

# 布尔塞维克

第三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小學校高級用

新時代國語教授書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的總結 定 一

這一次共產國際擴大會的召集，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到了戰後恐慌的『第三時期』的時候，『第三時期』這個名詞是第六次世界大會上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而決定的。第六次世界大會時，正當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時候，在很多人的心中，尤其是中國同志，都存着某種悲觀的觀念。但共產國際在那時却指出，全世界革命的高潮將要到來了。現在六次大會經過了不到一年工夫，世界上已經確確實實的發生許多大事件，證明了第三時期的到來，與其性質。一切的爭論，在這些事實的審判之前，自然雲開天青。同時，在這從歐戰以來從未遇到的環境之中，有許多新的策略，與實際工作方法，須要決定。在這情形之下，這次擴大會議中，所表現的空氣，是非常的一致，所解決的問題，是更清晰而實用。

擴大會的議事日程，共有三項：一、政治狀況及黨的任務，二、職工運動，三、國際紅色日（八月一日）。

### 一 政治問題及黨的任務

共產國際存在的十年來，對世界革命的估計會有兩度的變動了。在戰後的第一時期，當時蘇聯十月革命成功，處在帝國主義的四面圍攻之下，連麵包亦沒有，各帝國主

義國內相繼的爆發革命運動，這時期成立共產國際，其總的信條，是資本主義的必然崩潰，無產階級必須以暴力奪取政權，這個信條，是與工人階級的叛賊——社會民主黨最明顯的對壘。但當時對世界實際革命問題的估計，是（一）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革命，將立刻發生。（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某一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才能成功，否則是要失敗的。這兩個實際問題的估計，到一九二三年第三次世界大會上是改變了。列甯在三次大會上說：『在十月革命的前後，我們總以為資本主義先進國中的革命運動，即不立刻，也一定極快的將要發展了。並且若不如此，蘇聯一定要失敗的。……但實際上，事實並不如我們所期待的一樣。到現在，先進國的革命沒有到來。……那末，我們怎麼辦？現在就必須要做革命的基本準備，深刻研究先進資本主義國發展的具體情形。這是我們必須從國際狀況中得到的第一個教訓。我們必須利用這喘息的時間為蘇聯做點事，以便把我們的策略，適應於歷史的曲曲彎彎的發展』。在第四次大會上，他更說：『蘇聯有單獨的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

於是接着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的穩定時期』。這時期中，就產生了托洛斯基派。托洛斯基的革命前途，是絕望的前途。他的由來，乃是一方面只看見資本主義的穩定，這資本主義的穩定把他駭壞了，照這樣穩定下去，在他看來將來是沒有革命的可能了。另一方面是看不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成功，以為照這樣下去，蘇聯是一定

被帝國主義消滅，或者自己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這位浪漫主義的英雄，就回到軍事共產時期的匹馬單槍的革命事業。托洛斯基在與布爾塞維克鬥爭時自號爲列寧主義者。他常常引列寧在一九二三年以前的話，但是他沒有得到列寧所指出的歷史的教訓，這使他不能忍耐而發革命狂。可是他的革命狂，乃正是由他對於世界革命的絕望而發生出來的。托洛斯基的『左傾』，其實際乃是右傾。事實的發展，竟使托洛斯基與張伯倫合作來反對蘇聯。在他這樣公開的反革命以後，反對派在蘇聯就消滅了。拉狄克等向蘇聯中央寫信，說『大夢已醒，聲明在反對派的宣言上撤回其簽名，並請求恢復黨籍』了。

現在是到了資本主義戰後恐慌的『第三時期』了。什麼是第三時期？我想到一個很好的比喻：資本主義世界好比一個氣球，在氣球吹到十足之後，再吹一點點氣進去，就要爆裂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十足之後，再發展一點，也就要爆裂了，在地球上就要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社會來了。前次世界大戰，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十足而爆裂的時候，結果蘇聯十月革命成功，而世界革命，却因社會民主黨的背叛而沒有成功。被大戰所破壞的資本主義經濟，好像整的氣球一樣，但這氣球不是新的，而是舊的，已經破過一回，而被巧媳婦補過的。這氣球又漸漸的漲大起來，資本主義『穩定』而恢復了。可是巧媳婦無論如何巧，補不到『天衣無縫』，於是卽在這戰後資本主義尙未恢復到

十足的時候，已有中國大革命，英國總罷工，維也納暴動等驚天動地的事件發生，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屹然獨立，不能消滅，到現在，資本主義已經恢復到超過戰前了，那末，爆裂的時期又到了。在這時期，世界上已經有了浩大的有經驗的共產黨，來領導革命成功。有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做世界革命的大本營。

『第三時期』這個名詞，六次大會解釋道：『這個時期（第三時期）將不可避免的，經過資本主義穩定的矛盾之更加發展，使資本主義穩定變成更加不牢靠，使資本主義總恐慌極度加劇』。

右派與調和派怎樣呢？右派就公開反對這句話，調和派呢，口頭答應，實際反對，並且加以解釋，以解釋來修改。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只看到資本主義的穩定，第三時期的特點在他們眼光中就是資本主義更加由穩定而到發展了，至於在這時期中矛盾之加劇，他們是看不見的。同時對於蘇聯，也不要他有工業化。並且說蘇聯的工業化乃是極危險的政策，可以激起農民造反，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蘇聯現在要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這次擴大會上有一個材料，是調和派賽拉（意大利人，前在共產國際工作）在意大利共產黨中央擴大會上的報告，其中荒謬絕倫的話是多極了。口口聲聲都攻擊斯大林，攻擊斯大林本是這班人說話時離不了的，要用此來加罪於他一個人身上。現在只摘譯

最主要的幾句在此，讓大家看看調和派的政綱：

「我不等到第六次世界大會，就知道一個新的高潮時期將要到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我着重指出資產階級的民族的相當團結（換句話說，即各國資產階級在本國範圍內團結自己——定註），但這團結，加緊了各國資產階級間爭奪國際的領導權之衝突，而因為了國際關係之緊張，使資產階級在每一國家中調度（Maneuver）的可能減少」。底下就罵斯大林，說他要在「穩定」一字之前加上許多「不牢靠」「腐朽」等形容字，是違反六次大會決議的；關於戰爭危機，工人階級鬥爭激烈化等皆一字不提，這是他的第三時期觀。

「現在階級力量的關係，並不比一九二一年更於我們有利」。『革命的主觀與客觀力量的不平衡，比一九二〇——二一年更要厲害。要戰勝這個困難，共產國際必須幫助各黨在兩條戰線上鬥爭，不僅反對機會主義，並要反對那些革命的口頭禪，把階級力量的正確關係及鬥爭中的實際困難掩蔽起來』。

『對右派要用解釋的工夫，用黨內民主討論的方法』。這是在德國右派公開發生小組織，出版報紙，反對共產國際及德國中央時調和派提出來的辦法。至今這班右派已與社會民主黨一起，而賽拉先生對這好辦法尙是念念不忘。『誰是調和派？如果向右傾及機會主義讓步的叫調和派，那末，我們應當與之鬥爭的。但

如果他在反右傾中，不過主張採用與共產國際及德國中央的違反六次大會決議的辦法不同一點的辦法，就加上他一頂調和派的帽子，那末這樣的調和派，沒有人沒有權力去罵他」。

對於蘇聯，則說蘇聯現在遇到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從未遇到的困難情形。反對富農是不對的，因為俄國的富農，「其實際進款與意大利的中農一樣」，所以反對富農是把中農送與他。蘇聯的經濟，要恢復「輸出米糧，輸入原料與機器」，要自己什麼都立刻要有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應當注重糧食的生產。要增加糧食的產額，用不到什麼新式的耕田機器，只要給農民一點廉價的，用馬拖的耕具就好了。現在蘇聯的農村經濟，還是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的時候，還不是由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的時候，所以組織集產農場尚太早，現在是一般農民的財富應當增加，他們每家的收入應當增加到如富農的收入一樣。蘇聯的真正富農極少，現在的所謂富農，只等於意大利的中農一樣，而政府却對這種「富農」用非常的手段，當他敵人一樣，這是不對的，這將使中農統統怕起來，跑到富農的一方面去，那才是大危險。斯大林是在恢復托洛斯基的武斷政策。——以上是調和派對於蘇聯的觀點，在這裏，我們明顯的看到他們看輕蘇聯經濟上的成功，只看見「蘇聯遇到新經濟政策以來，從未有過的困難情形（！）」，「農村經濟是在自然經濟時代」



，看輕社會主義生產進步的能力，『要自己什麼都立刻要有（機器與工業原料）是不可能的』。那末怎樣呢？米不夠，可以向外國買，不要從富農身上用非常手段拿出來；機器沒有，可以向外國買，不必自己製造，但是戰爭的危機一天天增加了，帝國主義要向蘇聯開戰了！調和派先生們說：『沒有這回事，現在還是和平世界呀』。

此地算把調和派的觀點介紹了。看一看調和派及右派的基本觀念，在把他與托洛斯基的一比。有點什麼分別呢？沒有分別，本來是一家人。這種觀點，正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觀點。調和派在平常只東一句西一句的反對黨的政策，好容易現在賽拉把他有系統的和盤托出。聽說最近布哈林有同樣的文件。

現在讓我們言歸正傳罷。第三時期的總矛盾是起於市場問題。資本主義本來有兩個歷史的任務，一個任務是增加生產能力，一個是擴大市場。世界的市場是早已將盡了，又被蘇聯佔去了六分之一的地面，更加困難。但同時生產能力之增加，却在合理化之下，進行得非常之快。在德國，一九二五——二七兩年之內，鋼業工人的生產能力，增加百分之四十，複雜的機器製造業則為百分之四十五！這種合理化，是被最大的資本家，用來消滅小的資本及與其大的對手競爭的。在競爭中，一定要用合理化，但是你合理化，我也合理化，結果資本巨頭看不見他的大對手的消滅（當然小的消滅了）

，只看見市場的狹窄。現在合理化是到了什麼程度呢？美國是大家知道了。他的摩托公司，每年的盈利會到三萬萬美金，現在更在組織輸出事業的大托辣斯，來與他國競爭。後起的英國，正在計劃把紡織工業合理化。這個計劃說，在『開手時』，這大公司的紗錠數目，就要超過德法二國紗錠的總和。但無論如何，現在合理化的狂熱時期已經過去，後起之國如英國一定會感到極大的困難。因為生產能力如此猛進，而市場的需要不增，所以（一）現在有無數的生產工具閒着。照國際聯盟的統計，這樣閒着的約有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二）無數人的失業，美國已到四百萬人。歐洲有五百萬，全世界約有一千五百萬的失業者。（三）生產的發展，呈停頓現象，重工業除了銅的產額，現在比大戰前增加百分之六十以外，其餘都非常之慢。本來在一九二四年，各種金屬的產額，除了生鐵以外，都已超過戰前了，而且一九二五年時，鋼的生產，已超過戰前百分之十九了，可是一九二八年的統計，表示鐵礦超過戰前僅百分之十，鋼的生產僅超過戰前百分之二十。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公開表示停滯，公開表示生產的增加遠落在其可能之後。

這一次擴大會上，對於合理化有一個討論。合理化是增加生產能力的，資產階級的學者並且說合理化的意義，等於第二個工業革命。尤其是美國，因為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最『興旺』的一個國家，那邊的資產階級學者，就造出理論，說合理化將使社

會和平地進到社會主義、絕對用不着什麼布爾塞維克的革命與暴動。這種理論，影響到美國黨內，而有『除外主義』發生。所謂『除外主義』，即是說，世界資本主義發生恐慌了，但美國除外，無產階級激進化了。但美國除外……什麼都是美國除外。合理化究竟是否第二個工業革命呢？這次擴大會肯定的說不是的，非但如此，並且合理化的本身，只包含組織的改變，是工廠管理法的進步，而不包含生產技術（Technic）的進步的。我們對於資本主義合理化，應當取反對的態度。

爲什麼說合理化不包含技術的進步呢？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就到現在還在進步的，但是這進步已被阻礙了。列甯在帝國主義一書中，曾引了一個例子：一個美國人發明了製玻璃瓶的機器，本來玻璃瓶的製造是用氣吹的，這種吹氣的工人，五年之後，肺部就要腐爛了。但是資本家當時因爲用機器不能增加其利潤，所以把圖樣藏之高閣，十六年之後才在美國應用（在列寧寫書之後數年）。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到Donbass時看到，真是精妙的機器。現在，這種事情亦何嘗沒有？與個更明顯的例子，戰事工業與生產工業的技術，比較起來，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戰後的化學工業，乃是戰時毒氣工業的一點唾餘。帝國主義者是爲殺人而在生產，他們最主要的工業技術的發展，是在戰事方面！

合理化所引起的工作的緊張，是加重工人的體力的消耗的。在合理化之下，實際

工資的計算，就要顧到這一個重要點。華爾茄(Varro)有個錯誤，就是他在計算工資的時候，沒有把這一點顧及，因此認為現在工人的生活程度沒有低降。這個錯誤，擴大會上統統反對。合理化在工廠中工人組織的變化，最重要的就是皮帶制度(Conveyor System)；在走動着的皮帶旁邊坐了很多工人，第一個工人把第一手續做完，就放在皮帶上轉與第二工人，這樣的組織法，使工人一點點懶也不能偷，而要趕緊的在規定的時間內，把他的手續做完。工程師可以計算一件物品從頭至尾要做多少時間，不差一秒鐘！工人對於合理化有一句俗語，叫做『進工廠的時候，把大衣與魂靈一塊掛在更衣室裡』！資本家對於牛馬，多做了些工作尙且要多給一些滋養料，但對於工人則比牛馬也不如，增加其剝削，而不給以多一點的工資！

對於失業問題，華爾茄認為現在已發生了在生產中工人日益減少的現象，所以資本主義起了機體上的變化。他的理論亦被反對？大家以為現在失業工人是大量地增加，但在生產中的工人也增加的。馬克思的理論是對的，華爾茄的理論是不對的。

以上講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狀況，及由此而附帶說及了幾個問題。但目下資本主義中的特殊現象，除上面所說的生產方面之外，還有金融方面的。

財政資本與工業之日益混合生長，現在是沒有停止，而且到了這樣的高度，甚至使財政資本要考慮怎樣把自己的形跡斂藏一點，不要公開的來統治工業資本，以免去政治

上的不良結果。同時，銀行日益厲害的統治到國際範圍來。統治世界的金錢市場，統治信用事業。統治物價的漲落。這種統治，是在英美的手裡，尤其是在美國的手裡。

可是在這財政資本日益得到領導權的時候，同時也發生了幾個特殊的現象：（一）有些新工業想脫離銀行之束縛，而自己掌握經濟（如電氣，化學等工業），（二）銀行所得的利潤，遠超工業所得的利潤，所以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發生本身利益的衝突，（三）量資本輸入高度工業發展的國家」的現象。從前資本的輸出總是向着農業的或半農業的（更有趣的現象是「大國家的，他開條路。使工業製造品或半製造品輸出到新的市場上了，可是現在，則這資本供給了工業的敵國。由此而起工業原料的輸出。這樣就更促進了先進國的工業的發展，而市場問題益發不能解決了。

最後一點非常重要的現象，是金錢市場的大恐慌之將臨。這是目前非常可以注意的一回事。這個恐慌的表現，是在銀行利息之日高（銀行利息在大戰後各國金融恐慌時非常之高，後來漸漸穩定，利息也低下來——二·五%左右，現在又高起來了——二〇%）。這一個浪潮是從那裏起原的呢？是從最「興旺」的美國。美國現在交易所的投機事業大發達，所謂「經紀人的賬」有一時竟到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六十五萬萬）之巨數！好股票的價格大漲特漲，有到二倍以上者。這個現象，使信用借款的利息日高一日，使信用機關的組織瓦解，從美國又影響到別國來。大批

的資本，不投於生產，而投入投機事業。結果使金融遇到日益增長的危險。爲什麼有這個現象呢？其原因是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勻加緊到萬分，只有很少的國家情形順利（美國），而全世界各國都大受打擊，沒有興旺的可能。

這些一切，都加緊帝國主義掙扎來維持自己的壽命。其最主要的問題仍是市場問題，而市場問題總不能和平解決的，帝國主義者既實行了合理化（英國亦在開始），又減少工資，增加工時（這是許多新的工人鬥爭發生原因），又準備輸出業之總競爭（美國已在組織），最後，只有準備戰爭，來奪取蘇聯，來爭奪殖民地，來屠殺革命的工農，來打倒自己的敵手。因此，戰爭的危機日益緊迫，階級鬥爭的形勢日益緊張。

第三時期，是帝國主義沒落的時期。是全世界革命總爆發的時候。那樣驚天動地的中國大革命，英國總罷工，維也納暴動，只算得第三時期的楔子。

最強硬的是事實，六次大會以來的世界歷史，可算是階級鬥爭的空前未有的熱鬧的一段了。

### （一）帝國主義系統內——

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登台及其法西斯蒂化。德國社會民主黨登台之後，接着英國工黨也在大選中得到勝利。除了這兩個國家以外，其他則法國，日本等，的『左派』也一一上台。社會民主黨的登台，這一次是戰後的第二次了。他第一次登台時，是適

當歐戰終結，各國皆起極大的經濟衰落的恐慌。十月革命的影響，有掃蕩歐洲的發展的時分。社會民主黨就帶了一副『激進』的面孔上台，對工人說，我們上台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了。這樣，他暗地裏幫助資本主義的穩定。到現在則更不同了。現在他們的專政了。這樣，他暗地裏幫助資本主義的穩定。到現在則更不同了。現在他們的專政了。上台，簡直就沒有一點兒爲工人階級謀利益的氣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德政，除了上次報告中已寫了一點外，在五一節則禁止工人的示威，社會民主黨的柏林市警局長走爾狗鉢兒並命令屠殺工人。英國工黨大選時的政綱，竟是公開的資產階級政綱。社會民主黨由工人階級的叛徒，變爲十足的資本主義擁護者。他的本身，已與一九一四年更不相同了。這個社會民主黨，帝國主義就用來做他的政客，不是爲穩定戰後的恐慌，而是爲在第二次大戰之前夜，來準備戰爭，來更加重的施行壓迫工人及殖民地，反對蘇聯的工作。

社會民主黨與從前一個極大的不同點，就是他的法西斯蒂化。右派與調和派對社會民主黨是完全反對我們對社會民主黨這樣認識的。這一個問題，在六次大會上已經有了討論與決定，這一次擴大會上更加多了各方面的解釋。

社會民主黨是不是在變爲法西斯蒂？柏林五一節的屠殺就是最明顯的實證了。

社會民主黨有沒有變爲法西斯蒂的理論上的可能？只要看莫索里尼從前便是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之一，他大戰前還激進的辦報紙反對戰爭，到後來一變而爲法西斯蒂。

在帝國主義的獨占經濟發展到現在的程度時，在政治方面，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獨斷，資產階級獨斷政權的形式，就是法西斯蒂。意大利共產黨的右派，曾以為意大利法西斯蒂，是退步到專制政體，所以現在應當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合作，將來的意大利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是完全與絕對的錯誤。同時國際右派及調和派，以為現在社會民主黨不是用獨斷的方式來執掌政權，幫助資產階級，而是以更民主的方法。右派更以為這樣的民主下去，社會民主黨左派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友人，並可以走到共產黨隊伍裡來的！

社會民主黨的成為法西斯蒂，是在他的階級基礎的變化。社會民主黨是工人貴族的黨，是高等工人的黨。到了現在合理化的時代，工人的成分大變。合理化不要高等工人，而要沒技術的工人，在工廠中，不熟練工人的成分大增，而高等技術工人，或者無所用其才，或者就成為脫離實際生產，成為管理生產者（監工等等），這樣，從前的高等工人，到此日益與政府機關接近，成為其一部分。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就是這班人，這班人可說是在『中國工頭化』。非但如此而已，他們在企業中有許多同時是股東了，法國的黃色工會，甚至投了許多資本在非洲，與法帝國主義一塊剝削殖民地。在這種狀況下，社會民主黨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混合生長起來，成為資本家在工人羣衆中執行命令的一只最好的手臂。他因此而在現時登台，因此而反影資產階級



公開獨裁政權的要求，而法西斯蒂化。

社會民主黨的第二次登台，表示帝國主義已遇到如此重大的困難，使他不得不把最後的一斧頭使出來（程咬金的三斧頭）。可是因其如此，社會民主黨遇到極快的崩潰，大眾工人的退出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已經開始，尤其到了五一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青年團，決定每個社會民主黨員必使其子弟加入社會民主青年團，來維持他日益崩潰下去的組織。在英國，大選時，工人說『讓我們再給工黨以一個機會』，這表示英國工人對工黨的幻想尚未消滅，而其懷疑已在生長。最近，世界紡織中心蘭開夏的五十萬工人，因廠主要減少工資百分之十二又五而宣布大罷工，英國工黨政府出來調停，竟決定減少百分之六！在不久的將來，立刻可以看到英國工人羣衆，站起來反對這世界上歷史最久的工賊黨了！

只有那右派與調和派，在替社會民主黨遮掩。德國右派對柏林五一的流血事件，說德國共產黨中央盲動，說走爾狗鉢兒的屠殺，不是法西斯蒂，而是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普通辦法』！說社會民主黨何可合作！

在社會民主黨變成法西斯蒂，或為資產階級最後的工具而登台時，就有左派的起來。這左派的作用，就是來和緩社會民主黨的崩潰與工人羣衆的革命化，造成一個幻想，以為社會民主黨中尚有反對派在。這個『左派』，實際上是完全真心誠意的擁護社

會民主黨的法西斯蒂政策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英國的獨立工黨。他的領袖麥克斯東與柯克，簡直是英皇太子的最好朋友，他們的黨內，麥克唐納爾亦是一員。獨立工黨對於麥克唐納爾空口反對，實際上是只在拚命反對共產黨。在與社會民主黨鬥爭的時候，應當特別指出這『左派』的奸賊！

對蘇維備戰之緊急。帝國主義在準備大戰，這是誰都知道了。右派調和派是未嘗不如此說，即中國的改良派亦何嘗不說。但是這班帶着革命面具的反革命走狗，他們是從不指出帝國主義備戰的第一個目標，是向着蘇聯進攻，雖然他們甚至還叫着『保護蘇聯』的口號。這一點，是我們與他們大不同的一點。

前次報告中，對於英法的聯合，以及此後的許多事變，包括阿富汗的內亂，都已說到了。第十次擴大會上關於各國對蘇聯備戰情形有書面材料。這個材料，是多關於實際的情形的。在他們的實際佈置中，法國是最努力的一員。在波蘭，有不少的法國軍官，軍火也不斷的由法國輸入，在保加里亞亦然，波蘭與保加里亞是反蘇聯戰爭中最主要的工具。英國則在阿富汗波斯等一帶準備工作。日本尚不十分起勁（報告中如此說）。

自前次報告到十次擴大會時，有裁減軍備委員會（國際聯盟的）的破產，公開否決蘇聯的提議；有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的起來贊成德政府的軍備計劃，表面上說『如果德

國沒有軍備，將來各國進攻蘇聯時，德國將不能中立；有楊格計劃（Young's Plan）（對於德國賠款問題的）產生；在擴大會上則更有中東路之挑釁，屠殺了三十餘萬革命工農的劊子手。做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工具！尤其是中東路的這次挑釁，是在帝國主義包圍蘇聯的形勢已由歐洲擴展至中亞細亞以至遠東的時候，國民黨竟以武力來搶奪蘇聯的財產，逮捕無數蘇聯官員及人民，組織白俄騷擾蘇聯的邊界，這種行爲，是武裝挑戰的更進一步的表示了。所以這件事特別挑動全世界工人羣衆的憤慨，在各國都有工人的示威運動，起來反對，許多地方的示威是在中國公使館門口舉行的。此是後話，不提。

在擴大會中有辨論的是德國賠款問題。華爾茄的意見，以爲楊格計劃可以和緩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所以雖賠款問題是並未被楊格計劃所解決，但衝突是可以暫時延緩其發展。衝突的發展是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意見受到很多人的反對。在摩洛哥托夫的發言中，摩指出了關於賠款問題的兩個主要現象。第一是帝國主義衝突並不因楊格計劃而可有和緩。而可到『不久的將來』才加緊。帝國主義衝突就在楊格計劃中加緊起來，『現在』加緊起來。第二是楊格計劃表示美國帝國主義也加入了反蘇聯的戰線，這是第一次的表示。

楊格計劃的最主要點，一是所謂國際賠款銀行之設立，二是萊茵流域的撤兵，三是

德國賠款數量之減少，同時以物代款的數量要逐年減少。美帝國主義第二度出來作主賠款問題的時候，世界情形已與道威斯時代大不同了。國際銀行是美國以經濟統治歐洲的企圖，是與英法帝國主義不相容的。萊茵河的撤兵，是德國可以強盛起來，這是對蘇聯的威嚇，同時也是對法國的大威嚇，法國是絕對不肯的。賠款數量的減少，是減少英法的收入，同時英法等對美國的借款，却仍照舊要還。以物代款的數量逐漸減少，是來救濟世界市場的恐慌，但是德國何來款子？照計算起來，德國要拿到這筆款子，須要占領全世界八分之一的市場，這明明是要他向蘇聯進攻，取得市場。這就是美國的計劃——把德國強盛起來，以經濟控制全歐，再叫德國進攻蘇聯。美國做進攻蘇聯的一員，並其組織者，是有極大的意義，不可輕視的呵！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日益迫近，特別是對蘇聯進攻的危機更是日益迫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護蘇聯的口號，日益成爲共產主義者的每日的口號。

工人革命運動的勃興。自從去年洛茨（波蘭）罷工以來，歐洲工人罷工運動勃興。德國的魯爾罷工，漢堡罷工，動輒數十萬人的大行動，與警察衝突。法國則每月有罷工一百次左右，特別是去年底的紗廠大罷工，牽連到整個法國東部。在其餘的各國，都有第一次的罷工發生，幾乎資本主義國家遠至南美洲，沒有一個除外的。在這些大門爭之中，工人羣衆表現異常的激進，特別是無組織的工人。黨則除了德國與波

蘭以外，都表示領導的不够。這次擴大會上的第二項議事日程，就是特別對此問題的，姑且留在後面再說。

現在僅要說到這種罷工運動中，共產國際與右派調和派不同之觀察，再有五一節的運動，特別是柏林的流血事件，這是十次大會以前工人革命運動的一個總結，從這總結裡更可看清工人運動的情勢的。

共產國際與右派調和派的鬥爭，從去年就起了。對於職工運動的問題的右派調和派認為現在的大罷工，乃是純粹的保守性的罷工，沒有進攻的性質。共產國際則認為現在罷工的形勢，已由保守而帶有進攻的性質，已由經濟的而帶有政治的性質。工人階級是在一種半醒悟的半革命的狀態之下。因為資本進攻的加劇，法西斯的壓迫日益明顯，工人羣衆每個鬥爭，有與政府機關直接衝突之必須，在這狀況之下，工人將急劇的革命化。黨應當豎起獨立的鮮明的旗子，不畏怕不妥協的來領導工人。現在的特點，是調和黨（社會民主黨）的立場已經明顯，而工人羣衆經過戰後十年沒有什麼大鬥爭，現在忽然到處發生數十萬人的堅強的一致的行動，不復聽那資本家的『和平』鬼話，及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不復怕那逮捕，拷打，與種種警察與軍隊的暴行，這是再明顯也沒有的工人革命運動極速發展之表徵了。自大罷工以至五月一日，這種論斷在事實上表現其十分正確。

今年的五月一日，世界上只有最大的聲音在響着！從來未有那一年的五一節，有像今年那麼全世界的緊張的空氣的。西歐的資產階級政府，公開禁止這每年一度的工人示威。巴黎與華沙，共產黨要人幾乎被捕光了。但是到五月一日，工人羣衆仍舊拿着紅旗，與武裝的警察爭街道，在柏林發生了流血事件。此地必須說到，在許多國內，是有產生與德國同樣偉大與劇烈的運動的可能的。可是只有最健全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了如此偉大的運動。

柏林的五一，有很多有趣味的事實可述。在五一的前一個多月，紅旗報（C P的）與前進報（S P的）就爭論起來，一個叫工人上街示威，一個叫工人聽政府命令在屋裡開會。走爾狗鉢兒禁止示威的命令下來後，共產黨更大鼓動。到五一，『柏林街上呈着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的一年）以來空前的緊張現象』（資產階級報紙說的）『即羅曼諾夫時代也沒有的』。示威的會場被軍警占領，工人即到處集會，與軍警衝突，爆發了兩個工人區域的巷戰，街上鋪的石塊就拿來堆做障礙物與武器，軍隊開槍，死數人，傷數十人，被捕數百人。在這巷戰的時候，工人就向共產黨要武裝，說『你們告訴我們要暴動，我們知道武裝在那裏，我們就去拿來暴動』。社會民主黨就來挑釁，在濟難會及黨部等地方放了炸彈等，說這是共產黨預備暴動的。一面又造謠說俄國派了曼牛爾斯基（共產國際主要人物之一）來柏林指揮五一暴動，又說領導工人巷戰的

有俄國紅軍領袖等等。當時，黨必須要取堅決的態度了，要知道這個時候的臨時決斷是很困難的呢。黨在障礙物背後散傳單與工人說：『暴動是必須的，無產階級革命最後一定要暴動。但現在時期未到，現在不能暴動。你們與警察巷戰，共產黨是一定與你們在一起的，現在的任務是動員廠中的工人羣衆出來與你們一起』。沒有疑問的若是暴動，一定是大失敗了，若是因不暴動而連巷戰也不參加，甚至自己解散巷戰，則共產黨在工人中的信仰一定低落了。德國黨的態度，使他得到勝利。

五一之後，社會民主黨政府就封閉紅旗報與禁止紅色先鋒隊（Rote Frontkämpfer Bund），共產黨就印刷秘密報紙『紅色戰鬥』（Rote Kampf），這是用打字機的，因為過去對於秘密印刷沒有預備。領導反抗五一屠殺的政治大罷工，及反抗封閉紅旗報的運動。五一後的政治罷工，參加的人數不十分多，這是右派調和派等拿着來說明德國共產黨五一運動失敗的證據。他們（右與調）並攻擊德國中央。說五一是一盲動。他們是對不對呢？完全不對的。今年五一後的政治罷工，可以說是一九二三年以來，德國從來未有的純政治的罷工了。共產黨的勝利，表示在他已能動員數萬工人做政治罷工。在工人中把社會民主黨的信仰打得粉碎，社會民主黨下的工人，在五一後成羣的脫離黨，有整個支部加入共產黨者。

共產黨有沒有錯誤呢？有的。但並不是由右派與調和派指出來，而由德國中央

自己指出來的，這個錯誤就是沒有設法恢復紅色先鋒隊的公開，而隨便讓社會民主黨禁止了。所以他們決定在八一節號召另一組織，叫做『反法西斯蒂團』，來代替紅色先鋒隊。最近，又聽說他們在九月一日國際青年日的示威中，要把紅色先鋒隊復活起來，再着了從前的制服來示威。

五一節柏林之大屠殺，其世界的意義非常重大。這是帝國主義戰後穩定以來歐洲工人階級第一次流血。資產階級常常以德國自誇，說德國是歐戰以後產生的從來未有的民主國家（因此他們說共產黨的『帝國主義進到資產階級公開獨裁』是謊話），現在又是社會民主黨得到最大多數的票子而執政的時候。五一事件把一切都揭穿在工人階級面前。柏林的五一事件，還不像維也納暴動，英國總罷工等發生在帝國主義經濟『穩定』時期，而是發生在帝國主義普遍地感到新的大恐慌的時期，所以這是一個信號，說全世界的革命是在高漲起來，資本主義世界整個根本搖動時期特別的信號。惠定區與紐庫倫區的工人，與警察的作戰，表現階級鬥爭之激烈，社會民主黨的法西斯化，工人階級的左傾，都非虛語。這是現在最要注意與普遍的一件大事。

除了工人以外，農民亦在激進化，這現象表現於歐洲；在波蘭，五一節有五萬農民示威，在瑞威，德國，及巴爾幹半島各國都有同樣現象。資產階級因為備戰，要農民多生產以爲戰時之用，現在各國都有農村改良政策之出現。擴大會上亦特別注意此問



題，並在議決案中特別加上奪取農民的一條。

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隨着帝國主義加緊剝削與爭奪殖民地而起來。

先說一說帝國主義爭殖民地的形勢，這裏我們可以看見美國的非常激進。從前沒有殖民地的美國，現在非但是想以門羅主義炮艦政策，囊括美洲，並且在一切殖民地上面，遠至印度，都有他的手臂伸到了。美帝國主義在一切殖民地上，其政策完全與在中國所執行的一樣，就是幫助那地方的資產階級。在印度，美國就替那班改良派說話，美國報紙常常向印度的『獨立運動』作同情之鳴，而反對英國的殘暴。在中國，則美國正在企圖獨霸爲其資本輸出之市場。現在我們看得更加清楚，各國殖民地資產階級，其作用僅爲美帝國主義的工具；卽此一端，也就可說現在殖民地資產階級客觀上沒有革命的作用，他已不是助着階級鬥爭的發展，而是助着帝國主義來爭奪這一殖民地了。

中國資產階級，還算唯一一個曾經在革命之中發生過作用的呢。廣州暴動之後，是沒有第二個了。

不但這樣，甚至殖民地革命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成功的，如土耳其，到現在也開始在失其自主。最近，基瑪爾承認了協約國的舊債，名爲烏托門借款（Ottoman debts），並以君士但丁堡的關稅交於協約國爲付款之担保。這證明了甚至在土耳其，已經得到獨立的國家，基瑪爾想在帝國主義時代中造出資本主義的土耳其來，尙且不能。列甯

在帝國主義一書上說，在帝國主義時期，經濟落後的國家絕對沒有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前途的，甚至獨立的，也要化爲附庸（大意如此，書不在手邊，不能找原文）。這大可以教訓教訓那班高唱國家資本主義的改組派，及所謂非殖民地化論者。土耳其更是個好例子。

黑炭魯易，避居柏林，在擴大會前，在德國已被開除的右派 *Blackletter* 的報紙上，發表文章，說殖民地的工人階級，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到資產階級反叛的一天。說印度資產階級現在仍有革命的作用無產階級尙應與合作。這篇文字，不啻他的退出共產黨的宣言了！

殖民地革命運動的目前形勢，一方面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復興，一方面是印度大罷工的爆發，同時在許多殖民地上，皆有罷工之爆發，如高麗三月間之碼頭運輸工人罷工，如波斯的罷工。如美洲香蕉工人的暴動，如摩洛哥革命之復興等等。帝國主義之剝削，使農村的饑荒愈厲害。中國，印度皆有極大的農村饑荒。中國革命浪潮低落以後，新的殖民地革命浪潮是挾着比從前巨大十倍的勢力而滾來。

印度的革命是極堪注意的，雖然我自己所得不多，亦可以寫一些告訴你們。

印度與中國革命不同之點，就在印度的資產階級，現在已不如從前中國資產階級的尚有革命作用，而這反動的印度資產階級，却因爲過去曾領導過獨立運動，在羣衆中有

比較根深蒂固的影響。特別是甘地的無抵抗不合作主義。印度的工人運動是起來了，但是共產黨的力量非常弱小，幾乎沒有。特別是共產青年團，至今尚無組織。在印度，我們感到缺乏有力的共產黨。

甘地的反革命已是日益明顯。在他領導之下的印度國民大會，今年開會時曾電賀國民黨的革命成功，並捨棄『完全獨立』的口號，而向英國要求把印度做屬國(Dominion)而不做殖民地，決定向英下哀的美敦書，謂如果不答應，將要於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宣佈全國總罷業來對待。可是即這個哀的美敦書，在八月初已看見報上載着，甘地提議把他延期了！這班資產階級的右派，是竭力反對階級鬥爭，要國內階級和平，在工人運動日益高漲的時候，他一天天靠到英國，懷抱裏，要他保護來消滅赤禍。

在甘地信用漸失的時候，就有小耐羅起而代之，小耐羅是十足十足的改良主義代表。印度學生中最近也有了社會主義運動，當然受到無數的反對，耐羅曾出來替社會主義說話。他在印度的地位，甚至有超過甘地之勢。在一切革命羣衆的集合上，總有他的足跡的。上述的社會主義團體，開會時請他做主席，在工農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黨)。在工會等中，他都是重要脚色。可是在孟買大罷工的時候，他身為重要負責人，有意的怠工，他的同志嗾使回教徒與印度教衝突，這樣來破壞罷工。

印度工人運動，雖然熱烈，然而因為黨的弱小，工人羣衆是在半覺悟的狀況中。

全印工會開會時，泛太平洋勞動大會，黃色職工國際都在印度有活動，然此大會決定兩面都不加入，而加入反帝同盟，因為當時反帝大會派往印度的代表被捕了而惹起的憤激所致。可是同時，在工人示威時，曾有一次喊出了『蘇維埃印度萬歲』的口號。

印度工人運動日益發展，帝國主義就日益厲害的用恐怖手段，大肆逮捕。這種白色恐怖手段是日益厲害。印度黨甚弱小，團沒有。從前黨還犯了錯誤，就像中國從前一樣，不露自己色彩，想把自己藏在工農黨裏面，不發展自己的活動與組織，因此幾乎成了取消的現象，現在趕快改過來，但領導的同志有許多被捕了。

殖民地的運動，總帶了很濃的自發的色彩，如果不趁此時努力堅強黨及工會的基本組織，則仍無力量的。印度亦是如此，譬如工會，因孟買之罷工，孟買工會由數百人突躍為數萬人的組織。同時城市與鄉村革命的聯絡，也非常重要。印度農民過去受了資產階級極大影響，現在雖有飢荒，尚無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印度內部民族甚多，宗教亦深，這都是將來比中國麻煩的問題。現在印度的最主要問題，還是造黨與團。印度的革命前途是很可樂觀的，三萬餘萬的奴隸，將在歷史上顯出他的英勇來了。除了印度以外，最近又有阿剌伯的大騷動，殖民地革命之火焰，燃燒到滿天紅了。

現在要說到

## 蘇聯系統內

去年籠罩全俄的麵包恐慌，右派與調和派得以藉口來做反對蘇聯工業的嘗試。在四面包圍之中屹立十餘年的蘇聯，已經完成了恢復經濟的工作，而進到新的建設社會的時期。從前在蘇聯經濟非常恐慌（因大戰，革命，與內亂）的時期，蘇聯政府是不得不向私人資本及富農取讓步的策略——新經濟政策，這時期，非但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那是完全非列寧主義的）不能行，而且是不稍向資本主義的分子讓點步不行。現在是已經過了這個艱難的時期，而是向工業化邁步猛進的日子了。但左派調和派說不然。

他們說現在是蘇聯國內經濟情形非常危殆的時候，再不向『農民』讓步，『農民』要起來革命暴動了！的確，蘇聯的經濟恢復了，而階級鬥爭却加緊了。這個鬥爭是在農村裡最顯著。蘇聯的農村經濟，現在還是許多極小的個人經濟。蘇聯政府向農民收買麥子，統統在中農與富農家裏。在軍事共產主義的時代，農民不肯多種麥子，因為多種的結果是被無代價沒收。現在富農是有了麥子而不肯出賣。藉口是政府定出的麥價太低。富農知道麥是在他手裏，人要吃飯，麥不怕賣不出去。在麥價太低的口號之下，他就不把麥賣給政府，而趁麥子恐慌的時候，做投機生意，這樣來搗亂市場。更進一步而要求減少富農的納稅等等。再進一步而幹各類的反革命事業，破壞蘇維埃信用，殺戮共產黨員，組織暴動等等。政府也就不客氣，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

法律，你搗亂就給你懲罰，於是下令沒收不肯照價賣給政府麥子的富農家產，在沒收中發現了口喊『我沒有麥』的富農家中，堆麥如山，有的甚至堆久出了芽的。除麥以外，連他的農具，傢伙都一並沒收了。此時鄉村中的階級鬥爭，發展到非常厲害的程度。這幾乎是每年一度，到去年更加厲害而已。

怎樣來根本解決這個問題？第一應當把麥產的處理，完全放到政府手裡，民食不靠富農，而靠集體農場及蘇維埃農場。第二，應當增加工業生產品，減低其價格，賣與農民。同時，要顧到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惡意日益增加，農村集體生產及增加收穫所必須的機器，以及製造工業品的生產工具，與自衛的設備，必不能像以前那樣的專靠外國輸入。那末，要趕快解決這一切的問題，只有拚命注意重工業。有了足夠的重工業，然後輕工業的機器可有了，輕工業的生產可以增多而便宜了，鄉村中的耕田機器也有了，收成可靠了，集體農場等可以大大的擴展，使民食的支配完全在政府手中，集體農場並教育農民以社會主義。只有這樣，才是建設社會主義。尤其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日益緊張之時，說不定什麼時候斷絕一切仰賴與國外的必需品的來源，說不定那一天帝國主義向蘇聯宣戰，上述的任務就加二的必需執行。同時，蘇聯的經濟狀況，雖然不十分好，也已經有能力來實行這個任務。

右派與調和派則不然。布哈林從前就有個理論，說富農是能和和平的生長到社會主

義裏來的。在他看來，富農也是社會主義的後補員，在他看來，如果蘇聯的經濟發展，階級鬥爭不會在蘇聯發展，『如果社會主義經濟一天天發展，而階級鬥爭也發展，那末，這是什麼社會主義呢？』富農在鄉村裏殺戮共產黨，威嚇政府，左派調和派就在黨中主張向『農民』讓步。他們是看不見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惡意日增，看不見全世界已到了戰爭革命之前夜，所以覺得蘇聯沒有必須來努力社會主義建設，努力發展重工業。同時，他們看到蘇聯的經濟情形，以為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參觀前面引的賽拉的話）。他們如此來解決問題：

『農民』（富農）不肯出賣麥子，就應當抬高麥價（如果富農仍不肯出賣，怎麼辦？），沒收不是方法，要引起暴動的。今年麥子不夠，（够了）應當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國防儲金，向外國去買（如外國亦不賣則如何？豈非引起大恐慌，而使蘇聯復滅？）。現在農村耕地面積減少（不對），表現過去對農民的政策不好。應當發展輕工業，使工業品低廉，而農民不怨。輕工業的機器，向外國去買。應當增高農業生產，輸出糧食輸入機器。要增高農業生產，應當再使鄉村的個人經濟富裕一點，『大家來發財』（布哈林語），以後再講別的（如果再讓鄉村中的資本主義發展而不加揭制，富農更發展，更作惡。這在布哈林當然不要緊，因為富農不是社會主義的敵人呀）。『你們的計劃我不反對，但再過兩年實行才好，現在實行我的。』（雷

可夫語)。

右派弗浪根，則甚至主張減少富農的納稅(賽拉亦然了!)，與取消派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這簡直是更公開的不要蘇聯存在了!

聯共中央與這些右傾分子作死鬥，通過了五年計劃，五年計劃起草時有好幾個，後來揀了最大的一個而更加了一點。右派調和派在旁訕笑，全蘇聯的工人與貧農，全體動員執行這個五年計劃。五年計劃的原則，上面已講到，其內容並及於教育，工資，等項，各方面的生活都包括在內。這樣的計劃，五年的，全國的，各方面完全包括在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未有，在歷史上是大放異彩的!

計劃的內容大要，大概你們已經知道，現在要說一說這計劃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經濟是死對頭，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超過資本國家數倍，五年計劃，更是加速的發展社會主義，他的意義，就不僅是保守的而是進攻的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之突飛猛進，足以使歐美無產階級覺到社會主義之遠超資本主義，這是世界大革命的催生符咒。蘇聯的強大，足以使他有力量甚至以武力來幫助他國革命。所以帝國主義及社會民主黨，在五年計劃之下駭得胆戰心驚，有一個左派的法西斯蒂說，現在我們反對戰爭，戰爭的危機是張伯倫與斯大林之間。這五年計劃宣佈之後，到第十次擴大會時我們看見什麼現象呢。十次擴大會以前不久



，黨內還在拚命爭論。右派調和派拚命攻擊，可是一年未滿，而所得的結果，已經超過了第一年的計劃。舉個例子，五年計劃中最困難的是農業，第一年計劃中，增加耕地面積一。五百萬畝，結果增加了一。八百萬畝。集體農場的組織，預算到六月一日要有七千個包含七十八萬畝，結果，有了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個，包含了四百萬畝！（在貧農多耕的時候，富農就有意少耕一些，與政府作難。）工業中亦是各項都超過了預算。這真是歷史的奇蹟！非但右派調和派根本反對五年計劃的預料不到，無論誰，那裏想得到從幾個計劃中揀了一個頂大的，再加了一點的五年計劃，竟非但能實現，並且超過了呢？所以五年計劃中的第二年計劃，現在已有修改，改得更高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竟如此匪夷所思的偉大！

我們在蘇聯看到了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五年計劃定出後，工農羣衆都看到這是自己的事。他們自動手的肅清一切障礙，自動手來實現這個計劃。各地工農清除官僚主義，組織社會主義的競爭，城市與城市，鄉村與鄉村，工廠與工廠，部門與部門，都自動的訂立交換合同，要實現自己的生產計劃到百分之百，並且要超過。要改善生產紀律等等。共產青年團員，在工廠中組織『堡壘』，做全廠生產的模範，生產得最好而最多。爲建設社會主義，爲保障蘇聯，爲世界革命，成千成萬的工農在蘇聯灑其血汗。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難道如國民黨那樣屠殺工農的刮民政府空喊幾句『建

『所能辦到的？』今年，差不多小一點的工廠，統統要改到七小時工作制了。在已改到七小時的工廠中，工人的生產能力，等於或超過從前沙皇時代作工十二小時的。五年計劃完成，蘇聯將實行六小時工作，工資增加百分之七十，物價減低百分之四十。

這樣的事實，使聯共黨內反右傾的鬥爭，成爲比較容易的事。不像前次反對派鬧事時，當時列甯格勒與莫斯科有兩個月幾成敵國。現在則幾乎全國一致的反右。但執迷不悟的右傾分子，至今仍在繼續其工作。清黨期到，他們的日子不遠了。

### 黨的情形

大風暴的時期將到，黨的布爾塞維克化是成爲非常的必要了。一年以來，在各國都發生了右傾的問題，德國的，法國的，捷克斯拉夫的，英國的，蘇聯的……雖然上述各國黨內的問題，在擴大會以前都有若干解決，但是餘毒仍未清純。目前主要的仍是與一切右傾與調和派鬥爭。尤其到了現在，右派開除之後，調和派已經代了右派的任務。

黨內問題在擴大會上最惹人注意的是英國問題。英國的黨遲遲不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在英國大選時黨仍動搖，對印度的問題，極少幫助。在倫敦舉行了一次爲印度而示威的羣衆集會，其中僅有四個同志參加。對獨立黨，仍存幻想，獨立黨却一天天的向共產黨進攻。擴大會上英國代表還在說左傾是英黨內最嚴重的危險。而且英中

央局又把幾個最能執行共國路線的人調開。會上對此問題，惹起了幾多爭論。決定調換英國黨的領袖人物。

美國黨的代表報告美國黨內的情形，非常有趣。美國的多數派與少數派都是右傾的，其爭論是無原則的爭論，這爭論已經繼續了五年了。今年共產國際用最嚴重的口氣，叫他們停止鬥爭，但美國黨大會以後，鬥爭並未停止。多數派的領袖如丕包（P. C. DeL.）（即六次世界大會上被中國代表大罵的）及洛扶斯東（Lovestone），就在美國預備反共產國際的工作。洛扶斯東及多數派的幾個代表到莫斯科，就被各國代表大罵，斯大林罵得更凶。洛扶斯東就在美國資產階級報紙上造謠，說到莫斯科來的美國共產黨代表，都被格不烏捕起來了，只有洛扶斯東逃出來。同時密電美國共黨中央，出賣自己的報館及黨部房子，拒絕國際訓令等等。這些鬼計，都在幕後進行，聞者咋舌。最後他的陰謀擲穿，多數派的羣衆羣起反對，而相信國際領導的正確。除一大患而美黨保全。好像一部偵探小說。

意大利，自賽拉在他們的擴大會上做了有名的報告之後，會場都反對他。但仍留他在中央局，而賽拉則怠工。擴大會認為留這樣的人在最高機關的中央局是不對的，必須把他從中央局撤退。

披金斯基在擴大會有篇很有趣的演說，指出德國黨內街道支部的增加而工廠支部

減少，有支部的地方組織亦少，在大企業中的支部甚少。這個現象，在各國都有。工廠支部的工作不好，工廠報紙出版的間斷，與銷數之減少，徵集新同志的方法不好（如法國常在羣衆大會上叫人簽名加入，簽名之後，不知道把加入的人歸到那個支部去，如在工廠內徵集，就不致如此。）等等的組織上的缺點。

對於青年團，會場上都非常注意。青年團在新的革命中，因青年工人在產業中數量之大，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在過去黨內反右鬥爭中，青年團處處表示為正確路線的一個支柱，可是一般政治方面雖然如此，但青年團的工作成績，則在各國都不好，到處是團員減少。少年國際對於自己的工作——青年工作——不能推進。這個現象受到許多批評。莫斯科『少共正理報』的主筆甚至提出了『少共國際發生恐慌（Crisis）』，這當然是過分之談。但是工作的太不够乃是真的。現在正要改進中。婦女工作，在擴大會上亦受嚴重注意。右派對婦女運動，看重女傭，而忽略女工，但女工在鬥爭中顯出其非常英勇，如法國紗廠罷工，工人失敗而上工，但女工仍繼續的單獨罷工。這次會中有國際的婦女部長及泰爾孟都特別着重的講到婦女問題。對於青年問題，有許多同志發言，苦先寧及曼牛爾斯基（這次政治問題的兩個報告人），在結論之中，亦特別講到青年工作，作為一個極大的問題。這些情形，在中國當沒有見過的，雖則中國的青年運動，實際上比其他國家都更有重要。

今後各國黨的責任，最主要的口號是『奪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曼牛爾斯基對這口號解釋道：在沒有奪到政權以前，要在組織上奪取工人階級之大多數是不可能的，共產黨只能夠獲得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在其影響之下，經過許多領導的線索：工會，工廠委員會，罷工委員會等等；我們理解『多數』這一個字是與改良主義者不同，不是在他的形式的意義上去了解的，不是照統計，亦不是照投票數目，我們的標準是階級鬥爭的領導與指導。擴大會並以準備政治的大罷工為各國共產黨目前所應當準備的中心任務。

擴大會特別指出，各國黨與共產國際，如果不能徹底肅清右傾與調和傾向，則不能完成其任務。這種與右派的鬥爭，在六次大會後特別激烈的發展。從共產國際執委中開除出去的，已有洛扶斯東（美國）及利克（捷克斯拉夫）斯比克脫（加拿大）及德國右派等等。這次大會上，對於許多國家的黨，也有批評，而且規定其特別之任務。大會上認為最滿意的是德國黨以及波蘭黨。受批評的有下列國家的黨：

意大利（賽拉之祖國）中央在三月中反對賽拉的錯誤，但仍把他留在中央局。賽拉怠工并要求辭職，中央仍不叫他走。擴大會認為賽拉不應當再留在最高機關裡，并當更加緊的與右傾調和派戰鬥。

英國黨，因為其領導機關內之右傾，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上決定改變工作路線的

決定，一直遲遲不肯執行。英黨大會以後，共產國際用了許多力量去糾正他的錯誤，但一直到英國大選時，英黨仍有人要與工黨合作，並且不反對那工黨的左派——獨立工黨，不放胆提出『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不盡力幫助印度革命（在倫敦有一次反對英國侵略印度，幽禁革命分子的示威行動，共產黨員僅有四人參加）。擴大會前並把最能擁護共國路線的同志由政治局調開。這次對於英國黨，有許多人說話，並有特別的委員會，叫他趕快再召集一次全國大會，並把政治局的名單改了一個人。

瑞典的黨，今年五一節因天雨而與社會民主黨商量，將示威延期。街上已有八百工人等着他們去領導示威，而他們不去。這次會上被許多人嚴重的批評。

在會場上許多人的發言，報告及結論中，特別是着重於反對右派及調和派。現在各國黨的任務，既然是奪取最大多數的工人羣衆，如果黨內尚有那些右傾分子的遺留則不能執行工作。現在要更加努力的來清除這些意識與分子出去。擴大會決定把布哈林，及脫老，賽拉，昂白特洛四人，由主席團撤職。把極立克（捷克斯拉夫）洛夫斯東（美）斯必克脫（加拿大）開除共產國際。同時加入新的同志茹蘭地（意）各脫華（捷）倫獨爾夫（美）古雪夫（俄）蘭斯基（波蘭）到主席團中，並舉李杜（南美）爲主席團委員，雷依門（捷）爲主席團後補人。同時對於布哈林等提出三個條件：一、這些調和派必須公開而堅決的表示與右派不同；二、他們必須不但在口頭上，並且在行

爲上，做反右的積極鬥爭；三、他們必須無條件的服從共產國際及其支部之決議，並執行之。如果不照這三條做，就要開除。

最後，把『第三時期』與直接革命的階段分開。實際上，我們在第三時期中，看到另一革命的復興之發展，這個革命的復興，在環境順利的時候，一定要發展——好像是突如其來的，而是受到外面的推動的——到一個直接革命的形勢。爲了這個緣故，各共產黨一定要記得這事實；共產國際叫各黨注意到另一革命復興的發展』。

## 一一 職工運動問題

職工問題中討論的最主要的問題，是現在罷工之性質，黨怎樣領導工人運動，與工人運動中的具體方法。關於第一個問題——罷工性質的問題，是在政治討論中已經可以算結束了。這一點上，右派調和派與共產國際的不同，也在上面講到了。我想在此地，關於六次大會以來各國黨領導工運的批評，及工運方法中最重要的問題談一談。此次國際爲討論職工運動問題，特別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在會前討論最中心的問題——組織無組織者的問題。上面已經舉到調和派賽拉的反對組織無組織者的言論了，現在要來說說爲什麼共產國際特別注意組織無組織者。

在合理化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成分是變換了，資本家把大羣的無技術的工人（特別是青工女工）驅到工廠裡去。工廠中的熟練工人（高等工人）是減少了。舊的工

會的羣衆基礎大爲變動，社會民主黨不要這種新的工人去加入他的工會。工會中現在會員多是有錢的，要交很多會費的。這些最下層的工人，因此是站在工會之外，而無組織的。擴大會上發表了各國工人組織的統計，證明即在工會組織最普遍的國家內，無組織的工人尚占多數，有些國家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是沒有組織的。這些在工會以外的新工人，他們是沒有受到社會民主黨工會官僚們的改良主義的麻醉，在一切罷工之中，他們（尤其是其中的青年女工），常常表示比有組織的工人更爲激進些。這就是們的階級成分來講是沒有什麼希奇的。他們的激進，是表示在他們投票贊成罷工，及在各種選舉中贊成共產黨的事實上，一次次的明顯地表現出來。在工人階級日益激烈化的時候，他們不但比一般有組織的工人表示左傾，有時常常比同志還厲害一點。有些時候選舉工廠委員等，同志不敢把自己的名單提出去，而工人強迫支部提出自己的名單來競爭選舉。

關於這一問題之解決，就是工廠委員會與罷工委員會（或鬥爭委員會）的方法之應用。這兩個組織，前者是經常的，後者是臨時的，但其原則是一樣的，就是要由全體工人（不論無組織的，有組織的）一塊來選舉。這樣就是把全體工人一塊團結在一個指導之下了。這些委員會，就是動員無組織工人的機關。可是同時，這種委員會不是在政治上中立的。被選舉出來的委員會，有一定的政治立場，所以必須由赤色工



會及黨堅決的拿出自己的政綱，來爭取這些委員會之選舉。只有這些委員會有了革命的政治立場，才是動員工人羣衆去做革命行動，反對戰爭，爭取日常經濟利益，取得罷工鬥爭之勝利的機關，如果放到社會民主黨手裏，則這種委員會適足以成爲勞資合作的機關，成爲能工的破壞者。所以黨必須要堅決的單獨領導，與社會民主黨拚命鬥爭。

但是這一點在各國黨內是甚缺乏。

在工人運動的最大毛病，就是工會的合法主義。黃色工會明明是要分裂工人運動，把共產黨員從工會中開除出去。這個開除的方法，在革命工會沒有或勢力很小的地方，或者是工人運動從未分裂過的地方（如德國英國）是有很大的作用，可以使共產黨不能去奪取工會的羣衆，並不能在工人中活動。現在最重要的必須與懼怕被工會開除的心理鬥爭，勇敢的單獨的拿出我們的旗子，來奪取工會中的及無組織的工人，及爲奪取工廠委員會與罷工委員會而工作，同時也就要有個問題發生，就是有些黨員，因爲被社會民主黨工會開除，想組織新工會來奪取羣衆，而不用從前的在工會中組織反對派的工作方法。這個問題，須要看條件之是否足夠，否則新工會不能發展，反而使我們捨棄了奪取黃色工會中羣衆的機會。

這方面的決定，是在沒有赤色工會的地方（如英德），不把被開除的共產黨及革命工人組織在新工會裏，而要組織這些人，與工會的羣衆一致起來反對開除，爲增加工會

中的民主而鬥爭，反對改良主義與工會領袖的官僚主義。我們要以這樣的方法來奪取工會的羣衆，當然，想由此而奪取工會的機關，則是妄想（更錯誤的是專想奪機關，而不想奪羣衆）。同時我們一定不忘記，在原則上我們是不反對分裂的。如果羣衆在鬥爭高潮時，不相信舊工會而大羣退出之時，我們就應當立即組織新的工會（如波蘭的洛茨紗廠工人，及鑛工，墨西哥的舊工會『克浪姆』在羣衆激烈化的時候失了信仰，那邊新的總工會亦在組織）。所以這個工作不是機械地造出一個新工會來就好的，在平常要拚命與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政策奮鬥，只有到罷工高潮時，到政治鬥爭最急劇的時候，才有組織新工會的可能。

我所以要在報告中特別在這一點上多說，因為（一）這是新的問題，（二）要使我們知道在黃色工會最強大的地方如何做工作，如何奪取黃色工會下工人的羣衆。中國從前就有極大的赤色工會，而且最大部分的工人是在赤色工會的領導之下，建立赤色工會是更有順利的條件，不過如何有羣衆的與黃色工會之鬥爭方法，我們還是要學。

在殖民地方面，擴大會特別指出罷工委員會的方式，應當是爭取羣衆組織羣衆的最主要方式。

關於罷工的戰術，洛執夫斯基講得很多的，他的演說可以注意。其中特別的一點，是罷工時間的多少長，要不要繼續下去，須要由罷工羣衆自己決定（當然我們要做工

作的)。這樣罷工才能堅持。

現在的情形，是各國黨與工會左派有落於羣衆後面的現象，決議案上對於此點再三的指出，不僅僅在口頭上答應承認國際決議的新路線就夠了，而要在實際行動中去執行。

青年及婦女的問題，討論中是關到極多。他們在生產中數量的增加，使其作用日益偉大。

### 三一八一——國際紅色日

極簡短的來寫這個問題。不僅在中國，而且在西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社會民主黨，右派托洛斯基，都拚命的反對八一，各地逮捕共產黨及革命工人，封閉報紙等以外尚不算數，並且他們在理論上與八一的示威作戰；他們造許多謠言，說共產黨要在那天『盲動』『冒險』，說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挑戰等等。八一的日子是在六次大會上決定的。社會民主黨每年在八月四日（他們賣階級的紀念日）來做和平主義的運動。到今年，革命的世界無產階級就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賣階級的社會民主黨，反對帝國主義向蘇聯挑釁的全世界的聯合行動來答覆他。

今年八一的示威，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戰鬥大檢閱。其意義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與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並且要把這個運動，擴展在全

世界的範圍。在黨內，則是檢閱各黨工作如何，是否在積極準備鬥爭，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英國在這次受到極大的批評，因為黨對八一消極。認為一定無甚結果，而放棄準備工作。八一的準備，實在是黨內情形的最好的反映。這都是國際擴大會所以特別重視這個問題的緣故。

——完——

# 國際狀況與共產國際的目前任務

——一九二九年七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政治決議案——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指出：自從第六次世界大會以來，事變的發展完全證明第六次大會對於政治和經濟狀況的分析是正確的，其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規定的路線也是對的。

無論社會民主黨和右派及調和派分子怎樣預言，資本主義穩定不僅未曾表現出持久穩固的形勢，而反一天比一天搖動起來。人們就事實上一天比一天更加看出六次大會對於目前時期估量的正確：認為目前是大戰後的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增長起來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日加劇烈的時期，此時期的矛盾將要達到帝國主義新的戰爭，將要達到偉大的階級衝突，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

## 一 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日加劇烈

一、自從十年前世界大戰停止以來，資產階級得到第二國際政黨積極的贊助。以一種神話有系統的欺騙勞動羣衆；照這種神話所說，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爭是『最後一次』的戰爭，德國被打敗并被解除武裝之後，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就可成立固久的和平了（他們說：國際聯盟是『和平工具』，無數的資產階級『裁兵』計劃如凱洛格的虛偽

的「和平」公約，楊格計劃等是「和平解決戰後發生之賠款問題以及其他帝國主義矛盾」之方法。但事實上，顯然自從一九一四——一八以來，新的帝國主義大戰之危險從未像目前那樣嚴重。爭取市場原料產地以及輸出資本和投放資本的勢力範圍等鬥爭，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戰爭，以求擴展自己的經濟地盤而奪取別人的經濟地盤，以求重新分割世界。國際聯盟，事實上是英法帝國主義的工具，現在正積極的準備戰爭。國際聯盟拒絕了蘇聯提出的普遍而切實的裁兵計劃，更加揭破假面具而表現其為準備戰爭的工具。在「否定戰爭」的虛偽假面具之下，凱洛格公約正式成為強大的美國帝國主義之一種企圖；美國認為在新戰爭將要爆發的頃刻，自己有權並有可解解決問題。帝國主義國家軍備之無限增加以及新的政治同盟和軍事同盟（如英法同盟，英日同盟，法波同盟等）的締結，更加一次證明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接近了；這次大戰比較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爭，將有更大的規模和更大的破壞性。以楊格計劃來解決賠款問題的新辦法，絕非改良派所想像以為是和緩帝國主義的矛盾；恰好相反，這個計劃乃是加劇帝國主義的衝突（如英美間爭賠款銀行的鬥爭，法德間的衝突等）；同時這樣的解決辦法，也因德國更親密加入仇視蘇聯的軍事政策之帝國主義戰線以後，而加劇了對蘇聯的財政封鎖，甚至軍事干涉的危險。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小」戰爭（如中國蔣桂蔣馮間的戰爭），其背後都隱藏着英美間為爭世界霸權的日加劇烈的衝突

。巴黎會議之後，賠款問題更加嚴重的提出來，在這個問題中佔支配勢力的帝國主義列強間的主要矛盾互相縱錯交雜而嚴重起來，帝國主義列強及其集團間的鬥爭一天比一天劇烈，他們爭取市場，爭奪原料產地，爭奪投資範圍。財政資本的壟斷團體之國際結合（國際加秋爾，投資社會，楊格計劃中之賠款銀行計劃等），不僅不會和緩戰爭危險，而且祇有加重這個危險並造成新世界大戰即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戰之前提。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帝國主義營壘內怎樣敵對和衝突，但主要的世界矛盾都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間的矛盾，這二方面形成兩個經濟和政治系統，二者的矛盾一天比一天劇烈起來。

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乃是主要的危險。這個由造成並擴大反蘇聯的軍事封鎖之新企圖，由蘇聯隣近各國狂熱武裝（羅馬尼亞軍隊改組，法國總參謀部供給波蘭武裝，英國幫助阿富汗舉行反動政變等）諸事實就可以證明。這個由進攻蘇聯外交代表等有計劃的挑撥行動，也可以證明。帝國主義列強挑撥中國反動派進攻哈爾濱的蘇聯領館，中國軍閥霸佔中東路，破壞中俄協定，成羣拘捕並虐待蘇聯人民——這些事實都證明國際財政資本直接挑撥戰爭以反對蘇聯。所有這些對於新帝國主義大戰的準備工作，各方面都是得到「社會民主黨」的積極幫助和協作而實現的；「社會民主黨」中的「左派」以和平的空話來遮掩這些準備工作，尤其特別的卑鄙無聊。

二，同時，資產階級要蘇聯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希望，已完全消失了。資產

階級要蘇聯逐漸屈服於資本主義世界，并以此變成國際資本的殖民地這種希望，也不能實現。無論過去遺留下的困難怎樣重大，無論在技術上和經濟上進步怎麼遲緩。無論農村經濟的水平線極端底下。無論資本主義元素怎樣包圍——蘇聯，在蘇聯共產黨領導之下，已經進攻城市和鄉村資本主義元素而得到勝利，并保證經濟的社會主義形式。使之對資本主義元素佔決定的優先勢力。農業的羣衆集體化之強有力的進展，農業上技術之進步，蘇維埃農場，集體農場，引動機和農業機器分站之設立，以及社會主義工業之迅速發展——這些事實造成了工農聯盟的新形式，即生產聯盟的形式，同時又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陣勢。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之熱情，一天比一天明顯而有力的表現在社會主義競賽裏頭，表現在勞動生產力和工業生產增加裏頭，表現在一天比一天濃厚的反官僚主義鬥爭裏頭，表現在清除國家機關中一切非無產階級分子的運動裏頭。建設社會主義的五年計劃，是要來保證蘇聯工業化以後的迅速進行步驟的，是要來更廣大的發展生產機關之生產的，是要來堅決抑制城市和鄉村的資本主義原素和加強其社會主義原素，是要來領導幾百萬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廣大發展農村經濟的，是要來大大提高無產階級和鄉村勞動羣衆之物質的和文化的水平線的——這個計劃不僅對於蘇聯的勞動羣衆是最大的成功，即對於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也是最大的成功。這個計劃已經開始實現而有成效的；這個計劃的實現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之社會主義基礎，增加其自



衛的能力。因此，這個計劃加強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鬥爭的陣勢。蘇聯在社會主義的路上進展的成功，形成一種最重要的動力，以破壞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

三，資產階級想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裏建立『工業和平』，這種企圖也是不能成功。一向未經解決的市場問題，以更嚴厲的形勢提出來。這個問題不僅由於生產機關之增加而嚴重起來，而且由於受壟斷的加狄爾，關稅的籬籬，廣大羣衆的貧困，經濟落後國家工業發展，殖民地狀況的普遍動搖等影響引起價格提高而鞏固起來。資產階級想以大規模資本主義合理化手段來解決這個資本矛盾，這種努力也是枉然的。合理化倒反一天比一天更增長了這種矛盾。資本主義合理化一方面增加了生產的機關之能力，將幾百萬工人從生產過程中排除出去並更甚的增加市場的競爭；他方面也就增長了社會衝突。合理化既然是將一切重担加在工人身上，自然更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水平線，並由於勞動者間的增加以及傳遞制度(Conveyor system)的設立，更使工人勞動容易疲累。十年以來，尤其在一九一八——二〇革命高潮時期，工人階級以爭鬥手段奪得來的許多社會勝利品，都被取消了或正在被取消的恐嚇之下（八小時的工作制，社會保險，失業救濟，勞動立法，集會和罷工權等）。在若干國家內，資產階級取消無產階級的社會政治的勝利品，還是得到社會民主黨幫助，並在『新改良』的虛偽藉口（法國關於社會保險，強迫調解以及住宅等的法律）之下舉行的。在法國的『工業和平』旗幟之下

，在德國的「經濟德謨克拉西」和意大利等國法西斯蒂的「強迫仲裁」掩護之下，資產階級又得到社會民主黨和改良派工會官僚贊助，以及最強大的兇暴手段造成一種制度，無恥的劫掠奴役，並野蠻的壓迫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合理化的結果使失業的工人大大增加（主要資本主義國中有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三百萬失業工人）。中間分子的破產，資本主義國中僱員數量的減少，使城市的貧困民衆更加增多起來。農民中廣大羣衆的狀況不僅未曾改善，而且中農和貧農的貧困化倒反明顯普遍。由於不斷的農業危機以及各國的反動，農村中這些分子的狀況更加嚴重。美國資產階級發出繁榮的口號，這個口號之破產一天比一天被人承認了。這個口號發出來，是爲的要擁護美國的工業以反對歐洲的競爭，並表示是一種有系統的對美國工人階級進攻，降低其生活水平線並增加失業工人的數量（美國失業工人已在三百萬以上）。調和派認爲資本主義國內矛盾已經和緩，並且現在已有組織世界市場之可能；這類觀念已經被最近幾年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證明是錯誤的了，這種觀念乃在改良派思想面前投降的觀念。

●經濟上採用壓榨工人的政策，同時政治的反動也增長起來：資產階級國家機關之法西斯蒂化，壓迫和白色恐怖的日加嚴厲，世界資本贊助下的法西斯蒂政變（南斯拉夫），工人的成羣被捕（法國，波蘭等），革命團體的被解散（德國「紅色先鋒隊」），示威工人或罷工工人之被處死刑（印度，美國，柏林），凶暴的白色恐怖壓迫工農運動（

墨西哥、古巴、哥倫比亞、凡涅朱拉，拉丁美洲及其他國家，革命黨人之經過或不經過裁判而被刺殺以及被判決做長期苦工等（意大利等）。在帝國主義內部衝突和階級鬥爭二者同時激進的空氣中，法西斯蒂主義愈加變成爲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方法。在社會民主黨佔有勢力的國家裏，法西斯蒂主義另有一種特殊形式，即『社會法西斯蒂』形式，資產階級一天多一天的利用形式以軟化羣衆的活動。使之不能反對法西斯蒂專政制度。

資產階級使用這種統治和經濟壓迫的可怖的制度，是得到國際社會民主黨贊助的，資產階級想以這種制度壓迫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使之多年不能興起。但在這方面，資產階級的努力也是枉然的。工人階級戰鬥的活動力的增長，革命工人運動新的浪潮之正在成熟，指出這種駭人的剝削制度和暴力制度不可避免要破產的；這種制度就是國際社會民主黨所稱爲『德謨克拉西繁盛』的時代和『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的時代。

四、資產階級壓迫殖民地革命運動也未嘗成功。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中間的矛盾，在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一天比一天劇烈起來。中國工農革命運動暫時失敗之後，中國資產階級，因他的利益與各帝國主義國家（美英日）財政資本利益不可分離和他與封建反動聯盟之故，他是絕對不能保護中國獨立而必須走入反對此獨立的帝國主義營壘中去的。中國現在有三派軍閥正在互相戰爭，各派都是某一國帝國主義的工具。

。中國這種內亂正可明顯證明：統治中國的各派軍閥利益，是與中國民族統一之利益極端衝突的。中國的統一及其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是與土地革命和消滅一切封建餘孽的運動，絕對不能分離的。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這些根本問題之解決，祇有等待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革命新的有力的浪潮才能實現。這個革命浪潮——其條件，毫無疑義的正在成熟——將一定引導至創立蘇維埃，成爲工農民主獨裁的機關。

目前，在印度正發展着強有力的革命運動。孟買無產階級英勇的罷工，勞動羣衆反對西門委員會的鬥爭——示威和巷戰，日益擴大的土地運動——所有這些事實都證明印度現時是殖民地革命的最重要基礎之一。印度資產階級之公開背叛民族獨立運動（自治黨全國大會對於屬國憲法權利之決議）及其積極幫助英國帝國主義以流血手段鎮壓罷工工人，不啻是揭露其反革命的性質。這就是指明：印度的獨立，工人階級狀況的改善，土地問題的解決，要能實現，必須經過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工農羣衆的革命鬥爭，必須經過反對英國帝國主義反對印度封建王公反對民族資本的鬥爭。印度革命的任務，只有經過在蘇維埃旗幟之下爭取工農羣衆獨裁的鬥爭，才能實現。

印度的革命浪潮正在成熟起來，同時殖民地反對外國壓迫的鬥爭也重新發展（摩洛哥、剛果，拉丁美洲諸國等）。在宗主國工人革命運動日在成熟的浪潮以及蘇維埃的日加鞏固之下，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將比以前更快的速度前進，以促進整個資本主義之崩

續。

## 二 執政權的第一國際政黨

五、資產階級在內外矛盾日益加緊之前，找不到一條出路，他們認為要解決困難唯一的方法，只有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并儘可能的壓迫工人階級以鞏固後方之安全；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若專靠自己力量而不得社會民主黨幫助，是不可能的；此外他們又認為必須拿德謨克拉西與和平主義的旗幟來遮掩這種政策。如此種種原因，資產階級與第二國際政黨之公開合作就成爲必要。就因爲這些原因，所以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英國的工黨能取得政權。麥克唐納爾政府和穆勒政府之政治使命，就在實現資產階級國內政策的計劃（最大限度的榨取工人階級，因賠款關係雙重壓迫德國工人階級，英國的合理化等），同時也在實現國外政策的計劃（準備新戰爭並加重對殖民地的壓迫）。在德國，第二國際下最強大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參加了政權。德國工人羣衆得一種經驗而消失了他們對社會民主黨的幻想，社會民主黨取得政權之後，就以強迫仲裁來撲滅工人的罷工，幫助資本家實現停業并取消工人階級的勝利品（八小時工作制，社會保險等）。社會民主黨建造巡洋艦並實行新軍事計劃，不啻完全與戰前社會主義傳統斷絕關係而公開的準備戰爭。社會民主黨和改良派工會指導機關，現在在執行資產階級所付託的任務之下，借威爾斯口裏拿公開的法西斯蒂專政來恐嚇德國工人階級。

社會民主黨禁止五一節的示威運動並殘殺無武器的工人，社會民主黨禁止工人的報紙（紅旗報），解散工人的羣衆組織（紅色先鋒隊），以法西斯蒂方法壓迫工人階級并準備禁止德國共產黨。

這就是領導社會民主黨走向社會法西斯蒂的道路。這就是第二國際底下最大政黨得到政權以後的成績。

工黨的整個政策，尤其是最近幾年的政策，證明麥克唐納政府將與執政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走上同樣的道路。麥克唐納政府將壓迫一切罷工運動而野蠻的實現資本主義穩定的合理化。他將鎮壓殖民地尤其印度的民族革命運動。他將施行進攻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即戰爭的政策。首先是進攻蘇聯，但他必定以和平主義的空話來掩飾這個政策。麥克唐納政府和美國之間任何談判和協調，將形成這個戰爭之準備上的一個階段。就像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前夜列強間一切協調企圖一樣。人們在英國工人中間散播幻想，以爲工黨政府成立就是工人階級取得政權。這種幻想將被麥克唐納爾政府反工人的帝國主義政策所打破。現在工人羣衆的迅速政治分化，以及工人羣衆與資產階級的工黨分離，正在開始。如果英國的共產黨愈加堅決的肅清內部一切右傾派和調和派的剩餘思想，並愈加實行正確的布爾什維克政策。鼓動工人起來反對工黨政府，那麼英國工人羣衆將看見，唯有英國共產黨的政策，唯有上次選舉中「以階級反對

階級」的政策，才是正確的政策；唯有「以階級反對階級」的政策，才能使廣大工人羣衆解除一切議會的與和平主義的幻想并指示工人階級以真正勝利的道路。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指出：在戰爭將要爆發而工人階級貧苦不斷增加的條件之下，第二國際政黨取得政權，就造成了社會民主黨在無產階級羣衆內部最深刻的危機之條件。這個危機表現出來，就是廣大工人羣衆左傾過程的加速；這個危機不可避免，全國共產黨易於獲得工人階級的大多數。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認爲加緊反對這個資本主義強有力的擁護者即社會民主黨之鬥爭，乃共產國際各支部的一種任務。全體會議又要求各支部特別注意加緊反對派社會民主黨左派的鬥爭；這個左派傳播幻想，使人相信其是反對社會民主黨中領導一派的政策，以此來緩和社會民主黨崩潰的過程，其實，這個左派乃是盡可能的擁護社會法西斯蒂政策的。

### 三 工人革命運動新的浪潮的興起

六、第六次世界大會以後發現的新的事實，就是國際工人階級明白表現的左傾和工人革命運動高潮的開始。因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增加引起工人階級狀況的日加困苦；社會民主黨揭破假面具公開會同資產階級反對工人階級採取社會法西斯蒂政策；共產主

義在工人羣衆中的勢力增加；——這些事實推動無產階級去採取更積極的鬥爭方法以反對資產階級。資本的進攻已經碰到無產階級日益增長的抵抗。資產階級方面取攻勢的階級鬥爭，開始轉變爲工人階級反攻，有時甚至直接取攻勢的鬥爭。在洛茨的總同盟罷工中，罷工工人表現最高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活動；在魯爾的鬥爭中，資本主義國家業主和工會官僚三角同盟的進攻，碰到工人階級堅決的抵抗；在工廠委員會選舉中，德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的成功；——這些事實證明已經有個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長大起來。賠款的分配使德國內部也迅速加緊了階級鬥爭，一方面是業主殘酷的進攻，他方面是無產階級羣衆的偉大行動。德國無產階級身上的二重壓迫，一方面國債和賠款，他方面本國資產階級的剝削——使德國的革命危機更容易成熟，罷工的風潮到處興起：在法國是礦工工人紡織工人碼頭工人郵務工人等的罷工；在美國是紡織工人的罷工，在這次罷工中羣衆的鬥爭發展起來直到成爲工人和警察中間武装流血的衝突；在澳洲有巨大的罷工運動；在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巴拉圭，哥倫比亞，）也有罷工；在德國，是碼頭工人的罷工，魯爾的停業罷工，紡織工人幾個月的長期罷工；在波蘭是洛茨的總同盟罷工，農業工人的罷工；在希臘是總同盟罷工，在捷克斯拉夫是農業工人的巨大罷工。在保加利亞是煙草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在印度有強有力的罷工革命的風潮；在中國有罷工鬥爭的復興。現在差不多沒有一個國家，在今年最初幾月裡的罷工其次數及



其重要性不超過幾年的罷工運動。現在的罷工運動，表現出無組織的羣衆的積極作用，甚至於時常超過改良派工會工人的戰鬥力。同時在許多國家裡，農民羣衆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精神也增加起來。這個革命精神在羣衆運動武裝衝突形式之下表現出來，譬如農民的參加五一節示威運動，烏克蘭西部，波蘭貧農和農業工人的罷工和革命運動，希臘的農民抗稅暴動，羅馬尼亞的暴動，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地方農民的紛擾，捷克斯拉夫荷蘭法國農業工人的罷工等。因為業主團體和改良派工會機關一天比一天厲害的與資產階級國家勾結，因為階級衝突一天比一天異常的劇烈起來，所以在許多情形之下，經濟罷工轉變為羣衆政治的罷工（洛茨，孟買）。所有這些，迫得工人羣衆不得不將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即與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聯結起來。資產階級調動其一切壓迫工具（拘捕，充軍，屠殺），調動整個資本主義國家機關，以反對罷工工人。這樣激起並將激起更廣大的抗議罷工，這樣的同情罷工帶着明顯的政治性質。羣衆的政治罷工問題就是這樣成爲直接的時代的堅決問題，提出共產黨面前的問題。羣衆的政治罷工將幫助共產黨使散碎的工人階級經濟運動更集中起來，幫助共產黨廣大的調動無產階級羣衆並巨大的增加其政治經驗，使這些運動變成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鬥爭。

七、站在罷工發展和新的革命浪潮前面，五一節柏林無產階級的行動，有非常之重

要。這次行動不僅表明德國無產階級的創造力和戰鬥力，而且表明德國共產黨的影響；無論查季伯爾（柏林市警察長）和改良派工會怎樣禁止示威運動，德國共產黨還能夠調動二十萬工人到街上來。黨在反動面前絕未退後一步，並不允許資產階級將示威運動挑撥成暴動，在當時環境之下，若舉行暴動，將使革命前鋒孤立并降為後衛地位。

柏林的五一節表明德國階級鬥爭轉灣點并加速德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高潮。這幾天示威，絕不是像失敗主義者和共產主義叛徒所想像的，德國無產階級的失敗，乃是證明德國共產黨戰鬥策略的成功；德國共產黨在自己隊伍中奮鬥，不留情的反對一切跟住羣衆尾巴的傾向。柏林無產階級行動的政治意義，就在這次行動已經打破了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要從工人階級奪取五一節之企圖，已經迫得德國資產階級及其社會民主黨在禁止示威運動問題中不得不屈服於工人階級面前，已經影響到其他國家的遊行示威，已經鼓勵起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羣衆，而這些羣衆，也已經表示其對於德國無產階級的同情了。

這次五一節的行動比較上年其他國家（波蘭，法國，孟買）五一節的示威和罷工都有更多的戰鬥性質，這個證明無產階級羣衆的經濟運動有提高至更高的鬥爭形式的傾向。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同情於柏林的英勇工人，同情於紐哥因和衛丁街道障礙物的勇敢的擁護者，并宣言完全與柏林事變中德國共產黨實行的策略路線相一致。

#### 四 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

八、工人革命運動新的浪潮的正式成熟以及英德二國社會民主黨政權，在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面前特別嚴重的提出加緊堅決鬥爭以反對社會民主黨及「左派」的任務；尤其要反對社會民主黨「左派」，因為他是工人運動中共產主義之最危險的敵人，是工人羣衆積極力和戰鬥力發展的主要障礙物。與此鬥爭有聯繫的，還有一種中心任務，也是共產國際所應該注意的；即在黨內政治方面，還要做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機會主義是傳播資產階級影響於工人階級，並傳播社會民主黨傾向於共產主義運動之一種間諜。共產黨，如果不將其隊伍中公開的和秘密的機會主義分子肅清出去，如果不戰勝對於這些分子的調和態度，是不能夠將工人運動新階段階級鬥爭的加緊提出的新問題解決得很好而有成效的。

這個新的階段之重要，其關於共產黨方面就在可以從階級鬥爭發展過程中發現出腐化的執行破壞罷工任務的機會主義分子。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指示，已經證實了，即說，右傾的危險現在是共產黨內的主要危險。

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看見最近一時代共產國際影響的增加，看見其各支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加強及其肅清機會主義分子（向朗德爾，海易斯，洛夫斯頓）認為滿意。叛徒們以及小資產階級的調和派此唱彼和的高喊共產國際瓦解了，這只是證明這樣的清黨是必要的，為的是預防機會主義分子的破壞工作，為的是保證共產

黨真正布爾塞維克化。這種布爾塞維克化之最重要的結果，已經從許多國家共產黨表現出來。尤其在德國，法國和波蘭。機會主義分子之肅清，已經增加了這些黨的戰鬥力，這些黨已經更能勝任負擔指導無產階級經濟政治之任務了。在反對機會主義鬥爭中，工人階級的活動力日益增長起來，由此，更產生出新的力量。在黨內更大民主化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的紀律增加起來。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內增加了更多的工人分子。

全體會議指出：在第六次大會政治和策略路線基礎上，共產黨是鞏固起來。最後，全體會議又指出：共產國際指導機關，即政治秘書處和主席團，在及時反應主要的政治事變上和反對右傾及與右傾調和的鬥爭上，確實正確的執行了第六次大會決議的路線。爲造成更好的保證以實行共產國際決議起見，全體會議委托主席團設法提拔非支部戰鬥員進來，並肅清機會主義分子出去，加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機關。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導之下並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寫的公開信的基礎之上，德國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已經打破了叛徒向朗德爾和達爾海墨的集團，並完全剷除其在工人中的影響。捷克斯拉夫黨，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積極幫助之下，迅速的打破海易斯等人的卑劣企圖，他們要分裂捷克斯拉夫的紅色職工運動；這個黨做過反取消派鬥爭之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經比以前強壯起來。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之下，美

國黨也掃除了黨的指導機關中機會主義小組組織領袖之無原則的小組織活動和破壞的影響（洛夫斯頓，伯伯爾等）。

加緊反右傾的鬥爭，在殖民地國家共產黨內也是必要的；在那些黨內，機會主義分子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之傳播者，他們並妨礙無產階級求獨立運動的鬭爭。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完全追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美國問題的決議，關於德國問題的決議，給德國黨的公開信以及關於捷克斯拉夫問題的決議之後，還認為：共產黨員擁護共產國際所排斥的右傾思想，即擁護反共產主義的並深深違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利益的思想，這是加入共產黨這一件事實不能並容的。

同時，全體會議指出：袒護公開的取消派之調和派分子，最近在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切根本問題中都站在右傾的地位，並在共產國際中形成右派的作用。右派取消派被開除之後，他們已經變成爲黨內右傾分子結合的重心。變成爲一切失敗主義傾向和機會主義觀念之代言人。爲這些原故，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一）調和派必須公開的並堅決的離開右傾派；（二）他們必須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進行積極的鬥爭，反對右傾派；（三）他們必須無條件的服從共產國際及其支部的一切決議，並在實際上執行這些決議。這些條件有一條不實行，無論誰都要從共產國際滾出去。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認為如果不實行這些決議，如果不完全剷除右派和『左派』（托洛斯基派）的取消派傾向，如果不堅決克服與右派或『左派』調和的傾向，則在工人革命運動新高潮條件中，共產國際及其支部就不能執行其任務。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夠舉行鬥爭反對戰爭的危險，擁護蘇聯，反對社會民主黨及其『左派』，並使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準備真正能夠勇敢的和不遲疑的領導無產階級為推翻資本主義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

十、反對取消派和調和派的鬥爭，在共產黨執行奪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任務上，有特殊重大的意義。這些分子緩和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過高估量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並過低估量共產黨的作用，這樣就等於破壞共產黨為奪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鬥爭，並阻礙那些已經在由社會民主黨轉變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之工人，使之不能確定的走到共產主義方面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認為右派機會主義分子執行破壞罷工的作用，因此號召共產國際一切支部集中其一切力量在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任務之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指出在工人運動新的浪潮條件之下，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成為共產黨的中心任務。要執行這個任務，共產黨必須先爭取得工人運動的指導權；這樣就是說：在工人階級一切行動中，在經濟罷工中，在街上示威中，在工廠委員會中，必須先爭取得指導權，以便在無產階級堅決爭鬥中的指導權能有保證。

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大爭鬥過程中，要能解決這個中心任務，必須實行下層聯合戰線之策略新形式，必須引導無組織的廣大羣衆到鬥爭中來（魯爾的罷工委員會，德國的工廠委員會選舉，巴黎和柏林準備五一節罷工之各工廠工人代表會議）。爲此原故，共產黨應該用其力量在工廠中工作，應該使每個工廠都成爲共產主義的堅壘。共產黨應該在舊幹部中選擇優良分子，以在階級鬥爭過程內證驗出來的新力量去補充舊幹部，這種新力量應該是從下層羣衆裡提拔出來。共產黨應該有系統的發展自我批評，自我批評是黨的幹部的革命教育上最重要的工具，是真布爾塞維克的訓練上最寶貴的武器。爲解決中心任務，即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到共產主義來的任務，必須用盡種種方法來有組織的鞏固共產黨的政治影響。

有幾個共產黨以前是公開工作的，現在有被法律禁止之危險。爲此原故，共產黨實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認爲這些黨應該擔負一種責任，即馬上採取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各種必要方法，盡一切力量發動一個反對禁止共產黨的鬥爭，以保證在不公開條件之下，黨的羣衆工作還能繼續甚至更加發展；黨並應該時時刻刻將公開的和祕密的工作方法聯系起來。

在反對戰爭危險，反對廠主進攻，反對改良派造謠誣蔑之鬥爭中，各國共產黨應該廣大的宣傳，使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功（經濟上的五年計劃）能爲一般人民所通

曉。各國共產黨應該拿蘇聯社會主義的合理化去對抗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前者是提  
高工人階級和鄉村勞動者物質文化水平線之強有力的樞紐，而後者則使無產階級更陷於  
水深火熱的貧困。

十一、各國共產黨應該很堅決的加緊共產主義的工作和在改良派工會中革命工會反  
對派的工作；在職工運動分裂的國家裏，又應該盡一切力量去加強赤色工會。

爲在工廠內反對廠主，反對法西斯蒂，反對改良主義的鬥爭，鞏固共產主義的影響  
，爲保證赤色工廠委員會有更廣大的工作基礎，爲使工人階級一切鬥爭都帶有組織的性  
質，必須在工廠企業有工人選舉的革命代表的聯絡綫網。

共產國際的一切支部，在最受壓迫剝削的一部分無產階級羣衆中間的革命工作，即  
在女工青工和農工中的革命工作，其工作方法必須根本改變。

青年工人的作用，一天比一天大起來，尤其是反對戰爭危險的時候，因此爲革命而  
調動並集合青年羣衆，有很重大的意義；共產黨需要充分注意青年運動問題並切實幫助  
青年團的工作。

少年共產國際在最近一年中曾經強有力的幫助共產國際反對右派調和派。但青年  
團的羣衆工作及其組織發展很少能令人滿意的，因此無疑義的需要實行少年共產國際第  
六次世界大會所喊出的轉變。



在那些有民族解放運動和農民革命運動的國家裡，除了爭取無產階級多數這一根本任務之外，還有一個根本任務，即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並保證黨領導這個運動。

以各種方法鼓勵殖民地羣衆的共產黨之發展和鞏固，使之成爲無產階級的黨，使之成爲下一次革命鬥爭的前鋒隊和領導力量。——這乃是整個共產國際的任務。

必須堅決的走向羣衆黨的創立，反對教派觀念之剩餘和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反對無原則的小組織鬥爭。——這種鬥爭在許多國家（美洲）成爲黨的向前發展的障礙，並成爲妨害黨轉變爲羣衆共產黨的一種力量。

在共產國際的許多黨內，譬如瑞典的黨，右派的猶豫是很普遍的，甚至成爲實際工作上的一種危險。如果不堅決的打擊並戰勝這種機會主義的猶豫，共產黨就不能夠積極完成其應負的任務。

總括起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指出：工人革命運動的敵人使廣大無產階級羣衆離開共產黨之企圖（開除工會中的共產黨員，辭退共產黨員在工會中的職務，禁止共產黨的報紙和組織等），一天比一天厲害起來；全體會議號召同志起來反對這種企圖，並指出目前時代最大的危險就是共產黨有追趕不上羣衆革命運動發展之可能（尾巴主義）。全體會議號召共產國際一切支部起來以最堅決精神反對這種反映社會民主黨遺傳的尾巴主義傾向。不戰勝這種傾向共產黨是不能盡其工人運動前鋒隊的作用，即

不能領導工人階級到新的革命戰爭的勝利。

# 共產國際與新的革命浪潮

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辭

## 一 共產國際的發展的主要特性

同志們：很可惜我未能盡聆全體會議上的全部討論，所以我不說各位發言人所發表的意見，而祇講到幾個基本的問題。

我開始說共產國際在六次大會後的發展的主要特性。

我們都知道，六次大會以後，在共產國際內部，爲了大會的基本決議案而發生了鬥爭。在許多支部（德國，捷克斯拉夫，美國，蘇聯）裏，關於六次大會基本路線的鬥爭，真是非常劇烈的。六次大會宣言『現在最主要的脫離正確政治立場的傾向是右傾』。這句話，完全證實了。右派及調和派攻擊六次大會決議案的基礎，反右派及調和派的鬥爭，在上一個時期中，就成爲黨的中心問題。這個鬥爭不僅限於單獨的幾個共產黨。反對右派及調和派的鬥爭，帶着國際的性質。這個鬥爭的尖銳程度，牠的嚴厲和堅決的程度，大部分可以作爲各國共產黨發展的一個標準。最近時期內各國共產黨的發展，指示出：那裏有鮮明，劇烈，一貫性質的鬥爭，那裏就有最布爾塞維克化的黨；這正指示出各個共產黨的真正的發展程度。這上面更是證實，共產黨祇有經過

無情的反右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方能正確地佔據革命無產階級的前鋒地位而竭力地自覺地有組織地準備將要來到的革命事變。這就是反對右派與調和派的鬥爭，成爲這個時期共產國際發展上的主要特點的原因。

你們都知道，國際六次大會，把國際上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作了一個總結。當聯邦共產黨內的托洛斯基反對派，被打得一敗塗地的時候，其他國家的托洛斯基主義小團體，就祇成爲社會民主黨的附屬物。托洛斯基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出名報章（『每日快郵』）上，攻擊蘇聯，這更確切地證明托洛斯基主義變成叛徒的過程，是已經完成了的。在國際六次大會以後，少數托洛斯基主義者，尙能留在共產黨裏，但是往後把他們開除出去，並沒有引起特殊的注意（例如加拿大的斯配克托爾）。他方面，共產國際反對明的和暗的右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都獲得了巨大的意義。雖然這個鬥爭的迅速發展，在六次大會時，還很難預先見到。可是這個鬥爭的發展，却是非常快的。六次大會以後，各個共產黨內右派及調和派分子所取的态度，使這個鬥爭不可避免的發生起來。

這些右派及調和派的分子，攻擊六次大會決議案的基本路線。在資本主義穩定的目前階段的估計上，在戰後資本主義恐慌發展的第三時期的估計上，他們都與共產國際採取截然不同的意見。在這上面，我們不必講勃蘭特萊爾，和秦漢美爾那種人，因

爲這種人，已是明顯的叛徒，已自處於共產國際之外，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現狀的估計，主要的都是與社會民主黨相同的。社會民主黨高呼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興。各國共產黨裏右派的觀點，實際上就是根據於這種立場的。實在說來，調和派也是循着這條路走的。調和派沒有說，現在這個時期『必不可免的使資本主義穩定的矛盾，更加增長起來，因之使資本主義的穩定，走入進一步的動搖，使總的資本主義恐慌，更劇烈的尖銳化』（六次大會）。調和派的論據，實在是和社會民主黨的『資本主義復興』的理論一樣。基本問題上的分歧意見，表示出兩條相反路線的存在，一條是共產國際的路線，他一條是右派機會主義者的路線。從這兩條相反的路線上，發生兩個相反的對於工人運動發展及社會民主黨作用的估計，因之也就發生兩個相反的對於共產黨基本任務的估計。這兩條路線，不可免的產生兩種相反的策略。所以在現在這個時期中，反對右派及調和派分子的鬥爭，是中心的問題。所以應該和最危險的工人階級中的資產階級影響，進行堅決的鬥爭，應該和共產黨內部的社會民主黨殘餘，進行堅決的鬥爭。

我們可以舉出幾個例來，說明右派及調和派分子對於六次大會基本路線的攻擊，是如何的激烈。在這上面，我將舉出恩貝爾特羅（Humbert-Droz 瑞士）適拉（Serr意大利）及德國幾個調和派（美以耳、愛浮爾德（Meyr, Eweret））的政治立場。恩貝

爾特羅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國際政治秘書處理的演辭，可以作為代表。他說道：

『國際六次大會，實際上已經斥責了一般的模糊的公式（腐朽的不穩的等等……的穩定），因為這個公式，對於資本主義穩定，實在是沒有說出確定的意義來。同志們，請你們看一看六次大會的提綱。你們在那裏決找不出上面我所說的那些字樣』（按：即腐朽的不穩的等字）。

這就是六次大會閉會以後恩貝爾特羅同志所作的解釋。恩貝爾特羅同志言論，剛是和事實相反。或許有人會設想恩同志沒有看過六次大會的提綱，因為恩同志竟然忽略過六次大會所說的『現在這個時期，祇使資本主義穩定發生進一步的動搖』的一段。雖然恩同志無疑地看過六次大會的提綱，可是他却是沒有注意到六次大會的這段宣言。不祇如此。恩同志表面上裝着擁護六次大會的路線，實際上却是在發表和大會路線相反的觀點，這點可以從下面看出來。恩同志當講到那些發生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經濟鬥爭時，這樣的說道：

『這些巨大鬥爭的發展，不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衰敗的時候，也不是在資本主義的政權沒落的時候。反之，他們的發展，剛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權加強了的時期中』。

所以根據恩貝爾特羅意見，資本主義的穩定，非但沒有動搖，而且我們還可看到『

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權正在加強」。這種哲學和社會民主黨歌頌資本主義「復興」的宣言，有何分別？無論如何，在恩貝爾特羅同志的立場和六次大會的路線之間，總存在着非常大的區別。

適拉同志更加坦白地反對共產國際。他在一九二九年給意大利共產黨中央作報告時，這樣估計德國資本主義的穩定：

「如果像德國同志那樣，說德國資產階級的穩定，是腐朽的，那末等於閉眼不看事實」。

適拉向德國的同志，作猛烈的攻擊。可憐他的論據，祇證明他自己閉着眼，不看革命無產階級中所發生的事變。他非常幼稚，他不知道他對於資本主義穩定的堅決信仰，祇使他成爲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幻想的犧牲者。這種信仰，祇是向社會民主黨去的過渡階段。適拉給意大利共產黨中央所作的報告，證明他已經不是調和派，而是顯然的右派，他的觀點，是與共產國際的觀點，絕對不相同的。

德國共產黨的調和派的立場，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些調和派以各種方式，重複恩貝爾特羅和適拉所說的話。在德國共產黨中央十一月會議上，愛浮爾特提議在決議中除去「資本主義穩定，更是腐朽和不穩」的字樣。十一月時，美以耳在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這樣的說。

「台爾曼同志怎麼能夠說一九二八年的穩定，比較一九二六年更要腐朽和不穩定。這種論據，顯然違反六次大會關於第三時期的意見」。

依舊是那穩耳熟的歌頌資本主義穩定的老調。調和派翻來覆去說，我們不能把現在的穩定，說作腐朽和不穩，這種老調，是如何的令人厭倦呵。我再從德國調和派的共同宣言上，摘下一段來，指出他們和恩貝爾特羅一樣，宣佈資產階級經濟地位和政治權力的鞏固。在愛浮爾特，愛盤拉因，田特烈許，貝該爾，許曼，庫爾特等同志的共同政綱上（發載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德文的『國際』雜誌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話：

「中央委員會中的大多數，祇看到中國的戰爭，反蘇聯的戰爭的準備，無產階級的左傾，可是引起矛盾尖銳化的過程上底另一方面，『經濟的迅速發展』，即現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基礎在經濟上的鞏固，以及連帶的資產階級政權的鞏固，他們却沒有看到……」。

所以，所謂調和派，正是和社會民主黨共同唱和，他們的態度，正是顯示他們已經可恥地承認資本主義的『復興』。有時這也稱為資本主義的『再造』，好像已經進入嚴重恐慌階段的經濟制度，還能重新建設似的。可是他們却還把這種意見，當作國際六次大會的真正路線！



這些例子，明白地指示出他們對於六次大會路線的攻擊，是根據在何種基礎之上的。從這些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到，右派機會主義者從六次大會以來，假擁護六次大會議決案之名，來進行堅決的反對六次大會路線的鬥爭。所謂「調和派」分子取的立場，也已經完全被揭破了。擁護六次大會政治路線的鬥爭不得不成為堅決的反對右派及調和派（他們是和右派一鼻孔出氣的）的鬥爭。

現在很明白的可以看到，六次大會的決議案，是何等的重要。這些決議案，對於往前發展的資本主義的恐慌，作了一個正確的科學的分析。對於國際革命運動的發展，作了一個明明白白的預言。這正是決定各國共產黨及整個共產國際的實際任務底根據。祇有根據於六次大會所下的世界經濟及政治發展的估計，各國共產黨，方能正確地決定工人階級經濟鬥爭的性質，揭破社會民主黨（包括左派）的作用，決定新的情勢下自己的策略任務，並且發展那種清除黨內機會主義腐化成分的鬥爭。

但是我們要顧到右派機會主義傾向，不但來自「公開」的右派及調和派分子，而且還用別種方法侵入黨裡來。這點可舉瓦爾加同志為例。

在討論賠償問題，說到楊格計劃時，瓦爾加同志提出修改意見，他的修改中，包含下述的意見：

「沒有一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以為現在便於用戰爭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的

衝突，這種衝突的尖銳化，使他們不得不有一種企圖，來暫時免除賠償問題上帝國主義的衝突」。

修正之末，還有這樣的話：

「當帝國主義的衝突更加尖銳時，賠償問題也將採取一種尖銳的形式」。

有人一定要發生奇怪，爲什麼擴大會議的參加人，竟會在賠償問題上得出這樣明顯的機會主義的結論。第一根據瓦爾加意見，「沒有一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以爲現在便於用戰爭方法，來解決」尖銳的帝國主義的衝突。瓦爾加同志說是這樣，可是事實所表現的，却是相反。人人都知道，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一天天的迫近起來。這點，瓦爾加同志，也未始不知道，不過我們在他的「修改」中所得的，却是相反。

第二、瓦爾加同志甚至說到這個地步，以爲楊格計劃，能暫時免除這些帝國主義的衝突。可是，如果楊格計劃，能够暫時免除帝國主義的衝突，那末在帝國主義的估計上，不是共產主義具有真理，而是社會改良主義說得正確。在這點上，瓦爾加同志和社會民主黨共相唱和，他否認在楊格賠償計劃實行以後，帝國主義國內（首先是德國自己）及帝國主義相互間（英美，英法聯盟與德國）的衝突，會不可免的加劇起來。第三、根據瓦爾加同志意見，祇在「帝國主義衝突變成更加尖銳的時候」，賠償問題，方再採取一種尖銳的形式。可是這是非常機會主義的：這句話裡，好似說帝國主義衝突

，現在已經暫時免除，他們的尖銳化，要待之於渺茫的將來，到了那時，賠償問題方才也跟着尖銳化起來。瓦爾加同志，把賠償問題的尖銳化，推到渺茫的遼遠的將來，表示他對於楊格先生這些人的計劃和能幹，非常相信。這種見解，正是改良主義的幻想，與共產國際意見，毫無相同之點。瓦爾加同志想以他的修改，來『糾正』共產國際，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如果瓦爾加同志自己不經『糾正』那末他將不能站在共產主義立場之上了。

他關於工人階級生活程度問題的修改，也同樣是機會主義的，瓦爾加同志提議以『減少他（工人階級）在自己生產中所得的部分』字句，來代替『資本主義穩定減低他（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一句。瓦爾加同志的統計及經濟的論據，至少是沒有包含嚴重的意義的。他所要證明的意見，實際上是：工人階級的一般狀況，變壞了，可是他的生活程度却沒有降低。但瓦爾加同志的證明，不能令人相信，並且顯然是矛盾的。他在第二次發言時，說他並沒有講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是昇高的，這正是證明他對於這個問題的觀念，是何等的混亂。瓦爾加同志否認在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條件之下，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會往下低落，可是在報告及討論中，已經舉出很多的論據和事實來證明，瓦爾加同志的詭辯之辭，決不能駁破這些事實。這個否認的客觀意義，祇是想給資本主義裝出一種好看的外貌，以與頌揚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者共相附和。

關於瓦爾加同志，還應該說一點。瓦爾加同志很堅決地爲自己的立場辯護。他在會議上曾兩次發言，爲其立場辯護。我們不僅要說瓦爾加同志意見的實質錯誤，而且還因瓦爾加同志想把我們會議拖回到共產國際所已經審查過、解釋過、決定了的問題上去。所以還要說瓦爾加同志在這裡盡了一種反動的作用（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現在在共產國際之前，擺着新的重要問題。所以我想我們還是用全力來注意共產國際的新的革命任務吧。

在這上面，我們不是向瓦爾加同志學習，而是從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及其改良主義走狗的革命鬥爭的經驗上去學習。雖然有人想把我們拖回去，可是我們却應該勇敢地向着新的革命任務前進。

### 一一 國際六次大會後的新現象

現在讓我來說主要的問題——國際六次大會以後，究竟發生些什麼新現象呢？共產國際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決定各國共產黨在最近將來所應負擔的基本任務。我們會議所要討論的決議案草案，給出這樣的回答：

「國際六次大會以後新的現象，就是國際工人階級的顯然的左傾，以及另一般革命工人運動復興的發展」。

草案中的這個意見，應該與國際六次大會決議案所說的並起來看。六次大會說，

因爲資本主義的穩定，不絕往前破壞，因爲資本主義的一般恐慌，日益尖銳化，所以「工人階級一般的左傾，在歐洲不絕前進」。我們擴大會議議決案草案上面所引的一段，已經說得更進一步了。他說：「國際工人階級的左傾，已經是顯著的事了，再次，我們更看到『另一般革命工人運動復興的發展』。前者（六次大會所說的）不過指出國際工人運動發展的一般的背景，後者却已經確定地指出現在發展上新的和重要的特點。共產國際現在所能够說的而且應該說的主要現象，顯然是新的革命浪潮的發展。」

在未舉出事實來說明新的革命復興以前，我在這個新的復興問題上，先要說及所謂『第三時期』。

關於第三時期，我們常在黨內聽到純粹學院派的論調。

你們都知道，在經濟方面，第三時期是說資本主義已經超出戰前程度，並且在許多工業和國家裏，技術和生產合理化的發展，迅速地前進。嘉特爾和托辣斯的發展，還有國家資本主義的傾向，也發展起來。因之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即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間的矛盾，帝國主義營壘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中間的矛盾，都更加尖銳化起來。總起來，這些就使資本主義的一般恐慌，更加尖銳化。但是資本主義恐慌的尖銳化和資本主義穩定的加重的動搖，究含何種意義？他的意義是說，在資本主義內部，正發展着一種破

裂資本主義穩定的力量。關於第三時期的學院派的意見，是在企圖用一種高牆，把戰後資本主義恐慌發展上的這個時期（即第三時期），和資本主義穩定崩毀的時期，即是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新的復興的時期，分隔開來。我所要說的，就是在這個「第三時期」，和直接革命形勢之間，並沒有隔着一道萬里長城，好像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上的各時期間沒有隔着一道萬里長城一樣。第三時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超出戰前程度；雖然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還沒有達到戰前程度，可是六次大會却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說出第三時期來。我們不能不看到在各國資本主義恐慌的發展上，以及在各國新的革命復興的發展上，是有很大的程度的不同。可是無論如何，我們能夠說而且應該說，六次大會以後國際發展上的基本事實明白地指出革命工人運動的復興，而且這種復興是正在擴大。祇有不懂社會發展的革命辯證法底迂儒，方才會尋找一個發展階段和個別發展階段間的嚴格分水嶺。特別是所謂第三時期和直接革命形勢時期中間的分水嶺。實際上，我們在第三時期中，已經看到新的革命復興的發展，這種復興在適當的時候，一定要發展或直接革命的形勢（看來，好像是出於意外的，爲外面刺激所引起的）。共產國際之所以注意於革命復興的發展，即是爲着這種理由，這點各國共產黨都應該記住。

我現在要舉出新的革命復興的事實。這種事實很多。我祇舉最主要的：魯爾區

域的巨大衝突（關廠和罷工），洛慈（波蘭）的總罷工，法國北部的數萬紡織工人的不屈不撓的罷工，捷克斯拉夫農村工人的罷工，孟買紡織工人的堅毅不拔的總罷工，各國巨大的衝突，並不是帶着孤獨的性質，他們的背景，是這些國家裏以及其他許多國家裏工人階級經濟鬥爭的發展。此外還可以指出，從一九二九年，開始時起，法國每月有一百次以上的罷工。雇主組織，改良主義工會與資產階級當局，結成聯合戰線，來對抗工人階級，這種聯合戰線，使工人階級的這種經濟鬥爭，帶上政治的性質。五一節柏林的巷戰，拍白凡尼茨基工人對於警察的武裝抵抗等的事件，和各國的遊行示威運動及罷工運動合起來看，就可以表示出勞苦羣衆的經濟鬥爭，正要採取更高的革命鬥爭的形式。孟買的總罷工，指示出印度革命運動的發展，同樣的，五一節，柏林工人區域的巷戰，也指示出歐洲的特別是德國的革命運動的發展。我們應該從這方面去觀察德國共產黨最近在工廠委員會選舉上的勝利。此外我們還應該顧到許多國家（波蘭以及巴爾幹半島諸國），農民中間的革命的騷動。這上面，我要指出，在波蘭有七萬以上的農民，在革命口號之下，參加五一的遊行。

看了這些表示革命復興的事實以後，我們應該質問自己，這個復興的事實是什麼？我們應該設法去了解現時工人運動的革命復興的特點。

這種復興，自然是和資本主義恐慌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制度根本矛盾的尖銳化相連

的。這些原因，使無產階級的地位，日益惡化，使資產階級對於鄉村勞苦羣衆的壓迫更加厲害。使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的壓迫，更加繁重。工人階級地位的惡化，不可避免的發動起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現在形勢的特點，即在：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尖銳化，工人階級狀況的惡化，剛發生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蓬勃生長的時候。

這件事實，是具有世界的意義的。蘇聯轉入新的建設時期，就使現代的基本衝突，即兩個根本相反，不可調和的兩個制度（衰落的資本主義制度，與上升的社會主義制度）間的衝突，更加尖銳化。資本主義國家革命工人運動的復興，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密切地相連，這是毫無疑義的。在擴大會議上，大家好似沒有充分顧到這點。所以下面我更詳細的說到。現在我祇指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是在國際革命工人運動的復興上，具有特別意義的。

現在的復興，具有國際的性質。不管程度和性質的差別如何，我們根據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的事實，儘有理由可以說這種復興是帶着國際的性質的。

有人要問，這種復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對於這個問題，作一種嚴重的分析，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倘專門以探考復興開始的時日爲事，那末這是沒有用的。

下面幾種解釋，可以幫助着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記住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一九二八年二月）因歐洲工人運動表現左傾，已深信有改變歐洲主要共產黨（法、



英、)的策略底必要。一九二八年初赤色職工國際的基本決議案，也是根據這個觀點做成的。最後，共產國際六次大會指出，資本與工人中間的一切經濟鬥爭的特點，是他們的特殊的尖銳性，指出『每次罷工都帶着政治的，即總的階級的性質』，指出『工人階級已經恢復以前時期中嚴重的創傷。他們的反抗力，日漸增加』。可是就是六次大會也還沒有說到新的革命復興的形勢。祇有現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根據於無數新的事實，方才能够而且的確應該堅決地宣佈：革命的復興，正在往前發展。

不用說，這個復興在各國是具有不同的形式的。在歐洲這些國家裏（如德國、波蘭及法國），我們看到革命復興最清楚的形式。印度也是如此。印度革命運動的復興，逐漸發展成爲直接革命的形勢。在討論中，同志們很正確的指出，共產國際應該非常注意地分析這些歐洲國家與印度的革命復興。自然這並不是說，英、美及其他國家的工人運動復興的問題，共產國際可以擱置不顧。

現在我們要注意到黨內懷疑革命復興與事實的那種意見。右派及調和派分子，正想推翻這個事實。他們所愛用的論據是：在三年以前當英國發生總罷工中國革命高潮怒發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說到國際革命的復興。現在，在一九二九年，我們怎樣能够這樣說呢？這樣的問題的提法，顯然就是不對的。自然，如果否認英國總罷工，一九

二六——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以至有名的維也納暴動等等的事件的革命意義，自然是嚴重的錯誤。不祇如此。如果沒有這些事件，那末我們或許就沒有現在這樣迅速的事變發展。英國總罷工以及中國革命，絕大地震撼了資本主義的穩定。他們在震撼資本主義穩定上，盡了攻城機的作用。但是，在那時的形勢之下，這些事變，祇是單獨國家（英、中國）所特有的現象。這些事變，沒有在別的國家裏得到回音。現在我們有不同的形勢了。

現時在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發生的事，指出革命復興的發展，不是某個國家所特有的現象，而是歐洲及歐洲以外許多國家所共有的現象。現在的形勢，就是如此。現在說中國發生新的革命高潮，確是太早。但就是在中國，情形也決不是安靖的。反之現時在中國正常時發生革命的騷動。城市和鄉村中的革命勢力，的確是在發展着。固然現在說新的中國革命高潮，尙屬過早，可是如果否認中國階級矛盾的增長，否認新的革命高潮的先決條件正在形成的事實，那末這的確是極卑鄙自由主義的近視見解。但是現在特別主要的是印度革命運動的發展。印度革命運動，不但吸收更多的工人，而且還普及於一部分農民。印度革命運動的發展，對於全部東方特別是中國及中國革命運動，有極其重大的革命意義。

現時，在國際工人運動上，固然是有像英國總罷工那麼重要的事變；可是英國的

總罷工，整個的說來是孤獨的，牠甚至在英國本國，也沒有發展成爲革命的形勢。他方面，現時在德國，波蘭，捷克斯拉夫，其他歐洲國家，以及美洲歐洲等地所發生的工人階級經濟及政治的鬥爭，指示出國際革命的復興，確是一個事實。所以祇有黨的庸俗的調和派，才否認，我們是在迅速地走近偉大的事變，比英國一九二六年總罷工更大的事變。

上面所說的，全部指出各國共產黨應該準備好去應付巨大的革命事變，應付更大規模的新的革命鬥爭。我們在動員革命力量，來應付新的巨大階級鬥爭時，我們應在黨內提高我們對於工人階級的責任心。要把現在的經濟鬥爭，轉成征取政權，獲得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那末極大部分，是要依各國共產黨的努力。

在這個意義上，柏林的五一事變，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柏林五一事變，表示德國階級鬥爭的轉變點，這次事變，促進德國革命工人運動的發展。像我們議決案上所說的「這次事變證明無產階級的經濟運動，有發展到更高的革命鬥爭形成底傾向」。這些事變，顯示革命復興的基本問題，就是更高的革命鬥爭形式的問題；不但對於德國工人如此，就是對於全部國際無產階級，也莫不如此。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成爲無產階級運動的切身問題。誰要是否認這點，那末他就不是革命者，不是共產主義者，而祇是腐化的可憐的改良主義者。（鼓掌）

### 三 革命的復興及我們的任務

現在已經明瞭，我們要用何種觀點去考慮我們的實際任務。

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是徵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在現在的情況之下，當我們看到革命復興的時候，這個任務，應更特別注意。我們應該堅決地宣示，共產黨要徵取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就要徵取工人運動中的領導權。共產黨祇有在每個工人的行動中，每個罷工與示威運動中，每次工廠委員會選舉運動中，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集合無產階級羣衆於自己的周圍，祇有這樣，方能獲得工人運動中領導權。祇有堅苦地為一切羣衆運動的領導作用而鬥爭，才能擔保共產黨有工人階級的擁護。這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在這上面，擴大會議對於經濟鬥爭中共產黨新策略的討論，有極重大的意義。這個策略，大部分已為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大會所規定。現在來總結這些經驗時，執行委員會應該特別注意於罷工策略，罷工領導，以及無組織工人中的工作（這點特別重要）。這上面，還包括反對改良主義工會開除共產黨員的鬥爭，某種條件下革命工會的組織，產業裏面工人所舉的革命代表機關的設立，以及工廠委員會內的工作。最後，這上面還包括怎樣以新的形式去應用無產階級聯合戰線策略底問題，以及現在更是重要的怎樣聯系工人經濟鬥爭及無產階級基本階級任務的問題。

我們已經可以記載我們在實行這些新任務上的巨大成績。德國，法國，波蘭（這些國家現居革命復興的前鋒）等地工人的經驗，尤其重要。

我們已經試驗過新的策略，我們已有工人階級新的組織形式的例子。這些經驗，應該檢定起來，擴大起來，增益起來，成爲整個國際工人階級的財產。我們絕對不能把我們的實際任務，限於「已經試過」的辦法，我們絕對不應忘記，新的形勢，須求新的方法，新的爭鬥形式，新的組織，新的征取羣衆的道路。忘記這點，等於忘記征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要點。

我不再詳述其他和組織工人階級經濟鬥爭的實際任務相連的那些問題。我祇指出，現在正確地從下實行起的那種新的聯合戰線策略，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現在，和改良主義妥協的策略以及在革命和改良主義組織之間成立合作的策略，比較以前更是不接受，更是有害；我們更應該指出共產黨在無產階級羣衆行動中爭取領導權的重要。共產黨人，祇有以最先進工人的資格參加無產階級的一切羣衆示威運動，祇有竭力協助工人階級的一切羣衆行動，祇有嚴酷地反對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左派」；祇有如此，方能造成征取工人羣衆的先決條件，使工人階級的主要部分，能够歸於共產主義旗幟之下。祇有應用這種策略，祇有應用一切新的形式和方法來組織工人階級，共產黨方能征取到工人階級的大多數，而領導他們，去作奪取政權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鬥

爭。

這上面，我們應該說一說現在時期中政治的羣衆罷工的作用。

資本家對於工人階級的進攻，最近以來，引起無產階級的更厲害的反抗。在有些地方，工人的經濟鬥爭，不再是防禦的鬥爭，牠已經採取了反攻的性質，並且有時更採取了一種經常進攻的性質。僱主組織，改良主義工會，與資產階級政府機關的合作，迫着工人採取新的鬥爭形式，並使經濟鬥爭轉爲政治鬥爭。可是現在這種反對資本家及其改良主義走狗的示威運動，還是帶着散漫的性質。我們應當使正在發展的羣衆活動，有一致的方向；我們應當領導這種活動，進入總的無產階級鬥爭的道路。羣衆政治罷工的問題，是共產黨在最近將來的樞紐問題，這正是現在共產黨策略任務中新的基本的和特著的一點。這是說，我們已非常接近新的最高的階級鬥爭形式。

我們現在還不能說我們是處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但是，如果忘記在新的革命復興與直接革命形勢之間，並沒有一條萬里長城之隔，真是不可饒恕的近視。我們不能空費時間，來猜測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國家，在什麼特別時機，我們會遇到直接革命形勢。在這上面，預言並非共產黨的事。可是我們如果不懂得，現在的革命復興在某個階段上（顯然並不是在渺茫的遼遠的將來）能夠發展成爲革命的爆發，成爲革命鬥爭的最高形式，如果不懂得這點，那末我們就不是共產主義者。因此，

我們必須找出一個革命的口號，來聯絡羣衆的散漫行動，使之成爲無產階級綜的革命行動。在現在發展的階段上，這樣的口號，就是羣衆政治罷工。如果我們不曾達到堅決的革命形勢，那末我們是不能提出這個口號的。在現在的情勢之下，這個口號，顯示出全部基本的實際任務以及現在我們整個的策略。

列寧總是非常重視工人的罷工運動。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間，以及後來一九二一——一四年的革命浪潮期間，特別看重罷工運動的作用。他不但再三地解釋經濟與政治罷工兩相聯系和總合的重要，他並且還特別指出「聯合兩種最有力量的革命鬥爭工具——羣衆政治罷工與武裝暴動」（列寧：『專政的歷史』）的重要。

我們提出羣衆政治罷工的口號時，我們正是向工人階級最高的革命鬥爭的形式走去。這個口號在實際上的成功，將指示出：革命浪潮，正要發展到最高的革命鬥爭形式。我們提出羣衆政治罷工的口號時，我們將在路上遇到堅決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直接奪取政權的鬥爭。（鼓掌）

#### 四 反對社會民主黨及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在現在的情勢之下，更堅決的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特別具有重大的意義。共產黨絕對不能忽略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特別是反對「左派」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因爲「左派」社會民主黨比右派採用更精緻的方法，來出賣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嚴厲的

的墮落的反對社會改良主義的鬥爭，那末我們即不能有征取工人階級的鬥爭。因為社會民主主義更往前轉成社會法西斯主義，所以反對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反對社會民主黨「左派」的鬥爭，更是特別重要了。

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問題，需要特別的注意。

據我看來，全體會議上關於法西斯主義，特別是關於社會法西斯主義的討論，有些地方帶着學院派的氣味。自然，法西斯主義的歷史，本性，特質以及牠的發展階段等的詳細研究，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逐漸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的詳細研究，對於共產國際，確是非常重要的。但這可不是說國際全體會議，應該轉成像大學士的會議那樣。這個問題的基本部分，共產國際已經研究過，已經表示於六次大會決議案及共產國際綱領之上。在現在革命復興的時期，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在決定各國共產黨應採取什麼鬥爭的方法，去反對法西斯主義，去反對正要轉成法西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我以為全體會議，應該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這個上面。

工人近來更多地遇到社會民主黨方面的法西斯蒂方法。像柏林五一事變時，社會民主黨警察總監（宰爾基倍耳之流）所表現的那種反工人，公開反革命的策略，已經明白地顯示出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本性。五月一日，二日，柏林社會民主黨警察的暴舉的教訓，以及全體社會改良主義組織擁護這種暴舉的事實，無產階級羣衆，是不能忘記的。



。現在社會民主黨首領們所提出的口號，已經明白地指示出社會民主黨的法西斯蒂性質。大家都知道，在最近一次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上，社會民主黨的一個首領，威爾斯提出法西斯蒂專政的口號，以與革命的無產階級鬥爭。我們看到社會民主黨，公開地採取新的立場，而更前進地轉變為顯著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的作用，即在造成（經過社會民主黨組織及改良主義工會）某種擁護法西斯主義的羣衆力量，來反對工人階級及無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正盡力利用社會法西斯主義，來阻礙無產階級羣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來阻礙工人反對資產階級專政的鬥爭。所以在現在的革命形勢中，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反對牠的卑污的左派（左派以巧妙方法，欺騙羣衆）底鬥爭，是無上重要的。

可是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法西斯蒂轉變，的確是不一致的，這上面，我們可以舉出兩個例子：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英國的工黨。我們知道，麥克唐納爾政府當權不久，還沒有向工人充分表現出牠的真正性質。但是麥克唐納爾政府反對工人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辦法，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準備新的對於蘇聯的進攻等等的政策，將逐漸把牠的社會法西斯蒂性揭破。在現時革命運動發展的形勢之下麥克唐納爾政府的真正階級性的顯露，將比平時更要迅速。工黨政府的政策，是在幫助資本主義合理化，加重壓迫工人，在上述條件之下，工黨的政策，將迅速地表示出牠的顯著的資產階級及帝國主

義的性質。麥克唐納爾政府，沒有國會的多數，現在，牠所以能够當權，是靠資產階級政黨的恩惠。牠已經表示出，牠是怎樣焦急地尋求自由黨甚至保守黨的幫助。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因為『工黨政府』忠順地執行英國帝國主義的意志，所以給牠以這種幫助。如果工黨政府能够在國會內依靠自己的多數，那末他自己更將迅速地暴露自己的面目；在這上面，我們祇可惜『工黨』沒有那樣的一個國會的多數。

關於英國工黨政府，還要說一點。

總選舉中工黨的勝利，在相當限度內，也是因為英國共產黨犯了錯誤。有幾位同志在此地已經說過，上一次英國共產黨，通過錯誤的決議案，主張幫助麥克唐納爾的政黨，工黨在總選舉時，就從這個錯誤的決議案上，積累了大批的政治資本；和英國工人的改良主義傳統進行鬥爭底絕大困難，使英國共產黨對於英國的社會改良主義，屢次採取模糊的不堅定的策略。我們方面的這種動搖，絕大的便宜了麥克唐納爾。漢德森，克萊因斯，史諾登這流的人。英國共產黨似乎到現在還沒有消除這種猶豫的態度。因之，我們更有理由，指出祇有在『階級對抗階級』的口號之下，堅毅地執行新的策略，方能使英國共產黨，提高（雖然並不是立刻的）牠在英國工人運動中的威信。我們執行這個策略，愈是堅決，麥克唐納爾政府面目的揭破，也愈是澈底；那時，這個策略的正確，也愈得到證實（特別是我們堅毅地殘酷地執行這個策略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時

候)。

關於現在執政的第二國際政黨所說的話，儘可用來指示現在社會民主黨的真正作用。牠的作用，祇是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法西斯主義的工具。實際上，社會民主黨，更往前轉變為社會法西斯主義。在革命復興的時期，社會民主黨一定變成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聯盟中的組成分子。

## 五 各國共產黨的狀況

我現在要說六次大會以後各國共產黨發展上的基本要點。

我在開始已經說過，這個時期中共產國際發展上的主要特點，是反對右派及調和派分子的鬥爭。這個鬥爭採取確定的國際的性質，而且非常尖銳，這自然不是偶然的，在革命復興的時期，這是無產階級鬥爭勝利的主要先決條件之一。在這時候，共產黨機體內全部柔弱和腐化之點，非常明白顯示出來。自然，我們不能說，我們已經把共產主義運動中全部腐化和機會主義的成分，全部發現和揭破。可是，無論如何，共產國際清除機會主義腐化分子的工作，總已有極大的進步。

在這方面，我要舉出幾件事實來。

我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組織成分開始。共產國際的發展，不斷地把黨內偶然的依附者以及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清除出去。六次大會以後，這個過程，進行得

非常之快。不到一年，好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不但從執行委員會內開除出去，並且還甚至開除了黨籍。其中不但包括托洛斯基主義的叛徒斯配克托爾（加拿大），而且還包括這樣的叛徒：如洛夫斯東（美國），依萊克（捷克斯拉夫）。這些以及其他（勃蘭特萊爾，森漢美爾）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的開除，是於共產國際有利的。如果德國共產黨有勃蘭特萊爾以及森漢美爾這種人在內，那末牠或許就不能應付牠在現在形勢中所負擔的革命任務。和顯明的叛徒一起，決不能動員羣衆，來作獲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如捷克斯拉夫共產黨有嚇以斯，耐以拉特及依萊克等人在內，那末牠也就不能站在革命無產階級的前鋒而前進。這些人堅決地朝着社會民主黨走去，他們是不適於革命的鬥爭的。

共產國際清除內部的墮落分子以及顯明的叛徒，這是共產國際往前成長，發展，及鞏固的先決條件。祇有以新的領袖，特別是那些經過階級鬥爭訓練的從工人中出來的領袖，去替代這些機會主義的領袖，我們的黨，方能成爲工人階級的真正領導者。

共產國際特別注意於美國共產黨的狀況。

共產國際特別派送一個代表團，到美國共產黨的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去。隨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特別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慎重地考察美國黨內的狀況，這個委員會在莫斯科工作了好幾星期。在這個委員會工作的時候，我們明白地看到洛夫

斯東所領導的中央委員會，是不能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的。這個中央委員會藉口美國處於特殊地位，而拒絕了共產國際的路線。洛夫斯東之徒，企圖以美國處於特殊地位的理論，來掩護他們可恥的擁護美帝國主義的策略。洛夫斯東在美國委員會內所表示的態度，清清楚楚地指出洛夫斯東祇顧到他的腐化的小組織底利益，指出他不是一個共產黨的首領，而祇是我們隊伍中一個陌生人，他是可以作任何卑鄙的詭計以欺騙共產國際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絕大地刷新了美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造成美國共產黨真正向布爾塞維克化發展的基礎，造成美國共產黨鞏固牠在工人中間的威信的基礎。這個例子，證明在資本主義穩定的時期中，腐化的分子的鑽入我們黨裡來，這些分子的開除，以及和工人相連的新領袖的代替，一定能使黨有更好的基礎，而促進黨的成功。

在捷克斯拉夫黨的領導機關中，也發生了巨大的變更。

好幾年來，捷克斯拉夫黨裡的半改良主義者，隱藏了他們真實的本性，現在他們已經公開地出來反對黨和共產國際。好幾個黨的首領和幾個國會內的共產黨議員一起，開始違反黨的紀律，懈怠工人的經濟鬥爭，並且和警察一起，來反對工人，以便他們可以獲取工會的機關。雖然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在現在發展的階段上遇到極大的困難，可是黨着黨的招牌的半改良主義者之清除，祇會鞏固黨，祇會提高牠在羣衆中的威信。

我以為經過這些變故以後，我們儘够領略他們關於共產國際「破裂」和「分裂」等等的呼號，有何等的價值。

我們在波蘭共產黨中遇到特殊的情形。不久以前，波蘭黨內的鬥爭，有時帶着無原則的性質。並且兩派都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最近以來，所謂「多數」一派的首領們的改良主義傾向，激進地往前發展；在波蘭國內的重要問題，以及對於波蘭社會黨的態度上，尤其是如此。波蘭共產黨中央的最近一次全體會議，正確地決定刷新黨的領導機關，撤去中央機關內顯然帶着機會主義傾向的那些同志（柯斯特而熱瓦及其他）。我們可以確定的說，波蘭共產黨，在布爾塞維克化的發展上，在羣衆影響的擴大上，將獲得巨大的持久的成功。

關於意大利共產黨。我也要說幾句話。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意大利共產黨，並沒有清楚地提出反右派及調和派的鬥爭。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在這上面表示得非常猶豫。我甚至說，表示得非常柔軟。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對於適拉同志的態度，即可作證明。

在三月時，意大利黨的中央嚴重地斥責了適拉同志的路線，以為這路線是反對共產國際的。現在意大利同志出來說，意大利共產黨中央，早在三月已經屏斥了適拉的觀點，但是我更正確地可以說意大利的中央，不幸祇在三月，方才屏斥適拉的路線，無論

如何。這個決議案雖是太遲，可是總是絕對必要的。雖然適拉明白地表現出一個十足的機會主義者和右派，可是意大利黨的中央還是繼續地不可索解地對他表示好意（聽！聽！），在中央三月會議上，適拉同志宣佈他要辭去政治局的職務。中央非但沒有先時提出自己的決議案，而且還甚至決定挽留他在政治局裏的職務。在嚴重地屏斥適拉的政治路線以後，這個決議，顯然是不合論理的。我們可以從意大利同志分給會場的說明書上，看出意大利黨的中央，根據什麼理由，來做這樣的議決案。意大利代表團舉出三個理由：第一、中央以為辭職的政策，一般的說來，是不能允許的；第二、適拉答應不為自己的主張宣傳；第三、中央要更強固地以黨的紀律和監督，約束適拉。這些理由之不充分，是非常顯明的。適拉已公開的反對國際路線，中央對於適拉，通過這樣的決議案，顯然是種極大的錯誤。從愛爾柯里同志的演辭中，我們可以看出，意大利黨的中央，已經承認有改正這個錯誤澈底弄明白這個問題的必要，我們對於中央的這種觀點，祇有表示歡迎。我們不能不說，意大利共產黨在六次大會上提出適拉為駐國際代表，是種錯誤。無如論何，國際既有反右派的決議，而意大利共產黨又是擁護這個議決，那末，和適拉那樣的右傾分子作堅決鬥爭，是絕對必要的。

關於英國共產黨的狀況，我祇說幾句話。英國共產黨，對於反對右派及調和派的鬥爭，還沒有達到十分明確的地步。這點反映在黨內領導機關及中央政治局的組成分

子上面。如果以共產國際路線爲我們出發點，那末我們很難解釋，爲什麼英國黨的中央，因着某一些理由，把那些擁護國際路線最形堅決的同志，調到中央機關之外，倘然我們要加强國際路線，加强堅決反對右派及調和派的路線，那末我們首先就應該加强這個中央領導機關。在現在情形之下，英國共產黨所最應該注意的事，就是政治路線的固定，果決，堅持。

關於法國共產黨，我祇舉出一個總的意見。雖然歷史使法國共產黨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佔據前鋒的地位，可是我們不能說，反對右派及調和派的鬥爭，已在法國黨內達到完全明瞭的地步。在法國黨內，我們的任務，顯然是在提高反對右派及調和派的鬥爭到應當的地步，就是說提高到原則的地步。祇有對於原則的清楚了解，對於鬥爭的堅決一貫，我能担保法國共產黨往前的發展，方能担保牠在反對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上得到勝利。

我不再說其他共產黨的情形。我祇要舉出瑞典共產黨因天氣不佳而拖延五一紀念的舉動，以及牠在國會內的顯然機會主義的路線，就已經足夠證明反對右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在好多共產黨裏，還沒有正確地發展起來。可是在現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如果對於這個問題，一有不正確的或甚至不十分明瞭的路線，那末這就等於在重要革命事變的前夜，解除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武裝。



在現在時候，我們應該特別用力揭穿我們的政治弱點以及組織上的缺點。片得尼茨基同志在其演說中，舉出許多事實，來指示各國共產黨在組織工作上的缺點。片得尼茨基同志關於共產黨發展狀況，工廠支部工作，鼓動宣傳工作狀況等等的敘述，應受特別的注意。在準備巨大革命事變的時期中，各國共產黨，應該用盡一切力量，去鞏固他們的組織地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經過許多發展的階段後，已成爲世界工人運動的真正列寧主義的路線。將要來到的革命事變，不僅要普遍地試驗我們的政治路線，并且還要試驗我們組織上的成績。柏林的五月事變，已經指出，即使黨的路線和策略都是正確的，但組織上的缺陷，還是具有極大的關係，這是各國共產黨所應該牢記的教訓。

在總結反對右派機會主義的鬥爭時，全體會議應該顧到調和派在現在環境中的作用。我們不用贅說，不久以前還在黨內的右派分子（如勃蘭特萊而和泰爾漢，以美爾之流）現在已在共產主義運動之外了。他方面，所謂『調和派』，在全體重要的問題上，已和右派採取同樣的意見。在右傾的取消派被開除以後，調和派已變成機會主義分子的吸引中心，并且在實際上他們正在實行右派的作用。所以決議案上所指出的條件，是最低限度的絕對必要的條件，調和派祇有遵守這些條件，方能留在黨裏。誰要是不能和右派脫離，不去實行真正的反右派的鬥爭，不去執行共產國際的議決案，那

末他就不能留在共產國際裏面。他們如果企圖在黨內舉起機會主義的旗幟，那末他們的企圖，將受共產國際堅決的打擊。我們的口號是：肅清右派及機會主義。（鼓掌）

## 六 蘇維埃及聯邦共產黨

現在我要說蘇聯的狀況，我們觀察蘇聯問題，一定要和世界革命復興問題密切地聯接起來。

世界革命浪潮的發展，正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蓬勃怒發的時候，這并不是偶然的事。蘇聯之為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革命原素，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自蘇聯進入建設的時期，特別是從蘇聯開始實行五年計劃的『偉大工程』以來，蘇聯之國際革命原素的作用，獲得更大的意義。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銳進，強烈地影響於全世界革命勢力的發展。反過來，蘇聯因國際革命勢力的發展，也更加加強固和發展起來。社會主義建設的五年計劃，不但是蘇聯的基礎，而且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柱石。

關於五年經濟計劃本身，要說幾句話：

我們已經開始實現五年計劃。我們知道，目下的經濟年度是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現在就是連悲觀主義者，也相信這個計劃，決不是一堆廢紙。五年計劃的實現，使蘇聯工業，要超過戰前的三倍以上。這決不是當權的共產黨人的夢想，而是社會主義

經濟建設的真實計劃。而且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還不過是最近五年中社會主義建設的最低限度的計劃。

祇在數星期以前，黨和蘇聯政府的最高機關，批准了這個五年計劃。在這幾星期中，對於這個計劃的各部分，還可以有更進一步的研究，現在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說在好幾個重要部門上，我們將絕大地超出我們預定的計劃，我將從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統計冊中，舉出幾個最顯著的數目。

我開始說重工業。在礦工業上，五年計劃預算比戰前增加三倍半，現在已經預算可以增加四倍半。在五金工業上，現在預算的增加為三、一至三、三倍（在有色金屬工業上為三、四至四、四倍）。農業機器為四至四、七倍。在電氣工業上，增至四、九至五、七倍。在化學工業上增加四、六至五、一倍。

至於輕工業，那末主要的增加，是在下屬部門中：造紙工業，二、五至三、三倍；印刷二至二、五倍；化學二、五至二、九倍；橡皮，二、四至二、五倍。

我們已經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五年計劃中，那些供給工業原料的部門，是發展得非常不夠的。這點已經使聯共中央及各該蘇維埃政府機關，特別注意於我們國民經濟中的這些部門：如棉花，木材及漁業等等。我們將用力地發展這些部門，使他們的生產量能够比五年經濟計劃內所規定多一倍。所以五年計劃，不僅是一個非常真實的計劃

，而且更顯明地還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計劃。這也就是說，作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基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蓬勃地往前直進。

但這並不是說，蘇聯在現在的時期中沒有遇到巨大的困難。蘇聯在現時，正是已進入社會主義建設上最困難的一個階段——即在小農經濟裏內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

在這上面，很明白地可以看到，為什麼反對右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在聯共內，具着這樣重要的意義。我們要堅決進攻資本主義成分，並且在最落後最困難的經濟部門（農業）中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總路線的執行，在聯共黨內現在遇到一種極其猶豫的狀態。聯共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提出一個自由主義的機會主義路線，來反對列寧主義的路線。適拉又是這條右派機會主義路線的最坦白的宣示者。

適拉不過把聯共右派心裏所要說而不敢形之於言辭的那種意見，表白出來罷了；現在我們要將適拉的取消派哲學指示出來。

在他給意大利共產黨中央的報告裏，適拉也討論到聯共的政策。他的見解的右傾及取消派性質，極顯著地暴露出來，他的哲學，大部分無疑地是從聯合右派那裏得來的。適拉寫道或是更正確地可以說，適拉抄寫聯共與右派的意見道：『蘇聯的農業，有衰落的危險』。適拉以為聯共的十五次大會『犯了一種幻想，以為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徹底改變農業政策的時機』；他宣佈，『十五次大會太過迅速地離開十四次大會的立

場』。以後，他繼續的說道，『我們應該說，十五次大會關於發展集體農莊的決議，正是根據於這種錯誤的估計』。這樣，對於蘇聯貧農和中農羣衆已是十分明瞭的事實，在適拉看來，却是一種危險的『幻想』。適拉的推論，自然是包含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精神。

適拉的政綱，是『提高全部鄉村的財富』（適拉自己加圈），他既說：『提高全部鄉村的財富』，自然他也要提高富農的財富；提出這樣意見的人，還胆敢稱自己爲共產黨員。好像直到最近，在我們隊伍中，還有人像適拉那樣主張『富農的最低限度的收入，應該成爲農民羣衆的平均收入』（適氏自己加圈），這是適拉的富農的好夢，他完全揭穿聯共黨內右傾的性質。實在說來，適拉祇是學唱別人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歌調。但是歸根結底，右派機會主義者的觀念，還不是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觀念相近嗎？

適拉的路線，是和聯共的路線，不能并列的。適拉的路線，和全體右派的路線一樣，是向富農投降的路線。我們黨的路線，是堅決進攻富農的路線。在投降資本主義成分的路線之間，是沒有共通之路的。牠們是兩條不能調和的相反的路線。

適拉的觀點，是小資產階級的狹窄的觀點。雖然他在蘇聯好幾個月，可是蘇聯鄉村中社會主義建設的無數事實，從沒有映進他的狹窄的眼簾中去。我們農村經濟中社

會主義成分發展的迅速，是爲十八個月前當十五次大會時候我們黨所不曾預先見的。那時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說，在去年之內，集體農莊的數目，竟會加倍。而且今年集體農莊的發展，也不會比較慢些。在十八個月以前，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大的國有農莊的建設。會像現在這樣的快。我們看到去年的大計劃，都被棄去，現在我們開始實行的計劃，不但超出去年的計劃，而且還超出新近通過的五年計劃；這個計劃，使大規模的農業生產，能够迅速往前發展（這種發展的可能，是全世界各國所不曾有過的）。這是一個例子。五年計劃，預計今年國有農莊的耕種面積爲一百六十萬黑克太（一黑克太約等中國十五畝左右），可是實際的耕種却有一百八十萬黑克太。五年計劃，預計明年耕種面積（國有農莊的）爲二百三十三萬五千黑克太，可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明年耕種面積，將超出三百十萬黑克太（鼓掌）。今年社會主義部分的耕種面積，比較去年加一倍。

除發展國有農場外，我們還進行別一項巨大的工作，就是組織機器引動機的中心站。具備最好的農業機器和引動機，他們和農民訂約，耕他們的土地，收割他們的農產。這樣，國家所組織的最大的機器生產，直接達到了農民經濟。引動機中心站，根據和一部分農民或整個村莊自願訂立的條約，耕農民的土地，收割他們的農產。大規模農業生產的利益（收成更好并且更穩定）對於農民羣衆，已是非常顯明，農業機和引動

織的中心站，已經樹立起他們的威信，並且正鼓勵着農民在中心站的周圍，組織集體農場。這種工作，造成農民經濟大批集體化的道路；我們從經驗中學到，蘇維埃機關和農民合作，能够在這點上產生最大的效果。我們現在還只有極少數農業機器及引動機的中心站，但是我們已經擬就及批准一個計劃，預備在一年中建立一百個這樣的中心站。他們的工作將普及於一百五十萬黑克太的耕種面積上。這點指出機器及引動機中心站的設立，將絕大推進鄉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

此外，鄉村蘇維埃現在採取新的工作方式，來發展農業。鄉村蘇維埃現在第一次正確地負擔起經濟及工業發展的工作。糧食收買上訂立合同方法的迅速發展，在這上面，盡着極重要的作用。在現在情形之下，訂立合同方法具有何等意義，我們已經說得儘够了，所以我不再贅述。我只要特別指出改造農業上面的其他幾種方法。

黨所進行的改良農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數千農民的會議，通過了關於『最低限度農學方法』的決議，這種組織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在農民中間，已經舉出，二十五萬以上的農民代表，來監督『最低限度農學方法』的議決案底執行。這些例子，不過使我們具有一概括的映象，知道黨蘇維埃及合作社等等機關在鄉村中所採取的辦法，是怎樣的衆多和各別。這些辦法大部分是爲發展個別的農民經濟，可是在他方面他們準備鄉村中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集體化的成功，要依靠鄉村中黨所領導的全

體工作的銜接。

在發展農業的堅苦的工作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好多實際的成績。事實證明右派關於農業衰落的談話的無稽。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秋季會議，規定在今年要把耕種面積增加百分之七。這個議決案，通過於十一月，那時我們已經絲毫沒有方法來補救冬種的減少（因霜早降，所以冬種減少百分之三）。雖然冬種減少，可是今年的耕種面積，還是增加百分之六，這就是說我們已經設法耕種面積增加六百萬黑克太。而且在這個所增的數量中，一半是歸於社會主義部分的。這就是適拉所高聲大叫的蘇聯農業的『衰落』

還有一點。幾星期前，我們黨內的右派及調和派預說我們若是不進口大批糧食，我們就不能解決糧食的困難。他們提議，從蘇聯工業化款項及準備金上面，挪用一萬萬金盧布；他們提議更要減少我們工業中心的麵包分配率。他們高喊鄉村中間我們地主的危急。結果，這些都成無聊的空談，黨決不准減少現金的準備，因為這種準備金，担保工業機器的進口以及蘇聯的國防。要想減少工人麵包分配率的企圖，已被我們拒絕。黨為回答富農的反攻起見，更加重動員貧民和中農羣衆來向富農分子進攻。現在已經明白，我們用了許多方法以後，首先是加緊收買糧食，堅決壓迫富農等等。我們已使蘇聯不必進口糧食，而能穩定地給工人以經常的麵包的供給。（鼓掌）



在解決糧食問題上面，我們的確是向前進步。我們應該更廣大地利用那些發展農業的新經驗，去竭力改良工業中心的糧食供給。供給糧食的方法問題，也擺在我們前面，這的確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在講蘇聯時，我們不能忘記在社會主義競賽的事實。這是蘇聯最主要的發展之一。祇在三四個月前，方才提出競賽的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現在社會主義競賽，已經包括絕大部分的工人階級。你們如果到工廠裏去，你們就可以看到這點。自然不是每個工廠的競賽，都是做得非常的好。還有許多缺點，還有許多不會勝過的障礙。可是無論如何，在提高勞動紀律，減少生產價格，增加生產等等上面競賽，已成一種最重要的方法了。

在這個經濟年度的上半年，絕對重要的減低生產價格的任務，沒有得滿意的成績。但是非常顯著地，自社會主義競賽開始以來，即自四月以來，這上面已有明白的轉變。這種現象的表記之一，就是實現工業計劃上的進步。如果根據頭兩個月（四月五月）的成績來判斷，那麼，我可以相信，今年工業計劃的主要任務，非但能夠完全實現，並且甚至還要超越。這就是社會主義競賽最初的重要成績。

社會主義競賽，逐漸從特殊的運動，轉變到日常的問題。這正是真正成功的保障：社會主義競賽逐漸包括單獨工人的集團，各分部各企業，以至整個工人區域。競賽

的制度，更侵入鄉村中。集體農場和國有農場也採用這個制度，來改進農業的生產方法。競賽在鄉村中，將操一種其重要的作用，而成爲引入社會主義到鄉村中去的一個方法。競賽的方法，一定要成爲我們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共產主義方法。這是我們的方法，這是蘇聯的方法，這是聯共的方法。

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任務，堅決的需要我們把我們經濟的協作社的職工會的以及黨的種種組織的實際工作和方法，徹底地改革和改組。這種改組，是我們現在的主要實際任務。和這個任務密切相連的還有準備社會主義建設各部門人材的任務。這是現在非常緊迫的急切的任務。

我們要使社會主義建設成功，我們一定要激進地改良我們的工作方法。這上面的最主要的障礙是遲緩、慵懶、和放任；這些壞習氣，在我們隊伍中，還是有的。如果不和我們經濟機關職工會甚至黨的組織中底官僚習氣，進行堅決的剛毅的鬥爭，那麼我們將不能完美地應付我們前面的任務。黨將用全力來加強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竭力鼓勵羣衆的自動力，引導工人階級的力量，去作有組織的自覺的戰勝社會主義建設上困難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之上，在發展農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之上，在勝利地打擊敵對階級的活動底情形之下，蘇聯的無產階級將在聯邦共產黨領導之下努力推進社會主義的建設。蘇聯爲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革命原素，爲現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復

與的一個原素。蘇聯的這種意義現在更加增長了。

在結束時我將簡短地敘述我們黨內狀況

聯共發展上的主要特點，和整個共產國際一樣，是堅決反對右派及調和派的鬥爭。在佔據國際前鋒地位的那個黨裏，是一定要如此的。我們以為反對右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是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及其成功底先決條件。在迅速進行工業化，發展鄉村中社會主義建設，進攻富農及其他城市和鄉村資本主義成分等等的問題上，黨是不容有任何的動搖的。

我們不能夠不記住，在蘇聯還是有非常適宜的，發展右派機會主義傾向的環境。在蘇聯人口中，小資產階級成分，佔據最大部分。資本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成分的壓迫，經過許多路途，影響於一小部分共產黨人。當階級鬥爭更是尖銳的時候，這種敵對社會階級的壓迫，也更是顯著。在黨內，牠就採取右傾的形式。反右傾的鬥爭，不得不成為黨在現時的主要任務。在這個鬥爭的過程中，黨在思想上更變得堅強了，黨更是前進着，向社會主義建設的更高形式走去。

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對於聯共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鬥爭中，黨在思想上發展起來，並且變得更堅強了。在黨的十五次大會上，托洛斯基反對派不但在思想上被揭破，而且在精神上也已受失敗。從此以後，我們看到反對派的最後的崩裂。托洛

斯基在資產階級報章上攻擊蘇聯和第三國際，他已成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直接備僕。他的不久以前的政治朋友，不能不與之決裂。托洛斯基反對派崩潰的新事實，指出托洛斯基派，是在迅速消滅下去。

在這上面，我一定要給你讀一個文件。我所指的文件，是幾天以前拉狄克送給中央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一篇宣言。拉狄克在和中央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作過多次談話以後，寫成這篇宣言。他們開始表示同意於中央的總路線，並且宣布脫離反對派，我們相信，這篇宣言，不但由拉狄克署名，並且還要由斯米爾加和拍萊奧勃拉仁斯基兩人署名。所以作這篇宣言，不是祇用拉狄克名義，而是用三人的名義。我要把這篇宣言中主要及總結的部分，給你們讀一讀：

『我們以前對於中央政策所作的最主要推論是：這個政策，到某個階級，不可避免的脫離無產階級專政及列寧主義的道路，使蘇維埃政府及其政策，轉入特米多爾（即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權政）的地步，而把十月革命所獲得的勝利，不經一戰地放棄掉。我們對於中央的最重要的責備，是：中央的領導，雖然違反自己意志，可是總是在助成這種脫離，中央不和黨內蛻化分子及右派分子鬥爭，並且當經濟恐慌達到焦點的時候，中央將採用右傾政策，採用對富農讓步，放棄對外貿易壟斷權，向世界資本主義投降等等的方法，來尋找出路。』

「我們對於聯共中央及中央政策所取的態度，是錯誤的，所以獨立小組組織的設立，以及黨史上所未有的絕頂積極的小組織的活動（秘密印刷，十一月七日的遊行示威等等）等等都是錯誤的。」

「當蘇聯從恢復時期轉入建設時期的時候，我們在工業化速度，對於富農的鬥爭，共產國際問題等等上面，和中央發生不同意見；小組組織鬥爭的邏輯，使我們誇大我們和中央間的不同意見，而看不到中央的政策，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列寧主義的政策。所以聯共十五次大會根據這個觀點來斥責我們，是正確的。」

「根據上面所說的理由，我們取消小組組織文件上所簽的名字，宣佈我們完全和聯共同意。」（不是七月十三號發表於『真理報』上的宣言，而是七月六號拉狄克送給中央的稿紙）。

雖然已經太遲，可是拉狄克總已經承認他的路線的錯誤。他說『我們看不到，中央的政策，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列寧主義的政策。誰要是『看不到這樣的事實』那麼我們有充分的公開的權利，可以說他犯了極嚴重的錯誤。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歡迎這樣明白的宣言及拉狄克的承認，他指出反對派政綱的錯誤立場，承認了十五次大會的正確。」

拉狄克的這個文件，把我們黨反對托洛斯基派的鬥爭，作了一個結束。在這個宣

言公開發表以及托洛斯基的許多有名信徒宣布脫離反對派以後，托洛斯基在蘇聯甚至連一小團體的老共產黨員，也都沒有了。這真是托洛斯基反對派崩裂的頂點。現在托洛斯基只能退而與反革命分子爲伍了。

托洛斯基派的最後的崩裂，明白地表示出，否認蘇聯有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那條政治路線，具着何種的意義。大家都顯然可以着到，掩護在左傾辭句下的機會主義，獲得怎樣不光榮的結果。這是托洛斯基反對派歷史的最有益的教訓。

現在黨的主要任務，是征服黨的猶豫動搖與清除黨內顯然的機會主義者。右派放棄階級鬥爭，因之也就放棄列寧主義，而接受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處在無產階級前鋒地位，而且正在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聯邦共產黨，對於右派及調和派分子，將如對於托洛斯基反對派一樣，給以嚴重的打擊，這點難道還用懷疑嗎？這自然是毫無疑義的。即使黨內有一部分人受了別個階級的壓迫，而落在小資產階級影響之下，可是整個的黨，總是堅決地發展對於資本主義成份的進攻，掃除資產階級的勢力，而在發展的過程上，消滅自由主義的幻想。在現在的時期中，黨不是放棄階級鬥爭，否認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而是更用力地進攻資本主義成份。祇有這樣，聯共方能完盡真正列寧主義先鋒的作用，而以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來造成他們的領導權，這就是使聯共成爲共產國際先鋒隊的原因。

## 七 國際赤色日

同志們，國際工人運動的復興，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兩個密切相連的不可分離的現象。他們相互幫助着，並且共同擔保強大的新的革命浪潮的到來。國際的革命浪潮，和蘇聯的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指示出資本主義穩定的不絕的動搖。這兩個原素，都使帝國主義制度中劇烈的矛盾，更加尖銳化。這就是說，我們看到，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新的武裝進攻蘇聯底危險，可怕地尖銳化起來。國際六次大會提醒工人階級去注意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現在這個危險更加迫近了。在現在革命復興的情形中，我們應該動員工人階級的力量，去反對日益增加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以及新的武裝進攻蘇聯的危險。

我們應以這個觀點，去觀察八月一日的問題。我們擇定這天，作為國際工人階級舉行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及保護蘇聯的示威運動底日子。這個紀念日，指示出現在世界事變發展上的主要問題，是帝國主義戰爭及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蘇聯的危險。共產國際之組織國際無產階級示威運動，也是一個特著的事實。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已經進到這個地步，使單獨資本主義國家的不相聯系的示威運動，更明顯地成為不充分。工人階級鬥爭的國際化，的確是非常主要的。最後，組織國際赤色日的事實，也是非常特著的，這個紀念日，包含國際工人階級反攻的意義，我們明白看到，赤色日不是僅

僅引起世界上我們朋友的注意；在赤色日紀念的週內，不但動員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而且還動員了我們階級敵人的力量。這點正是指出國際赤色日的巨大的革命意義。八月一日的示威運動，不是尋常的示威運動。這個示威運動應該和工人階級的全部經濟及政治鬥爭，和工人階級堅決的反資本主義反法西斯蒂主義反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更甚地轉變為法西斯蒂主義）的示威運動，聯結起來。對於各國共產黨，這是一種嚴重的試驗。對於國際無產階級，這是一種動員鬥爭力量的方法，這是一種聯合國際無產階級，舉行反帝國主義革命示威的方法。八月一日，是我們集中力量，準備未來堅決革命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階段。

無產階級的不絕的經濟鬥爭及羣衆的新的示威，是革命復興的表認。工人階級的經濟及政治示威運動，帶着更堅決的鬥爭的性質，這些運動，包括更多的新的工人羣衆。在這些鬥爭中，我們的黨，更經鍛鍊，來應付他們的任務，黨的領袖，也受最後的試驗。羣衆參加這個鬥爭，愈是普遍，這些示威運動對於工人羣衆的影響，愈是厲害；共產黨在一切行動上所佔據的工人階級先鋒的地位，愈是堅固，黨的領袖在革命鬥爭中對於他們的任務，愈經磨練，那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愈有把握，我們從革命復興轉入新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階段，也愈是迅速。（鼓掌）



# 共產國際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

——瞿秋白同志在十次全體會議上的演講——

我以為共產國際中右傾的危險不僅從關於西歐的一般政治問題中表現出來，不僅從宗主國中表現出來，而且也從殖民地問題中表現出來。他方面，機會主義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國的哥哥，還走得更遠。我們如果拿關於戰爭危險和第三時期的矛盾等問題來看，則右派機會主義的政綱有一部很好的中文譯本。

中國革命失敗以後，許多人以為中國開始了一個資本主義狂熱發展的時代。甚至成立一種理論，認為『工農失敗以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有廣大發展的可能性』。於是，人們直至於說：中國不僅有資本主義發展，而且也走上了自己的帝國主義的發展道路。在第六次大會時，英國代表團談到印度及其他殖民地之『超殖民地化』(Decolonisation)時候，也表示這種見解。我認為英國同志現在也還未遠離這種見解，因為他們囑咐他們的黨的地方黨部去研究那英國代表團所附加於大會關於殖民地的提綱的修正案。他方面，如果殖民地和宗主國機會主義者，以為第三時期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恢復時期』，那麼戰爭危險和國際矛盾加劇就成了問題。

我們不要相信：右派祇停止在這樣道路上而不更向前進。在法國，有一些同志以

爲法國帝國主義是退兵的，帝國主義者是要和平的，因此戰爭的危險是減少的。在中國，機會主義以同樣方式提出戰爭危險問題，而推論說：美國既然借二十萬美金給「南滿鐵路公司」，可是美國有經過日本帝國主義以剝削中國的意思，可見國際資本利益這樣結合起來，太平洋戰爭的恐嚇是要減少的。我們知道，最近，人們認爲英國工黨和日本自由派上台是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新時期開始，自然人們要相信：這樣，在某種限度之下，可以促成殖民地之超殖民地化。

我們應該說：這種輕視戰爭危險的傾向，也存在於反蘇聯戰爭的問題中。人們肯定說：一般說來，帝國主義都不願意戰爭和騷亂，因爲這將妨害了合理化的實現，資本主義狀況的改善，帝國主義者地位的加強等。人們由此推論說：至於蘇聯，則資本家是不會對牠宣戰的。對於中國問題，也有一個特別重大的危險。人們肯定說：中國有內亂，已將近二十年，大家都願意和平，帝國主義者將控制中國軍閥擾亂，他們將容許工商業發展，因此中國工業將有依照資本主義進化道路而發展的可能。

所有這些見解歸結於：在西方，將有一個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新時代，而在東方，在殖民地，則將有超殖民地化和工業化之可能。事實上，在殖民地是完全相反的。祇要看看關於印度的幾種文件，就可以知道：在印度所發生的絕不是超殖民地化和工業化。英國帝國主義資本之剝削印度，一天比一天厲害起來：印度民族資本一天比

一天愈要歸屬於英國資本。至於中國，我們則有明白的事實。首先，無論關稅怎樣提高，但中國海關的監督和指導仍像從前一樣落於英國人之手。他方面，我們又聽見中英有個協定，關於派遣中國學生赴英國學習軍事的事情和此協定已經簽字的消息。英國在中國南方幫助建築粵漢鐵路和兩廣間的汽車路等，這不僅是要擴大市場，增加商品銷路和採辦中國原料，而且有一個軍事戰術上的目的。所謂英國人來『創立強有力的中國海軍』，究竟有甚麼意義呢？事實上這乃是英國的一種武裝力量，而不是中國自己的力量。

至於日本，我們很明顯看見：無論政友會上台或民政黨上台，總歸是一個樣的。

日本總歸要實行一種政策，即加強其在滿洲的軍事基礎，一部分也加強其在內蒙古和魯直二省的軍事基礎。現在，人們宣稱說：日本要召集一個太平洋會議，在此會議上，『日本代表將軍事觀點和經濟觀點上證明滿洲不應該屬於中國而應該屬於日本，因為如果不然，日本將受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恐嚇。』一切手段，如日本撤退山東駐軍和新內閣召回南滿的一些官吏，都不改變現狀。恰好相反，英國工黨政府和日本民政黨政府，祇用這種手段來掩飾他們對於戰爭之狂熱準備，他們對殖民地，對印度中國等等加緊剝削的政策。

至於美國，則應該說：牠拿錢給中國，絕沒有要使中國工業化的意思，也沒有幫助

中國資產階級以發展其資本主義的意思。恰好相反，我們現在所得的一切材料，證明美國要在中國創立其太平洋軍事基礎，因為美國資產階級比一些共產黨員還更知道：沒有戰爭是不能奪取英日的中國市場的。至於說到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不要中國內戰不要軍閥戰爭的一些見解，則最近幾個月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些見解是錯誤的了。

恰好相反，英國和日本公開的或秘密的幫助中國幾派軍閥，並造成國內新戰爭的條件。應該說：自從蔣介石戰勝桂系以來，南京更加受美國的影響。但在同一南京政府內部都有英日美三國為奪取對這政府之霸權而起激烈的衝突。這就造成了內亂發展的一切條件，而非造成統一中國的條件。英國和日本都有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都不容於中國統一，都以種種方法幫助中國軍閥及其戰爭，為的要奪取中國新地盤並擴充各自的勢力範圍。

不僅英日如此。甚至德國，甚至現在一般人所稱為貧窮帝國主義國家的德國，現在也宣言在中國要有德國租界。南京政府的德國顧問鮑爾（Baer）說：中國沒有統一的可能，中國要恢復戰前制度，即德國在中國要有租界和軍事基礎。

有些中國同志以為現在人們不能說共產黨員要幫助中國資產階級，但必須指出：蔣介石和李濟間的戰爭乃是民主資產階級和封建軍閥間的戰爭，為此之故，蔣介石在這個戰爭中是代表進步的力量；蔣介石之勝利，據他們看來，使中國有某種超殖民地化和

工業化之可能，這樣就可造成一個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即革命的主要動力，沒有這個動力，任何革命高潮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得到結論，即：我們雖然不應該擁護蔣介石，但我們應該將蔣介石看做一種進步的力量。他方面，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像中國和印度那樣廣大的殖民地，其面前有二條發展道路；第一條是蘇維埃的道路，第二條是美國的道路，即由美國資本幫助工業發展的道路。人們說：全世界既然沒有革命局勢，而中國革命潮流又是低落，則第一條道路是不可能的；第二條道路對於殖民地工人或有很大的用處，因為工業發展，工資自會增加，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線也自會改善。人們肯定說：爲着這些好處，人們可以放棄革命。我們以爲這裏有一種很危險的傾向。所以我請大家原諒，如是我要先說幾句關於瓦爾嘉同志。他說：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線在某種程度之下是抬高的，無論如何也是不降低的。如果說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即應該將中國苦力和印度南洋等的工人也都包括在內。我不明白：他說到統計表的時候，爲甚麼忘記這些工人。或者他以爲中國本沒有一般的統計表，爲此之故，在計算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線時可以將中國從總統計表中除去嗎？

其次，我們應該提出一個新問題。在第三時期的過程中，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將發展嗎？封建關係將漸進的但必然的消滅嗎？這是純粹資本主義關係即自由競爭不相干涉的關係來代替封建餘孽的統治之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傾向嗎？我相信這個問題

從未曾在任何大會任何全體會議中提出。可是對於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殖民地的共產黨，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如果資本主義在宗主國和一部分在殖民地實行合理化，如果資本的輸出有增加，人們是否就可以推論說：在殖民地經濟中有一種更資本主義的更工業的發展，而資本主義發展的原素將必然戰勝殖民地的封建餘孽呢？如果是這樣，那麼蔣介石就確實是一種進步力量，無論如何他是代表那要摧毀中國封建制度民族資本主義。但我以為問題不是這樣的提出。事實上，現在，中國革命失敗之後，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愈加與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結合起來，而帝國主義也絕沒有專門幫助『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丟棄舊買辦和封建力量而不顧的意思。關於印度的材料，證明英國政府傾向於加重對印度資本的壓迫。同時英國政府公開宣言：印度土著王公是很可寶貴的，應該保護這些王公，免使他們受『國民會議』或資產階級的政權的侵害。在這種情形之下，政治關係是很明白的：帝國主義者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為一新的力量，同時正要依靠於封建力量之上，以便鞏固其在殖民地的統治。

至於經濟關係，則我們知道：在帝國主義資本能於殖民地發展的限度內，在外國商品競爭，因宗主國合理化關係，能戰勝殖民地土著商品的限度內，數量不大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進入生產和投入農業及工業要遇見巨大的困難。下等的和惡劣的資本形式，要非常自然的發展，尤其是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要發展。

這樣就造成了殖民地封建殘餘能維持存在，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多少成爲資本家的資產階級，能與封建剝削分子親密結合之一些前提。所以我以爲中國軍閥戰爭這件事實很可以解釋這個問題。中國戰爭，首先是世界範圍裏資本主義總危機增長之徵兆。

人們不能將蔣介石和馮玉祥間的戰爭，看做是一種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劃別很清楚的戰爭。我們看見蔣介石軍隊是軍閥的成分，與馮玉祥和李濟琛的軍隊一樣。人們說：吳佩孚孫傳芳和李濟琛都是英國的走狗。吳佩孚迫不得已削髮爲僧并隱匿在庵廟內。但這絕不是說英國勢力也迫不得已隱匿在庵廟內了。李濟琛現在被監禁起來，但這絕不是說英國勢力也被監禁在南京獄中，因爲兩廣還有許多舊軍閥，他們以前服從李濟琛，現在服從蔣介石，將來要重新造成獨立力量。如果馮玉祥離開中國，但他的右手鹿鐘麟還在中國，鹿鐘麟形式可以服從南京政府，實際上則還在準備一個新戰爭反對蔣介石。他方面，蔣介石迫不得已要奉送新的特權給其他軍閥，以使得他們幫助來反對李濟琛和馮玉祥。這樣使中國封建軍閥的政權更加鞏固起來。

必須再指出一件事實，即蔣介石以其代表上海資產階級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格，是要控制廣州青島天津等地方市場的。他講了許多好聽的話，說他是要中國統一，要中國超殖民地化，要確定固定的幣制等。民族資產階級要以此維持其在民衆中的影響并阻止民衆的反對戰爭的鬥爭。如果人們不能說中國有憲法的幻想，但『統一』的

幻想是存在的。

至於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在未來帝國主義間戰爭中或在未來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中之作用，則殖民地資產階級在這樣戰爭中是要幫助資本主義政府來抑制羣衆之革命鬥爭的。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我祇舉出一件事實。一年以前，胡漢民曾到倫敦遊歷，隨後又到君士坦丁堡；他在那裏與基瑪爾曾經有一次談話。基瑪爾告訴他說：你要知道蘇聯中的回教民族是受蘇維埃政府壓迫的，而蘇維埃政府擬定一個大計劃要奪取新疆。胡漢民爲此問題曾在南京大作宣傳，號召中國的回教徒組織起來，爲反對蘇聯的紅色帝國主義而鬥爭。

在第六次大會時，我曾經說過：蔣介石主義不是別的，祇是『民族法西斯主義』。這次全會中對於法西斯主義會有許多辯論。我特不能參加這個辯論，因爲時間來不及；但我祇說一點：即當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拿到政權時，牠絕沒有依照民主主義教科書中一條條實行的意思。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殖民地國家共產黨的指導中間，有某種『不平衡狀態』存在，即我們在這裏寫布爾塞維克的提綱和議決案，而人們在那裏祇讀教科書，這些教科書說：資產階級要民主，而封建勢力要君主。照這些教科書說來，如果資產階級拿到政權，牠必然是要民主的。

但事實却另是一種樣子。武漢政變之後，有一個時期中一些共產黨員還希望：縱



然不是蔣介石，至少也是汪精衛，一定會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制，允許中國共產黨得以合法手段為爭取羣衆而鬥爭；他們希望這樣就可以得到『安心建設這些合法的羣衆組織』之可能性。但過了幾天以後，人們看見：不僅蔣介石，而且汪精衛和鄧演達也直接拿取武器并開始殘殺工農。還有一層，南京政府熱烈的歡迎意大利的法西主義，聘請意大利顧問到南京來。我不曉得這些事實有甚麼意義？是法西主義不是？稱這一個為法西主義，在科學觀點上也許是錯誤的；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族資產階級，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其尚未拿到政權的印度，已經開始以民族和社會的虛偽名義拿恐怖和專政的方法來壓迫工農運動。

我們必須注意，既然知道在德國在美國等壟斷資本的統治，已開始變成『社會法西主義』之公開專政，那麼帝國主義的政權，壟斷的財政資本的政權，在殖民地，必將由確定的方式表現出來。在『第三時期』中，帝國主義者究竟將幫助民主資產階級之議會政制呢，還是維持那資產階級佔有重大作用之恐怖的和專政的政制？我以為應該以肯定的方式答覆我所提出問題之第二部分。

其次，如果在大的殖民地，譬如中國印度及其他，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是明白反革命的力量；如果殖民地資產階級有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如果這個資產階級幫助帝國主義維持其統治，那麼我則以為小資產階級的政團，如汪精衛，鄧演達，『獨立同盟』（少年

（Zoya），及其他政團，就有西方社會民主黨左派的作用。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公開的恐怖政策和印度民族資產階級之明白背叛民族獨立鬥爭，將使資產階級不久失去其在羣衆中的影響，於是資產階級左派就拿和平主義的和假革命的空話來掩飾資產階級的這種政策的真面目。他們，這些小資產階級政團，將努力抓住羣衆，將欺騙羣衆并將以此幫助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自然，我并不是說小資產階級的羣衆，而祇是說其優秀分子，其所謂領袖，他們說要革命，但不願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

這些分子的作用，將比民族資產階級更加危險，所以我們必須有個完全恰切明白的態度對待他們。可是右派機會主義者却繼續堅持有創立一個『民族革命黨』之必要，就像以前他們主張工農團體加入印度的獨立同盟一樣。你們不要驚奇，在中國無論白色恐怖怎樣厲害，仍還有些共產黨員主張現在應該恢復與汪精衛陳公博的同盟，因為不這樣做，則我們太孤立了，太脫離羣衆了；他們又主張在民族革命運動中，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幫助者，一個同盟者。總之，右派機會主義者甯願與資本家的資產階級聯盟，而不願與農民聯盟。他們的策略就在放棄對於工人鬥爭獨立的指導，就在放棄那為爭取土地革命中和民族解放運動中之無產階級領導權而鬥爭，就在適應於資產階級領導下殖民地『民主化』之前途。

現在，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地位是怎樣呢？一切事變，戰爭和危害五千七百萬人以

上的饑荒，證明小資產階級羣衆中大多數人的地位是一天比一天困苦的，但其領導分子則懼怕共產主義甚於帝國主義。在這一點，汪精衛的一篇論文之題目是很有意思的，即：『我們是在夾攻中奮鬥』。小資產階級將有甚麼作用呢？他們將社會民主黨左派或波蘭社會黨的作用，即他們高喊革命，他們抗議，反對南京政府，反對帝國主義，——他們所有這些呼喊和抗議，祇爲得要欺騙羣衆。他們縱然也能使反動派營壘內部組織發生相當的煥散，但他們總是遮掩南京政府和國民黨的真正作用，及民族改良主義和殖民地資產階級的真正目的。所以必須堅決的鬥爭，反對這些領袖，反對殖民地中小資產階級的煽動分子。

我們知道：土地革命是殖民地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之中軸，尤其在中國和印度。我們十分知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此問題取什麼態度。但這裏，重新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要將無產階級革命和農民戰爭配合起來，那麼我們究竟要趨向農民中那種分子呢？有些人還以爲在殖民地中農民整個的是無知的羣衆，可以完全跟着我們走，是整個贊成革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

另有一些人看得更遠些，他們肯定說：我們應該聯合富農並與富農一致行動來摧毀地主的封建制度。人們肯定說：祇爲這樣，所以『我們才要一個民主專政，而不要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若沒有富農，則專政立即就是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內

存在有這種傾向。

但他方面，另有一種形式提出農民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全了。南京政府不僅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府，而且是一個富農的政府，所以我們的任務就祇在組織僱農並從事於『純粹的階級鬥爭』。任何封建殘餘都不存在了。所以，我們可以希望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就像托洛斯基所說一樣；這個革命，當其他國家的一切帝國主義者都被推翻時候，是要爆發的。這樣的提出土地問題是很危險的。我們必須鬥爭以反對這種路線。自然，英國人美國人及其他帝國主義者，要經過民族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之中介，努力促成富裕農民的發展並倚靠在經濟力強的農民身上，而且他們有了這一類的企圖。但有些同志從這個理論推演出來，說在中國和印度，斯托雷賓的路線，比俄國更易於實現，因為反動的富農力量，在這些國家內是現成的。所以我們有一種前途，即在中國和印度農村當經濟力強之農民不停的發展的限度之內，農業在工業化和合理化底下還能夠更強大的發展。根據上述理由，我們的同志做出結論說：農村平靜下來，農民的戰爭將迅速的消滅，因此土地革命問題就要退出議事日程了。結果，他們走到『經濟主義』，即是說在農村中祇可從事於經濟的鬥爭。中國黨十分注意這個問題，這是毫無足怪的，因為自從革命失敗以後，自從我們得到一劫教訓以後，對這個問題還存在這些模糊的觀念。據我看來，我們應該認定在一切殖民地中正有一個土地革

命擺在我們面前，這些國家的革命，目前正活動於各種矛盾基礎之上：

首先是廣大勞苦羣衆對帝國主義者和民族資本家中間的矛盾。

其次是農民和地主封建勢力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是中國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國家革命之出發點。自然，我們絕不懼怕殖民地農民之分化過程。這種分化幫助貧農和農村無產階級，使之更接近於城市無產階級。我們不應該光祇攻擊大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經過幾千線索與封建殘餘結合起來，積極的反對土地革命，不能夠實現任何重大的土地改良——我們還要反對半地主的富農，小地主，我們不應該離開這條道路，而將他們看做農民。其次我們也應該攻擊富農，縱然他們現在參加反軍閥和反地主的鬥爭。我們應該反對富農，不僅因他們是反動派，他們一般是城市資產階級的坐探，而且因為他們在全國有汪精衛譚平山等的作用。他們有時也領導農民鬥爭，以反對捐稅，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切狡詐，因為他們要藉此表示他們也在企圖領導貧農至於勝利，而不像共產黨員要沒收貧農的土地。我們應該攻擊這些富農以領導農民基本羣衆反對捐稅等的這些運動。

在一切情形之下，我們應該努力組織農村無產階級，使之成爲獨立力量。這是在二十五年前就說過了，而現在還是正確。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唯有用這個政策去對待富農，然後我們才能夠真正聯合農民。我們應該說：我們現在必須與貧農聯合

起來，並在這基礎之上鞏固我們的領導。無產階級對整個農民的領導。這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之發展步驟，是有幫助的，因為我們並非要在殖民地先為民主制度和議會制度而爭鬥，然後再做第二次的無產階級革命。我們有權利可以像列寧對俄國革命轉變問題那樣的說：我們利用農民對地主和帝國主義者的勝利，並非為幫助富農來打擊農村無產階級，而是為能與世界無產階級携手向前走上社會主義革命。

# 共產國際關於布哈林同志問題的決議案

##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看過四月十三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關於撤消布哈林同志在共產國際的工作的決定之後，有以下的決議：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以前，布哈林同志就已經和蘇聯共產黨總的政治路線，有不同的意見，他這些不同的意見，在他及和他同意的同志實行反對黨的政策鬥爭過程裡，形成了特別的機會主義的政綱，實際上就是右傾的政綱。

蘇聯共產黨，按照蘇聯國民經濟社會主義的任務，實行着全國工業化的政策，開展了對於資本主義成份的勝利的進攻，加緊的進行反對富農的鬥爭，這都根據於動員貧農的羣衆，實現無產階級和貧農中農羣衆的新的生產式的聯合，而且保障國民經濟裡最落後的部分——農業之中，社會主義經濟方式，能够在發展上有堅決的轉變。實行這種加緊進攻資本主義成份，並且排斥他們的政策，同時農民經濟的羣衆的集體化又在一直前進，大規模的建設蘇維埃國立農場，機器製造和耕種機製造的事業也在開展起來等等，——這都不能不在目前的階段裏引起階級鬥爭的劇烈化，就是資本主義成份加緊的企圖反抗社會主義的進攻，而小資產階級的許多階層也就加緊的動搖起來。蘇聯共產黨

裏有傾向的同志（布哈林同志也走到他們一方面去了），都反對這個政策，而提出另外的一個路線，——就是拋棄對於資本主義成份的進攻，否認加緊反對富農鬥爭的必要，主張縮小社會主義經濟方式的建設，——這實際上就是投降資本主義的成份。布哈林同志和蘇聯共產黨的路線相反，他簡直對於新經濟政策加以自由主義式的解釋，在開展商品週轉的旗幟之下，進到放任國內資本主義成份的自由發展，拋棄對於糧食投機的奸商的鬥爭，不顧黨所執行的政策是對於資本主義成份加重課稅，他却否認對於富農的個別稅的必要等等。這就是布哈林事實上走到主張和資本主義成份實行階級的合作政策，用「富農生長到社會主義裏去」的政策，代替無產階級反富農的階級鬥爭政策。

布哈林同志，因為他有這種錯誤的方針，主張減低工業化的速度，認為黨所實行的工業化政策，速度太快。蘇聯共產黨正在堅決的實行日益開展全國工業化的路線，——工業化是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布哈林同志等，却對着困難就投降，在這種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上，拋棄無產階級的立場，而反映小資產階級潮流對於黨內某些成分的壓迫。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熱忱日益增長，蘇聯共產黨正在領導着牠而日益團結更多的極廣大的勞動羣衆，而布哈林等，却散布小資產階級的悲觀主義，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如果不克服這種悲觀主義和對於工人階級力量的輕視，那就不能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效。



最後，布哈林同志等對於蘇聯共產黨及其指導方法的估量，也是重復托洛斯基派的造謠。蘇聯共產黨正在自我批評和開展的黨內民主主義的口號之下，動員廣大的羣衆反對官僚主義，清洗腐化分子；布哈林同志等，却只說反對官僚主義的空話。事實上反對黨指導機關所實行的改造工作：改造黨的組織，工會，合作社，蘇維埃機關的全部工作，而且這都根據於竭力鞏固與羣衆的聯繫的新的方式之上，——布哈林等反對這種改造，正是反映那些反抗黨的路線的最壞的僵屍化官僚主義份子的情緒。

布哈林同志在蘇聯共產黨政策問題上的錯誤，和他在國際政策路線，是密切相同的。布哈林，昂白德洛，塞臘，愛維爾脫等，對於蘇聯共產黨所實行的社會主義進攻是搖動資本主義穩定的動力問題，估量得不够，所以他們也就對於全共產國際裏右派份子的政策，給以政治上思想上的基礎。布哈林反對共產國際的路線，一部分也就是反對第六次世界大會的議決，他否認資本主義穩定日益動搖，而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革命工人運動新的高潮的生長的事實，這是他走到了機會主義的估量。根據這個立場，布哈林同志就有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本主義的國內矛盾遲鈍化的理論，他說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僅僅只保存在國際市場之上，這種理論，成爲共產國際內一切右派份子的思想基礎；資本主義的全部發展恰好證明他這理論不對；他簡直是投降改良派的思想（希費亭的資本主義健全論）。

布哈林同志的『有組織的病態經濟論』那篇文章裏（實話報七月三十日）就可以看得出來：他不但不拋棄自己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本主義國內矛盾遲鈍化的理論，而且更加深自己的錯誤。

因此，很明白的：布哈林等亂叫，共產國際『崩潰』，只是他們贊助右派而又胆怯的一種方法，——反對右派份子的鬥爭現在仍舊是共產國際的中心任務。清洗各國共產黨社會民主派式的份子，是健全的過程，在現在革命高潮生長條件之下，尤其必要；而布哈林同志和他的一派，都企圖用各種方法破壞；這亦就是削弱共產國際反對右派叛徒的鬥爭。布哈林及其一派，既然是共產國際內一切右派份子的中心吸力，他們的宣傳悲觀主義，散布灰心喪氣的情緒，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估量，——就不但幫助一切反列寧的派別的活動，而且破壞布爾塞維克的紀律。

布哈林同志的這些機會主義的動搖，已經使他背着黨，企圖和以前的托洛斯基派結合聯盟，進行反對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鬥爭。

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批准蘇聯共產黨中央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關於布哈林決議，撤消他在共產國際的工作，並且決定免除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職務。

（完）

## 論布哈林同志的錯誤及其惡傾向

真理報社論

真理報前幾期公布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布哈林的機會主義錯誤之議決案，是值得最嚴重注意的。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四月全體會議以前，布哈林還是真理報的總編輯和共產國際的一個領袖。

布哈林在本黨指導機關以及在整個共產國際之地位，大家都是充分知道的。這一件事實就已經迫得我們非將布哈林於最近時期所犯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明白指出不可，因為這樣，才使蘇聯共產黨中以及整個共產國際中的廣大羣衆，明白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布哈林之離開第十五次大會的路線，在中央委員會七月全體會議以前，人們就已經看出來。主要是關於黨政策上的根本問題，關於工農關係的問題，關於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步驟和指導的問題。在那時候，我們正在處置鄉村中富農分子之以囤積糧食手段所行的有組織的怠工以及某幾部分中農分子搖動而傾向於富農。黨對中農有某種讓步（提高麥子價格），但認為必須堅決進行那合於第十五次大會議決案精神之改造農村的各種辦法（創立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而這乃是立足在堅決進攻富農和集中貧農中農於黨週圍之基礎上面的。那時布哈林趨向於放棄對富農的進攻，認為農村的社

會主義改造所必需的各種辦法是不必要的，鬆懈國家對於商業的監督，并對富農作許多足以使農村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原則上讓步。

黨曾經設法拿協作社和農業的集體化（同時鞏固與中農的聯盟），來解決麵包的困難。

布哈林則想加強農村資本主義上層分子，鼓勵農村經濟中的商品生產，以此來解決這個困難。因此，黨的路線和布哈林的路線中間原則上深刻的分歧已經存在有一年之久。如果說這種分歧在那個時候還未曾克服下去，那是因為布哈林當時還不敢徹底明瞭的擁護他的那些足以使他和黨的路線相決裂的錯誤。

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上，布哈林在其關於大會議事日程第一問題（「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的任務」）之報告和結論中也表現出許多錯誤的觀念。布哈林說到戰後資本主義進入於其發展上的第三階段時候，竟傾向於將這個階段認為是資本主義技術改造及其內部組織加强的時代，認為是資本主義穩定鞏固的時代。雖然有其他的代表公開的表示這個意見於大會（愛維特，羅威斯敦，柏柏爾），但布哈林也未認為有駁斥這個意見的必要。（不僅如此，布哈林分析資本主義穩定的矛盾時候，自己也肯定說：成爲嚴重作用的，現在乃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國外矛盾，而非國內資本和無產階級間的矛盾了（在各國如此，在國際上也是如此）。從這一點，祇能得到一個結論：即惟有戰

爭能够替我們引起革命的局勢，而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鬥爭之加緊是不能够引起革命局勢的，——可是事實上，階級鬥爭之加緊顯然是與戰爭危險相平行而增長起來。這樣的一種結論，天然是要消沉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并給社會民主黨以一種藉口去做欺騙的鼓動，說：共產國際——本是要獲得工人階級中的廣大羣衆的——爲戰爭而作孤注一擲。

第六次世界大會明白知道：布哈林絕不願意反對那些對右派取調和態度的同志（尤其是德國黨中的同志）。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大會上究竟未曾堅決的徹底擁護其錯誤的斷語和傾向。第六次大會的議決案（關於布哈林對「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的任務」之報告的議決案也包含在內）還是經過大會的委員會以及各代表團全體會議審查之後，布爾塞維克式的明白答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切根本問題。

但到了實行議決案時候，到了大會閉幕之後德國共產黨中右派和調和派分子立即組織真正的反抗以反對德國黨中央委員會和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時候，我們絕未曾看見布哈林站在那些擁護這個路線的人的前列隊伍。布哈林寧可外交式的躲避起來，不說一句話或寫一個字去擁護第六次大會的路線，以他在共產國際的地位而言，這是使每個人都要失望的。不僅如此，別人拿他的名字做招牌，德國的調和派——他們與右派結成真正的同盟以反對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甚至反對共產國際——也引他的「同意」以自

重。對於這些事實，他絲毫不提出抗議。參加德國黨黨內鬥爭的每一個人，誰也會相信布哈林的確是與德國調和派同意以反對共產國際的路線的。

在一九二八年秋天，布哈林認爲已有了可能并到了適當時機，遂做一篇論文：『一個經濟學家的觀察』，公開反對蘇聯共產黨的總路綫。布哈林的攻擊是對於我們工業化的步驟而發的，而五年計劃中工業化的步驟乃是合於第十五次大會議決案的精神。

布哈林的批評形式上是攻擊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中的專門家，事實上是攻擊本黨的中央委員會。要和緩工業化的步驟，使之適應於『弱點』——這個傾向明白的從這篇論文中顯露出來。布哈林在這篇論文中關於農業退化的一些議論是很含混而有雙關意義的，足以使讀者設想：在蘇聯因爲黨政策上的錯誤以致農業趨於退化，——而這乃是那些資產階級教授很早以前就已斷言的。這一回，布哈林仍舊未曾將他的『一個經濟學家的觀察』那篇論文中的觀點，徹底的堅持着。

這篇論文發表以來，到現在還未滿一年。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所預見的和布哈林當時所批評的那個工業化步驟，在這期間已經被本黨第十六次會議和蘇維埃第五次大會通過之五年計劃所大大的超過了。人們已經準備對這個五年計劃加以重大的修正，爲的使步驟還更加速。實際生活已經否定了『一個經濟學家的觀察』之著者的悲慘的預言，并證明這篇論文是缺乏對於工人階級力量的信心和過分估量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

這篇論文中所發揮的投降的理論，已經整個的被實際生活所推翻了。

雖然一開始黨就一致的和堅決的拒絕這種觀點，雖然在一九二八年秋天布哈林尙未決定徹底擁護這種觀點，雖然人們還能相信他將取消其猶豫態度，但他終於不放棄他的反對黨的總路線之鬥爭。

一九二九年初，當列甯逝世紀念時候，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一篇論文，以隱蔽的形式重新向中央委員會進攻。這篇論文中充滿了對本黨指導機關之攻擊，認爲指導機關是跟不上近代科學和技術的要求的。布哈林就拿這個『跟不上』來暗示底下幾點是錯誤的政策：即不願和緩工業化的步驟（不管布哈林的一切『科學的論調』），不對富農有任何讓步，不鼓勵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的『文化』，龔特拉底夫及其他同志的科學，很久就已對我們的國家和蘇維埃政權指出這一條戰勝困難的道路。

布哈林在莫斯科黨部和莫斯科蘇維埃全體會議上演說，說及『列甯的政治遺產』時候，他還取更直接的和更明白的態度。布哈林拿他的對本國富農分子（他們的面目已經充分明顯了）投降和讓步的政治路線給黨，認爲是『列甯的遺產』。有幾個同志說：這種情形彷彿就像伯恩斯坦在馬克思主義的教訓之下來修正馬克斯一樣，——這樣說是并不過於誇張的。布哈林值得這樣被拿去做比較。除此之外，還有何方法可以解釋這種拿列甯旗幟來掩飾這個機會主義這個投降政策之企圖呢？照布哈林的演說所說

，則：列甫教訓我們的，沒有別的，祇有對農民要小心謹慎一點；列寧在其最後的論文中絕未提到富農（因此：黨爲什麼要時時刻刻對富農進攻呢？）；農村中建設共產主義，照列甫的判斷，是一種早熟的觀念，而列寧的觀念是要以節省和節約國家的機關來實現工業化，而非要以『過分剝削』農民來實現工業化……。

這樣，布哈林就造成整個的機會主義的體系和絕對與黨路線不同的整個策略路線。在國際問題上，布哈林事實上是擁護資本主義穩定鞏固的意見。結果，他必然要丟棄那爲第六次世界大會所指出的革命新高潮的整個觀念，忽視那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中間日益劇烈的矛盾，因此幫助（現時還是外交上的幫助）共產國際中右派和調和派的傾向。

在俄國內部問題中：藉口弱點以和緩工業化的步驟，否定第十五次大會的路線，即農業之廣大的和充實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認爲整個農村復興的觀念（在個人的農村經濟之上 即在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發展之上），與富農和平合作，使富農和平的合併於社會主義的理論，放棄以自我批評手段徹底的堅決的反對國家機關中官僚主義的鬥爭，——這樣實際上就成爲對國家機關之離開階級路線這件事取調和的態度，並造成一種傾向，即對於那些不願與蘇維埃政權調和的一部分城市資產階級專門家取公開調和的態度。所有上面諸點，都祇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各方面對於資本主義原素的投降。布



哈林於是成爲本黨中右派反對派的理論家和領袖了。這個反對派本身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成爲一切已經離開共產主義和正在離開共產主義的右派和調和派分子之中心了。

本黨中央委員四月全體會議和本黨第十六次會議，曾經精細的批評布哈林及其反對派同志對於本黨和共產國際政策上一切根本問題之觀點。那時人們還希望本黨中右派反對派的代表，縱然不公開承認其錯誤，至少也要停止其反對黨的路線的鬥爭。本黨路線，在會議前後幾個月中，已經由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一切經驗所充分證明是正確的了。但他們并未停止反對本黨路線的鬥爭。

尤其是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第十次全體會議以前，布哈林發表一篇論文『論有組織的不合理的經濟』，在這篇論文中，他重犯了發展了並加深了他的錯誤，即第六次世界大會所發現的，而以後又推動他必然站在右派和調和派方面的那些錯誤。布哈林比在第六次世界大會時候，更公開的說到資本主義制度，戰勝生產中和市場上無政府的傾向，和緩內部矛盾。這樣，布哈林就堅決的前進一步，即離開馬克思列甯主義對壟斷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估量，而走向希爾費丁派的社會民主黨中馬克思主義的不肖門徒。自然，這個堅決的一步碰到第十次全體會議，碰到各國支部代表一致的和堅決的抵抗。正爲答覆這個觀點，所以第十次全體會議取消布哈林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主席團委員的資格，並通過政治議決案關於布哈林的錯誤，於最近公佈發表。

黨知道布哈林的偉大功績，他在我們的隊伍中曾經有好多年與列寧一起奮鬥。列寧死後，布哈林在領導本黨和在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中所做偉大的工作，黨也高高的加以估量。但黨絕不能將布哈林看做是『列寧遺言』之毫無疑義的繼承者。事實上，黨並未會忘記布哈林在過去所犯的錯誤，他的多年反對列寧的鬥爭。這種鬥爭，當帝國主義世界大戰那幾年，布哈林還在繼續進行；那時他一方面搖擺於半無政府主義的國家觀念和本黨黨綱中間，他方面對於托洛斯基式的公開的中派分子及其機會主義觀念，取調和態度。

當許多年間，戰時以及戰後，布哈林在民族問題中擁護盧森堡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見解，而這個問題在帝國主義時代乃是重要的問題。在一九一八年，布哈林成爲共產黨左派小組的領袖；這個小組組織幾乎引起本黨的分裂，這個小組組織自己沉溺在小資產階級泥潭中，反攻擊列寧的黨是腐化的。在一九一九年本黨第八次大會時，布哈林成爲批評列寧主義的黨綱草案那些人的領袖。在一九二〇年，他著『過渡時代之經濟』一書，引起了列寧許多堅決的答覆（這本書中已經含有布哈林現在對『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之若干觀念的萌芽）。在一九二一年，布哈林加入托洛斯基主義的反對派，反對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並對於工人反對派半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的思想，做許多絕對

不能永許的讓步。最後，當第三次共產國際的大會時，也在一九二一年，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策略之根本問題上反對列甯。

列甯因病不能參加運動，而布哈林在第十次大會之後竟擁護喬其亞諸同志的惡傾向，他們隨後跟着托洛斯基跑，最後大多數同托洛斯基反對派一起被開除出黨。在一九二五年，當反對所謂新反對派的鬥爭開始時，布哈林與黨一起反對這個反對派，但他犯了許多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他的『大家發財罷！』的口號；他的關於富農協作社的宣言，認為這種協作社與讓與權的企業一樣，可以合併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內；他的認為能夠『開慢步』前進至社會主義的議論）。——縱然那時他也承認這些錯誤中的某幾點。

布哈林在黨中的功績不管是怎樣偉大，無論如何，他沒有權利在黨面前自命為『列甯遺產』的正確的解釋者和這個遺產的唯一繼承人。

在蘇維埃政權第十二年中，布哈林能成爲黨中右派的領導者，而他現在的錯誤又已經大大超過其過去一切的錯誤。——這件事實證明右派惡傾向對黨的危險是何等的重大；這個惡傾向，如果不指出來并加以克服，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和黨以後的鞏固，將不可能。舊時各種反對派之經驗，已經充分的對我們證明；反對本黨的鬥爭，將走到甚麼地方去。這些經驗可以對布哈林作嚴厲的警告。

無論布哈林將取何種態度——或者他有充分的勇氣承認他的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或者他繼續發展和加深這些錯誤——我們的黨總具有充分的無產階級的毅力和決心，以舉行并繼續反對那要破壞本黨隊伍之右派惡傾向的鬥爭直至最後的勝利。

「共產黨最鄙薄隱秘自己的政見和目標。所以他們公然宣言：要達到他們的目的，只有用強力打破一切社會的狀況。讓那班統治階級在共產黨革命的面前發抖呵！無產階級所失的不過是他們的鎖鍊，得到的是全世界。」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共產黨宣言——

# 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

## 決議的決議

政治局會議通過，十二月二十日。

中央接到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經過詳細的討論後，完全同意第十次全體會的精神，路線，與一切決議。並且深切感覺全體會的路線與一切決議都極適合於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需要，特別反對黨內右傾取消派及調和派的論斷是給與中國黨戰勝取消主義與調和派的最鋒利的武器；因為中國取消派與調和派在各方面的表現，正是與國際取消派調和派的思想，一條路線，一個系統。因此，中央號召全黨同志必須仔細的研究十次全體會議的一切決議，並且根據這些決議配合實際情形堅決的執行。

一、全體會指出一年來事變的發展，『一天一天更加看出第六次大會對於目前時期估量的正確。認為目前是大戰後的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增長起來，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日加激烈的時期』，這是完全正確的。在國際形勢上，如各個帝國主義因為搶奪市場，爭取投放資本的勢力範圍，以求重新分割殖民地而加緊世界大戰的準備；因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更加鞏固與發展，帝國主義更積極的向蘇聯進攻；因為生

產合理化，更殘酷的榨壓工人，而促成工人階級的日益革命化；因為更厲害掠取殖民地勞苦羣衆的血汗，而促起殖民地工農勞苦羣衆自謀解放的革命鬥爭更尖銳的向前發展；因為這些原因而促進了世界革命新的浪潮的興起，完全證實了這樣的估量。就中國現在一般經濟政治危機的形勢，也完全適合於這樣的估量。如英美日帝國主義搶奪中國的矛盾日加尖銳，一方面極力指使中國軍閥互相搶奪，戰爭不已，另一方面極力在中國樹立軍事的根據，美國佔有航空，英國奪取海軍，日本在山東滿洲擴大其自由駐兵的範圍；這便是各個帝國主義加緊準備直接戰爭的形勢，因此，中國已成爲爆發帝國主義大戰的主要危險區域之一。如國民黨在帝國主義指使之下武裝奪取中東路，組織白俄軍隊，攻入蘇聯邊境，讓日本積極進兵北滿。請求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共同干涉，都充分證明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加緊。如帝國主義更厲害的侵掠中國，勾結國民黨軍閥取得更多的經濟政治的特權（如航空，海軍，內地雜居，內地租借權，內河航行的擴大等），而使中國更加殖民地化，因此促起了工農勞苦羣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重新興起。如中外資本競行生產合理化，加重工人工作，增加失業，工資減少，童工女工增多，使中國工人階級爲救死求生不得不堅決起來鬥爭，而就開展了工人運動復興的形勢。這些事實都是「帝國主義的一切根本矛盾同時尖銳化」的有力的證明。所以右傾派及調和派說「帝國主義間的一些協約協定（如楊格計劃等）可以相當緩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或者

說『資本主義國內矛盾日漸衰弱』都是些無稽之談。特別是中國的取消派認為帝國主義可以對中國資產階級讓步，可以放任中國工業的獨立發展，更是完全走上了社會民主黨謳歌世界資本主義繁榮的觀點，無疑的是絕對錯誤的。

二、全體會指出現在帝國主義互相衝突的中心，是英美爭奪世界霸權的矛盾，『在殖民地的「小」的戰爭（如中國蔣桂間的戰爭），其背後都隱藏着英美間為爭世界霸權的衝突』，這是不容絲毫懷疑的。最近改組派軍閥反蔣戰爭的興起，也同樣有英帝國主義的積極作用（如汪精衛回國前首先至倫敦與麥克唐納會見，香港成為改組派策動中心，同時香港政府又操縱兩廣戰爭等），又是一次有力的證明。所以英日美在中國三角衝突，固然日美間表現得更加尖銳（如日本積極組織北方軍閥反蔣及對滿洲問題等），而英帝國主義決不會取消極的態度，尤其不能與美國妥協一致以穩定南京政府；並且就發展的形勢看，必然要從三角衝突而走向英日協調與美對抗的形勢。如果輕視了英美間的矛盾，那麼，一切政治問題的估量都會走到極端錯誤與右傾的方面去。

三、無論帝國主義營壘怎樣的敵對和衝突，但主要的世界矛盾是世界資本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兩個經濟政治系統的衝突。特別是一年來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出乎右傾派意料之外的更加鞏固起來，在全世界工人階級與勞苦羣衆中的影響更加擴大起來，所以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也就日益緊迫。帝國主義在他互相衝突更加緊張的時候，更

要企圖首先消滅蘇聯的。所以全體會指出「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是目前主要的危險」。

只有取消主義者陳獨秀們，才在極明顯的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中東路問題上把帝國主義戰爭與進攻蘇聯戰爭的危險平列起來；才認為蘇聯與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經減輕了甚至沒有了進攻蘇聯的危險。這樣的觀點只是替帝國主義在羣衆中散播和平欺騙的空氣，來鬆懈廣大羣衆武裝擁護蘇聯的決心。

四、全體會議指出「經濟上採用榨壓工人的政策，同時政治上的反動也更增長起來，資產階級國家的法西斯蒂化。在社會民主黨佔有勢力的國家，另有一種社會法西斯蒂的形式」，更殘酷的來鎮壓工人。另一方面也就造成了「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階級中的危機」，廣大羣衆日益左傾革命化。於是左派社會民主黨成爲資產階級欺騙工人有力的工具。「這個左派傳播幻想，使人相信是反對社會民主黨中領導一派的政策，以此來緩和社會民主黨崩潰的過程，其實這個左派是盡可能擁護社會法西斯蒂政策的」。所以「共產國際及各國支部，特別嚴重的提出，加緊堅決鬥爭，以反對社會民主黨及其左派的任務，尤其要反對社會民主黨左派，因為牠是工人運動中共產主義的最危險的敵人，是工人羣衆積極力和戰鬥力發展的主要障礙。」，這更是非常正確的！如果輕視了反社會民主黨左派的鬥爭，無疑的要墮入右派調和派的泥坑。同樣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中國，也極力利用民族改良主義來緩和工農革命鬥爭；國民黨，特別是改組派。第



三黨，是他們最有力的工具。現在廣大羣衆對這些改良主義的政黨，的確還有不少的幻想的殘餘；特別現在形勢，軍閥戰爭更加擴大與混雜，工農革命鬥爭更加向前發展，改組派，第三黨更要加緊牠的欺騙宣傳，實在是黨奪取廣大羣衆之最嚴重的敵人。所以黨必須更嚴厲的作反改組派與第三黨的鬥爭，不斷的揭破他們的欺騙，然後才能領導工農革命鬥爭更快的向前發展。

五、全體會指出『國際六次大會以後發現的新的事實，就是工人階級明白表現的左傾，和工人革命運動新的浪潮開始』。過去的洛茨同盟罷工，柏林五一示威的巷戰，魯爾的鬥爭，印度革命的繼續高漲，以及最近的澳洲礦工的大罷工，東京電車工人的同盟罷工，美洲海地工人的武裝鬥爭，都充分證明這一估量是完全正確的。在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增加，工人生活更加痛苦，社會民主黨公開的法西斯蒂化，更暴露了牠的假面具；共產主義在工人羣衆中勢力的增加，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進攻蘇聯戰爭的危機的加緊：在這些條件之下，無疑的羣衆革命鬥爭要更快的成熟爲世界的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勢。右傾派與調和派認現在新的革命浪潮與直接革命形勢之中好像有一座萬里長城隔住，無疑的是極端錯誤的。同樣的，現在中國的一切政治的根本矛盾，都更加尖銳化，資產階級因爲牠的利益與帝國主義國家財政資本的利益，不可分離，和牠與封建勢力反動聯盟之故，決不能實現絲毫改良的企圖，而只有更加走入反中國獨立的帝國主

義的濫墾中去，更殘酷的剝削工農勞苦羣衆。這樣自然要更加促起工農革命鬥爭的發展。現在各地罷工潮流的興起，特別是主要產業工人，農民的土地鬥爭與武裝鬥爭到處爆發，兵士譁變普遍了全國，都證明中國革命運動的復興，證明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與中國黨的二中全會對中國革命的估量是完全正確。尤其是最近的形勢，軍閥戰爭擴大，統治階級的危機加深，工人鬥爭漸次走上反黃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鬥爭，每個經濟罷工都很快轉爲嚴重的政治鬥爭，甚至武裝衝突（如青島紗廠工人，北京人力車夫，武漢紗廠工人等），農民暴動與遊擊的範圍日益寬廣，紅軍的組織特別是政治影響，更加強大起來，這就表現着這一革命復興的形勢，要更迅速的開展這一全國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勢。取消派陳獨秀等，以爲現在羣衆鬥爭「正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這不過證明他們完全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抹煞一切事實而幻想資產階級的穩定罷了！

六、在這樣革命浪潮發展的形勢之下，黨必須提出更堅決的策略與政治口號來領導羣衆鬥爭更快的發展，所以全體會指出「政治罷工，成爲直接的時代的堅決問題」，是異常正確的。特別在現在中國革命的形勢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組織同盟罷工，示威運動，發展到政治的總同盟罷工，擴大游擊戰爭，組織地方暴動，儘量的擴大紅軍，組織兵變，是現在黨領導各種革命鬥爭匯合起來成爲推翻國民黨軍閥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之直接鬥爭的主要策略。取消派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無疑的是替資產階級服役來

阻止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

七、特別是全體會堅決反對右派與調和派的路線，指出「機會主義是傳播資產階級影響於工人階級，並傳播社會民主黨傾向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間諜」。中央認為是非常正確的。因此，中央更完全同意全體會反對布哈林同志的調和主義，同意決定免除他的主席團委員的職務與在共產國際的工作。

布哈林同志遠在指導中國黨的六次大會的時候，雖然根本上是依據共產國際的整個路線，但在某些問題上仍然暴露了他的調和派的觀點。如在他的演說中，因對富農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觀點不正確而得出將來工農專政時還會有與其他急進的革命政黨成立聯合政府的形式，「或者會形成一個甚麼急進的革命黨，牠在某一階段，將與我們共同行動，或者如左派譚平山黨……」，尤其論到組織問題，提出「和氣一致」的口號等，都是極明顯的右傾的不正確的觀點。必須明白的指出這樣觀點的錯誤，而肅清這樣思想的殘餘，否則，在將來還可以成爲右傾思想的基點。

八、中國黨一方面過去的機會主義的殘留，還伏着很深的根蒂，另一方面黨的無產階級基礎尙很薄弱，因此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乃更加嚴重。所以六次大會後中央開始工作即堅決的與機會主義的殘留思想鬥爭（如順直問題，江蘇問題，廣東問題）。從卅四號通告起更明白的指出右傾是黨內主要的危險。二中全會便在這樣的精神之下

，確定了黨的路線，更加強了黨內反右傾的鬥爭。在中東路問題爆發以後，機會主義——反對派，公開的提出他的取消主義的路線來反對共產國際，黨的六次大會，二中全会與中央的整個路線，更加表現出右傾危險的嚴重。中央在一貫的反右傾的路綫之下，動員全黨的同志，與取消派作堅決的鬥爭。現在雖然相當的戰勝了取消主義的思想，並且在組織上開除了一些公開反黨的取消派的領袖，陳獨秀彭述之等；可是這一鬥爭還是在異常嚴重的時期。因為黨的一般的理論水平綫很低，同時取消派正在積極作反黨的活動，所以要肅清取消主義的思想，更須要全黨繼續不斷的加倍的努力。特別是調和主義的思想，還在活躍，還需要在思想上給以嚴重的打擊；所以右傾的危險，仍然是黨的最嚴重的問題。必須依據國際第十次全體會的精神與路綫，繼續堅決執行反右傾的鬥爭。

九、且目前右傾危險，是有他的客觀的強大的基礎，是由於階級矛盾的更尖銳化，歷史上空前的事變，將要到臨，黨內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殘留，為這樣嚴重的事變所嚇怕，自然要更加動搖而走向右傾與調和的方面去。特別是中國黨內無產階級基礎尚不寬廣，理論水平都很幼稚，更易於反映右傾的思想，甚至在堅決執行反右傾的路綫之下，而在某些策略上亦仍然可以犯到右傾的危險。譬如中央一年來總的路綫。主要的是反對右傾，可是過去在政治的分析上，過分估量了資產階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在農民問題

上，對富農的認識不清楚，與策略的動搖。在職工運動上，主張在黃色工會之下，不能建立對立的赤色工會等，都是極明顯的犯到右傾錯誤。雖然這些錯誤在接到國際的指導後很快的糾正了，但仍然值得我們嚴重的注意。因此全黨在堅決反對取消派與調和派的鬥爭時，仍然需要很仔細的檢查自己的策略與工作，肅清一切右傾的危險。現在黨內和平發展，合法運動的傾向等仍然異常嚴重；特別是國際決議案上最後所指出的「目前時代最大的危險，就是共產黨有追趕不上羣衆革命運動發展的可能（尾巴主義）」，在中國黨內表現得尤爲嚴重。最近幾月來工人罷工潮流的發展，黨很少在事前起領導的作用，大部分都是跟着羣衆的尾巴跑，尤其在策略的運用上，隨處表現出尾巴主義的精神。所以中央號召全黨的同志，必須堅決的接受國際全體會議的指導：「以最堅決的精神，反對這種反映社會民主黨遺傳的尾巴主義傾向。不戰勝這種傾向，是不能盡工人運動先鋒隊的作用，即不能領導工人階級到新的革命戰爭和新的勝利」。

中央 一九二九，一二，二十。

#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一期

## 目次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號出版——定價一角

### 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執委會會議特號

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執委會會議的總結

國際狀況與共產國際目前的任務

共產國際與新的革命高潮

共產國際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

共產國際關於布哈林同志的決議

論布哈林同志的錯誤及其惡傾向

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

小學校高級用

新時代國語教授書 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大變化之一年

史達林

## ——蘇聯五年計劃之第一年的成功

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中社會主義發展各方面都起了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緊跟着社會主義向城市和鄉村中資本主義成分積極進攻的形式來的。這一進攻的特殊之點就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範圍之內，已經引起了一貫的確定的成績。這證明黨善於利用新經濟政策初期的讓步，爲的是組織後來的變化，爲的是在進攻資本主義分子上可以得到勝利。

經濟建設上所達到的成功，由下列三方面看出來。

第一、我們在勞動生產力上已有了決定的變化，在社會主義建設前線上數百萬工人們所表顯的創造力和極大的熱誠，便是明證。

羣衆所表顯的創造力和熱誠在這三方面發展着：一、以自我批評對官僚傾向鬥爭，二、以社會主義的競賽對躲懶，怠工，和破壞無產階級紀律的人們鬥爭；三、以不間斷勞動週（蘇聯已廢除星期日休息的舊制，工廠的工作是不停息的，但是工人每工作三四天以後可休息一天。）的組織對工作的舊例和落後鬥爭。結果是：在勞動前線上得到很大的勝利，全國數百萬工人都表現出熱誠和互相的鼓勵。這種成功的意義真是不可



計算的，因為只有工作的推進力和數百萬工人們的熱誠，才能保證生產力提高，若不能提高，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之最後的勝利是難以想像的。

黨的第二種成功是和黨的這第一種成功有不可分的聯系的。第二種成功就在表現於下邊的事實上。在去年一年之中，對於重工業大建設的基本問題，我們已得到滿意的解決。同時生產工具的總產額已加速的發展，關於轉變我們的國家為五金生產的區域也創造出了它的前提。過去十二個月的成功的意義就在資本家們所希望於蘇聯的已經完完全全的被打破了。不管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之公開的與秘密的財政封鎖如何，去年已經證明：我們並沒有把我們自己出賣給資本家，並且證明我們怎樣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了資本積累的問題，建築了重工業方面的基礎。這是一個事實，就是工人階級最頑硬的敵人也無法再加以否認。

去年主要工業的投資有十六萬萬盧布，其中約有十三萬萬是投在重工業上，今年主要工業的投資有三十四萬萬之多，其中有二十五萬萬之多是投在重工業上——再進一步，去年大工業生產總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僅重工業就增加百分之三十，今年生產總量據估計增加百分之三十二，重工業却增加百分之四十六，事實既是這樣，那麼、重工業發展的積累問題是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的，這豈不是明顯的嗎？

我們的重工業的發展是很快的，我們的落後早已勝過了，這難道還可懷疑麼？就

以上所述看來，去年的成績竟超過了五年計劃中的估計，五年中計劃之最高限度的實現性，在資產階級的臭學者則視爲『幻想的不可實現的』，在我們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派）胸中却覺得很可怕的，然而牠在實際上已經表現出是最低限度的實現性了，這難道還是奇怪的嗎？

過去的十二個月已經證明：黨在實現這一任務上很有成績，並且甚至克服了最嚴重的難關。這自然不是說工業的發展上將來不再有任何的困難了。發展重工業的任務，不僅因財政積累問題而感困難，而且同樣還遇到幹部的問題。這幹部問題就是爲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從工人階級隊伍之中，徵調許許多多忠實的技師與專家的問題，養成赤色技師與專家的問題。

就是資本積累問題可以解決大半，而幹部問題仍待解決。而且自工業上技術的建設看來，這個幹部問題是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因此，立刻抓住這個問題，一定要實行解決這個問題，便是黨的責任。

與第一個成功和第二個成功有密切關係的第三個成功，就在於我們農業的發展的根本改變，自個人農場的原始制度變化到集體農場，共同耕種，機器和電耕機的應用，勞動合作社和集體產業，這些都是根據最新式的耕種方法，因此最後發展到具有數百架電耕機和聯合機器的巨大的蘇維埃產業之更偉大的形式。

關於這一點，黨的偉大成功就是：黨使得許多鄉村的主要農民羣衆，自舊式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一道路，只有少數富農和資本家們獲得利益，而大多數的農民僅能生活於窮困之中）轉變到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式方法（這種方法，把富農消滅掉，給中農貧農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供給他們新式的器具，電耕機和農業機器，這樣就使得他們不再需要富農，仰賴富農，而且進到合作的和集體的耕種的道路）。雖然進行上有許多極大的困難和各種惡勢力——自教皇和富農起一直到黨的自己隊伍之中的庸俗的右傾的機會主義者——的拚命的抵抗，但是黨的這種成功就在於黨已經能夠把農民本身的這種根本變化組織起來，並取得中農和貧農廣大羣衆的領導權。

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引證幾個數目字。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場下的耕地面積共計一百四十二萬五千五百公頃（每公頃約合中國十六畝有餘），糧食生產總額計六萬萬米突磅（即十進位磅），而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共計一百三十九萬公頃，糧食生產總額約計三萬五千萬米突磅。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場的耕地面積共計一百八十一萬六千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八萬萬米突磅，而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共計四百二十六萬二千公頃，糧食生產總額約計十三萬萬米突磅。一九三〇年，據估計蘇維埃農場的耕地面積將達三百二十八萬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十八萬萬米突磅，而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將達一千五百萬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四十九萬萬米突磅。換句話說，就是來年蘇維

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生產的商品糧食合計總額佔我們所有農業生產總額的一半還多。

像這樣生氣勃勃的發展速率，甚至在社會主義的工業上也是沒有的，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無疑的也是開足速力向前飛跑的。因此，我們幼稚的社會主義農業是有偉大的前途，是能夠發展成爲奇蹟的，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至於集體農場發展的這種非常成功由於種種原因，無論如何，下列的原因是必須說明的。

這種成功首先要歸功於黨之執行列寧的教育羣衆的政策，用合作社的提倡，有系統的引導農民走向集體的耕種。這種成功也是由於黨能夠戰勝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一種，是誇大這種運動，主張以法令助長集體農場的發展（即「左派」唱高調的人們）。一種是阻止這種黨的行動的（即右派冷淡愚呆的人們）。

關於建設集體農場的這種非常的成功，也是由於蘇維埃的當局明確的認識了農民日漸需要新式器具，新式的技術，並且認識清楚在舊式耕種方法之下，農民的地位是毫無希望。因此，出借電耕機和農業機器，設立電耕機廠，組織共耕，建立集體農場並加以提倡，還有集體產業給農民一種普遍的扶助，這種種都及時的幫助了農民。一種政權，一種蘇維埃政權，已經興起，由行動上已經證明了這種政權是情願而且能夠有系統的繼續的幫助農民勞動羣衆，改善生產：這還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哩。 感受工具缺乏

和一般能力的需要的農民勞動羣衆，一定要急切的抓住這種資助的，一定要加入集體農作的運動的，不是明顯的嗎？工人階級舊時的口號『向着鄉村！』，還應當以集體的農民的一個新口號『望着城市』，來補充，這難道是奇怪的嗎？

最後，集體農場的這種驚人的成功，是我們國家的進步工人已經把這件事拿在手裡的一種結果。我這裡所說的是指的那些四散在我們國家的主要區域內的幾百幾百的工人隊。從他們在農民羣衆之中的成功看來，集體農場之一切宣傳隊，最好的是工人宣傳隊。工人們已經說服了農民，使他們相信集體的農場比個人的小農場的利益大得多，特別由於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現實例證，更容易使他們這樣相信。這是毫不奇怪的。我們建設集體農場因為這樣纔會成功的，必定要把這種成功看爲是最近幾年來最重要的最決定的成功。

『科學家』們曾懷疑組織五萬至十萬公頃田地的大規模糧食工廠之可能與必要，現在已經證明這種懷疑是多餘的了。在有私有土地權的資本主義國家，若不購買土地或交納絕對地租（這樣將要妨礙生產），大規模糧食工廠的組織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呢，却沒有這類限制，既不要繳絕對地租，也不要收買土地，因爲我們根本就沒有土地私有權的。因之，我們對於大規模糧食農場的發展，是有更有利的條件的。

資本主義國家，大規模糧食農作企業是爲要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的目的，或者無論

如何，也是作爲相當於所謂平均利潤率的一種利潤的目的的。我們却是另一種情形了，大規模糧食企業是國家的產業。對其發展，既不要最大限度的利潤，也不要平均利潤率，却能限制最小限度的利潤，或有時一點利潤都不要也可以管理，這是發展大規模耕種有利條件的另一事實。

最後，資本家們對於他們大規模糧食生產產業，既沒有信用制度的便利，也沒有輕易的特殊稅制度，而在有利於土地之社會主義化的蘇維埃秩序之下，這類特權，却是現在有，將來也不斷的有的。

右派機會主義（布哈林派）所說的一切謊言，說農民一定不加入集體農作，說集體農作的加速的發展，不能不引起羣衆的不滿，農民一定要脫離工人階級，說鄉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康莊大道』不是集體農作，而是合作社，說由於集體農場的建立，和向鄉村中資本主義成分的進攻，將容易使得麵包缺乏——這一切謊言，已經證實是虛妄的了，已經打得粉碎了，像舊時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胡言謔語一樣了。

農民已經加入集體農場了——而且有時，是整個鄉村，整個縣區的加入。集體農作的羣衆運動並未嘗削弱勞動農民的聯盟，反倒加強了這種聯盟，並且供給了勞動農民們一種新的生產基礎。現在雖是瞎子也一定要承認農民是日漸走向新式集體農作，也一定要承認，假使農民之中有什麼不滿，這不是因爲蘇維埃當局的集體農作政策引起

的，而倒是因為蘇維埃當局尙不能完全應付集體制度的發展與農民對機器與耕田機的需要。

關於鄉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康莊大道』爭論，是一個學院式爭論；是一個如蔣秦菲德（Fichewald）和斯列樸考夫（Stepkov）一類幼稚小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爭論。這是明顯的，在沒有集體農作的羣衆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發展的原始形式，合作社和供給消售聯合社，造成了這個『康莊大道』；然而到更進步的形式，集體農場的形式，出現了，那末，它就自動的代替原始的形式，而爲社會主義化的主要路線了。鄉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大道是列甯的合作社計劃，包括農業合作社自最單純的以至最複雜精密的一切形式。要以集體制度來反對合作社，這是侮弄列甯，這是忽視他的批評。

現在雖是瞎子也一定看到，若不向鄉村中資本主義成分進攻，若沒有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發展，我們現在一定沒有今年糧食準備的任何成功，也沒有現在國家手中的這樣幾千萬普特的糧食。的確這倒可以斷言的，就是由於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運動的發展，我們究竟自糧食危機之中逐漸把我們自己解放出來了——如其以前還沒有解放的話。假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運動的發展更迅速些，那末，五年之後，我們國家將來一定無疑的，是世界上糧食生產國家最大的一個，即使不是唯一最大的。

關於現在集體農作運動的新而決定的事件，農民不是如從前一樣三一羣五一夥的加

入集體制度 而是整個的鄉村，整個的村落，或者整個的縣區，加入集體制度。這就是說中農也日漸加入這個運動了。這一點構成農業發展的根本變化的核心。這個農業的發展必須看作是過去十二個月最重要的成功。托洛斯基及其信徒們的孟塞維克的觀念，以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主要羣衆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已經證明打得粉碎而且證明是荒謬的觀念了。現在托洛斯基主義者自己也必須承認。現在，很明顯的，一切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的五年計劃的人們，或者不相信他們國家內有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的人們，是不配贊許這個計劃的。各國的資本家們最後希望，在蘇聯內恢復資本主義，『恢復私有財產的神聖原則』，已經毀壞無餘而等於零了。資本家把農民看做是資本主義園地的肥料，現在這羣人，全體廢除了『私有財產』的著名旗幟，而站在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基礎上了。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希望一天一天的煙消火滅了。

這一事實就解明了我們國家的資本主義成分，動員舊世界的一切勢力，反對社會主義的前進之絕望的企圖，這些企圖不過引起階級鬥爭之更加擴大而已。資本家明明曉得『怨恨』社會主義是徒然的。因此，資本主義的各式各樣的看家狗們，如斯特魯夫，黑森，米流考夫，克倫斯基，唐，阿伯拉摩維赤等，都發出了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狂暴呼號。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希望要永遠消滅了，這的確不是小事。列寧說過，如果果能供給農民十萬架電耕機，中農也要一定加入共產主義運動的。去年已經證實了黨



向這一目的前進已得到成功。在一九三〇年春季，我們將要有六萬多架電耕機，一年之後，有十萬架，兩年之後有二十五萬架，這是大家知道的。

幾年前所視之爲『幻想的』，現在能以實現了，甚至於超過了。這就是中農所以轉向共產主義的緣故。

這一切都表明我們在工業化的道路上，開足速力走向社會主義，而且日漸脫離我們國家的一世紀之久的落後。我們將來成爲一個五金生產的國家，汽車和電耕機的國家。那末，讓那些誇稱他們的『文明』的資本家們追趕我們！那時，我們要看着那些國是落後的，那些國是進步的罷！

# 軍閥混戰和汪精衛

瞿秋白

「革命已經成功，中國已經統一，三個月內肅清共產」！——蔣介石在去年六月間北伐軍到了北京之後，就這樣的說。中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會議，財政會議，鐵路會議，以及南京的所謂編遣會議（裁兵會議），都在那半年之中，都表演着資產階級的「統一幻想」。國民黨中央的第五次全體會議，當然更是這種統一幻想的大廣告。那半年之中（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王正廷的外交政策之下，訂立了許多新的條約，求得了增加關稅。而且，最近兩年極大的革命鬥爭和反動屠殺之後，以及從廣東到直隸的連綿的戰爭之後，武漢的封鎖，上海天津之間北京漢口之間交通斷絕的情形，得着相當的變更；鉅大的戰爭暫時沒有。——於是中國經濟上比較鬆動，暫時表現着相當的改善，行市上的改善。帝國主義的列強承認南京政府；美國帝國主義方面，有許多『道威斯計劃』籌款的傳說，許多大借款的呼聲，許多外國顧問和委員會到南京來。……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滿洲的張學良也插起了青天白日旗。國民黨『真正統一了全國』，得着了許多新的領袖——所謂北方軍閥，不但加入了國民黨，而且成了最早的忠實信徒，應當可以倒數過去首先反對赤化的功績；他們成了國民黨政治委員分會的主席（張學良）和黨國要人。所有這些情形，都散佈很多的國民黨的幻想，甚至於影響到共產

黨的隊伍，產生機會主義復興的動搖和猶豫。機會主義者的論調，便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統治，現時已有相當的穩定，且在最近的將來，會有長足的發展」，「中國的南京政府已經是代表城市資產階級及鄉村富農而與買辦地主妥協的政府」，「中國的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特別在資產階級勝利以後，受着最後的打擊，現在只是殘餘的殘餘」；「因為過去革命的威嚇，及現時市場的需要，帝國主義是需要中國一時的和平，而不願即刻促成各派軍閥的混戰」；「所謂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來之『必不可免』字樣，用在估量現時鬥爭形勢決定策略時，是很唯心的定命思想。」

事實上，國民黨的統治——所謂資產階級的勝利——只不過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在帝國主義的贊助和指揮之下，暫時打退了工農羣衆革命的革命襲擊。只是「因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暫時比較的有力力量，所以革命受着暫時的失敗」（史達林「論反對派」第六二四頁）。而中國資產階級，並沒有能夠解決引起中國革命的那些矛盾：（一）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只有更加深入，英日的勢力範圍和一切對華特權更加鞏固起來，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完全是欺騙羣衆的誑話；美國帝國主義對於南京政府的勾結，正是要取得中國的財政控制權及中國的一般經濟命脈，使中國變成他的完全殖民地；美國和英日的爭奪中國是世界第二大戰的中心問題之一。尤其明顯的表演着英美相爭世界的霸權；英日之間以及其他帝國主義的衝突，在英美的衝突的總形勢之下，只

有日益加強中國國民黨軍閥之間的相鬥和混戰，決沒有『帝國主義來維持中國一時的和平』的事；不但如此，帝國主義的列強，在中國革命暫時失敗之後，最容易利用中國國民黨的反動聯盟，做他們進攻蘇聯，及對蘇聯戰爭的工具之一。（二）中國封建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只有更加加重；一般的經濟發展在外國資本加強侵略之下，只能使積聚起來的資本多份投到封建式的土地私產上和商業高利資本上去；國民黨的甚麼土地稅法和二五減租的『改良草案』，沒有任何實際上的意義；一年多以來，只有繼續的清鄉屠殺，加緊實行保甲連保，拉夫拉車的軍事徵役；農業危機的深入和廣大的破產失業，只有更加加增高利資本和地主的剝削，很明顯的是資產階級努力在保持擁護這種封建式的秩序，並且自己更多的參加封建性的剝削；地主資產階級各種集團，在極端劇烈的經濟危機之下，互相爭奪這種剝削工農的份量，只有引起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而不會是努力保障甚麼『和平發展』——甚麼『地主之資本主義化』的萬里前程。（三）軍閥的基礎，原本是『中國經濟的特殊狀態：封建餘孽的統治和鄉村中商業資本的存在聯結起來，而保存着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這種基礎，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能加以打擊，並且對於他還在竭全力保護和維持。中國沒有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而只有經濟上政治上半獨立的區域（地方市場），這種情形一方面做帝國主義瓜分勢力範圍的基礎，別方面亦就是各該區域軍閥割據的條件；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之後

更加和封建地主混合生長的過程之中，首先就是在各個地方市場之內和軍閥政權的官僚機關更加親密的聯結起來。資產階級已經決不是和軍閥制度對抗的力量，而恰好相反，正是軍閥封建豪紳統治的新的工具，封建式的剝削壓迫方法的附屬——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固然必須依賴軍閥的保護，而且資產階級的資本更多份的投入商業，投入軍閥公債，使他和當地軍閥的關係日益密切。資產階級的某些集團之間的競爭，和當地豪紳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互相錯綜着，形成極複雜的軍閥政客各派各系經常互鬥的局面。這決不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決不是所謂民權主義和封建制度的鬥爭，而是買辦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營壘之中的內部鬥爭。至於所謂比較有力量民族資產階級，事實上也不過上海區域（江浙）的資產階級，他占着國內最發達的市場，和經濟最優越的地位。可是，這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也只能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門戶公開政策』之下，做帝國主義的附庸，用各種各式民族統一提倡國貨等的旗幟號召『反對割據的鬥爭』；其實，他只是給南京政府的軍閥以割據的體面招牌；上海資產階級和當地封建軍閥的聯盟，用這種『統一』的名義，要征服其他區域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事實上即使這種鬥爭裡包含着幾份上海資產階級統一國內市場的嘗試，即使這種鬥爭，表現着美國帝國主義排擠英日的對華勢力的矛盾，也只不過是各區域豪紳資產階級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亦就是英日美列強爭奪中國的鬥爭。這種鬥爭，決

不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夠統一中國的鬥爭——這和世界帝國主義戰爭不是美國或者英國能夠統一世界的戰爭，是一樣的。正好是相反，南京和各地軍閥之間的混戰，各區域軍閥之間的自相混戰，正反映着：世界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在中國有多大劇烈的表演，中國各區域軍閥之間的衝突，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內部各種集團之間的鬥爭，是怎樣的劇烈，他們的內部矛盾是怎樣的嚴重。

中國的這些主要問題，民族解放，土地革命和國家統一的任務，不但是國民黨的反動所不能解決，並且是更加緊迫起來。青天白日旗插遍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軍閥混戰重新開始的日子。中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之中，工人階級已經是唯一的能夠統一中國解放中國的階級，他的革命勢力，和他所領導起來的農民戰爭，既然受着帝國主義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摧殘。那末，在英日美帝國主義互相爭奪和侵略之下，在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加重的剝削壓迫之下，在各派各系的反動勢力互相衝突競爭之下，中國的軍閥混戰是必定不可避免的，中國的統一是絕對不可能的。——只有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了農民羣衆，把這種軍閥混戰，變成爲反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戰爭，而得着革命的勝利，然後中國的統一方才能够實現，這就是要農民羣衆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實行澈底的土地革命，根本剷除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根基而解放中國。

○

○

○

南京政府的所謂『統一中國』，沒有能夠得着甚麼『資本主義的穩定』和『和平發展』的道路。恰好相反，滿洲掛起青天白日旗之後，不到兩個月，蔣介石和廣西派的戰爭就爆發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二九年二月間的休戰期間，所看得見的一些經濟行市上的改善，只不過是各地軍閥準備新戰爭的附帶條件。一般的情形，却是農業危機的更加深入，巨大的災荒，推廣到廿一省四特別市一千〇九十三縣的七千萬人（盛京時報所載最近的南京官場統計）；工業裡的危機也仍舊繼續發展，除紗廠比較有些發展以外，其他工業都在破壞停滯的狀況之中，重工業不必說，就是絲業，烟業，麵粉業皮革業等，都感覺到極厲害的恐慌。國外貿易雖然有進展的狀態，但是這正是外國貨物占領中國市場的情形更加厲害，外國財政資本控制中國經濟的力量更加增加。南京政府財政的困難，已經到了完全破產的地步，帝國主義所允許的增加關稅，正是爲着稍稍救濟政府財政上的困難——對於保護中國工業是沒有意義的。可是，這一點救濟，只能做國民黨政府的『懸命湯』，不能解決財政上的根本問題。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已經兩三次要求辭職，他自己的口供是『絕無辦法』了！各地地方政府仍舊截留解款，也同樣的是入不敷出。中央直到地方，軍事的費用都超過全部預算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這樣，一切軍閥政府，只有拚命的增加苛捐雜稅，準備戰爭，以奪取收入豐富的區域。所謂廢除釐金，實際上變成『消費稅』，稅額還要比原有的釐金加

兩倍。這只是幫助當地資產階級（錢莊資本當舖資本）的少數財閥包捐包稅收入的增加，而更加破壞阻滯一般的國內商業。各省區的軍閥，因為當地商業的縮小和財政金融的破壞，更加急急乎要爭取財富的區域。而地主資本家對於工農的剝削，工人的失業以及工資的減低，工作時間加長，勞動條件加重，農民羣衆的破產，「逃荒」，小資產階級羣衆生活的極端惡化，多數兵士因欠餉和軍裝短少而受餓挨凍……這些情形，都一天天的更加厲害。一般的經濟狀況是惡劣到萬分。中國的經濟的確在極嚴重的危機之中。

南京政府的一切「建設」的空談，大借款的籌畫，不過是要假借名義，用公債的方法，回扣的方法，尾數的方法，籌出款項來填補軍閥的需用。誰也不在認真的想什麼「建設」，而只是想着彌補目前的財政困難。爲着這個原故，南京政府承認西原借款，得着尾數六千萬元；爲着這個原故，以隴海路的名義借比利時銀行二百萬元美金；爲着這個原故，以滬寧滬杭路名義借英國銀行七十八萬美金；以粵漢隴海路的完成名義，動用英俄庚子賠款七千五百萬元。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針，主要的就是怎樣得到外債。甚至於一切關稅自主等等名目，不是想直接取得外債，就是想用「靠得住的担保」，去取得國內公債。帝國主義指揮了幫助了中國反動派暫時打退了工農革命的襲擊，但是，帝國主義不但不能幫助南京政府的甚麼經濟建設，並且不能夠幫助國民黨軍閥多多少



少真正部分的解決財政上的困難。上面所說的那些小借款，每次不够南京政府一兩個星期的軍費和政費。自然，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所最希望的，是大財主的美國帝國主義。希望美國帝國主義幫助中國的工業化嗎？美國帝國主義却首先顧到他自己怎樣準備和英日爭取中國財政的控制權，他派了克美爾財政博士的委員會，他派了孟德爾的鐵路顧問，他聲言要使中國的鐵路全部美國化。他首先還注意到中國太平洋沿岸的軍事設備（飛機場，汽車道，無線電等等）。暫時，這些設備正可以用做擴大美國對華商業的支配力量。一切美國對華的『建設計劃』，都是這種性質，——因為美國知道得很清楚：奪取中國市場是不能不和英日有嚴重的劇烈的鬥爭的。華盛頓剛剛說了一句『中國鐵路的美國化』，立刻就聽得到英日的抗議。說新銀行團的公約，規定對華借款必須列強共同參加，不能由美國獨占。帝國主義內部的衝突，正在劇烈起來，對華政策上決不能有多大有意義的比較長期的『和平合作』，各方面都在準備着太平洋的戰爭，而不是準備什麼『中國的工業化』！何況所有這些計劃，都還不過是紙上的空談。現在美國總統（他就是美國紅十字會的總理）已經聲明說：甚至於賑災的款項都被軍閥官僚放到自己的腰包裡去，美國不能參加賑濟中國的災荒了。這樣，那些『建設的借款』又要到什麼地方借呢！至於說希望美國的大借款，救濟財政上的困難罷，那麼，這固然是中國國民黨各派都在夢想着，中國的資產階級也覺得這是比較更實際更切近的

救命方法。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的計算是很精明的，他說：

『中國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政治統一程度，可以做什麼全國範圍的改造工作。

十年來鬥爭的結果，秩序是破壞了，現在又發生軍事的派別的衝突和糾紛，農民的騷動正在增長……要中國有担保才行。南京的弱點，就在於一方面，政府費用的一半都歸到軍閥的腰包裡去，別方面，債務却不歸還』。（一九二九年七月號的『Foreign Affairs』）。

這樣，南京政府不但到現在還沒有得到什麼美國的大借款，而且最近亞姆斯特丹的『國際商會第五次會議』上，美國財政家拉門德正式宣言說：我敢斷定『紐約或者歐洲的市場上，中國不能籌到任何國家的借款』，因為沒有國際信用。

中國經濟財政的狀況是這樣。軍閥混戰，一方面是經濟危機的表演，別方面更在加重這種危機：鐵路交通的破壞，內河航路的阻梗，苛捐雜稅，拉夫拉車的剝削更加加重。南京政府和廣西派的戰爭就把那一點商業比較活潑的現象都打擊下去。同時，其他各派軍閥，馮玉祥閻錫山等也就逐漸暴露他們反對南京的步驟。今年六七月間，正是南京政府遇見國內國外一切複雜的問題最困難的關頭。『革命已經成功』罷？這已經不能欺騙民衆了。關稅自主和排日運動都明顯的破產了。關稅的增加，還不夠用來担保外債內債。排日運動的禁止，只換到西原借款的承認。關稅所擔保的債

款，『又加上了裁兵公債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總共新加擔保的小債款（內債和外債），已經有三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而長期的外債還不在這個數目之內。從關稅支付的利息，每年就要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中國已經統一罷？』那更是大笑話。各省區獨立的軍閥政府，和南京一樣是軍閥政府，仍舊存在着。蔣介石戰勝李濟深李宗仁的結果，只是在廣東換了一個西山派的政府，在兩湖鞏固了何鍵的政府，同時，又發生馮玉祥反對南京的糾葛。蔣馮的鬥爭正在一天天的緊張起來，北方的閻錫山唐生智都實際參加馮玉祥的反蔣運動。所謂裁兵編遣的幾次會議，都只是軍閥準備戰爭的應付手段，事實上各人都在招兵買馬。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裁兵公債已經用完了，亦許一大半是用在軍費上的，用在準備戰爭上的，而兵却一個也沒有裁掉。這些裁兵公債的『所有款項都已用盡，而裁兵還沒有開始』（京津太晤士報八月二十八）。『孫科報告，北方的鐵路每月要供獻軍閥二百萬元；而同時，鐵路已經破壞不堪，至少要用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修理。還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鐵路債款要清償。這些款項到什麼地方去籌呢？國外的新債現在是沒有希望，因為拉門德已經公開說：非等外債清償之後，不能再借款給中國。國內再發行新的公債呢？中國銀行界看見擔保品已經沒有了，都在反對任何新的公債；要消售公債，非用威逼手段不可』（同上報八月二十六日）。

這樣，蔣介石的『關稅自主，裁兵，統一，理財，建設，』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政綱，不但對於工農民衆是完全的欺騙，甚至於對於資產階級也明顯的是完全破產了。此外，蔣介石還答應過一件事，就是『三個月內肅清共產』。他所謂『共產』，就是『一切反抗運動。是不是肅清了呢？』

各大城市的工人運動，顯然的一天天發展；不斷的經濟鬥爭和自發的罷工運動，一每天的帶着羣衆的性質，無論黃色工會怎樣活動，怎樣欺騙羣衆，而工人羣衆一天天的暴露他們激烈反對國民黨——豪紳資產階級反動聯盟的鬥爭力量。工人階級的鬥爭一天天的轉到更高的形式——政治的鬥爭。上海今年五卅的示威，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三四萬羣衆衝破國民黨的一切壓迫，黃色工會領袖的一切合法主義，而直接向國民黨帝國主義表示革命的反抗，搗毀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報。這個示威顯然有極鮮明的政治旗幟。羣衆走向共產黨的潮流，在這示威之中，表示出極有力的趨勢。同時，在今年五卅之前半年之中，尤其是將桂戰爭爆發之後，不但大刀會紅槍會等等的運動，日益引起廣大羣衆的參加（註）；而且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游擊戰爭又開始更大規模的發展。最大的區域是：福建的西部（朱毛部隊），江西的東北，江西的西部，湖南的平江瀏陽，湖南的西部，廣東的東江，湖北的西部，湖北的東南，以至於四川。『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在反動聯盟內部衝突和嚴重的危機之下，日益成熟起來；雖然並不是一切統治階

級的危機，都會自然而引起直接的革命形勢，然而中國工農的革命勢力的確是在重新收集起來，準備着對於帝國主義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實行堅決戰鬥的總攻擊，——這是沒有疑義的。

〔註〕一九二八年底的約計北方農民的原始組織，總共有七十萬人：河南約五九八，〇〇〇人，河北約一〇五，〇〇〇人，山東約二〇，〇〇〇人，山西約七，〇〇〇人（密勒評論八月三十一日）。此外中國各地的土匪亦是一天天的增多，單是河南一省，普通的土匪至少有二〇〇，〇〇〇人。最近四川東部農民反抗捐稅（那地方去年半年之中徵稅八次，並且又預徵田賦兩年），組織抗稅軍，將軍閥所解散的新舊民團聯合在一起，共有一三，〇〇〇人。當地軍閥屢次被他們所打敗，『因此，有謂抗稅軍必為共產黨人所領導』（華北前驅，九月七號）。

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凡此一切都可以歸結起來說：『革命沒有成功，中國沒有統一，共產沒有肅清』。蔣介石在攻打廣西派的時候，還可以說：『所以有這些不幸的事，都是廣西派的軍閥不好，外國不肯廢除不平等條約，美國人不借錢，因為廣西派割據着，共產黨搗亂，因為廣西派壓榨商民，『廣東商人已羣起聲言寧受共黨暴動一次痛快』的屠殺，不能忍受廣西派軍閥之長期不斷的壓榨』。蔣介石用他的『理財建設裁兵統

「的旗幟，做準備戰爭實行戰爭的口號，彷彿他是救濟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唯一的救命皇菩薩。但是，蔣桂戰爭之後，一切情形，仍舊是照樣的糟糕。

問題不僅是怎樣救濟南京政府蔣介石的政權了，問題是在怎樣救濟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亦就是怎樣救濟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

中國工人階級恢復自己的戰鬥力，加強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力量——中國革命新高潮興起的嚴重的形勢，和中國資產階級的絕無能力解決任何問題，跪在軍閥的面前請求「肅清共產」而只能幫助軍閥混戰糾紛的發展；這種情形，使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不能不更加投降屈服，去請帝國主義的財神。於是南京政府的「最後的」救星，就是中東路事件。蔣介石想用中東路事件的「反對赤色帝國主義」，達到他對內對外的目的：（一）團結反蘇聯的各國帝國主義，而向他們兜售中東路，向他們請求借款，向他們哀懇廢除治外法權的面子；（二）用私通「赤色帝國主義」的罪名威嚇馮玉祥及其他地方軍閥，使他們承認他是「對外戰爭的民族領袖」；（三）用反對「赤色帝國主義」和「緊張的事實」為名義，再開始大批的屠殺共產黨，鎮壓工人運動和農民鬥爭，想用最後的努力提高所謂民族主義，用民族的武斷論調，來維持他在小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之中日益喪失的信仰。

結果怎樣呢？「反對蘇聯的功績」在各帝國主義的前面，是賣不出幾個大錢。

英日美帝國主義都現成的利用中國的國民黨，來反對蘇聯，準備反對蘇聯的戰爭，把中東路放在中國軍閥手裡，當然可以部分的打擊蘇聯的經濟建設，並且隨時可以用來做進攻蘇聯的軍事戰術上的基礎。可是，國民黨的這種「功績」，對於帝國主義是應盡的義務，並不因此便必須廢除治外法權，來給南京政府掙些面子，更用不着答應什麼大借款，來做南京政府的賞錢。英日美法各國帝國主義反而因為爭奪在中東路上權利，而互相衝突，不能很快的解決什麼「共管」的問題。同樣，「對外戰爭的民族領袖，蔣介石也沒有能當得成功，——帝國主義目前還沒有能夠準備好立刻和蘇聯開戰，中國自己已是絕沒有能力和蘇聯的工農紅軍開戰（國民黨，甚至於連朱毛的小小紅軍都消滅不掉呢）。恰好相反，中東路事變，把張學良陷於極困難的地位，時時還有被蔣介石借反對蘇俄派兵侵入滿洲的危險。這逼着張學良和閻馮接近。至於借此鎮壓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的高潮，那更是得着相反的結果。中東路事變之後，上海香港天津等處，工人羣衆之中熱烈的響應共產黨「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從七月十六日起，每天報上可以看見上海各工人區域的游行示威和飛行集會。共產黨員雖然又受着很多的屠殺和逮捕，而各地工人的罷工潮流仍舊是向上高漲。八一的示威，不但在上海香港天津等處發動起來，就是滿洲也有相當的羣衆行動，其他窮鄉僻壤，到處都有參加八一示威的消息。農民游擊戰爭，更有新的發展：四川農民的發動，賀龍部隊的進展，以及朱毛重

新佔領上杭龍巖武定。此外，兵變的消息也更加多起來，並且有些「叛兵」插起紅旗，尋找共產黨。

總之，結果是革命運動的威嚇更加厲害，而反動聯盟之內的矛盾衝突更加劇烈起來。

九月二十張發奎在宜昌宣佈獨立，反對南京政府。隨後的消息，證明北方馮閻和張學良的反蔣聯盟，的確同時在那裡進行。山東的陳調元扣留車輛準備作戰。唐生智參與反蔣而被扣留在南京。安徽的方振武被捕之後潛逃，而他的部隊已經「叛變」起來反對蔣介石。廣西的俞作柏也已經在進攻廣東。朱培德（江西）亦有反蔣的嫌疑，因此他的駐京辦事處受搜查。鹿鐘麟（馮玉祥的親信——現在軍事部長）也受着同樣的待遇。中央軍官學校之中有反蔣的組織，幾次企圖刺殺蔣介石。南京的危機，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厲害的了。

張發奎所發動的新戰爭，當然是蔣桂戰爭之後，第二次軍閥混戰的開始。張發奎反蔣的旗幟是什麼呢？他的要求是：（一）解散現在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集新的大會改選，不得用任何暴力壓迫；（二）免除反革命的賣國官僚，恢復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戰爭；（三）請求汪精衛回國擔任指導工作。

新的中國軍閥戰爭，有汪精衛做旗幟了。汪精衛又是什麼東西呢？他想代替蔣



介石來救濟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哩！張發奎，唐生智，馮玉祥，朱培德，閻錫山等等軍閥，在武漢時代很有些救濟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功績』，張發奎更是廣州暴動時『拯救商民』的勇將。他們代表封建勢力和商業資本的混合體，實行軍閥官僚的統治，『彷彿』不見得比蔣介石張學良以及廣西派差到什麼地方去罷！汪精衛却依據着這些軍閥的力量，向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說：在我的政綱領導之下，反蔣的成功就是天下太平的時機到了！這樣，汪精衛給混戰的軍閥一種政治旗幟。

○ ○ ○  
中國經濟政治的危機正在深入而擴大，各地方的軍閥用一切種種榨取的方法，壓迫工農羣衆，破壞一般的商業和經濟生活。南京政府不過是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他却有接洽外債的優先權，有賣國的頭等地位，佔據江浙最富饒的區域。反對南京的一切軍閥，要用什麼政治旗幟呢？當然不是公開的說，不要蔣介石賣國，而要我來賣國；當然不是公開的說，不要蔣介石佔領江浙，而要我來搜刮江浙。現在一般危機和恐慌，使資產階級裡面經常的分泌出破產窮困的成份，這種環境之中，最適當的旗幟就是：『公理和仁政的買賣』，『肅清共產的賽跑』。這種資產階級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本來絕對不能和封建軍閥的制度對抗起來，而只能希望換一個好軍閥，好政府，真正的青天白日大老爺。他們曾經這樣想望蔣介石，他們並且努力贊助這種幻想傳播到工農羣衆之

中。汪精衛現在却想人家崇拜他，恭維他有實現這些希望的本領。哼！哼！——聽他說罷！『我們的地位，是在反動勢力與共產黨夾攻中的地位……本黨因分裂及反革命派的反動行爲，已失信仰於民衆，所以我們必須加倍努力，以取得民衆對本黨絕對的信仰，』（民意雜誌六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五期）。這樣，汪精衛的所謂國民黨左派，爲着救濟已經喪失信仰的國民黨起見，爲着救濟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崩潰起見，要求改組國民黨，以便蒙蔽羣衆，阻止革命。這種改組主義的旗幟，恰好是混戰的軍閥所須要的。

汪精衛和張發奎同時發表討伐蔣介石的十大罪狀。這當然不是偶然的。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時候，已經是汪精衛派開始活動的時候。『科學的統計家』或者會誤認中國有資本主義穩定的事實，而羣衆的艱苦鬥爭，巨大的災荒，以及工商業根本上的沒有出路，却早已經使中國資產階級，戰戰兢兢的防備工農革命勢力的襲擊，而要努力尋找新的欺騙羣衆的道路。改組派的活動，在各地國民黨地方黨部之內，裝腔做勢的反對南京的中央，運用一切種種改良主義的宣傳，自由主義的空談，竭力替國民黨保持對於民衆的影響。國民黨第三次大會，正是蔣桂戰爭爆發的時候，改組派勾結蔣介石不成，便事實上開始做『反蔣大聯合』的運動——就是製造軍閥的新混戰的旗幟。

汪精衛的政綱是甚麼呢？第一，外交政策上主張『進攻日本，對於英國防禦，使

英國中立，而在不宣傳不行動共產主義條件之下和蘇聯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恢復國交。這是今年三月間，改組派在上海開的全國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等到七月間中東路事變發生之後，張發奎的宣傳獨立，却已經不客氣的樹起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旗幟。

第二、對於第三國際，說他要利用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所以認為必須在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基礎上聯合東方各國民族資產階級，『組織三民主義的新國際』。這並不是汪精衛的新發明。一九二五年戴季陶開始反共產的時候，便主張建立『民族國際』和第三國際來對抗。現在蔣介石胡漢民，並且已經在南京設立了所謂『東方被壓迫民族國際通信處』。對於共產黨，他們認為是『代表流氓屠殺民衆的黨，本黨應努力掃除之。』現在汪精衛訴述蔣介石的罪狀時，還特別提出反對蔣介石的『非法屠殺』。這是申明，汪精衛是主張對於共產黨的『合法屠殺』的。第三，表面上高叫反對封建制度，而同時公開主張『革命必須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憲政時期以前，一切政權歸國民黨，國民黨的全國大會委任中央政府，省黨部委任省政府……黨部對政府有指導監督之權。』這種所謂『民權主義』實在是高明得很。當軍閥屠殺千萬工人的時候，汪精衛是首先贊成，並且是首先提議的。當蔣介石得罪了馮玉祥張發奎等軍閥，汪精衛却起來訴述蔣介石專橫的罪狀了！總之，改組派政治制度的理想，明白的表現資產階級公開的提議和軍閥豪紳公同實行階級獨裁，並且崇拜法西斯蒂的『團體國家』（Corporat-

Stout)的理想，主張『政權的行使，關於政治組織，採用區域代表制，關於經濟組織，採用職業代表制』。第四，表面上說要實現民生主義，却在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之外，又特別加上『建設國家資本』的一項。並再四再三的說明：除買辦階級，所謂『寄生資本主義』以外『一切工商業者，都在工農小市民的革命戰線之內』，所謂『節制私人資本』，是要特別『扶助新興工業，獎勵僑民回國興辦實業，予以切實保護』。這顯然是擁護資本主義的政綱。都用所謂『國家資本』為招牌來蒙蔽；說甚麼『基本工業，如一切煤鐵石油煉冶主要機器工業及交通機關，都以國有為原則。』其實，這些工業早已經『國有』，早已是軍閥政府的企業，是外國財政資本控制之下的企業。所謂國有就是『軍閥有』，就是和帝國主義做買賣的好材料。最有趣的，汪精衛的政綱裏，還有一句絕妙的話：『國外貿易，期由國家經營』。這實際上是孫中山『中國之國際發展』的更進一步；所謂『中國之國際發展』計劃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本來是孫中山的『偉大的買辦計劃』，如今『國外貿易由國家經營』更是『國家資本』買辦化的『資本主義的烏托邦』。第五，對於工人政策，除了表面上製定勞動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等空談以外，——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已經談了兩年了，——却有露骨的限制工人自由的要求，說：『在不妨害國民革命的範圍中，工人有罷工自由權』，『工人運動應當時時注意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獲得農民及城市的小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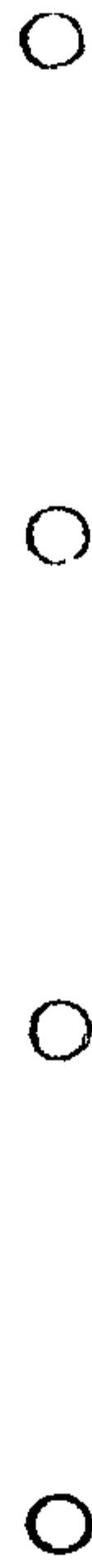
的同情，不可使之生長懼或厭憎的心理。『他們尤其注意店員的行動，主張『店員的組織要自成系統，直接受本黨之指揮』，因為店東都是『小貧的小市民』，千萬不可以對他們有『過火』的罷工運動。很有趣的，他們說：『反動政權與帝國主義妥協，必更使外國資本充分的無限制的投入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之中，中國工人必更增加其數量，並注重其質量，且益趨於集中。』這種工業化的理論，却會是國民黨改組派利用工人運動限制工人運動在『國民革命的範圍以內』的張本！第六，農民問題上的政策，最有趣不過的了。起先，今年三月的改組派大會通過一個『耕地政策決議案』，上面還說大小地主的土地『一律無代價沒收，固然是最爲澈底的辦法，但是實行上……小地主也在被打倒之列，自耕農與生活較優裕的佃農亦在所不免；城市中小市民，小商人，手工業者，智識界，自由職業者等，一定亦要反抗，因為他們的耕地也被沒收；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破壞……』，所以改組派主張只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等到六月間改組派政治主張公開發表的時候，連沒收大地主的主張也一字不提，只有『實行減租』四個大字，加上幾句實行鄉村自治，清理官荒，設立農民銀行，嚴禁高利貸等空話。土地問題上，國民黨改組派，也不能和胡漢民蔣介石有甚麼多大的分別。

汪精衛派的政綱便是如此。我所根據的，不僅是上海三月間改組派的『祕密決議』，而是根據六月底改組派機關報『民意』上在中國公布的『我們解決黨政問題的主張

』。這很有些關係，因為越到接近實行，越到公布態度的時候，這些資產階級的政客越是要『現原身』；因為他們要得到地方豪紳軍閥的承認其爲反蔣的『領袖』，所以取消了沒收大地主土地的話；因為他們怕銀行界幫蔣介石，而希望銀行界幫自己，所以取消了『金融機關歸國有』的話，改成了『金融機關以公有或公共節制爲原則』。

等到張發奎宣佈反蔣之後，汪精衛的宣言，已經是直接的政治行動，那就口氣更加緩和，完全適應那些反蔣軍閥和資產階級，包含到所謂『寄生的資產階級』的胃口。汪精衛歷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是什麼？盡是『蔣介石任用私人，貪贓枉法，吞沒國款，強派公債，非法沒收，藉口裁兵而實自增兵，託名建設，而濫借外債，辱國求榮締訂新約，破壞司法以致外國不肯廢除治外法權，承認西原借款，破壞國民黨紀』等等空洞的叫喊，一切反蔣的軍閥都早已喊過的口號。汪精衛自己以爲他是反蔣鬥爭的政治領袖，其實，他只是反蔣軍閥的小老婆，用來安慰資產階級的。他代替以前的蔣介石，做自由派資產階級的代表。這是各地軍閥和蔣介石爭奪剝削機關（政府）的鬥爭，却要汪精衛來掛一塊招牌，說：蔣介石實行不了『肅清共產，理財裁兵，統一建設，』我們才能實行。國民黨的改組派說了很久的『不做軍事投機，』但是同時就說『我們以爲能尊重十三年改組精神，根據革命的三民主義反抗南京的反動行爲的，都有和左派聯絡的可能』。這就是汪精衛『號召』軍閥，正確些說，是依附軍閥，向資產階級做『

公理和仁政的買賣。替豪紳資產階級欺騙羣衆的策略。



蔣桂戰爭以來的中國局面，顯然日益進於軍閥混戰的延綿紊亂的狀態。張發奎現在開始的反蔣戰爭，更是總的政治經濟危機的表現。汪精衛的改組派，却企圖對於這種軍閥混戰，使他理想化，成爲『爲改組國民黨而戰，爲救國救民而戰。』改組派努力於救濟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努力於救濟國民黨的破產，企圖擴大些國民黨的社會基礎，企圖利用羣衆一般的不滿意，而蒙蔽羣衆，代表資產階級去依附軍閥，選擇『新的』青天白日大老爺，而借此籠絡羣衆。汪精衛不是在爲反對軍閥封建勢力而鬥爭，却是爲着要建立別的軍閥獨裁，去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罷了。他的假民主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裝腔做勢』以及他們所謂『耕地政綱』和以前蔣介石的改良宣傳，蔣介石民族的武斷和社會的武斷，(National or Social Demagogu) 實質上沒有甚麼不同。然而汪精衛的改組派，企圖征取小資產階級羣衆裏的影響，甚至工農羣衆之中的影響，他處於『在野黨』的地位，更方使些替反蔣的軍閥『出賣仁政和公理』。汪精衛和蔣介石的分別，却在於蔣介石現在多分依靠着江浙區域的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聯盟，他的主要政策已經是差不多只用武斷的民族主義，鎮壓工農，他的改良欺騙，因爲處於執政地位，而經常的暴露出來；至於汪精衛，他却多分依靠到中等民族資產階級，地方

性質的商業資本，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去和小地主聯盟，他的政策，除民族武斷之外，還多運用些社會問題上的武斷。甚麼『大工業國有』，甚麼『反對寄生資本』，甚麼『國有資本』等等，以欺騙羣衆，更巧妙的進行這些階級維持反革命統治的企圖，企圖利用羣衆的不滿，而達到自己分贓的目的。因此，汪精衛比蔣介石必更加危險了。軍閥混戰的新階段上所以不能不擡出汪精衛這類的招牌，也就證明在政治經濟的總危機的背景上，革命的新高潮開始興起，羣衆和國民黨——豪紳資產階級統治對抗的陣勢，正在日益明顯起來，革命的實力正在積聚起來，使資產階級不得不設法利用一般工農羣衆的不滿意，企圖領導他們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之下來，換句話說，就是要在不可避免的軍閥混戰的局面之下，企圖防止這種戰爭變成民衆反對軍閥的戰爭，變成工農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戰爭，企圖遏止工農民衆的革命化。阻滯工農羣衆的積極行動。

改組派運動的前途，無疑的是蔣介石一樣的要迅速破產，我將來在另一篇文章來說，現在，我們且說一說目前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正是利用反動聯盟內部的劇烈衝突，利用政治經濟的總危機，而發動廣大的羣衆革命運動。必須要指明一切軍閥都是工農羣衆的敵人，工農羣衆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一切軍閥，亦就是每一省區之內的工農只有針對着當地統治的軍閥



實行堅決的鬥爭。只有積厚自己的力量，把政權奪到自己手裡，澈底肅清一切封建餘孽，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方才能够達到解放。必須指明一切國民黨、國民黨的一切派別，都是豪紳資產階級聯盟的代表，要開始極大規模的對一切國民黨的宣傳運動。必須防止聯合改組派的機會主義策略，糾正忽視反對改組派的錯誤，防止軍事冒險政策之下聯合某種「左派」軍閥，或者單獨的反蔣介石，而忽視反對當地軍閥的宣傳和鬥爭，或者等待着軍閥戰爭，而放棄當前的羣衆日常鬥爭，放棄領導羣衆實行總的政治鬥爭。

事實上恰恰相反，現在更加不應當忽視改組派問題，輕視汪精衛的反革命力量，正應當格外努力反對國民黨的改組派，暴露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暴露他們的假民權主義，揭穿他們「反帝國主義的」裝腔做勢的把戲，指出他們擁護豪紳資產階級統治和贊助軍閥獨裁的真相。特別要加緊反對改組派在羣衆之中的影響，特別要加緊爭取羣衆的鬥爭。「變軍閥的戰爭爲反對軍閥的革命戰爭，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羣衆鼓動的口號。

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戰爭的任務，一天天的緊迫起來。這個鬥爭的前途不但是推翻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的統治，並且也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應當在現時的形勢之下，努力鞏固農民的游擊隊，努力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朱毛的部隊和滿洲

。滿洲最近亦發生農民羣衆「騷擾」的事實，往往圍攻縣署，實行抗稅，並且表示擁護蘇聯。滿洲農民的游擊戰爭，即使是很小規模的行動，亦有「武裝擁護蘇聯」「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擁護蘇聯戰爭」的偉大意義。南部中國，更應當利用農民運動程度的較高和力量的較大，發動真正羣衆武裝鬥爭，實行抗租抗稅抗債，只要有可能，便要建立蘇維埃，實行武裝農民——解除軍閥的武裝和地主的武裝，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要使鄰近區域的游擊戰爭和農民暴動，互相配合起來。同樣，要注意兵士的運動，要使他與農民運動及工人運動聯絡起來。

尤其要注意的是，現在農民運動已經在城市工人運動復興的條件之下進行。城市之中必須發動並且領導工人經濟政治的鬥爭；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把赤色職工運動自動的公開起來，衝破國民黨的合法主義而爭取工人羣衆的政治權利。必須要確當的聯結經濟的鬥爭和政治的鬥爭，領導羣衆從日常的經濟鬥爭，進到反對當地軍閥的政治鬥爭，反對國民黨的一切派別的鬥爭。要擴大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鬥爭，爭取其中的領導權。應當及時準備政治的總同盟罷工的問題。

中國工人階級，處在現在的狀況之下：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衝突的發展，一般的政治經濟危機，農民羣衆及城市貧民生活的不斷的惡化，罷工運動的生長，軍閥混戰的延綿糾紛，——他自己的任務也就格外的加重起來。帝國主義趁中國的混亂而更加進攻

，尤其要加緊革命鬥爭的形勢。而中國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羣衆和城市貧民，實現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中自己的領袖地位——這在中國革命之中有決定勝負的作用。因此，首先更要鞏固自己的黨——共產黨，要堅決的反對黨內右傾的機會主義，反對那些對於革命高潮的懷疑派，對於獨立領導羣衆鬥爭的取消派等等。事實上，現在最要緊的問題，就是在這革命新高潮正在興起的時候，在這軍閥混戰和政治經濟危機的時候，在這國民黨改組派努力活動企圖欺騙羣衆的時候，特別要注重共產黨獨立領導工農羣衆鬥爭的任務。甚麼『等待黃色工會領袖的同意』，甚麼『農村之中應當做經濟鬥爭』，甚麼『聯合富農』等等的機會主義的傾向，都要澈底的肅清。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才能執行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的使命！

一九二九年十月九日

#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立三

在去年黨開始反取消派鬥爭的時候，即準備寫一本中國革命與取消派的小冊子，系統的駁斥取消派理論的錯誤。第一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大革命的教訓，已將他當做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議決案的序言發表。第二章就是這篇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第三章政綱，政策與策略與第四章組織問題，繼續在本刊發表。

因為本刊的篇幅所限，所以本期只能登載本章第一第二兩節。第三節中國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第四節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下期才能續完。

三月十五日

## 一 帝國主義怎樣統治着中國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成爲最高的統治者，握住了中國經濟政治的特權，支配着中國經濟政治的生活，任何一個政治的事變，如果帝國主義不是主要的組織者，也都與帝國主義有莫大的直接關係。誰不瞭解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實質，誰便要對於一切問題的認識，陷入到極端錯誤的觀點。

現在取消派思想的根本來源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對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政策，統治中國的實質，發生了極大的錯誤。他們認為：

『中國一九二七年之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為他確已開始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轉變的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主要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他的階級力量的比重，封建殘餘確在這一轉變中，受了最後打擊……』（陳獨秀）

根據他這一觀點，認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結果，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不僅是戰勝了工農羣衆，而且戰勝了封建勢力，不僅戰勝了封建勢力，而且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那麼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三大矛盾，——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和工農革命勢力，資產階級都將他克服了，自然毫無疑問的資產階級可以暢利的發展資本主義，『中國完全有成爲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了。（托洛斯基）『現在是走向發展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統治階級只有繼續穩定，『決沒有甚麼動搖』。因此陳獨秀叫他做『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時期』，所謂『歷史大轉變』，自然是從半殖民地國家，轉變到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意義。

革命失敗後兩年的歷史，中國的實際狀況，正在加速殖民地化的過程，而不是資本

主義發展的過程，恰恰與他們的估量相反，此地暫且不說。他們這一觀點的來源，是由於不認識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實質。他們認為帝國主義之所以能統治中國，是由於帝國主義「依據中國海關來阻礙中國工業的發展，及限制國內的市場」（托洛斯基）所以他們以為：

「國家統一與經濟獨立，就是關稅自主，或更正確些說免除了對外貿易的壟斷，便是表示中國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

他們既然認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只是依靠佔據關稅，關稅自主就是經濟獨立，就是中國解放，自然看見帝國主義開了一次關稅會議，實行了二五稅則便要高喊着「帝國主義讓步了」，「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發展了」。其實帝國主義佔據中國的海關，只是阻礙着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條件之一，此外帝國主義還有許多極殘酷的方式，不只阻礙着而且破壞着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並且佔據海關與其他侵掠的方式是不可分離的，如果其他的侵掠不掃除，決不能實現真正的關稅自主，即令海關稅則有多少的改良，仍然不能挽救中國殖民地化的惡運。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開始，爲着能够暢利的掠奪中國廣大羣衆，一定要在中國內部找到一種社會力量的擁護，成爲他統治中國的工具，以鎮壓中國廣大羣衆的反抗。因此首先和以前社會構造的統治階級，封建貴族，地主，原始的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

結成聯盟。一方面以強大的武力的壓迫，使這一封建統治階級降服，另一方面極力發展經濟的侵掠，使這些剝削階級都漸次買辦化，使他們的利益與自己（帝國主義）的利益益混合起來。這樣遂使中國舊有封建統治階級，很快的成爲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帝國主義得到這樣有力的掩護，才更快的發展在中國的侵掠。因此帝國主義極力保護中國的封建剝削形式，用作這一反動聯盟的生存的基礎。

帝國主義的商戰侵掠如狂風暴雨一般的在中國封建剝削階級有力的幫助之下，一天一天深入到中國的經濟生活中，中國落後的生產方法，舊有的手工工業，家庭工業，人工灌溉的半自然經濟的農業，不能避免這一惡運，始終無法抵抗而漸次崩潰起來。另一方面，封建地主與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又更殘酷，遂使廣大羣衆，日益窮困化以至破產失業，同時帝國主義又用各種的方法阻止中國生產力發展，近代工業的建設，使這些破產的羣衆無法到城市中去找得工作，變成近代的無產階級，遂造成中國日益增多的廣大的游民無產階級，而成爲軍閥軍隊的基礎。中國軍閥制度就是建築在舊有的封建剝削關係與這樣的遊民無產階級基礎上，所以軍閥一方面極力保障封建剝削關係，同時他自己對廣大羣衆的剝削形式，也就與純粹封建時代封建諸侯的剝削形式原則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軍閥就是代替原來封建貴族（滿清）的帝國主義的最好的工具，辛亥革命雖然把滿清封建貴族階級推翻了，帝國主義却更積極的來扶持着中國軍閥的統治，

因此帝國主義的統治的力量不只沒有動搖而且更加鞏固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大革命，使軍閥制度受過嚴重的打擊，在革命失敗以後，又極明顯的恢復起來。所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無論政治上經濟上都倚靠着中國的封建勢力，同時封建勢力的存在也倚靠着帝國主義的扶持，已經成爲不可分離的關係。

帝國主義維持着中國的封建軍閥，不只是爲鎮壓廣大羣衆的反抗，而且利用軍閥的封建剝削來阻止中國的民族工業的發展，軍閥割據在中國存在一天，那麼這些厘金制度，苛捐雜稅，強迫派款，以及戰爭災禍，使交通破壞運輸阻礙等決無法避免。帝國主義却因爲得到了各種的特權（子口稅）有自己的運輸機關，不會受到這樣阻礙，這就在與中國民族工業市場上的競爭佔了極大的優勢，使中國生產力在這樣的打擊之下無從發展，甚至日益衰敗。

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階級也就受着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只有更利害的剝削農民，才能維持自己的地位，因此地租的剝削一天一天的提高起來；同時因爲自然經濟的破壞與農民的窮困化，又造成了高利貸的活躍的條件。於是中國剝削階級從各種掠奪方式，從帝國主義剝削剩餘之下得到的很少的資本的積壘，大都投資到土地與高利貸方面去，而很少投到工業方面去，因爲投資到工業方面的利潤還沒有投到土地與高利貸上的可靠，所以中國近二十年來，地價飛漲，和銀行資本的畸形發展（中國銀行資本最大的作



用是與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關聯，以及買賣證券公債等）便是明顯的例證，這樣也就阻礙着中國工業的發展。

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這樣互相倚靠不可分離的統治着中國。所以要使中國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必須根本推翻封建軍閥的統治，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地主剝削，和與封建地主剝削互相勾結着的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同時要推翻封建的統治，徹底肅清封建的剝削，也必須徹底驅逐帝國主義的勢力。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就使中國向着殖民地的道路，使中國成爲貨品的市場與原料的供給國，開始便攫得中國經濟政治的最高權，宰制中國的海關，割據租借地，開闢商埠，握着交通機關，（如管理鐵路與內河航行權，）以及領事裁判等各種特權，並在中國長期駐紮軍隊以保障這些特權。商品的侵掠在這樣重重保障之下，自然非常便利的，伸入到中國的農村，破壞中國落後的農村經濟，同時極力掠取中國的原料，以供給本國工廠。於是一方面使中國農業商業化（爲商品而生產），同時農民因爲資本主義前期的半封建的剝削加緊，日益窮困，無法改良自己的生產工具，使生產方法仍停留在一種舊有的形式之中，而不能有一點進步。這樣在中國掠奪的利潤，並不用在中國的生產上（不在中國開設工廠），而用在帝國主義國內工業的發展上；在中國掠奪的原料，並不在中國製造，而運回到帝國主義國內去製造商品，再運回中國來出賣。於是中國擔負

着破產貧窮的痛苦，而資本的積壘，却表現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中，表現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極端的破壞，破壞着舊的生產方法，又阻礙着新的生產方法的建立。遂使中國的經濟生活一天一天的更奴服於帝國主義，而成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屬體，現在中國經濟的形態完全適合殖民地經濟的特徵。因此要使中國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解放出來，必須解除一切帝國主義侵掠的武器，取消一切在華特權，海關協定僅是這些特權中之一種。

還有一個統治中國，阻礙中國發展的方式，就是經濟的壟斷與獨佔。帝國主義在中國銀行，壟斷着中國的金融，支配着中國的市場，如匯豐，正金，花旗等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有無上的權威，中國本國銀行錢莊，只能是他的一營業的附屬機關。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洋行，交易所，貿易公司等，更壟斷着中國對外貿易，壟斷着國內市場，甚至操縱中國的農民生產，因此帝國主義常常可以用一種「屯併」政策來打擊中國本國的生產（如現在中國火柴業的衰敗，便是受着瑞典托拉斯的屯併政策的打擊）。並且進一步的到中國來開設工廠，用高度的技術，強大的資本來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同時又有各種特權保障他的發展，中國幼稚的工業自然很困難和他競爭。所以不收一切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企業，工廠等，中國工業決沒有發展的可能。

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到中國來（以前和將來都是一樣）決不是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還是更利害在政治上經濟上實現奴隸中國的任務。現在中國所擔負二十五萬

萬以上的外債，極大部分都是一種政治的借款。這是歷次反動統治者拿中國政治的特權交換得來的。把關稅做抵押，帝國主義就藉此管理中國的關稅，把鹽稅做抵押，就藉此管理中國的鹽稅，交通借款，就藉此管理中國的鐵路。無數經濟政治上的特權都是這樣斷送去的。至於帝國主義直接對中國的投資，一部分是經過中國銀行錢莊的作用流到商業高利貸借貸，助漲中國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活躍，妨礙中國工業資本的發展；另一部份雖然為生產目的輸到中國，可是這些工業的發展，決不是向中國工業獨立發展的方向，却是向着加強中國經濟附屬到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的方向。因為這些資本輸到中國來，差不多完全為着榨取原料，（建設初步製造原料的工廠）或者用在擴大交通，（現在美國投資就是這樣）藉以便利商品與原料的運輸，加緊對中國的束縛。所以如果認帝國主義的投資，可以幫助中國工業獨立發展，實在是莫大的錯誤，恰恰相反，帝國主義資本輸到中國，正是中國政治的經濟的解放的莫大的障礙。孫中山的『利用外資以發展實業』，改組派陳公博想利用美國金元的經濟建設計劃，這只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幻想。中國如果不取消一切外債，不沒收一切帝國主義在華的資本，決不會真正的解放。

中國其所以一天一天走向殖民地化的過程，實在是受到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各方面的殘酷的壓迫與束縛，取消派把他縮小到一個單純的海關問題，這樣的觀點，離開中國的實際，離開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理論不下十萬八千里。現在改良派的資產階級，

從蔣介石以至中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寅初等，惟恐廣大羣衆認識了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實質，煽起了徹底的反帝運動，於是把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各種各色的兇毒的政策，輕描淡寫的掩藏起來，而只宣傳關稅自主的口號，以欺騙廣大羣衆。不幸的很，現在取消派的觀點，恰恰與蔣介石等這樣欺騙羣衆的宣傳一致了！

尤其是認『帝國主義可以對中國讓步，可以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更是不瞭解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與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關係。殖民地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發展的有機的組成的一部份，如果殖民地經濟走上了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場與原料的供給，便是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動搖。所以極力來維持並加強殖民地的附屬，以加深對殖民地的剝削，而且儘可能的破壞殖民地的獨立的發展，這是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整個經濟政策。中國是世界最大的一塊殖民地，毫無疑問的任何一個帝國主義都不會對中國有經濟上重大意義的讓步，尤其不會直接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

過去中國工業的發展，只是在帝國主義尚未完全統治中國的初期，和歐戰中不能顧及中國的時期。所以歐戰後帝國主義爲着挽救自己的在大戰中的破壞而更厲害侵掠中國的時候，中國工業遂受到莫大的打擊而停滯衰敗起來。帝國主義始終是要箝制中國工業的發展，決不肯有絲毫的放鬆；就是他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開設工廠，也僅祇那些極

軍事過程的製造（如紙煙工業，紗布工業等類輕工業），藉此減輕原料與商品來回的運費。至於真正的工業化，能以使中國生產有獨立發展可能的，特別是五金工業，（軍事工業除外）決不會讓中國建立，而且要極力破壞他的發展。強迫中國犧牲獨立發展的利益，使中國成爲商品的市場與原料的供給國，成爲帝國主義發展的後備軍，這就是帝國主義使中國殖民地化的主要作用。不僅是對中國是如此，英國對於印度，日本對於朝鮮，美國對於拉丁美洲都是一樣。只有在某些特殊條件之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才不得不和殖民地的大工業合作，或對殖民地作些少的暫時的讓步。例如戰爭的準備，或戰爭行動的需要，才在那些戰略上估量殖民地地位的重要，而設立機器工業或化學工業。或者爲與強有力的競爭者競爭，不得不對關稅政策讓一步，就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宗主國還要借特惠稅的名義來保護自己。因此殖民地生產力的發展是異常困難，就是發展起來，也就是忽起忽輟的，極不暢利的。並且只限於個別的工業部門。這就是殖民地國家產業發展的特殊性質。

在中國歷史上，所謂帝國主義對中國讓步，可以找着兩次，第一次是美國召集的華盛頓會議，書面上表示在相當期間內可以允許中國有關稅自主，與取消領事裁判權。這是一方面因爲日美的競爭，美帝國主義要打破日本的壟斷，並爲示好於中國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就是想緩和中國快要爆發的革命。第二次就是在一九二五大革命爆發以後

(五卅以後)帝國主義會表示着各種的讓步，如段政府時代的關稅會議，如英國放棄漢口九江租界，在一九二七年，各國都發表對華宣言，表示可以考量放棄在中國的某些特權(如領事裁判權)可以修改條約等。這不過誘惑中國資產階級更快的反革命，以消滅廣大羣衆的革命。到了資產階級已經叛變革命失敗以後，這些當時鄭重的宣言，馬上找出一些藉口完全拒絕，成爲不兌現的紙票。很明顯的，英帝國主義已經放棄的租界不又收回去了嗎？所謂取消領事裁判權不是在原則上承認而事實上遙遙無期嗎？所謂修改條約不是變成了再加中國一條鎖鍊的政策嗎？舊有的特權一點也沒有取消，而在甚麼『平等互惠』或者最惠國的名詞之下取去了更多的特權，如內地雜居與自由購買土地權，一切內河都可讓帝國主義船隻航行的權利。中國民衆沒有領事裁判權的保護，除掉了願意到外國做奴隸，或者那些下野官僚軍閥們可以得到帝國主義的保護者以外，誰還有資格到外國去雜居嗎？中國還會有一隻輪船航行到外國的內河嗎？這樣的『平等互惠』，除掉使中國更加奴隸化，還有甚麼意義！還有更明顯的，就是美國佔據了中國的航空，英國佔據了中國的海軍，日本取得了山東滿州更多的特權，這就不只是使中國更加殖民地化，而且是準備着瓜分中國大戰的意義。不知道陳獨秀所謂帝國主義的讓步，究在那裏？對的，二五關稅實行了，可是這一『二五關稅』，根本上並沒有改變關稅協定的原則，而且一切中國能製造的貨物，都列在最低的稅則裏面，較之以前，沒有絲

毫的增加（與子口稅的二五徵收恰好相抵），在保護中國工業發展的利益上一點意義也沒有，只是幫助軍閥政府更多的軍費，更便利的來製造不斷的軍閥戰禍罷了！

這樣取消派的觀點，與所謂「超殖民地發展」的理論根本完全一致，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社會民主黨的先生們所謂「先進的民族送給了落後的民族，興盛以進步和文化」的欺騙殖民地勞苦羣衆的理論的最好的宣傳者。這不只是歌頌中國資產階級的成功，而且是歌頌帝國主義的仁慈，這樣觀點除掉阻滯羣衆革命鬥爭的勇氣，還有麻醉羣衆革命性的作用，是最可恥的機會主義的觀點。

## 一一 封建勢力與封建制度

取消派思想的第二個根本的來源，就是否認中國的封建勢力，托洛斯基簡直不承認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而陳獨秀們也說中國封建勢力只是殘餘的殘餘，否認他有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作用。爲着大家明瞭他們的觀點起見，再把上面徵引過的陳獨秀的一般說話，詳細的寫在下面：

「其實中國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爲商品經濟所支配，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實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久已成爲他們在經濟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積累）財政上的（維持政

權所必需的苛捐雜稅）共同必要。……

而且中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沒有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為他已開始了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的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就是社會階級關係轉變，主要是資產階級得到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優勢的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對立地位的過程中，變成殘餘的殘餘；牠爲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

上面一段話的總的意思極明顯的就是說明：中國封建勢力經過商業資本與帝國主義的商品侵蝕，已經變成殘餘；經過大革命資產階級的勝利，更受到最後的打擊，不只是不能束縛資產階級的發展，而且他自己爲自存計，要努力資本主義化。既然封建勢力一點也不能束縛資產階級了，那麼毫無疑問的現在是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 所謂『開始了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時期』，即轉變到資產階級政權穩定，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列寧在批評考茨基的時候，常常說：『假如俄國工人階級看見了這樣的詞句，馬上可以指出這完全是以前的孟塞維克的陳言爛調，不值一駁的』。假如陳獨秀上面的一段話，



譯成了俄文，俄國工人階級看到了，更要說：『爲甚麼到處的猴子是一樣的叫聲（列寧話），以前俄國取消派的思想一模一樣的在中國叫起來了』。把以前俄國取消派的文章引出一段來與陳獨秀的話對比，便知道這句話完全是實在的。

『一九〇五至七年的革命（資產階級）成功了，雖然在嚴重的反動之下，然而常常有社會上極深的變化……在反動時期中，新的社會力量日益成熟，新的社會集團日益形成。

『不久以前，他們（大農業家的代表）一般都是真正的農奴主，純粹是貴族式的地主。他們當時還是分着小集團，形成那種蒲施克維池，及馬爾夸夫第二式的貴族。但是現在呢？大多數俄國之貴族，及非貴族的大地主——他們在國會裡的代表，就是國民黨與十月黨右派，已經漸漸變成農業資產階級。……』

『俄國客觀上的根本問題，在現時是完成文化的資本主義代替野蠻的半農奴制度的過程，這是絕無疑義的，無可辯駁的。』（羅石夸夫——俄國著名的取消派）

把這一段話與陳獨秀的話來對比，除掉了表面上所用的詞句不同，根本思想是絲毫的分別也沒有。羅石夸夫說『一九〇五——七年的革命成功了』，陳獨秀說『一九二五——七年的革命，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都勝利了』；羅說『俄國貴族與大地主，已經漸漸變成農業資產階級』，陳獨秀說『中國封建勢力正在努力資本主義化』；羅

說『從前貴族在國會裡的代表。現在變了農業資產階級的代表』，陳說『張學良，閻錫山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陳致中央論軍閥戰爭的信）；羅說『現在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農奴制的過程，』陳說『現在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時期，就是資產階級已經戰勝封建勢力，至少是在戰勝封建勢力的過程』。他們的根本思想是不是一模一樣的？這樣的根本思想自然要走到歌頌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定而取消革命；主張完全合法主義，而取消一切非法的鬥爭，認一切非法的鬥爭甚至示威運動都是盲動；以至取消黨的祕密的組織，而主張完全合法的組織，反對罷工而主張請願，迷信國會萬能（在中國就是國民會議）……等。列甯批評『取消派的思想是反工人階級的，反馬克斯主義的，最無恥的機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到中國來，尤其非常之明顯，尤其非常之危險。因為現在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與一九〇七年革命失敗以後的俄國還有很大的不同；革命高潮的象徵，已經極明顯的表現出來，毫無疑問的現在是走到了（勉強來比例的話）俄國一九一二年以後革命開始復興的形勢。陳獨秀們在這樣的時期來高唱取消主義的論調，除掉幫助資產階級來迷亂工人階級，阻滯革命以外，還有甚麼意義？！

中國取消派思想否認封建勢力的一個主要的來源，就是對商業資本的作用的錯誤觀念，認為商業資本的發展，足以消滅封建剝削關係，甚至認為商業資本可以形成一種社會制度來代替封建制度，因此現在中國是商業資本佔統治的時期，所以現在中國社會制

度就建築在這種商業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上，這不只是對於馬克斯主義的修改，而且可以說沒有入馬克斯主義之門（這一錯誤的觀點種源於臘狄克的中國革命史的演講，現在已成反對派對中國問題的中心思想）。

馬克斯主義對於社會歷史發展的定律，是『社會關係和生產力有密切的關連。人類得着新的生產力的時候，同時改變他們的生產方法；改變他們的生產方法，和謀生式樣的時候，同時就改變他們的一切社會關係』（馬克斯——哲學之貧困）。這就是說一切社會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築在當時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生產方法又是因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必須是生產力發展了，生產方法才能改進；必須是生產方法改進了，然後舊的社會制度才會發生動搖，適應新的生產方法的社會制度才能建立起來。商業資本，只是永久在流通中——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所以他與生產資本不同。他的本身並不代表一種生產方法。

『商業資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展，就是指資本自身還沒有支配生產；因此商業資本的獨立的發達與社會一般經濟的發達是成反比例的』（馬克斯）。因此商業資本的特別發展，並不就是表現着生產方法有了根本的改變，（生產方法改進當然可以促進商業資本的發展）並且專就他的自身講，還不足以爲一種生產方法過渡到別種生產方法的媒介與說明。馬克斯對於這一點有詳細的說明，摘述兩段在下面，便可以對於這一問

題有明白的瞭解。

「商業以及商業資本發達，到處使生產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增加，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變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爲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即自然經濟的形態——立注）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的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的解體作用，究竟達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及其內部的構造如何爲轉移的。這種解體的進程，究竟歸結到何處，就是那一種生產方法起來代替舊的生產方法，這不是以商業爲轉移的，而是以舊生產方法自身的性質爲轉移的。在古代世界中，商業的作用，及商業資本發展常常歸結到奴隸的經濟；又依照這種出發點如何，一種以生產直接生活品爲目的的家長的奴隸制度，有時僅轉變爲一種以生產剩餘價值爲目的的奴隸制度。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的發達，歸結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由此所得的結論是：此等結果自身不是由商業資本的發展決定的，但是由種種完全相異的狀態決定的。……」

在十六十七世紀中，因地理上發見，諸大革命出現於商業中，並且很迅速的增加商業資本的發達；此等革命在促進由封建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過渡中，構成一種主要的要素，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因這種事實而產出種種完全錯誤

的見解。世界市場的突然擴大，流通商品的種類增加，歐洲諸國民間，佔取亞洲生產物，和美洲財寶的競爭，以及殖民地制度，對於破壞生產的封建制限，是有重大的幫助的。然近世生產方法在他的第一個時期中——在手工工廠業中——只有在中古時代已經造出自己發達的條件之處才存在的。例如試將荷蘭和葡萄牙比較一下（注）。當十六世紀中以及十七世紀一部份時期中，商業突然的擴充和新世界市場的創造，對於舊生產方法的崩壞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興起，發生一種重大的影響，然這却是在已經造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上出現的。世界市場自身構成這種生產方法的基礎。在另一方面以繼續擴大的規模而生產，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驅策世界市場不斷的擴大，所以此處不是商業不斷地使產業革命，而是產業不斷地使商業革命。……（馬克斯——同上）

（注）漁業，手工工廠業，和農業所安下的基礎——其他狀況不計算在內——對於荷蘭的發達是何等重要，十八世紀的著作家已說明了。——從前的見解是過於輕視亞細亞的商業，古代和中古商業範圍及其意義，現在的流行見解，就是過於重視這種商業範圍及其意義。矯正這種見解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十八世紀初葉英國的輸出與輸入，並且將他和現在的輸出與輸入比較一下。然十八世紀初葉的輸出與輸入，較以前任何商業國民的輸出與輸入要大得無

比。(博洽德等)

徵引這一大段，並不是閒文，從馬克斯這兩段話當中，我們可以瞭解商業資本的作  
用，和生產方法遞進的基本概念，並且進一步可以瞭解封建制度的末期——資本主義的  
前期商業資本主義時期，即是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時期，他的社會制  
度——從封建諸侯過渡到集權的君主專制的國家組織的下層經濟基礎到底是甚麼？同  
樣即是中國純粹封建制度破壞以後的社會制度，即國家組織的經濟基礎是甚麼？現在  
取消派都肯定他的基礎是建築在商業資本的發達上，統治階級即是『商業資產階級』，  
因而否認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這種觀點是不合於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原則的。商業  
資本的發展對於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的生產組織，可以發生一種解體的作用，可是商業  
資本本身並不代表一種生產方法，並且「還不足以爲一種生產方法過渡到別種生產方法  
的媒介與說明」(馬克斯)；因此從封建諸侯進到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商業資本的發  
達並不足以爲這一社會組織的基礎，也就是說中國純粹封建制度破壞以後幾千年來的國  
家組織並不建築在甚麼商業資本的發達上。

西歐封建社會的興起，是由於古羅馬帝國奴隸勞動經濟的崩壞，社會經濟從商品經  
濟很發展的狀態又復退化到自然經濟的狀態，農業經濟佔着統治的地位，封建制度就建  
築在剝削廣大農民的基本上。土地都是封主——諸侯所有，把他分成小塊給自由，或

半自由的農民耕種而徵收各種生產物品以爲租稅，同時實行徭役制度，每月農民都要攜帶自己的工具替地主作幾天工作。諸侯對農民有絕對的統治權力，以嚴刑峻罰來駕馭農民，使農民附着於土地，不能自由脫離，實際就成爲一種農奴羣衆了，現在有些取消主義者（如馬玉夫）說封建社會是奴隸經濟，中國沒有奴隸了，所以沒有封建剝削，這簡直是沒有歷史常識的說話。農奴與古代羅馬的奴隸不同的，就是他們的身體不是買賣的商品，地主不能把他們買賣，而且有他們自己的生產工具。地主一切金錢，玉帛，房屋，衣食都是由剝削農民得來。所以這時候剝削形式的特徵，是地主以土地所有權的關係來隸屬農民，以超經濟的壓迫去榨取農民的剩餘勞動。

純粹封建社會的時期，自然經濟是佔着主要的形式，但是有許多生活的必需品（如鹽鐵等……）不是每個地方都可出產的，這就需要一種交換以輔助自然經濟；這種交換的發展引起城市的發生。這些城市多半在宗教教堂與封建諸侯的駐在地，商業與手工業都漸次集合在這些城市來。商業主要是鹽鐵……等和農產品的交換，手工業是一些簡單的日用品的製造。許多日用品既有了專門製造的手工業（這就是分業的開始）自然比農民自己製的要好些，因此農民漸次用農產品來交換這些手工業品；需要日繁，手工業也就一天一天的發展。同時因爲原料出產地與製造專業的關係，於是某些地方某種手工業製造特別的精良，別的地方的人都需要購買這一種手工業品，因此需要商人

流通各地不同的手工業品，商品就隨之發展起來。這時候手工業生產組織，完全是行會與家庭工業的組織，自己不能兼做商人，而且一定要依靠商人來流通商品；這些商人從中取巧剝奪更多的利潤，於是商業資本積壘得非常之快，並且因此造成商業資本支配工業的基礎。多因為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於是行會與商會的組織普遍的發生：行會只限於一城市的組織，而商會因為商品流通很廣的關係而聯絡到許多城市。這時候的城市盡是諸侯與教會的產業，居民負有各種義務和賦稅，並且諸侯濫用權力壓迫市民。這樣是與當時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城市自由的發展發生了很大的矛盾，所以這時候就發生了許多城市反抗諸侯的鬥爭，這一鬥爭的結果，諸侯允許城市的自治，城市却對諸侯有納一種經常賦稅的義務，所以當時這種城市雖得到了自治權，却仍然是諸侯的附庸。

生產的範圍繼續擴大，交換的關係隨着發展，市場的需要隨着增加，於是以前家庭工業的生產組織，與行會制度，都成生產力繼續發展的束縛，（因為限制着大批的製造），許多商人便拿出資本在城市中建立手工工廠，協業分工，也就同時發生，以便大批的製造。因此家庭工業的組織與行會制度漸次破壞，手工工廠的組織漸次起來代替他。從家庭工業進到手工工廠是生產方法一個大的進步，於是這一新的生產方法與當時的封建制度發生了極大的矛盾。

手工工廠的生產，須尋找更廣泛的市場，以消納這樣大批的生產。於是封建制度的



各種組織，——如關卡的繁多，戰爭的頻仍，幣制的不統一，度量衡的不一致，尤其賦稅的苛重與強迫徵收等，都成爲莫大的束縛；必須突破這些束縛，才能使生產暢利的發展。所以佔有這些生產機關的商業資產階級，極力幫助當時的君主來消滅這些諸侯統一全國。純粹封建制度從此崩壞，集權統一的君主專制國家代之而興。所以極明顯的，純粹封建制度的崩壞，根本原因是由於與生產力的發展發生矛盾，不適合新興的生產方法的組織。商業資本只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方法的改變而發展，就是馬克思所說『產業不斷的使商業革命，而不是商業不斷的使產業革命』。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使封建的生產組織發生了解體的作用，可是根本動力，還是生產力的發展。

商業資本的發展，侵入了農村，使農村自然經濟，漸次解體，商品經濟漸次發展，可是農民生活更加惡劣。因爲商業資本對於農村經濟發展及耕種方法和技術改良等事從不過問，祇想把農產品變成與城市工業一樣的商品，怎樣達到這目的，是毫不關心的。這樣喚醒地主去適應這新的交換制度，於是殘酷的剝削農民。在自然經濟的時候，地主剝削農民的生產品只是供給自己的需要并不出賣，所以剝削的程度，終爲其本身的需要所限制。商品經濟發展以後，這樣的剝削無所限制，於是地主用盡各種的方法，以取得農民的生產品送到市場上去出賣，兌取金錢，農民所受的剝削比前更加利害起來（西歐任何一國都是這樣的形式）。所以商業資本的發展，侵入農村，並沒有改變

農村的生產方法，而只是促起地主的原有生產方法上更厲害的剝削農民；就是馬克斯所謂『以一種生產直接生活品爲目的的奴隸制度，轉變爲一種以生產剩餘價值爲目的的奴隸制度』。並且商業資本與封建剝削互相勾結着一塊來壓搾農民。

所以城市生產力的發展，破壞了家庭工業與行會的生產組織，而進到新的手工工廠的生產方法；（就是從剝削學徒工匠的形式進到剝削僱傭勞動的形式）並且使當時社會制度在適合他的發展的基礎上，破壞純粹封建制度，建立統一的王國。但是影響到農村中並沒有改變農村中的生產方法，而只是促進了地主在舊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更殘酷的剝削農民。同時城市雖然有相當的發展，並沒有超過農村，農村經濟（在生產的比較上）仍然是佔着主要地位；所以當時的國家組織是建築在這兩種並行的生產方法——農村的封建生產方法，與城市手工工廠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而封建生產方法仍然佔着主要的地位，這就是說當時集中統一的君主國家，就是適應兩種生產關係的組織，而封建的生產關係仍然佔着主要的地位。仔細去考察當時的社會組織形態，便可以把這種複雜的生產關係，看得非常之清楚。雖然削弱了封建諸侯，建立了統一強固的國家，但是並沒有把封建貴族的統治推翻，而只是建立了一種貴族與商人的聯合政權。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仍然存在，尤其是貴族地主統治農民的特權一點也沒有掃除。剝削農民的方法更加殘酷，這就極明顯的表現着並沒有把舊的社會制度根本改變，所以這種國家制度

只是封建制度比較進步的組織形態。這種社會組織與資本主義的組織形態固然是完全不同的，與封建社會並沒有根本的區別；所以如果稱他爲資本主義制度固然是絕對的錯誤，就是把他從封建制度劃分出來稱他爲『商業資本主義制度』，來與封建制度及資本主義制度對立起來，也是同樣的不正確的（歷史家稱這個時期爲商業資本主義時期，只是指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特殊的發展，並不是認他就是這一時期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一直到工業革命，生產力更進一步的發展，於是爆發了資產階級的大革命才把封建制度根本推翻，建設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我們分析每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的時候，首先要弄清楚這個時代的社會關係是建築在那一剝削形式——生產方法上，并且要把他的主要的條件與次要的條件分別清楚；因此這個時期仍然是封建社會制度，決不能稱他爲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

根據以上的論斷，便不難分析現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國純粹封建制度雖然在幾千年前——周末秦初——因生產力的進步，商業資本的發展而破壞了，可是起而代替的集權統一的國家組織，是建築在封建剝削與手工工廠生產方法的基礎上；這一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是封建地主與商業資產階級的聯合，而封建地主階級仍然是佔着主要的地位。現在取消派的觀點認秦始皇起就是純粹商業資產階級的政權，毫無疑問是絕對錯誤。從秦朝到現在三千餘年，雖然經過不斷的變亂——農民暴動，野蠻民族的侵入，商業

發展與衰敗……等。可是生產力與生產方法始終停滯在手工工廠的基礎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沒有逾越這個範圍。因此農村經濟有時候商品經濟很發展，有時候又退到自然經濟，而他的主要的剝削形式——生產方法仍然是封建的方式。直到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自然經濟的破壞，超過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雖然促進了農民的階級分化，發生了新的剝削關係（富農剝削僱農），可是農村中主要的剝削形式——生產方法一點也沒有變更，只是促起地主在舊的封建生產方法的基礎上更殘酷的剝削農民。城市中雖然發生了大工業，並且發展了幾個工業中心，發生了工業資產階級，可是在全國經濟生活中的比重上說起來，仍然是很弱小的，農村人口還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根據日本經濟雜誌的統計），農業生產，還超過工業生產幾倍以上，可見封建的生產方法仍然是佔着很大的優勢。取消派只看『商品經濟支配了農村』，便以為是資本主義統治了全國，而不注意這是由於帝國主義商品侵略而不是本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展的結果。所以在農村中表現着買辦化的商業資本與封建剝削互相勾結壓榨，而農村生產方法——剝削方式一點也沒有變更。所以現在社會組織的經濟基礎是建築在城市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鄉村封建生產方法上，而封建的剝削關係，仍然是佔優勢。所以上層的政治組織毫無疑問的是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即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聯盟。

取消派既然有了這樣根本的錯誤觀點，自然對於農村經濟的分析走到離馬克斯主義的原則更遠了。他們認為『中國商業資本主義已經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的封主已經完全沒有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因而集中到商業資產階級手裏，他們剝削的目的與封建地主不同的，因為後者不知道貨幣經濟，他們的目的不過為得黃金，裝飾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只有商業資本家』（臘狄克發明的理論，當然托洛斯基是一樣的觀點）。我們不從剝削的方式——生產方法上來立論，只看地主的出身，和剝削目的來肯定他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這是對於馬克斯主義聞所未聞的修改。馬克斯對於封建剝削方式這樣的說明：

『在一切經濟結構之下，如果直接勞動者仍為生產工具和勞動方法的佔有者，……則所有權的關係，必進而為統治與隸屬的直接關係，直接生產者必成為不自由者。此種不自由是可以由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柔化而為簡單的租稅義務……名義地主只有用超經濟的壓迫去榨取剩餘勞動』（馬克斯——資本論第三卷）

因此這種經濟結構的經濟基礎，是在於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方法，以榨取其剩餘勞動。故凡此種剝削方式，就叫做封建剝削方式，維護此種剝削方式的制度，就叫做封建制度。『封建式的所有權……憑之以建立社會組織，其中對立的直接生產階級，不是古代的奴隸，而且小農奴式的農民』（馬克斯文匯

卷一）這就是馬克斯對於封建制度的定義。極明顯的，馬克斯對於封建剝削的說明是從他的剝削方式上立論，而不根據他的剝削的目的與剝削者的出身。

現在中國經濟的結構主要的基礎，完全適合於馬克斯對於封建剝削，和封建制度的定義。農民是生產工具和勞動方法的佔有者，地主得以加於農民的剝削，就是利用土地所有權的關係，而採用一種超經濟的榨取，統治與隸屬的關係，就是建築在這種剝削的基礎上。下面舉出的一般情形，證明這種封建方法的超經濟的榨取是非常的厲害，等級制度與地主特權都依然存在：

一、地主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從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從前歐洲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徵收沒有這樣厲害，就是商品經濟深入了農村的時候，也不過是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徵收農產品，就是封建剝削的主要形式之一，歐洲封建時代極普遍的採用，到了商品經濟發展了才有部分的變成以貨幣代表的表面形式，現在這種形式，有些地方也發生了（所謂折租），但還是極少。

二、租額以外的貢獻，如廣東的田信鷄，田信米，如湖南的年鷄年肉等。

三、徭役制的殘留，如湖南的應工，江蘇的送工等。在歐洲封建時期，農民對地主服役每年十二日，後來商品經濟發展了，地主更加緊剝削，才任意自由增加。現在湖南湘潭的『應工』，每月八日，江蘇的『送工』每月五日。至於到了四川、雲南，

陝西等處，還有更長期的勞役，並且純封建的土司制度都還存在。

四、地主統治農民的特權，也不亞於以前歐洲的形式：地主有民團，保衛團等的武裝，有法庭有監牢可以自由審判，處罰，甚至屠殺農民。

五、在社會關係，地主完全是另外一個等級，各省通有的一句話，所謂「東佃父子」，把這種關係表現得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形，地主與農民不通婚姻，地主有冠婚喪祭的事件農民全家都須去服役，甚至農民到了地主家裏不能坐在凳上只能屈坐在地下的情形都還存在。

上面的情形，充分證明這種利用土地所有權的關係的超經濟的剝削，不只是存在而且非常的厲害，這就是極明顯的封建剝削方式；並且這種剝削方式在全國任何一處都是佔着統治的地位。

至於有許多特殊的情形，西歐所沒有的，但這並沒有動搖這一封建剝削方式與這一封建殘餘制度的存在：

第一在土地所有的關係上，已經有可以自由買賣的長期的歷史，因此歷史的封建已不存在，土地集中到貨幣資本家手裏，這是取消派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理由。

這在上面已經解釋清楚。根據馬克斯的對於土地關係的解釋，只應看土地所有者所採取的剝削方式是甚麼，而不必問他——土地所有者是甚麼出身，以及他的剝削的目的是甚麼

，因為社會制度是建築在剝削關係上的，如果以為土地是商人所有，剝削的目的是為貨幣，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關係，那麼古羅馬商人購買奴隸來耕種土地，生產的目的也是為貨幣，難道也可叫做資本主義的關係嗎？不是的，這是比農奴制更原始的奴隸勞動經濟。並且中國土地的所有關係也不是純粹資本主義形式的，還帶有很深的封建的宗法社會的色彩。土地的買賣並不是資本主義一樣的絕對自由，買土地與賣土地的人都必須經過他的宗親伯叔的允許——不僅是形式上的而且有法律上的意義。假如出賣土地的人不得他的宗族親戚的同意私自出賣了的時候，那麼他的宗族可以提起訴訟，得到法律的保障而將田地收回，這就是一種封建的宗法關係的保留。所以說他是一種純粹的資本主義的關係是極不正確的。並且土地的所有者並不都是集中在商業資本家手裏，很多地主，尤其是比較大的地主，多半是官僚軍閥；軍閥是一種新起的封建諸侯（下面再說明）。如河南的袁世凱，湖南的趙恆惕，四川的劉湘，劉文輝……等都佔有很多的土地，幾乎在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幾個不是出身於官僚軍閥的。中國每換一次朝代，舊的封建貴族官僚消滅，土地到了農民手裏，但是新的封建貴族官僚又漸次從農民身上掠奪過來，兼併起來，這是歷史上不斷的繼續的事實。

第二中國特有豪紳等級。掌握鄉村政權，統治農民的，不一定就是地主，而是一般豪紳，豪紳的產生表面都是經過會議推舉的形式，因此有人稱他為資產階級的自治制度



，這完全是抹煞鄉村實際情形的謊言。豪紳產生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地主階級中，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多，在一個地域的範圍內，有很多地主，而且所有的土地是互相錯雜的；因此這一區域的鄉村政權不能歸那一個地主來掌握，遂需要一種人代表地主階級來掌握鄉村政權。統治農民；這種人就是豪紳（當然在鄉村中還保留一種公社制度的殘留，如義倉社壇等，也是產生豪紳的原因不，過是次要的）。所謂鄉村中的會議，並不是每個農民都有權參加的，普通都只是佔有土地的人——地主與半地主的富農，才能參加，實際上就是地主豪紳的會議，佔有土地愈多的人，他的權力就愈大，假如他是做過官的，他一定是最有權力的。這樣的會議產生出來的人，自然完全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的；他們在農村中掌握武裝，可以自由審判，處罰，以至殺戮農民。假如農民不完納對地主的義務，他們馬上可以責罰。與政府的官吏是連同一氣的，他們在鄉村中的權力是與國家官吏毫無分別。官吏還要經過他們來抽剝農民，徵收一切捐稅，同時他們可以自由決定抽收鄉村的捐稅；所以豪紳就是地主階級政治上的代表，這一定義是完全正確的。並且他們就是掌握一切公田——社田，祠田，廟田的人，這些公田。也就是公社土地之殘留，歸了豪紳掌握以後，便利用這些社田來剝削農民，用各種侵吞之方法，把農民所納的租變成私有，所以豪紳成爲了經濟上的地主。高利貸商業資本發展以後，他們又是兼營高利債和商業的人，因爲他們有權力，不怕農民不還錢。帝國主義

侵入以後，商業高利貸資本都漸次買辦資本化，他們便成爲鄉村中的買辦。因此中國農民，特別仇視豪紳。『打倒豪紳』成爲土地革命的第一個口號。所以這種豪紳制度是建築在封建剝削的基礎上的。

至於高利貸商業資本在農村中異常發展，這並不是中國特有的條件，歐洲各國在資本主義的前期，商業資本發展以後，都是一樣。因爲商業資本發展，使農產物商品化，更加促起地主爲着增加商品，以取得貨幣，更加加緊對農民的剝削。所以農村自然經濟破壞以後，農村中根本的剝削形勢一點也沒有改變，農民遭受着更厲害的舊的方式的剝削而益加窮困，這又造成高利貸活躍的機會。所以商業高利貸資本對農民的剝削是與封建的剝削相連繫相勾結的。取消派認爲『封建社會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到了商品經濟支配了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成了主要的剝削；因此農民中主要是反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而不是反對地主，至少反地主已經是次要的地位』（陳獨秀）。這不光是錯誤，而且是毫無常識之談！上面在理論上已經有了充分的說明，現在再把法國大革命前的農村狀況拿來證明：

『革命前法國農村經濟狀況，是在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的過程中，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已成很顯著的現象。……這樣使社會發生變化……貴族地主日趨破產，好些貴族要把土地賣給資產階級了。於是地主爲着避免自己的崩潰，更厲害的進攻農

民，恢復地主權利的運動，遍於全國。……於是農村經濟資本主義化的傾向與阻止農村工業發展的障礙中間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就是革命的一大原因。

『農民地租是自然品物，如租穀與工役。……凡耕種或租佃土地，要納很重的租稅，第一每年須繳貨幣地租，第二繳納相當收穫，其數量為二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不等。除此之外農民對於地主還有許多極卑賤的義務，地主有無限的特權，使農民簡直無以為生。……』

『農民中大部分為佔有很少土地的小農……。因商業資本侵入農村的影響，使農民起了很大的分化，已經有佔有較多土地的農村資產階級，一方面經營農業，一方面經營商業及手工業，此外就是自己耕作的中農，和那些貧農。土地分配極不平均，便是純粹農業省份中，沒有土地的農民，仍佔很高的百分比（農民佔有的土地，從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

『法國在經濟上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各省各自有關稅制度，貨物經過各省邊界各地方，各城門，各河干都要收稅。……在革命前五十年間為便利通商起見，建築寬大馬路，長至一萬英里。信用事業亦很發展』。（西方革命史第六節）

從上述的情形我們可以看見，資本主義的侵入農村，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已經非常厲害，另一方面封建的剝削反在這時候加緊起來。正因為如此，才發生封建勢力與資本

主義的激烈的衝突，才使農民要更厲害反對地主，才爆發歷史上最著名的法國的大革命。假如農村中是純粹自然經濟的統治，不只是資本主義的與封建的生產方法無從發生矛盾；而且地主因為自然經濟所限——剝削農民只是供給自己的享樂需要而不能出賣，對農民的剝削還沒有商品經濟發展了這樣厲害，因此農村的革命只有商品經濟發展以後，才更厲害的爆發起來。

現在中國農村的結構，與法國大革命前比較：第一，自然經濟的破壞與農產物商品化比大革命前的法國還更厲害，這是因為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大批物美價廉的商品，深入農村，使農民自然拋棄自己家庭手工業製造的用品，而去購買洋貨，最顯著的例子，如以前農民都是穿自己家裏紡織的棉布，現在都穿洋布了；從前點茶油，現在都用洋油了。中國商業資本因帝國主義侵入而買辦化，這就更加強了他對於自然經濟的破壞性，另一方面却又加重他對農村生產方法資本主義化的妨害力，這就使中國農民更加窮困。農產物的商品化也同樣的是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關係；因帝國主義極力在中國收買農業原料，因此中國農產品要供給世界市場，使中國農業受到世界市場的影響，自然農業商品化一天一天的厲害起來。第二，因此地主的剝削也就比當時法國更加厲害，因為一方面因農產物商品化，使地主更要掠取農民的產物，送到市場上去以取得貨幣，另一方面因帝國主義的商品深入農村，支出日多，也就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只有厲害

的壓榨農民才能維持自己暫時的地位。所以近二十年來，不只是田租增加極多——大約從增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譬如湖南湘東一帶以前一石田收十六石至二十石租，現在加至三十石至四十石租，押規也跟着增加，從前每石田押規約六十元，現在加至一百五十元以上；而且許多封建的特權更加厲害起來——如地主在鄉村中的武裝，以及自田審判斬殺農民等。自然這就同時促起農民對地主階級的更加仇視而積極起來鬥爭。

第三，農村生產方法的資本主義化，就比法國大革命時要落後些。譬如富農經濟——剝削僱農的形式，在當時法國已有很多的發展，現在中國在比例上這種富農經濟還是很少的。這是一方面帝國主義商品的侵略，對農村加以極厲害的破壞，可是資本的積壘却極大部份流到帝國主義手裏，表現在中國尤其是在農村中的，只是些餘一點的經手費。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又用各種的方法極力阻止中國工業的發展，使投資在工業上不能賺錢，就是剝削僱傭勞動的所得，還不及採用封建方法剝削農民所得的這樣多；所以中國富農有了錢，不用來擴充自然的耕種，反而投到土地上去，這就是中國富農兼有半封建性的主要原因（關於農民階級分化的問題到第三章農民運動的策略上再詳細說明）。第四，高利貸資本的活躍，也是比法國當時更加厲害，這是因為農民受各種的剝削日益窮困，需要的貨幣更多，不得不仰助於借貸。這些放高利貸的人，就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及豪紳，他們與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有關係的。

上面的情形極顯明的指示出，正因為商業資本深入農村，尤其是商業資本的買辦化，破壞了自然經濟，發展了商品經濟。却更加助長了封建的剝削方法，增長了地主對農民的壓榨，加深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反抗與仇視，而更急激的要求土地革命，這就是這幾年農民暴動比法國大革命時還要厲害繼續發展的主要原因。同時也就是農民鬥爭不只是反對地主豪紳，而且反對高利貸與商業資本的剝削，反對帝國主義的原因，可是反對地主豪紳是最主要的鬥爭。

在世界歷史上毫無例外的，經過商業資本的發展，必然要發生極激烈的農民戰爭：歐洲封建社會的末期，經過商業資本發展以後，接續着幾十年的農民戰爭（主要是反地主而不是反商業資產階級，看德國農民戰爭時期的農民宣言便可知道。），中國的歷史也是一樣，譬如周末秦初商業資本主義異常發達，因而促進了秦始皇的統一一列國，可是不幾年就是農民的大暴動，使秦朝覆滅。這就是因為商業資本的發展，更加促進了地主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自然要激起農民反地主階級的大暴動。取消派以為商業資本的深入農村可以減輕農民對地主的仇視，可以轉移農民的仇視到商業資產階級，因此想以打倒商業資產階級的口號來代替『打倒地主』的口號，至少把打倒地主的口號放在次要的地位。這在客觀上便是幫助地主階級來模糊農民的意識。這不只表現牠們認識上的錯誤；而且表現他們理論上的反動性。

不錯，在城市生產力繼續發展，商品經濟漸次征服農村的過程中，地主階級雖然極力加重對農民的剝削，可是封建的生產方法，終究敵不住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打擊，而必然漸次崩潰起來；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地主階級的某些部份爲挽救自己的危險，企圖把自己資產階級化：一方面投資到城市工業，另一方面改變農村中的生產方法，從剝削『自由佃奴』的封建方式，進到剝削僱農的資本主義的地主經濟，因此推動着資本主義更快的發展。在西歐各國這樣的情形是表現得很利害，特別是在德國，他的資本主義的加速的發展，從落後的農業國很快就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的法國，主要就是地主階級這樣『努力』之下的成功。可是中國地主階級這樣的企圖與『努力』，受着歷史條件的限制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第一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極力扶持封建勢力，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二中國中小地主階級佔大多數，自身已是異常的窮困，決不能找大批的資本，投到工業方面或者購買機器改變農村的生產方法；第三中國土地分割得很零細，要實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必須把土地集中起來，把佃農變成僱農，這是極端困難的。在中國產業發展的歷史上，地主階級已經不止一次的『努力資本主義』：初期的官辦工業，固然是表現着當時滿清貴族的『努力資本主義化』，以後的歷史上仍然有不少的地主投資到工業方面來，或者實行農業資本主義的生產；可是多半失敗，無從發展起來，如南通的張季直，湖南的聶雲台等，便是明顯的例證。尤其改變農業

生產方法的企圖更是毫無成功，曾經發現過這樣的事實的主要是在江蘇，如墾牧公司，與棉業農場等，曾集合大批資本來購買土地，可是在生產方法上仍然是沒有改變，極大部分還是分割很零碎的，在佃給農民耕種，來徵收農民的佃租。對農民的壓迫尤其厲害，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保衛隊，監獄，法庭，農民如有欠租，便可以自由拘捕，處以嚴重的罰金或坐牢。這樣的形式與一般農村生產方法來比較，除開『公司組合』與『土地集中』的一點外，沒有別的不同。這就是在所有的關係更資本主義化的形式（並且在集中土地時還有很嚴重的封建形式，低價勒買，甚至藉名圈地，全不付值，這就與封建諸侯兼併自由地的形式差不多），而生產方法却仍然是封建的剝削，並且生產力也沒有提高。這些公司，現在不特沒有發展，而且是朝不保夕的狀態！這就是因為上面所指出的歷史條件的限制——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帝國主義，不只是限制中國工業而且限制中國農業資本主義化，因為許多帝國主義國家農業生產的日益發展，並不需要中國農業原料的供給，美國固然不要說，英國主要取之於印度。並且中國原有的特殊的農產物，如茶與絲，現在在世界市場上都因為日本意大利等的競爭，受到嚴重的打擊。甚至麵食的生产都因外貨的輸入而日益衰落，譬如麵粉，大部分從美國輸入，穀米從安南輸入，這樣市場縮小的限制，更無法使農村生產方法資本主義化。只有滿洲現在農業生產方法的資本主義化，的確有很大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地主經濟、農業公司，與富農經



濟，都佔很重要的地位，（可是半封建的地主階級仍然佔着農村中的統治地位。）這是他的特殊的原因。日本帝國主義恃滿洲爲原村供給的最大的場所，並且滿洲將要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組成的部份，與日本的交通異常便利，對日本工業的供給是極迅速的，滿洲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就是在這樣特殊條件之下發展的（當然這樣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的發展，仍然限於殖民地的經濟形式）。至於說軍閥正在『努力資本主義』，也是不合實際的。現在軍閥極力在農村中開闢馬路，只能說客觀上對資本主義發展有多少幫助，並且事實上還是幫助帝國主義的商品深入農村；他的主要的意義是軍事上的作用，爲着便利作戰，爲着易於鎮壓農民，決不能說他們是在努力資本主義化。因爲他們在城市中既沒有大開工廠，那麼開闢馬路，自然不是爲着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或者陳獨秀可以舉出例來反駁說『不是的，他們開闢馬路是爲着便利鴉片商業的運輸，這就有商業資本主義化的意義』（這並不簡單是挖苦的說話，的確桂系在廣西開闢馬路是有便利運輸鴉片的意義，不僅如此，甚至他們舉辦航空，都是爲着運輸鴉片。鴉片托拉斯互相競爭的問題，已經成爲政治問題）。如果這也叫做資本主義化，那麼中國真有『進化到鴉片工業國』（某小報語）的希望，未免太滑稽了罷！在過去軍閥努力資本主義化的事，也不是絕沒有的，如張宗昌的在山東，組織魯大公司，建設紗廠，開闢礦山，可是現在通通倒閉了，張作霖，張學良在滿洲『努力資本主義化』，（如開設奉天紗廠等）也

因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無從發展，自然都是逃不出上面所指出的原因。軍閥『努力資本主義化』最有成績的算是開設兵工廠（不如說是製彈廠，因為開設大的兵工廠，花很大的資本，除了很有根基的軍閥，是不這樣做的，因為假如自己倒了馬上又被別人搶去了，軍閥都不做這蠢笨的事的），這是因為不受帝國主義競爭壓迫的原因。現在軍閥制度崩潰更加厲害，每個軍閥倒台更加迅速的時候，他們搜括了錢，只是存到外國銀行去，或者簡直匯存外國去（這次軍閥戰爭緊張的時候，南京政府的各要人便匯了四千萬以上的美金到美國去，便是明顯的證明），預備下野出洋後的享樂用費，決不願投到工業。因為恐怕倒台以後，馬上被人家做逆款沒收了。總之如果帝國主義的統治不推翻，封建束縛不消滅，任是資產階級也好，地主階級也好，不管如何努力資本主義的生產，都是只有失敗的。陳獨秀們高喊着『地主階級努力資本主義化』，『中國已到了歷史的轉變時期』，這不過是他們腦筋中憑空造出來的取消主義的理論根據罷！

因為下層的經濟結構上封建剝削方法，仍然在全部經濟生活中，佔着很大的優勢，自然在上層的建築物還是表現很大的封建勢力，這就是國家封建制度殘餘形式的軍閥仍然能繼續統治中國的原因。軍閥制度的發生，一方面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掠，破壞了中國農村自然經濟和手工業的生產，同時又阻障中國的工業化。於是千百萬的農村與手工業的破產失業羣衆，不能找到生活，這樣遂造成廣大軍閥軍隊的基礎。另一方面，

就是因爲農村經濟商品化，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益加殘酷，農民也就益加痛苦，於是到處爆發反對地主剝削的激烈鬥爭（最初表現的形式，自然沒有現在這樣明顯的革命旗幟，而一種封建的神祕色彩，如拳匪，大刀會，紅鎗會，哥老會等），於是地主階級要求一種武裝的力量來鎮壓農民暴動，保護他的剝削，軍閥制度就適應這種要求而成立起來。

自然，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已經掌握了中國經濟政治的特權，如果軍閥不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是不能保持他的統治地位的，同時帝國主義要盡量的剝削中國農民，一樣需要鎮壓中國農民的反抗，也就極力扶植中國的軍閥，來做他的鎮壓中國農民的工具。所以任何一個軍閥都表現着他的『政治買辦』與擁護封建剝削的兩個特性；也就是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互相結合着來剝削中國農民的顯著的事實。封建軍閥是帝國主義政治上的買辦是極明顯的事實，誰也不反對的；其實軍閥是擁護封建剝削的利益，何嘗不是一樣明顯的事實，可是取消派却認爲『軍閥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否認他們是封建勢力』，或者說得巧妙一點『現在軍閥極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經濟勢力做他的統治的基礎，所以是努力資本主義化了』（陳獨秀）。這就不得不把一般人所籠統的問題，再來說一說。只要舉出下面幾個極明顯的特徵來，就足夠證明了：

一、強迫征收農民極重的賦稅，與以前的諸侯毫無原則上的分別，如張宗旨在

山東每畝田征收八元，閩錫山每畝田征六元，河南四川等省預征錢糧到民國廿八年至卅一年不等，任何一省都有層出不窮的捐稅，特別在自耕農較多的地方，這樣的抽剝常常超過實際地主對農民抽剝以上，從農民收穫所得抽剝二分之一以上。這就是馬克斯所謂『柔化為簡單租稅義務』的封建剝削。取消派說『外國的捐稅比中國還重，為甚麼不是封建剝削』，這完全是無經濟學常識之談。封建剝削是取之於農民土地的收穫，而且是強迫的；資本主義的捐稅是剩餘價值分配的一部份，在形式上主要是抽收生產稅、營業稅、海關稅……等，並且不帶強迫的形式。譬如發行公債，本是資本主義的方法，但是中國軍閥勒派農民購買公債，便帶有封建剝削的性質了。

二、軍事勞役制的殘餘形式的存在，如戰爭時期的拉夫拉車，征船封馬，或者比較柔化一點的攤派夫役等，都是一樣。

三、分區割據的形式，也與封建時代的封土形式沒有甚麼差異。每個大小軍閥佔領的區域無異於一個獨立的諸侯，各有自己的關稅（釐金）、法律、幣制，以至外交等。就是每個大軍閥下的統一的區域，也要分成許多軍區，封給下面的小諸侯去管理，如閩錫山把山西分成四個師衛戍區，再分成二十四個團衛戍區等。

四、在任何一個軍閥區域，都是極力保護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固然軍閥對

地主也徵收捐稅，但是地主可以完全把他嫁到農民身上，如以前歐洲的自由地主對大封建諸侯一樣），保護封建社會關係，極殘酷的榨取以至屠殺農民。

我想以上的事實，足夠證明軍閥是封建關係的產物；帝國主義就是利用這樣的軍閥來統治中國，這就證明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的結合。至於軍閥一樣的要保護資產階級，鎮壓工人的鬥爭，這自然毫無疑問的；他既然這樣保護封建剝削，難道還會允許工人觸及資本家的利益嗎？西歐純粹的封建制度時期也是這樣的幫助城市的手工廠主與商人鎮壓工人與店員學徒的階級鬥爭。所以我們要認識軍閥是否是封建性質，一定要從他所採取的剝削方式上來觀察。

至於現在蔣系軍閥在政治上表現着許多地方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反映出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要求，企圖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建立統一集權的政府，這是有他的特殊條件造成成功的。第一，他的軍隊經過長期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訓練，直到現在還是繼續這樣的訓練。第二，他據有長江下游的地盤，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最有力量的地方，自然很易為反映出資產階級的利益。可是他仍沒有脫軍閥的原型，他的軍隊仍然是軍閥式的軍隊。尤其是他統屬的地方愈擴大的時候，他反映出的封建剝削的關係，也就愈加濃厚；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還不能統治全國的經濟生活，自然在政治上無法統一全國（此地且不作詳細的說明）。無論是誰，佔領名義上的統一的全國政府

（自然只有名義上的），他就不能不擁護封建剝削的利益，他就不能不與封建勢力聯合起來（聯合的政權），所以現在南京政府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聯合政權，這是毫不足怪的。除非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已經在全國都征服了封建的生產方法（光只是商品經濟，破壞了自然經濟是不夠的），佔了統治的地位，才能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即是資產階級的統一的中國。不過這是只有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取消派主義者的腦中才能有的東西，實際上是絕對不可能的。中國決不會有資本主義的統一，只有工農革命才能負起統一中國的任務，然而這決不會是資本主義的中國，而要走向建立社會主義的中國了。所以蔣介石的統一的迷夢，也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想用軍閥來建立統一的中國的迷夢，是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即令蔣介石克服現在和他對立的這些軍閥——如馮系、閻系、張系等，他自己的部下馬上就是代馮閻而起實行割據和他對立的軍閥。總之無論是誰，除掉他是佔領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局部的江浙以外，他都必然要把他主要的基礎放在封建剝削方式——封建生產方法上；因為在生產落後，農村經濟佔優勢的地方，決不能從海外去找資產階級的基礎。從天上掉下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權來的。

取消派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以前的軍閥都加入了國民黨，這就表現他們都資產階級化了』，這一論斷的大前提固然已經錯了，而且犯了論理

學上倒因爲果的錯誤。中國軍閥在國民黨的北伐過程中，一個一個的漸次加入國民黨，變成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這決不是表示這些軍閥的資產階級化，而且恰恰相反，正是封建勢力來搶奪這一國民黨的旗幟，這一政策的發難指使者就是帝國主義。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的決議上說明這一現象是非常正確的。

「帝國主義者企圖叫醒民族資產階級使之脫離革命戰線。並爲使民族運動內增加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的勢力起見，使那些迄今還站在民族鬥爭之外甚至仇視革命的某部分大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開始轉變到國民黨方面來。這種主動的目的是從革命的聯合手中（無產階級，農人，城市小資產階級）奪取革命領導權以阻礙革命的發展。這些反革命舉動的主謀者，便是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促使中國軍閥加入國民黨，正是要使封建勢力在國民黨裏面強大起來，把工農羣衆壓迫出去，而使國民黨成爲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聯盟，成爲他統治中國的新工具，這一企圖可以說是完全成功了。以前的國民黨是以反帝國主義做他的主要政綱，現在的國民黨是以壓迫工農做他的主要政綱，這難道不是客觀的事實嗎？現在取消派不說國民黨封建化，不說資產階級妥協封建勢力，而說是封建勢力資產階級化，真是不管事實的瞎談！尤其奇怪，承認北京政府的張學良是封建貴族的代表，到了掛起青天白日旗便說他是「代表城市工商業大資產階級」，難道張學良改變了一點他的

實際的政策，即變了一點剝削的方法？這除掉替蔣介石宣傳「統一成功」以外，還有甚麼意義！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因農民反地主豪紳的暴動，到處爆發，的確使封建勢力受到很大的打擊，動搖到封建勢力的基礎。可是在革命失敗以後，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聯合一致的來反對革命，極力鎮壓農民的暴動，封建勢力又回光反照的一時的恢復起來，而且更殘酷的壓榨農民，特別是在經過農民暴動的區域。無須乎徵引各地冗長的鄉村實際材料的報告，只須舉出幾個極明顯的事實來：如各地地主的武裝更加擴大起來（如民團，保衛團，自衛團等的增加，如果有確切的統計一定很驚人）；農民在大革命中所得的利益，例如租稅減輕，現在不只完全取消，恢復原狀，而且更加重徵收；已經被農民推翻了或者動搖了的鄉村封建秩序，更是完全恢復了；特別是地主在鄉村中的殘酷的虐待，苛索，以至屠殺，更是一模一樣地表現出封建時代領主的特權。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實，就是資產階級的報紙也無法掩諱的事實。至於各地軍閥更明顯的割據，一切封建的剝削方式比前益加殘酷，把以前改良欺騙的二五減租，佃農條例等都公開的取消了，而且極力幫助地主民團武裝的發展。這難道不是表現着封建勢力的恢復，不是表現着南京政府正在極力恢復統治鄉村的封建秩序，不是表現着封建勢力把政治上的權力從北京政府移到了南京政府嗎？自然封建勢力的暫時恢復，只是一種



「同光反照」的表現，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以他經濟力的發展來漸次「侵蝕封建基礎」，或者使他「資本主義化」，而走上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道路；推翻封建軍閥的統治，澈底摧毀封建勢力的基礎，只有暴烈的革命，只有工農革命的澈底勝利。並且農村激烈的土地革命鬥爭，從一九二七到現在繼續的爆發，工農的紅軍在農民鬥爭中一天一天生長起來，他的前途，將要得到正在復興的城市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而走向最後的勝利。

列甯在一九一五年曾這樣的批評托洛斯基：

『十年的經過——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證明……農民的階級分化加強了，農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驚醒了政治上許多睡着的份子，使農村無產階級接近了城市無產階級；然而農民和馬兒夸夫，羅曼諾夫……（地主）之間的對抗，的確更尖銳了，生長了，激烈了。這樣明顯的真像，即令托洛斯基在巴黎做的文章，再加幾十篇、幾千句，也駁不倒的。托洛斯基，事實上幫助俄國自由主義的工人政治家，他們否認農民的作用，就是不願意推動農民起來革命。（列甯全集第十三卷）現在中國鐵一般的事實，不是比當時俄國更加明顯嗎？買辦商業資本的發展，農業生產商品化；一方面固然使農民發生了階級的分化（富農，中農，貧農，與農村無產階級），另一方面却促進了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整個農村的組織，仍然是封建的秩

序統治着，農民羣衆都不過是封建地主宰割下的半自由的農奴；上層的政治組織，特別是封建軍閥制度，都是極力保護這種封建秩序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雖然使封建勢力受了嚴重的打擊，可是因為資產階級的叛變，革命的失敗，封建勢力又極明顯的恢復起來；農村中固然是封建秩序統治着，豪紳地主有自由宰割農民的特權，上層的政治組織也仍是封建軍閥佔着優勢。在這過程中農民階級分化加強的事實（富農的反革命與僱農鬥爭的發展），只是使農村無產階級和廣大的半無產階級（貧農），更接近了城市無產階級，並沒有掩蓋過農民反封建勢力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正因為農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更接近了城市無產階級，更接受了澈底的土地革命的思想，而急激的參加土地革命的鬥爭，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蘇維埃的旗幟到處飄揚着，這就使農民與封建勢力的對抗，更加尖銳化，激烈化了。這樣的真像，就是取消派陳獨秀們再多寫幾十篇文章宣言，除了表現着他們幫助自由主義的反動的思想（如改組派陳公博們否認中國有土地革命的存在）外，還有甚麼作用？

他們否認封建勢力的存在，就是不願意農民的革命的反動理論的根據！（未完）



## 反對派對於中國問題的錯誤

吳良賦

從一九二六年到現在，『反對派』已由黨內的反對派轉成公開的反革命派，這個轉變墮落的過程，是早已完成了的。在國際上反對派已完全破產，覺悟的工人，明瞭自己的錯誤，脫離了反對派，重新回到黨裡來，不可救藥的分子，大部分直接投入社會民主黨的懷抱中，（如德國哈萊及其他地方的反對派）小部分還是繼續幹他們反國際反蘇聯的工作。這點充分地證明反對派的機會主義實質。托洛斯基出國後的言論（登載於最反動的帝國主義報紙上）直接為帝國主義效勞，中東路問題一發生，反對派一致攻擊蘇聯，為劊子手蔣介石辯護，這些都非常明顯地證明反對派在現時已是最壞不過的反革命派。

自聯共十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及國際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七月）以後，反對派在聯共及國際內部已受到最後的打擊。反對派在黨內已經完全失去了根據，布爾塞維克黨裡，再不容有他們的存在。同時反對派內部的分化，也急轉直下的前進，有名的反對派首領（如齊諾維也夫，加米尼夫，最近如拉迭克，斯米爾加等等）及覺悟自己錯誤的工人，都堅決的宣佈與反對派脫離關係；德國的『列寧聯合會』，四分五裂，不復成其為組織；聯共及國際反對派的崩毀已經達到頂點了。

在這樣的國際反對派完全崩裂的形勢之下，中國黨內一小部分動搖分子，受中國革命失敗的影響，根本懷疑及反對中央的正確路線，拾取已經完全破產的反對派的理論，來和中央鬥爭。我們爲使黨內同志更加明瞭他們錯誤堅決和他們鬥爭起見，所以不憚煩的把反對派在中國問題上的錯誤，重新說明一下。

我們可把反對派對於中國問題的錯誤分開兩段來講；一，過去歷史上的錯誤；二，目前中國反對派主張的錯誤。自然，這兩段是連接着的，不過爲便利於說明起見，我們可以這樣分開來。

一、在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國革命高漲的時候，聯共內部對於中國問題發生劇烈的爭論。最主要的爭論問題是：

- (1) 中國革命的任務問題
- (2) 封建殘餘問題
- (3) 聯合資產階級問題
- (4) 國共關係問題
- (5) 武漢時代蘇維埃問題

我們現在把這些問題一個個的來分析一下；

(1) 中國革命是何種性質的革命？ 牠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聯共中央的回答是

：中國革命，是半殖民地國家的民主革命，牠的主要任務，是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上及政治上的統治，消滅鄉村中封建殘餘（土地革命），統一中國。反對派的意見，完全不是這樣。他們以為中國鄉村中的封建殘餘，即使不是沒有，也是非常柔弱，毫無重大的意義（拉迭克意見），他們以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外任務，不是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及政治的統治，而是『關稅自主』（托洛斯基意見），這樣反對派既然否認封建殘餘在鄉村中的勢力，而且更忽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政治勢力。據他們意見，中國革命現時主要的任務，是反對鄉村中的資本主義剝削，求得關稅自主；這樣，中國革命的民主性，已是煙消雲散，剩下的祇是半截不完的社會主義性。反對派雖然否認帝國主義與封建的勢力，可是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却還是盤據於城市及鄉村中，盡情抽剝及統治中國的勞苦羣衆。祇要稍為知道中國經濟情形的人，都可以明瞭反對派的意見，是何等的錯誤。

（2）封建殘餘的問題 統治中國鄉村的究竟是誰？是封建殘餘抑是資產階級，是封建式的剝削，抑是資本主義式的剝削？聯共中央的回答是：在中國鄉村中居統治地位的，還是封建殘餘，和封建式的剝削方式。反對派的回答相反，他們說，居統治地位的是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式的剝削方式。他們的論據，是：中國商業資產階級，已經統治了大部分中國的土地，商業資本的剝削，也就不能稱為封建式的剝削。這個

論據，是非常錯誤的。第一，他們不明瞭土地所有權和剝削的區別，第二他們不明瞭封建剝削與資本家的剝削的區別。

是的，中國的商業資本已使中國土地的所有權，起了絕大變化。但是商業資本所有了土地，是否僱傭勞動者，應用新工具，來自己進行生產呢？絕對不是，牠（商業資本）還是像其他地主一樣，把土地佃給農民，抽取租穀或租金（佔全生產額百分之四十至七十）因為這樣對於他更有利益。商業資本在鄉村中沒有形成新的生產方式和剝削形式，牠還是用封建式的剝削形式，殘酷地抽剝農民的血汗，他自己變成地主。商業資本雖然變更了土地的所有權，可是沒有變更鄉村中的生產及剝削方式，所以統治於中國鄉村中的還是封建的剝削關係。

第二，反對派不明瞭封建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的區別。稍懂馬克斯經濟學的人，就可以知道農業上資本主義的剝削，另是一種形式。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通常是地主土地租給農業資本家，資本家投下資本，僱用農業工人來耕種（如在英國）或是資本家兼有土地僱用農業工人來耕種（如在美國）。從工人身上剝削下來的剩餘價值，一部作為資本家的利潤（大致是按照社會的平均利潤率的）他一部分作為地租，歸於地主。工人從資本家那邊，獲得勞動力的代價工資。在這種剝削之下，最主要的敵對階級，是農村工人和資本家（自然在有地主的地方，地主和資本家，為了利潤分配的多

寡，也不免要發生爭執，但這是次要的），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在農村中的最主要的鬥爭對象，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剝削。

在封建剝削之下，普通是兩個階級，封建領主和農奴，地主和農民。在封建制度之下封建領主非但擁有全部土地而且擁有農奴的身體（農奴沒有自由），農奴應為領主作工（工役制），或把大部分的產品及其他各種貢品，供獻領主。貨幣經濟的發展，使封建制度逐漸崩裂，農民獲得了自由，農民開始分化，但是大部分土地還是在大地主的手裡，大地主還是握着鄉村中的全部政權，地主階級更加緊的剝削農民以積累更多的財富（貨幣經濟的發展，使他們有更多積累的可能），以維持他們的地位，來抵抗新興的資產階級。在這時候，鄉村中資產階級雖然已經形成和發展，但主要的衝突，却是在地主和農民的中間，所以民主革命的主要爭鬥對象是地主階級和封建式的剝削方式，（自然在這個鬥爭中，決不能一刻忘記富農是貧農和農村工人的敵人），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土地革命。

現在中國鄉村中的主要剝削方式，是封建式的呢，還是資本主義的呢？祇要稍微懂得馬克斯經濟學及中國農村經濟情形，就可以堅決的回答道：現在統治於中國農村中的主要剝削形式，還是封建的剝削形式。反對派觀點的錯誤，是再明顯沒有了。

（3）聯合資產階級問題 中國革命性質和任務，既如上述，那麼革命的動力是什麼



呢？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工人和農民。但是在殖民地國家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是否有與資產階級暫時聯盟的可能？根據列寧意見，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可以暫時與資產階級聯盟，但要有三個條件，第一，資產階級真正進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鬥爭，第二，無產階級政黨要有獨立的組織，第三，資產階級不妨礙無產階級政黨嚴格批評的自由，不妨礙牠用革命方法去組織及訓練工農羣衆。所以列寧並不絕對拒絕和殖民地革命資產階級作暫時的聯盟，可是要嚴守上述條件，上述條件，一經破壞，則聯盟也就不得不破裂，無產階級政黨即不得不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中國機會主義者在這上面最大的錯誤，即在他們忽視了上述條件（尤其第三項），犧牲工農的利益，減少工農的力量，來遷就反革命傾向日益明顯的資產階級，他們對於共產國際的武裝工農加緊軍事工作，深入土地革命等等的訓令，完全怠工，結果使資產階級能够容易地壓倒工農的革命運動。這絕對不是列寧主義策略的錯誤，而是機會主義者不懂列寧主義策略所犯的不可饒恕的錯誤。在列寧所提出的條件之下，暫時聯合資產階級，能够加速工農的革命力量的發展（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已經充分證實了這點），反對派不顧客觀條件，一般的否認與殖民地資產階級暫時聯盟的策略，這證明他們根本不懂列寧主義的革命策略；如果照反對派的意見做去，那麼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決不能發展得這麼快，工農運動決不能發展得這麼廣大，無產階級政黨，自己也不能發展

得這麼利害，反對派主張之有害於中國革命，是很明顯的。

(4) 國共關係問題 反對派根據上述錯誤的意見，就把國民黨，看作資產階級的政黨，所以他們根本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而且在民族資產階級未叛變以前，即主張共產黨自動退出國民黨。這正是合於反革命資產階級的需要，這正是減少共產黨對於羣衆的影響，這正是把領導權自願地退讓給資產階級。當時聯共中央的意見，完全不同，聯共中央以爲那時的國民黨是幾個階級的政治聯盟（*聯盟*），共產黨應在裏面爭取領導權，擴大對於羣衆的影響，並且努力的使國民黨民主化，削弱上層反革命首領的作用，把國民黨逐漸變成民主的組織。中國機會主義者投降了反革命的首領，對於國際所指示的正確路線，完全怠工，結果使反革命首領，能够抓住國民黨作爲壓迫工農革命運動的工具。機會主義者的錯誤，是不可饒恕的，可是如果按照反對派主張，在武漢時期以前，自動退出國民黨，那麼這不祇自己繳械，退出戰場，而幫助蔣介石，這樣或許連武漢時代的革命鬥爭，也不會有，反對派主張的錯誤和有害，在這點上是非常明顯的。

(5) 武漢時代的蘇維埃問題 在武漢時期，反對派提議在武漢政府的領土內，建立蘇維埃。這個主張在那時是非常錯誤的，這證明反對派絲毫不懂蘇維埃的作用。蘇維埃是政權的機關，建立蘇維埃就是建立另一個革命的政權。在同一領土內，是不能

有兩種革命的政權的。蘇維埃的革命政權，一定要推翻別一種反革命的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就要推翻武漢政府。可是在四月至六月間武漢政府還是反對蔣介石，還是進行革命的鬥爭，在這時候，推翻武漢政府，就不啻幫助蔣介石。反對派一方面承認武漢政府是革命的，共產黨應該用一切可能力量，來幫助牠（季諾維埃夫意見），他方面又主張那時就建立蘇維埃政權（等於說要推翻武漢政府），這正是明白地指出反對派主張的矛盾和錯誤。

自然，武漢政府叛變以後，中國革命，已經進入新的階段，蘇維埃的道路，也就成爲中國革命唯一的出路。

二、上面我們已經把過去反對派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錯誤，指示出來，中國革命的失敗，使一部分動搖分子，懷疑現在黨的正確路線而重拾過去聯共反對派的唾餘，來攻擊中央，我們現在把目前中國反對派的主張，來分析一下。

第一、關於革命性質的問題 中國反對派以爲現在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握取了全部政權，鄉村中的封建殘餘，已經是毫無力量，已經超過了民主革命的階段，以後是社會主義性的革命了。這種主張是絕頂錯誤的，第一，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握取了全部政權是不正確的。南京政府是豪紳資產階級共有的政府，絕不是單獨資產階級的政府（這點我們在牠的對內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綱上，可以明白地看到），各省政權，還依舊是

在封建殘餘的代表割據的軍閥的手裏，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第二，大革命失敗以後，封建殘餘在鄉村中迅速地恢復了他們的權力（自然有相當變更），封建殘餘，又成爲左右鄉村的力量，這點就是國民黨自己也是承認的。第三，革命性質，不能只看革命動力來決定，最主要的還是要看革命所要解決的任務，現在中國革命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呢？主要任務是，消滅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及經濟的統治，土地革命，及真正統一中國。這些任務，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所以資產階級雖然變成反革命，反對這個革命，但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上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對派在這上面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關於土地革命的問題 中國反對派現在重唱舊調，說統治於中國鄉村中的不是封建式的剝削方式而是資產主義的剝削方式。這種理論的錯誤，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現在可以不必贅述。反對派說現在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只是表示他們對於土地革命的性質，完全不能了解。我們且看列寧對於土地革命的意見怎樣：

「從社會民主黨產生時起，一直到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總是擁護下列三種主張。第一，土地革命，必然是俄國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消滅鄉村中農奴式的壓迫關係，便是這個革命的內涵。第二，未來的土地革命，根據牠的社會與經濟的意義，將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牠不是滅弱，而是加強資本主義及資本

主義階級矛盾的發。第三，社會民主黨儘有充分的根據，以最堅決態度，去幫助這個革命……」（本文作者加圈）——『重新審定工人政黨的土地政綱』作於一九〇六年。

列寧這段話，把反對派對於土地革命的觀點的錯誤，明白地指示出來了。

反對派根據現在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理論，主張在農村中主要的是反對農村資產階級而使中農中立。這是托洛茨基輕視中國的歷史的錯誤。歷史證明如果在民主革命階段中，沒有堅固的中農的聯盟，那末革命的勝利，是沒有希望的。反對派既忽視目前主要的敵人，又拋棄主要的聯盟者，這種政策，如果實行，一定會葬送整個土地革命。

第三、關於現在世界形勢及國內形勢的估計 反對派和右派機會主義者一樣以爲現在世界革命浪潮低落，中國的革命鬥爭，非但沒有復興，而且更是下降。這種意見，祇證明反對派不顧馬克斯主義者在決定策略時所應有的原則，即客觀情形的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銳化，各地革命鬥爭的發展，（如德國，波蘭，法國，捷克，美國，印度等等的巨大罷工運動及革命鬥爭），更高鬥爭形式的應用（柏林五月的巷戰，各國工人與軍警的武裝衝突等），都證明世界革命浪潮，正在興發起來。在中國，工人鬥爭亦漸由消沉狀況，而趨於活躍，革命運動，表現出復興的趨勢，各大城市（

上海，青島，唐山，北京，漢口，香港，廈門，等）工人罷工運動及羣衆鬥爭，都興發起來，本年十月份罷工的統計，超過以前同一月份的數目，這顯明地表現出中國工人運動正在復興的形勢。此外各地的農民運動，游擊戰爭，士兵運動等等，在嚴重的壓迫之下，非但沒有消滅下去，而且反擴張起來，這些都是革命運動開始復興的表徵。所以事實證明反對派對於世界及國內革命形勢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第四、國民會議問題 根據於錯誤的革命形勢的估計，反對派就提出錯誤的策略。革命鬥爭既然低落，新的高潮，又渺茫無期，那麼在這種環境下，祇有利用公開發法運動的可能了。他們於是就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我們對於這個口號，可以分開兩點來講：

（一）國民會議，是否現在所急需？一個口號的提出，一定要根據於目前階級的關係及羣衆急迫的需要。現在除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智識分子（如胡適之等），以及一部分改組派以外，廣大勞苦羣衆並沒有需要國民會議這個勞什子的東西。羣衆看清了國民黨統治的實質，知道唯有鬥爭是他們的出路，唯有蘇維埃才是他們所要建立的政權。國民會議這種口號，祇能迎合自由主義智識分子及改組派的需要，實際祇是幫助他們。

（二）這個口號，現在有非常危險的影響。我們要使羣衆明瞭祇有蘇維埃革命是唯一解放的出路。現在廣大羣衆，自己並不需要國民會議。我們提出這個口號，祇會

在羣衆中散播合法的幻想，減弱蘇維埃革命口號的影響，轉移羣衆的視線，而和緩迫切的革命的鬥爭。

從這兩點上可以明白看到，國民會議的口號，要給革命鬥爭的發展，以非常大的妨礙。所以反對國民會議的口號，反對合法幻想，是發展革命鬥爭上的一個重要任務。

○ ○ ○ ○ ○

反對派的一切理論和主張（關於蘇聯問題的，關於國際問題的，關於中國問題的），都已經完全破了產。事實已經證明反對派祇是以左傾辭句爲遮掩物的機會主義者。在反對列寧主義路線時，他非但與公開的機會主義者聯合，而且還時常與反革命分子聯合。列寧主義的黨，是在反對「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揭破反對派的錯誤，肅清一切不可救藥的反對派分子，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堅決革命鬥爭上的一個主要任務。

# 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

秋白

一

中國的工會組織，是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之後發生的。辛亥革命的時  
候，工人參加革命鬥爭的事實，雖然已經很多，但是工人的職業組織——經濟鬥爭的組  
織，至多也不過是最原始的形式。直到五四運動期間，方才開始有工會的組織。因  
此，往往有人說：中國的一切工會都是中國共產黨所組織的，都是共產黨影響之下的團  
體，中國的職工運動是共產黨所製造出來的。其實，中國勞動者的團體，很早便有自  
己特殊的歷史。中國工人的鬥爭，也很早便有種種特殊的方式。這些最早時期的工  
人團體和工人鬥爭，當然和當時的中國勞動者階級的狀況有密切的關係：當時還簡直沒  
有工業工人，而都是手工工人以及苦力，因此，只有行會，只有幫口，只有中國式的「  
秘密結社」。而且這些舊的組織和鬥爭方式，遺傳下來，在現時工業工人之中，還保  
存着很大的勢力，影響到後來的「現代式的」工會運動。直到工業工人鬥爭開始之後  
，現代式的工會方才發生，——中國共產黨的作用，就在於他開始指導工人羣衆組織現  
代式的階級的工會，開始和工人階級之中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影響鬥爭。同時，中國工



人一開始鬥爭的時候，資產階級就竭力想法抓住工人組織的控制權，經過各種各式的方法滲入工人的組織——從經過「帶口」等組織來影響工人，一直到後來國民黨的委派工會黃色工會爲止。中國革命之中，我們看得見：豪紳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爭奪對於工人組織的影響之整個的過程。

中國工業工人階級還是很新的階級。極大多數的工人是剛從鄉村之中破產失業而到城市之中來的，而且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和農民破產的速度比較起來，落後得好幾百倍。因此，自然的結果就是：（一）全國只有極少的幾個大城市，鄉村裏破產農民必須走出家鄉很遠的路，方才可以找着有工作的城市；（二）「多餘的」勞動者的數量是非常之廣大，他們互相之間必須經過極殘酷的競爭，方才能夠得到工作；（三）極大多數的工業工人都要經過在城市之中很久的流浪生活，或者極簡單的苦力生活，方才能夠進到工廠裏去；（四）手工工人的失業和手工業主的破產往往是同時並進的，而且同樣也不能加入工業裡去，這些手工業主和手工工人就悠久的保持着自己行會關係，有時候，還迫不得已要組織極小的集股資本的生產——工人和業主的「互助合作」。這些現象，就規定了中國工會組織和工會運動之中的許多特殊的情形，也就使豪紳資產階級能夠經過許多很特殊的綫索來影響工人運動。

中國勞動者的組織從前是一種神權的行會式的組織，這當然都是手工業的組織，其

中雇工學徒和業主是混和組織的。業主在這些組織之中，自然處於絕對的指導地位。

這種組織的任務，實際上就是的『同行公會』任務，是所謂生產者對付消費者的組織。例如木匠的組織，大家公約木匠工作的價錢和條件，一致的對付雇主。同時，這也是業主對付雇工學徒的組織，大家公約木匠收學徒的條件，學徒的年限等等。這些行會的公約，都請一個『神』來保證，例如木匠的神，便是魯班（行會的神都是道教的）。雇工和學徒在這種組織之中，只是聽從業主的決定：每年工資或每次工作工資的多少等等；不過，這裡所謂工資，僅僅在形式上都帶着分紅的性質，而且行會的組織總給一種業主『團結』自己的雇工去對付消費者的幻象，使雇工和學徒覺得業主的事業和營利就是自己的事業和營利似的。

再則，還有一種會館式的組織。這種組織本是紳士階級的組織。例如北京各省甚至各縣的會館：每一省或一縣一府的人住在外鄉做事，他們之中最大的紳士官僚就收集金錢建設『會館』，準備同鄉人暫時居住的地方，碰着同鄉之中有爭端發生，或者受着外鄉人的欺侮，『會館』的主持人物，就要出來調解或者『爭面子』。苦力和勞動者在外鄉做事，當然受不着這麼許多的幫助。但是，因為苦力和勞動者極大多數都離着家鄉很遠，並且很難找着工作，所以他們自己也有這種組織，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幫，甯波幫，湖北幫……這種組織，當然不是階級的組織，而是同鄉性質的組織，其

中商人小官吏等也有加入的，而且總是頭腦。這也是很自然的，——苦力的同鄉組織，也要靠『有權有勢』的同鄉（工頭，包探，『有面子的人』）。同鄉的幫口，是互相幫助尋找工作，同別幫人爭奪工作的組織。這不僅是一種地方主義，而且是極殘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種特殊的鬥爭方式。實際上這些同鄉幫口，都只是大小紳士的工具，譬如虞洽卿蔣介石利用上海的甯波幫，便是最明顯的例子。上海工人過渡到現代式工會的最初一步，正就是這種幫口的『歐化』，變成甚麼『旅滬安徽勞工總會』、『旅滬口口勞工總會』等。

此外，還有一種方式，就是豪紳軍閥資本家等，利用同鄉同學同事等的關係，直接影響工人；例如：北方鐵路上，交通系的政客，利用『交通傳習所』出身的技術工人，來影響工會破壞工會；廣州辦理市政的官僚利用從南洋招收的技術工人，組織機器工會，來反對赤色工會運動，而且和其他資本家搶生意。

中國『下等社會』之中，還有一種組織，便是『秘密結社』性的組織，例如青幫，紅幫，哥老會，三點會等。這種組織的歷史很長，此地不能敘述。比起同鄉性質的幫口來，這種組織更進了一步：他有一定的頭目，一定的系統，秘密的暗號等。加入這種組織的人一定要經過許多神祕的手續。這是一種鬥爭的組織：破產失業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會』裡的人找着這種組織方式，互相幫助着反抗官廳的追捕，保護自己

的生命，同時，也可以爲豪紳資本家利用，去反對自己的仇敵。他們這種組織，往往用武力鬥爭的辦法，相打，械鬥等。他們的首領，大半都是職業的刑事犯。這種組織深入到『下等社會』的羣衆，在新起的工業工人階級裡，也留着極大的勢力。這種組織的系統，是極嚴重的宗法社會的形式：大龍頭，二龍頭，師父，徒弟的輩分分得極清，紀律極嚴。『下等社會』的組織，却是模仿『上等社會』的帝制主義族長主義。

自然，他們的羣衆要變成首領互相械鬥的砲灰和謀利的工具。因此，即使現在的青紅幫，有的時候會和各個的資本家搗亂，也不過是敲竹槓的性質；表面上是要『大家抱義氣』，實際上是首領得錢，犧牲羣衆。這種組織的首領，而且必然與警察包探有關係。蔣介石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間開始反動的時候，就依賴這種組織，實行搗毀工會——這是蔣介石法西斯蒂化的第一步，這就可見這種組織的作用。

凡此一切，都是中國新起的無產階級組織的障礙，中國的舊社會秩序對於工會運動遺留下的流毒。

## 一一

中國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因此，雖然很早就發生，——和中國工業的最初發展同時就出現於中國的，——可是，一直隱蔽在這種『同鄉反對外鄉』『祕密結社反對貪官污吏』的形式之下，而手工工人的鬥爭更是蒙混在業主之間的競爭裡面。同時，資產

階級（從最初期的商業高利資本起），就經過這種紳士式會長式家長式的影響，把持着工人苦力的羣衆，不放他們自己組織起來。

直到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方才因爲中國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高潮開始，因爲工業工人階級的生長和擴大的鬥爭，而產生現代式工會的萌芽。一九二〇年以來的中國工人罷工潮流，經過二七屠殺，五卅運動省港罷工，直到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形成中國工會發展的極劇烈極迅速的整個過程。中國赤色工會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之中，從『五十四萬會員，增加到二百八十萬』（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職工運動議決案）。中國工會運動最早發展的時期（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三年），就由工業無產階級的巨大鬥爭（如香港海員罷工，鐵路罷工，鑛工罷工），開闢了歷史上空前的局面；甚至於使手工業者的組織和鬥爭，都竭力附會『新文化的』『社會主義的』色彩，例如廣州謝英伯等所謂無政府派的協作社運動，以及各種各式勞動團體和勞動組合；至於工業工人，例如海員，更是明顯的從同鄉式秘密結社式的團體（聯義社等）進到新式的工會和俱樂部的組織，尤其是北方的鐵路工人的組織和鬥爭——一開始便帶着共產主義的色彩和影響。

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對於勞動羣衆的影響開始動搖，——無產階級獨立的組織起來，而且去領導一切勞動者——手工工人的階級鬥爭。當然，這不是說：資產階級對於工

人運動的影響，從此便立刻消滅了。這是『共產誇大狂』的錯誤見解。中國赤色工會成立和發展的過程裡，資產階級也就尋找新的道路和新的方法來箝制工人鬥爭。原來，赤色工會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如果中國豪紳和資產階級，對於工人反對軍閥政府的鬥爭（如鐵路罷工），一開始就表示厭惡和敵視的態度（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紳商』已經發誓不再『獎勵』『下等人』反對任何政府），那末，他們當時却還有可能和必要去設法利用中國工人反對外國資本家的鬥爭。這種利用，不但爲着和帝國主義工業競爭而『提倡國貨』，並且是在政治上要取得工人運動的領導：蒙蔽階級間鬥爭的實質，而移轉到民族間鬥爭的方針。一九二五年八月以前，差不多比較巨大的罷工都發生在外國企業裡（英國輪船公司，日本紗廠等等）；赤色工會最早發展的地方，也是外國企業。華商紗廠香煙廠等等的赤色工會，直到一九二七年反動之前，還是異常的薄弱。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策略，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可是，機會主義的錯誤，正在於曲解這一策略。無意之中使赤色工會的鬥爭方針，也受着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不能充分的去反對『民族高於階級』的觀念，却有時候反而助長羣衆之中這種觀念的發展。

赤色工會的發展，固然很迅速的掃除一切『旅滬勞工同鄉會』等類的組織，排斥江亢虎謝英伯等類的所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固然，中國工會當時沒

有赤色黃色的分別，純粹是赤色工會國際的影響。但是，赤色工會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法之中，却包含着許多機會主義的成份和雜亂的影響。當時工會運動的發展，差不多純粹是自發的，潮流似的。客觀上鬥爭的劇烈和工人生活的痛苦，使工會發展的速度，超過其他一切的國家。同時，國民革命高潮的猛烈和工人羣衆文化程度的十分落後，這兩方面的情形便造成一種特殊的現象：一方面許多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往民間去』，跑到工人裡去辦工會；別方面，工會的指導不是由羣衆之中選拔出來，而是完全由羣衆信託這些學生去辦。所以雖然會員人數可以一天增加幾千幾萬，而工會下層機關和本組織，始終是沒有實際的，和羣衆沒有密切聯繫的。『工會從罷工運動之中生長出來，罷工委員會逐漸變成執行委員會或幹事會，罷工工人成爲工會會員』（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的職工運動決議案）。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機械式的過程。所以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二百八十多萬的工會會員，實際上都沒有組織好的，當時的工會都缺乏下層的基本組織。至於鬥爭的方法——指揮羣衆的方法，一部分仍是運用中國舊式方法：以同鄉的關係聯絡感情（例如海員之中實際上廣東幫和寧波幫是分別組織的），以『抱義氣』的青紅幫式的口號號召同情罷工（這一口號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商紗廠罷工中曾經有極偉大的作用），有時，也用『幫助中國同胞反對東洋人』的民族主義口號鼓動鬥爭。這些鬥爭方法的初步，固然也是善於運用羣衆當時的情緒，善於適

合羣衆當時的程度；可是，同時這也表現着赤色工會之中曾經有過什麼樣混淆的成份。最主要的是：在這種民族主義的空氣之下，工人羣衆覺得：工會是愛國的「學生先生」去替他們辦的，是他們之外的人去替他們「打抱不平」的。因此，赤色工會在組織上便大部分有散漫空洞和「尙未成形」的現象。

如此情形之下，很自然的，赤色工會之中很久很久的實行着委派制度和命令主義。羣衆當初是只知道「青天白日」大老爺應當救他們的苦命——從農民之中帶來的對於紳士階級的觀點：認爲惡霸劣紳貪官污吏作威作福的時候，最好是有正紳清官出來「打抱不平」；現在，「學生先生」辦的工會，就是彷彿正紳一樣。這樣，在組織上各工會由總工會委派職員去辦理——這對於會員羣衆沒有什麼奇怪；在鬥爭上，罷工只由工會職員下命令——這也是當然的事。赤色工會在當時是極少注意發展羣衆的基本組織，實行羣衆的選舉和決議；反而有過上海總工會「十大不准」的告示，去禁止羣衆鬥爭的事實（上海三月暴動時候），這一類的例子 武漢時代更多。總之，工會沒有成爲羣衆自己的組織，而彷彿變成一種衙門，這是極大的錯誤。

革命高潮初起的時候，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反動爲止，赤色工會和幫口流氓以及國民黨爭奪羣衆的方法，也不是在羣衆之中建築鞏固的革命核心——黨的支部和工會小組；而是偏向於聯絡流氓幫口的某些領袖，聯絡某些「好的」工頭，去反對壞的工頭職員（



反對交通系等)的方法，越到後來，越是這種上層的政客式的勾結方法佔着優勢。

中國工會運動的發展，事實上完全在極端緊張的經濟政治鬥爭的擴大和深入的過程裡。一九二五年二月間開始的上海青島紗廠罷工起，直到廣州暴動的前夜，經濟鬥爭的罷工潮流普遍全國，到處極快的轉到政治鬥爭。工會運動裏保留着如此之多的非無階產級的影響，而始終有如此之大的發展，這正是因爲工人羣衆生活狀況的萬分惡劣，所以羣衆的鬥爭力量，能够不管那些豪紳或資產階級影響的束縛，而仍歸得到大規模的發展；沒有鞏固的羣衆自己的組織，而罷工鬥爭，始終是極端劇烈的發展。問題是很明顯的——不管資產階級怎樣利用民族主義來控制階級鬥爭，而罷工潮流到五卅之後，不久就發展到華商的工廠；不管工會的組織怎樣散漫鬆懈，而上海總工會，尤其是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一直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工人羣衆之中的信仰迅速的擴大，享有極大的威權；不管委派制度和命令主義的傾向如何厲害，而武漢時代的工會羣衆，糾察隊，童子團，直接表現羣衆的自動力和建議力，客觀上實行着羣衆的革命獨裁；不管工會機關對於幫口流氓的首領和資產階級紳商的代表，怎樣實行行政客式的勾結方法，而羣衆鬥爭的發展，發動了極下層的苦力以及各地各縣的手工工人店員，吸引了他們組織到赤色工會的系統之下。當時——武漢時代，已經顯然是經濟鬥爭之匯合成爲總的政治鬥爭，爭政權的鬥爭，正需要工會機關的指導能够適當的實行這一任務。但是，中國共

產黨第五次大會的職工運動議決案，却說：『過去偏重於政治鬥爭。不注意工人的經濟鬥爭……經濟鬥爭是工會的日常生活，必須如此，才能吸引廣大的羣衆參加，加緊羣衆的組織。』固然，第五次大會已經正確的覺到：以前專用工會名義通電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或者張作霖吳佩孚，歡迎蔣介石馮玉祥，這種『政治鬥爭』，已經使工人羣衆對工會冷淡了。可是，反對着這種工作方法，而在武漢那種時代專指出『人所盡知』的經濟鬥爭，這就是暗示着工會少問政治，不要妄想參加政權的鬥爭！這是一種暗藏的經濟主義。

總之，中國革命高潮時代，工會運動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發展起來，顯然是工人階級階級組織的形成，逐漸在羣衆擴大的鬥爭過程裏，清洗那些同鄉主義，祕密結社主義，行會主義——亦就是脫離豪紳和資產階級對於勞動羣衆影響的舊有方式；同時，客觀上羣衆對於豪紳資產階級的新式方法。如民族主義等類束縛階級鬥爭階級意識的方法，也在宣戰，一直走到最劇烈的政治鬥爭——政權的鬥爭。二百八十萬會員的中國赤色工會，確是一都分盡了這種領導羣衆的任務。同時，不可諱言的：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機會主義，對於工會運動，也正部分的幫助了豪紳資產階級，保持他們對於勞動羣衆影響的新舊方式：中國赤色工會裏的民族主義，委派命令主義，政客式的勾結方法，以及工

會組織在羣衆之中的沒有基礎而成爲類似於青紅帮式的團體，——以致於在鬥爭最緊迫的時候，用經濟主義去阻止羣衆鬥爭。

## 二二

中國赤色工會在大革命之中，得到極大的發展。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廣東工人代表會，從廣州國民政府時代直到廣州的蘇維埃暴動的時候，是盡了如何偉大的作用，上海總工會在上海暴動之中，以及全國總工會及武漢總工會，湖南省總工會等，在武漢時代之中，執行了如何重大的任務……這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事實。雖然赤色工會有上述的許多弱點和缺點，可是，他們的確在羣衆鬥爭的過程裏逐漸成爲廣大的羣衆組織，選拔出相當的工人幹部，爭得了勞動條件的改善，在南部中國部分的成爲羣衆革命獨裁的機關。

所以中國國民黨——豪紳資產階級的叛變，首先向赤色工會進攻。豪紳資產階級第一步就是奪取國民黨，將『包辦』國民黨地方黨部的工會壓制下去，取消工會裏的『特別黨部』；再進一步就是清黨，且將一切革命的工人，工會會員開除出國民黨。當然，對於農民也是如此辦法。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間，國民黨再進一步，蔣介石從南昌開始，搗毀赤色工會一直搗到上海，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廣州李濟琛政變，也是從解散工人代表會開始，進而開除廣州各鐵路等的革命的機器工人四五百人。同時，武漢

的汪精衛政府也已經向工會進攻，在武漢還沒有公開叛變的時候，就要求武漢總工會解除武裝，限止工人店員的要求；等到長沙許克祥政變，那更是一開始便屠殺工會領袖及一切革命工人。

國民黨完全叛變之後，全國各地普遍的屠殺，沒有一處不是從工人下手的。赤色工會完全被封閉，解散，「改組」——不能不進到極端祕密的地步。赤色工會的幹部受着極大的摧殘，屠殺，拘捕，開除等等。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十二月各地反革命政變裏所殺的工人農民，是不可勝數。單就一九二八年一月到八月的統計來看，中國工農被殘殺的有十萬人；其中正式宣佈罪狀，經過判決而執行死刑的有二七·六九九人。現任中國各地監獄裡的「革命犯」有一萬七千二百多人。國民黨的這種白色恐怖政策，却始終不能消滅工人的鬥爭；因此，國民黨同時不得不用民族的社會的武斷主義（National and social demagogu）為根據，設立官廳性質的官僚工賊工會，以箝制工人的行動，更進而發展黃色工會的組織，以民族主義勞資合作主義企圖制止工人的鬥爭。這就是國民黨對於工人運動的政策，以下再詳論。現在，我們先看一看，中國革命暫時失敗之後，工人的生活狀況是怎樣的情形。中外資產階級竭全力壓迫中國革命，首先就是對於工人進攻。廣州暴動之後，國民黨的各政府（南京，武漢，廣州）再四再三的下命令取消一切「共產時代」所訂的勞資條件（集體契約），大批的開除革命工人

；中國資本家更藉提倡國貨發展實業，而加重工作，增加時間，減低工資；他們開除男工換用女工童工，加緊剝削，苛酷待遇。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自然是極端的惡化。根據項英同志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一九二九年二月）的報告，我們可以分述中國工人的工資，工作時間，勞動條件，失業問題等如下：

一、工資

革命時代，上海廣州尤其是武漢，因為赤色工會鬥爭的結果——集體契約的訂立，最主要的勝利是工資的增加。現在，不但現實工資因生活程度增高而有低落，而且資本家實行大大的減少工資。

第一表 全國工人每月工資簡表（以元為單位）

工人種類	最高工資	最低工資	平均工資
（一）粗工：			
紡織男工	一二	六	九
紡織女工	一〇	五	七·五
鐵工	二〇	一〇	一五
機械工人	二〇	一〇	一五
礦工	一八	九	一四

絲廠男工	一三	六	八·五
絲廠女工	一〇	五	七·五
其他男工	一六	六	一一
其他女工	五	三	四
(二) 精工：			
紡織男工	三〇	一三	二六
紡織女工	二四	八	一二
機械及鐵工	五〇	二〇	二五
礦工	四〇	一六	二三
絲廠男工	二二	六	一二
絲廠女工	二二	六	九
其他男工	三〇	九	一五
其他女工	二〇	七·五	一二

〔註〕這一表是根據『新國民年鑑』的調查，不能認為很正確，因為沒有指明地域的分別。而且所謂『其他男女工』兩項太籠統了。可是這表可以給我們一

個大概的工資水平線。

第二表 上海各業每月平均工資表

業名	紗廠	布廠	絲廠	電車	郵務	印刷	店員
平均工資	一二·八	一四·五	一二·	二〇·	四五·	二〇·	一二·五

〔註〕這表極不完全。再郵務之中是除出郵務員計算的。

第三表 上海物價指數表

	一九二三年五月	一九二四年九月	一九二八年九月
米	一〇〇	一一六·九八	一二三·五八
菜肉	一〇〇	一二七·七一	二〇四·九一
小食	一〇〇	一八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
燃料	一〇〇	一二八·八八	二二一·一一

〔註〕菜肉一項之中，包括鹽，蛋，雞等。

小食一項之中，包括油條，饅頭等。這一項對於最沒有保障的工人苦力，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大半不能有家眷，不能有自立的廚房，必須買現成的『小食』過活。就是有家眷的工人，也因為工時太長，忙碌得不堪，往往只能在工廠門口吃『小食』，而不能正式的吃飯。

照這些表看來：中國工人的工資是低到幾乎不能維持自己個人生活的地步。生活程度（物價）有驚人的高漲，即使赤色工會在革命高潮時代所爭得的增加工資完全保存着，那末『現實工資』尙且不能算沒有減少。何況革命失敗之後，資本家還在減少名義工資。

一九二七年中國的工商業恐慌差不多達到極點。一九二八年戰爭有一時的停止，因此，工商業的行市比較上有些改善。於是有人以爲中國革命失敗之後，資產階級取得了『資本主義的穩定』，有『實行改良主義』——改良工人階級的生活之可能。其實，正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的勢力鞏固起來，經濟上的侵略加緊起來，中國工商業的資產階級更加覺得經濟上的高壓，而加緊向工人進攻：外國資本家從中國資本家方面奪去的利潤，中國資本家趁革命的失敗，想從工人階級身上榨取回去。一九二七年四月之後，全國工資都更加低落，只要將上列各表和革命前的工資及生活費數目一比，便可以看得出來。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對於工人生活給以絲毫的改良，亦沒有能力取得甚麼資本主義的穩定，以至於『長足發展』，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上海總工會被封禁之後（四月十二月政變之後），上海工人的工資是減低了，尤其是上海紗廠工人的工資。武漢工人的工資，能夠維持所謂『共產時代』的程度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例如銀行的行員），而百分之八十是減少了。廣州暴動之後，各業資



本家都實行減少工資，例如油業，甚至於接連減少了三次。

第四表 廣州暴動前後工資減少表

工人種類	原有工資(元)	暴動失敗後的工資(元)	減少的數目(元)
輪渡工人	每月二五。	二〇。	五。
碼頭工人	每日 一·四〇	〇·六(或〇·七)	〇·八(或〇·七)
油業工人	每槽 三·一〇	一·六〇	一·五〇
酒樓茶室工人	每月四〇。(最高數)	三〇。	一〇。
印刷工人	每月三〇。	二〇。	一〇。
建築工人	每日 〇·九五	〇·七五	〇·二五

其他的地方。例如天津紗廠工人的工資，最高是四角二分一天，最低是一角錢一天，還有一種學徒(名叫裏徒)每一個月的工資，只有八角錢；地毯工人的工資，最高五角錢一天，最低的每月只有二三元錢。安源的礦工，經過很多年的鬥爭，武漢時代，工會爭得參加管理生產，當時公司方面就用停止工作的方法對付。現在，凡是以前工會所爭到的條件完全取消，工資減少到一角錢一天。蕪湖紗廠工人工資，最高的每天三角，最低的每天一角。雲南的礦工，更是每月只有三元錢的工資。北方的工人向來沒有加過工資。而鐵路工人，還要七八個月，甚至十幾個月得不着工資。海員的

工會運動有最久的歷史。現在從國民黨反動之後，英國輪船公司及日本中國的輪船公司，也都在壓迫工會，實行減少工資。

## 二、工作時間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工會運動中所爭得的減少工作時間雖然很有限，——一般說來中國工人運動之中減少工時的鬥爭比較都是很少；但是，當時是：國家企業的工工作時間——九或八小時，武漢紗廠——十小時，店員——十二小時，童工——九至八小時。現在，除國家企業還保留着九或八小時工作以外，其他各業工人工作時間都恢復到十一小時以上。例如上海的紗廠和絲廠，現在是早六時進晚六時出，或者晚六時進早六時出，實際是十二小時的工作；以前所爭到的吃飯半小時休息，現在都取消。至於星期日休息，在生產緊張的時候是沒有的；而且星期有休息的時候，大都是沒有工資的。

總之，一般說來，工作時間是在全國地各各業都延長了。

關於工作時間的調查，只有上海的，再錄表如下：

### 第五表 上海各業工作時間表

業名	分類	工作時間	星期日休息
紗廠		一二小時(星期六加三小時)	休息無工資
布廠	日廠	一二	休息無工資

華廠	一四	休息無工資
英廠	一六	休息無工資
絲廠	一一	不一定
電車	九	無休息
郵務	七	
郵差	八—二	
苦力	九—〇	
印刷	一〇	每月休息兩天，無工資
墨色石印	一〇	休息
華洋印務	一〇	無休息
彩印工人	九	無休息
報紙工人	八(夜工)	無休息
店員	一二—一四	無休息
普通的	一二—一四	無休息
熟貨業等(特別的)	一七—一八	無休息
兵工廠	一二(加夜工則一五)	
造船廠	九	
鐵廠	一二	無休息

〔註〕這表也是不很完全，例如香烟廠就沒有。

### 三、勞動條件

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經營的工廠裡，部分的採用所謂「合理化」的方法，例如原來用蒸汽機改用電力機（如上海紗廠），原來用煤的改用煤油（如外洋輪船），許多廠裡改用最新式的精良機器，因此可以減少工人，而加重工作。並且因為中國農村破產更加擴大，勞動後備軍無限制的增多，所以更可以降低工資而加重工作；工人在失業恐慌的前面，不得不同意於工作的加重。中外資本家就用這個方法：不改良技術而減縮工人數量並加重工作。上海紗廠從前做十六支紗的，現在做三十二支，從前一人管理一部或二部機器的，現在要一人管三四部。華商工廠既然沒有資本去大規模的改用新式機器，又在外貨競爭之下，所以更加加緊剝削工人，提高生產率，節省生產費，裁減工人。於是原本很厲害的失業恐慌，弄得更加厲害。而資本家所開除的大都是成年男工和「不安分」的工人，採用新從鄉下來的女工或童工。

工廠裡對於工人的待遇，自然也更加惡化。革命時代所爭得的改良待遇，已經完全取消，工廠中從前的賞工，現在取消了。武漢總工會和武漢政府勞工部所爭到的女工產前產後一個月的休息，現在一天也沒有了。武漢童工爭得的參加童子團的自由，不做過重工作的條件，現在也取消了。打罵等的非人的虐待，更是數不勝數。

工廠裡的工人，現在必須有『保結』，而且要『聯保』。上海的工廠裡有特別的包探及巡捕；工部局的巡捕隨便進廠逮捕工人。武漢，河南（馮玉祥）的工廠裡，常駐着軍隊監督工作。

此外，工頭的勢力，經過赤色工會的打擊，曾經削弱了好多；現在又強大起來，例如碼頭工人卸貨是一角一分錢一噸，而大工頭抽五分錢，二工頭抽去三分，有時還有三工頭抽去二分，工人自己只能得一分錢。至於失業救濟，工廠衛生，死傷撫恤等，簡直無從談起。國民黨的『工農政策』和許多草案，完全和事實沒有絲毫關係，——只不過是國民黨武斷宣傳的一種材料罷了。

#### 四、失業問題

最近據中國報紙的統計，中國的失業數目，非常之多。然而中國並沒有失業登記，這統計不過是大約的估計，事實上還要多得多。漢口的失業工人是一〇三，〇五九人。廣州有八，七八四人——這裡沒有將革命工會會員從一九二七年四月間被開除及廣州暴動失敗後被開除，而至今找不着工作的三〇，〇〇〇人算在裡面。上海，據社會局根據官辦的一百十七『工會』機關的呈報，就有一五五，〇六九人的失業工人。浙江的杭州湖州，綢緞業倒閉了不少工廠，失業工人在六〇，〇〇〇人以上。山東失業工人有二——三〇，〇〇〇人，單是臨城礦工失業的就有二，〇〇〇多人。山西亦

停閉了不少工廠，那裡兵工廠都減少了三分之一的工人。北京失業的工人以及職員小官吏的數量，據英文報的消息上，簡直超過北京人口的百分之十六（一八七，〇〇〇）。單據上述的極不完全的統計，只就有數目的計算，已經有三七八，九一二人。此外，香港上海兩地失業的海員還有三〇，〇〇〇人。總起來說，極少的數目，總有五十萬的失業工人。

中國革命失敗之後，赤色工會所爭得的勝利，不但完全取消，而且工人羣衆的生活，更加惡化。所以不管白色恐怖如何厲害，黃色工會如何作惡，工人的鬥爭是沒有一天停止的。

#### 四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暴動之後，中國的革命受着極嚴重的打擊，中國共產黨和赤色工會的幹部，受着極大的摧殘，加以各地國民黨政府及資本家對於一般工人的進攻，開除『共產分子』，可以說：工人羣衆之中比較有鬥爭經驗的分子，差不多百分之八十是被殺的被殺，開除的開除了。然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只能得到暫時維持自己政權的局面，無論如何不能得到任何真正的政治經濟上的穩定，加以工人羣衆生活極端的惡化，使工人的鬥爭仍舊繼續的發動和發展，重新收容自己的力量，重新選拔自己的領袖，堅決的實行鬥爭。雖然赤色工會縮小到只剩極小的團體，雖然有政府工會的箝制，

雖然有黃色工會的欺騙，可是，工人羣衆自發的鬥爭，以及赤色工會在萬分困難條件之下所指導的鬥爭，仍舊是一天天的發展。我們只有上海的材料比較詳細，可是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知道上海，就可以推想到中國工人階級的一般鬥爭的情形。

第六表 上海一九二八年的罷工表

月份	罷工次數	罷工人數
一月	七	一〇・八一三
二月	八	七・二六五
三月	八	六五・一一三
四月	二	四・六七〇
五月	七	二・四九二
六月	四	六六・〇九五
七月	四	七・六九七
八月	一	一八・一〇二
九月	一	九・七五五
十月	一	九・〇七八
十一月	三	一一・五八七
十二月	三	

十二月

一六

二二·二三七

〔註〕這表裡的數目，從一月到四月是根據上海社會局的統計，從五月到十二月是根據上海總工會的統計。

總算起來，一九二八年上海總共發生罷工一百四十次，參加的工人有二三三、八〇二人。據另一個統計，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九月罷工人數是二三三、四三一，其中女工七一、三六九，童工一二，三八九人。

意大利和布加利亞，自從法西斯的政變之後，曾經有兩三年，甚至四五年，一次罷工都沒有，而中國自從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不到一個月，在赤色工會絕對的祕密條件之下，就繼續發生罷工的鬥爭，而且一年以來繼續增高起來。這很明顯的指出中國革命走向新的高潮的形勢。至於一九二九年的統計還沒有完全，就拿已經有的英文報的片斷消息來看，也看得出上海工人鬥爭的積極：

罷工次數

罷工人數

一九二九年一月

一一

六、四九一

一九二九年三月

九

一〇、六〇五

上海罷工運動，在廣州暴動與濟南慘案之間，是表示相當的消沉狀態，其中除絲廠女工罷工之外，大半都只是手工工人，尤其是店員的小鬥爭。濟南五三慘案的反抗運



動興起之後，工人鬥爭已經趁勢復興。尤其是國民黨『北伐完成』（六月）之後，一方面雖然南京政府製造統一中國實行三民主義的幻想，別方面，正是工人羣衆開始着重於反對南京政府及軍閥的鬥爭，暴露國民黨的欺騙政策。表上所指示的（六月之後罷工運動不間斷生長起來。尤其是十月間（正是南京政府慶祝統一蔣介石正式登極的時候），上海郵政工人的罷工，擴大到全國。這一罷工雖然受黃色工會的箝制和破壞，但是他客觀上直接反對政府，而開闢全國工人反守爲攻的道路。接着十二月上海法租界水電工人罷工，雖然屢次受國民黨的破壞，可是陸續爆發三次，時間延長到一個月的光景。華界電車工人亦提出條件，英界電車工人亦是如此；都得着相當的勝利。隨後上海就有棉織工人的罷工，中國造燈廠的罷工，滬寧鐵路工人要求加薪的鬥爭，商務印書館怠工，郵政快信工人罷工，新新公司工人罷工，英美煙廠工人的罷工，南洋煙草公司浦東分廠工人反對停工的鬥爭。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間，更有上海日商內外棉第七紗廠的罷工，吳淞興華紗廠罷工等，不斷的發展起來，顯然形成羣衆鬥爭向前發展的形勢。

上海一埠的情形，可以大概代表全國的形勢。

武漢工會受着的摧殘比上海尤其厲害，可是濟南慘案之後，工人鬥爭也同樣復活起來。大約和上海法界水電罷工同時，漢口發生日本水兵殺死車夫水杏林的事件，引起

八千多人的反日總罷工。雖然這次罷工受當時廣西派軍閥的利用和控制，可是罷工延長到二個半月以上。直到蔣桂戰爭時候，蔣介石亟亟和日本解決濟案，於秘密承認西原借款之外，更以嚴厲的禁止一切反日運動為條件，以換取有名無實的日本撤退山東的軍隊，漢口的反日罷工方才被國民黨政府所破壞。

廣東在廣州暴動之後，工會完完全全被摧殘，工會幹部幾乎全部被殺。可是濟南五三慘案之後，廣州電燈局鐵路工人有鬥爭；油業工人反對裁減工人；麵粉工人反對廠主減少工資的衝突；車衣女工的鬥爭；汽車工人的罷工。佛山油業工人反對開除工人而罷工；輪渡工人反對剋扣工資而罷工。東莞，石龍的長生店工人要求加薪而罷工。西江肇慶建築工人有鬥爭。其他南路的海口，北海，以及北路的英德韶關等處手工工人也有零碎的罷工發生。香港在一九二八年，如水師工廠，織造女工，太古糖廠，金銀業工人都有鬥爭和罷工，尤其是十一月十二月之間。

北方（京津）有特殊的環境，那地沒有經過赤色工會公開的時間，而且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最後取得的地盤。所以國民黨取得京津之後，不得不也設立官辦工會，以欺騙工人，製造羣衆的幻想，而阻止工人的鬥爭。可是，上海郵政罷工影響到北京天津之後，北方工人對國民黨的幻想極快的開始崩潰，其他工人也都發動鬥爭。原本『救民的北伐』口頭應允的很多，而北伐到北京之後，事實太不相符合了！北京電車工

人反對『國民革命軍』軍人不買票而凌辱工人，發生罷工；電燈工人要求加薪。天津英美煙廠工人提出開除工人須得工會同意等的條件，並發生罷工；裕元紗廠要求吃飯的休息時間而怠工關車；地毯工人也有鬥爭；京奉鐵路工人提出要求，今年三四月間使醞釀着全路的總罷工。最近三四月間滿洲就有十八次罷工。北方鐵路拖欠工資，各路工人索薪運動的鬥爭是到處發生。海員的罷工鬥爭也有好幾次，但是我們沒有得到材料。

此外，像廈門的錫工，煤炭工人，運輸工人和船夫；浙江杭州的織業工人，蕭山湖州的絲廠工人，寧波的紗廠工人，都有和資本家的許多衝突發生。山東淄博的礦工有過一次罷工。江蘇蘇州綢緞業染坊工人有一次大罷工，延長到二十餘天。江西的景德鎮盜業工人曾經有幾萬人的罷工。再則，像徐州不久以前，因為警察殺死車夫三人，全市工人總同盟罷工五天。這種小縣裡的罷工都顯然很快的漸變到政治罷工的性質。今年五一，五卅，直到八一，中國工人的示威罷工，以及反對南京政府侵犯蘇聯的游行及飛行集會，都在祕密的赤色工會和共產黨領導之下，每次比前次更多的調動羣衆，每次都有更濃厚的反國民黨政治色彩。五卅示威幾千工人搗毀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的報館（可惜我們現在只有關於這些示威的極簡單極零碎的片斷消息）。

再則，除一年半以來工人鬥爭的一般狀況以外，我們還有下列的關於上海的材料，可以更深一層的研究：（一）工人鬥爭的方法，（二）工人鬥爭的勝敗，（三）工人鬥爭的原因，（四）工人鬥爭的指導：——

第七表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上海勞資衝突的原因表

原因	原 月 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共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共計
資方破壞條件	三	四	六	三	五	一	二二	三	四	六	四	三	八	三一
開除工人	五	八	三	四	三	八	三一	二	二	二	一	三	八	二二
禁止工會拘捕領袖	二	二	二	〇	三	八	一六	三	二	一	一	三	八	一六
資方關廠減少工作	三	二	一	一	一	三	一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三	一〇
增加加工時	〇	一	一	〇	〇	〇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一
加重工作	一	一	一	一	〇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減少或尅扣工資	二	三	〇	二	二	一	一〇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一〇
尅扣紅利儲金	一	〇	一	〇	〇	〇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一
取消米貼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二
濫行罰金	一	二	〇	〇	〇	〇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三

(○六爲數分百)攻反人工

原因	原 月 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共計	包捐人雜費	惡劣待遇	共計		
要求簽訂或改訂條件	二	二	八	九	〇	五	二六	〇	四	二三		
要求加資	一	〇	一	九	七	二	七〇	〇	三	三三		
要求星期償工貼花紅	四	二	一	一	三	一	一二	〇	二	四〇		
要求改良待遇	二	四	〇	七	九	三	四五	〇	三	二二		
要求減少工時	三	二	一	一	三	〇	一〇	〇	二	二二		
要求開除工賊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三	〇	三	三		
要求減少車租床費	二	〇	〇	〇	〇	〇	二	〇	二	二		
要求減輕工作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二	〇	二	二		
要求取消包工制	一	〇	〇	〇	一	一	四	〇	二	二		
要求不中斷工作	〇	〇	一	〇	〇	〇	一	〇	四	一		
要求安插失業工人	一	二	一	〇	〇	〇	四	〇	一	一		
共計	二	二	八	九	〇	五	二六	〇	四	二三		

因原他其 八為數分百	統共計算	第八表				共計	打倒工賊	幫口衝突	其他	原數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	上海勞資衝突的方法表	共計	百分數					
	六三	五〇	五一	四一	四九	四三	二	二	二	二九七
	〇	〇	〇	二	〇	一	一	一	一	四
	〇	〇	〇	二	〇	一	一	一	一	三
	〇	〇	〇	二	〇	一	一	一	一	一
	四〇	二三	三三	二七	三四	二二	一七	九	九	二二

月份	衝突次數	罷工次數	請願仲裁(和平交涉)	羣衆行動(如關車等)	廠方讓步	廠方自動加資	第九表				共計	百分數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	上海工人鬥爭勝敗表	共計	百分數		
七月	三〇	一四	一一	二二	二	〇	〇	〇	〇	四	二	一〇〇
八月	三三	一五	一二	二二	二	〇	〇	〇	〇	四	二	一〇〇
九月	二四	一四	九	一三	一	〇	〇	〇	〇	四	二	一〇〇
十月	二九	一三	一三	二二	三	〇	〇	〇	〇	四	二	一〇〇
十一月	三七	二二	一一	二二	一	三	〇	〇	〇	四	二	一〇〇
十二月	三四	一六	一一	二二	二	〇	〇	〇	〇	四	二	一〇〇
共計	一八七	九四	六八	一〇	一一	四	〇	〇	〇	二二	一七	九

月份	衝突次數	百分數
七月	三〇	一〇〇
八月	三三	一〇〇
九月	二四	一〇〇
十月	二九	一〇〇
十一月	三七	一〇〇
十二月	三四	一〇〇
共計	一八七	一〇〇

完全勝利	五	一一	五	二	二	七	四	二五
部分勝利	九	四	四	四	一一	四	三六	一九
失敗	六	六	二	六	二	四	二六	一三
妥協及無結果	四	一〇	八	七	四	七	四〇	二一
未解決	〇	〇	〇	六	九	八	一三	一一
不明	六	二	五	四	〇	四	二一	一一

第十表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上海工人鬥爭的領導表

月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共計	百分數
衝突次數	三〇	三三	二四	二九	三七	三四	一八七	一〇〇
赤色工會	一〇	一一	九	七	二三	一〇	七〇	三七
黃色工會	三	五	五	一	〇	九	二三	一二
自發的	一七	一七	一〇	二一	一〇	一五	九〇	四九
不明	〇	〇	〇	〇	四	〇	四	二

〔註〕第七表的衝突總數是二九七，這個數目和前一表以及第八九十表都不相符合，不知道是甚麼原故（據其他的表總數是一八七）。

上海勞資衝突的這些統計，表示着：（一）半年以來工人的鬥爭，是由反抗資本進攻

逐漸進到工人進攻資本，雖然反守爲攻的過程還是很遲緩的，但是這種趨勢是很顯然的；(二)和平交涉及請願仲裁的鬥爭的方法逐漸進到直接行動及罷工怠工的方法；(三)鬥爭失敗的次數比較的減少，而勝利及部分勝利的次數比較的增多；(四)自發的鬥爭雖然大致都占着極大的百分數，可是黃色工會領導的鬥爭並沒有增長的趨勢，而赤色工會的領導却很慢的日益加強；(五)此外，還有一件事是可注意的：就是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參加鬥爭的工人大半是店員和小工業裡的工人，下半年却是大工廠工人顯然的積極起來；(六)一九二九年（上海法界水電公司罷工之後）這些趨勢尤其明顯起來；而五一五卅及八一的示威，更可以證明中國工人的經濟鬥爭一天天更多的轉變成政治鬥爭。

大概而論，中國革命第一次高潮受着打擊之後，職工運動復興的過程裡，尤其可特別注意的是：(一)一九二七年以前，罷工鬥爭大致偏重於外國企業，現在恰好相反，中國企業之中的衝突和罷工，比較的占着極大的百分數（據另一個統計，一九二八年上海一百廿次的罷工之中，有九十八次是發生於華商工廠的，八次發生於美廠，七次發生於日廠，九次發生於其他外廠）；(二)不但上海，而且北京廣東以及各地工人的鬥爭，很多發生在政府所辦的企業；如果以前大半是利用國民黨民族主義的口號激起工人反對外國資本家和租界政府，那麼，現在却很多由反對軍閥反對國民黨的鬥爭進到廣大羣衆的政治行動（例如，徐州工人反抗警察殺人的罷工，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都沒有看見過



這種性質的運動)。

但是現在中國職工運動的特殊點，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形勢，應當是我們職工運動的方法和策略的出發點的，這就是國民黨的統治和北京政府的統治的差異：——(一)現在，國民黨的一切政府不得不使工人的經濟鬥爭合理化，容許工人的經濟鬥爭，同時，却用極端殘酷的白色恐怖對付赤色工會(共產犯)；(二)現在，國民黨利用民族的社會的武斷主義設立官廳似的工會，控制工人運動，同時，也就造成一種條件，利於黃色工會的發生。

這兩種新的形勢，使職工運動的發展趨勢及現時狀況，和五卅時期比較起來，有極大的區別。此外，現時的職工運動，在消沉之中復興起來的過程裡，部分的也正因此而有：(一)極大的散漫無領導的自發的情形；(二)極端畸形的組織方式。

國民黨統治之下，中國職工運動的前途，不是赤色工會的合法的公開，而是極殘酷猛烈的鬥爭；不是國民黨政府和黃色工會的民族改良主義影響逐漸穩定和發展，而是黃色工會日益明顯的生長成爲政府的官僚和資本家的公司工會的職員，日益施用公開的屠殺壓迫以及法西斯蒂的手段。所以雖然現在赤色的領導非常之薄弱，工會組織非常散亂而沒有鞏固的羣衆基礎，罷工鬥爭大部分爲黃色工會及國民黨所破壞而失敗，羣衆之中還有許多合法主義的情緒，——然而赤色工會運動的發展前途是非常偉大的，只要真

正能夠根據現在新的形勢（白色恐怖和黃色工會），找着適當的工作方法，組織方式和策略，準備那猛烈殘酷的鬥爭。

廣州暴動失敗之後，赤色工會受着如此之大的摧殘，簡直是等於大部分的消滅；可是，工人生活狀況的惡化和資本的進攻，也是如此之厲害，使上海以至全國工人的經濟鬥爭沒有一天間斷的發展。極端祕密的赤色工會能够因此而逐漸恢復擴大。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中國職工運動在絕對新的形勢之中，經過一九二八年五三慘案的運動，經過一九二八年十月郵政罷工和十二月上海法界水電工人罷工，而達到今年的五卅總示威（八一示威的材料還沒有）——這一年半的經驗，已經很明顯的指出赤色工會發展的前途。今年五卅的前後，香港有十六次的罷工，天津有六次罷工，唐山礦工有怠工運動，甚至滿洲也有十八次的罷工，——在中國共產黨和赤色工會指導之下，都得着相當的勝利。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中國工人運動的怒潮，已經有許多新的徵兆，即使這些徵兆還是很薄弱，可是革命新高潮向前進行的趨勢，確是非常明顯的了。只要看上海五卅示威的形勢：

「五卅之前，赤色工會在各工廠號召羣衆的籌備五卅會議，例如在黃色領袖把持的郵務工會裡，開代表大會，羣衆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口號，一致高呼打倒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統治階級預備着嚴厲的壓迫，可是看見羣衆革命情緒的高漲

，到五卅那天，不敢不稍稍緩和；廣大的羣衆，不管什麼總理奉安，在上海馬路上，尤其是南京路，舉行嚴重的示威，並且搗毀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報，使國民黨政府及上海工部局政府一再禁止集會遊行的命令等於廢紙。……示威繼續到六小時之久，經過巡捕警察不斷的衝擊，被捕一百餘人之多，羣衆始終沒有畏怯退縮。……：那天有許多工廠之中宣佈了罷工，就是不能罷工的工廠裡也實行幾小時的關車怠工。……五卅之前，從五一一起，上海郵務工人，電車估衣藥業棉織工人，振泰申新的紗廠工人，已經不斷的起來鬥爭；而且這些鬥爭已經極大部分在赤色工會領導之下，和五一以前許多工人鬥爭大部分在黃色工會（改組派）和國民黨地方黨部領導之下，的情形不同。……國民黨改組派和黃色工會在五卅示威之中，既不敢公開反對示威，又只在暗中行施破壞的陰謀，企圖掩蔽自身的政治面目。五卅示威，表示羣衆和統治階級直接的衝突裡，改良派喪失在羣衆之中的政治作用。……五卅之後只有十天，而碼頭電車華商水泥工廠，甚至黃色領袖把持的商務印書館工會底下的工人羣衆，都起來鬥爭」（李立三：一九二九年五卅示威運動的意義和教訓）。

可以說：中國最近革命鬥爭的形勢，是羣衆在革命失敗之後已經開始反攻的嘗試，衝破國民黨的合法主義，積極的反抗白色恐怖的壓迫和中外資本的進攻——羣衆對於豪

紳資產階級的高壓，已經是在實行積極的反應(Active Resist)。

所以，共產黨和赤色工會，應當在組織上更加加緊的鞏固自己對於羣衆的政治影響而這種影響正在日益擴大起來；而在策略上應當更加堅決的進行反對民族改良主義和黃色工會鬥爭的任務，——這都格外的重要起來。

## 五

中國現在職工運動裡的問題，首先便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政策和黃色工會的問題。

白色恐怖對於一切革命的工會和工人，都是極殘酷的壓迫，赤色工會不能有絲毫的公開可能——差不多「凡是不反對共產黨的，都是共產黨；但不准組織工會，並且就要開除出廠」，成了國民黨統治的法律。因此，國民黨的工會便成爲唯一的公開工會，他們獨占公開的可能。

國民黨的工會是甚麼？中國革命高潮之中，工人羣衆的鬥爭，從民族主義的經濟罷工（外國工廠裡的罷工），進到一般中國工廠裡的經濟鬥爭，引起極廣大的手工工人和店員的參加；這種反帝國主義總運動裡的工人鬥爭，差不多一開始就同時是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並且很快的生長而成爲直接反對當地政權的（反對軍閥國民黨的）政治鬥爭——形成政治的總同盟罷工，而近於武裝暴動（一九二七年上海的三次暴動是最明顯的形式，其實武漢時代湘鄂贛各縣的工人運動也都帶着這種性質）。既然如此，中國

資產階級，蔣介石汪精衛的陸續叛變，首先就遇見工人階級方面的嚴重的仇敵。國民黨要轉變成爲豪紳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反動聯盟，要阻止革命的前進，就必須要企圖將工人運動裡的革命領導消滅，並且將工人運動的領導拿到國民黨的控制之下。所以國民黨還沒有叛變之前，「誰應當是民衆運動的領導者，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這一問題已經是兩黨之間爭論的焦點。國民黨當時已經在工會之中組織工賊，可是他始終不能用任何別的方法取得工會的「領導權」，除非是用政權的壓迫；因此，國民黨在蔣介石李濟汪精衛的陸續叛變之中，就只有兩個辦法：（一）是用武力解散「共產黨的工會」，用組織流氓搗毀工會虐殺工人的方法消滅赤色工會；（二）是用政府（亦就是黨部）派遣官吏來「改組」「整理」「統一」工人運動，設立一種專管工人的特殊官廳（某某工會改組委員會，工會統一委員會，工會整理委員會等）——這就是所謂國民黨的工會。國民黨反動的時候，不能完全消滅工會，回復到北京政府統治之下的狀況，而必須設立這種假工會，——這一部分也是因爲當時的革命形勢，確有工人階級取得優勢而進於工農民權獨裁的更高階段的可能，所以蔣介石等要運用民族的社會的武斷主義（例如完全照抄上海總工會的要求大綱，來做上海當時工統會的招貼），用工會的名義來強制工人停止革命而等待國民黨實現民生主義。就是廣州暴動失敗之後，革命的第一高潮已經受着極嚴重的打擊而低落下去，工人羣衆的經濟鬥爭當日仍舊繼續不斷的發生。

如果沒有這種很快的轉向新的革命高潮進行的形勢，也許國民黨的工會，就永久是簡單的一種壓迫工人的特別官廳，以至於完全取消。可是，事實上，國民黨逼得不能不承認工人經濟鬥爭的合法，不得不把官辦工會變成勞資仲裁，調解衝突的機關。所以國民黨的工會，就成爲壓迫工人政治鬥爭的官吏偵探的組織和強迫仲裁工人經濟鬥爭的流氓工賊組織。這種工會，是沒有會員的；所謂工會就是一個官廳黨部指派的職員所組織的機關，這些人都是工賊流氓，頂着工會名義來壓迫工人的鬥爭。但是，後來工人鬥爭實際上極勇猛的不斷發生，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又不能統一穩定，引起國內戰爭和各派國民黨政客的衝突，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賣國的情緒日益濃厚，反對國民黨軍閥豪紳資產階級專制的羣衆運動儘在醞釀着，——總之，就是國民黨「北伐完成」後的絕大失望和革命運動的復興，使國民黨的執政派，連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欺騙力量都逐漸喪失，而對於日益發展的新的工人經濟鬥爭潮流，更是不能希望完完全全全鎮壓下去。於是國民黨政府，設法用法律手段限制民衆的鬥爭，例如工會必須登記，開會必須呈報，一切民衆團體選舉職員必須官廳黨部的批准，罷工或示威必須備案等等。這一方面是工人鬥爭發展的反應——不能完全用屠殺壓迫的政策消滅工人的鬥爭，就不得不用所謂合法的手段來控制民衆運動；別方面也是國民黨內部崩衝突的結果，——國民黨內發生所謂改組派，並且蔣派桂派馮派的鬥爭劇烈起來；單是用國民黨員名義去組織工會

等等的人，未必就是當地政府執政派的國民黨，所以國民黨政府在每一區域都要防備自己內部的派別利用工人『搗亂』。黃色工會就在如此的情形之下發生並發展。黃色工會的特別地位，就是他不像其他的官辦工會一樣，專門壓迫工人的鬥爭，專用告密逮捕開除等的強硬手段，而是對於羣衆大部分用改良主義的欺騙方法，有時還領導工人做經濟鬥爭，他被羣衆鬥爭逼迫着，起來用妥協方法求點生活上的小小改良，以緩和羣衆的革命化；他在組織上要想籠絡羣衆，例如職員用選舉方法選出，討論工會會務和爭論用表決方法的等等；自然，羣衆反對領袖的鬥爭激烈起來，無法實行妥協政策的時候，黃色工會也用政府勢力來恐嚇壓迫。黃色工會必定接受國民黨部和政府的指導，他對於當地政府，是處於『恭順的在野黨』的地位，和第三黨或改組派一樣；對於資本家，是向他替羣衆要求些小利益，以緩和羣衆的鬥爭，以合法的和平的妥協方法來消滅羣衆的直接鬥爭；如果羣衆革命情緒高漲鬥爭劇烈起來，他立刻就和本家妥協，以領導罷工者的資格來破壞罷工。黃色工會發生之後，國民黨的工會又多了一種形式，這是阻礙工人革命化而和資本家妥協的工頭組織。

國民黨工會的社會基礎是甚麼呢？國民黨工會大致可以分做兩種：（一）是政府工會，（二）是黃色工會。有時，也可以看見介乎兩者之間的『政客工會』，譬如李濟琛派的官僚，曾經在上海執政，組織了某幾個政府工會，經過政變之後，政權移轉到蔣介石

派手裡，李濟琛派的官僚變成在野的政客，這種政客所把持的工會，也會「發動」工人鬥爭，去和執政的人搗亂（閩錫山境內的蔣派工會，蔣介石境內的馮玉祥工會等，都有這種可能）。再則，一般來講，國民黨工會（政府工會和黃色工會）都帶着法西斯的性質和趨勢。「法西斯的」並不是簡單的「反動」「白色恐怖」的代名詞，他正是政府或資產階級把持「民衆團體」，而且總是依據在和政府機關或工廠管理機關混合生長的分子身上，以鎮壓工人革命鬥爭而鞏固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對於工人階級和勞動民衆的統治之一種工具。國民黨施行製造御用的民衆團體的時候，國民黨工會的社會基礎，正好是中國的工頭和小資本家式的手工業主，或者小股東式的公司職員。

政府工會只是國民黨御用團體的最初形式，他的組織成分直接的工賊流氓。這些工賊流氓，在中國的數量很多，向來是職業的刑事犯，同時，也是官廳的包探，而且他們總是青紅幫方式的「秘密結社」的頭目。他們利用這種秘密結社裡的線索，能夠控制一下羣衆。他們也會借着工人鬥爭的勢力，向各個資本家敲竹槓，自己賺錢，出賣羣衆。他們以強暴的手段和軍警的武力，搗毀赤色工會……盡了他們保護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責任之後，在繼續發展的羣衆經濟鬥爭裏，不能延長自己的生命，敲詐工會會費，公開破壞罷工，實行包探職務的情形，極快的自己暴露極鮮明的工賊面目。所以這種工會事實上不是消滅，便是必須轉變成某種形式的黃色工會。國民



黨工會的組織，被羣衆鬥爭所逼，必然的要從這種公開官吏機關，轉變到比較暗藏的官吏機關——黃色工會。流氓工賊的工會職員，本來是極公開的一種政府機關的胥吏。黃色工會的職員便是生產機關之內的胥吏了。

黃色工會的組織成份，極大部分是工頭。工頭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原本是一種差役，——現代拉夫的警察軍官也有同等的任務，——清朝監商或者縣官辦理『工程』的時候，就有這種人包辦招募夫役的工作。各大城市發生之後，種種苦力，挑夫，碼頭工人都有這種工頭。並且因爲工人都是從農村中新來城市的，他們的工頭自然利用同鄉的苦力不知道大都市的一切手續規矩，去招募他們，而從中剋扣『餽錢』——『抽頭』。工廠之中也很多保存着這種包工制度：資本家包給工頭，工頭經手付工錢，例如一件工作，工頭包下來，答應幾天可以完工，總共多少錢；此後工頭去僱多少工人，每個工人得多少工錢，資本家可以一概不問了。這種制度的種種變相，可以在最新式的工廠裡還保存着自己的勢力。現在上海工廠之中：絲廠有所謂『管車』，紗廠有所謂『工頭』或『拿馬溫』(Nol)，煙廠有所謂『先生』，商務印書館的『職員』，郵政局的『郵務生』……都是這種工頭或變相的工頭——監工。此外，還有一些所謂『工人』或職員，或者因爲同鄉親戚的關係，或者簡單的因爲自己有些小資本，他們成爲那工廠或商舖的小小股東（例如新新公司便有這種店員）。他們亦有工頭同等的地位。工頭的地位是甚

麼？就是工廠或商店的管理機關的一部分，而且直接掌握着工人的賞罰生死之權。管理機關聽着他們的呈報而決定工人工作的好壞和去取。再則，中國手工業的行會本來是業主和工人混合組織的；破產失業是常事的中國，有許多手工工人在兩三個月以前還是『獨立』的業主。這種『手工工人』的組織（例如廣東的廣東總工會），一到工人羣衆鬥爭劇烈的時候，自然變成反動的，公開擁護資本主義的團體。這些工頭，小股東式的職員以及手工業主，便是國民黨工會的社會基礎；——從『失業胥吏』（流氓）移轉其基礎於『在業胥吏』（工頭），使國民黨工會從純粹的政府工會變成黃色工會的轉變。

很顯然的，這種基礎上的改良主義，決不能和歐美的社會改良主義一樣。中國資產階級，那裏能夠有『額外利潤』來形成歐美式的勞工貴族呢？中國職工運動裡的改良主義——無論政府工會和黃色工會，都只是中國資產階級機體之內的一部分，他們只能有中國資產階級的意識：——『民族高於階級』，『爲民族利益犧牲階級利益』，『努力生產以富強中國』，『中國只有大貧小貧，要一致對付外國的真正大資本家』，『階級合作勞資調和』，『服從國家命令，尊重黨國威信』等等的武斷宣傳，便是國民黨工會的主義。

黃色工會運用這種宣傳，並不能取得真正的工人羣衆。黃色工會最主要的征取羣衆的工具還是他的官吏地位：在政府系統上，國民黨的工會是黨部（政府）的一個國家

機關，在企業系統上，牠是公司工廠方面的一個管理機關。工人羣衆，一方面受着白色恐怖（殺頭）的恐嚇，感覺到已經沒有每一次經濟罷工都可以轉變成爭取政權鬥爭的形勢，別方面所受的剝削異常之嚴重而有迫切鬥爭的需要。於是黃色工會的合法主義，便在羣衆之中發生一種吸引力。『我們要改良生活，但是要走出法律的範圍』。

政府工會要在羣衆之中取得些影響，他也必須對於工人這種迫切的鬥爭，加以領導請願，或者設法調解實行仲裁，使每次勞資衝突有個解決；再進一步就要由工廠裡的工頭起來調解，起來勸導工人走上法律的軌道，工頭自己也借着羣衆勢力爭些利益，以爲出賣羣衆的代價，……以至請大家選舉工會職員，由黨部去批准等等，這就轉變到黃色工會。羣衆對於這種工會就有願意加入的。因爲他不但是『有根的』，而且是可以有法律的地位來領導些經濟鬥爭。凡是羣衆鬥爭發展厲害的地方，國民黨的工會，就比較快的轉變到黃色工會。所以五三慘案以後，上海，北方，隨後浙江，福建，安徽等處，黃色工會就急急的起來抓拿羣衆。也因爲這個，國民黨改組派才能侵入北方的工人羣衆，告訴他們：『國民黨的主義是好的，但是某某軍閥不好，我們可以站在國民黨的地位去攻擊他，他沒有辦法』。國民黨的改組派這樣鑽入黃色工會，做這樣宣傳，並不在北方上海，但是，因爲廣東武漢等處，工人鬥爭比較上海北方發展的遲緩些，所以廣東武漢就沒有多大的黃色工會。可以說，黃色工會影響的發展，也正是工人羣衆鬥

爭劇烈起來的反應，——他們竭力在拉住鬥爭起來的羣衆，使他們不要革命化。

國民黨的政府工會有羣衆沒有？亦可以說有，因為，如果唯一公開的機關，可以去告狀的，就只有這一政府工會，那麼，羣衆自然要去請求他。這種工會本來無所謂會員，所以說全工廠的工人都是他的會員，也是可以的。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北方初有國民黨辦工會的時候，羣衆之中有些工人說：『我們去找那些工會先生，他們是有根兒哩！』什麼叫根兒？就是說這些『工會先生』是和新來的國民黨軍閥有關係，說起話來，在資本家和官廳方面是佔面子的。至於黃色工會，或者在野政客（自然都是國民黨員），能夠鼓動起小小鬥爭，根據國民黨的法律說話，甚至還請『工友們』大家來商量表決，那是更可以利用解決目前的迫切要求。所以政府工會有時也能欺騙羣衆，因為他自己『是官』。黃色工會，也能夠抓拿羣衆，因為他至少是『紳』。黃色工會對於官廳站在『尊敬的在野黨』地位，對於資本家處於講價錢的工頭地位，他們的合法主義，對於羣衆革命鬥爭的發展，自然比政府工會有更大的危險。

現在否認國民黨工會有羣衆，——同樣是共產主義的誇大狂，和革命時期認為一切中國工會都是十二分的共產主義工會和產業組織的工會是一樣的。

中國現在的國民黨工會之中，自然還有很多純粹的政府工會，可是許多地方的國民黨地方黨部，國民黨整理工會委員會，國民黨指導工會委員會，國民黨民衆運動訓練委

員會等類作機關，以及他們所指派的工會機關，都相當的轉變到上述的黃色工會的作用；上海所謂七大工會（商務，郵政等），工會行政雖然相當的獨立，而在政治系統上，亦是直接受國民黨黨部指導。這種工會，企圖組織羣衆，而控制羣衆的鬥爭。這種工會的性質，實在是法西斯的組織。有一個外國字，叫做「混合生長」（Stachewarn）），西歐的共產黨現在說：工會官僚和國家機關及財政資本混合生長起來了，所以社會民主黨轉變成法西斯的派。中國的黃色工會（國民黨工會）呢？他的社會基礎，原本是中國資產階級，以至於外國資產階級企業機關裏的管理員（工頭），原本是官廳政府的小官吏（包探和黨部委派），原本是工廠和公司的小股東，原本是店東業主——受銀行錢莊所支配的「最小資本家」。紅利分配制度，階級調協主義，是這種人天性裏生成的「理想」——是中國資產階級順手得很的社會武斷主義。中國黃色工會的工會官僚，是「天生成的」，是現成的，是已經和國家機關及資本主義「混合生長」着的東西。所以黃色工會的發展，並不是甚麼中國資本主義穩定而開關民主自由時期的徵兆，並不是赤色工會可以走向經常合法的存在前途的標誌；而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方面，在新的革命高潮和劇烈的階級衝突的前夜，收集自己的力量，組織自己的戰士，準備決一死戰的「籌備事業」。革命高潮到來，階級衝突擴大範圍的時候，這些黃色工會也就要比一九二七年間的流氓工會，要更加有組織的更加週密的更加殘酷的實行反革命的屠殺

壓迫政策——執行豪紳資產階級的命令。現在，每次罷工鬥爭之中，每次勞資衝突之中，黃色工會已經是比政府工會，『更有組織的』，更能巧妙應付的出賣工人；現在，中國的黃色工會已經發狂似的反對共產黨，反對革命工人，時時實行告密：逮捕革命工人，開除革命工人等等。黃色工會的選舉必定要國民黨批准，如果羣衆推選革命份子，立刻這些革命份子就有被捕和開除的危險（今年五卅之後，上海郵務工會要轉到赤色工會方面來的時候，立刻就被解散改組）。所以黃色工會在羣衆裡的『影響』，並不在於他用欺騙的方法籠絡羣衆，而同樣也因為有政權的威力在他的後面。赤色工會的任務，最主要的便是和這種黃色工會爭取羣衆，暴露黃色領袖的真面目，組織上鞏固革命的影響。

## 六

赤色工會現在的情形，經過如此之大的屠殺和摧殘，實際上只剩得工會的幹部，散在許多工廠和產業裏。正因為恐怖的關係，許多赤色工會的會員，自動的組織許多很小的兄弟團，姊妹團館口等類的原始組織。一方面這種情形，表示赤色工會的進步，組織上已經是工人自己感覺到必要而有相當的團結，不像五卅時期，工人完全等待上級的委派及英雄式的『好學生先生』；別方面仍舊暴露幫口主義（青紅幫式）的鬥毆團體的傾向，同鄉會性質的原則及行會主義。同時，就是在黃色工會內部，革命工人的反

對派，也有同樣的毛病。而上層的赤色工會機關，仍舊不免於命令主義和委派制度的空機關的辦法。而且赤色工會之內的工作裏，更發露許多經濟主義的傾向，傳染着行會主義的習氣（店員之中）。因為黃色工會的影響發展，職工運動之中更有發生勾結手段的上層聯絡的危險；現在共產黨之中不但只有口頭上要到黃色工會裏去，工作的決議，而沒有切實的工作（相當的『左派』情緒和宗派傾向還是存在着），而且還發現取消主義的主張，說完全要在黃色工會裏工作，最好取消赤色工會，否則國民黨要說我們分裂統一的工會。說工廠裏不經過黃色工會的答應，不可以有所動作，或者說一定要『強迫黃色的或畏懼的領袖來執行』我們的主張（今年五卅紀念示威時）——這簡直是尾巴主義和合法主義。

黃色工會正是利用羣衆的恐懼白色恐怖，來實行他們的合法主義和經濟的主義宣傳，正是利用幫口同鄉以及秘密結社的線索來實行他們委派任命批准的及少數流氓工頭包辦的組織。共產黨必須勇敢的起來取得正在興起的經濟鬥爭的領導，動員羣衆，實行羣衆自己的組織，正確的進行反對幫口同鄉主義等的鬥爭。

當然，首先要掃除『宗派主義』的殘餘——掃除不肯到黃色工會裡去工作的動搖和猶豫。共產黨及革命的工人，必須加入一切有羣衆的國民黨工會裡去。同時，必須掃除職工運動歷史上的遺毒：藉口反帝國主義而模糊階級鬥爭，任其自然的爆發經濟鬥

爭而不能在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影響，用委派制度建設空機關而沒有羣衆的組織基礎，認爲加入黃色工會是聯絡黃色領袖（或流氓領袖）的統一戰線，遷就黃色工會影響而不敢發動政治鬥爭（所謂『不要幻想政治鬥爭』的口號是經濟主義的標本）。更加重要的，是要看出工人鬥爭發展的前途，及黃色領袖必然日益公開暴露工賊面目的趨勢，所以要明顯的看赤色職工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恢復並鞏固秘密的赤色工會，實行獨立領導羣衆的經濟戰鬥，引導工人的經濟鬥爭到鮮明的政治鬥爭，——階級反對階級的鬥爭，而向着革命的新高潮進行。這種過程之中，就要日益動員廣大的羣衆，去反抗黃色的國民黨領袖。如果存着一種幻想，以爲這些領袖雖然懦弱，只要羣衆威迫一下，也會革命起來；如果甚至於主張在黃色工會之中一切行動都要得着黃色領袖的應許，方才可以進行，那就是右傾的合法主義和取消主義！黃色工會的所謂選舉，所謂表決，是顯然的騙局。既然準備羣衆提出革命的口號和提議，就要準備黃色領袖狡猾的作弊或者用政治威力來破壞多數的決議。我們應當明白：如果沒有勇氣去打破黃色工會的合法主義，揭露他們的真面目，同時由羣衆自動手的進行這些革命決議，以至推翻黃色領袖，那就是幫助黃色領袖的賣階級。必須堅持着這些原則去加入黃色工會。

革命的中國職工運動，現在必須認清自己的根本任務：是調動羣衆組織羣衆，取得正在興起的經濟鬥爭的領導，引導這些鬥爭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這就是說，鮮明的表



顯整個無產階級對待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在組織上就是要建立真正羣衆自己的基礎組織，力爭革命工會的自由，和黃色國民黨工會作長期艱苦的鬥爭——掃除羣衆之中幻想『青天白日大老爺』公正調解的合法主義。因此，就要努力去掃除中國工人階級裏許多落後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掃除以前赤色工會運動的惡習氣和機會主義的餘毒。——黃色工會影響的發展，正是利用羣衆裏的這些委派命令主義和同鄉帮口關係等的餘毒，正要用『小百姓向官紳請願』的方式阻滯工人運動的前進，而反對階級鬥爭的開展。同時，赤色工會還要巧妙的去聯結公開的和秘密的工作方法，深入羣衆，建立羣衆之中秘密的革命組織的鞏固基礎和鬥爭幹部。如果以爲現在形勢之下，赤色工會能够和平的取得黃色工會的機關，彷彿只要羣衆都贊成赤色工會便可以得國民黨政權和法律的允許，使赤色工會合法的經常公開存在，那就是很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和幻想。現時的情形是：工人生活程度急劇的惡化，自發的經濟政治鬥爭衝破殘酷的白色恐怖而日益發展。所以革命職工運動的三大任務：（一）獨立的領導經濟戰鬥。（二）發展赤色工會並在黃色工會之內爭取羣衆。（三）建立基礎組織及工廠委員會運動，取消機關主義，不但有極大的可能可以實現，而且更加有萬分的必要去堅決的實行。只有這樣，才能爭取工人階級的羣衆，走向革命的新高潮。

第一、必須要取得罷工運動和羣衆鬥爭的領導，赤色工會方才能擴大自己的影響，

而成爲真正羣衆的組織。就算只有極少數無產階級的工廠或產業裏，也必須要會利用工人羣衆的不滿，團結積極的無黨工人，組織一種「工會小組」性質的團體，領導他們提出當地當時最迫切的部分要求。經常的宣傳鼓動；每次衝突或罷工沒有發生之前，就要能够用這種方法去取得領導。這種工會小組的組織，可以利用原有的兄弟團姊妹團等類的組織和線索，逐漸改造，使他們脫離許多行「主義式的習氣，而形成階級的鬥爭團體——工會幹部的組織。這些每一工廠每一產業的部分要求綱要，應當時常按照環境而變更，應當成爲日常工作的行動大綱。只有這樣深切的和羣衆日常生活聯繫起來，取得鬥爭的發動者和領導者的地位，赤色工會方才能够打倒政府工會和黃色工會。

第二、鬥爭或罷工發動之前，以及進行的時候，必須設立鬥爭委員會和罷工委員會性質的組織。這種組織一定要是廣泛羣衆所推選出來的，一定要和鬥爭的羣衆有密切的關係。這樣鬥爭罷工委員會，真正和羣衆密切的聯結着，取得鬥爭的實際指導權，就可以戰勝國民黨工會和官廳的破壞罷工的把戲，就可以抵抗白色恐怖的壓迫。共產黨和赤色工會的注意，要完全放在準備經濟衝突和政治衝突上，要能及時的去組織廣泛的罷工鬥爭委員會，吸引最積極的工人加入，而去指導鬥爭。衝突或罷工終了之後，這種鬥爭委員會或罷工委員會，自然要變成監督執行條件的機關，並且直接改造成爲工廠委員會性質的組織。

第三、共產黨支部和工會小組在工廠商舖裡的經常有系統的工作，不論是否有過衝突或罷工，都是要努力去創造工廠委員會。這就是說，要及時提出羣衆之中成熟起來的要求，發動羣衆的不滿（像第一項所說的），以造成建立各廠全體工人的代表機關（工廠委員會）的前提。工廠委員會應當是經常的機關，定期改選的機關，應當和全體工人發生密切的聯繫，真正能代表一般羣衆。工廠委員會和鬥爭罷工委員會不同的地方，就是鬥爭罷工委員會是臨時的；如果已經有工廠委員會的工廠裏發生罷工，那麼，罷工委員會的組織，就沒有特別的設立的必要或者應當是工廠委員會所委託的行動委員會的性質。或者是工廠委員會臨時擴大的組織。工廠委員會現在是全體工人的代表機關，那麼，在赤色工會祕密的條件之下，他決不能代替赤色工會，因為工廠委員會是一種執行機關，他本身無所謂會員（只有委員），無所謂會費等等的。當然，如果工廠委員會能夠公開存在，工會組織成爲極有系統的產業組織，那麼，工廠委員會同時就是工會最下層的基本組織（每一工廠裡的工會）的執行委員會。

中國現時的工廠委員會問題，只是在無論有無國民黨黃色工會的一切工廠商舖輪船車廠礦山裡，要實行一種工人代表機關的運動。這一問題是國內實際職工運動裡最模糊的問題——至今還是沒有開始執行。

中國現在的白色恐怖和官廳工會政策之下，是不能達到工廠委員會的公開存在的。

然而在堅決的鬥爭之下，在不斷的領導羣衆行動之下，在勞資衝突和罷工發展之下，在許多次鬥爭委員會罷工委員會等組織過程之中，應當去力爭，並且有可能建立工人代表機關的某種形式，名稱不關重要，只要羣衆的力量發展（如罷工之相當勝利）就可以達到公開組織某廠『工廠委員會』『勞動保護委員會』等——就可以達到某一時期裡某工廠有全體工人代表機關之存在。最主要的當然不是名稱，而是羣衆感覺到自己真正的代表機關的力量，感覺到真正羣衆自己的組織之必要，而掃除對於國民黨辦工會，官廳（黨部）委派工會，或職員工頭黃色工會之依賴心。工人運動高潮的開頭，這些工人委員會，工人代表團，勞動保護委員會……等名目的機關，就可以成爲真正工廠委員會的出發點。

第四、赤色工會經過自己的工會小組，運用鬥爭委員會，罷工委員會以及工廠委員會性質的組織，去爭取工人經濟政治鬥爭的領導，並且獨立的去發動羣衆行動，同時，必須要鞏固擴大自己的組織基礎，力爭工會組織的公開和自由，在工人鬥爭高漲的開頭自動的公開起來。最初的步驟，就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組織赤色工會的公開團體：工人互助會，體育會……以及其他各種各式可以公開的名義。重要的是：要工人和女工並工，感覺這種組織是他們自己的組織，是工廠內鬥爭的積極幹部，是以擁護工人利益爲任務的。這種組織就是赤色工會小組的公開名目，實際上要做鬥爭委員會罷工委員

會，工廠委員會運動的核心。這種公開名義的團體能不能夠長期存在呢？不會的。

這種組織發生了，經過幾次鬥爭，就會被封閉，又應當重新更換名目創立起來，再造成某種『中立』組織，做赤色工會的招牌。赤色公會的這種公開方式是非常之必要的，要使羣衆分辨黃色領袖國民黨工會和革命工會運動的面目。所以應當儘可能的去進行這種工作。工廠之中提出當時當地的行動大綱（部分要求），提出每次鬥爭的口號和要求。都不必用當地赤色工會小組的名義提出，儘可以用這種公開團體的名義就夠了。用他們名義提出的要求，應當變成羣衆的，就是鬥爭罷工委員會以至工廠委員會的決議，和黃色工會領袖的政綱對立起來，以暴露黃色領袖的面目——官吏工頭的面目。

自然。凡此一切工作之中，應當記住：嚴重的白色恐怖和極端祕密的條件之下，極廣泛的羣衆是不能組織的，只能組織最先進的分子，共產黨員和積極的無黨工人。所以，必須找尋許多公開形式，來擴大赤色工會的組織。只有堅決的反對一切命令主義委派制度的遺毒，努力領導一切日常鬥爭，建立羣衆的基礎組織，運用工廠委員會的方式……可以使巨大高潮起來的時候，赤色工會能够在極廣大的羣衆基礎上公開起來。因此，赤色工會的領導機關，如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總工會，以及其他地方赤色工會的祕密聯合，都要一方面在組織上極切實的和羣衆基礎組織發生密切的聯繫，去掉一切委派制度空機關的習慣，別方面，在政治上要經常的有系統的號召並發動羣衆的鬥爭，

根據於最日常最切實的羣衆需要之上，並且綜合各廠各業各地的工會小組所提出的行動大綱，加以確當的指導。赤色工會的領導機關，只有如此，才能鞏固擴大自己在羣衆之中的威信，準備革命高潮時起來公開指導全部的運動。

第五、黃色工會裡的羣衆工作，亦當從這個觀點出發。加入黃色工會，並不是和黃色工會的領袖去實行甚麼『統一戰線』，甚至於一切行動鬥爭，都要得到他們的應許，方才可以進行。加入黃色工會的策略，主要的是利用公開的可能，實行征取羣衆，——這是共產黨員在公開存在的工會裡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問題。

中國一切公開存在的工會，都是國民黨工會，因為中國沒有一個合法的『民衆團體』是可以不屬於國民黨的。一般的講，中國並沒有公開存在的真正羣衆工會。國民黨的黃色工會，並不團結很廣泛的羣衆。他們只團結一部分的工人，其中有許多是受武力高壓手段所強迫而加入的。至於政府工會的所謂羣衆（官場統計裏的中國國民黨工會會員的數量），不過是將各業各廠工人機械的算做會員罷了；有些工會，是由黨國政府的命令，經過工廠管理處剋扣一部分工資作為會費的。公開存在的工會職員，大半是由工廠管理處准許他們不做工而照樣領工資的，或者還給他們相當的津貼，——簡直公開的是資本家或政府僱傭的小官吏。同時，有些黃色工會，雖然有羣衆，可是其中有許多對於國民黨員的黃色領袖是不滿意的，甚至於是反對的。國民黨員的黃色領

袖。碰見衝突和罷工發生，也會立刻就抓到自己手裏，以『領導』鬥爭的方法去消滅鬥爭。他們馬上到國民黨黨部或者政府機關去請求調解仲裁，實行破壞罷工。國民黨工會的工賊作用都是很明顯的。黃色工會和政府工會的分別只在於改良主義的宣傳和合法主義的巧妙不巧妙。總之，一切國民黨工會的任務，都是怎樣阻止工人鬥爭和罷工潮流的生長，怎樣搗亂破壞經濟鬥爭，使他不能變成政治鬥爭。——除非是中國資本家要利用工人和外國資本家競爭（如南洋煙廠和英美煙廠），或者一派軍閥要利用工人反對別派軍閥，那末，國民黨的某一派，可以支配工人來做他們的工具。結果，他們始終是出賣工人的。——這種強迫仲裁破壞罷工的策略，是國民黨工會的慣技；加以警察官廳的白色恐怖壓迫，和國民黨工會共同行動起來，時常能夠破壞罷工，或者使罷工完全失敗。工人如果繼續反抗，黃色工會也是和政府工會同樣，不客氣的告密，加以逮捕或開除。所以加入黃色工會，推翻黃色領袖的前途，並不是和平的取得其機關的前途。

革命工會運動的策略，應當是很活潑的，隨着環境而變更的。如果國民黨的公開工會，是完全空洞的機關，純粹的直接的警察包探（流氓）機關，那麼，應當努力在羣衆之中發動鬥爭，要求真正工會組織的權利，同時，在強迫加入這種工會的工人之中工作，打倒這種政府工會的一切信仰。如果國民黨的公開工會裏，有『左派』國民黨性

質的領袖（就是黃色工會），他們會用種種應付手段，表示他們彷彿是工人利益的擁護者，——那麼，這種黃色工會之中，我們就應當使當地的一切共產黨員（每一工廠，每一商舖裏的共產黨員）都加入進去。這些共產黨員應當一方面組織羣衆去積極的領導鬥爭反對資本家；別方面並不號召一般羣衆加入，而努力去實行反對黃色領袖的鬥爭，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斷的揭發他們是政府資本家走狗的真相。這些工會之中（和一切工廠之中一樣），不但要組織堅強的共產黨支部，並且要把工廠裏的革命的無黨工人團結起來，使他們圍繞着黨的支部；領導羣衆鬥爭，使羣衆和黃色工會領袖對立起來。工廠委員會的運動，在有黃色工會的工廠裡，尤其重要，因為工廠委員會努力的工作，就可以有使黃色工會的會員轉到赤色的羣衆工會裡的可能。

第六、一切工廠之中，尤其是主要的工業裏，都要在鬥爭的過程之中，去組織革命工會的羣衆基礎的小組。黃色工會之內，共產黨的支部和無黨革命工人固然要形成組織上鞏固團結的小組，使國民黨公開工會之內，可以有堅強的領導鬥爭的幹部，以造成同時建立革命工會的良好條件。同時，沒有黃色工會的工廠和產業裡，更是要努力去建立赤色工會的基本組織——這種真正羣衆的自己的工會小組的組織。這樣，一切赤色工會小組的聯合，就是赤色工會的祕密系統，——他要能够團結工人，經過各種各式的公開的方式，經過工廠委員會運動去實行領導正在興起的工人鬥爭。



現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工會運動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就是：用全力去鞏固和發展秘密工會；建立下層的組織，鞏固團結的小組；參入國民黨黃色工會去爭取羣衆；創造赤色工會的公開的方式；參入一切同鄉性質的小團體性質的兄弟姊妹團等，運用他們的線索而改造他們到工會小組的工作路線上來，廣大的堅決的去實行鬥爭委員會罷工委員會的組織職工運動的方法，實行工廠委員會的運動，以及女工代表會和青工童工會議等運動；實行反對黃色領袖，反對強迫仲裁；等等的鬥爭；特別注意重要的工業（紗廠，鐵路，礦山，海員），同時努力在手工工人店員之中工作，在舊式行會之中工作和行會主義奮鬥，而爭取手工工人羣衆的領導；這樣去爭取每一次勞資衝突和罷工的領導。

至於其他問題：如女工青工的特別要加緊注意，武裝組織的祕密工作，反帝國主義運動，反對國民黨軍閥鬥爭的領導，等問題，因為前此許多決議都有說到的，我們在此地不再贅述。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

# 太平洋勞動婦女運動和反帝國主義的鬥

## 爭

楊之華

——在一九二九，八月太平洋職工大會上的勞動婦女問題的報告

報告內容：（一）太平洋各國勞動婦女與工業合理化；（二）工業合理化與社會的影響；（三）太平洋勞動婦女在經濟鬥爭和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作用；（四）赤色工會今後對於太平洋勞動婦女的任務。

在這次太平洋職工會會議上討論太平洋勞動婦女問題是有很大大意義的，就是當帝國主義挑撥大戰進攻無產階級祖國的時候。赤色工會要號召太平洋沿岸的勞動婦女羣衆站在自己的階級利益上來反對帝國主義殘酷的戰爭。

帝國主義者已經準備了，並且已在事實上表現了他們是不肯放鬆地在那裏進行着開始着對蘇聯對太平洋無產階級進攻了。因此太平洋沿岸的勞動婦女羣衆要加緊預備參加反帝戰爭的鬥爭。這就是在大會上要討論勞動婦女問題中之中心任務。

太平洋沿岸的勞動婦女，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勞動婦女，他們在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鬥爭的歷史中已具有特殊的意義。

## 一 太平洋各國勞動婦女與工業合理化

資本主義發展到財政資本的階段上，爭奪國外市場——殖民地的鬥爭，發展到極劇烈的程度。他們像強盜一樣地到東方各國去找尋出路，使東方落後的國家殖民地化，他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榨取額外利潤，一方面有現存的市場，另一方面有廉價的勞動，尤其是女工和童工。最近資本主義工業的合理化，更多半是靠着殘酷的剝削女工和童工而實現的。遠東各國，無論是帝國主義的日本，或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印度朝鮮爪哇等，對於女工童工的剝削一天利害一天，女工和童工在數量上也一天加多一天。在產業工人的數量上平均女工佔全體百分之三五——四〇，尤其在紡織工業中女工所佔數量更多。

遠東各國女工童工統計表

年份	國名	工業部門	女工人數	女工百分數	童工百分數	女工總數
1926	日本	紡織	800,000	82%		
		紡紗	174,827	77%		1,200,000
		化學	60,000			
1928	中國	紡織	160,000	70%	12%	

絲廠	200,000	89%	15%	800,000	江蘇 388,000 浙江 18,200 武漢 119,000 廣東 128,000 北方 52,500
----	---------	-----	-----	---------	--

1921	印度	棉織	100,000	52%	3,700,000
		鑛業			
		紡織	157,046	42%	4,000,000
		種植	385,873	97%	
1926	澳洲	糧食飲料	14,546	1,23%	
1927		成衣紡織	79,681	66.5%	
		書紙印刷	9,470	8.01%	118,212
		其他	15,115	12.79%	

(註)一、童工在表中只有對工人總數的百分數，沒有找着總的數目，女工百分數是指對於工人總數的百分數。

二、高麗產業工人共八三・〇〇〇人，其中女工童工總共有二三・二四〇

(百分數二八%)

附一九二六——二七澳洲男女工人比較表

地名	男工	女工
新南維爾斯	一三八·三〇九	四四·八八四
維多利亞	一〇八·九六九	五二·六四〇
昆斯藍	四〇·四九三	七·六四〇
南奧六利亞	三四·九八〇	七·一八四
西奧六利亞	一六·七九九	三·六二五
大斯麥尼亞	九·四八五	二·二〇九
總數	三四九·〇三五	一一八·二一二

(註)一、澳洲平均一年內男工增加一〇七八八而女工只增加二九二一人，但是女工之絕對數量始終是增加的。

二、在都市中的男女工人之數量要佔全國六二·一%。

總合以上情形，在東方各國被剝削的勞動婦女的數量和全體勞動比較其百分數比西歐各宗主國高些，如日本在一九二七年產業工人共有四·七〇四·〇〇〇人，女工佔一·三五四·一五〇人，約佔三四%，在一九二八年十個主要工業部門內，女工和十六歲

以下的女子共佔全數工人五二%以上，這個數目超過了歐洲女工百分數最高的德國（四〇%——四五%）要是估計到日本印度菲列賓資本主義的種植場農業和小手工業上的女工數量（平均在五〇%——七〇%以上）更要加倍。其他殖民地上女工數量的增加更速。如英國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從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印度工業的發展之中，男工數目增加八三%，女工增加一〇〇%。除勞動婦女之外，還雇用大批未成年工和童工。這種雇用童工在中國也一年加多一年。上海是工業中心區域，據上海工部局所調查的童工統計表（租界以外的還不算。）來看，已屬駭人聽聞。

上海男女童工調查表（上海工部局調查表）

區域	十三歲以上的男子	十三歲以上的女子	十二歲以下的男子	十二歲以下的女子
哈爾濱路	二·六七五	三·〇三六	?	〇·〇八二
匯山路	八·三二一	八·三〇六	〇·四四三	〇·〇六〇
楊樹浦路	一一·一八九	二九·二九三	〇·五四三	三·三二七
戈登路	一七·二〇六	三〇·四七三	一一·〇八七	一·九三四
靜安寺路	?	?	?	?
新開路	〇·三〇六	二·二九二	?	〇·〇九〇
虹口	〇·三〇〇	一·九五〇	?	〇·二〇〇

中 央	〇・四五〇	一・〇〇〇	?	〇・二〇〇
閩 北	一・三六八	一五・七〇二	?	四・八九八
浦 東	二・四四九	六・二六九	〇・二四七	〇・三一八
西 虹 口	〇・三八九	四・九二六	一・四五四	六・七九四
總 計	四四・四二五	一〇三・二四一	三・七七四	一七・七〇四

右表只是上海租界一區男女童工總數已有十六萬九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中十三歲以上的男童工四萬四千四百二十五人，女子十萬零三千二百四十一人，兩者共計十四萬七千六百六十六人。十三歲以下的男童工三千七百七十四人，女子一萬七千七百零四人，兩者共計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八人。男女分計則男童工凡四萬八千一百九十九人，女的凡十二萬零九百四十五人。一般說來，上海中外區域合併計算童工約佔全數產業工人四分之一。這些童工大數是散布於紗廠絲廠棉花廠毛織廠煙草及機器廠裏面，同時在上面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女童工比男童工要多三分之二。

這些殖民地上的女工和童工所得的工資比西歐宗主國內的女工所得的少一倍或一倍以上。同時童工所得還比成年工人少一倍。因此帝國主義資本家就能在這些國家內從各企業裏——紡織業棉織業絲織業礦工業及在種植場中（茶，咖啡糖）獲得極高的利潤。

澳洲一九二七年十六歲以下的童工統計表

地 名	男	女	總 數	種 類	數 目	種 類	數 目
新西蘭	4,691	5,001	9,595	成衣	1748人	印刷	1291人
維多利亞	4,567	4,041	8,603	領結襯衫	1681人	自行車， 汽車	925人
昆 斯 蘭	1,281	929	2,203	女 帽 子	1403人	機 器	
南奧大利亞	1,215	856	2,071	鞋	917人	鐵 工	309人
大斯麥尼亞	6,311	254	5,655	編織	026人		
西奧大利亞	614	242	856	藥	536人		
總 數	13,532	11,321	23,003				

童工中有女童工的，如成衣，領結，襯衫等職，現在都列於前表。

過去的四年，男童工增加一五七八人而女的增加一五八九人。

工業合理化對於資本家的利益日增，因為可以減少成本和勞動人數加重生產者的勞動力。而生產量可以較多。例如日本，在一九二七年開始時每女工管四架車，二五〇人做一萬錠子，而到一九二九年每女工管六架車，二〇〇人做一萬錠子，在下面日本紡績女工生產力比較表也可以看出每一個女工的勞動是增加很多。

日本紡績女工生產力比較表如下



年	月	運轉錠數	女工數	一人所做的錠數
一九二七	五月	四・六七二・七一五	一三六・四七二	三四・二八
一九二七	十一月	四・七〇六・〇〇一	一二六・二二二	三七・二八
一九二八	十月	四・九一八・一五三	一一五・五一八	四二・五七
一九二九	二月	五・一七一・七二八	一一六・五〇三	四四・三九

日本全國大的紡績布工場能率表（小工場不列入表內）

年	代	運轉錠數	原料	每日生產的紗	男	女子	使用勞動者數目
一九二四	六月	五三・七八八	八六・七	五六・七六匁	八・〇一〇	四二・九九五	
一九二五	六月	六三・三二〇	一〇一・三	五九・〇七匁	八・七八二	四七・〇二三	
一九二六	六月	六五・五四二	一一一・八	六四・六三匁	九・一九四	四九・八一六	
一九二七	四月	六八・五八一	一一六・四	六三・八一匁	九・〇四二	四五・一四九	
一九二七	六月	六六・七六四	一一〇・六	六一・九一匁	八・七六九	四二・七五三	
一九二八	六月	六九・〇六四	一一三・一	六五・二六匁	八・〇七〇	三四・四四〇	
一九二八	三月	七四・二三六	一二六・八	六六・六六匁	八・五六五	三五・二四二	
一九二九	一月	七九・〇六九	一二三・四	六五・八一匁	八・六七一	三五・三一七	
一九二九	二月	七一・〇八七	三一・八				

日本全國大的紡績工場能率表（小工場不列入表內）

年	代	運轉 錠數（千錠）	原	料	每日生產的紗	平均勞動者的數目 男	女
一九二四	六月	四・一〇八	一七二	八捆	七四・九匁	三五・七六四	一一八・五一四
一九二五	六月	四・六七一	二〇四	八捆	七八・六	三二・五二七	一三九・五一
一九二六	六月	五・〇二五	二三七	六捆	八六・三	四〇・八〇二	一四五・三九五
一九二七	四月	五・二二三	二三四	九捆	八四・六	四〇・一五〇	一四〇・三九五
一九二七	六月	四・六四八	二〇九	四捆	八五・六	三九・〇四〇	一三二・七〇六
一九二八	六月	四・七三六	一九九	〇捆	八六・六	三六・〇三四	一一六・〇五六
一九二八	三月	五・一一三	二三七	九捆	九二・四	三六・五四九	一一八・三七五
一九二九	一月	五・一五四	二一九	四捆	九六・〇	三五・五一〇	一一七・〇九七
一九二九	二月	五・一七一	二一六	二捆		一一六・五〇三	

又如中國一九二七年每女工至多管兩架車，每日做二十五個木棍（約一〇〇錠子），現在增加到管四架車，每人每日做五十個木棍（約二〇〇個錠子）平均起來，以前三人所負擔的工作現改爲一人負擔了。

難怪在中國的中外資本家發了大財！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魄力很大，去年（一

九二八）在中國雖然遇着排日貨打擊，但田中內閣在一九二九年做的報告中說：「去年日本對華貿易比較前年（一九二七）還增多三百五十萬元，又日本財政部發表，本年一月日本輸出中國之貨物比去年一月又加多一千三百餘萬元（其中紡織品佔大多數），這種貨物到滿洲旅順大連的一千餘萬元，到中部揚子江流域的亦四百萬元」。這就是說到中國的資本在外資如此嚴重壓迫之下，對於工人的剝削更要日益加重。

增加一萬二千担這種超度的利潤是怎樣來的呢？是用最苛刻的方法剝削工人，尤其是女工和童工的血汗中所得來的。

#### （一）工資太少不够生活

中國社會生活程度日高而工人所得的工資有限，不能足夠衣食住。尤其是中國工人的工資，不但不能增加，而且減低了，據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申報中上海市政週刊上所發表的『工資指數試編』來看，半年來男女減少工資的有十二業，女工減少有六業，童工減少的有四業。減少之程度平均每月工資減少了半元以上；尤其是中國廠家，平均減少四分之一的工資。同時一九二八年七八九三月工人平均收入之比較表上，指明女工與童工工資特別比男工低廉，即以紡績業來說，女工與男工在同一紡織業同一工作部門中工作，工作能力是相差無幾的，但男女工資每月相差十元左右，若與童工相比要差十五元。總之，中國女工工資平均每月八元到十五元，童工每月二元到六元

，男工由六元到二十六元。

日本 女工工資每日為九角二分到一元五角六分，不及男工工資之一半。

印度 在孟買紡織業之中，女工與童工每月十六羅比，男工三十三羅比，在煤礦工業上每星期女工三個先令，男工五個先令。

南洋 女工工資二角五分（合中國二角）此數還是政府決定的，在事實上還要少些。

澳洲 一九一四——二五年每年平均  
男工得二二四磅·四一先令  
女工得九九磅·四一先令

一九二五——二六年每年平均  
男工得二二七磅·五五先令  
女工得一〇二磅·二一先令

一九二六——二七年每年平均  
男工得二三五磅·五三先令  
女工得一〇六磅·六一先令

日本女工賃銀實數（每日工資）附表（一）

照這樣看，澳洲男女工資的比較也是極不平等的。

年  
份  
資  
別  
工  
別  
業

紡織業  
織物業

	定額賃金	實收賃金	定額賃金(元)	實收賃金(元)
一九二五	〇・九二六元	一・〇九〇元	〇・八五八	一・〇八八
一九二六	〇・九二一元	一・〇八八元	〇・八六一	一・〇七八
一九二七	〇・九〇八元	一・〇八七元	〇・八三五	一・〇五七
一九二八	〇・九三一元	一・一〇〇元	〇・八二八	一・〇五九
一九二九(一)	〇・九三二元	一・一一〇元	〇・八一七	一・〇五一
一九二九(二)	〇・九三五元	一・一〇二元	〇・八二六	一・〇六三

定額賃金——名義工資。 實收賃金——實際工資。

日本最近工資調查表——一九二九年二月工商省各都市工資調查(二)

綿絲紡績女工 棉花織女工

地名	平均	平均
東京	一・四六元平均	・八八平均
大阪	一・二三元平均	一・二三平均
神戸	一・五六元平均	一・八六平均
京都	一・一八元平均	一・二〇平均
名古屋	一・〇八元平均	一・二〇平均
橫濱		



廠 織 棉		廠		絲		廠	
九二九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外 國	中 國	九二九	九二八	九二七	九二九	九二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三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五 四	八 五			四 三	四 三	〇 三	〇 四
八 七	五			六 五	七 六	六 五	六 五
		一 二	一 九	一 九	二 九	三	〇
		五 六	三 九	一 九	二 九	三	〇

		年八二九一		中英日		中英日	
一 四	一 六	間 到	間 纜	間 絲	間 抄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四 二 二	四 二 二
				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香烟廠		香烟廠		香烟廠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八二	九一	七二	九一	三〇	八
三六	二八	三六	一四	一四	八
一二	九	一四	一四	一四	八
一五	一二	一四	一四	一四	八
一九二八	蛋廠	一九二八	火柴廠	一九二八	火柴廠
二〇	一四	一五	三	七	九
一四	九	一四	三	七	九
一四	九	一四	三	七	九

工資以月為單位

(二) 工作時間長得利害

日本——工作時間平均十一小時。紡績工業上還有到十二小時或十三小時，只有在礦工上，依一九二八年頒佈的法律減少十小時了。

中國——工作時間平均十小時到十四小時以上，可以參觀上面的表。

印度——依一九二一——一九二二所頒佈的法律，工作時間平均十一小時，但是到一九二五年事實上還達十三小時；在礦工業上依一九二三年的法律，工作時間縮到九小時或十小時，一般的工作時間最近還是由十小時到十三小時。



澳洲——一九二五年每星期中男工四十六小時，女工四十五小時，七八分

一九二六年每星期中男工四十六小時，五七分女工四十四小時，九四分

一九二七年每星期中男工四十五小時，四六五分工四十四小時，九四分

南洋——工作時間由一〇——一四小時。

一般的女工每天在工廠裏做工這樣多時間，回家還要燒飯管理小孩，及其他洗衣等等工作，因此他們沒有得到休息時間，他們的疲勞，致於不能恢復耗費的精力。而殖民地上比日本澳洲尤其厲害。

### （三）女工待遇惡劣

女工在工廠裏除了工作時間太長和工資太少之外，還要受着極嚴酷待遇。例如包工制，賣身制（日本資本家雇用女工往往先付錢給女工的家長，並以契約規定年限，因此女工在這期限內。像奴隸一樣的沒有絲毫自由。）如罰金制（印度罰金制佔工資八——一％）貯金制（由中國工廠實行貯金制已很多，對於工人非常不利，就是每天從工資中扣去幾分錢到一角，存在廠主經手的銀行裏，如工人犯廠規或被開除時即沒收工人平日所貯蓄的工資），像監獄一樣的宿舍制（日本女工最痛恨的）等等，都使女工們過最殘酷最不幸的奴隸生活。其他如中國女工童工被工頭打罵出入被檢查，甚至沒有大小便的自由。

中國政府對於女工不但沒有爲女工設立勞動法，而且如中國國民黨幫助資本家取消女工在已往的鬥爭中爭得的生產前後一月休息工資照發的條件。

日本資本家的政府雖然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實行廢止夜工，但是實際上這個工廠法非常狡猾，他說：『資本家沒有權力使童工與女工在晚上十時到晨五時做工，但得地方官廳之許可，資本家可延長到晚十一小時』，官廳本是資本家的，官廳始終是幫助資本家的。當然可以得到地方官廳之許可。次則以前日本工廠女工每月中有四日可以休息，而現在減少到二日（紡織的），從前每日有一小時的休息，（吃飯半小時其他半小時做二次休息）而現在改了半小時的休息。因此在名義上雖然說廢止夜工，實際上等於不廢止。在中國紗廠也有許多廠實行取消每日半小時（吃飯）的休息。尤其是絲廠，現改爲六進六出，即早晨六點以前進廠（工人如到六點以後幾分鐘到工廠門口，那就再不能進去了）下午六點以後出廠。

#### （四）資本家政府及其走狗的欺騙和壓迫

中國在工人罷工的時候，幫助資本家的黃色工會，一方面以法西斯蒂的手段恐嚇女工干涉女工破壞罷工；別方面口頭和紙片上說些甜蜜的話來欺騙工人。

當然他是反動政府的走狗可以公開活動，黃色工會盡量地利用女工落後思想即利用帶口民族觀念，使工人離開階級戰線轉到愛鄉愛國的狹義觀念方面去。在工人隊伍中起

分裂作用。

中國國民政府頒布的工廠法的草案上說：『女工產前後相當期間內不準工作，工資照發給』『女工童工每日做工不得超過實在十小時』。你們看罷！他所指的產前後相當期間休息，不知怎樣『相當期間』究竟多少分，多少時，多少日呢？又他們所指的實在工作十小時，那末吃飯大小便嬰兒飲奶等等時間大概不能算在內了，這樣每天工作時間還須十二小時以上，這種欺騙式的工廠法，對於工人有害而沒有利的，這無非是資本家剝削女工可在法律上更得一層保障而已。何況即使這種法律，正式公布，資本家決不實行，還可進行更大的剝削。

#### 舊禮教與宗教對於女工的壓迫

東方各國尤其是日本中國的女工，不但受廠主的壓迫，還受社會一般的壓迫和束縛；資本家時常利用舊禮教和宗教關係來剝削女工。在日本工廠內遇有男女戀愛的事實，廠主即認為這是破壞廠規立即開除。又如中國上海市政府職工服務暫行規則中說：『男女職工有曖昧者應記過一次』，這些事實尤其在女工積極參加罷工的時候。資本家的走狗工賊造謠向女工的家庭告發說什麼『你們的女兒在外面做不正當軋姘頭的事。』所以日夜不回家來等等，於是女工參加罷工常受家長們責備，甚至因此而受體刑。日本的天皇教，對於女工的壓迫也特別厲害。這種舊禮教與宗教關係可以使女工受多

方面的限制，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無限的束縛，養成他們應爲資本家做馴服的奴隸。這些舊禮教與宗教關係，也可以算爲資產階級——剝削女工方法之一了。

## 二 工業合理化與社會的影響

一、在資本主義工業合理化的過程中，大批的吸收不熟練的婦女和童工，這些羣衆來自手工業被破壞的農村中，資本家即利用這些無組織的落後的廉價勞動，不但便於剝削和壓迫，而且減低了整個工人階級生活的水平線。

二、不但要減低整個工人階級生活的水平線，而且利用女工和童工的弱點，來軟化和腐化一部分成年工人，藉以分裂工人階級戰線。同時資本家收買流氓，組織法西斯蒂，阻礙革命運動的發展。

三、資本家既然大量的剝削女工和童工。那末男工尤其在鬥爭中勇敢的男工，便大受排擠。尤其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上，女工的速度增加出於人之意料，如在中國上海楊樹浦申新七廠在一年前四千幾百工人中，男工佔百分之四十左右，但今年一九二九年五月計算四千工人中男工只存四十六人，即百分之一；又浦東日華紗廠在二年前二千五百工人之中男工佔全數百分四十左右，而今年大批開除，減到一千餘人，男工只存了三百十八人。再看上表上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內罷工的統計中一百〇三起，中有三十四起是關於資本家開除工人的，一九二九年一月份上海勞資糾紛統計開除工人條件佔第

一位（照社會局的調查本月份六十四起糾紛中反對開除工人的二十起），平均上海每月份的罷工統計，失業問題鬥爭幾佔全部三分之一。中國失業工人已達五〇〇，〇〇〇人。日本一九二〇年失業的數量由五〇，〇〇〇增到（一九二九年）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了，在日本這種失業的影響已達到女工方面來了。女工失業的百分數，雖不像男工那樣高，但本年女工失業的也加多了。就是澳洲一九二五年失業者有三四六二〇人，到一九二七年第四季計算增到三八六四一人，失業人數為煤礦及寶石佔多數。

這種失業現象在工業合理化的過程中已成爲不可免，而且還在繼續增加着。

四、資本家剝削女工的殘酷，使女工生活條件日益惡化。疾病的數量一天一天的增加。請看日本紡織女工八〇〇，〇〇〇之中有婦人病的四八〇，〇〇〇人，即四〇・六〇％有肺病的二〇〇，〇〇〇人，即百分之二十五，再看印度產業工人的小孩之中，全數百分之九十八，常用鴉片熱醉的方法，其目的是爲着母親的能安心工作，多替資本家生產。在印度大部分女工小孩像中國一樣地放在機器旁邊或下面，時有發生傷害小孩的事實，並且常常發現在馬路上或工廠裡生育小孩的事實。這些國家的女工及其子女的身體，大部分不能健康，白天則在工廠勞苦，夜裏則在家庭忙碌。吃飯睡眠的時間，都成問題，與俄國體強紅面的女工相比，真有天淵之別呵！

### 三 太平洋勞動婦女在經濟鬥爭和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

## 作用

遠東各國資本家用殘酷的方法壓迫這些女工和童工，實際上教會了她們積極參加罷工運動。在最近五年中女工參加鬥爭的積極性特別高漲，尤其是在殖民地 and 殖民地上的勞動婦女羣衆，她們不但在經濟鬥爭中表現其作用，而且在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政治鬥爭中表現了極偉大的作用。

澳洲 在澳洲地方雖然工人生活較好，但罷工運動一樣的勃發。一九二七年中有四四一次罷工，參加人數達二〇〇，〇〇〇人，其中也有許多女工參加的，罷工緣因為工資問題的，九四次；爲時間問題的，十八次，爲食問題的，三六次；爲工作條件的，七二次；罷工的結果：工人勝利的八三次；廠主勝利的三〇七次；調和的三五次；沒有解決的五次，這種罷工運動，足以證明，澳洲工人的資本家的進攻工人，已經經常的引起工人的反抗，資本主義的合理化正在降低澳洲工人的生活程度，工人羣衆的前途不是澳洲是例外的天堂而是堅決的殘酷的鬥爭。

國中 中國女工受中外資本家雙重的壓迫，她們參加經濟鬥爭，還在一九二〇年開始的，五卅前後（一九二五年左右），全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已經非常高漲。當時女工參加罷工的人數在四〇〇〇〇〇左右。尤其在上海的女工與男工一樣地英勇，組織工會及糾察隊。此種糾察隊的組織很普遍的差不多每個工會都有，至於有組織的工會

女會員在一九二九年計算已有三二五〇〇〇人（即上海天津武漢廣東），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五萬六千人之中女黨員居三千九百四十三人即全數百分之六又一，其中有二千是上海的女工。當時女工在反帝國主義運動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他們思想方面由幫口民族的觀念漸漸轉變到階級的觀點。他們在行動上充分的表現了階級的意識。舊有幫口組織受了極大的打擊和破壞。

其次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上海女工參加了三次暴動的罷工，這次參加的不但紗廠女工，而且較落後的女工如各絲廠女工也全體參加。她們很勇敢的在戰場上排着他們的隊伍；對軍閥的兵士做了極大的示威運動。其他如運輸槍械，暗殺工賊，散發傳單的工作也做得很多。暴動成功後的兩星期內，她們積極參加組織工會工作，上海市區代表會議上有女工領袖參加，她們勇敢的戰鬥力在革命歷史上有很偉大的意義，四月十二日以後，蔣介石大屠殺，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之下，她們仍舊秘密中進行着，直到現在還是繼續着零碎的經濟鬥爭。

第一次中國成立蘇維埃的廣州暴動中，女工做了很多工作，如分配糧食運輸槍械，散佈傳單。那時候許多女工們手執紅旗游行示威，向總指揮處要求發槍。

在廣州暴動的前後，廣東省的海陸豐瓊崖島及湖南湖北南邊一帶農村貧婦很積極的參加了各項的游擊戰爭，她們受了很大的犧牲，屠殺的在數千以上，被捕的不計其數。

直到現在很多革命的女子判決在獄裏受着無限的痛苦。在暴動失敗以後許多女工農婦首領都死在軍閥們的刀口之下，割奶腰斬裸體示衆，殘酷到了極點，可是她們的血跡永不會消滅。這種犧牲證明了中國勞動婦女在反帝國主義和反國民黨鬥爭的作用。

最近兩年來革命比較消沉的時候，雖然沒有大的同盟罷工，但是部分的經濟鬥爭每月却有，只在上海一區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的罷工的統計中，十七萬〇五百六十三罷工人員中，女的佔十一萬七千九百七十四人。在一九二八年凡有女工參加罷工的共有四六起。

業別	月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共計
紗廠		一〇	八	〇	三	三	二	二六
絲廠		一	二	一	二	二	〇	八
烟廠		一	五	二	三	〇	五	一六
蛋廠		〇	〇	〇	〇	一	一	二
火柴廠		一	〇	〇	二	〇	一	四

一九二九年初尚有天津英美煙廠，北洋紗廠，河南豫東和衛輝紗廠，甚至江西紗廠，茶葉業及鎮口火柴等廠也有罷工事件發生。



上海二月份中共有五十起罷工之中，如上海老英美煙廠，喜和紗廠，滬西內外棉織廠，永安及開北商務印書館等廠，內都有女工參加的。這些罷工都可以表示中國女工在罷工中的作用，并不因政府和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消滅。

日本 日本女工在組織上雖然還很弱，但是她們參加最近十年來的罷工運動，都非常積極，一九二三年紡績工廠罷工人數在八，〇〇〇以上，在一九二五年東京大罷工運動，女子積極參加，唐麥德公司紡織工廠女子大罷工。一九二六年聯合了幾個企業上的女工人數達到六千。一九二七年六百二十三次罷工中有二三次是由女子發動，並有女子指揮的。在食品工廠的罷工中，女工出來發起工人大會。一九二九年一月到三月在東京Musubi第一第二廠罷工，第一廠參加者二，八九〇人，第二廠參加者一〇〇〇人。自四月——六月共有一二〇〇〇女工參加罷工。日本女工雖然有增無已的參加罷工運動，但是這種參加都是自發的，尤其在紡織業內的女工，大部分來自鄉間，約有一定年限的特別苛刻條件，差不多完全處於奴隸地位，她們受政府的禁止不准和一般的無產階級運動發生關係。一九二六年，日本農村婦女積極參加貧農和半僱農底組織運動，參加小佃農聯合會（日本農民協會左派共七萬人，其中女子有一萬人）。

一九二九年，三月三日到五日，日本全國農民協會舉行代表大會，決議在各支部中組織婦女部。但日本無產階級婦女對於政治鬥爭的參加，還比較薄弱，在勞動農民黨

內九百個黨員中只有幾十個女子。

印度 在英屬印度數年前的工人運動，一部分是在英國工會改良派首領影響之下，一部分是在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底影響之下（資產階級是實行和英國政府完全妥協政策的）。女工參加職工運動和革命鬥爭遠在中國無產階級婦女之下。無產階級婦女羣衆，無論是參加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羣衆罷工運動，或參加『甘地主義』的解放運動，以及後來的『斯華拉基黨的運動』大部分是自發的性質，而且在改良派的影響之下。一九二二年在全印度第一次職工代表大會後在孟買組織了單獨的女工聯合會，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在孟買及加爾各答的紡織工廠及製麻工廠內舉行擴大罷工，女工參加的達三萬人。一九二七年印度罷工運動高漲，職工會提出要求，要改良女工生活地位，女工參加經濟鬥爭的積極性逐漸增高。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二次職工代表大會上選舉專門婦女組織員作婦女工作。一九二八年，孟買紡織工會罷工，女工在職工會左派領導之下已成爲積極的參加和一部分的指導者，一九二九年在最近一次的孟買地方罷工運動，參加罷工人員十五萬人中有三萬是女工。並且還組織了女糾察隊。

一般的說來，印度女工還沒有好好的組織起來尤其是鄉村女僱農（彭合破和孟買）和種植場上的女工（阿撒孟加拉）這些地方有五十萬以上的女子，都是最被壓迫最受痛苦的份子，都還沒有吸收到無產階級的戰線內來。

荷屬東印度 荷屬東印度甘蔗場上和製糖工廠內無產階級婦女參加過一九二六年的暴動，許多都被荷蘭猛獸般的軍隊所殘殺。

爪哇 爪哇工會共有三五〇〇〇會員，其中女工不過三百五十人，共產黨員共有三〇〇〇人，女黨員有三〇〇人，此地國民黨稱『薩到加黨』，女黨員共有二萬五千人，其中女工和農婦佔極少數。

朝鮮 朝鮮的產業女工，依官廳統計只有一萬人，他們最被剝削的，她們積極參加一次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當然她們的組織還十分薄弱。

中國勞動婦女的反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朝鮮無產階級大批地參加獨立運動；日本女工的罷工；孟買紡織工人的鬥爭，所有這些事實都指明東方和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婦女正在大批地加入整個無產階級鬥爭的戰線，而積極地參加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

同時在東方及殖民地國家內女工在大小工業上和農村經濟的企業上雖佔有廣大的數量，但是女工加入革命工會及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還非常薄弱，如日本有組織的女工只有一二〇一〇人。

在遠東各國，女工羣衆中組織力量薄弱的緣因，大部分是各國赤色組織還沒有十分注意到勞動婦女在鬥爭裏的作用。這種輕視勞動婦女作用，是非常之大的錯誤。如

果沒有女工積極參加罷工和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那末整個工人階級就減低革命運動發展的速度。

東方各國和殖民地的產業女工及一般勞動婦女既沒有盡量被吸收到革命的階級組織內來，於是帝國主義者和本地的資產階級便利用『女界大同盟以及其他各種慈善團體來吸收勞動婦女，使之受自己的影響』，在日本改良派的婦女協會如『旅館女聽差協會』『新婦女社』尤其是佛教同盟會，共有會員一，二〇九，九〇〇人，其中有許多是農婦。此外尚有其他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的組織，這種性質的組織在印度爪哇中國也開始活動了，他們的目的為引誘勞動婦女脫離革命戰線。因此我們為加強階級力量起見，必須很堅決的糾正不注意勞動婦女運動的錯誤。

#### 四 赤色工會今後對於太平洋勞動婦女的任務

赤色工會今後對於太平洋沿岸勞動婦女的任務如下

一、如要順利的吸收女工加入革命工會應提出一般女工所重視的，尤其是在某工廠內女工所注重的要求：

- A 施行廣大的真正的保護婦女和兒童的勞動方法
- B 七小時的工作制
- C 同等勞動須給同等工資

- D 防止疾病的社會保險
- E 婦女產前後休假兩個月，工資照發
- F 由廠主出錢在廠內替女工設立幼稚園及補習學校
- G 婦女和兒童不得做夜工
- H 凡有害健康的工業及其他危險的機器不得使用婦女
- I 廢止契約式的雇傭制（日本）
- J 廢止牢獄式的寄宿舍制（日本）
- K 勞動婦女在政治上有公民的平等權利
- 二、赤色工會要加緊組織那些沒有組織的女工羣衆，尤其要以紡織絲廠爲中心工作。
- 三、吸收女工加入工會，應當直接在企業裏進行，使女工羣衆完全到革命工會底指導之下，來擔任這工作的應該由革命的工會支部或工廠委員會派人負責。
- 四、在革命工會領導之下，組織婦女委員會或代表會議，討論和研究一次日常生活，如有必要時，可以召集女工大會。但是要反對單獨組織工會或其他單獨的組織婦女團體。
- 五、應當選舉女工參加工會各級指導機關，並多訓練女工尤其是政治訓練應特別注

注意。

六、盡量吸收廣大的無產階級婦女羣衆參加無產階級的總鬥爭，在女工日常生活需要的立場上從事鼓動她們，使經濟的要求與政治的要求發生聯繫。

七、滲入反革命的或左派（日本）的工會內，進行工作，奪取羣衆，反對其欺騙的領袖，揭破改良派妥協的反動政策。

八、開除男工代以女工是一般的現象，因此赤色工會以同工同酬口號領導女工爲失業工人鬥爭。

九、工會應反對一切忽視婦女要求而認爲這種鬥爭只是婦女的罷工的範圍，男工應注意女工的要求而爲此種要求而鬥爭。

十、中國在過去的鬥爭中，鄉村中的貧婦組織及其鬥爭時的行動，沒有與城市女工發生聯繫，尤其在宣傳方面沒有把兩方面參加羣衆鬥爭的事實和經驗相互交換。今後太平洋各國工會應注意加緊城市女工與鄉村農婦鬥爭的聯繫。

十一、遠東各國尤其是日本中國和印度，資本家利用舊社會禮教等關係來阻止女工參加革命運動，這種關係，顯然已成爲資本家壓迫女工方法之一。因此赤色工會應認爲這種減低婦女在整個階級鬥爭中的積極性而破壞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的企圖，是要極力反對的，同時，我們更要指明對於這種舊禮教關係的殘餘，只有在階級鬥爭中，才能

得到破壞和消滅。婦女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完成蘇維埃政府之下，才能澈底的解放。

十二、在帝國主義時代。對於勞動婦女的剝削格外加強，勞動婦女務必反對帝國主義造成的世界大戰，赤色工會應當號召太平洋勞動婦女參加反戰爭的鬥爭。蘇聯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祖國，我們要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來保護蘇聯。

(完)

一九二九，八月

# 國際共產黨反右傾的鬥爭（續）

亮 萍

## （八）反右傾的鬥爭和中國共產黨

機會主義的領導，是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機會主義領導破產以後，中國黨內經過一個非常艱苦的反機會主義鬥爭的時期。經過這次堅決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以後，我們能否說機會主義活動，在黨內已經沒有了呢？不能說。機會主義者，還時常蠢蠢思動，企圖重整旗鼓，和黨鬥爭。在中東路問題發生以後，這種企圖，尤其明顯，尤其急進。他們的錯誤（譬如陳獨秀信內所表現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系統的，一貫下來的。現在我們把中國機會主義者的觀點，作一個有系統的分析。

首先我們來看中國機會主義者對於世界形勢估計如何？

在陳獨秀致中央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信上，這樣的說道：

「……最近索性更進一步（指中央），換一句更確定的話說「革命復興」，並且以爲「各國工人階級鬥爭與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尤其是日益激烈起來」，現在已是一世界革命的激劇」時期，拿這樣錯誤的政治認識與誇大的估量爲前提……

（見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小冊子第一〇八頁）



根據獨秀意見，各國工人階級的鬥爭與殖民地革命運動，一定是絲毫沒有加厲，世界資本主義，一定是非常穩定，因之他罵中央居然採取「這樣錯誤的政治認識與誇大的估量」。

陳獨秀否認各國工人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否認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加緊，否認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漲。此外在他致中央關於中東路問題的信裏，說中東路問題「不只是簡單的中俄兩國間的糾紛，而且是國際糾紛問題的導火線」，於是定出兩個發展的前途。這樣獨秀更是看不到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底緊迫，否認帝國主義進攻（嗾使國民黨進攻）蘇聯的明顯事實。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對於世界形勢，有顯然相反的兩種估計。中央根據共產國際六次大會的政治路線，認為「國際工人階級鬥爭與殖民地革命運動尤其是日益激烈起來，」認為世界革命運動向上高漲；中國的機會主義者（以獨秀為代表）完全否認這些，他們和其他國家的右派分子一樣，大罵中央的估計「這樣的錯誤……與誇大……」機會主義者，絕對沒有看到，更正確點說，不願意看到世界革命運動發展的事實，看到各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德，法，波蘭，捷克，美，以及其各國的巨大罷工和更高形式的鬥爭（如柏林的巷戰，各國工人與警察的武裝衝突）印度，非洲（如剛果，摩洛哥等）南美近東以及中國的不絕興發的革命運動，都不在機會

主義者的眼裏。他們根本否認帝國主義基本矛盾的尖銳化，他們以爲帝國主義世界還是安謐太平，這種估計是社會民主黨的，牠是和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不能並存的。

有了這樣機會主義的世界形勢的估計以後，他們對於中國的政治形勢，也自然產生一種非常離奇的錯誤的分析。第一，完全看錯了帝國主義的作用，第二，過分估計了資產階級的勝利，第三，沒有看到自己的力量。

中國機會主義者，絕對沒有看到，帝國主義經濟的根本矛盾，日益尖銳化，帝國主義者爲維持其經濟地位起見，一方面加重對於本國無產階級的剝削，他方面更激劇地加緊對於殖民地的榨取和壓迫。英帝國主義對於印度加緊的掠取，法帝國主義對於非洲加重的剝削（引起廣大的黑人的暴動），美帝國主義對於南美更急進的侵略，都證明這點。在中國這點尤其明顯，自大革命失敗以後，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更加利害。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山東得寸進尺，盡力擴大經濟及政治勢力，滿洲已實際成爲日本的殖民地，英國在南方，鞏固香港的經濟勢力，盡力向兩廣進取，在長江流域，以上海爲根據，也不絕擴大自己的政治經濟勢力，美帝國主義也同樣的竭力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其他帝國主義，也莫不恢復和擴大自己的勢力，南京政府對於帝國主義進攻，總是投降總是屈服。中國機會主義者竟會忽略這樣明顯的盡人皆知的事實而說：

「……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同書九十二頁）

這樣，根據機會主義者意見，帝國主義者竟會根本改變以前的傳統政策，對中國資產階級讓步，來幫助中國資產階級獨立的發展，這種不顧事實的分析（事實所表現的却正相反），祇有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才會做得出來。（讀者注意，獨秀的這封信，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五號寫的。）

對於帝國主義既然採取這樣錯誤的估計，對於中國本國的階級關係，也自然發生非常離奇的分析。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高潮，使中國資產階級，畏懼到極點，於是投降帝國主義，妥協封建殘餘，來建立南京政府。南京政府，是豪紳資產階級政府（代表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利益），帝國主義的工具，反動勢力壓迫工農的聯盟。機會主義者竟會忘記這樣明顯的革命教訓，而說：

「……牠（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確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牠的階級力量的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的打擊……」

不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使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發生極大的轉變，這個轉

變，主要的是在工農運動的勃興，震撼了整個舊社會的基礎，嚇退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於是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妥協，共同來壓迫革命；而不是機會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根據機會主義者意見，南京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這個資產階級得了勝利以後，對外已經使帝國主義讓步，並且甚至獲得帝國主義的幫助，在內部呢，封建殘餘，已受最後的打擊。這種估計，實在講來，和蔣介石走狗頌揚南京政府的話，有甚麼區別？

機會主義者，祇要不是硬閉着眼，總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勢力的擴大，鄉村間豪紳地主階級勢力的恢復（在革命失敗以後，恢復得很快）以及資產階級卑躬屈節的投降。二年以來的事實，都充分證明這點。馬克斯主義者要以客觀事實的科學分析為基礎，機會主義者把這點完全忘記了，更正確點說，把牠完全拋棄了。我們且摘引另外一段話，來和機會主義者所說的相比較：

「……二年以來，不平等條約不獨未能廢除。且因修約而加一層保障……土豪劣紳，大肆活動……」

你道這段話，是誰說的？這是一九二九年九月廿九日上海國民黨全縣代表大會正式宣言內的一段。機會主義者說帝國主義者往後讓步，幫助中國資產階級，國民黨員自己承認帝國主義利益，更得一層保障，機會主義者說封建殘餘勢力受了最後打擊。

國民黨員自己承認，土豪劣紳大肆活動。機會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勝利的估計，竟極大地超出國民黨本身的估計之上。這真是可憐已極，而且簡直是可恥已極！

機會主義者既然幻想帝國主義採取這樣的態度，中國資產階級獲得這樣「偉大」的勝利，所以無疑地對於自己力量和工農鬥爭就受發生取消派的觀點。他們於是就幻想中國統治階級會得長期的穩定，說「現在統治階級，不是走向崩潰，革命鬥爭不是開始復興，而是更加衰落。」說「中國革命高潮……不會快要到來……」幻想羣衆情緒這樣的消沈失望，說黨領導工人鬥爭「是盲動主義」，說各種示威（包括廣大羣衆熱烈參加的五卅）是把羣衆「玩把戲」。這種批評，就是連一絲一毫的共產黨意味都沒有了。中國的工農，親身受到帝國主義者壓迫的加緊，資本家封建殘餘剝削的加重，他們堅決地不斷起來奮鬥，他們決不像機會主義那樣閉着眼睛，空口瞎喊「盲動主義」，他們以自己階級的意識領略到鬥爭的緊迫。各地工人（尤其是上海）的經濟及政治鬥爭，各地農民對於反動勢力的反抗和暴動，各地士兵的變亂等等，都給機會主義者的狂呼，以明白的答覆。

根據機會主義者的國內形勢的估計，（一）帝國主義，改變態度，對於資產階級讓步，（二）中國資產階級獲得「偉大勝利」，封建殘餘，已受最後打擊。（三）羣衆消沉，鬥爭是黨的「盲動政策」。示威運動，是「玩弄把戲」，「革命鬥爭，更加衰落」，革命

高潮不會快要到來」。(至少在很遠的將來吧!)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有什麼出路呢？

於是機會主義者獻策道：

一、首先要剷除中央盲動主義的精神……」就是說不要發動羣衆，來作鬥爭，來作示威運動。

二、「……在一定條件之下，爲發展我們的力量有必要時，列寧所謂『不帶何等血熱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這個時期，也不應一概排棄，列寧在一九〇八年爲此曾和多數派內排棄一切合法手段的『召還主義者』有過劇烈鬥爭……」

關於第一點。在帝國主義侵略，更是加緊，中國經濟不斷破壞，農村經濟，繼續破產，工農及城市貧民生活，不絕惡化的環境中，無產階級先鋒的政黨，是否可以不發動羣衆，起來鬥爭？在帝國主義戰爭危險，日益加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萬分緊迫（南京政府已經秉承帝國主義命令向蘇聯進攻）的時候，中國無產階級先鋒的黨，是否可以束手不顧，不去動員羣衆，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保護蘇聯』？這種鬥爭和示威的發動，是否是一盲政策動？。我們想誰要是還有一些共產黨的意識，他一定會說：『黨應該起來，發動鬥爭和示威』。機會主義所說的『取消盲動主義！』就是取消鬥爭的發動，使中國共產黨，變成和平發展的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黨反對盲動主義，但是黨現在更要堅決地反對機會主義的『不動主義』，這種不動主義，會使黨放棄

革命的任務，實際上等於向帝國主義及統治階級投降。

關於第二點。機會主義者把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的情形，和中國現在相比，證明要利用『不帶何等血熱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

這上面首先應該解釋清爽原則的問題。無產階級的政黨，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是否可以利用各種公開的可能？我們的回答，是：可以而且應該（參看列寧的『共產主義中的左傾幼稚病』）。但是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所不同的，即在共產黨把公開可能的利用，看作一種工具（而且是次要的工具）來促進羣衆鬥爭的發動，（主要的是在羣衆鬥爭）社會民主黨却把公開可能的利用，本身當作一個目的，而放棄羣衆鬥爭的發動。

機會主義者，既然拋棄羣衆鬥爭的發動，那麼公開可能的利用，自成一種目的，這樣就明顯地陷入社會民主黨的泥坑。

再次，關於現時在中國利用合法可能的問題。一九〇八年時的世界形勢及俄國國內形勢，與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及現在中國國內的形勢，大不相同。俄國那時有穩固的沙皇政府，羣衆革命運動又無快要起來的希望，所以列寧和『召還主義者』鬥爭，主張參加國會，利用公開可能來訓練羣衆，但是他一方面，我們更不能忘記列寧更堅決的反取消派的鬥爭。取消派主張祇顧部分的經濟鬥爭，專門利用公開可能，取消秘密組織。這種主張，等於把自己繳械，向敵人投降。所以列寧一方面反對排棄一切合

法手段的『召還主義者』，他方更堅決地反對那些以利用合法手段爲主要出路的『取消派』。

中國現在的客觀形勢和統治階級的情形和一九〇八年時的沙皇俄羅斯絕大的不同。黨中央的路線『並沒有拋棄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十月五日政治局決議案），不過現時在國民黨殘酷白色恐怖統治之下，公開的可能，非常的狹少，而且現在中國羣衆鬥爭和革命運動，也決沒有一九〇八年俄國那樣消沉（現在客觀事實指出革命鬥爭正在開始復興），所以一方面固然『要利用公開與合法的可能』，他方面更緊迫的，是要直接發動羣衆鬥爭，領導羣衆作政治的示威。機會主義者放棄羣衆鬥爭和示威的發動，而以『利用一切合法可能』爲主要出路，這就證明他們還幻想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會有廣大公開的可能，證明他們已經陷入『取消派的泥坑』（『國民會議』的口號，是這種主張的邏輯的結論）。

總起來看，我們可以獲得機會主義意見的系統：第一，世界無產階級鬥爭及殖民地革命運動低落，資本主義十分穩定。第二，中國資產階級完全獲得勝利，帝國主義讓步，封建勢力受最後打擊。第三，黨應該取消『盲動政策』（機會主義者所說的盲動政策，即指羣衆鬥爭和示威的發動），去利用不帶任何血熱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這種估計，和策略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反黨的，而且是違反事實的。



中國機會主義者，非但在時局的估計上，和國際及黨採取相反的意見，而且更進一步。在革命的幾個根本問題上，（革命性質問題，土地革命問題），也和黨採取絕對不同的意見。在這上面，我們更可以明白的看到，右傾機會主義者，已經和『左傾』的機會主義者（托洛茨基派）混在一起了。

先說革命性質問題：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根據革命的任務，規定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點黨內同志都已經十分明瞭了。

現在我們來看機會主義者的意見。獨秀在他的信內，這樣說道：

『……封建殘餘……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對立地位的過程中，變成殘餘勢力的殘餘……』——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第九十二頁

封建勢力，已經變成了殘餘的殘餘，那麼現在統治於鄉村中的，是什麼呢？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南京政府既是資產階級的政權，統治於鄉村中間的，又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那麼目前中國工農革命的主要目標，自然就是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打倒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樣說來，中國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麼？這種理論的錯誤非常明顯。我們祇要以馬克斯經濟學的眼光，去詳細考察中國鄉村經濟，就可以看到，現時在中國鄉村中居主要地位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而是封建式的剝削關係。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南京政府不是單獨資產階級的政權，而是豪紳

資產階級所共有的政權。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上所要實現的主要任務，是：消滅帝國主義在華的全部勢力，實現土地革命，實行真正的統一。這三大任務，都是資產階級性的任務。所以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上顯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機會主義者根據他的『社會主義革命性』的理論，對於土地革命的任務和動力，就發生錯誤到極點的意見。封建勢力，既成殘餘之殘餘，那樣土地革命最主要的敵人，就不是地主。土地革命的主要目標，將是對付鄉村的資產階級。這樣，無怪陳獨秀說：

『……現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貧農（雇農，小佃農與小自耕農）是革命的柱石，中農是中間動搖分子，富農是反革命者……』（前書第九十八面）

這個土地革命動力的估計，是和他的『社會主義革命性』的理論相連的。既然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那麼在反對農村資產階級時，中農一定動搖，這是邏輯的結論。他不知道，土地革命根本就是帶着資產階級性質（因牠造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更不願意從事實上看到土地革命的目標，頂主要的是對付地主（不知道陳獨秀有否研究過去革命的經驗）。在這個土地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富農，因其特殊的經濟條件（對於貧農的封建剝削，高利貸等等），一定反革命，可是中農同受殘酷的封建剝削，一定能成爲貧農和雇農的堅固聯盟者。土地革命的柱石，自然是貧農和雇農，但如果

沒有中農的堅固聯盟，那麼土地革命必然要受很大的打擊，以至被敵人的聯合力量撲滅。在民主革命階段上，貧農僱農如果沒有中農的堅固聯盟，勝利是沒有希望的。機會主義者放棄中農的堅固聯盟，把他們看作動搖分子，這正是幫助地主和富農，來破壞土地革命。忽略中農的策略，是托洛斯基派最嚴重的錯誤之一，機會主義者在這上面，已經和托洛斯基派墜入同一的泥坑中去了。

○ ○ ○ ○ ○

我們已經明白的可以看到，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革命性質問題，土地革命問題等）及戰略問題上（世界形勢估計，中國形勢估計，策略路線等），機會主義都與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採取截然不同的意見。這已經不是簡單策略上的爭論，而是兩個思想系統的鬥爭。一個是列寧主義，他一個是孟塞維克主義。偉大的中國革命，因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已經受到無數的損失和摧殘。祇有消滅黨內任何機會主義的動搖，肅清一切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成分，黨方才能够堅決地組織羣衆，發動羣衆，引導羣衆，來準備新的中國革命的高潮，以獲取最後的勝利。

### （九）總結

國際的形勢，日益緊張起來，世界無產階級鬥爭和殖民地革命運動，不絕往前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更加尖銳化。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已成為妨礙世界生產

力發展的桎梏。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各國無產階級的實際任務。

在這種歷史轉變的階段上，將趨滅亡的資產階級，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來延緩自己不可避免的命運。他們用出最後的政治工具——社會民主黨——來欺騙工人，以維持自己的地位。

在這種歷史轉變的階段上，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黨——共產黨——內部，也有一部分落後的小資產階級的依附分子，受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而發生機會主義的動搖。

這種機會主義的動搖（右傾），是目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最主要的危險。歷史（尤其是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和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我們，如果沒有堅決的列寧主義黨的領導，那麼革命雖有良好客觀條件也是不能獲得勝利的。所以反右傾的鬥爭，就成爲準備革命高潮所必需的工作。祇有肅清內部的動搖，共產黨方能毫不猶豫地堅決領導工人羣衆，去和資產階級作最後的鬥爭，以獲得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

在堅決反右傾的鬥爭中，黨內有種調和派分子，掩護右派，妨礙反右傾的鬥爭。

在許多國家裏，顯然的右派機會主義分子被黨開除以後，調和派公然在黨內代替執行右派的作用。所以反對調和派的鬥爭，應該和反對右派的鬥爭，同時進行。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急劇地緊張起來。世界上已經顯明地分割了兩個營壘：一

方面有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工會，反革命的殖民地資產階級等等），他方面有蘇聯，各國無產階級及殖民地勞苦羣衆。帝國主義日夕準備的武裝進攻蘇聯，以圖消滅世界革命的大本營。武裝進攻蘇聯，是現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危險。在這兩方面堅決的鬥爭中，共產黨人不能有絲毫的猶豫和動搖的。猶豫和動搖，就是幫助敵人。機會主義者，在緊急的時候，每易被鬥爭所嚇倒而引起黨內的動搖。祇有消滅黨內任何機會主義的猶豫和動搖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才能完成牠的偉大的歷史使命。

#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二三期

合刊

## 目錄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出版——定價大洋一角

大變化之一年

史達林

軍閥混戰和汪精衛

瞿秋白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李立三

反對派對於中國問題的錯誤

吳良賦

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

秋白

太平洋勞動婦女運動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楊之華

國際共產黨反右傾的爭鬥（續）

亮萍

小學校高級用

新時代國語教授書 第四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正在成熟的世界經濟危機，羣衆失業與罷工行動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擴大會議根據馬奴夷尼斯基同志的報告通過的決議）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估計國際經濟狀況，特別指出資本主義戰後發展的第三時期的根本特質是帝國主義內外根本矛盾的急劇尖銳化，現時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速度的加快，國際工人運動的革命浪潮的深入和擴大，與殖民地國家中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成熟，是這些矛盾急劇尖銳化的具體表現。十次全會決議說：「一切都顯明地宣告美國資產階級所高唱的特異繁榮的口號的破產」。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及殖民地的長期衰頹的狀況之下，三個月以前在美國開始了的經濟危機，使國際資本主義的各種根本矛盾尖銳化的速度加快到極點，打消美國「永遠繁榮」的資產階級的神話（胡佛），給予社會民主黨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一個致命的打擊。

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揭露了關於「美國除外主義」的改良主義觀點（羅福斯通，柏爾）的虛偽，揭露了「市場價格，競爭 危機的各種問題，在國內已經代之以組織的



問題，而日益成爲國際經濟的問題」（布哈林）的可憐的理論不能成立，證實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及執委第十次全會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的正確。

### 一 危機，失業增長與資本主義矛盾尖銳化

一，美國生產過剩的危機的意義的加倍嚴重，是由於牠恰是在生產力增長與銷售市場的縮小之間的矛盾特別急劇尖銳化的條件之下生長出來的，在這時期：慢性病似的衰頹時期的延長深刻地成爲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傾向，世界經濟許多主要部門（煤，紡織，造船等等），在幾年過程中都不能脫出危機，在許多另外工業主要部門（橡皮，煤油，有色金屬，銀等等）正進入危機之中，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感受着深刻的農業危機，有些國家的原料及鄉村經濟生產品過剩（美國，坎拿大，澳洲，阿根廷），而另有些國家——主要的是殖民地國家（印度，中國）的食品又非常缺乏。

美國經濟危機正使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很大的部份陷於沉重的經濟衰頹的境遇。在東歐及中歐許多國家（波蘭，波維的海國家，奧國，巴爾幹半島國家），因爲廣大羣衆空前貧困之結果，又因爲戰後的分割，封建殘餘的存在，世界帝國主義的控制，遂使延長的經濟衰落與危機日益加劇，更加造成了普遍的政治危機的前提。殖民地的經濟危機是由於財政資本憑藉土著封建制度而施行的掠奪之發展，由於普遍的種植單純爲市場而生產的農產品，使殖民地（印度，埃及等國）在經濟上完全受帝國主義國家變動不居

的行情控制；更由於殖民地生原料的價格比一切製造品及其他農產品的價格跌落得特別厲害。在純粹殖民地國家中，因為帝國主義，土著地主與資產階級對勞苦羣衆之無情的榨壓，與工農之空前的窮困，這一危機更特別厲害。

二、從資本主義制度一般危機的基礎之上生長起來的美國危機，日益增加其國際的性質：（一）因為美國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地位中佔有支配的作用（美又多佔百分之五十的世界出產，現金儲蓄最多）；（二）因國際托拉斯，新狄加的組織，資本輸出的發展，國際借款制度的盛行，使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形成縱橫錯雜的密切聯系，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捲進經濟危機；（三）因國內市場的縮小，推動美國資本加緊在國際銷售市場上的進攻，同時就使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縮小；（四）因美國資本爭奪市場的鬥爭，將影響到國際價格的低落，使弱小的競爭者破產；（五）因美國生產的縮小，使輸出原料和半製品到美國的國家（日本之絲，安南之橡皮，巴西之咖啡）連帶着發生危機。這就使着到處價格低落，股票跌價，紙幣流通縮小，已經開始了的許多殖民地國家的金融恐慌，破產增加，生產低落，以及工資低落與失業到處增加，等等現象表現出來的美國危機，開始波及到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去。

同時，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各國的危機現象的形式，程度和性質的不一致。在有些國家中（坎拿大，澳洲）美國危機的影響直接引起牠們的危機形式；

在另些國家中（東歐，殖民地，中國與印度，南美各國，日本）佔有廣大領土的正在開始的經濟衰頹；在第三種國家中（德國）——一般經濟危機正在增長；在第四種國家中（英國）許多最主要工業部門的慢性衰頹加劇，在第五種國家中（法國）——危機現象的最初徵候已經發生：生產開始降低，裁減工人，股票跌價。

經濟危機加深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危機，使其內外各種矛盾尖銳化，使動搖的資本主義穩定崩潰，使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革命浪潮速度加快。

三、危機給予工人階級以不可數計的困苦，其中最痛苦的是廣大的羣衆失業。這種羣衆失業與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銳減和加緊資本主義合理化是緊相關聯的。

在美國，便是在最近幾年生產增加的過程中，因為異常加緊剝削工人之故，在業工人的數量還是減少的。失業數目日益增長，已達到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在紐約省的失業人數已達到自一九一四年來所未曾有的高度。雖然失業數量是這樣巨大的增長，世界上最富的美國資產階級，直到現在還未實行對於失業的國家保險制度。

在經濟危機不過才開始的德國，失業數量已超過三，五〇〇，〇〇〇人。

在還未正式走進危機情態的英國，失業者已由一，五〇〇，〇〇〇增到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在日本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失業。

在工資低降得可怕和工作時間延長的法西斯蒂的意大利，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工人失業。

在波蘭，每三個工人中，有一人是失業者，——共有失業三〇〇，〇〇〇人。在奧國和捷克斯拉夫有四〇〇，〇〇〇人失業。

在工業無產階級數量比較很少的南美洲，失業人數亦達到一，五〇〇，〇〇〇。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失業總數已達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連他們的家庭計算起來共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陷於赤貧的困境。此外，如幾百萬工人每週不能完全找到工作，而且時時感受到失業危險的威脅，更使失業大批的增加。失業羣衆的境遇真是不堪忍受，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他們或者是得不到國家方面任何的幫助，或者是得到極細微的津貼。

慢性失業更佔着極大的可怕的範圍，因農業危機而破產的最貧的農民羣衆，走上勞動市場上成爲勞動後備軍。資本家利用他們來更加大大地減降工資。在地主，農場主，農業資本家之下過着奴隸生活的鄉村無產階級，尤其特別痛苦。在殖民地，資本主義合理化簡直是無情的毀滅勞動力，在工業和鄉村經濟中不可數計的失業，使幾百萬的勞動者白白地餓死。同時，資本家以延長工作時間的政策代替縮短工作時間的辦法，使在業工人所受的剝削也達到非常緊張的程度。

資本家的壟斷組合及其國家毫不留情地步步加緊進攻工人階級，加強對工人的壓迫，實行開快車，使工人更加筋疲力竭，截減已經很低微的工資，使廣大羣衆的生活條件惡化到極點。

四、世界危機的發生恰當蘇聯經濟強大的發展的時候，在這一發展的相形之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就愈加嚴重。所以這一危機對於資本主義更加有致命的打擊。社會主義經濟在不斷地堅決減少失業和不斷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文化程度的基礎之上得到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速度的發展。無產階級在發展自我批評和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基礎之上，增長了無產階級的積極與創造性（社會主義競賽，衝鋒隊，在所有各間及各個工廠作坊中）。農民對於蘇維埃政權及聯共政策的信仰鞏固，——保證了工業強大的發展，保證了鄉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加快，並且保證了千百萬農民羣衆走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小規模的個人的農民經濟大批的過渡到大規模的集體化的經濟，便是這一轉變的實現。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的實行，對於一切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陰謀的無情的鎮壓，盡力廣大實行七小時工作和轉變到四日工作週，五年計劃加速在四年內完成——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勝利。毫無疑義的，這一切就改變了兩種世界經濟制度的力量的對比，而且有利於國際社會主義，這一切使蘇聯現在更加成爲加深資本主義危機和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般被剝削羣衆更革命化的有力因素，共產國際指明

蘇聯經濟的強大發展與工人階級的正在勃發的熱情，正戰勝在自己路途上發現的困難與進行對一切仇視無產階級份子的反抗。責成所有的各國支部在工人羣衆及一切勞苦羣衆中普遍地進行闡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的解釋工作，以便把勞苦羣衆團結在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旗幟之下。

五、經濟危機的發展使各資本家的壟斷組合及其國家相互間爲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極端尖銳化，使保護主義政策極度的厲行，使資本主義世界走近新的帝國主義戰爭。英美爲世界霸權而鬥爭，英美之間瘋狂似的軍事競爭，一方面，美國向英國的領域和保護國施行劇烈的進攻，另一方面，英國爲保持其原有地位——特別在南美洲的地位，拚命的鬥爭，——這種隱藏在軍事政治力量的重新結合與虛偽的裁軍會議（如倫敦海軍會議）的各種戲法之下的鬥爭，海軍在最新技術基礎之上的重新武裝，與美國資本及其歐洲競爭者在國際市場上及在歐洲本身的衝突增長是緊相配合的。

在這些條件之下，楊格計劃（戰勝國資產階級在美國財政資本的領導之下和得到德國的財政寡頭政府同意的綱領）的意義：一，是加緊剝削和降低生活水平而奴役德國無產階級的計劃，二，是加強戰勝國財政資本威力的計劃（從德國榨取幾百萬萬），——因此，也即是資本家降低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對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的進攻的計劃；三，是對蘇聯財政封鎖（賠款銀行）和軍事進攻的計劃；最後，四，楊格計劃使帝國主

義國家間因分贖問題起着尖銳的鬥爭。

因此，共產國際主席團號召共產國際各支部，特別是英國、法國和意國的共產黨，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尤其是德國無產階級，反對楊格計劃，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爲工人階級的革命專政的勝利的鬥爭加以積極的援助。

帝國主義列強企圖把經濟危機的致命結果轉移到經濟上和政治上被人奴役的國家身上去，增加對於附屬國的壓迫，加強在殖民地的壓榨和財政剝削，擴大暴力行動，軍事佔領和公開搶奪窮困農民的土地的辦法。

因帝國主義國家爲重新瓜分世界的殘酷鬥爭的開展，因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的緊張，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尤其是武裝進攻蘇聯的戰爭的危險正在增長着。蘇聯鄉村經濟的集體化，消滅富農政策的實行，取消了在干涉戰爭中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最後的內應者，不能不引起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線的積極加緊和擴大，不能不引起受全世界社會民主黨積極贊助和發起的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新挑釁行動。（美法對於中東路問題的干涉，墨西哥與蘇聯絕交，英法德的擁護反革命教徒的反蘇聯運動，以及羅馬教皇領導一切宗教反動勢力反對蘇聯）。

擁護蘇聯和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威脅，成爲共產國際一切支部的主要任務，現在比任何時期都更爲迫切。

## 二 第二國際當權的政黨

在危機開展的狀況之下，社會民主黨的作用表現得特別顯明，他是惡化工人階級經濟地位及變國家機關為公開的法西斯蒂專政的武器，同時也是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及進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政策的積極前驅。

在德國，社會法西斯主義一年半主政的成績，指明了牠是在聯合政府的名義之下執行德國資本家意志，幫助他們實行加緊壓迫工人階級及準備新戰爭的政策。

社會法西斯主義口頭上高唱保障和平和減輕凡爾塞和約及道威斯計劃所加於德國勞苦羣衆的負擔，實際上實行接受戰勝國資本更進一步地奴役德國工人階級的楊格計劃的政策，以及擴張海陸軍備，把德國捲入反蘇聯戰線的政策（宣告偽造蘇聯貨幣的白黨無罪，與波蘭訂立反蘇聯的條約……等等）。

社會法西斯主義口頭上高唱保障政治上的德謨克拉西，實際上實行對工人階級加以與日俱增的壓迫的政策：禁止在資產階級政府之下公開存在的紅色先鋒隊。成立反對共產黨及反對一切革命無產階級組織之『共和國保護』法，處罰共產黨出版品，不僅禁止工人示威，而且社會法西斯蒂的警察公開槍殺示威羣衆。

社會民主黨口頭上大喊『經濟民主主義』和擴大社會立法，實際上其政策給予德國工人的是：財政資本公開專政的鞏固，驅使成千累萬工人失業的資本主義合理化進一步



的實行，失業保險法的惡化與直接取消工人社會救濟的威脅，完全加在工人階級肩上的地方稅捐的增加，實際工資的降低，法西斯蒂化了的社會民主黨的工會機關用工賊的方法反對職工運動中的革命反對派及罷工工人，從職工會中大批開除革命工人。

七、在英國，與德國同樣的各種趨勢就決定了工黨政府的政策。工黨在選舉時宣傳的是：總撤廢軍備，改善與蘇聯間的關係，在殖民地的（首先是在印度）民主改良，改善工人階級地位，減輕失業，而事實上做出來的是：不僅繼續執行保守黨政策，而且進一步地惡化工人階級地位及壓迫殖民地（實行資本主義合理化，減低紡織工人工資，流血手段壓迫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嘴裡說裁軍的和平主義詞句，手裡做海陸軍備的增長事情。「工人政府」表面上說改善與蘇聯間的關係，實際上用更狡猾的方法繼續保守黨反蘇聯的政策（亨德遜在關於舊俄債務和「宣傳」問題上的態度，干涉中東路問題幫助南京政府強盜，亨德遜最近擁護反蘇聯的反革命教徒的言論等等）。

在殖民地的民主改良的實際是：在印度的恐怖壓迫的加強，在南非流血鎮壓黑人運動，在巴力斯坦組織阿拉伯人的屠殺，與埃及訂奴役性的條約。

改善工人階級地位的實際是：降低工人（紡織工人，鐵路工人）的工資，公開破壞恢復礦工工人七小時工作日的成約，頒佈惡化失業工人地位的新法令。

這就是第二國際兩個主要黨在歐洲最大資本主義國家當權的實際。

在不當政的國家，社會民主黨對於最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的反對工人階級和共產黨  
的各種辦法經常是直接最積極的參加，公開的與白俄携手領導瘋狂似地反蘇聯的運動（  
法國）；積極贊助資產階級政黨實行法西斯蒂的憲法（奧國）；動員自己所有力量幫助  
法西斯蒂反對共產黨員與革命工人的恐怖手段（波蘭）。

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越尖銳，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分子變成財政資本寡頭統治的警察  
附屬品也越快，社會民主黨在保護資本主義制度，鎮壓工人階級與殖民地革命以及準備  
進攻蘇聯的戰爭等問題上的作用也越積極越直接。

「左派」社會法西斯蒂與整個社會民主黨一樣地繼續着完成這種劊子手的作用，不  
過採用了更隱晦更狡猾的方法，因此，他們就成爲工人階級最危險的仇敵。

## 六 罷工鬥爭，失業工人運動，示威運動——共產黨的任務

九 經濟危機加速了資本集中的過程與中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增加了農民羣衆（特  
別是在殖民地）的窮困，資本主義合理化的結果又加強了空前未有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方式，就帶着絕大的力量來加深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矛盾。

因此，階級鬥爭便尖銳化起來：在資產階級的營壘裡，法西斯蒂主義的傾向增長，  
在危機的影響之下，一切更加採取恐怖手段去鎮壓羣衆（格殺罷工工人，解散工人階級  
的各種革命組織，逮捕工人階級的先進戰士，從企業中把共產黨員及一切革命工人驅逐

出去……等），在另一種營壘裡，——革命浪潮日益生長，無產階級鬥爭的戰線日益擴大，殖民地及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羣衆日益捲入一般革命的潮流。

十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已指出工人運動已經從前此一時期的相當消沉現象，進入工人階級日益左傾的時期。共產國際執委十次全會特別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新革命高潮的生長，許多地方反攻資本進攻的羣衆經濟罷工的發展（魯爾，洛茲，法國紡織工人，美國南部及印度孟買罷工），許多示威（法國的示威，五一在柏林與波蘭的示威），都是這一發展表現。然而無產階級的這些行動還是帶着孤立的性質，而且只包括幾個無產階級的中心區。

共產國際執委十次全會後的工人運動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在正在成熟的世界危機及羣衆失業的狀況之下，革命高漲更加進步的發展。

在爲無產階級經濟要求而鬥爭的基礎之上，在全世界範圍內正在開展的罷工運動特點是：牠一天一天地脫離和反對執行工賊作用的改良主義工會，無組織的工人日益積極的參加，罷工的領導機關在鬥爭過程中已普遍的由羣衆自己建立。

在各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罷工運動顯然地向前增長。在法國，一九二九年的罷工人數比一九二八年增多一倍，在一九三〇年初罷工運動即表現更向前發展；在英國，一九二九年的罷工數量比一九二八年增多幾倍，在德國，雖在過去一年中經濟罷工的

數量減少了，但經濟罷工都帶着更酷烈更頑梗的性質，同時，在許多國家中，罷工通常是伴着羣衆示威，示威的結果工人與資產階級國家武力機關起流血衝突，也是常見的事實（美國，澳洲）。

或爲增加工資，或爲反對減少工資而發生的經濟罷工，最大多數通常是帶有政治性質，轉變成同盟罷工（法國所有罷工的百分之十六），轉變成擁護被資本家開除和處罰的工人的罷工（德國），以及轉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組織的罷工（羅馬尼亞）。就是在最殘酷無恥的法西斯蒂恐怖統治的國家中，罷工運動還是衝破了法西斯蒂專政的藩籬（意大利）。

十一 在已經走進危機狀況的國家中，革命浪潮正繼續生長着。雖然有時候經濟罷工的數量減少，但罷工的情形都更尖銳化，還有許多其他的鬥爭形式也可以表現無產階級羣衆的積極性。

失業運動廣泛地與罷工運動並駕而來，失業運動化作飢民隊，化作工人階級向政府和國會要求給予失業者麵包和工作，要求社會保險和由國家與資本家救濟失業工人的政治示威，化作被資產階級與社會法西斯蒂聯合力量殘酷壓迫的羣衆示威，這一運動逐漸捲入更廣大的失業與在業工人羣衆，在各地建立起失業委員會和失業代表會，摧毀資產階級的法律，在街道上實現工人羣衆的權利，並且動員廣大工人羣衆團結在共產黨的政

治口號的周圍（德國，波蘭，羅馬尼亞的最近許多示威）羣衆的政治罷工的口號，已是今日的議事日程。

十二 危機的發展和深入並不僅惡化了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危機殘酷地加害於農民羣衆，首先便是其最貧的階層，在這樣基礎上革命的農民運動便開始活躍起來（意大利，波蘭，希臘，羅馬尼亞），在有些殖民地國家中，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及民族革命運動匯合起來，發達到最大的範圍。中國反革命統一的破產與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的鬥爭尖銳化，革命的農民運動新浪潮便與牠們相伴而來（游擊隊與農民軍）。在印度，在深刻經濟危機與恐怖統治加緊的基礎之上，與大罷工（加爾克答，大印度鐵路）及政治示威同時並存的，有農民羣衆的革命騷動（彭加布），在安南，現在正發展着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一點，就是雖然革命浪潮在階級鬥爭的形式及其尖銳化的程度上都表現不平衡的發展，革命浪潮確是繼續生長，使工人階級走近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最主要的任務。

十三 在共產國際十次全會以後，在各國共產黨中，都發生在六次大會的路線基礎之上進一步的思想上的團結和鞏固的過程，與不正確的傾向（首先就是右派與調和派）作堅決的鬥爭，把腐朽了的和半社會民主主義的成份清洗出共產黨去，第十次全會，估

計右傾機會主義不能存身於共產國際中，估計調和派事實上是轉到右派的地位上去，這都完全證實了。

十次全會前，即被共產國際開除了的德國捷克斯拉夫，美國右派叛徒，對於工人階級的一切根本政策和策略問題已走到與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一致的地步，在十次全會後形成和已被共產國際開除的瑞典右傾機會主義反對派（齊尼布孟），以及法國黨內的在左派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分子，也都形成這同樣的變化。（在所謂擁護工會大同盟的虛偽旗幟之下的叛徒大聯合，所謂工農黨的廣告式的宣傳）。

右派的叛徒們與社會民主黨一樣的站在繼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觀點上，否認革命浪潮增長與戰爭危險增高的事實，提出與社會民主黨一樣的理由反對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獨立策略，企圖以社會法西斯蒂的工會機關的紀律來束縛在改良主義工會中工作的共產黨員，擁護共產黨員與社會法西斯蒂的統一戰線，積極參加社會法西斯蒂對於共產黨及蘇維埃的襲擊，並且供給襲擊的材料。

以托洛斯基為首領的托洛斯基主義的小殘渣實際上也是走這條道路。可以斷定托洛斯基主義叛徒們與右派叛徒們對一切策略與政策的根本問題的觀點，完全一致。托洛斯基主義與各國右派完全一致的公開的締結反共產黨的同盟（漢堡與中國），他們所做的都是為社會民主黨作直接走狗和企圖破壞各國共產黨的工作。

共產黨反社會民主黨與奪取羣衆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堅決鬥爭，需要盡量揭露打着共產黨旗幟的社會民主黨的走狗——右派與托洛斯基主義叛徒們的假面具，繼續清洗企圖在共產黨內起這一作用的所有成分，戰勝共產黨隊伍中一切機會主義的傾向，右派是主要的危險，「左派」也要克服。

十四、在危機開展，階級鬥爭向前尖銳化和革命浪潮成長的狀況之下，各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奪取無產階級的基本羣衆，是動員廣大勞苦羣衆（農民，破產了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壓迫民族），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及其領導之下，是保證黨在一切羣衆運動中的領導，是引導這些運動（罷工，失業運動，示威）——很多時候帶着自發的性質——走到有組織的政治鬥爭的道路上去。特別是引導牠們走到使工人階級走近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的政治罷工的形式上去。

爲實現這一階段上的這些主要的和有決定性的任務，根據十次全會決議，必須

1 鞏固黨的組織，尤其是生產支部與工會黨團，擴大吸收革命的工人羣衆到黨的組織中來，因此，進行徵收新黨員的運動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運動雖然進行的程度很不够，但在德國及美國最近幾月已有成績了。

2 在盡力加強宣傳鼓動工作的條件之下，必須保證共產黨工作方法與方式的改造能適應於領導無產階級，僱農和最貧農民階層的羣衆運動（無產階級的罷工，失業運動，

示威，以及本國的和殖民地的僱農，最貧農民的羣衆運動）的任務，實行這些羣衆運動實際上應有的準備。在英國這一工作方法與方式的改造任務特別銳厲，在這一點上共產黨已出版的日報，應當盡其偉大的作用。

3 爲實現基本任務——奪取羣衆的任務，在目前世界危機正在成熟的條件之下，羣衆左傾化的過程一定加緊的——在改良主義的工會中工作，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一工作是建立在實行把工人羣衆從改良主義叛徒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的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基礎上。此外同時需要共產黨加緊在革命工會中（法國，捷克斯拉夫克，美國）的工作，加緊吸收工人羣衆加入這些工會，保證共產黨在一切由下層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羣衆鬥爭的機關中（工廠作坊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失業委員會等等）的領導作用，在這種基礎上鞏固在改良主義工會中的革命工會反對派以便牠將來正式在組織上形成獨立組織。據上述一切，在德國的任務是鞏固革命工會運動的隊伍和這一運動的組織中心。

4 正在開展的罷工鬥爭，在許多國家是與工人階級的其他政治鬥爭方式（羣衆示威，同盟罷工等等）緊相混合着。羣衆政治罷工的口號廣大通俗化就成爲共產黨的當前任務，而在黨的本身工作上需要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方法並用起來。這樣在波蘭準備工人階級在正在成熟的一般政治危機中起領導作用，是黨的迫切任務。

5 殖民地與附屬國的共產黨的中心工作，應當是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以



及保證其階級獨立性，這是奪取無產階級在城鄉勞苦羣衆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作用的根本條件。在中國的任務是鞏固共產黨與赤色工會，以及奪取在國民黨工會中的羣衆和保證工人階級對於革命的農民羣衆的領導權。在印度，第一個任務便是建立無產階級真正領袖的共產黨。在南洋羣島與安南的共產黨員面前，也擺着同樣的任務。

#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

立三

現時革命鬥爭的發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提出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嚴重的任務擺在我們前面。如果對於這些問題不能找到正確的列寧主義的解答，我們將會犯到可怕的嚴重的錯誤，甚至斷送革命。我在最近幾期的紅旗上面寫了一些短篇的論文來解答這些嚴重的問題。雖然是零碎的篇章，却還可以找出系統的貫串。又因迫於實際工作不能再作長篇論文，所以把他彙集起來重行在布報登載，暫給這些問題以初步的原則的解答。

## 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

一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最大的商品和資本市場與原料的供給地。因此中國是整個帝國主義的經濟組織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帝國主義的統治失掉了中國，便是帝國主義——首先是世界三主要帝國主義日，英，美，滅亡的到來。所以中國革命成爲世界革命主要柱石之一。

中國革命最主要最嚴重的敵人是帝國主義，所以中國革命的勝負不只是一定要決定於國

內的無產階級廣大工農勞苦羣衆的鬥爭力量，而且要決定於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力量。同時中國革命的勝負也必然要決定世界革命的勝負；中國革命的勝利必然緊接着世界革命的勝利；沒有世界革命的勝利，也決不能保障中國革命勝利的持續。這是半殖民地中國，與蘇聯不同的條件得出來的必然的結論。

中國革命的開始，不只是一要遇到殘酷的國內戰爭，而且馬上要遇到更殘酷的國際戰爭——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革命的戰爭。這一戰爭只有，而且必然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與中國革命及全世界殖民地工農勞苦羣衆站在一邊（無疑的社會主義的蘇聯是這一戰線的領導者）全世界帝國主義與全世界殖民地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站在一邊；作決定各自壽命的最後的搏戰。中國革命要在這一最後的搏戰中取得勝利，同時世界無產階級也會在這一最後搏戰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完成社會主義的世界。

如果有人拿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國民黨政府可以用外交政策來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來比擬將來的形勢，那麼，他是完全沒有瞭解中國革命的階級關係的轉變——那時帝國主義還可以採用引誘中國資產階級叛變的方法來消滅中國革命——與整個國際形勢的截然不同，無疑的這樣忽視對帝國主義的殘酷鬥爭是極危險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只有在與帝國主義作決死爭鬥，取得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強大的援助與共同鬥爭的條件之下，才能保障最後的勝利。所以更加鞏固與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聯繫，特別

加強世界無產階級對中國無產階級的信念，加強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以取得他們對中國革命的強大的援助與及時的一致的行動，這是準備中國革命勝利的主要的條件，這是中國指導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而且是國際與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嚴重的任務。

## 二

依據中國這樣的客觀條件，取消派的人們便得出了他最無恥的結論，「中國革命高潮，只有在世界革命或者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才有再來的可能，並且才有勝利的可能」。這樣等待世界革命與帝國主義戰爭再來革命的觀點，這不只是沒有進一步的去瞭解國際與中國的客觀條件，而且沒有瞭解極粗淺的革命的各部分的力量互相推進的作用。遂形成了他「睡在李樹下等候李子落到口裏來」的最無恥的懶漢的觀點。

帝國主義是中國主要的統治者，固然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不能保障中國革命的勝利；沒有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決難有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勝利；可是就帝國主義統治的整個世界來看，中國是帝國主義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是最尖銳最嚴重的地方，這就是說帝國主義束縛世界的鎖鍊中，中國是最薄弱的一環，就是革命最易爆發的地方。所以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國爆發的可能，而且這一爆發以後，必要引起整個世界革命的興起。

中國是世界之主要帝國主義——英日美衝突最厲害的地方，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與社會主義的蘇聯直接接觸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最嚴重的地方，同時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最易爲尖銳化的地方——譬如現在每次工人的經濟鬥爭，都迅速的轉變爲嚴重的政治鬥爭以至武裝衝突。這樣一切帝國主義的根本矛盾都集中在中國，遂造成中國無可挽救的經濟政治的危機，造成不斷的軍閥混戰，造成統治階級無法穩定而日趨崩潰的基礎，造成工人階級與廣大勞苦羣衆只有日益走上革命來找自己解放的出路。這就是中國革命最易爲爆發的主要原因。

假如中國革命要首先爆發，自然要遇到極殘酷的鬥爭，極嚴重的犧牲，然而這是歷史付與的偉大的使命。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有最大的決心準備最大的力量來完成這樣偉大的歷史使命。誰想逃避這樣的使命爲這樣空前的殘酷鬥爭所嚇怕，他就必然成爲取消主義者，客觀上就是帝國主義統治的支持者。

## 三

目前革命形勢無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據中國的經濟政治的條件，在全國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黨的任務是在準備全國革命高潮之下最嚴重注意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條件。

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是全國革命政權的建立，是全國革命勝利的開始。根據

上面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的分析，更可知道一省與幾省的政權的奪取，是有的他嚴重的國際意義。他不只是馬上要遇到殘酷的國內戰爭而且馬上要遇到殘酷的國際戰爭。所以在我們準備這一勝利的條件的時候，必須嚴重注意這樣偉大的殘酷的鬥爭，決不容許我們有絲毫的兒戲。

我們要特別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要準備各種革命勢力的平衡發展，要準備全國的配合，而且要特別加強與世界革命的鬥爭聯繫，這都是準備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世界革命浪潮的正在發展，無疑的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可是世界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注意——雖然有共產國際的指導與號召，還是不夠，所以我們在準備偉大的革命鬥爭的時候，要嚴重注意與國際無產階級的聯繫，而且我們應當要求國際動員全世界無產階級注意中國革命問題，準備擁護中國革命偉大的爭鬥。

## 論革命高潮

### 一 革命形勢決定黨的戰略

黨的主要戰略，是要依當時的客觀形勢來決定；我們要正確的精密的去估量客觀形勢就是爲着要確定我們的戰略，與戰略的轉變。在有革命形勢與沒有革命形勢時，以

及在一般的革命形勢和革命高潮時，無產階級列寧黨的戰略是完全不同的。

六次大會正確的指出：『現時沒有廣泛羣衆的革命高潮，……：武裝暴動只是宣傳的口號』，『將來新的高潮時，便應把武裝暴動從宣傳的口號變成直接實際行動的口號。……』

所以我們提出革命高潮問題是有嚴重的戰略轉變的意義：如果離開黨的戰略而斤斤於現時是否是革命高潮的爭論，成者說『黨的戰略並沒有甚麼不夠』，而對革命形勢又估量是『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名詞的爭論。這是十足的書生式的清談，完全不是列寧主義者提出問題的方式。

## 一一 革命高潮的標誌

現時形勢，無疑的是革命復興，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勢。可是在全國範圍內的確還沒有表現出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主要的標誌。

對的，現時土地革命是有空前的發展與深入，生長了很多的蘇維埃區域，特別是紅軍的擴大與鞏固。工人鬥爭與罷工運動也在繼續不斷的興起，兵士羣衆也在日益革命化。然而這些只能說是革命高潮將要到來的形勢，還不能說是革命高潮已經到來。

革命高潮的主要的標誌，一定要注意革命勢力中先進階級——工人階級的鬥爭形勢。只有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湧現了工人鬥爭的高潮，廣泛的甚至落後的工人羣衆都表

現出對政治鬥爭的積極，才是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標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動搖統治階級的根本，才能領導各種革命勢力匯合起來，進行奪取全國政權的武裝暴動。現在工人鬥爭的形勢，的確比以前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已經漸次從國民黨黃色工會領導之下脫離出來，走向反國民黨反黃色工會的鬥爭；從和平合法的鬥爭方式之下解放出來走向直接鬥爭。這樣的不同，的確有嚴重的政治意義，證明工人階級已經得到很多的政治經驗，已經有了更高的政治覺悟，成爲革命高潮將要到來的的主要徵兆。可是另一方面的確表現出還停留在一廠一業的鬥爭，還沒有匯合成爲偉大的爭鬥，還表現出時起時伏的散亂的形勢，特別是還留有不少的對國民黨黃色工會幻想的殘餘，以及最主要的產業工人——鐵路，海員，兵工廠，市政工人，還沒有普遍的積極起來，這些現象就可說現在還不是廣泛羣衆的革命鬥爭的高潮。自然在現在軍閥混戰日益擴大，統治階級統治的力量日益削弱的形勢，經濟與政治的恐慌更加嚴重的形勢，特別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形勢，革命高潮的到來決不會是很慢的。而且在這樣客觀條件日益成熟之中，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有爆發革命高潮的可能，這是要我們嚴重的注意，決不可絲毫忽視的。但是即令明天就爆發革命高潮，今天這樣的估量，仍然不免是錯誤的。

就一般的說決不是每一個工人羣衆的總罷工都可以發展成爲革命高潮，而必須有其他各種必要的條件的配合。在現在中國的形勢，有了農村暴動的廣泛的發展，有了工



農紅軍的迅速擴大，有了兵士的動搖與自覺的譁變的事實的增加，有了統治階級這樣嚴重的危機，的確只要是在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爭鬥，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這更是我們應當特別嚴重注意的。因此取消派在估計客觀形勢的時候，完全把農民暴動的發展除外，現在更進一步的與國民黨同盟的詈紅軍爲土匪，這除掉幫助統治階級欺騙羣衆來消滅革命以外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

### 三 目前主要的危險仍然是對革命形勢估量不足的右傾觀念

我們對於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左傾幼稚的觀念固然應當避免；可是目前主要的危險，仍然是對革命形勢估量不足的右傾錯誤。在現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之下，左傾的觀念，只要還沒有犯到過早暴動的策略上的嚴重錯誤的時候（當然，如果我們不及時糾正必然會犯到這樣策略上的錯誤），還不會大有害於羣衆鬥爭；可是對革命形勢估量不足的右傾錯誤，不要說連到策略問題，就是這種觀念本身已足灰懶羣衆鬥爭的勇氣與決心，已經是幫助統治階級鬆懈革命陣線緩和革命鬥爭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們應當嚴厲的指斥這種觀念的錯誤！

我不願意多來批評取消派的「現在絲毫沒有革命高潮的象徵，只是統治階級穩定，革命低落時期」的說法，因爲這不過是幫統治階級宣傳的無恥的勾當。經濟的事實已

經回答他：嚴重的工業恐慌與軍閥戰爭所造出來飢荒與破產都是表示出革命的形勢。政治的事實也已經回答了它：反動統治的恐慌，戰爭的擴大與延長特別是工人鬥爭的尖銳化，農村暴動的普遍發展，紅軍的擴大與兵士的革命化。這難道還不够說明革命形勢的存在與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嗎？如果否認這些事實，那麼，他若不是瞎子便無疑的是在無恥的替國民黨蔣介石作宣傳。我要勸動搖於取消派的人們（聲明一句決不是勸陳獨秀彭述之劉仁靜梁幹慈……等純粹的取消派，因為他們已經是自覺的階級叛徒，列寧主義的叛徒），去拿列寧著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資基第七章甚麼是國際主義中論到當時歐洲革命形勢的一段細讀二遍，便瞭然於這樣的真理，便可知道陳獨秀彭述之們現在幹的甚麼勾當！

現在要特別批評的就是黨內現存的一種對工人鬥爭的悲觀觀念，他並不否認革命形勢的發展，他覺得現在工人鬥爭沒有如農村鬥爭一樣的高漲的形勢，也還是對的。可是他因此便懷疑到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他覺得工人鬥爭很難有很快的高漲，這就是極危險的右傾錯誤。在他這一分析上，缺乏一點非常重要的認識。他只機械的看到了現在羣衆的組織力量還是很薄弱，黨的組織是更加不够，便結論到革命高潮不會很快的到來。他却不知道在經濟政治的恐慌日益嚴重，廣大羣衆失業破產飢餓死亡沒有出路，這些革命客觀條件日益成熟的時候，再加以統治階級改良欺騙日益破產和羣衆鬥

爭已在發展的條件，那麼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有爆發革命高潮的可能；而且在革命高潮到來的形勢之下，羣衆組織可以飛速的從極小的組織發展到幾十萬人甚至幾百萬人的偉大的組織，同樣，黨的組織也可以在幾星期甚至幾日以內變成廣泛的羣衆的黨。這是在革命的歷史上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證。如果在黨決定策略的時候不抓住這樣的客觀形勢，無疑的要犯到嚴重的右傾錯誤，而且無疑的將會成爲革命發展的尾巴，甚至阻礙革命，那就已經是十足的機會主義了。

自然這樣的認識決不會使我們鬆懈對於加強城市工作的特別注意。因爲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尤其要特別加強黨在工人羣衆中工作，極力擴大羣衆的組織與黨的組織，加強羣衆的鬥爭力量與黨的政治影響；然後才能樹立強固的基礎促進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領導革命的澈底勝利。否則革命高潮的爆發，將使我們措手不及，而又受到嚴重的失敗（不管這一失敗是如何暫時的，都是嚴重的罪過）。所以特別注意工人運動的工作，加強赤色工會的組織，組織政治罷工與同盟罷工是目前黨的最主要的任務。

### 準備建立革命的政權

目前全國範圍內還不是革命的高潮，但顯然的是逐漸接近於這種革命高潮的形勢。因爲如此，所以準備建立革命政權的問題，在目前便應該使廣大羣衆的嚴重注意，因爲

他造成了最近鬥爭的目標，他已經有了實際的策略意義。

就全國範圍內看來，革命的羣衆鬥爭，工人，農民，士兵，紅軍，確是一個普遍發展的形勢。從哈爾濱，唐山，天津以至武漢，上海，廈門，廣州，香港，都是平衡的向前發展。在目前這一統治階級大破裂的客觀形勢之下，使着無產階級的先鋒——共產黨，必須顯明的認清最近革命發展的前途。革命高潮的客觀條件已經無疑義的正在成熟，我們只是不能預料其爆發的時日，只是要盡量準備着這一爆發，只是要用最大的主觀的努力，以配合與促進這一客觀形勢的發展。

在這樣形勢之下，怎樣去建立革命政權將要成爲策略路線的中心問題。我們黨第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案上說：

「反動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

這個原則在目前接近革命高潮的客觀形勢之下，他有嚴重的策略上的意義。他告訴我們，當全國範圍內已經到了革命高潮的時候，但革命政權或許不能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

因爲中國在經濟上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集中的組織，還沒有壟斷全國經濟之唯一的中心。上海是長江流域的統治中心，但還不能說是全國的唯一中心。南方的經濟中

心是香港，北方的經濟中心是天津，滿州的中心是大連與哈爾濱，他們固然都受上海的影響，但上海並不能絕對的支配。這種形勢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使全國政治上有許多封建軍閥的勢力，將中國分裂成一種顯然割據的局面。這不僅對統治階級有嚴重的影響，他同樣也影響於革命發展的前途。柏林的暴動，可以——並且必然——使整個德國起來響應，巴黎的勝利便是在整個法國勝利，但中國確沒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這樣的作用。上海是中國第一個產業中心，這裏若發生了暴動，自然對全國以至對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但他並不能馬上使全國反動勢力都完全死滅，一九二七年的三次暴動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其他的城市，自然比上海的領導作用還要小。在這一種形勢之下，革命勢力在某一省或某幾省得着勝利之後，反動統治還不免可以在其他省區內保持一個相當時期的最後掙扎。我們的任務是要力爭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前途，建立全國的革命政權。來完成我們全國革命的勝利。

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雖然還不是全國範圍內的革命勝利，但他必已經是有全全國範圍內之革命高潮。這種政權雖然建立於一省和幾省，但他的基礎一定不只是依靠於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勢力，而必然要依靠於全國範圍之廣大的革命高潮。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一省或幾省的政權，不但不是一個和平割據的前途，並且比現在各省蘇維埃區域還要更激烈的爭鬥，極力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經過一省或幾省的政權，過渡到

全國範圍內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

## 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的條件

六次大會指示我們：

「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與幾省重要省區首先勝利」。

最近政治事變與革命形勢的發展，已顯示出全國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可是另一方面雖然全國的統治階級無疑的都在日趨於崩潰，然而各省軍閥撐持他的統治的力量上已有明顯的強弱的不同；因此全國的革命鬥爭雖是同樣的日益尖銳，而發展的速度與各種革命勢力配合，也就表現在某幾省區更加成熟的形勢。這完全證明六次大會指示的正確。因此在準備全國革命的勝利的任務之下加緊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已成爲黨的目前的總的戰略。

第一，首先要瞭解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是與全國革命高潮不可分離。『沒有革命高潮的條件之下，這種勝利沒有可能實現』（六次大會）。因此要取得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首先要注意全國的配合，沒有全國的配合，決沒有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現在軍閥混戰的擴大與加深，無疑的是更便利於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條件；可

是只要革命已經或者將要在各省勝利的時候，反動勢力的各派，各省軍閥，尤其是各帝國主義，馬上要拋棄他們相互的矛盾聯合一致的來壓迫革命。以前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政府可以割據廣東一年來準備自己的力量形勢，在現在蘇維埃革命的階段是絕對不會有的事。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以後必然是緊接着殘酷的戰爭，不僅是消滅反動勢力的內戰，而且是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際戰爭。如果不是有全國革命的高潮，如果不能調動全國無數千萬工農兵士勞苦羣衆，一致堅決的與反動勢力作拼死的決戰（並且還要加上全世界無產階級尤其是蘇聯的有力的援助，一致的鬥爭），決不能克服反動勢力爭取全國的勝利。所以一省與幾省政權，必須是緊接着全國革命的勝利，決不能有甚麼「割據」，「偏安」的局面。所以在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時候，如果只注意在某幾省區的狹隘的範圍而忽視了全國工作同時加緊的配合，便是絕對的錯誤觀念。

第二，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中心城市，產業區域，特別鐵路海員兵工廠工人羣衆的罷工高潮，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想「以鄉村來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種幻想，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所以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的條件，特別要加緊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產業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組織政治罷工，擴大到總同盟罷工，加緊工

人武裝的組織與訓練，以創造武裝暴動的勝利的基礎，是準備一省與幾省政權奪取的最主要的策略。還要特別認識，在統治階級日趨崩潰，鄉村的統治日益失敗的時候，必然要緊抓着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作決死的掙扎，因此城市的爭鬥必然要比鄉村還要殘酷十倍。所以在城市尤其重要產業工人中，樹立起摧毀不壞的基礎，喚起着廣大羣衆拚死鬥爭的決心，是目前最嚴重的工作，是戰略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第三，在中國客觀經濟政治條件之下，單只無產階級鬥爭的高潮，而沒有農民的暴動，兵士的譁變，紅軍的有力的進攻，各種革命勢力的配合，同樣是絕對不會有革命的勝利。而且在這四種革命勢力中，缺乏任何一種，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輕視農民，不要紅軍的思想，無疑的是企圖削除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消滅革命的戰鬥力的反動思想。同樣，認現在城市的工人的鬥爭尚未高漲起來，要現在農村中採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紅軍的發展的等待觀念也是極端錯誤的。農民在革命中作用的偉大，比以前俄國革命的情形，還要嚴重得多；在土地革命中產生出偉大的紅軍力量，更是中國特有的條件，這是托洛斯基主義取消派所絕對不能瞭解的，所以托洛斯基主義的危害革命，在中國尤為嚴重。現在的形勢，工人鬥爭固然還沒有進到革命的高潮，農民暴動與紅軍發展也還是表現着不夠。我們應嚴重注意加強工人的鬥爭力量，決不應過慮農民與紅軍的發展超過城市超過工人。因為即令農民與紅軍的發展超過城市，超過工人，決不會



有害於城市工作有害於工人鬥爭，而且還可以幫助工人鬥爭更便利發展的條件。所以我們的策略，不是停止農民與紅軍的發展，而是要特別着重工人鬥爭力量的加強。所以我們對於農民與紅軍，同樣要採取積極發展，擴大與進攻的策略。

四月二日

### 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

現在革命的發展，無疑的是日益接近着新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這一形勢的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把廣泛的落後的羣衆——無論在城市與鄉村都是一樣，都捲入到政治鬥爭的漩渦。因此加緊準備武裝暴動，準備並促進這一新的高潮的到來，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革命政權，成爲黨的目前的中心任務。

按照中國客觀的經濟政治的條件，這一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將要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決不能與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分離，尤其是要爭取這一勝利，必須是工人，農民，兵士，紅軍鬥爭力量的總的匯合，特別是工人階級的領導。沒有極廣泛的罷工運動，沒有中心城市的政治的總罷工，決不能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

因此無疑的，紅軍是主要革命力量之一，可是想單憑着紅軍的力量，來奪取一省與幾省的政權，建立全國革命的政權，便是一種異常錯誤的觀念；因爲不只是不可能的幻

想，尤其是這樣的觀念，便會在策略上忽視着我們最主要的工作：組織工人的爭鬥，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工人的武裝隊。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們的頭腦與心腹，單只斬斷了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制他的最後的死命。這一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的殘酷的爭鬥，主要是靠工人階級的最後的激烈爭鬥——武裝暴動。所以忽視準備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不只是策略上的嚴重的錯誤，而且會成爲不可饒恕的罪過。

這一偏向的來源由於不信任現在工人階級的力量，工人鬥爭的悲觀觀念。他覺得「現在革命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鄉村的發展，特別是紅軍的擴大遠超城市，遠超過工人的鬥爭。」因此便形成單憑紅軍的力量可以奪取政權的觀念。而在策略的結論上便必然走上忽視應特別注意加強組織工人鬥爭的偏向。

自然從這樣對工人鬥爭悲觀的觀念出發，而走到這一策略的偏向，還是比較積極的較好的一方面，更壞的一方面必然會走到取消紅軍，取消農民暴動，取消革命的取消主義派傾向上去。

就現在的鬥爭形勢看，鄉村已有極廣泛的農民暴動，蘇維埃區域普遍的發展，而城市工人階級的鬥爭，只是一廠一業的罷工而沒有形成偉大的政治鬥爭，的確是表現不平衡。不過這僅僅是表面的，今天的形勢。至於階級鬥爭的實質與廣大羣衆的政治覺

悟，無論城市與鄉村的確是同樣的異常的尖銳。無論在南方與北方，在任何一個城市中的工人鬥爭，每一個很小的經濟鬥爭都很快的轉變為嚴重的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政治鬥爭，轉變為殘酷的武裝鬥爭；而且激烈的反黃色工會反國民黨的鬥爭，已經普遍的在工人中發展，在上海，天津，青島，武漢，都爆發了政治罷工與示威運動，這就充分表現出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其所以還沒有匯合成為偉大的總的政治鬥爭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統治階級白色恐怖的鎮壓，統治階級鎮壓革命的力量遠超過工人鬥爭的力量。無疑的現在統治階級是日趨崩潰的末日，可是正因為他在日益恐慌，特別是在鄉村已表現失敗的時候，他必然要儘他的力量在城市中作頑強的掙扎。這樣就造成城市工人鬥爭，更殘酷的更嚴重的條件，這樣就造成今日城市工人鬥爭還沒有總的爆發的形勢。如果統治階級在城市，也如在鄉村一樣毫無統治的力量了，那麼，便已經到了他上斷頭台的最後的末日。

因此，城市的鬥爭，既然更加嚴重，更加殘酷，所以更需要偉大的強固的革命的主觀力量，才能衝破白色恐怖的鎮壓，戰勝統治階級，促進他的死亡，就現在主觀力量的估計，的確，無論在黨與羣衆的方面都還是異常不夠。因此特別注意工人羣衆中的工作，加強黨與羣衆的力量，組織政治罷工與同盟罷工，以匯合現在還在散亂的鬥爭形勢，成為偉大的革命高潮，這是黨準備建立革命政權任務的最中心的策略。

可是還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要認識現在軍閥戰爭的繼續擴大，無可解決的經濟政治危機迅速的加深，無疑的要使到統治階級統治的力量繼續削弱，更促進工人鬥爭力量的飛速發展，而造成革命高潮的更成熟的條件。這就是說現在統治階級這樣的鎮壓，僅僅是企圖維持自己壽命的掙扎，不只是不能由這一掙扎重復走到「穩定」的途程，而且一掙扎只是加速他的崩潰。因為統治階級無辦法緩和根本的政治經濟的危機，自然最後掙扎的白色恐怖，只是更促進廣大羣衆的憤慨與鬥爭的決心，使最落後的羣衆都會漸次認識除掉推翻現在的統治，毫無生路。所以我們目前特別注意加強工人鬥爭的力量，是有很便利的客觀條件。雖然這一鬥爭是異常殘酷的，可是，確有很快發展的可能。並且在這樣客觀條件更加成熟的時候，將會在一瞬間，爆發出偉大的爭鬥，這就是說從現在到工人革命的高潮；決沒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因此如果只看見現在工人的總的爭鬥尚未形成便主張停止紅軍的發展以等候工人爭鬥，是異常錯誤的觀念。

所以特別注意發展工人鬥爭的力量，組織政治罷工與同盟罷工以加強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力量，這是現在黨準備新的革命高潮，首先奪取一省與數省政權，建立革命政權的中心策略。單想憑藉紅軍的力量以奪取政權自然是錯誤的觀念；如果企圖停止紅軍的發展以等候工人鬥爭的高潮，甚至主張取消紅軍，那就走到了與取消派的觀念毫無根本的區別了。

## 建立革命政權與革命轉變

現時全國革命鬥爭無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勢，因此準備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建立革命政權的問題，已經提到黨的任務的前面。緊隨着這一問題要同時，而且必然同時提出的就是革命轉變——從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

目前革命鬥爭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是消滅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所以無疑義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取消派認為現在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終了，是使我們放鬆民主革命的任務，放鬆動員廣大羣衆的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的民主思想。可是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份，因此民主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同時也必須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澈底勝利與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可分離，而且必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鞏固與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勝利。這就決定民主革命的勝利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勝利。

革命已經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時候，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必然要用盡一切力量來反對革命，經濟怠工，組織反革命的暴動與武裝進攻等。這一殘酷的戰爭是對帝國主義買辦地主階級的戰爭，同時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戰爭。這時革命政府為着力爭全國革命的勝利，不只是要沒收土地，沒收帝國主義的銀行企業工廠，

使民主革命幹到澈底而且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以剷除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武器；並且爲着對付嚴重的經濟封鎖必然要實行組織生產，管理生產。同時在政治上，爲着對付這樣頑強的反革命的進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獨裁的政權，這就必然需要從工農專政進到無產階級的專政。政治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沒收資本家的工廠企業和銀行，由革命政府來組織生產管理生產，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了。所以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中間決不會有絲毫的間隔。

如果以爲革命一定要在全國勝利以後，才能開始革命的轉變，這是嚴重的錯誤。因爲這時革命政府如果不堅決執行階級的政策沒收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和銀行以剷除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武器，不只是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會障礙着力爭全國革命的勝利，這就是革命的自殺政策。所以革命轉變的階段論，無疑的是極端危險的右傾觀念。另一方面如果以爲「革命勝利的前夜，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開始勝利後，革命政權一開始建立便是純粹社會主義的政權」，也是錯誤的。這就忽視了革命轉變的過程（不管這一過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是一必然經過的），忽視了這時反帝國主義反豪紳資產階級的殘酷戰爭，還需要民主革命的口號和政策以動員千萬，萬萬羣衆來克服這一反革命的進攻。所以這一錯誤的觀念，也是很危險的。

革命勝利的開始，必然就是更殘酷的階級戰爭，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除掉極力進

行反革命武裝的進攻外，必然還要用盡一切方法來引誘尙留在革命戰線的小資產階級（鄉村殘留的富農與中農，城市中的小商人……等）來反對革命。所以在革命轉變的過程中不可免還要發生新的動搖與叛變。所以我們決不應幻想革命的和平轉變，而要從現在起運用我們正確的策略，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建立僱農的獨立組織並鞏固與貧農的聯合，肅清富農的影響，穩定中農的動搖，以減少將來革命轉變的困難。這樣正確的堅決的策略，的確有決定將來革命轉變，比較順利的嚴重意義，不容我們絲毫忽視的。

決定這一革命以及革命轉變勝利的另一重要的條件，就是已經勝利的蘇聯無產階級的有力的幫助，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興起。依據中國半殖民地的條件，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與世界革命的勝利將是不可分離。中國革命對帝國主義的空前猛烈的爭鬥，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就目前世界革命浪潮正在高漲的條件來說）同時沒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高潮，決不能保障中國革命勝利的持續。所以特別加強中國革命在國際無產階級中的宣傳，特別是加強鬥爭的聯繫，實在是目前嚴重的任務，是準備革命勝利與革命轉變的主要條件之一。

# 論國民黨改組派

瞿秋白

「中國裡面，應當是：或者中國的莫索里尼，像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的人，得勝，隨後再被土地革命的浪潮推翻，或者武漢。蔣介石和他的黨徒，企圖站住在這兩個營壘的中間，一定應當倒下去，和張作霖張宗昌的命運相同。」（斯達林）

現在的情形，早已證明蔣介石的「中國基瑪爾主義」的完全破產。蔣介石從所謂「中間營壘」，滾到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營壘」裡去。張作霖雖然死了，張宗昌雖然失敗了，他們的軍隊或者僅僅保存在滿洲，或者大部分崩潰了，可是，他的社會基礎——封建勢力，仍舊在全中國占着統治的地位，不但在經濟上，並且在政治上還是占着統治地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企圖「改良」中國到「民族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嘗試，正確些說，改造中國到「以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半殖民地」，來代替從前「以封建勢力為基礎的半殖民地」的嘗試，顯然是破產的了（很相對的比較：「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時期，俄國的農奴制度的專制政體，向着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方面進了一步——」。中國，却連這樣的一步，也沒有做到）。「北伐勝利」後幾個月內的資產階級的幻想（財政會議，經濟會議等），「中國基瑪爾主義」——「嚇壞了的資產階級的迷夢」（統一裁兵，關稅自主），很快的都驚醒了，對於資產階級自己都明白



了。固然，南京政府比較起北京政府不同，中國現在的南京政府已經不是純粹的地主買辦的政府，但是，他亦沒有能够最終的形成地主和全體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中國資產階級留在國民黨現存政權之內的成份，只是買辦鉅商銀行界和極大的所謂工業家的大資產階級。蔣介石喪失了他在三月二十，四月十二政變前後的社會基礎，（民族資產階級）之後，方才能夠在豪紳地主領導的政府裡面，保存自己的參加，蔣介石已經代表大資產階級。至於民族資產階級的中等階層，却又落到了所謂「中間營壘」，他們對於豪紳地主買辦及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得不立在「在野黨」的地位。這樣，既然是蔣介石移轉他的社會基礎到大資產階級，投降封建地主，而和他們組成統治的聯盟，那末，在一般的來說，始終還是「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的人」得勝了；——並不是國民黨消滅了北京政府，這就算當時「企圖站住在兩個營壘中間的」那個蔣介石得着了勝利。並且，因為一則在這聯盟之內，封建軍閥占着指揮一切的地位；二則「在中國沒有這樣的政治派別，或者政府，能够實行甚麼斯託柳賓式的改良」（斯達林「論反對派」第六百三十四頁）——連這樣封建地主階級的改良，也不能實行；三則統治着中國的列強帝國主義亦沒有能力實行對於中國的「民族改良」，他們內部的衝突矛盾，更加使他們的所謂「讓步」，所謂「幫助」，只是支配着中國軍閥混戰，進行準備太平洋大戰的步驟，他們只在更加鞏固封建地主的立場，而並不能夠把那中國式的「農奴制度的專

制政體』（「帝國主義皇帝」根據封建地主的掠奪統治），向着變成中國式的「資產階級的立憲君主政體」，（「帝國主義皇帝」之下根據資產階級的「立憲統治」）的方面，推進一步，——換句話說，就是比較有些和斯託柳賓改良相同意義的一步，他們也不能夠完全做到；所以，雖然中國的封建統治是在瓦解腐敗，雖然帝國主義對華的強盜統治是在發展着內部的矛盾，而有崩潰的危險，然而他們却不能夠找着甚麼新的道路：一方面可以保持帝國主義封建地主的政權和收入，別方面又能稍稍解除中國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的道路，而只有繼續舊的道路：就是利用軍閥割據和混戰，經過買辦地主加緊剝削，同時，發展自己內部的衝突，經過這些「小戰爭」，而向着「大戰爭」的方面前進。這樣，中國現在的反革命營壘，分裂着兩個政治集團。第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集團，在這個集團之中，有經常不斷的日益發展的內部衝突和鬥爭，他們沒有能力實行甚麼「地主階級的帝國主義的改良」，「可以用來做統治階級的避電針和戀命湯」（*Zpouombog u cpeđicibc on m neku*），而變成純粹依靠恐怖政策的統治。

蔣介石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的「積極起來」，經過一九二七年四月叛變，到一九二九年七八月的上海經濟會議，用着許多方法，企圖完成「中間營壘」的統治，得到「資產階級的勝利」——當然不是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的勝利

，而祇是保存着地主階級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保存帝國主義對華的統治，自己想得到真正的參加政權，更多份的取得對於中國羣衆的剝削成份。——在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剝削之下，形成新式的買辦國家（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和『中國的國際發展』），這些企圖，都完全破產，比那『地主封建的改良』，自然更加沒有實現的前途。如果蔣介石留在南京政府裡面，那麼，這並不是說『民族資產階級』不但參加政府，而且是國民黨政府的領袖階級。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之中，那些沒有佔領國內經濟命脈的中等資產階級，並沒有取得政權。他們這個『中間營壘』始終是失敗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第一次的嘗試——蔣介石的國民黨完全變成豪紳地主大資產階級獨佔的國民黨，便幫助汪精衛變成『蔣介石第二』，『三月二十的蔣介石第二』，國民黨裡再發生『第二號的國民黨』（改組派），這是『中間營壘』找着新的表示，新的政治形成，這就是汪精衛的國民黨改組運動，亦可以稱爲中國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嘗試。武漢時代，汪精衛曾經代表所謂『激進的資產階級』動搖的店東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界；這種上層小資產階級在武漢時代害怕土地革命和封建地主的兩面夾攻，受着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而離開革命；武漢的失敗，是『革命喪失了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界』（斯達林『論反對派』第六百二十四頁）。那時，汪精衛就急急乎召集長江流域的商民會議，特別勇敢的起來擁護『工商業者』的利益，站在所謂『反動勢力和共產黨兩面夾攻的地位』

，轉向自由派的資產階級，「反對赤白帝國主義、反對共產和反動」。從此，在一般的發展過程之中，所謂「國民黨的改組運動」就成爲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代表。

上層小資產階級，當然附屬在這種集團裡面。這些階層，在中國劇烈的一般政治經濟的危機裡，日夜處於破產失業的危險前面，同時，很厲害的恐懼工農革命的發展，他們亦都和封建式的土地制度聯繫着，他們並且認爲工人罷工農民抗租的運動是他們破產的主要原因，而工農革命的勝利，更是他們不可挽回的滅亡，他們痛恨帝國主義和軍閥，不是爲着要革命，却爲着帝國主義和軍閥惹起革命的發展。他們絕無疑義的是反革命的力量。他們如果是南京政府的反對派，那麼，正是因爲南京的反革命中心已經沒有力量維持反革命的統治，因爲他們企圖救濟中國的反革命，中國國民黨的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他們的運動，事實上也正是維持這種階級統治的運動，竭力去保持國民黨對於羣衆的影響；現在黃色工會的運動，鄉村自治的運動，青年軍官的運動裡，都可以看見改組派的影響。這就是「第二號國民黨」的意義。中國自由派的資產階級決不能用「民族的民權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制度對抗。恰好相反，中國工農革命運動暫時失敗之後，現時中國資產階級，一般的都和帝國主義混合生長着，或者竭力求得這種混合生長，並且和土地的封建關係密切的聯繫着，這在汪精衛改組派的政綱裡，也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他們必然和第一集團的某些派別結合起來，去反對其

他的派別。中國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和矛盾，例如蔣介石和汪精衛的矛盾，結算起來，亦是附屬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封建地主各派之間的矛盾。

這樣，中國反革命營壘的第二個集團，就是自由派資產階級，這個集團當然有他的「尾巴」，上層的小資產階級，可是領導的階級却無疑的是資產階級；他們是處於「在野黨」的地位，來積極的維持帝國主義封建豪紳統治的反革命力量；他們是用資產階級的政綱蒙蔽羣衆，努力阻止羣衆的革命化，並且要利用羣衆達到自己「分贓」的目的，引導羣衆離開推翻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整個統治的鬥爭。

「中國只有「北京」勝利，或者「武漢」勝利。這個所謂「武漢」現在早已改名爲「廣州公社」了。「廣州公社」是暫時受着失敗了。但是，最近工人運動之中羣衆罷工鬥爭的發展，經濟鬥爭的常常轉變到政治鬥爭；農民騷動的不斷發展，游擊戰爭的擴大和進展，決不是「退兵時的戰鬥」，兵士羣衆裡的開始騷動，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軍閥的羣衆示威……凡此一切，都明顯的表示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是在生長起來，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營壘，是在「招兵買馬」準備自己的隊伍，收集自己的力量，向着「變軍閥戰爭爲反對軍閥的戰爭」，向着對於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總攻擊的方向進行。

「中國工農革命運動暫時失敗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他的經濟利益和列強帝國主

義的財政資本，已經密切的混合生長着（美，英，日），他聯合着封建的反動派，在保持中國獨立的問題上，已經完全破產，而且走到反對中國獨立的帝國主義的營壘裡去。

現在中國三派軍閥之間的內部戰爭裡，這三派都是各國帝國主義政府的工具，這種戰爭很明顯的指示：中國統治者的各派利益，基本上和中國民族統一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中國的統一以及中國的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和土地革命及一切封建餘孽的肅清，是不可分割的聯結在一起。然而，解決這些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主要任務，却只有在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工農革命新高潮的基礎之下，方才能够實現。這個新高潮的條件，無疑的是在成熟起來，他不能不引導到建立蘇維埃，用來做工農的革命的民權獨裁機關。〔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體會議議決案〕。

○ ○ ○

中國贊助帝國主義的統治營壘，必須分別下列的兩個集團：一、封建地主大資產階級，二、自由派資產階級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爲什麼？因爲，否則就有兩個錯誤的傾向：（一）是和武漢時代相比，認爲籠統的小資產階級還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認爲汪精衛的改組派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因此，不但忽視反對改組派的鬥爭，甚至於有聯合汪陳派的提議。這種錯誤的觀點，是不看見小資產階級內部的階層之中，城市貧民是在革命的營壘裡，而汪精衛派決不能代表他；這是不看見上層小資產階級現在

不能有甚麼獨立的政治路線，他只是汪精衛派所代表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附庸；再則，這亦是默認整個資產階級已經參加南京政府的國民黨的政權，不合再是『在野黨』，如果是野黨，那一定是籠統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這並且是『暗中』承認國民黨的政權已經是資產階級的政權，承認南京政府的社會基礎，不是縮小，却在擴大。這是偷運機會主義估量的私貨。（二）是認爲資產階級既然是絕對的反革命力量（這當然是完全正確的），因此，資產階級和地主沒有分別，買辦及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所謂『左派』亦沒有分別，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地主資產階級亦沒有分別，因此中國只有兩個營壘：一是國民黨，二是共產黨，絕對沒有『中間營壘』，（這兩個『因此』就不正確了）。這種觀點，亦是非常錯誤的，亦是引導到忽視反對改組派以及第三黨的鬥爭，引導到忽視爭取羣衆的任務：引導到黃色工會裡工作的不積極，農民原始組織裡的羣衆工作完全不注意，而且發生農村中的『和平發展』主義，兵士羣衆運動的工作遲緩，而放任那些自由派的青年軍官抓住兵士羣衆裡的相當的影響。爲什麼？因爲想着：反正除共產黨以外，一切都是一模一樣的反動派，反正他們是沒有羣衆的，不能取得羣衆的，羣衆天生是在共產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彭述之在資產階級還有相當革命作用的時候，否認中國有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改良主義的存在，那已經是極有害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現在，資產階級絕對的反革命了，他更確定的用自己的在野黨態度來欺

騙民衆，用所謂「民族改良主義的左派」的名義來引導羣衆走到青天白日主義的道路上去，這樣的擁護反革命統治，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否認民族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特別危險，把他們和封建地主完全混淆一起：蔣介石和李濟琛一樣，汪精衛和蔣介石一樣，一樣的不能影響羣衆，——這就是完全忽視爭取羣衆的任務，引導到很有害的機會主義的消極。

○ ○ ○

封建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內部，是受着列強帝國主義的支配，而在發展着中國的軍閥混戰——各省區的地主軍閥，是在互爭市場和剝削工農的政權機關。資產階級在這混戰之中決不是一希望和平，不願戰爭」。改組派當初的和平主義宣傳，事實上是準備新的軍閥戰爭，以便隨後自己供獻「資產階級政綱的旗幟」給作戰的某些軍閥，而希望參加分贓。現在張發奎果然拿着汪精衛的旗幟對蔣介石宣戰了。照第一種錯誤見解的觀察：應當是「以前蔣桂戰爭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地主的戰爭，李濟琛被捕了，封建勢力也被捕了」——幼稚的中國共產黨員可以做這樣的結論；現在汪蔣戰爭，又是「小資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了，那麼，小資產階級拿着武器和資產階級及地主宣戰，我們無產階級要贊助他」，——又可以做這樣的結論。照第二種錯誤見解觀察下來；應當說：「汪精衛蔣介石李濟琛都是一樣，反正他們的戰爭是軍閥混戰罷了，羣衆自然



而然的會反對軍閥戰爭，無需無產階級的政黨去堅決的獨立的領導」；這就完全忽視自由派資產階級企圖蒙蔽羣衆，贊助某些軍閥去反對別些軍閥，發展青天白日主義的影響。

最近對於「變軍閥混戰爲反對軍閥的戰爭」口號的某種猶豫，認爲沒有提出的必要，——這就是那種根本忽視反對軍閥戰爭的任務，將要從忽視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影響裡面產生出來的表徵。

至於反過來說：汪陳派既然代表資產階級，那就在那裡爲着民權主義，爲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文明道路，而和封建地主買辦宣戰，並且能夠經過這樣的戰爭統一中國；說：這種戰爭就等於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機的表現；——那麼，這是根本否認農民戰爭的革命作用，而承認資產階級能夠獨立的實行革命戰爭。這亦是把現在時期和武漢時期的錯誤的比擬。這種論調，簡直是百分之一百的機會主義。這種論調的公開的結論應當是「贊助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爭」！

黨的主要路線，却在於格外努力反對改組派的鬥爭，肅清青天白日主義的影響，獨立領導正在興起的羣衆鬥爭，明顯的指出工農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整個統治，反對整個的反革命營壘；反對一切軍閥的方針。

十月五日

# 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勢

問友

## 一 世界形勢與中國政局的關係

中國目前的政治局勢與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有非常密切聯繫的。世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市場問題的緊張，使資本主義世界所包涵的一切矛盾，都日益尖銳而難得收拾。帝國主義喉使國民黨進攻蘇聯的計劃，無論在政治上與軍事上都受着可恥的失敗。加緊壓迫工人及各國的共產黨；又遇着了各國工人運動之強有力的發展，到處發生羣衆罷工，示威，以及武裝衝突與巷戰。即是在過去比較軟弱而貴族化的美國工人，現在已經非常迅速的左傾起來。對於各殖民地勞苦羣衆的剝奪，已經引起了歷史上之空前的殖民地解放高潮。最後，帝國主義企圖建立全世界反蘇聯之武裝聯合戰線，企圖表面上造出一些欺騙羣衆的和平空氣，因此而舉行的一切裁兵會議以及最近在倫敦的海軍會議，他們又得了最可慘的結果。這些客觀的事實充分的證明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的正確，他說：

「目前是大戰後的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增長起來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日加劇烈的時期，此時期的矛盾將要達到帝國主義新的戰爭，將要達到偉大的階級衝突，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

### 國主義的大革命。」

我們看見全世界資本主義是在一個嚴重危機的狀態，我們看見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的日益發展，看見廣大殖民地的革命高潮，看見帝國主義矛盾之日益尖銳，最後，看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偉大的勝利，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處於全世界歷史之大轉變的前夜，應當知道由目前形勢走到全世界直接革命的高潮其中絕不會經過一個長期的階段，因此，現在是全世界革命暴動的時期。

這一種國際形勢對於中國政治形勢必然產生兩個結果，這兩個結果都與中國政治及整個中國革命前途有密切的聯繫。

第一，帝國主義在國際既然發生着嚴重的經濟危機，則他們中間必定要更加緊的爭奪銷售商品的市場。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既然發生了激烈的革命鬥爭，則他們對殖民地的壓迫必定更要加緊，一切甘地式的非武力反抗，國民黨式的外交手腕的哀求，絕對不會使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有任何讓步。正因為如此，所以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的競爭與矛盾，必然更加激烈起來。中國是世界上之唯一的最大的半殖民地，在這裡並不只是某一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所以這裏必然成爲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矛盾衝突的焦點。這種條件便必然在中國政治上產生兩種現象，一個是整個帝國主義的勢力必然向中國加緊進攻，而不致發生任何讓步。另一個現象便是各帝國主義必然各自收買一部分官僚

地主軍閥及資產階級，造成永遠不斷的軍閥戰爭。這兩種現象都必然使中國統治階級無論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都日益走向嚴重的危機。這就是目前國際形勢對於中國所必然產生的第一個結果。

由這第一個結果，再加以整個世界革命浪潮的發展，便必然產生第二個結果，就是造成了中國革命發展之比較順利的條件。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客觀上有一個不利的條件便是西歐沒有強大的工人運動的發展，西歐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沒有比較有力的精神上或實力上的援助。帝國主義反而相當的結成一個暫時妥協的局面，一致的壓迫中國革命。目前國際上雖然還不是直接暴動的局勢，雖然我們依然要遇着強大的帝國主義之有力的壓迫，但無論如何，現在已經是全世界資本主義普遍危機的時期，已經是世界革命迅速發展的時期，無疑義的是造成了中國革命發展之比較有利的條件。

十月革命之前，列寧認為俄國是世界資本主義鎖鍊比較薄弱的地方，因為在俄國充滿了一切尖銳的矛盾。現在一切世界資本主義所有的矛盾，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與蘇聯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再加以中國內地之廣大農民羣衆之反對封建地主的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這些都集中到中國來了。我們具有一切理由可以斷定：國際形勢是有利於中國革命發展的，說不定要以中國革命的爆發，來引起全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動。

## 二 國民黨統治與軍閥戰爭

我們現在也不必詳細研究國民黨各派的社會基礎，也不必去分析軍閥戰爭中之各派的策略，這些我們久已說過了。現在只需要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的統治已經顯然走向進一步的崩潰，軍閥戰爭的局面還正在無限的延長。

國民黨兩年來的統治，事實上已經自己揭破了對廣大羣衆的欺騙。任何人都不會相信國民黨之「全國統一」，「訓政開始」的欺騙了。除了最落後的取消派陳獨秀們，他還寫着「資產階級政權相當穩定」以外，大概沒有任何人相信國民黨的統治可以「穩定」的。

帝國主義經濟的危機與市場問題的緊張，必然要用各種方法來加緊剝奪以及擴大他們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帝國主義不會對中國有任何政治或經濟上之讓步的，相反的，他們還是繼續向中國進攻，使中國工業逐漸受着顯明的嚴重危機。絲業，棉業，烟草業，麵粉業，火柴業，航業，都受着帝國主義之極大的壓迫，接連不斷的破產，倒閉，或縮小營業，是整個中國民族工業中所普遍的現象。交通的破壞，簡直到了不可形容的地步。北方的饑荒，一天一天的繼續擴大。金融恐慌，米價高漲，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實，這都是整個中國經濟危機之具體的表現。

不僅就國際上看，這種經濟危機沒有緩和縮小的希望，即使就國內政治上，這種

危機同樣沒有任何解決的前提。帝國主義在中國相互的矛盾，中國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中國軍閥制度爭地盤的矛盾，都必然日益尖銳發展。使着中國軍閥混戰的形勢是不能消滅或縮小的。

就目前蔣閻對峙的形勢看，我們很可以預測最近將來之全國軍閥混戰愈加擴大的形勢。北方軍閥所以形成反蔣聯合的，顯然是因為日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努力。日本是在利用北方軍閥的團結，一方鞏固日本在北方的統治，另一方面又藉此以向南京政府威嚇，對整個中國作更大的進攻。關稅協定的成立，無擔保借款之承認整理，這是日帝國主義已經取得的第一步的勝利。在這種條件之下，無論蔣閻戰爭的前途如何，縱然蔣介石可以戰勝閻錫山，而日帝國主義必然要扶持新的勢力以與蔣系對抗，日本絕不允許蔣介石統治北方，因為蔣介石終是代表着美帝國主義的勢力。

若是蔣介石戰敗，閻錫山依然不能建立強固的中央政府，即使閻錫山只想統治長江，或奪取南京，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為美及英帝國主義，絕不允許日帝國主義有這樣大的發展，同時南方地主豪紳資產階級，也同樣不會允許北方軍閥這樣發展的。

改組派目前是在與閻錫山馮玉祥合作的形勢，這一反革命的聯盟其中當然不會鞏固的。一方面因為改組派在目前是依靠着英帝國主義的力量，他不會與日本保持長期的聯合戰線，另一方面，改組派的軍閥領袖終是些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他與北方軍閥

當然不能有鞏固的聯合。譬如關於國民黨的問題，汪閻無論如何是不會一致的。改組派與閻馮自然有合作的可能，但這種合作只是反蔣的合作，爲進行軍閥戰爭的合作，他絕不能減少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即使這種聯合得着反蔣的勝利，他必然又開始一新的「軍閥混戰的局面。

改組派若與閻錫山破裂，若轉過頭來實現了蔣汪合作的計劃，這當然也是一種可能的事。這一種形勢也許是蔣汪共同領導南京政府，而將廣東或其他某省地盤交給張發奎等，共同進行反閻的戰爭。這依然是軍閥混戰的局面。若改組派既不與閻錫山合作，又不與蔣介石合作，則前途自然更是大規模的破裂與混戰。

所以目前的問題，無論任何一派軍閥勝利或失敗，無論統治階級內部進行何種的妥協與合作，國民黨終是一個軍閥混戰的局面，國民黨的統治必然是遇着日益擴大的經濟危機，日益混亂的政治破裂。

### 三 羣衆鬥爭的發展

目前全國的羣衆鬥爭，自然是顯然的日趨發展的形勢。最近三四月以來，北方鐵路工人鬥爭的發展，黃色工會的破產，唐山赤色工會的擴大，部分罷工的實現，總同盟罷工的醞釀，天津，大沽，火柴，麵粉工人的鬥爭，津浦鐵路工人的鬥爭，青島紗廠煙廠的罷工，武漢福源，一紗，宸寰各紗廠工人的鬥爭，人力車夫，煤炭工人的鬥爭，上

海接連不斷的鬥爭，罷工，示威，武裝衝突，南方海員，造船廠，廣九鐵路，廣州店員，等等，到處都發生着不斷的鬥爭。在農村中，武裝暴動及紅軍游擊隊的擴大，成了非常顯著的事實。全國紅軍的發展，從前多在鄉僻小縣中，現在已經普遍到重要交通區域，不斷的消滅政府的軍隊，佔據城市。江西湖北的反動政府，幾乎僅能維持其在城市的地盤。農民暴動的省區有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四川，河南，最近已經到山東，河北，雖然統治階級不斷的『清』，『剿』，但終是如火上加油一般，使一切暴動區域，蘇維埃，紅軍，游擊隊，都一天一天的繼續不斷的擴大與發展。反動軍隊中的士兵，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所從來沒有的廣大的兵變，特別是在農民運動及紅軍發展的區域，到處都發生過兵變及投降紅軍。

這一種廣大羣衆鬥爭的發展，階級鬥爭的尖銳，只有統治階級認爲是『少數共黨搗亂』，只有完全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纔將他看成一個『偶然的』現象，只有機會主義的取消派，纔認爲這是『革命高潮的餘波』，或『革命高潮的反面』。馬克斯主義者列寧主義者是認識得很顯明的，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危機所引出來的產物，這是中國統治階級之加速的走向崩潰的表現，這是中國廣大羣衆鍛鍊自己的鬥爭力量而走向革命高潮的一種形勢。

我們自然不否認在目前羣衆鬥爭發展中還有許多弱點，但這些弱點絕不是在目前這



種形勢中所不能戰勝的事。相反的，現在我們已經看見了，羣衆鬥爭中的弱點是正在削弱與減少的。第一個弱點是羣衆鬥爭中的發展還欠有組織性，還沒有匯合成爲大門爭。但現在羣衆組織是正在發展的，赤色工會是正在擴大的，鬥爭是逐漸尖銳的，一個小的經濟鬥爭都時常變成武裝屠殺，大門爭的客觀條件是正在成熟。第二個弱點是黃色工會與改良主義在羣衆中還有相當的影響，但最近這些影響是迅速崩潰的（唐山工人封閉黃色工會，北寧路工人打死黃色領袖，上海工人反黃色工會，打取消派等），改組派的假面具，在羣衆面前已經扯破了。第三個弱點是羣衆中尚餘着一些恐懼心理，但這已經是很小的「殘餘之殘餘」了。第四個弱點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薄弱，但這一點仍然不是什麼嚴重問題，因爲目前黨的組織是正在擴大與發展的。

爲什麼這些弱點都可以逐漸戰勝呢？就是因爲客觀的政治與經濟的條件，造成了不可動搖的革命高潮到來的基礎。客觀形勢是正是走向革命的高潮，所以他必然使這些弱點逐漸的消滅。我們無產階級政黨的努力，正是要加緊的去消滅這些弱點，以使革命高潮可以更快的到來。

#### 四 革命高潮問題

經濟的危機是日益擴大，反動的統治是日益動搖，羣衆的革命鬥爭是日益壯大，這就是顯然的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勢。莫洛托夫同志在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上的演講

，會有這樣一段話：

「我所要說的，就是在這個「第三時期」和直接革命形勢之間，並沒有隔着一道萬里長城，好像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上各時期間沒有隔着一道萬里長城一樣。……實際上我們在「第三時期」中，已經看到新的革命復興的發展，這種復興在適當的時候，一定要發展成爲直接革命的形勢。」

中國目前的形勢正是這樣，革命高潮到來的條件是正在成熟，由目前到革命高潮的形勢，其中並不會有一個萬里長城。尤其是中國是處於不斷的軍閥混戰的局面中，戰爭與革命是有很密切聯繫的。列寧告訴我們，戰爭可以縮短人類發展的歷史，戰爭可以推動歷史的車輪使他們更迅速的前進。全國範圍內的軍閥戰爭，他要更加深一切政治與經濟的危機，更增加人民生活的痛苦與革命鬥爭的發展。所以在目前這種形勢之下，我們便不能預料革命高潮到來的月日，也許革命高潮的到來是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我們爲充分說明革命高潮到來的前途起見，有幾個要點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

第一，革命高潮是政治與經濟上的客觀條件所造成的，他並不是爲少數英雄或某個政黨的政策鬥爭取來的。馬克斯主義者要認識，社會經濟的危機，統治階級的動搖，與羣衆運動的高漲，這必然成爲革命高潮。政黨的作用，僅只是延遲或促進這一革命高潮。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僅只能當着客觀環境已經具備高潮條件的時候，他用主

觀的努力，使革命鬥爭更有組織，使革命高潮可以比較快的到來。若是當着客觀上沒有革命高潮的條件，僅只是某個政黨主觀上企圖造成革命高潮，其結果就必然成爲盲動，是不會成爲革命高潮的。若客觀上已經具有了革命高潮的條件，即使沒有革命的政黨，則革命高潮依然是會發生的，不過這種高潮的結果，往往因爲沒有領導而歸於失敗。因此，我們觀察革命高潮的條件，必須注意於政治經濟與羣衆鬥爭的形勢，並不能拘束於黨的領導。將不斷的羣衆自發鬥爭劃於革命高潮象徵之外，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在目前中國的環境中，我們固然要承認我們黨的領導薄弱，但只能使我們更加努力建立黨與羣衆的關係，更加努力的準備革命高潮的到來，絕不能因主觀領導薄弱而否認革命高潮的前途。現在我們已經看見，許多羣衆鬥爭是超乎我們黨領導之外的，假使我們到現在還依然不能認識革命高潮的前途，則將來我們黨必然有不能追隨羣衆的現象，使羣衆完全在黨的前面，則談不上任何革命中的領導。

第二，我們要認識目前羣衆的革命鬥爭，工，農，兵是有適當的平衡，並且，整個說來，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而發展的。我們絕對否認，目前全國農村運動已經超過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我們絕對否認將目前全國的蘇維埃，游擊隊及紅軍，看成簡單的農民力量。這一點在我們估計革命高潮到來的前途上，有很重要的意義。老實說，在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統治了整個中國經濟的時候，在中國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有了相當

發展的時候。假使沒有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會有全國範圍內的革命高潮的。事實上在目前中國的客觀形勢中，我們不僅要承認農民及士兵鬥爭的發展，同樣我們要承認城市無產階級鬥爭的發展，並且要承認城市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是站着領導的地位。關於這一問題，我們不能很表面的去觀察，不能說農村有暴動，但城市則沒有暴動，也沒有大的罷工，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城市的階級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非常尖銳的地步，現在一個簡單的經濟鬥爭都可以轉變為武裝衝突。現在城市中在經濟政治的形勢及羣衆要求上已經具備大鬥爭的客觀條件，僅只因為統治階級是在城市中以強固的白色恐怖來維持其最後的掙扎。我們只要看這樣一個事實，統治階級情願放棄鄉村，但統治階級盡量保持城市。城市雖然「沒有」大鬥爭，但統治階級的大批武裝絕不敢離開城市。明瞭了這種環境的意義，便可知現在城市工人的鬥爭，決不比農民鬥爭落後。並且在這些蘇維埃區域及紅軍遊擊隊中，無產階級政黨站着絕對領導的地位，因此，更不能將他看成簡單的農民勢力。

## 五 建立革命政權問題

當着客觀形勢顯然走向革命高潮的時候，當着我們策略路線應當建築在準備革命高潮的時候，我們黨便必需提出建立革命政權的問題。提出這一個問題，具有很嚴重的策略意義。

革命運動的發展，在全國範圍內看來是比較平衡的。天津所領導的北部，武漢所領導的中部，上海所領導的長江流域，香港廣州所領導的南部，這關內的四個基本區域，他們的革命鬥爭都是向前發展的。但中國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全國還沒有統一的經濟中心，還沒有一個絕對支配全國的中心城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但他對於華南華北的統治還非常薄弱，即對於武漢及長江上游的統治也並不絕對的密切。正因為這一種經濟形勢的反映，所以在政治上造出歷年全國軍閥割據的形勢。在全國範圍內並不是統一，反動統治鞏固的程度並不一致。正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在中國任何一處的革命暴動，他一定不能立刻變成全國革命暴動的勝利。所以在六次大會決議案上便指出中國革命的高潮，有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前途。這一個問題，就應當成爲目前策略行動上的中心問題。

所謂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前途，便是中國開始建立革命政權的過渡形勢。經過這一個政權，纔逐漸的取得全國範圍內的勝利。

我們說在一省或幾省建立革命的政權，這絕不是說我們首先只做一省或幾省的革命。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建立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必然不只是是依靠於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勢力，他同樣必須依靠於全國範圍內的革命高潮。中國的階級鬥爭是非常尖銳的，若是在某一省或幾省建立了革命的政權，則必然馬上引起全國統治階級之嚴

重的進攻。在這時候，若沒有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則必然不能保持一省或幾省的勝利。因此，全國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前途，這是密切而不可分離的。

同時，我們說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絕不是在中國希望這樣一個和平割據的前途。假使組成了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馬上便一定要進行很嚴厲的革命鬥爭，以爭取在全國範圍的革命勝利。所以，一省或幾省的鬥爭政權，他是一個革命過程中的臨時政權，他是一個鬥爭的政權，國內戰爭的政權，領導全國革命勢力向反動勢力最後進攻的政權，他不會和平割據，也沒有和平割據的可能。

這個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我們在那裏去開始建立呢？這是我們不能機械預定的。我們只指出這一個前途，只能指出在反動統治最薄弱而革命鬥爭最開展的地方。在今天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領導的湘，鄂，贛，却有很大的可能。但絕不僅限於武漢有這個可能，因為客觀形勢的變化是非常迫近，我們只能指出革命發展的前途，指出全國革命勝利所必然經過的階段——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

## 六 黨的中心策略

因此，黨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便是爭取在全國範圍內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去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

這一個策略的實際運用，便是使全黨的工作路線堅決的採取一種的進攻形勢，將上

，農，士兵，紅軍，這四種革命力量適當的配合起來，使各種羣衆鬥爭匯合成爲一個偉大的羣衆的政治鬥爭，走向直接武裝暴動的形勢。

在這裡，我們不能指出全盤的具體的工作路線。但我們可以舉出幾個最重要的中心問題。

第一，在職工運動中要堅決的組織政治罷工，因爲現在全國工人羣衆的鬥爭，都是帶着散漫性質，不能匯合成爲一個大的鬥爭。我們若要使無產階級更有強大的階級意識，則必須組織政治罷工，這樣纔能使這些散漫鬥爭有一致的方向。現在的客觀上是具有一切組織政治罷工之條件的，因爲軍閥混戰的擴大，一切集會結社及鬥爭的不自由，雖然很小的經濟鬥爭都可以轉變爲政治鬥爭。要在組織政治罷工這總的策略任務上來擴大赤色工會的組織，擴大糾察隊的組織，加緊對於工人階級的武裝訓練，關於擁護會場，巷戰以及武裝暴動的學習。要加緊在重要產業及交通工人中擴大同盟罷工的鬥爭，要使在業工人與失業工人有一致的團結。

第二，在農村鬥爭中必須改變小的遊擊方式，而盡量配合成爲以城市爲領導的地方暴動。要使農村的武裝鬥爭能以更擴大的發展，適應於新的全國革命的發展，不但不能使他永遠拘束於這些窮鄉僻壤中，並且不能採取所謂『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消極策略。現在的任務乃是要使農村武裝逐漸直接得着城市的領導，加緊在當地城市的工作

而配合成爲地方暴動。過去將發動游擊戰爭看成與城市工作不相關聯的，這是一個不正確的傾向。只有得着了城市領導之後，這種游擊戰爭纔有更顯明的階級的革命的意義。在游擊戰爭中，必需堅強的建立無產階級的領導，要堅決的肅清富農的影響與發展雇農工會的組織。這纔是在農村工作的中心路線。

第三，在全國長期混戰的時期，在反動軍隊中的中心工作必須是組織兵變，尤其在進攻紅色區域的反動軍隊中。統治階級經濟財政的危機，政治的破產，不斷的戰爭，工農鬥爭的發展，紅軍影響的擴大，這便是組織兵變之最優越的條件。事實上已經有無數次的重要兵變，已經超過了我們黨的領導，使着這些兵變後的士兵並不能完全正確的整個投到革命營壘中來，這是革命發展的一個很大的損失。我們要依靠各地的客觀情形，在軍隊的日常鬥爭以及每日的政治事變上，決定兵變的配合及其發展的方向。

第四，堅決的執行土地革命的政綱，在這一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去擴大蘇維埃區及紅軍。在蘇維埃區域中要堅決的分配土地，消滅地主階級，反對富農的剝奪，并且要建立真正的羣衆代表會議的政權。在擴大蘇維埃區域的政治影響與地方暴動的總策略路線之下，來取得蘇維埃區域的實際擴大。就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來擴大紅軍的發展。農民羣衆武裝，不應該只成爲赤衛隊的組織，他應該組織成正式的紅軍。在中國這一客觀形勢之下，必須有強固的與擴大的正式紅軍，在進攻路線與全國工農士兵的革命



運動有適當的配合，然後纔能更快的促進全國革命運動的高潮。目前全國紅軍確已有  
了很大的勢力，這裏還需要擴大的發展與統一的指揮。紅軍發展的方向更必要與一省  
或幾省建立革命政權的問題，有密切的聯系。

將這工人農民士兵紅軍四種主要革命力量配合起來，用反帝國主義擁護蘇聯及反對  
軍閥戰爭的口號將他們聯系起來。組織全國一致的政治示威，建立全國範圍內的廣大的  
羣衆組織，將武裝暴動的口號逐漸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這就是我們走向革命高潮的道  
路。

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堅決的領導着這一全國走向高潮的革命形勢，肅清一切動搖的權  
會主義的右傾觀念。黨尤其要堅決的取得組織上之擴大的發展，尤其在主要城市及產業  
工人中。目前六七萬黨員，是非常不夠的，黨必須有數十萬的黨員，更加十餘倍的發  
展，才能健強這一革命發展中的領導。

我們必要認識，我們現在是處於偉大的歷史事變以前，我們必定要有充分的準備啊

四月二日

# 一九二九年『五一』以來的工人鬪爭

項英

全國工人階級在反動勢力積極進攻之下，生活的痛苦是日益加深，到了不能維持生活的地位，這必然掀起廣大羣衆起來鬥爭。自去年『五一』以來，全國工人的鬥爭和罷工運動，是不斷的向前發展，日益走向劇烈的形勢；直到今年『五一』，是走到了萬分尖銳化的形勢中，表現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工人階級的鬥爭走到直接革命的道路上。

工人的鬥爭，自去年『五一』以來，不僅是繼續擴大的發展，而且在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普遍發展的現象，上海，天津，唐山，北平，青島，武漢，廈門，香港，無錫，南通，滿州，江西，以至其餘各大小城市，莫不有劇烈的鬥爭發展，罷工運動早已成爲全國一切鬥爭中最主要的鬥爭，同一產業的罷工和鬥爭，在各地都時常發生，如上海絲廠的罷工，無錫紗廠的罷工，麵粉廠的罷工，唐山五礦的罷工，北平人力車夫及市政工人的罷工和騷動，青島日廠罷工，山東周村絲廠罷工，江西景德鎮幾萬工人的幾次罷工，四川自流井鹽井工人二次罷工，至於各別工廠和職業的罷工，那更是非常之多，就光在上海，從去年五一到十二月底，大小的工人鬥爭，就有一百八十七次之多，江蘇的無錫，南通，海門，常州，蘇州等地同時也

發生了二三十次的鬥爭；天津的電車罷工，電話罷工，店員罷工，地毯工人罷工，提花工人罷工，大沽駁船工人罷工，運輸工人罷工，唐山洋灰廠紗廠工人怠工，安慶店員罷工，江西景德鎮在幾月之間共發生十三次之多的大罷工，武漢最近紗廠大罷工，廈門輕便鐵路工人罷工，公共汽車，罐頭工人，駁船工人等的罷工，杭州人力車夫罷工，廣東寧陽鐵路工人罷工，海員俄國皇后大罷工等。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完全的全國工人鬥爭統計，不然，一定可以得到很多有意義的結論。現在僅就上海來說。

從去年五一到去年底的工人鬥爭表：

月	門爭參加人數	鬥爭方式	領導別	關係	廠	勝失	結果	原因
5	24	罷工	和平	赤白黃	紗廠一	勝	無原	開除五破壞條件一禁組工會
6	28	罷工	和平	赤白黃	一市政五手工業	勝	無原	一加重工作一待遇惡劣四要
6	30000	罷工	和平	赤白黃	四店員三	勝	無原	求改良待遇一一五卅紀念一
6	18	罷工	和平	赤白黃	紗廠六絲廠四煙	勝	無原	開除五關廠三加重工作二姓
6	10	罷工	和平	赤白黃	廠二金屬二市政	勝	無原	扣紅利及儲金三待遇惡劣三
6	18	罷工	和平	赤白黃	五手工業二店員	勝	無原	要求改良條件八改良待遇二
6	8	罷工	和平	赤白黃	五店員	勝	無原	安插失業工人一



年關鬥爭統計表

廠名	原因	鬥爭形式	結果
武漢裕源	年關要求	二〇〇〇人包圍	七天工資
第一紗廠	年關要求	布廠八〇代表去交涉，紗廠關車	七天工資
震寰	年關要求	罷工	七天工資
煤業	分花紅加工資	罷工一千餘人	相當勝利
什貨店員	年關鬥爭	罷工	不詳
米業店員	年關鬥爭	罷工	不詳
武昌裕源	發工錢	一八〇〇人包圍，與護廠隊衝突	死一人

12	公役二運輸一棉	改良待遇一米貼四反對黃領
28	織四	二假期照給工錢一
27400	紗廠五煙廠三金	開除一禁組工會一關廠一扣
21	屬業二碼頭一手	工資二減工時一紅利五運發
5	工業一印刷四店	工資四加資七打工賊等及稅
2	員三棉織五燈泡	金六
22	二建築一舢板一	
4		
2		
9		
4		
15		

天津 裕大 (二月二日)

要求開足暖汽  
反對資本罰工

關車

勝利

寶成

要求花紅

全廠騷動

被黃色工會欺騙失敗

恒源

要求花紅

第一次關車捕去一人  
第二次關車又捕去一人

結果資方允給四萬元，被黃會反對，每人僅給四十一元工資。

裕大 (二月十七日)

要求花紅工資

準備罷工，被工賊破壞，被捕一人

失敗

唐山 京奉路

要花紅發工資

二次包圍打黃色工會及其領袖

勝利後被黃色工會與軍警捕人

唐山本廠

要花紅，反駁班

包圍礦師

被黃會捕去四人，失敗

林礦

反停工，反駁班

三〇〇人包圍黃會及礦師

無結果

香港 九龍貨船

要求加薪

八〇〇人派代表交涉

代表不去交涉無結果

廣州 清潔工人

要求加薪

八〇〇人

尚未解決

廣州 汽車

要求加薪

一〇〇〇人

相當勝利

上海 人力車夫

減租

數千人

自發的，得到勝利

上海 同興

要求加工資，米貼反對開除工人

一七〇〇人罷工二十天

相當勝利

安迪生	成立俱樂部，要求釋放被捕代表	全體一千人，罷工，包圍，武裝衝突	打死一人失敗下去
電汽廠	要求年關加薪	八〇〇人罷工	相當勝利
森大成煤	要求雙薪	罷工	被黃會欺騙
英美煙廠	發工錢，反工頭	一七〇人罷工	相當勝利
商務書館	要求加工資	三〇〇〇人	被黃會欺騙
培查青工	年關鬥爭	罷工	勝利
花捐業	年關鬥爭		年賞五毫

再附一個統計表，是海員鬥爭統計表：

船名	原因	鬥爭方式	領導者	結果	果備	註
俄后	反逮捕工友	直接行動	自發	失敗	開除人	
播寶	反欠薪	直接行動	自發	勝利	完全發清欠薪	
龍山	反抗黨費	直接行動	自發	未解決	開除人	
江門	反抗國民黨會費	消極抵制	海總	未解決	均在醞釀鬥爭	
聖亞路兵	反對國民黨組織支部	直接行動	海總	失敗	開除人	
上海民船	要求米貼抗捐	罷工	自發	未		詳

廈門海員	反對國民黨會費	罷工	自發
大沽駁船	加薪	罷工	
利昌	反對草菅人命	和平交涉	海總 未解決
加拿大	反對頭目破壞劇社	直接行動	海總 第一步勝利 戲箱留船劇社仍在
廣州鹽豐	反對辭人與要求加薪	未詳	自發 未詳

上面幾個統計表都是殘缺不全的，而且最近二月來的鬥爭，因時間倉卒的關係，沒有能列成統計表，是最可惜的事情，但從這幾個不完全的統計表中，我們已可看出幾個現象和特點：

一、從中國的北方到南方，從東部到西部，沒有一個地方不發生劇烈的鬥爭，沒有一個地方的鬥爭不是日趨尖銳，即使在北方黃色工會有很大的控制能力的，羣衆也一樣劇烈鬥爭起來，證明羣衆的積極性是發展，無論是有組織的或無組織的工人，無論是在黃色工會下或在非黃色工會下的工人，都是一樣的劇烈地鬥爭，鬥爭是一般的發展起來了。

二、鬥爭是日益政治化。從去年五一到年底的統計表中，就可以看出，有很多的鬥爭都是政治的，從年關鬥爭統計表中看出來更加明顯，在海員鬥爭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政治鬥爭佔整個的鬥爭的百分之五十有強；如果我們是拿最近二個月的鬥爭來看（可



惜現在沒有製成表，日間當設法製成詳表，另作文詳細分析全國的工人鬥爭（那鬥爭更是政治化了！上海祥昌的鬥爭，唐山南廠的罷工和武裝衝突，中東路和哈爾濱的工人鬥爭，關外北寧路的鬥爭，武漢七個蛋廠的大罷工，南京和記蛋廠的鬥爭，最近上海轟轟烈烈的偉大鬥爭，沒有一個不是政治鬥爭，或者是含有政治的鬥爭。現在的形勢已經到了這一個情形，就是每一個鬥爭一發生就成為政治鬥爭，不是反黃色工會，就是反國民黨反帝國主義，無論大小的鬥爭都是同樣的現象。而且鬥爭一發動就要走上武裝衝突，表現工人鬥爭是走向更高的方式，走向同盟罷工與武裝暴動的方式。所以，在目前的情形，做經濟罷工一定要同時做政治罷工，才能把鬥爭領導起來，才能有廣大羣衆熱烈參加鬥爭。

三、工人階級劇烈地反攻資本進攻。爲說明這一點，最好我再拿一個最簡單的統計表來！

資本進攻與工人反攻對照表（自一九二九年五一到十二月底）：

月份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總計
資本進攻	一二	一七	一五	七	六	六	一八	一〇	九一
工人反攻	一二	一一	一六	三	五	六	八	一八	七九
其他			三	二		八	五		一八

在右表一八八次鬥爭中，資本進攻的佔九十一次，工人反攻的佔七十九次，可以看見工人階級在無情的資本進攻之下毫無出路之時，是如何的在劇烈地作反攻了！現在一切的資本進攻都要遇到工人階級的罷工反抗。這個鬥爭發展的現象，我們一定要認清，否則便有走到取消路上去的可能！取消派沒有看見工人反攻形勢，只看見資本進攻，因此採取退守政策，主張合法運動，是根本的錯誤了！

四。黃色工會完全是國民黨資本家的工具，而且是日趨法西斯蒂化了。再從去年五一到年底鬥爭統計中，拿領導與結果來看，黃色工會的作用就很明顯可以看出來了。

	勝利	失敗	妥協	無結果	未解決	不明
赤會領導	六五	二四	一二	四	一五	六
黃會領導	〇	一〇	三	四	一	〇
自發	一四	三	二	〇	四	六

在右表裡，黃色工會領導的鬥爭，沒有一個是勝利，說明黃會是用領導鬥爭的方法來消滅鬥爭。而且在目前黃色工會是在每一個鬥爭中來實行壓迫工人了，更加作為國民黨資本家的工具了。

我們再看年關鬥爭的統計，在二十六次的罷工中，沒有一次是黃色工會領導的。其中有十七次的鬥爭得到相當的勝利，其餘的是沒有結果或失敗，都是由於黃色工會的

壓迫或欺騙下去的，充分的表明黃色工會的作用，現在在鬥爭中的一切事實都證明黃會  
是法西斯蒂化，黃會的領導不但大大的縮小，而且羣衆自己起來鬥爭，而且是反黃色工  
會的鬥爭。

五、從五一到年底的鬥爭統計裡，我們檢查鬥爭的原因，開除工人的特別多，有二  
十三次，說明失業是目前的普遍現象，必然的要掀起非常劇烈的鬥爭，一直到武裝暴動  
之前途。

六、以鬥爭方式而論，在五月到十二月的許多鬥爭中，和平交涉或請願等，比較少  
，凡五十九次，反之，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却有一百三十二次之多。中國工人鬥爭已經  
漸漸脫離合法傾向，和平方式，而走向直接鬥爭的正確大道，這是獲得最勝利的保障。

七、赤色工會的領導擴大。羣衆已經充分認識了黃色工會的眞面目，一天天的走  
向反對黃色工會，一天天的走向赤色工會之下來。在許多的自發鬥爭中，赤會一參加  
進去，就必然得到領導，羣衆是熱烈歡迎赤色工會的！不過赤色工會實際上還是躲在  
屋子裡，羣衆的鬥爭，因為得不到赤會的領導，時常遭受欺騙與失敗下去，所以，現在  
的問題是要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用公開的羣衆路線來爭取廣大的羣衆，領導羣衆鬥爭。  
八、在過去許多的鬥爭中因為我們的領導不夠，至所有的鬥爭成爲此起彼落的現象  
，沒有把鬥爭配合起來，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一定要加強赤色工會的領導，將各廠的鬥

爭配合起來，發動同盟罷工，政治罷工，造成廣大的鬥爭，以爭取直接革命的形勢。

九、黃色傾向是我們工作上最大的危險，但在過去一年來的鬥爭中看起來，我們的各地工作仍然是在黃色傾向之下做工作，仍然採取合法的形式來鬥爭，不堅決的來做直接鬥爭，無形間放棄了許多的鬥爭。鐵路的鬥爭，上海的許多鬥爭，都是表現得如此。現在光只拿海員的鬥爭來說，在十一次鬥爭中，自發的鬥爭佔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反之，在海總的領導之下的四個鬥爭，却大半是消極抵制和平交涉，以至鬥爭得不到解決，是充分的錯誤。如果我們不以十二分的決心糾正肅清工會中的黃色傾向，那鬥爭是很難得領導到勝利的道路上去的。

總之，經過一年來的全國工人鬥爭看起來，鬥爭是在日趨劇烈，走到最後決戰的時期，今年五中和五一後，鬥爭一定還要走向更尖銳的形式，直到最後的決戰，武裝暴動，奪取政權。



# 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

詔 玉

## 一 軍閥戰爭普遍全中國

馮玉祥回潼關後，西北軍十五萬已沿平漢隴海兩路積極動員企圖首先佔領武漢；閻錫山調動卅萬大兵，先鋒隊已再三進佔山東；蔣介石親坐軍艦視察長江要塞防務，並檢閱各部隊；奉系最近召集最高軍事領袖會議，已公開決定對關內事變不守中立；兩廣戰爭愈演愈烈；福建四川的戰爭愈延長愈混亂；德州，徐州，浦口，鄭州都不斷地爆發着混戰。所謂「討蔣」，「擁蔣」兩方面的舌戰筆爭，挑撥離間，威脅利誘……等等的宣傳組織工作已經結束，大家現在都是秣馬厲兵，擺陣佈防，軍閥混戰的慘禍，立刻要瀰漫全中國。

這次戰爭的積極參加者，不僅國民黨的新舊忠實同志（自汪精衛，蔣介石到張學良），不僅現在握有軍權的蔣，馮，閻，張，桂各系，不僅多少有些槍枝的雜色部隊，即久已銷聲匿跡的安福系，直系，魯系，研究系以及拚命找新舊軍閥和帝國主義賞識的國家主義派，都是「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大家起來拚個你死我活。

這次戰爭的破壞屠殺，要比前此任何軍閥混戰殘毒。蔣介石方面新由美國運來大

批軍用飛機及最新式戰具，由德國方面運來大批的毒瓦斯及各種毒汽彈；閩老西也從德國方面買到大批的最新殺人器械，張小鬍子當然從日本主人那邊可以得到一切殺人最多最快的槍炮炸彈，汪精衛，李宗仁自己和其主人大不列顛帝國主義也絕對不會睜眼吃虧，一定祭起各種殺人的法寶來，小軍閥劉湘都忙着購買飛機毒汽彈，馮大帥等當然更不會不懂『以毒攻毒』的戰略。最近兩廣戰爭中，雙方已經拚命地用飛機炸彈和施放毒氣的戰術；最近這一個大屠殺正式大規模暴發時，更不知要有許多成千成萬的兵士人民死於毒瓦斯，開花彈及普通槍刀之下，多少整縣整鄉整村的生命財產破壞在飛機，毒汽彈，野戰炮之下！

## 一一 目前軍閥混戰的特質

此次軍閥戰爭，從地域上看，自長江流域到黃河兩岸，從珠江流域，到關外各省，都直接捲入漩渦；從參加成份看，自北洋軍閥至改組派，自蔣介石到張學良，都直接走上火線；戰爭的決心和佈置，都抱有你死我活誓不並立的態度，這一切一切將怎樣解釋呢？究竟此次軍閥戰爭不過是十八年來軍閥混戰史中簡單順序的一幕，還是自有其特質呢？當然，一般講來，此次軍閥戰爭的直接動力，依然是可以從我們平素對於軍閥制度及軍閥戰爭的理論分析上得到概括的解答。但此次戰爭更有其特質。即此次軍閥混戰是整個世界及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尖銳化的具體表演。蘇聯五年計劃得到

顯著的成功。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東路問題受到可恥的失敗。國際資本主義發生一般的危機，不僅日趨殞落的老不列顛愈益走向絕境，而所謂「例外」繁榮的金元帝國現在都表顯出特別尖銳的恐慌。兩千幾百萬失業工人與在業工人聯合戰線的鬥爭，成爲資本主義制度的緊急致命傷，殖民地半殖民地（印，韓，菲律賓，安南，南美，南非）的解放戰爭，與日俱長的擴大和深入。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根本矛盾及戰後資本主義實行「生產合理化」的一切結果，現在都帶着極深刻尖銳的性質普遍爆發出來，帝國主義及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民主黨）能夠想到和做到的解決危機辦法，只是實行進攻蘇聯，重行瓜分世界及壓迫殖民地革命的世界大戰。處在國際帝國主義半殖民地地位的地大物博的中國，在世界大戰中，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太平洋戰爭毫無疑義地主要的是瓜分中國的戰爭，進攻蘇聯的戰爭不僅同時包含有瓜分中國的意義，而且中國對於這一戰爭命運有很大的決定性。爲要在進攻蘇聯，瓜分中國及一般太平洋大戰中，取得優勢的地位，各帝國主義國家——首先是英，美，日——都拚命地攫取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優勢，牠們都嗾使，挑撥，組織和發動軍閥戰爭，以便在戰前，戰時和戰後一般的得到許多新的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權利——尤其是直接在牠們各自豢養的走狗勢力圈內，得到許多特殊的新權利。南京蔣系政府，雖然不純是美帝國主義的寵妾，但政府各部都坐着福特，胡佛派的顧問，這些顧問天



天在那裡嚴密計劃使南京政府的一切設施，適合於金元帝國主義以龐大財政資本殖民地化中國的利益，雖然所謂五萬萬元大借款等計劃還因種種原因不能實現，但不僅中美貿易與日俱增成爲昭著的事實，南京政府強拆民房及徵工築路修成許多廣平的汽車道，以便汽車大王汽車生意暢茂全中國，強佔民地（老鼠沙）作爲油池，以便煤油大王煤油交易能夠更便利的在中國發展，訂定中美航空合同使中國大部領空成爲美帝國主義和平時期的交通工具及戰時的空軍根據地……等等，都是彰明較著的事實。美帝國主義者對南京政府也備極體貼懷柔，在關稅問題上首先發『贊成自主原則』的空砲，在領事裁判權問題上公開主張由南京『自動宣佈撤廢』的空文，在南京政府勢力範圍內已成立了幾種或明或暗的借款，在這次戰爭開始準備時便運來六十架軍用飛機。南京政府與金元帝國間這樣濃熱的雨意雲情，使英日以至德法都發生無窮的醋意，英日尤其感覺到大的威脅，雖然大不列顛帝國政府從南京政府手中，也得到退回漢潭租界，賠償鎮江租界英商損失及改成永租地域，成立中英海軍協定使中國海軍實權受『海上王國』的支配等等新權利；日本帝國主義從蔣系政府手中，也得到北洋軍閥政府所不敢承認的『西原借款』的承認，濟案的倒貼殺人手續費，中日互惠關稅及內河航行權等等新權利；但英日帝國主義總深切地感覺到金元帝國主義及南京政府間這些行動，給予英日在中國的既得權利和將來前途莫大的威脅。美國方面不僅對於英日法等在中國劃定的勢力範圍，早以『門戶

開放』『機會均等』口號要求重新劃分；而英國在南中國勢力的恢復，日本公開武裝佔據北中國及東三省等行動，在本國經濟危機加緊的美國看來，更是急待解決的問題。整個國際市場緊縮及爭奪市場戰爭（英美在南美的衝突及英日美在印度非洲各處的衝突等等）緊迫的結果，尤其使英美日都深切地感覺到對中國問題只有加緊進攻的可能。英國工黨政府不僅對於新工具——改組派，進行反蔣戰爭，加以直接同情和援助，也不僅把李宗仁與汪精衛拉攏起來，並且連老走狗吳佩孚，孫傳芳，楊森之流都動員出來，以便在此次軍閥混戰中能夠盡量的取得更多的好處，日本帝國主義動員了整個北方軍閥——張，閻，馮以至安福系餘孽都出來衝鋒陷陣，立意要在北方組織新政府。美使詹姆生不久以前特別南下謁蔣，籌議進行戰爭的方策。此外，恢復帝國主義資格了的德意志，不但一年來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表現積極的努力（中德商約改訂，德顧問，德教練幫助蔣政府，中德陸軍協定，中德歐亞航空條約……等），而且積極參加這一次軍閥戰爭的製造（輸送大批軍火於蔣，閻，張各方，派軍事顧問到作戰雙方），法，意帝國主義對於此次軍閥戰爭同樣具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組織作用。這一切都充分證明此次軍閥戰爭是國際帝國主義整個經濟政治危機加緊的反映，尤其是進攻蘇聯和瓜分中國的世界大戰的危機緊迫的反映，特別是美英日爭奪太平洋霸權及中國市場的戰爭危機異常緊迫的反映。此次軍閥戰爭毫無疑義地是英日美直接戰爭的預演和縮

影。除了有意隱蔽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各派軍閥分別勾結以宰割中國廣大勞苦羣衆這一事實的取消派（陳獨秀等）外，誰也不會說『每一個帝國主義利用一派軍閥作工具』的判斷是『笑話』吧！

北洋軍閥十幾年統治的結果，使中國民衆已陷於水深火熱的地步。加上國民黨三年的統治，更使中國整個政治經濟危機走到異常尖銳的程度。國際帝國主義兩年來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奴役力量的迅速增多和加強，是中國經濟總危機益加深刻的主要動力。非常明顯的，因為帝國主義主使國民黨進攻蘇聯的結果，使中國茶失去唯一廣大的市場，因而使整個茶業陷於絕境；因人造絲及日本絲與華絲的競爭，使整個絲業完全衰頹；因歐美麵粉的大批輸入，使整個麵粉業塌台；因日英紗廠的各種優越權利，使許多中國紗廠轉移成外資企業；因為瑞典火柴的大批輸進，使整個火柴業完全倒閉；因英美煙商有許多優越的利權，致使中國最大的煙公司（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都宣告破產；因為外國航輪的增多和不受中國政府影響，致使整個航業崩潰到極難堪的地步（招商局破產）；因種種特殊關係，使重工業中（如煤，鐵礦）的一部份中國資本急劇的非民族化；因農產品價格與種類受國際銀行的操縱與支配，使整個農村經濟的恐慌更趨於絕境；因勵行『生產合理化』的結果，使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降低與一般痛苦加深；因金融市場完全操在外國銀行再加以金貴銀賤的影響，物價高昂，工商業破產更是

隨時隨地的深入和擴大。南京政府及各派軍閥的一切設施，都只是使中國一切更適合於財政資本統治的利益，加緊和加深中國純殖民地化的過程，只是使經濟政治危機更加深入和普遍。軍閥制度不僅未因國民黨的統治而減輕或縮小，反而加深和擴大；北伐的結果，雖然名義上打倒了幾個著名的軍閥領袖——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而他們的武裝力量還依然改編的存在着；同時，加添了許許多多個國民黨忠實同志的新軍閥，增加了成千累萬的新軍隊。

在新舊軍閥之間，舊軍閥內部及新軍閥內部，都隨時隨地的加深和擴大着各種難以調和及不能調和的矛盾，經過幾次「編遣」，「統一」的會議，經過幾次「討逆」和「討蔣」的戰爭，各派及各個軍閥的軍隊的增加，更是愈加迅速和愈加擴大。蔣介石領導下的第一集團軍及所謂直隸中央的各種雜色部隊，號稱四十萬人，馮玉祥的西北軍經韓石兩部倒戈後，還有十五萬多人，閻錫山已經擴充兵額到卅幾萬，張學良更藉着「防俄」名義，大規模擴充海陸空軍，李宗仁張發奎部隊現又擴充到十一萬人，其他各個大小軍閥，都是擁有數千以至數萬的軍隊。如果前三年外人統計中國的所謂正式軍隊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是正確的，現在則起碼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不僅陸軍有大量的擴充，而海軍，空軍都有急劇的建立和增加。至於以各種名義存在着的軍閥武裝部隊——如教導隊，衛戍師，省防軍，保安隊……等等，更有可驚的數目。這樣大量的脫離生

產的羣衆——軍隊，只有靠剝削從事生產的工農羣衆的血汗來養活。以前北洋政府的每年經常收入，最多不過四萬萬元——四萬五千萬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南京政府的去年一年收入總數，便有六萬萬元，其他各派大小軍閥在各區域及各省的收入總計起來，當然更要幾倍於這個數目。南京政府兩年來發行的各種公債庫券款，便值四萬萬餘元，其他各派軍閥在各區域及各省發行的數目，更無明確的統計。南京政府治下的捐稅名目，據顯而易見可以統計的，已有一百七十餘種，其他各派各個軍閥隨時隨地的自立名目所徵的捐稅，更不知有多少花樣，南京政府的收入總額六萬萬元中除去以百分之三一開支作償還所謂「國債」及百分之二支作海關經費外，下餘的款項中有百分之九五，八是完全開支作軍費。據一九二八年五月份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經理處的支付預算書的報告，蔣系軍隊一個月的經常餉精，便要一千七百多萬元。蔣政府在一九二九年在德日兩國購買軍器的費用，便約合中國銀幣兩萬萬元。購買日本四二年式步槍十二萬枝之多，德國自動鎗一項便有十七萬枝，三十餘種的化學軍用品——毒瓦斯等，一百五十架飛機。至於向英美購買的武器及其他秘密購買的武器，我們還無從詳明的知道。不久以前中國各報都公開登載蔣閥兩方都在德國購買大批的軍火，前幾天革命日報（改組派機關報）又登載蔣張兩方都在德國購來幾船軍器的消息。軍器越多，軍隊越多，軍閥戰爭越來得凶猛和迅速；軍閥戰爭越增

多越廣泛，越要更多械多。去年兩次蔣桂戰爭，兩次蔣馮戰爭，幾次蔣張（發奎），蔣俞（作柏）戰爭，只是最近全國軍閥混戰的導演和預演。各派軍閥的餉糈主要來源，都不外租稅，公債和外債。不僅租稅公債的來源，因整個經濟恐慌而日漸涸竭；就是外債也因可以典當抵押的担保品日漸短絀而所得有限；因此，不僅佔駐陝甘豫災荒遍地的西北軍，是專靠打家劫舍強迫惡勒以爲生，不僅各派雜色軍隊是專幹強盜土匪生活，不僅湘鄂贛的軍隊，困守孤城，專門靠黑夜出城搶掠和燒殺赤色區域以苟延性命，就是號稱十幾年未打仗搜括積壘最豐的閻錫山軍最近也直接和平津一帶實行糧食日用品強迫徵發，佔據最富饒江浙區的蔣家軍，也是殺人綁票搶劫焚擄，無所不爲，關外王也因招兵買馬太多，時刻想到關內來染指。大家都只有用擴充地盤的辦法來解決兵餉困難的問題，大家都拚命地進行互相火併的戰爭，越戰爭人民失業，破產，流離失所的越多，糧餉越沒有來路，當兵當匪的人越多；糧餉越沒有來路，兵匪越多，越要進行戰爭。軍閥制度與軍閥戰爭的本身，簡直找不出新出路！軍閥戰爭不僅使整個農村經濟，完全破產，成千成萬的農民，變成乞丐，流氓，兵匪，盜賊，娼妓；使工人的工作加重，工資不發，受軍事紀律鎮壓，並且公開提取工人的公積金養老金儲蓄金等充作軍費，百物昂貴，捐稅增多，使一般貧民簡直沒有方法生活下去，一般羣衆都在殘酷的白色恐怖——軍事戒嚴的鐵血網內生活着，失去了一切人類最初步最原始的自由；交通破壞，工

商業凋零，以至於使一部份資產階級都發出反對戰爭和捐稅的呼籲。反對軍閥制度與軍閥戰爭的鬥爭浪潮，捲進千百萬億的羣衆；全國主要城市的工人鬥爭，已進走到政治同盟罷工和直接武裝衝突的形式，農民運動在南中國各省表現出顯著的高潮，蘇維埃區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農紅軍迅速在七八省範圍內建立和擴大，兵士成營成團成旅的譁變，很多投到革命羣衆方面去，要飯吃要和平反捐稅的鬥爭，在貧民羣衆中日益普遍和深入，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積極起來進行爭政治自由的鬥爭，並且其中有一部份深切同情於工農革命運動。不僅共產黨和總工會正在號召全國蘇維埃區代表大會，不僅共產黨正在領導，準備和佈置全中國的武裝暴動，不僅共產黨及工農羣衆正在準備在武漢區域開始建立中國蘇維埃政府，即統治階級本身也深切地感覺到「赤化」全中國和紅軍佔領武漢的危險已經迫在目前。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統治階級都一齊在革命怒潮之前發抖！

在這樣經濟政治危機空前緊張的形勢之下，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矛盾衝突，也越加深刻和廣泛。地主，買辦與資產階級間的衝突，地主與地主間的衝突，買辦與買辦間的衝突，各種各派的資產階級相互間的衝突，都帶着更深邃更尖銳的程度暴露出來。各派軍閥都感覺到自己勢力範圍內的經濟政治危機已日趨尖銳，都只能想到擴大自己的剝削壓迫地盤的解決方法，都以爲自己鎮壓革命與欺騙羣衆更有手段更有辦法，都

拚命進行火併戰爭企圖找到挽救危亡的相當出路！

這次普遍全國的軍閥戰爭，名義上是「反蔣」與「擁蔣」之戰，實際上是瀕於死亡的各派統治階級企圖找新出路而又不能找到以致完全場台前的混戰。無論蔣介石「擁護中央」「促成編遣」的號召，無論北洋軍閥「組織軍政府」「反對個人專政」的宣傳，無論改組派「護黨」，「救國」，「改組」的口號，都得不到廣大羣衆的同情，都只是表示他們沒有新出路，都使羣衆更加認識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走狗及羣衆死敵，都使羣衆認識他們之間的戰爭只是分贓戰爭和更增加羣衆的痛苦。所以此次軍閥戰爭是中國整個政治經濟危機尖銳化的具體反映。只有有意替統治階級捧場的取消派，才會高唱「國民黨的統治真是意外的穩定呵！」的開心曲！

### 三 戰爭的結果與前途

在全國大規模混戰還未正式爆發以前，或許再來幾個「大將軍下野」，「總司令出洋」的把戲，但反映整個國際及整個中國政治經濟危機尖銳化的軍閥混戰，絕對不能真正和緩或避免的。戰爭的軍事上的結果，（誰勝誰敗）現在我們還不能確切地斷言；但一般的結果與前途，我們是可以肯定指出的。我們堅決相信：無論誰勝誰負，爆發此次戰爭的動力——國際的和中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尖銳化——絕對得不到絲毫解決辦法，而只有更加尖銳！



在目前這樣緊張的國際政局之下，在爭奪市場（尤其是瓜分中國）的鬥爭這樣緊迫的局面之下，不僅在太平洋上已滿佈了戰雲，在中國境內已佈置了戰備。兩年來英美日法意的兵艦戰艇不斷的來華，陸戰隊，飛機，唐克，毒氣不斷的運入中國，在天上，海上，陸上，已分別佔據軍事根據地，在新加坡，菲列賓，香港，滿洲已實行作戰的佈置。此次軍閥戰爭的結果，不僅一般的使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的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加強奴役的勢力，不僅使勝利的帝國主義隨着其工具勢力發展而得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尤其是有直接引起英日美太平洋大戰的危機。

舊北洋軍閥（閻馮張等）雖然在戰略上策略上還時隱時現地說幾句什麼『護黨』『救國』及反對『偽三大大會』的口頭禪，但實際上已改樹『中華陸軍』，『西北國民軍』的旗幟，並不積極籌備在北平正式組織『軍政府』。改組派以『護黨』『改組』『反蔣』的旗幟，勾結各派各系軍閥做升官發財的捷徑。南京政府一方面高唱『擁護中央』『討伐叛逆』，另一方面請命直（吳佩孚）魯（張宗昌）軍閥，企圖離間和分裂北洋系。舊北洋軍閥雖然打起恢復北洋系統的旗幟，却又還不完全拋棄國民黨的幌子，這表示北洋軍閥本身也感覺到北洋系統的招牌已經早為廣大羣衆所痛恨；國民黨各派雖然把『以黨治國』的口號提得極高，但同時又公開投降北洋系統，這表示國民黨本身也感覺到國民黨的旗幟已經不能作統治階級的形式。這次戰爭把廣大羣衆對於中國任何一派統治階級的

任何幻想（『統一』，『和平』，『幸福』）都更加打破，把形式上成爲中國各派軍閥的年來共同統治形式的國民黨統治方式，正式宣告破產；戰爭的結果，使中國又正式分成幾個政府。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任何一派成立新政府，只有得到太上政府——帝國主義者允許和同意後才有可能。現在的形勢還是表示着英日聯合對美的形勢，如果這一形勢在相當時期內繼續維持，則中國要形成兩個政府（北平一個，南京一個）如英美日形成三角對壘的形勢，則要成立三個政府（北平一個，南京一個，廣東一個）。

。各個政府之相互間及各個政府內部的各派各系之間以及各派各系的內部的相互間，依然是矛盾不可調和，依然是進行更複雜的軍閥混戰！所以此次戰爭的結果是使中國過去一切統治方式（自北洋軍閥至國民黨）完全宣告破產。使中國各派統治階級都加速崩潰。

全中國已經有七八千萬奄奄待斃的災民，工人階級不僅將過去大革命中所得的一切政治經濟地位的改善條件完全失去，而且生活痛苦遠超過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兵士很多是八個月至一年以上未曾領到相當餉糈，一般貧民更是處在衣食俱無的境遇，交通已大部破壞，工商業已整個恐慌，金融更紊亂到不可收拾。此次戰爭的結果，將使災荒，失業，減薪，加時，欠餉，加捐，加稅……成爲更普遍更深入的現象。使廣大工農兵貧民羣衆走到更窮困更痛苦更是非革命無出路的地步！

因此，此次軍閥戰爭的前途是：全國國民經濟的總危機愈加尖銳化；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各派統治階級的相互矛盾衝突更加複雜和深刻，統治階級更加難於按照舊的統治方式繼續其統治；工農兵貧民羣衆更加感覺到不能再繼續忍受原有的統治。更有覺悟，有勇氣，有決心，有辦法起來推翻現在統治的直接革命鬥爭；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成份，更加要明顯確定其政治趨向，以分別參加決死戰鬥的陣線。只有喪心病狂的取消派，才會估計『中國軍閥戰爭是中國各派資產階級相互間的戰爭』，其結果是與『南北美戰爭及日本西南戰爭』一樣使國家達到統一然後和平發展資本主義的前途！

#### 四 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具體內容

中國共產黨早已向工農兵貧民羣衆明白宣言：『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是反對軍閥戰爭唯一有效而且徹底的方法。中國共產黨及廣大的工農兵羣衆都徹底的認識：軍閥戰爭的主要動力是國際帝國主義列強利害的衝突，軍閥制度矛盾及統治階級內部相互間複雜衝突，都是軍閥戰爭爆發的重要因素。我們不是反對戰爭中的某一派軍閥，而是反對整個軍閥；我們不是爲『暫時的和平主義』或『虛偽的人道主義』而反對軍閥戰爭，而是要根本消滅軍閥戰爭；我們不僅要消滅軍閥戰爭，而是要徹底消滅軍閥戰

爭的一切社會政治經濟基礎；我們不是空喊「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國民黨」，而是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根本推翻現存政權而代之以蘇維埃的統治。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真正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企業和銀行，驅逐帝國主義駐華海陸軍，收回一切租界地和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真正徹底實行土地革命消滅一切封建餘孽；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真正統一中國和實行民族自決；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使現在階段革命轉變到另一更高的階段。總而言之，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徹底消滅軍閥戰爭及其發生的基礎。同時，只有工農兵的武裝暴動能夠建立蘇維埃政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英勇的廣州暴動，便是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光榮前例。現在廣西的龍州百色十幾縣，江西的贛州及七十一縣，閩西的十幾縣，湖北湖南的幾十縣，豫皖邊的幾縣，都發展了地方暴動，都成立了蘇維埃。那裏便消滅了軍閥戰爭，那裏便實行消滅軍閥戰爭的基礎，那裏便只有革命羣衆與反革命間的決死戰爭。這一切事實都確切證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具體內容。只有甘心擁護軍閥戰爭及根本反對武裝暴動的取消派，才會罵共產黨在國際革命形勢與中國革命形勢這樣緊張和中國軍閥戰爭這樣普遍深入的條件之下，佈置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行動是「盲動」！

## 五 力爭實現革命首先在主要數省甚至一省勝利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明顯地指出因中國各種特殊條件的存在，革命有首先在主要數省甚至一省勝利的可能。最近中共中央七十號通告，根據目前國際革命形勢與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確定地指出在全國範圍內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口號已日漸成爲行動的口號，而首先在數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前途，日益證明有實現的可能；同時，根據種種客觀條件的關係，指出武漢及鄰近各省有最大的可能。這種可能當然並不是單純的軍閥戰爭的條件所決定，然而軍閥戰爭的確在客觀上要促進和加速這一可能的實現。從目前革命形勢及軍閥戰爭的形勢看來，在武漢及附近各省（湘贛）開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行動，並非什麼很遠的前途。湘鄂贛的統治階級在此次軍閥戰爭中表現出特別加速的崩潰，西北軍由老河口進逼襄樊，沿平漢路襲取武漢；蔣政府爲集中力量，縮短戰線起見，曾有放棄武漢的企圖；雜色軍隊中誰也沒有獨立統治武漢的能力，同時，誰也企圖佔取武漢。游擊戰爭 地方暴動，蘇維埃區域，工農紅軍，一定在軍閥戰爭中得到更大的發展；反帝運動及工人鬥爭，一定在軍閥戰爭中，激起更廣泛更劇烈的勃發；共產黨，共產青年團及其領導下的各種革命組織，在反軍閥戰爭工作加緊中，一定得到更廣大的羣衆的信仰與擁護。因此，力爭革命首先在武漢及其鄰近各省勝利的前途加速實現，即是變軍閥戰爭爲工農兵武裝暴動推翻軍閥統治的戰爭，不僅是武漢及其鄰近各省的工農羣衆的緊迫的任務，而是全中國工農羣衆

的迫切任务。 奪取武漢毫無疑義地是建立全中國蘇維埃政府的開始，牠不僅能使武漢及其鄰近各省脫離軍閥戰爭的慘禍，而且能變全國軍閥混戰為全國革命戰爭。 共產黨領導全國工農兵羣衆為加速奪取武漢而鬥爭，一切工作和鬥爭都應當向着這一中心任務進行，這毫無疑義是必要的。 但絕不是說，除武漢及其鄰近各省（湘贛）外，其他各省——尤其是閩粵桂等省，便沒有開始革命勝利的可能；這種可能不僅一般地存在着，而且在軍閥戰爭的局面下特別有利的存在着。 所以共產黨應當堅決地領導各省工農兵羣衆在軍閥戰爭中盡可能的實行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及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的策略；擊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中國統治鎖鍊中的最脆弱最主要的一環，同時，使動搖以至破碎其他的各環。 在軍閥混戰中，我們堅決地在各派軍閥統治範圍內，實行採取失敗主義的策略，實行進行游擊戰爭，地方暴動，建立蘇維埃區域，組織政治罷工以至總同盟罷工，直到武裝暴動推翻現存政權而代之以蘇維埃政府的統治。 我們絕不能絲毫存在着「反蔣」軍閥統治範圍內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策略，是否幫助了蔣系軍閥統治的勝利或鞏固；或者在蔣系軍閥勢力範圍內實行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的行動，是否幫助了蔣系軍閥的勝利或穩定……等等疑問。 我們應當堅決地認清任何帝國主義及任何軍閥對於廣大工農羣衆的關係和政策是一致的，他們之間雖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但他們對於工農革命運動的態度是一致無二的。 我們在一省以至數省首先進行

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的行動，是變全國軍閥戰爭爲全國革命戰爭的正式大規模地開始；我們首先在一省以至幾省消滅軍閥戰爭，是消滅整個軍閥戰爭的開始；我們在一省以至幾省首先消滅某派某系軍閥的鬥爭，是消滅整個軍閥制度的第一步。誰要藉口必須在全國各派軍閥統治範圍內同時舉行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才有勝利的可能，因而反對力爭革命首先在一省以至幾省的勝利的行動；誰要藉口在某一派軍閥勢力範圍內，首先以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的行動是幫助了另一派軍閥的勝利，因而懷疑以至反對在一省以至幾省盡可能地首先實行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策略；誰便客觀上贊助擁護和延續了軍閥戰爭與軍閥制度的生命，誰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否認了中國革命有首先在幾省甚至一省勝利的可能的前途，實際上是延緩和放棄了全中國革命的勝利！

## 六 加緊反改組派的鬥爭是反軍閥戰爭的勝利的主要前提

我們毫不隱晦地說：我們在不久以前，對於從理論上，實際上，反改組派的鬥爭，有客觀上忽視的缺點。直到最近，我們對於這一鬥爭雖然已加以極大的注意和努力，但實在還沒有做到應有和必須的程度。當此全國革命形勢緊張及軍閥戰爭擴大深入的局面之下，我們反改組派鬥爭的唯一有效方法，當然是深入革命鬥爭。我們以根本打倒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對抗牠的「爲要反對帝國主義，不能不妥協帝國主義，爲要妥

協帝國主義，不能不反對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我們以徹底實行土地革命的理論與實際對抗牠的『二五減租，主佃合作』的理論與實際；我們以階級鬥爭和從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際來對抗牠的『階級調和，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際；以我們的工農兵貧民代表會議的蘇維埃政權的理論與實際來對抗牠的軍閥、買辦、地主，資本家，豪紳分贓會議的國民會議的理論與實際。揭露改組派的理論基礎——孫文的三民主義，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理論；指明南京政府及各派軍閥現在所實行的都是真正道地的根據三民主義的政策，絕不是什麼現在國民黨實行的『假三民主義』，彷彿實行『真正三民主義』恐怕多少要好些；指出國民黨十三『改組』的真正革命意義，只是實行所謂『三大政策』——聯俄，聯共，工農政策——；國民黨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政綱，到現在已經成爲過時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綱領；整個國民黨及其政綱都已成爲公開無恥的反革命的工具，絕不是什麼『改組』和『恢復二屆中央』可以挽救和改變萬一的！改組派實際上現在不過是反動國民黨的各派別中的最狡猾，最狠毒，最下流，最無恥的一派！這一切當然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尤其緊要的要理論上和實際上指出和證明改組派是兩年來軍閥戰爭——尤其是此次軍閥戰爭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最積極的發動者和製造者！『革命評論』時代的改組派的『反對封建勢力』的理論與實際，便是幫助蔣介石進行反對西山會議派與桂系的軍閥戰爭；所謂『國民



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除改組派領袖陳公博，王法勤等黨籍，使改組派失去昇官發財的機會後，「民主」，「民生」等雜誌以及最近的「革命日報」大吹特吹的「肅清封建勢力，建設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際，便是拉攏，拍捧各派各系的軍閥進行「反蔣」，「擁汪」，「擁閻」，「擁馮」，「擁李」，「擁張」的軍閥戰爭；指出和證明改組派是香港總督和工黨內閣的新近寵妾，與其他美日臣僕毒害中國民衆的作用沒有兩樣；指出和證明改組派的「反蔣」，「反南京政府」的實際內容，只是與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爭奪禍國殃民的權利；指出和證明改組派之所以成爲此次軍閥戰爭中各派軍閥——自安福系，直魯系到閻，馮，李，張各系——的共同旗幟，正因爲改組派的一切理論和實際是各派軍閥所共同贊賞和採用的工具，是維護和延續各派帝國主義各派軍閥的統治的應時良劑，同時，卽是欺騙和屠毒中國廣大工農羣衆的最毒方策；指出和證明在廣州暴動三天之內屠殺工農兵達五千七百餘人之多的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在理論上實際上實行「殺盡共產黨，殺盡工農革命分子，殺盡革命青年」的主張的改組派，上台之後，絕不會與蔣介石政府有什麼根本區別；改組派現在的「打倒軍閥政治，建立民主政治」，「保護工農利益」，以至於「罷工，罷市，罷課，甚至暴動」的口號，都不外是用來欺騙廣大工農羣衆去作軍閥戰爭及「擁汪上台」的犧牲品！此外，我們更要從事實上暴露改組派現在大捧特捧的「各派武裝忠實同志」的原形；必須指出閻錫山是日帝國

主義的十八年來忠實的走狗，他不僅是以『模範省』的手段，對於山西勞苦羣衆實行『農奴式』的壓迫與剝削（『村里制』，『聯保制』），而且對於他統治下的工農羣衆鬥爭，更施行殘酷的屠殺（屠殺北平人力車夫百數十人，武裝壓迫唐山的礦工等等）；馮玉祥正在拚命找日本做姘頭，同時又正在向英國送秋波，他屠殺甘肅漢回農民一百幾十萬，以大刀隊血洗過陝西河南八十縣反抗苛捐雜稅，反對軍閥戰爭的鄉村；李宗仁是在湖南湖北血洗幾十縣和屠殺八十萬工農革命羣衆的劊子手，是對工農革命分子『寧肯錯殺一千，不要錯放一個』的理論的堅決執行人；張學良是東三省的忠實李完用，他實行屠殺蘇聯和中國的工農比任何人都殘酷，吳佩孚，段祺瑞，孫傳芳這些改組派的忠實同志的罪惡，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如果這些北洋軍閥在過去當權時，還沒有做出像國民黨各派新軍閥所做的賣國殃民的勾當這樣繁多和這樣『偉大』，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某些點上比國民黨各派軍閥政客要好些，而是因為那時候的國際關係與帝國主義各國對於中國關係以及中國國內階級分化和對比的關係，與現時都有程度上和範圍上的不同；他們現在如果要『東山再起』，其一切獻媚帝國主義與屠毒工農羣衆的行動，絕不會絲毫亞於現在當權的任何軍閥。現在『反蔣』與『擁蔣』的各派軍閥之間，都是以『攻俄不力』，『破壞對俄戰爭』，『剿共不力』，『清共不力』等口號作相互攻擊的中心，便是此次軍閥戰爭中各派軍閥——自安福系到改組派——的真實寫照！ 改組派的同盟師

友——西山會議派與國家主義派，是『反俄』，『反共』，『反工農』的最老祖宗，是最公開無恥地擁護軍閥制度，擁護五色國旗的最老『國手』，他們與改組派手携着手積極挑動和參加軍閥戰爭，都是積極找取升官發財的捷徑。至於寂然無聞的第三黨，實際上不過是附改組派『驢尾』的一條小狗。

我們必須堅決明白地向廣大工農宣言和解釋；蔣介石及南京政府已惡貫滿盈，應該立刻的打倒。但一切反蔣反南京政府的各派軍閥及整個國民黨，都應該立刻推翻。在工農羣衆中還在賣『迷藥』的改組派，是妨礙我們消滅軍閥戰爭及整個國民黨的最狡猾，最毒惡的敵人；改組派在羣衆中散佈的各種幻想的影響多一分，我們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工作便困難一分；在反軍閥戰爭的緊張工作中，加緊從理論上實際上肅清改組派及其各種同盟軍在羣衆中散佈的各種幻想與欺騙，是反軍閥戰爭勝利的直接前提！

## 七 加緊反對軍閥制度與軍閥戰爭的忠誠擁護者——取

### 消派，是實行反軍閥戰爭的澈底策略中的主要工作之一

取消派（托洛茨基反對派及中國機會主義的陳獨秀派）的取消主義理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在不可知的將來——的根本特質，是完全取消中國

現在階段的革命及社會主義的革命。從這一根本理論出發去分析中國各種問題的取消派，必不可免的成爲中國軍閥制度及軍閥戰爭的忠誠擁護者。他們根本以爲「帝國主義對中國讓步了」「中國沒有封建餘孽了」「全中國都是資產階級的統治了」，實際上便是否認了中國軍閥制度的主要基礎的存在，當然同時就否認了中國軍閥制度的存在。他們根本以爲「軍閥戰爭只是中國資產階級各派間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是與南北美戰爭及日本西南戰爭一樣」——即國家統一起來「和平」發展資本主義——，實際上便是否認了國際帝國主義在華矛盾，軍閥制度的各種矛盾及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複雜縱橫的矛盾，是軍閥戰爭的各種動力，當然同時就否認了軍閥戰爭的前途是使國民黨各派統治階級的統治更加崩潰，當然同時夢想某一派軍閥可以武力統一中國，可以召集國民會議，使他們這些「進步的民主勢力」，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中國國家中」，與改組派，第三黨等濟濟一堂，「攢進政治舞台」！他們根本以爲現在是「國際資本主義更加穩定」，「中國革命已經完全死亡了」，「現在的鬥爭只是革命高潮的餘波」，「現在沒有羣衆鬥爭」（以上陳獨秀的意見），「現在只有流氓土匪這裡那裡的無組織地非科學革命地蠢動」，「革命高潮只有在中國經濟來個高漲，然後再來個危機之後，才有發生的可能」（劉仁靜）……，實際上便是完全替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硬捧台，比麥克唐納爾，胡佛，蔣介石，汪精衛對於政局還要樂觀些；當然同時要完全否認中國工

農有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必要與可能，當然要咒罵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一切工作是『盲動』！他們根本從各方面破壞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赤色工會，蘇聯，中國蘇維埃區及紅軍，游擊隊等等的威信和信仰，他們根本在城市和鄉村中破壞和出賣工人的罷工，破壞和分裂革命的營壘，實際上便是完全爲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盡忠，同時當然就是破壞和消滅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的偉大工作！他們雖然在表面上也還說些『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以至『反改組派』的『革命』詞句，實際上他們已經成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忠誠擁護人，他們的根本政綱已經與改組派沒有分別，他們在政治上是跟着改組派尾巴後面聞香的一條小狗！他們對於革命及革命羣衆最危險最狡猾的地方，就是他們還打起『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共產黨』這些光榮偉大的旗幟，企圖在這些神聖旗幟之下，去進行最狡猾，最陰險，最下流，最無恥，最蠢笨，最靈巧的各種欺騙反動宣傳，以麻醉工農羣衆的階級覺悟，以和緩工農羣衆的劇烈鬥爭，以延續和擁護統治階級垂死的生命，以掩護和保持軍閥制度與軍閥戰爭。取消派在工農羣衆中散佈的各種欺騙與幻想的影響多一分，我們反對軍閥戰爭與消滅軍閥制度的工作也困難一分。所以在加緊實行反軍閥戰爭的徹底策略時，從理論上實際上在廣大羣衆中加緊反對軍閥制度及軍閥戰爭的忠誠擁護者——取消派，是非常主要的工作之一。

## 八 加緊進行反對各種右傾傾向及對右傾採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是目前黨的最主要任務之一

布爾塞維克毫不隱諱自己的弱點，只有公開的指出和努力的補救。現在黨內存在有各種右傾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險。右傾傾向的第一種表現是對於目前國際革命形勢及中國革命形勢的日益完備高潮條件的懷疑與動搖；第二種表現是在羣衆鬥爭中黨的尾巴主義；第三是職工運動中的黃色傾向與對於赤色工會建立的忽視；第四是農村中的富農路線的領導和對於反富農鬥爭的猶豫和不堅決；第五是地方觀念，保守觀念和一般的農民意識；第六是對於士兵運動的忽視與對於兵變的取消傾向；第七是對於爭取公開工作路線的懷疑與不堅決；第八是對於紅軍，游擊隊及蘇維埃區在一般革命運動中的比重成份估計得不夠；第九是對於「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不正確估計和「幻想」，最後，非常危險的是對於黨的本身力量估計得太過分薄弱。非常明顯地，第一種傾向能阻止，妨害，動搖甚至反對黨的目前一切中心策略路線的執行；第二種傾向，能使黨由羣衆的先鋒轉移到羣衆後備，因而減弱甚至喪失黨在廣大羣衆中的領導作用與威信；第三種傾向，能阻止，妨害，動搖正應加緊進行的組織同盟罷工，政治罷工以實現總同盟罷工的任務；第四，能使土地革命停留在「抗捐，抗稅，抗租」的半途上，不實行沒收地主土地，不實行分配土地，不能夠團結和組織廣大貧農僱農作鄉村中

革命力量的基礎，不能使中農羣衆得到土地，結果使貧農僱農對於革命懷疑，公開提出：「我們爲什麼革命？革命與我們有什麼好處？」以及「你們沒收土地、分土地，爲什麼不幹？」等等的問題；或者形成『保護革命同志家屬財產』，『保護中小商人利益』，『不提出店員和僱農一樣的要求』，『工人農民都是按同一數量比率選代表到蘇維埃』……等等危及革命發展的現象；第五，使游擊隊，紅軍，蘇維埃區域都拘守一隅，使革命最多也不過以平民式手段徹底完成土地革命，革命轉變的前途淪於幻想；第六，是客觀上放棄摧毀敵人主要力量的工作，是不了解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須要武裝力量來解決，奪取，分化，破壞敵人的武裝勢力的工作是準備和實行武裝暴動的主要工作之一；兵變是軍閥制度加速崩潰和士兵革命化的主要表現之一；第七，使黨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影響拘於祕密工作達到的範圍，使羣衆鬥爭拘於狹隘環境和一般方式之內，而不能迅速的轉變成廣大羣衆範圍及更高鬥爭方式去；第八，不能正確計算到紅軍，游擊隊及蘇維埃區域在推進革命高潮及摧毀反動統治運動中應有的力量和意義，不能正確估計到牠們是中國革命勝利——尤其是開始在一省以及幾省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基本支柱，不能了解牠們已經實行變軍閥戰爭爲革命戰爭的策略；第九，不能堅決地站在保護僱傭勞動的利益上面去發展店員學徒和手工工人的鬥爭，不能動員和團結廣大的城市貧民羣衆；忽視和否認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中因土地革命及一般革命深入而發生動搖，破裂，分化以及

反動的事實，誇大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定下對於他們的不正確策略；第十，『以爲客觀形勢樣樣都齊備，只是我們黨本身太不行』，『黨現在既不能拿到政權，就是拿到政權也沒有辦法』，完全忽視和否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理論上，羣衆工作上的種種力量 and 進步，完全忽視和否認黨在國際革命中及中國大革命中艱苦奪到得來的力量，經驗，威信和同情；完全忽視和否認黨在千百萬勞苦羣衆心目中潛伏着和活動着無限的希望，信仰與尊崇，完全不了解受大革命幾年洗禮了的中國勞苦羣衆的革命覺悟，意識，經驗，勇氣，決心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革命高潮到來之時，黨與廣大羣衆能夠很迅速很敏捷建立相互的正確關係，結果便非常容易走到悲觀，失望，消極，沉悶，沒辦法，無出路……一切失去前途的機會主義與取消主義的道路。這一切傾向都是與黨的目前根本任務不能相容的，都是動搖，妨礙，破壞以至反對黨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策略，都是使黨不能實現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根本戰術。與各種右傾傾向在理論上，組織上，政治上採取各種各色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是掩護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的有力護符，是右傾的實際同情者和贊助人。爲加速地和順利地進行反軍閥戰爭的根本戰術起見，加緊反對各種右傾傾向及對右傾採取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是目前黨的最主要任務之一。

## 九 加緊各種主要工作，爭取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



## 的澈底勝利

我們既已知道中國軍閥制度的主要基礎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奧援和封建條壟的存在；軍閥戰爭的主要動力是國際帝國主義利益的矛盾，加上軍閥制度的根本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縱橫錯雜的矛盾；徹底消滅軍閥戰爭的唯一策略是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這一策略的具體內容是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根據中國各種特殊條件，革命首先有在主要一省以至數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在主要一省以至數省奪取政權是建立全中國蘇維埃政府的正式開始；因此，必須認清當我們實行以武裝暴動在主要一省以至幾省首先消滅軍閥戰爭時，一方面固然是全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的開始，是變武裝進攻蘇聯的中國反武裝擁護蘇聯的中國的開始，是變帝國主義大戰屠場的中國為反帝國主義大戰堡壘的中國的開始；但另一方面，也即是中國工農兵羣衆與國際帝國主義武裝戰爭的正式開始，也即是全中國國內階級戰爭大規模地普遍地爆發的開始。英美日法德現在這樣拚命地用飛機，戰船，大炮，機關鎗，毒汽，軍用化學品武裝中國各派軍閥，兩年來那樣瘋狂地加派軍艦，陸軍，航空隊，唐克的來華，最近日本開十六隻魚雷艦到長江沿岸，英國武裝商船，上海租界及各地租界街頭巷尾的軍事佈置與炮台建築；各派軍閥及各省軍閥共同『討赤』，共同『剿共』的宣傳和佈置，都把革命與反革命武裝肉搏的時期迫切的問題顯明地提在我們的面前。無論各帝國主義相互間及中國各派相互間的內外矛盾何等深刻

，何等尖銳，何等不可調和，但他們實在有暫時聯合一致共同壓迫革命的可能。這一點不僅有國際帝國主義在過去和現在武裝進攻蘇聯的行動作爲充分的證明，即過去廣州暴動和最近龍州事變都給了我們寶貴的教訓和警號。所以我們在實行準備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以蘇維埃中國代替國民黨中國的時候，必須有必需和應有的一切實際準備工作，——尤其是針對着革命的特別需要和現有缺點的工作。我們現在應當特別加緊進行的主要工作是：

（一）廣大地和深入地實行各種方式的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必須把時刻準備着與國際帝國主義武裝作戰這一覺悟，決心與勇氣，佈滿千百萬工農兵貧民羣衆的心目中。必須把武裝擁護蘇聯，反帝國主義大戰及各國革命鬥爭（工人運動與殖民地革命）與中國革命更親密地聯合呼應起來，以保障中國革命對於國際帝國主義最後勝利。過去對於反帝運動做得極不夠，這是目前運動中最大的危險！

（二）不僅在政治上，宣傳上，一般組織工作上加緊準備武裝暴動的工作，而且要在軍事組織上，軍事技術上，軍事工作上加緊佈置武裝暴動的工作，武裝工農（糾察隊的武裝訓練與游擊隊的武裝戰爭），黨團員軍事化，都成爲目前日常工作的中心，盡力擴大紅軍，發展地方暴動，發展游擊戰爭，加緊對於在華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各派軍閥的武裝組織中的破壞，分化和奪取的工作，加緊奪取羣衆中的武裝的和半武裝的組織（紅

鎗會，大刀會，小刀會等）的領導，是非常切要的日常工作！

（三）加緊配合工農兵運動發展的平衡，盡可能地配合各地方各省份各區域的革命運動，使之更加平衡發展，加強工人階級對於農民兵士貧民運動的領導，加強中心城市的領導作用和工作，加緊組織主要城市的政治罷工，同盟罷工，以至總同盟罷工，建立和加強工人階級的戰鬥中心組織——赤色工會。

（四）提出國內各民族一律有自決權的總口號，提出各民族的特殊要求，以便把八千萬回民，幾千萬蒙，藏，苗，僮，畬，高麗……等民族，捲進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的巨潮，使他們不僅不致受國際帝國主義及中國統治階級的欺騙蒙蔽而反對整個的中國革命運動，並且積極參加和擁護這一運動。馮玉祥在甘肅的回漢大戰爭，日帝國主義與張學良拚命對於內蒙王公的拉攏，南京政府及閻錫山的卑躬折節歡迎班禪，南京政府的設立蒙藏院及蒙藏學校，英國的積極武裝西藏的王公喇嘛，浙江畬民暴動反對南京政府，四川苗僮能耐堅苦的戰爭……這一切一切都指明從政治上，組織上奪取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廣大勞苦羣衆到統一的解放戰爭的旗幟之下來，成爲非常緊迫的任務。我們敢堅決斷言：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迅速地奪取這些民族之內的廣大勞苦羣衆到工農解放的一般鬥爭上來，則中國革命在國內革命戰爭時將要遭到極嚴重的威脅與危險！過去我們異常忽視這一工作的錯誤，應該立時完全糾正過來！

(五)勞動婦女與勞動青年，在反軍閥戰爭及武裝暴動中有非常偉大的意義與作用。我們必須嚴厲糾正忽視甚至放棄在這兩部廣大勞苦羣衆中的工作——特別是武裝工作的傾向，我們敢確切斷言：中國解放戰爭，如果沒有廣大勞動婦女及勞動青年的積極參加和擁護，是不會勝利的！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工作，如果不動員廣大勞動婦女和青年都起來積極進行，則沒有成功的希望的！

(六)最後，還有一個有決定鬥爭最後命運的問題，值得更加特別的注意，就是在政治上，理論上，組織上，軍事上健全和鞏固共產黨在廣大勞苦羣衆中的領導作用，我們應當公開承認，主觀力量跟不上客觀的發展，黨還不能成爲現有革命形勢和革命發展程度中的足够的和應有的中心，是現時革命運動中的主要缺點之一。我們如果不加倍努力來戰勝和補救這一缺點，我們便不能保證革命的最後勝利！然而，我們堅信，在偉大事變發展和千百萬勞苦羣衆英勇戰鬥的過程中，我們有辦法，有勇氣，有決心來戰勝這一缺點的。

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這一策略的徹底實行，便是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推翻現存政權而代之以蘇維埃政權的統治，我們堅信中國工農兵貧民羣衆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偉大事業，一定能夠與蘇聯工農兵羣衆在『十月』時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同樣地得到預期的光榮勝利！



# 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

秋白

中國革命的樞紐，是農民的土地革命。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裡，無產階級必須取得對於農民羣衆的領導權，必須站到土地革命的領袖地位，方才能夠真正徹底的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這是中國革命裡無產階級策略的中心問題。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不但證明：革命動力的變更過程明顯的指示出，不肅清中國封建式的土地關係，便決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且暴露了：中國無產階級政黨裡的機會主義，大部分和中國土地革命問題相關聯着。機會主義策略的基礎，便是寧可聯合妥協的資產階級，而拋棄革命的農民羣衆；『隨後，事實證明了』：中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式土地關係，密切的聯繫着，因而堅決的起來反對土地革命，同時，亦就投降帝國主義，成爲絕對的反革命力量；那時，機會主義又暴露於『寧可聯合富農而拋棄鄉村無產階級和貧農羣衆』的公式。中國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使農民運動的策略裡，表現許多次極嚴重的動搖；這些動搖的根本意義，其實，就是拒絕資產階級民權性的反帝國主義革命裡的無產階級領導權。

——  
中國革命的初期，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對於農民土地問題，就絕對沒有注意——沒有

農民問題的政綱。雖然一九二三年冬天，已經有同志提起土地革命的問題，但是，當時絕對沒有人注意到。當時的注意在什麼地方呢？——在『反帝國主義運動』！當時資產階級對於一切種種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示威遊行抵貨等），還是『表同情的』——還是想利用的。共產黨的目光，『很奇怪』，也只注意到這個問題：怎樣進行所謂『反帝國主義運動』，而得到『社會的同情』。至於農民運動的發展，彷彿是和反帝國主義革命是沒有關係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農民土地革命的發展，是『違背着』黨的意志，『反對着』黨的意志而進行的。因此，最初是反對『農民自動決議減租』，隨後是要求『鄉村的聯合戰線』——聯合正紳反對『土豪劣紳』。武漢時代，因為『國民黨內只有贊成反帝國主義的左派，沒有贊成土地革命的左派』，所以認為兩湖農民運動太危險了，而有發動『第二個五卅』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提議，目的是在保存和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這樣，農民運動策略上的機會主義的第一方式，就是把反帝國主義運動和農民土地革命對立起來。八七會議之後，機會主義派的首領（例如美國的彼彼兒），還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上，企圖說廣州暴動是盲動，斷定中國共產黨只是『關門革命』——領導農民運動，而『忘記了』國外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國內的敵人和國外的敵人，彷彿應當分別對付似的，而且，彷彿首先要緊的是『國外敵人』；爲着反對『國外敵人』，安安逸逸的做反帝國主義『運動』（示威，集會，

叫口號）起見，可以暫時不管農民土地革命運動的指導，只要去要求『鄉村自治』，民權立憲——和『國內敵人』妥協！

當農民羣衆自動的從減租減息，進到抗租抗稅，自動的打倒『四權』（紳權 神權，祖權，夫權），——直到沒收地主土地，均分田畝，到了這種時候，國民黨內的資產階級固然堅決起來組織地主豪紳的反革命屠殺政策，小資產階級的領袖也極快的動搖而至於反動。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呢？——逼不得已要承認中國有土地問題了。從前有很久，是否認中國有土地問題的，以爲中國並沒有教科書上所說的封建諸侯，也沒有農奴制度，就不會有土地問題。農民要求分配土地了；然後沒有辦法，要再想法拖延這個問題。於是機會主義者又苦心研究大地主和小地主的問題，——要想定出一個限度叫農民羣衆不要過火，儘在這個大地主的範圍內沒收土地。臨時的對付敵人的策略，固然可以在相當的戰鬥時機，加緊進攻地主的某一部分。但是，機會主義的對共產國際指令的解釋，却是認爲中國地主有嚴格的『大』『小』之分，中國士紳有嚴格的『正』『劣』之分；於是不去領導革命的羣衆前進，却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按照『黨的命令』去阻止羣衆的鬥爭。彷彿小地主既然和外縣中等商業資本家很難分辨，而聯合小資產階級的策略又是『國際的命令』，所以農民土地問題的政綱，從『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變成了『決不沒收小地主』的罰呢。地主的大小問題，所以在黨內費着這許



多精力去研究，正是因為問題的所在，恰好是怎樣保存資產階級在革命戰線之內，——『罰呢不沒收小地主，亦許資產階級可以安心了』。農民運動策略上機會主義表現的第二方式，就是把小地主和大地主對立起來。

武漢時代終了，農民羣衆不管大小地主，不管二百畝一百畝，到處暴動起來就沒收一切地主田地。於是又有一種傾向，認為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均分田地，這是再徹底也沒有的了，再激烈也沒有的了。凡是澈底的和激烈的，都是社會主義革命，凡是均分財產的，都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中國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的邏輯。這是拋棄無產階級的觀念，而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完全混淆起來。同時，對於這種劇烈的農民羣衆行動害怕，而夢想着安逸的職工運動，於是說這種農民暴動和遊擊戰爭是無政府的運動，中國歷史上這類的農民騷擾多得很，不能算做革命勢力，這不是我們真正十二分道地的工業無產階級的事情。——無產階級的事情，只是有組織的職工運動。這又是行會主義的表現，用『無產階級』的名義，來做拋棄領導農民土地革命的旗幟。漂亮是很漂亮的了，但是同列寧主義沒有絲毫的關係！總之，農民運動裡機會主義策略的表現的第三方式，就是或者拋棄無產階級的立場，不去領導農民，而做農民的尾巴，或者拋棄農民土地革命的領導，而暴露行會性的經濟主義。

最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對於這些機會主義的動搖，加以嚴重的駁斥之後，中國革命正在完全新的條件之下重新收集力量，向着新的高潮進行：鞏固無產階級的基礎，爭取主要的產業和城市，準備去領導那正在醞釀的農民戰爭，正是共產黨的任務；在中國革命的這種新的階段之上，中國共產黨對於農民運動，正需要極堅決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需要更詳細的確定的對於農民裡各階層的策略，需要正確的爭取農民羣衆的策略；可是，我們又發見機會主義的傾向：說——『總的策略任務，是反對地主階級，必須和富農結合聯合戰線，如果故意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那就是不對的』，『黨的總的策略路線是聯合富農，可是並不因此而應當停止貧農反對富農的階級鬥爭』。這樣，因為『了解了』中國革命還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上，所以反對沒收土地的行動弄到富農身上去；因為要反對地主階級，就只看見富農是無產階級的同盟。這樣的了解，根本和列寧主義是不相容的。所以農民運動策略上機會主義表現的第四方式，就是聯合富農，拋棄農民羣衆，以及土地革命的領導權的鬥爭。

## 二

中國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分割成爲許多勢力範圍。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的政策，一般說來，就是互相搶奪這些勢力範圍。中國的國際地位，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表明『重新瓜分已經分過的世界的鬥爭，新的財政資本國家方面，要尋找『晒太陽

的地方一，發狂似的反對舊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舊的帝國主義國家正在拚死命的抓住了已經搶到的東西」。中國何以有勢力範圍劃分的可能呢？中國經濟的特別有兩方面：一是中國無論怎樣落後，但是已經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機體，他已經是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所以每一帝國主義國家，儘可能的抓住中國，把中國歸到他自己的經濟機體裡去。二是中國自身却還沒有形成全國的市場，而分裂着許多經濟上半獨立的區域，每一個區域各有各的工商業中心，而形成地方市場——其中有許多是直接可以和國外發生商業的財政的關係。所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初步，總是霸佔這些各個的區域，而造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中國的各區域，有着半獨立的地方市場，地方性質的商業資本和錢莊資本，各有各的財政機關和武裝勢力。帝國主義的列強，尤其是英日，早已能夠佔領中國的這種區域，以其「商業中心為出發點，而使整個的區域，歸到英國或日本的經濟機體裏去（例如滿洲和廣東）。這就是造成軍閥制度和軍閥割據的最好基礎。——軍閥制度就在這種區域，找着自己的社會階級的基础和國外帝國主義勢力的贊助。同時，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在爭取對於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的支配權，——這種中央政府是替帝國主義在「法律上」，在國際公法上，固定他的在華勢力的機關。這種情形之下，封建殘餘和落後的土地關係，完全的保存着，做軍閥統治的根底。「中國鄉村之中，最初積累式的商業資本和封建的統治地主的統治，混合生長着，而

且商業資本傳受地主方面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式剝削和壓迫方法』（史太林）。中國的商業資本積累起來，極大部分都不能在『民族工業』裏找着自己的出路，或者在多少有些意義的農業之『資本主義化』裡找着出路；而是一方面投資到洋商企業裏去，——這些洋商企業所給的利息，常常比較得多，而且能夠得着更大的政治上的保護，——別方面就是投資到半封建式的土地私產裏去。中國工業化的前途上，橫着如此之大的障礙；同時，對於農民的剝削，因為市場關係和貨幣關係的發展，都是無限制的日益加重；農業經濟的危機是在極廣大的開展，極長久的綿延：光緒末年直到現在二十多年的水旱災荒，加上國內混戰，使無限量的農民或者餓死，或者完全失業破產。廣大的破產失業的羣衆之存在，和外國資本的壓迫，一方面造成高利資本和租田制度之剝削日益加緊的情形，別方面，不但使城市工人勞動者的勞動條件極端的惡化，而且使兵匪的現象極廣泛的發展，使僱傭軍隊的制度得着良好的基礎。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能夠充分自由的在經濟上經過鉅商買辦，支配着整個地主高利資本的系統，而剝削中國，在政治上經過軍閥官僚支配着整個豪紳胥吏的機器，而統治中國。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正是工農民衆，利用複雜而混亂的『中國統治同盟』內部競爭分崩的過程，起來襲擊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堡壘。『中國統治同盟』不但包含着英日法列強的帝國主義，而且包含着各派各系各地域的買辦豪紳地主階級。中國資產階級的『參加國民革命』，

原本只是要求加入統治同盟的微弱的呼聲，他既然不願意也不敢想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亦不願意並不能夠推翻封建豪紳的統治，——因為中國資產階級自己和封建地主混合生長着，不但商業資本家是如此，就是工業資本家之中也很難找着一個不兼地主的。誰要打着燈籠去找，我勸他不要枉費力罷。中國幼稚的工業資產階級，只在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初期，是可以參加的。等到革命深入的時候，不但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農民羣衆的土地革命，也立刻使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堅決反對反帝國主義革命鬥爭，而想阻止工農的行動於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範圍之內，替他做向帝國主義講價錢的賣國工具。中國工業資產階級的背叛革命，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和土地革命不共戴天的鮮血寫的證書。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革命失敗，結果是中國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根本沒有絲毫解決；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加入了「統治同盟」，可是他只是依靠封建軍閥的勢力來救自己並且救地主，而不能解決甚麼土地問題；這樣，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勢力，重新鞏固而加強，並且保存着他的社會基礎的主要成份——豪紳地主和商業資本混合生長的地方政權，軍閥制度。

於是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不但繼續存在，並且更加深。一般的說來，軍閥的完全更換青天白日旗，也正是因為國民黨完全走上軍閥的道路！從今以後，國民黨和軍閥這兩件東西，極不容易分別，表面上看來，國民黨軍閥的混戰，對於北京政府之下的軍

閥混戰，也簡直是直接的繼續。中國的現象，仍舊是農民羣衆的貧窮化，城市貧民生活的惡化，中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日益增長，而且這些現象，比以前更加加倍的厲害；中國仍舊是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局面，各區域的軍閥仍舊是互相搶奪；英日等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反而更加鞏固。美國帝國主義，最近極力的鑽進中國經濟財政的空隙，——英日帝國主義所留下的空隙；——可是，這還並沒有改變中國主要的情形，並不能使『中國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統一，解決土地問題，消滅封建殘餘』，而只是更加加緊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尤其在最初一期，特別先行爆發中國反動營壘之間的矛盾——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各派之間的矛盾，引起『殖民地上的小戰爭』。『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的小戰爭（中國的蔣桂和蔣馮戰爭）背後暗藏着日益增長的英美競爭，這種小戰爭是英美爭奪霸權的大戰的序幕』（第十次執委會全會的國際形勢及共產國際的當前任務決議案）。而中國主要的矛盾：工農和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加劇烈起來。

### 三

許多的戰爭和軍閥的統治，幾乎完全毀壞了中國的人工灌溉的一切設備，帝國主義榨取中國的原料而破壞中國茶絲等類的生產，地主的剝削日益加重，高利資本的兼併和壓榨，軍閥官僚的無限制的掠奪……引起空前的大災荒，重複的水旱蝗蟲。一般說來，

農民羣衆簡直不能實行簡單的重複生產。單就前年和去年的災荒來說，據官場消息，災區擴大到十七省，災民總數在五千萬人以上。這樣嚴重的農業危機，使農民羣衆的生活狀況極端的惡化，極廣大的貧民化。中國的反動派沒有能力阻止這種過程，沒有能力減輕農業的危機。中國豪紳地主的封建勢力仍舊處於統治的地位，他們的發展前途，正是加重封建式的剝削，即使和商業資本更多的混合生長，也不是甚麼『文明化』——不是蛻化成爲教科書上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的資產階級，而只是在變態的新形式裡，繼續實行封建的剝削。至於資產階級，在戰爭破壞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情形之下，在外國資本加強壓迫之下，他的發展趨勢，不是獨立的民族工業的形成和擴大，而是民族工業的縮小，民族工業的『非民族化』，而是更多的移轉資本到封建性的土地私產裡去，移轉到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買辦企業裡去，移轉到『政治投機』（內債）裏去，——而做包捐包稅等的勾當。資產階級並不因爲中國革命的失敗，而和封建性的土地關係更疏遠些！他和整個的封建性的剝削系統聯繫着。他在土地問題上，不能和豪紳地主有多大的原則上的不同立場。南京政府既然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盟，自然，他沒有絲毫能力解決甚麼土地問題，並且他用天下最殘酷的白色恐怖，答覆任何一種農民的解決土地問題的企圖。

固然，南京政府之下有一個胡漢民的土地委員會。可是，第一，胡漢民土地委員

會的土地法草案，沒有絲毫實行的意義，這不但不是甚麼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土地改良法案，並且比不上斯托柳賓式的地主階級的土地問題『解決法』。第二，胡漢民的土地法草案，只是表面上說『平均地權』，『按照政府所佔地價收買土地』，事實上極端明顯的，只有一個整理田稅的用意，就是把半世紀以來事實上所加的田賦（附加稅，銀兩折算，陋規等等），加以法律上的承認的企圖。這就是更加增多政府稅源的辦法。

即使馬克思列賓主義忽然完全破產，南京政府居然會統一中國，中國居然會有所謂法律，居然可以按照這草案實行收稅，那麼，這尙且不是斯托柳賓主義的實現，而只是更加使農民羣衆的破產，即使地主豪紳階級更加加重對於獨立的小農民的剝削。再則，南京政府在農民暴動的危險之下，繼續武漢政府的口頭禪，常常談『二五減租』。但是，國民黨的，『二五減租』，完全是欺騙民衆的宣傳。兩湖廣東已經屢次用政府和黨部的命令，取消『共產時代』的二五減租的決議。就是浙東幾縣所實行的二五減租，現在也已經由省政府公令取消（今年四月二十二日上海新聞報）。江蘇省並且設立專門懲辦佃農的監獄。

況且，現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和北京政府時代政權的不同，不但在於：國民黨的政權已經不是純粹官僚買辦的政權，而主要的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且這種不同，還在於：現在國民黨的政權，是經過羣衆土地革命的襲擊而勉強保持着的政權



。所以這種政權的『土地改良』宣傳，並不足證明中國資產階級真正願意或者能夠實行甚麼改良，去造成整個的一個富農的階層，使他們做國民黨政權在鄉村之中的基礎。『土地改良』的宣傳，反而證明中國鄉村的不能安靜，證明農民暴動的危險，對於國民黨政權，還不是『兒戲』的。

至於事實上，國民黨的『農民政策』是各省各縣國民黨（軍閥）政府，儘在增加無奇不有的苛捐雜稅，加重鹽稅等等……實行實際上的軍事封建式的徭役（拉夫，拉車等）。

• 至於有些省份設立所謂村莊制度，恢復保甲，實行聯保，『用新的豪紳代替舊的豪紳』。這更說不上是國民黨依據富農的政策。這是用新的力量維持舊的統治：英國保守黨和自由黨政權的變更，並沒有變更政權的階級基礎。何況，所謂保甲式的村莊制度，不是甚麼民權主義的鄉村自治，而是更週密的封建統治。如果這些可以稱為『土地改良』，那麼，這種『改良』，只是更加加重一般農民羣衆的壓迫，束縛，饑餓和死亡——加深農業的危機。

日益加深的農業危機和這種背景上日益惡化的農民羣衆的生活，不可避免的要引起農民羣衆反對地主軍閥的鬥爭。極大多數的農民，簡直是絕對沒有出路，而只有拚命的鬥爭。所以，一九二七年以來極端的白色恐怖和清鄉，不能威嚇住羣衆的劇烈鬥爭。中國國民黨和地主，能夠消滅農民的小蘇維埃共和國，能夠消滅農民的游擊隊，但

是他們不能阻止別的農民的小蘇維埃成立起來，不能阻止別的游擊隊又暴動起來。其他農民原始的暴動更是非常之多。一九二七年末更到現在：（一）農民的遊擊戰爭，仍舊陸續的發生，此起彼落的不斷爆發。——朱毛的游擊隊等，在去年六七月間在湖南江西邊界有一時期的發展。今年三四月間在江西福建湖南廣東邊境又有一次的擴大勢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報又紀載朱毛佔領好些縣份。并且滿洲的報上有許多通信，說漢口附近新發生五六千的農民軍，四川有將近有一師兵士的譁變和農民聯合……其他如地方農民抗租抗稅的鬥爭，不斷的有許多消息。（二）中國北部紅槍會大刀會小刀會許多種名目的原始農民組織，一年以來也是不斷的『騷擾』；其中的指導的往往在小的豪紳富農手裏——他們的政理想，不但是根本不提土地問題，并且用迷信宗教式的秘密結社方法，籠絡羣衆，而領導到真命天子的崇拜。固然，劫富濟貧等的原始『共產主義』的旗幟，也往往可以看見，可是，比較是佔少數。只有相當有共產黨影響的地方，這些原始農民組織，能够轉變他們的『領導者』，或者分裂起來，例如河南有些紅槍會分裂出貧農的光蛋會。此外，豪紳富農，領導羣衆走妥協的道路，去跪香請願，要求減稅的運動，也是時常可以聽見。（三）因爲饑荒特別重大的原故，甘肅回民在一年之中有兩次巨大的暴動，其中有許多回族的農民參加。最近，又有第三次暴動的消息。回民暴動的旗幟，是單純的民族主義，他的指導，雖然還在所謂『回紳』手裡，可以受反

動營壘，某些派別利用。但是回民羣衆的革命活動，的確有客觀的前提，這已經不是成問題的。

所有這些運動和鬥爭，都在極端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進行，都在中國革命第一次高潮受着打擊而低落下去的時候，接着就起來。這很明顯的證明：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革命，不能解決中國封建勢力和農民羣衆的矛盾的絲毫，中國的農業危機的激烈和深入是如何的厲害。

#### 四

封建餘孽的土地關係和軍閥制度，還是佔着統治的地位；資產階級對於土地問題，甚至不能有極不徹底的解決和改良；封建豪紳和商業資本的混合體，保持封建性的中世紀的剝削和壓迫，繼續不斷的軍閥混戰，加深農業危機，並且重復產生那種特殊的封建關係；帝國主義方面，一般都是維持鞏固封建性的軍閥統治；——所有這些，新規定了那統治着中國鄉村的現存「秩序」；這種「秩序」就是：農民的絕對沒有政治權利，極端苛刻的租田制度，而且小地主尤其苛刻，田租是日益增高，任意的極端繁重的稅捐，高利貸的盤剝非常厲害，鄉村苦力僱農的勞動條件等於地獄，軍閥的封建式的徭役，地主紳商獨佔農產原料的市場。

「這種「秩序」還統治着的場合和關係裡，這種「秩序」既然是統治着——那麼，農民

的全體都是這種「秩序」的仇敵。對着農奴制度，對着農奴主和地主，對着替地主等服務的國家——農民仍舊繼續着是一個階級，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而是農奴制度社會的階級，就是『等級性的階級』。我們鄉村之中，農奴制度社會受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排擠有多少，那麼，農民亦就有多少不成其為一個階級，而分成農村無產階級和農村資產階級（大的，中等的，小的，最小的）。農奴制度的關係還有多少保存着，農民」也就有多少還是一個階級……」（列寧集第二版第五卷第九十二三頁）。

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裡，『農民』和地主階級的對抗，顯然是在加強而劇烈，這是民權主義革命的中心任務。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提出自己的土地革命政綱，目的正在於推翻軍閥制度和豪紳地主統治的封建秩序，即便利於鄉村裡階級鬥爭的自由發展，因為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上，極複雜的土地關係，自然把一般的民權主義任務提到第一等的地位。而且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够領導那必然要到來的『總的民權主義反帝國主義的襲擊』，——我們是不能拋棄這種領導者的責任的。

所以中國革命裡無產階級的總的戰術路線，非常之明顯。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特別指明：『主要敵人是豪紳地主』，『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不可以混亂』——這都是很正確的。可是，因此說『故意加緊反對富農是不對的』，那就開始混亂的策略問題上的解釋，放開機會主義的道路。從此而『不要反對富農』，

而『聯合富農』，成爲新的口號，成爲總的策路上的方針。列寧對於民權革命裡戰術路線的說明是：『起先同着『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而革命亦就仍舊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隨後，同着貧農，同着半無產階級，同着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列寧集第一版第十五卷，第五百〇八頁）。同時，對於富農，一開始就應當有明確的關係：『這一階層沒有雇農和短工的僱用，他是不能存在的。絕無疑義的；這一階層是仇視農奴制度和地主官僚的，他能够成爲民權主義者；可是，同樣無疑義的：這一階層對於農村無產階級亦是仇視的。一切在土地問題黨綱和策略裡，蒙混和忘記這種階級仇視的企圖，都是有意的無意的拋棄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的任務是——無論甚麼時候，都不要離開階級的觀點，要組織城市和農村無產階級的密切的聯盟』（列寧集第一版第六卷，第一百十四頁）。

## 五

中國農民階層的問題，並且因爲一般的政治經濟狀況和發展趨勢，以及極端複雜的土地關係的緣故，所以更加有特殊的意義。封建餘孽占着統治的地位，再加以外國資本的壓迫，造成更大的障礙，『阻止小資本投到生產裡去，阻止小資本在農業和工業裡的週轉。』這個自然的結果，就是資本的最壞最低等的形式，商業資本和高利資本，得

着無限的傳播。少數富農，處於「氣力微小的」農民羣衆之中，而農民羣衆都半餓半飽的生活在極小的土地之上；這些富農，就不可避免的變成最壞的剝削者，放債盤剝貧農，實行冬忙還債的辦法（做工抵債）等等」。富農是最壞的剝削者，必定做高利貸的勾當……這在俄國農奴制度餘孽統治之下，也是這樣。中國的情形，只有更加厲害。

○ 中國和俄國富農的分別，却是由於中國土地關係裡租田制度的特性，土地使農民之中，極少數的人，如果能夠積聚資本，就多份的投資到土地私產裡去，並且出租田地而收受田租，變成小地主或者半地主。中國極大的戰禍災荒和農業危機的環境裡，極嚴重的軍閥封建壓迫和絕對沒有資產階級式的法律保障的條件之下，富農避開自己經營資本主義農家經濟的道路，而用封建式的租田制度實行剝削。利用僱工和新式技術的利益，比租田制度少得多，而且經常的有虧本的危險。利用租田制度，就可以把一切意中的虧耗，轉嫁到佃農身上。況且，一般農業技術的平均程度，都不利於資本主義式農家經濟的發展。所以，中國富農生長成小地主半地主的第一個條件，是租田制度。

第二個條件，就是紳士統治的制度，使富農必然的要取得地方上小紳士的地位，否則他在軍閥官僚的壓榨機器之下，就應當破產而再降落到貧困的地位。少數富農在中國條件之下，可以做得生長而成小紳士的事，正因為軍閥制度，破毀了舊時代的士大夫世族的統治，即形成了紳商混合的統治：有錢的不但有剝削的能力，並且就有壓迫的權

勢——就有和平民不同的身份。封建關係在中國有許多畸形的重復產生的過程，也正是在這種地方表現出來。

中國極大多數的富農，在高利商業資本的關係上，在農村小資本更加困難投入生產的關係上，比起俄國當初的富農來，尤其要偏重於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所謂最壞的最低等的資本形式；而且，還兼着用完全的封建地主的租佃制度的剝削方式，——這更是俄國當初的富農所沒有的情形。因此，『中國的富農——大多數是小地主，用更苛刻更殘酷的方式來剝削農民的主要羣衆』。而且小地主的或半地主的富農，往往以鄉村裏的小紳士或小胥吏的資格，和軍閥官僚的政權機關混合生長着，成爲最直接的鄉村統治機關的爪牙（包捐，包稅，保甲，村長等等機關之某種部分）。固然，資本主義關係比較發展的區域，例如江浙廣東，的確有極少數的富農，單是自己經營農場，專用雇工的方法，而不兼着出租田地。但是，這種資本主義的富農，數量非常之少，而且即使有的時候，甚至於是租種地主田地的佃農（爲生產目的而租田的），都多少和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關聯着（農業高利貸或者包捐包稅）。這種極少的資本主義富農，在一般封建關係佔着統治地位的環境之下，他們的發展前途，多份是向着半地主化的方向進行，否則，就是『墮落』下去。於是，在政治方面，他們亦必定要勾結豪紳，利用所謂『經濟之外』的力量。

因此，中國的富農，極少實行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而多份是地主封建剝削系統的代表。中國一切富農，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失敗之後，更加暴露他們但不能爲土地革命而鬥爭，並且不能成爲民權主義者，而一般的公律，只是，『青天白日主義』的信徒。

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聯盟的統治，他保持着鞏固着那軍閥的『封建地主和商業資本混合生長』的政權，擁護着封建性的土地關係。他的社會基礎，決沒有移轉到富農。紳商地主和農民羣衆的對抗，仍舊保存着主要的地位。這是沒有疑義的。列甯，『同着全體農民反對地主封建制度的公式，對於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仍舊是戰術路線的總方針，亦是沒有疑義的。可是，在俄國民權革命階段的時候，富農雖然也並不是不利用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然而主要的還是資本主義關係的代表，『能夠成爲民權主義者』，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前，和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系統，立於對抗的地位，——在這種時候，聯合全體農民的口號，尙且決不能夠解釋成聯合富農的意思。那麼，現在中國的富農，『多份是封建地主剝削系統的代表』和紳商統治的軍閥官僚機關混合生長着，——這種『聯合富農』的結論，尤其是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結論。何況中國革命暫時失敗之後，現在國民黨往往能夠利用富農來鎮壓農民運動，正是利用那種『青天白日主義』，散佈黨皇帝（國民黨軍閥）統治之下的合法主義。



總之，外國資本侵略之下，特殊的中國土地關係，紳商混合統治的軍閥制度，破產失業的喪失土地的農民非常之廣大，而工業資本的發展和生產力的增高，受着多方面的阻礙，——農村裏市場關係和貨幣關係發展，所引起的畸形的階級分化，使農民在這資本主義畸形的發展之下，有特殊的形勢，而富農也就帶着特殊的社會性質。農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式的農家經濟的發展，亦帶着畸形的狀態。同時，豪紳地主階級和商業資本的剝削階級之內各種部分的關係，以及富農對於軍閥統治的關係，都有極可注意的特點。

因此，必須在農民問題裏，注意下列的三方面：

第一、極大多數的農民羣衆，自耕農和佃農，都在紳商地主階級極苛酷殘暴的剝削和壓迫之下，都是極大規模的貧民化的材料。貧農不必說，中農的廣大羣衆，都在破產的過程之中。不論是自耕農和佃農，其中都有中農貧農等的分別，都受着地主豪紳的軍閥統治的壓榨。『農民』之中雖然分泌出極端少的成份，變成富農，大多數更是不一定變成半地主的富農，並且有許多半地主的富農，是從小地主破產貧困而『墮落』下來的；然而，這並不減弱農民和豪紳對抗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更加加強這種對抗。

中國農民羣衆和紳商地主的對抗，很明顯的表現着封建社會性的對抗。小地主，半

地主的富農，甚至資本主義的富農，在這個對抗裏，（尤其是中國最近革命過程之中，——農民羣衆平民式的摧毀封建的土地關係運動之中），事實上是站在豪紳地主階級方面的，是贊助封建式的土地關係的保存的。民權主義的力量，只是農民羣衆的全體，而決不能在富農方面，就算是資本主義富農方面去找。

第二、中國鄉村裏，破產失業的過程既然非常之劇烈，也就不但有經常出賣勞動力

的鄉村無產階級（雇農），並且有極廣大的半無產階級——自己耕田的經濟不能維持生活，而必須兼做雇工的。除農場工作之外，還有一種搬運等類的苦力。雇工的勞動條件，都是惡劣到萬分，工資是極低的。鄉村雇工的僱主，固然大多數是地主商人和官廳，可是富農的對待雇工，只會比地主豪商在計算上更加苛刻。地主官廳等的『僱用條件』，與其說是『僱用』，不如說是強迫的勞役。商人也不是例外；而高利的債主，更是強迫債戶做工還債。南方各省，這種苦力雇農之中，往往有很多農婦和兒童，跟着父親丈夫去做工，而不能領取工資。至於普通雇農之中，長工的勞動條件比較固定些，有住宿和伙食的供給，有每年或每月的工資，然也是很低的；短工的工資看各地情形不同。中農往往亦用雇農，大半都是短工。最近飢荒之中，更有以『以工代賑』的名義，驅使飢民做工，不付工資，而只發極少米糧（一日三合米，陝西）。

中國農村之中僱用勞動的使用，不是不廣泛；可是，有兩點可以注意：（一）農村資

產階級（僱主的富農）和農村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抗，固然也在增長，可是，還大半隱蔽在豪紳役使平民的總形勢裏——大多數的僱主是地主豪商，因此，勞動力市場上的僱用條件，是由他們支配着，富農的不能有幾多事實上的不同。然而「宗法社會的浪漫主義」，恰好是富農利用的工具，說甚麼「親友帮忙」等等，而剝削僱農和短工。（二）農村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大半還是模糊的，一方面是因為都是喪失土地的農民，他們的鬥爭，不能和爭土地的鬥爭分開；別方面，更因為極大多數還保存着自己耕田的小經濟，反對僱用條件上的剝削，不能明顯的感覺到。農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正要脫離「農民的共同利益」的圈套，而爭取政治上的階級獨立。無產階級應當領導農民羣衆的民權鬥爭，獨立的去發動抗稅抗捐等的鬥爭，要認清中國農村半無產階級是土地革命的大力量。同時，主要的，亦要認定封建社會性的對抗之外，還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抗，指出農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任務。當然，如果保存「不加緊反對富農」的口號，就不能有真正組織農村工人的工作，不會加緊他們的鬥爭，提高這些最落後的無產階級意識。至於否認資本主義富農的存在，否認田租高利剝削之外，還有農村中勞資鬥爭的任務，那就不用說了。

第三、中國軍閥統治之下的混戰和豪紳資產階級各派之間的競爭排擠，是如此之劇烈，形成將近二十年的割據局面，互相鬥爭的紊亂狀態。這種情形，不但影響到一般

羣衆的破產失業和生活惡化，而且還加緊每縣每區之內小豪紳地主之間的吞噬：每一縣的豪紳之中往往也分成兩三派，而經常的鬥爭着。鄉村中的小豪紳小地主以至富農，爲着保持和爭奪自己的剝削所得的份數，往往依附着某派軍閥官僚，某派大的豪紳地主反對別一派（青天白日主義）。農民羣衆反對軍閥統治的總鬥爭之中，這些富農小豪紳的『反抗』軍閥，足以造成一般羣衆的幻想，以爲他們亦是革命的，或者以爲他們的爭鬥道路（勾結軍閥，大刀紅鎗的迷信方法），是真正解放的道路。如果半地主的富農，在鬥爭轉到抗租形式的時候，比較容易暴露反動的面目（小豪紳小地主的反動面目，當然，更容易看得出），那麼，資本主義的富農對於羣衆的反動影響，就比較得更加厲害些。所以，否認這種情形，而忽視爭取農民羣衆的任務，尙且必定間接的贊助資產階級和富農，以及其他反動思想對於農民羣衆的影響，何況是聯合富農的口號！

## 六

『聯合富農』的公式，在中國鄉村裏這種階級關係之中，應當有怎樣危險的結果，是很顯明的了。民權革命裏對於農民運動的策略方針，應當服從這裏的總的戰術路線：推翻紳商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摧毀軍閥制度的秩序——實行徹底的平民式的土地革命。策略方針上，因此特別要注意對於農民裏各階層的關係：就是依據在那一階層上，可以最大限度的最徹底的實現土地革命的問題。

第一種答案，認為殖民地革命既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麼，資產階級即使不要土地革命，至少也要反對封建而要求改良農民生活；自然，富農自己，不管是不是半地主，更加要改良生活，所以至少要聯合富農。實際上，這不單是聯合富農，簡直是聯合最小的紳士的策略，這是過去所謂『鄉村聯合戰線』，以反對土豪劣紳策略的變相。

第二種答案，認為中國的特別情形，使富農都變成小地主和半地主，而且會蛻化成爲現成的斯託柳賓政策基礎，開闢改良主義的道路；至於其他一切農民，便都是一片灰色的羣衆，其中沒有階級的分化，自然會跟着無產階級來實行土地革命，不用去和富農爭取羣衆的領導權；同時，還認為革命既然還只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那麼，爲避免那可能的斯託柳賓道路實現起見，彷彿應當使半地主的富農中立，主張罰呢不沒收富農的土地。這雖然不是公開主張聯合資本主義富農而使半地主富農中立的策略，但是否認中國資本主義式富農的存在，否認富農參加客觀上革命的農民鬥爭及其對於羣衆的影響，事實上是投降富農，拋棄和他爭奪羣衆的任務，放任他領導農民運動到妥協反動的道路上去。

第三種答案，是說『國民黨政府是代表城市資產階級鄉村富農而與買辦地主妥協的政府』，所以資產階級民族革命早已完結，封建殘餘已不存在，於是整個的中國農民運

動都成了反對富農的鬥爭。這是表面上左傾的空談，實際上亦是右派的中心政綱：中國革命已經告一階段，走上了資本主義進化的道路（奧國社會民主黨鮑威爾），一切農民游擊戰爭，都成爲無益的無政府主義的胡鬧，最好是要站在『真正道地的工業無產階級』的觀點上，去專門幫助『真正道地的鄉村無產階級』，進行『純潔而真正老牌的』階級鬥爭；這是拋棄反對地主的鬥爭，投降地主，而要實行所謂『鄉村經濟主義』的策略。

所有這些機會主義的答案，實際上都是民族改良主義的影響，企圖屈服無產階級的表現。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方針，應當是：——

推翻豪紳地主階級的統治和軍閥官僚的秩序，實行土地革命的總的戰術路線之下：（一）農村鬥爭的中心任務，是要反對豪紳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反對站着這聯盟背後的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出租田地用高利貸包租包稅及壟斷農產市場等方法剝削農民羣衆的人，亦就是要反對半地主的富農和反對地主一樣；（二）實行堅決的鬥爭，去爭取對於中農羣衆的領導權，要鞏固和中農的聯盟，堅決依據在貧農的基本力量之上——發動他們反對地主軍閥以及富農的鬥爭；（三）反對一切民族改良主義（從蔣介石到譚平山）的影響，反對一切反動的混亂思想。富農，尤其是資本主義富農『參加反對軍閥和反對稅捐運動的時候，並不應當改變對於富農的總路線，而應當和他們爭取農民羣衆的領

導，不讓富農有利用羣衆以遂其私利的可能；（四）獨立的組織僱農——農村無產階級，領導他們的階級鬥爭，反對一切雇主：地主紳商以至於富農，並且特別「解釋：農村工人苦力的利益，和「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互相對立着」；同時要注意領導農村工人反對帝國主義軍閥政權的鬥爭，而且要建立他們在這種運動的領導權，尤其是直接關聯農村的土地革命裏的領導作用，——農村工人是無產階級在鄉村裏的支柱；「不要忘記：僱農是喪失土地的農民，他們是不能夠並且不應當站在全體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對一切封建制度的鬥爭之外的」。

第六次大會議決案之中，勉強分別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富農；以及分別半地主和資本主義的富農，而不是去明顯的提出豪紳地主的統治的地位，却是去定出分別對付：聯合，中立和反對的策略方針；——這都引起機會主義的解釋，例如要罰呢不沒收富農土地，以至懷疑土地國有；或者要削弱鄉村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或者看見富農參加反軍閥的鬥爭，便認爲他們的作用還要高於汪陳派第三黨一等。共產國際執委，因此指出中國第六次大會決議的模糊和含混，而加以明確的指正：「一般的公律，是中國革命失敗之後，鄉村裏的富農份子，到處公開的起來反對農民羣衆而站在反動方面」；「發動鄉村無產階級運動和團結鄉村貧農的任務，應當不顧富農怎樣，不怕富農「離開革命」的去進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口號，解釋成爲不沒收富農土地，是不對的」；總之「不

應當對富農讓步而束縛自己的積極性』，而應當和他們去爭取羣衆的領導，『使羣衆脫離資產階級和富農的影響』（國際執委論中國農民問題的信）。

## 七

中國農民運動策略的正確的指出，取消聯合富農的口號和其他機會主義的說話，精確的說明對於鄉村裏各社會階層的關係，這並不應當動搖：中國現在的革命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質的定義。『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階段上的主要任務既然沒有解決（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度沒有消滅，外國資本的統治沒有取消，軍閥制度沒有消滅，中國沒有真正統一），那麼，中國將要來到的革命高潮的最初時期，仍舊保存着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性質。同時必須指出：解放鬥爭的階段上，已經要無產階級去團結貧農而鞏固無產階級對於全體農民的領導作用，這種情形，再加上其他的情形，正應當對於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速度的速度，有良好的影響。』

這才是正確的對於農民問題與革命性質問題的正確的答案，而不是托洛斯基式的解釋。史大林同志說：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是政權問題，不能因為革命的失敗或退却，即說切合於政權問題的總的戰術路線就不對了。中國無產階級現在仍舊應當領導全體農民去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同時，絲毫不模糊農民內部的階級對抗，尤其要認清一切豪紳地主式的剝削成份，包含着半地主的富農，而且是與『農民』對立的主要



矛盾。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經過了斯托柳賓的製造資本主義富農的政策。直到歐戰期間，革命的性質仍舊還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列寧說：「整個的十年——偉大的一九〇五到十五年，——證明俄國革命有兩條階級路線，而且只有兩條階級的路線。農民的分化加強了農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驚醒了許多政治上睡着的份子，使農村的無產階級接近了城市的無產階級……然而「農民」和馬爾諾夫，羅曼諾夫，赫沃斯托夫（地主）之間的對抗，是加強了，增長了，劇烈了。這是這樣明顯的真相，就算托洛斯基在巴黎做的文章，有幾十篇，有幾千句，也『駁』不倒的。托洛斯基事實上贊助俄國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家，他們「否認」農民的作用，就是不願意推動農民起來革命」（列寧集第一版第十三卷，第二百十四頁）。

否認農民的作用而放任農民在資產階級影響之下，和否認農民的作用，而公開主張聯合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或者聯合青天白日主義的富農，都是同樣的機會主義。

## 八

現在中國繼續發展着的農民運動，大半還是政治上不覺悟的運動，可是必然是反對現存秩序的，也就是反對封建豪紳的統治的。中國共產黨任務之一，就是贊助一切革命的反對現存政治社會秩序的羣衆運動：因此，中國共產黨應當竭力去贊助一般農民自發的鬥爭，並且肅清這種農民運動裏的反動性的混合物，而顯明他的革命的民權主義的

內容，從富農小豪紳手裏，爭取這些運動的領導權，發展農民的革命意識，即引導他們的民權要求到底。根據正確的戰術路線和策略方針，黨的具體的任務，應當是：

第一，廣大的工農民衆之中宣傳：中國共產黨認爲自己的任務，是最努力的贊助農民的一切革命運動，改善農民生活狀況的一切行動，直到農民蘇維埃的創立和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官有的寺院的……土地。

第二，揭破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以及汪陳派第三黨的「改良主義」的欺騙宣傳。實行極廣大的反對軍閥混戰的有系統的宣傳運動；提出中心的宣傳性質的口號：「變軍閥戰爭爲民衆反對軍閥的階級戰爭；變各派豪紳資產階級的混戰爲工農反對豪紳資產階級的戰爭」；反對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一切和平主義的欺騙宣傳。農民之中的反帝國主義宣傳，應當要擴大，並有系統的進行，要和土地革命的宣傳聯絡起來。

組織各種各式的農民團體，如俱樂部，體育會等，名稱可以是極不一致的，主要的，是農民運動幹部的公開形式，——只要有多少的可能，便要利用多少公開的方式，目的却是一定要是有團結秘密的小組，做農民委員會的核心。贊助農民運動的一切部分要求，如反對苛捐雜稅，要求減租減稅，取消高利債務，要求發給飢民米糧，要求增加米糧，要求發給衣服等等。這些運動，都應當是羣衆的行動，而且要隨時在組織上鞏固黨的影響。

第三，對於農民，提出組織農民委員會的必要：提出改組國民黨官辦的農民協會，爲鄉村一般農民羣衆選舉的農民委員會的必要（如果有官辦的或國民黨左派的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應當是下層羣衆鬥爭的直接機關，應當從鬥爭之中，部分要求運動之中產生出來，執行反對國民黨政府軍閥和地主的鬥爭，而成爲集中羣衆革命力量的中心。真正羣衆的游擊戰爭勝利的時候，農民委員會變成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

第四，特別注意農民祕密結社的運動，必參加進去工作；在這種武裝農民之中發展黨的影響，征取羣衆而和反動領袖鬥爭；鞏固其中黨的影響，必須組織無黨農民團結在黨團的周圍，提出正確的口號和政綱，和富農小豪紳的領袖爭取運動的領導權。

第五，真正有羣衆發動的地方，爲着動搖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起見，號召農民和農村無產階級起來實行各種政治示威，同盟抗稅抗租，反對拉夫拉車，反抗政府官廳的命令，一直到組織游擊戰爭；但是，沒有羣衆直接革命鬥爭的時機，或者顯然不利的環境，就不可以組織游擊戰爭。

第六，軍閥混戰的場合合理，要發展蘇維埃區域，特別加緊兵士運動，使他和一般農民運動聯絡起來。組織並且儘可能的擴大農軍（小的工農革命軍），運用游擊戰術，避開過於大的敵軍，而襲擊反動武裝的小隊伍。

一切佈置的方針，是要有系統的造成區域政權以及一省幾省蘇維埃政權的條件——



全否認這一種分化，那更是沒有理由。主要的是要城市無產階級，能夠領導農民推翻豪紳地主的統治，能夠在將要到來的革命的新高潮裡，執行這一「總的民權主義襲擊」的領袖的責任。我們和列寧對於俄國革命一樣，而且更加有權利說：我們利用農民對於紳商地主以及帝國主義的勝利，不是去幫助富農反對農村無產階級的鬥爭，而是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往前向着社會主義革命進行。

一九二九，九，八。

### 富農的爭論

「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論到農民運動的一般問題。關於富農的特殊問題，因為仍舊有許多同志不了解，不明白，所以還可以再說明這個問題裏的爭點。

共產國際執委今年六月間論中國農民問題的信，已經充分明顯的批評「聯合富農」的錯誤策略，並且指出：任何條件之下，列寧「聯合全體農民」口號，都決定不會有聯合富農的解釋。我認為這對於中國尤其重要的原因，一是在於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的許多文件之中，曾經將「不加緊反對富農鬥爭」提成獨立的口號，而簡直認為「聯合富農」是總的策略路線；二是在於中國富農有特殊的情形和性質。

第一，中國富農有兩種：一是半地主的富農，二是資本主義的富農——農村資產階級的富農。半地主的富農有兩方面的性質，一方面中國這種富農，和俄國當時的富農同樣是最壞的資本（高利資本和商業資本）的鄉村裏的代表，而且因為外資的壓迫（中

國的半殖民地地位），這種最壞的資本方式，比較起來，更加厲害；別方面，中國這種富農，往往同時兼做地主——出租田地，而且因為租田制度和豪紳統治的制度，這種半地主，甚至小地主的富農，都成為直接統治到農民羣衆的鄉村豪紳機關的爪牙，這和俄國當時的富農，簡直有根本上的不同。這種半地主的富農，在一般富農之中占着極大多數。至於資本主義的富農——就是以僱用勞動的方法經營自己的農家經濟爲主的富農，數量是很少，『並且多少都和封建式的剝削方法關聯着』。不但如此，這種富農對於僱工的剝削，因爲一般的封建剝削佔着統治地位，所以『只會比地主豪商在計算上更加苛刻』。

因此，『中國的富農——大多數是小地主，用更殘酷更惡劣的方式去剝削中國農民的主要羣衆』。『中國的富農，更少的應用資本主義式的剝削，而多份是地主封建剝削系統的代表』。

總之，中國的半地主的富農，是兼用資本主義剝削方法和封建式的剝削方法的；中國的資本主義富農，亦和封建式的剝削方法相關聯着的（高利貸和勞役式的僱用方法）。資本主義的富農和半地主的富農的分別，只在於他不出租田地。所以如果半地主的富農，顯然的和軍閥的政權機關混合生長着，那麼，資本主義的富農，事實上也是豪紳地主經濟上政治上的附屬。

張聞天硬說我承認資本主義富農是民權主義者而半地主的富農完全是地主，我不知道他怎樣讀我的文章的。我的意思是：（一）俄國革命的初期，「聯合全體農民」的口號之下，尚且要嚴格確定對於富農資產階級的反對策略，嚴格駁斥「聯合富農」的機會主義的解釋，解釋成「聯合富農」。（二）因此，我接着說：至於中國，則更有特殊的意義……中國的富農——大多數是小地主，半地主，和軍閥政府機關混合生長着，不能是民權主義的代表。（三）就是不出租田地的富農，也與封建剝削關聯着。

第二，中國富農的革命作用問題，我認爲「照一般的公律，中國革命失敗之後，鄉村裡的富農份子到處公開的起來反對農民羣衆，而站在反動方面。」這是對於一切富農說的。

何以說「資本主義的富農」，就會等於「革命的富農」！何以這裏的「富農份子」不包括資本主義的富農！

重要的是，要注意富農在反革命裏的作用。半地主的富農，並不是不會參加客觀上革命的運動的。農民運動的大部分「由反動份子所領導……黨應當去爭取這些自發的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對軍閥稅捐的客觀上的革命運動的領導」。這些「反動份子」之中，很明顯的有小豪紳，半地主的富農，亦有資產階級的富農。何以在中國，「反動」和「資本主義的富農」，是不相容的呢！這都是張聞天同志自己的成見。（中

國大刀紅槍的事實，張聞天同志竟完全不知道！）這樣，第一個問題，是半地主的富農在客觀上革命運動之中的作用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資本主義富農在客觀上革命運動之中的作用問題。他們都是除在開公反對農民羣衆革命運動之外，又有另一種方式來破壞革命運動，就是抓住這些運動的領導的方式實現他們的反動作用。但是，半地主的富農比小豪紳的領導，更加危險，而資本主義富農的領導，對於革命比半地主的富農，又要更加危險些。

因此，我說『富農，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富農，參加反對軍閥反對稅捐運動的時候，黨並不應當改變對於富農的總路線，而應當和他們爭取農民羣衆的領導，不讓富農有利用羣衆以遂其私利的可能』。

否認現在農民自發運動之中富農的參加，和他們對於羣衆的反動影響，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可以使黨機械的分割『農民』，以爲凡是參加反軍閥運動，便都不是富農，只有不參加這些客觀上的革命運動的，方才是富農，或者，認爲這些客觀上的革命運動裏一些反動的混合物都沒有。一些反動的領導都沒有。

張聞天同志，說我注重和富農爭取羣衆領導權，就是認爲資本主義富農還是革命的。這是因爲他自己想着：既是資本主義的富農，就是革命的富農，既是參加客觀上的革命運動，就有革命的作用。第一，這種推論完全不對；第二，我不僅說和資本主



義富農爭領導權，而且說到一般富農；第三，我指出，而且特別指出：資本主義富農也是不要領導農民羣衆到妥協反動的道路上去——青天白日主義的道路。

問題應當弄清楚：（一）豪紳地主和『農民』的對抗，是主要的矛盾。（二）戰術的路線是團結貧農而鞏固對於全體農民的領導。——而且必須更詳細的解釋爲——依據貧農爲基本力量，鞏固和中農的聯盟，反對軍閥地主及富農。（三）獨立組織鄉村無產階級，實行堅決的階級鬥爭，反對一切僱主……（四）與富農爭取羣衆的領導。

中國鄉村之中，顯然有着兩種鬥爭：（一）是農民羣衆反對一切剝削壓迫的鬥爭；這一鬥爭的總形勢是軍閥地主和富農（一切富農）在一邊，農民的羣衆在一邊；（二）中國無產階級（共產黨）與資產階級，富農，小豪紳等等爭取農民羣衆之中的政治影響的鬥爭。第一種鬥爭之中，包含着農民反地主的鬥爭（兼地主的富農，不能不同樣是抗租，以至沒收土地的對象），同時還有僱工反對僱主的鬥爭（不出租田地的富農不能不是這一鬥爭的對象，亦和其他僱主一樣）。第二種鬥爭裡，共產黨對於大刀紅槍運動，對於國民黨的官辦農民協會，或者汪陳改組派的農民協會，以及實行農民委員會運動和革命的農民協會組織等問題，應當有明確的方針。這裏論到對於農民無產階級的問題，不得不特別注意富農，尤其是資本主義富農的反動影響。

張聞天說：不要分別半地主的富農和資本主義的富農。這是模糊中國農村裏僱工

和僱主的鬥爭，至少可以得到僱農運動是不重要的結論。而國際執委的信說：『要加強我們對於貧農的影響，而沒有階級上堅決的鬥爭口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這就必須要領導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和鄉村貧農反對地主富農的壓迫和剝削』。此其一。張聞天要說：反對地主和反對半地主是不一樣的。這又是奇怪的理論。佃農方面，怎樣可以分別對付地主與半地主呢？債戶方面怎麼分別對付地主和富農呢？此其二。

總之，現在的路線是應當反對一切富農的，勉強分別對付小地主與富農的辦法，或者分別對付半地主與資本主義富農的辦法，都是機會主義；尤其是否認資本主義富農的存在，而忘却鄉村無產階級的特殊階級任務，——那更是機會主義。

再者，張聞天同志說：『不要反對富農的領導，而與之爭奪羣衆，因為『說富農參加客觀上革命的運動，就是說他還有革命作用』，『特別說要和資本主義富農爭取領導，就是承認資本主義富農還是革命的』。請問，如果說左派社會民主黨尤其危險，並且認清社會民主黨在羣衆之中還有影響，這就是承認他們有革命作用麼？如果說，應當和社會民主黨（社會法西斯黨——左派亦在其內）爭取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是否就是說社會民主黨還是革命的麼？從爭取羣衆的觀點上來看，自然，在中國農民羣衆之中要特別提出反對富農，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富農。如果張聞天同志認地主資產階級和富農對於羣衆的影響是同等的，用不着分辨，用不着提及反對富農領導而與之爭奪羣衆的問

題，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彷彿認爲現在沒有資本主義富農參加運動的事實，而且如果有這種事實，聯合富農便是正當的了，用不着反對他們反動影響的了。

第三，豪紳與農民的對抗和資本主義分化的問題。張聞天說，我說有兩種分化：一是「封建制度的分化」，二是「資本主義的分化」。這簡單是張聞天自己的幻想。我分明寫着「對抗」，他說是「分化」。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封建制度的對抗（豪紳與農民）處於統治的地位。而中國的特殊情形，使大多數富農（小地主及半地主的富農）和農民羣衆之間的矛盾，帶着地主和佃農之間的矛盾性質，同時也會有胥吏和百姓之間的矛盾性質。半地主的富農當然不就等於地主，這和勞工貴族不就等於資產階級一樣。但是，中國的富農在經濟上多份是封建剝削的代表，在政治上有時做軍閥機關的爪牙，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並不因爲富農自己兼管農業而能和地主有原則上的對抗。別一方面，資本主義富農與僱農之間的矛盾，則已經帶着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抗性質。只是豪紳地主軍閥和農民羣衆的主要對抗，籠罩着這種發展不大清楚的資本主義對抗，而且這種富農，對於地主不能用資本主義去對抗，對於僱農，却比地主有更大的剝削，張聞天否認這兩種對抗的並存和關係，以及在中國的特殊意義，這是很大的錯誤。

共產黨的任務，是一面要認清富農的大多數是封建剝削系統的代表，是和軍閥地主統治混合生長着的，在這種意義上他們是豪紳地主階級的「組成部分」（這個字眼亦許

是不科學的，然而對於我並不重要）；一面要認清鄉村無產階級和一切僱主對抗，就是除半地主富農之外，農民之中仍舊有階級分化，而且僱農有在一般農民羣衆之外的社會主義利益。所以城市無產階級要和農村無產階級密切聯合不離開階級的觀點而領導一般農民羣衆實行民權革命到底，而進到社會主義的革命。



#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續)

立三

## 三 中國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

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中國資本的發展，還是極幼稚的，只有商業資本獨立優勢的發展，和高利貸資本的活躍。這都是資本主義前期的資本活動的形態，他是與封建剝削互相勾結着來壓榨農民，生長起來（取消派認為以前中國的錢莊就是銀行資本的性質，這是毫無常識的話，錢莊只是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流通作用，與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銀行資本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當時只存在一種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大批的商品運到中國來了，利用洋貨在市場佔着統治地位的時候，商業資本成了洋行的附庸（即是成了帝國主義工業資本的附庸）。不只是城市的大商資本大半買辦化，而且鄉村中極小商業資本，都兼有買辦的作用（買賣洋貨，收集原料），商業資產階級，大部份變成了買辦階級。後來尤其是歐戰期間，洋貨不能運到中國來，市場的需要，促進了本國工業的發展，工業資本，漸次擴大，長成了民族資產階級。再有第三種，因商業與工業資本的發展而促進了信用制度的發展，這就長成了銀行資產階級。

中國商業資本，因為歷史上長期的發展，與封建剝削發生不可分離的關連；尤其是

因爲中國土地的自由買賣已有長期的存在，於是商業資產階級多兼是鄉村中的地主，兼有對農民的封建剝削，這就已經使商業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要站在反動的方面，擁護封建剝削制度。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商業資產階級大半買辦化，變成了買辦階級，於是他的利益與帝國主義的利益混合起來，於是在民族解放的鬥爭中，他也常常站在反動的方面。所以商業買辦階級，是資產階級最反動的一翼，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開始爆發的時候，他就與封建大地主階級聯合起來反對革命；如廣州商團事變和西山會議派的組成，主要都是這一階級與地主聯合的政治作用。『在歐洲近世史上，商業資產階級和商業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動的，他們和土地貴族，及財政貴族聯合起來，反抗產業資本』（通俗資本論）；在中國因爲加上了買辦化的作用，表現得更加明顯。

中國銀行資本，起初雖然是因爲工商業資本發展的需要而長成，後來因爲種種原因，漸次離開了本來的主要的作用，而變成一種政治投機的資本；替政府發行公債，買賣公債票，經理短期政治借款等。他們與政府發生密切的關連，而且任何一派的政府都必須取得他們的贊助，否則在財政上便要感受極大的困難。過去北京政府，固然常常受他們的影響（他們因爲買賣公債的投機，常常故意製造政潮），現在的南京政府也還是部份的倚靠着他們。投資到銀行資本中去的，主要是一般貴族，官僚，和買辦，他

們在經濟上與封建的剝削不只是沒有矛盾，而且有密切的關連；另一方面，中國銀行雖然常常受着外國銀行的壓迫，然而因為資本弱小，常常要依附到外國銀行之下，假如外國銀行斷絕他的資本流通的關係，簡直無法周轉。所以銀行資產階級也是和商業買辦階級一樣，一開始就是站在反對革命方面的。

中國民族工業，起初發生的時候，主要還是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如交通工業製造原料的工業）；直到歐戰期間，帝國主義的商品不能運到中國來，市場的需要促進工業的發展，於是許多買辦、官僚、地主、商業資本家，以及一般小資產階級都競起投資到工業方面來；所以紡織，麵粉……等輕工業，都有很快的發展，而形成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民族工業相當的發展以後，在市場上與帝國主義的商品發生激烈的競爭，同時也就感覺到帝國主義的侵掠，各種經濟政治特權的壟斷——如在關稅上，原料上，交通上，金融上，都是對於他的莫大的壓迫。歐戰後前兩年，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尙未能完全恢復對中國的貿易，因此當時民族工業最大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抵制日貨，提倡國貨」，成爲當時一般的呼聲，因此促起了有名的五四運動。過後英帝國主義恢復了對中國的貿易，擴大在中國的市場，美帝國主義以及其他各帝國主義的商品，也都積極的侵入到中國市場，遂使中國民族工業受到莫大的打擊，許多工廠都關門倒閉，興奮一時的工業運動，又因此停滯衰敗下來。這時的工業運動，不只是



在大城市中，建設了許多本國近代式的工廠，而且在閉塞的小城市以至鄉村，都發生了很多的手工工廠；後來衰敗的過程，固然許多大工業失敗了，尤其是這些新起的小工業破產得更快。民族資產階級當然感覺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利害，成爲他的發展上莫大的敵人。同時民族工業相當的發展以後，當然也馬上感覺到封建制度對他的束縛，如軍閥割據，釐金，捐稅，幣制與度量衡的不統一等，也就要打破這樣的封建束縛。所以五四運動，不只是表現着激烈反帝運動，而且反對一切封建制度和思想，特別是軍閥。

當時工人階級，在數量上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還祇是一種「自在的階級」，還沒有明確的階級的「自覺」；廣大的農民羣衆，更是束縛在封建壓迫之下，雖然也表現着反抗的鬥爭，但還是極原始，極零亂的。雖然民族資產階級知道了俄國革命的教訓，知道工人階級的興起，是他們生死的敵人；雖然他們也同樣的兼有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剝削，農民的興起會要求掃盡一切封建剝削，而直接妨害到他們的利益；可是他們感覺到當前的，壓迫最利害的敵人，還是帝國主義，與做帝國主義工具的封建軍閥；這就使他要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運動的發展，在客觀上就要驚醒着工人階級和農民起來鬥爭，同時他們——民族資產階級爲着增加反帝與反軍閥的力量起見，也就企圖利用工人農民的力量。這就是在大革命的初期，民族資產階級其所以參加革命，表現着相當的革命作用的原因。所以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初期的參加

革命，是因爲工人階級的鬥爭與農民運動尙未強大起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又非常利害；到了工農運動一天一天的發展，他便要極力束縛，使工農鬥爭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致超越他的階級的利益。到了工農鬥爭高漲起來，要求澈底的驅逐帝國主義，澈底的肅清封建勢力，以致自動起來收回租界，分配土地，監督生產的時候，這就極明顯的，革命的發展，已經在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之下，不復是他可以控制的了。這時候他便感覺到當前最危險，最嚴重，最利害的敵人，已經不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而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自然要馬上叛變革命投降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聯合一致的來壓迫革命，這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主要原因。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充分表現着他的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特性：尙未完全脫離買辦，地主，貴族，官僚的母體，還兼有半封建半買辦的剝削，這就規定他不能有革命的政綱；而只能有一個改良主義的政綱，起初採用革命的手段，只因這一改良主義的政綱，不能得到帝國主義與封建絲毫的容納。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力量，因爲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工業，更超過他的力量以上，尤其是蘇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影響，階級解放的自覺更堅決起來；同時，農民的特別窮困和痛苦，也就不是些少的改良所可滿足，一走上鬥爭的道路，便要求澈底的土地革命，而成爲無產階級天然的同盟軍，所以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極難控制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逼使他在未能得到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欽賜的讓步以前，便要叛變革命來鎮壓工農

。在他叛變革命以後，便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壓迫工農的同盟者，雖然他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仍然是有衝突，仍然企圖以改良主義的方法來取得資本主義的發展，可是永遠不能——而且不願採取革命的手段了。這就是他看着工農比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還可怕，澈底革命的勝利——澈底肅清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就是直接損害他的利益。

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的改良主義，主要是在消滅工農的革命鬥爭，尤其在客觀上只有消滅工農革命的作用自然是毫無疑問的。可是他之所以在工農羣衆中發生影響，却正因為他在表面上還在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要求些少的讓步，才能使工農羣衆發生幻想，才加重了我們與改良主義堅決鬥爭的任務。事實極明顯的，假如蔣介石連表面上要求關稅自主，取消領判權，修改條約等的假猩猩的欺騙都沒有，而只是一些濟案，寧案，航空，海軍等條約，那麼儘管他們在羣衆中極力宣傳，決難起絲毫的影響的。

中國沒有改良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說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是極明顯的事實。帝國主義生產的發展和市場的枯竭，已是成爲極嚴重的危機，這就使帝國主義無法對殖民地作些少的讓步。有人以爲中國資產階級可在美帝國主義金元幫助之下來發展中國工業，這始終只能成爲資產階級與取消主義者的幻想。首先英日帝國主義決不能絲毫放鬆中國的市場，就假令美帝國主義完全採取以財政資本經過中國資產階級來掠奪中國工農的政策，而且不顧一切的積極進行，但遇到英日的矛盾，不止要受到嚴重的阻礙，

而且很快就要挑起世界大戰。（有人以爲英美可以妥協，美讓英獨霸歐洲，英讓美獨佔中國，這真是莫大的笑話，帝國主義這樣根本不可調和的矛盾，可以在麥克唐納爾與胡佛樽酒笑談之中容易解決，那麼馬克斯的資本論與列寧的帝國主義都只有付之一炬的價值了，而資本主義的世界可以萬歲萬萬歲了，這樣意見的結果必然走到與取消主義一致去）。何況美帝國主義也是不差上下的決不願意讓中國資本主義化，不必多從理論上來說明，祇要看一下現在的南美和呂宋，已經成爲美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統治的地方，何常有大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美帝國主義只是企圖把已有工業控制在他的財政資本統治之下，而繼續的發展，只能在適合美帝國主義的利益範圍以內；（譬如中國是美國有希望的麵粉市場，決不會讓中國的麵粉工業發展），那就這樣的發展將是與現在東三省一樣走上純粹殖民地的道路。並且現在封建勢力不只是依然存在，而且更在極力加緊封建的剝削。如果不將帝國主義驅逐，沒有澈底的土地革命，是無法推翻中國軍閥制度的；中國中小地主佔着優勢的地主階級，些少的改良都無可接受；資產階級想以經濟的侵蝕，漸次克服封建勢力，這是無法做到的。這些條件規定着中國的改良主義決沒有實現的可能，也就是決定了中國終不能有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過正因爲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無法取得絲毫的讓步，於是有時候在會議上，外交上，演講上，還表現着好像在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鬥爭一樣，才更加重了改良主義在工農羣衆中的欺騙的

作用。自然資產階級改良的要求，因為他害怕羣衆比帝國主義還更利害的原故，必然要很快的一步一步的出賣民族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我們不清這些客觀的事實，到羣衆中去指出改良主義的不可能與他的反革命的作用，指出資產階級只有更利害的一步一步的投降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反而高喊着「帝國主義讓步了，封建勢力沒有了」，這不只是不能揭破資產階級的改良欺騙而且是極明顯幫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宣傳，客觀上更是隨着資產階級一塊做帝國主義的奴僕！

小資產階級是一種中間階級，即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過渡階級。他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向兩極分化；一部份漸次發展成爲資產階級，大部份破產失業成爲無產階級。因此小資產階級中有許多的階層，他的上一階層，如手工工廠主，小商人，富農，店東等，他雖然也有時受到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他們在剝削的關係上完全是與資產階級一樣，完全要靠剝削僱傭勞動者來生存發展，所以他是接近於資產階級；他的下一階層，如獨立勞動者，手工業者，苦力等，他們雖然佔有生產工具，可是完全靠自己的勞動而生活，不是利用生產工具來剝削人的，並且他們常常受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和賤視，所以他們很接近於無產階級。

中國上層的小資產階級，不只是有資本的剝削，而且多數兼有封建的剝削，常是鄉村的小地主，其中小商人的部份，也常與買辦資本發生關係；所以這一階層，在政治的

主張上，在對革命的態度上，更易爲接近資產階級，而成爲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最好的助手。過去革命的歷史，代表資產階級的南京派叛變革命以後，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武漢派也馬上動搖，並且很快的反革命，便是很好的例證。下層的小資產階級因爲受到軍閥，地主，資產階級殘酷的壓迫與剝削，尤其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快的破產失業而墮落到無產階級的行伍，所以也就更易爲接近於無產階級。不只是城市的小資產階級是如是，而且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羣衆（整個的農民都是小資產階級）也是一樣；上層富裕份子（富農）更易爲接近豪紳地主與資產階級，而下層的貧苦農民，很易爲接近鄉村的與城市的無產階級。至於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是更必然要反映着客觀的階級分化而分化，一般教授，員司，工程師，……等，都是倚靠着資產階級的豢養，享受着優裕的生活，必然成爲資產階級有力的工具；而大多數的青年學生羣衆，他們還處在一種被壓迫地位，一切思想，言論，集會，結社，都沒有絲毫的自由，也就可以接受無產階級的思想走向革命的方面來。尤其是現在階級鬥爭這樣的尖銳，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和下層，更必然發生極明顯的分野，反革命的必然跟隨資產階級的思想跑，而與資產階級混合起來；革命的只有擁護無產階級的思想，兩者之間，決難發生一個中立的思想，尤其不能發生一個甚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這就是改組派與第三黨，只有一天一天與資產階級混合起來，決難保持着他的獨立的政綱；從此也就可

以斷定現在的取消派，既然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他的前途，必然要一天一天的轉向反革命的方面去。所以這些上層的小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散播改良主義的有力的工具，資產階級經過他們把改良主義的思想傳播到工農羣衆中來，以和緩羣衆的革命鬥爭。有時候在與帝國主義軍閥的衝突的時候，這一上層的小資產階級，似乎表現着很激烈；可是假如這一運動，已經波動了工農羣衆，必然馬上與資產階級聯合一致來實行對工農的欺騙和壓迫。總之在武漢政府反革命以後，中國再不能發生甚麼代表小資產階級獨立的政黨了。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商業買辦階級和銀行資產階級，他們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幾乎完全混合着，所以一開始就站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方面來反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雖然在他的經濟的發展方向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不可調和的衝突，可是他們尙未完全脫離封建與買辦母體，仍然兼有多少封建剝削的利益，所以只能有一個改良主義的政綱，尤其是他們懼怕工農的徹底的革命，也就一樣的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聯合起來壓迫農工，反對革命。於是在壓迫工農革命的一致上建立了現在的買辦地主資產階級聯合的南京政府。可是正因為他們在對付工農，壓迫革命的主要政綱上雖然一致，而他們內部——主要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仍然有他的矛盾存在，因而在一切政治的設施上還表現着相互的衝突，再加以軍閥制

度的存在，特別是各個帝國主義互相爭奪中國統治的促使，遂不斷的爆發軍閥戰爭，而使南京政府始終無法穩定起來。

取消派因為認帝國主義已經讓步，封建勢力已不存在，於是否認「軍閥戰爭是帝國主義互相搶奪中國，軍閥搶奪地盤，以及反映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所造成」；而認為是「各派資產階級相互衝突的最高表演。」「一方面是在北方以閻錫山為中心的馮玉祥段祺瑞，張宗昌，張學良，安福系等代表官僚買辦銀行及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勢力，在南方是以改組派為中心的張發奎，俞作柏，方振武等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另一方面是代表南方買辦銀行大工業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雖是彰述之要說，是「奇形混沌的中國」，銀行與銀行，大工業與大工業，竟這樣利益衝突，有如「深仇宿恨」一般的互相廝殺起來！其實中國倒沒有這樣的「奇形混沌」，不過表現着他們思想的「奇形混沌」罷了！

中國資產階級的內部的確是有很多的衝突：第一是民族工業資產階級與商業買辦階級的衝突，（譬如湖南改釐金為特稅，加倍徵收舶來品的稅額，於是發生長沙商人的罷市反抗）然而這一衝突實際的內容，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衝突，商業買辦階級不過站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一方面罷了！第二親日，親英，親美的各個買辦階級的衝突（在政治上表現着更加明顯），然而這一衝突的實際內容，是由於各



派帝國主義互相搶奪中國的衝突，各派買辦不過站在自己的主人——帝國主義方面罷了。第三是地方幫口的衝突如寧波幫擁護蔣介石與廣東幫擁護李濟琛，然而這主要是兩個地方的封建勢力，封建軍閥的衝突，不過這兩幫的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脫離封建的母體，所以各自站到本地方的封建勢力的方面罷了，並且這樣的衝突表現在商業買辦階級的裏面比較多，而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內部是表現得比較少，這是因為商業買辦階級與封建的剝削是互相勾結混合生長着的原因。第四是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衝突，這確是純粹資本利益的衝突，然而這樣的衝突，除在革命時期，小資產階級有時候聯合無產階級一塊來反對大資產階級外，決沒有因這樣的衝突而發生國內戰爭的。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輕工業和重工業，工業資本和農業資本，財政資本的衝突，現在中國簡直微弱得很，很少發生政治上的影響。總之中國如果不是帝國主義佔着經濟，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不是封建剝削關係還在全國佔着優勢，不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各派互相的爭奪起來，那麼不只是無從爆發軍閥戰爭，而且資產階級內部也就不能發生這樣的衝突；資產階級內部還發生買辦性，地方性的衝突，正是證明各個帝國主義是搶奪中國的統治，與封建剝削關係還在全國佔着優勢。在一個國家內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都有互相依靠的密切聯繫，雖然在各種性質的工業和各種形態的資本之間，有利益的衝突，然而決不能超過他們互相依靠的聯繫，所以可以發生各種不同的政治派別，而絕少發生國內

戰爭的可能。尤其在同一性質的工業和同一性質的資本當中，雖然在市場上也常常發生厲害的競爭，到了這樣的競爭發展到互相不能兼併的時候，便馬上會採用托拉斯的方法來解決相互之間的競爭，在全部產業發展的歷史上找不出一國內的資產階級因競爭市場而發生國內戰爭的。現在中國的民族工業尤為明顯，他一進到市場上便遇到了外貨的競爭，幾乎看不見本國工業的互相競爭；因此他們只有團結他們微弱的力量，如紗廠聯合會，絲業公所等）來與外貨對抗（當然主要是對付工人階級），甚麼「中國資產階級……有互相犧牲別省別縣的資產階級，各求自己的發展」（陳獨秀，彭述之），這只是毫無經濟學常識的『童話』。思想的『奇形混沌』竟到這樣地步！尤其最可笑的，為證實一國內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可以發生國內戰爭，於是引出『美國南北戰爭，日本西南戰爭』（陳獨秀）來做例證，這不只是表現着他們不懂馬克斯主義，而且沒有歷史的常識。美國南北戰爭是由於獨立戰爭以後，北美的資本主義特別發展，而南方農業仍建立在奴隸勞動（黑奴）之上，於是兩個經濟制度，就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衝突日益尖銳，無可調和而爆發國內戰爭。日本的西南戰爭是由於明治維新以後，近代工業發展很快。而西南的封建藩屬仍然存在，這就障礙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要求全國的統一，肅清封建制度，因此爆發西南戰爭。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在他的資本主義尚未成熟的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國內戰爭，除開其他特種的原因外（如墨西哥國內戰爭因

美帝國主義的關係，中國軍閥戰爭因英日美的衝突所促成）必然要反映資產階級與封建殘餘的矛盾。這是歷史上找不出例外的。

現在中國軍閥戰爭，因為中國經濟組織的基礎異常複雜，決不簡單的由某一個原因，而是由各個複雜的矛盾所促成。第一，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佔着中國經濟政治的統治地位，同時又不是那一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是許多帝國主義——主要是英日美，正在互相爭奪中國的統治。每個帝國主義都在中國佔有經濟和政治的勢力範圍（如日本的在滿洲和北方，英國的在兩廣和南方），一方面扶持着本區域的中國軍閥（任何一個軍閥佔領着這一區域的時候，也必須與這一帝國主義相勾結。）來做他的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並幫助這一軍閥來搶奪中央政權。因為那一個帝國主義佔着中央政府的指導權的時候，他可以藉此取得更多的利益，更便利的發展。如果這一原來扶持的軍閥在搶奪中央政權的過程中失敗了，戰勝的軍閥決不敢損害絲毫帝國主義的利益，因此他又可以扶持在這一區域新起的軍閥，來和中央政權對抗，這樣就造成中國不斷的軍閥戰爭。歐戰以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主要是英日的對抗，因此這時候的吳（佩孚）段（祺瑞）戰爭，張（作霖）吳（佩孚）戰爭……都極明顯的表現着英日帝國主義的指揮作用。歐戰以後，美帝國主義勢力漸次侵入，可是他在中國並沒有固有的勢力範圍，因此他要繼續發展，必須打破英日壟斷的局面。「門戶開放」，「機

會均等」，便是美帝國主義的主要的口號。恰好在這時候，中國民族工業有相當的發展，也就反對着英日帝國主義的特權，而要求中國的自由發展。於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成爲美帝國主義的最好工具；美帝國主義，遂在贊助中國自由獨立的好聽的名詞之下來進行他的侵掠的政策（這是任何一個帝國主義搶奪別一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時候都必然採取的巧妙奸滑的手段）。從華盛頓會議以後，表面上都是採取援助中國資產階級的傾向；利用資產階級的宣傳來掩蓋他的侵掠行爲，以欺騙廣大的中國羣衆。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也隨着并進；到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美帝國主義的影響，幾乎超越英日之上，而且在經濟的地位上也是繼續增高的（譬如對中國的貿易，英日帝國主義固然也是日益增加的，而增加速度的比例，却遠不及美國）。在這樣的過程中，於是由英日對抗的局面，進而爲英日美三角衝突的局面；而且美國的發展，必然要侵犯英日固有的特權，因此英日在保持固有的利益上，日益接近起來，必然要由三角衝突轉變到英日聯合對抗美國的局面；現在正在這一轉變的過程當中。（認爲現在英美聯合反日的觀點，不只是沒有看清國際形勢的主要矛盾，而且沒有看清中國的形勢。）所以現在的軍閥戰爭是極明白表現着這樣的矛盾，就是英帝國主義勾結的新舊桂系和廣東的陳濟棠，日本帝國主義扶殖的閻張，與美帝國主義勾結的蔣系三角衝突的形勢，而且有南北軍閥聯合反對蔣介石的形勢。自然蔣

介石因爲佔着中央政府的名義，必須對各個帝國主義都獻好意，決不敢損害那一個帝國主義的利益；然而在帝國主義矛盾這樣日益尖銳的時候，也就不能不比較倚靠一方面（認識了這樣的形勢，就可以瞭解蔣介石兩年的賣國外交政策）。正因爲蔣介石雖然不敢得罪英日，但的確比較偏向美國；這樣就引起英日帝國主義的醋意（不只是醋意，而且是實際利害的衝突），而要幫助自己勢力範圍內的軍閥與蔣介石對抗，並進一步的搶奪中央政權。當然英日帝國主義在自己扶植的軍閥尙未取得中央政權的時候，決不會放棄搶奪南京政府的領導；而且要藉這一軍閥對抗的形勢，以挾持中央政府，以取得更多的利益。日本帝國主義在這次軍閥戰爭，運用這樣的政策異常巧妙而且異常明白；他一方面極力促起閻馮張反蔣，並企圖恢復北京政府，以取得中央政權的壟斷，另一方面又藉此要挾蔣介石取得「取消排日運動」與南京不干涉中東路的解決等。這樣的現象，在一般短視的人們看起來似乎是五花八門莫名其妙，而不知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巧妙。總之，因爲帝國主義這樣的矛盾，任何一個軍閥，也無法統一中國；並且任何一個名義的中央政府，也無法有短期的安定，誰認爲「這次軍閥戰爭，蔣介石得到了勝利，將要開展中國穩定的局面」，誰便是在根本上對於這一總的形勢，有極端錯誤的估量。

中國的統一，只有工農革命澈底驅逐帝國主義的勝利，如果有反革命的統一，便是已經爆發了世界大戰，而且此一方壓倒彼一方的時候。這是決不會有的前途，因爲假如爆

發了世界大戰，整個的世界，是將要改變顏色，在中國必然仍是革命的勝利。所以在工農革命沒有取得勝利的時候，必然始終是這樣軍閥割據與混亂的中國，而且要日益尖銳，複雜，嚴重起來。這不只是在中國是這樣，而且在過去的歷史，任何一個弱小民族，如果還沒有確定為那一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是兩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在互相爭奪的時候，那麼國內的戰爭，必然主要是由於這些帝國主義的指使。譬如朝鮮在尚未確定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尚在中日兩國互相爭奪的時候，他的國內戰爭，便是親日派與親華派的戰爭。取消派完全否認這樣的實際，他說：『如果中國戰爭，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戰爭，那麼蔣介石打敗了桂系，就是在中國推翻了英帝國主義的勢力；蔣介石二次北伐成功，就是打倒了日本，豈非滑稽之至！』這樣的話真是一種『童騃氣』，難道帝國主義的矛盾促起中國軍閥戰爭，與帝國主義直接戰爭，不是有天壤之別嗎？難道反證出了不是帝國主義的直接戰爭，就夠證出不是帝國主義促起中國軍閥戰爭嗎？難道蔣介石打勝了英日帝國主義挾持的軍閥，就敢直接侵犯英日帝國主義的利益，不怕比這中國軍閥更鋒利千百倍的英日帝國主義的槍砲嗎？難道蔣介石沒有侵犯到英日帝國主義直接的利益，就夠證明這些軍閥不是英日帝國主義的工具嗎？『如果真是童騃，倒也罷了，他却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語）第二，現在中國封建的剝削關係，並未肅清，而且尚在全國佔着優勢，加以帝國主義的侵掠，手工業與經濟都漸次破

產、發生廣大的失業羣衆，這就造成了軍閥制度的基礎，再加以帝國主義的扶殖，於是軍閥制度遂日益壯大起來（這在前面已經有了詳細說明）。軍閥制度的本身本含有極殘酷的戰爭根性——決不能解作是軍閥個人好戰。軍閥佔據一塊地盤以後，爲着鎮壓農民的反抗，防禦別個軍閥的侵掠，必須擴充軍隊；軍隊擴充了，軍餉困難，財政沒有辦法，便要極力企圖擴大地盤；地盤增加了，軍隊又要擴充，軍餉又覺着困難，又要擴大地盤。每個大小軍閥都是如是，軍隊的增加不會停止，地盤的爭奪也就延綿不斷，這就造成了不斷的軍閥戰爭。同時這也就暴露出軍閥制度必然不可避免的要漸次崩潰，不只是每個軍閥都要殘酷的壓榨廣大工農羣衆而必然要掀起廣大工農羣衆的革命，而且因爲軍隊增加而軍餉日益困難的矛盾，要使廣大兵士羣衆生活日益痛苦，必然要積極起來反抗；尤其是因爲工農革命勢力的影響，更加要增長兵士羣衆的覺悟，最近兵士譁變與投到紅軍和游擊隊區域的日益增多，便是這樣的原因。因此在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無疑問的兵士譁變將要更加洶湧起來，與工農革命匯合，而根本消滅軍閥制度。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消滅軍閥制度，消滅軍閥戰爭。軍閥戰爭的第三個原因，便是反映着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各派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封建的生產方法，始終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雖然因爲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脫離買辦與封建的母體，因此不能而且不願根本消滅封建勢力，可是他爲着自己發展的前途，仍然要爲他改良政綱而奮鬥

，仍然要求漸次免除封建軍閥的剝削——如厘金制度，與苛捐雜稅等；這樣的矛盾自然要反映到政治上來。特別是經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後，封建基礎更加動搖，資產階級政治影響更加擴大，使一些軍閥企圖得到比較廣大的社會基礎，而傾向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同時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還沒有統治全國的力量，也企圖利用軍閥制度來做他的搶奪全國政權與實行改良政綱的工具，所以在軍閥戰爭中就常常表現着資產階級的口號。在過去蔣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和蔣桂戰爭的時候，的確在雙方的政治口號和社會勢力的基礎上都是比較明顯的反映出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矛盾。就在這樣的時期，蔣介石已經佔據很大的地盤，南京政府名義上已經成爲全國政府，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挾持，沒有可能實行，而且自然的日益買辦封建化。這樣在資產階級中便開始發生了對蔣介石的不滿，特別是改組派的改良宣傳擴大，部份的資產階級便走到改組派的旗幟之下。所以在此次軍閥戰爭，雙方結合的勢力都表現出是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集團。主要的原因自然是要由於帝國主義相互的矛盾，和封建買辦勢力的相互的衝突，而資產階級尚未完全脫離封建買辦的母體，也就各自與接近的封建買辦的各派互相勾結着，而造成現在這樣『混戰』的局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資產階級，仍然是不會完全放棄他的改良的要求，而且要企圖利用自己所擁戴的軍閥來實行這樣改良的要求，互相認爲對方的軍閥是實現這樣改良要求的障礙，也就促成了軍閥不斷的戰爭。



所以在這樣複雜關係中仍然是多少反映着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

因為帝國主義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掌握着一切經濟政治的最高權，任何一個軍閥，任何一個反革命的社會階級，都只能仰帝國主義的鼻息，都不能超越帝國主義的意志，所以帝國主義相互的爭奪是造成中國軍閥戰爭的最主要的動力。同時軍閥互相搶奪地盤和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仍然有他的相當的作用。並且這個矛盾是互相連鎖着而不可分離；如果把帝國主義與軍閥都丟開不管，而認這樣的戰爭是「階級對抗階級」，這是莫大的錯誤。因為如果不是帝國主義統治着中國，如果中國不是半殖民地經濟，整個的社會關係，一點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的情形，自然無從發生像現在這樣的軍閥戰爭。所以這樣的軍閥戰爭，最主要是表現各個帝國主義相互的矛盾，只是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的豪紳買辦資產階級，互相搶奪中國統治，搶奪剝削工農勞苦羣衆血肉的戰爭，任何一方面的勝利，不只是廣大工農勞苦羣衆仍然是一樣的受殘酷的壓榨，而且整個中國仍然是要繼續殖民地化的惡運，一絲一毫革命的或進步的意義也沒有。所以共產黨的任務是對這樣的戰爭，採取失敗主義的路線，號召廣大工農勞苦羣衆起來反對軍閥戰爭，以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完成中國的獨立自由，與工農勞苦羣衆的徹底解放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這樣的爭奪，在客觀上也必然是誰也不能統一，誰也不能消滅誰，最後走到雙方俱倒，工農勞苦羣衆革命鬥爭得到完全的勝利，我

們的努力就是要促進這一勝利更快的到來。

(未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四五期

合刊

## 目錄

正在成熟的世界經濟危機羣衆失業與罷工行動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擴大會議的決議——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

論國民黨改組派

走向革命高潮前的形勢

一九二九年五一以來的工人鬥爭

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

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續)

立三  
秋白  
項英  
問友  
紹玉  
秋白  
立三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出版——定價大洋一角

列 甯 青 年

第二卷 第十二期 (即第三十六期)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出版

五一特刊目次

中國共產青年團五一宣言

今年的五一

怎樣紀念今年的五一？

血紅的五月

五一與青年工人

暴風雨的前夜

紀念五一與擁護蘇聯

擁護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在五一鬥爭中打倒改組派取消派黃色工會

衝破資產階級的欺騙與壓迫

五一歌

鐵鎚

徐 白

振 鵬

季 冰

均 鶴

莎 菲

維 克

徐 白

維 克

徐 白

莎 菲

每冊定價大洋五分

# 中國文化史

顧康伯編

1928

#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六期

## 目錄

反抗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

問友

一九三〇年全中國五一運動的總結

曉野

蘇聯集體農業運動近況

楊新松

蘇聯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代

之華

四川革命形勢的開展及其發展的前途

覓陽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出版——定價大洋一角

# 反對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

問友

——駁斥托洛斯基之早已破產的所謂「不斷革命論」——

## 一 引言

托洛斯基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君士坦丁堡發表了一篇「什麼是「不斷革命論」？」的大綱，這個大綱登載於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機關報「我們的話」第十七期上，直到今年五月我們纔看見。

在這個大綱中，托洛斯基將他之早已破產的理論，重新從那些舊書堆中找出來，外面加了許多新的欺騙人的保護色。我們在他這個大綱中，絕對找不出任何新的理論，都是些在二十年以前已被列寧親身所排斥與辱罵了的舊東西，都是在整個歷史發展的事實前面所已經宣佈破產了的理論。

但我們對於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必需加以深刻的注意，並必需站在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給以迅速的正確的回答。因為：

第一，這個文件是整個托洛斯基主義的基本路線，代表着托洛斯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之各方面的理論系統。我們以前批評托洛斯基主義都是只說到其中的某一問題

，往往不能指出托洛斯基主義之全部的內容。只有在托洛斯基這一篇文章中，我們可以批評托洛斯基主義之全部內容，可以將托洛斯基之整個的背叛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地方，都有系統的一貫的揭露出來。

第二，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乃是顯然的對列寧主義的直接進攻。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們用了由列寧著作中選擇出來的許多重要引證，處處都證明列寧主義是與托洛斯基之所謂「不斷革命論」完全不同的。托洛斯基表面上還拿着『列寧』的旗幟，表面上是進攻現在的共產國際，實質上所發表的一切理論，都與列寧主義的原則絕對矛盾，並且實質上是列寧在未死以前所已經親身擊破的理論。但托洛斯基現在却披一件『列寧』的外衣，事實上要以托洛斯基主義來代替列寧主義。這一進攻列寧主義的策略，比一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社會法西斯蒂的手段都更陰險。爲擁護列寧主義起見，對於托洛斯基主義這一進攻，必須立刻給以列寧主義的回答。

第三，在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中，說了許多關於民主革命，工農民主專政，革命轉變等等問題，這些問題都與現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有密切的聯繫。托洛斯基固然在這個上頭寫了許多不正確的意見，但我們正必須要明瞭這一切錯誤觀念的實質，必須由駁斥托洛斯基這一錯誤理論中得出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瞭解。只有在打倒了這些錯誤理論之後，纔能更深刻的認識正確的路線。



根據以上這三個理由，我們纔覺着對於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必須給一有系統的嚴重的駁斥。也正因爲這樣，所以才希望每一個列寧主義的戰士，都來嚴重的仔細的研究這一問題。

在這一綱中，托洛斯基的原文寫得非常簡單，使許多顯然的不通的理論，我們還不能知道他自己將要怎樣解釋。因此，使我們的許多批評，也只能很原則的指出。托洛斯基在這個綱的後面說，這個綱是他準備出一本『大書』的內容，或者這些不通的理論，托洛斯基將要在『大書』中去發揮罷！但現在，一則因爲托洛斯基在這一文件上寫得文字非常簡單，二者則因爲他的錯誤太多，問題太多，所以使我們寫的回答終不能發揮而只限於很原則的。

爲使問題明瞭起見，爲使讀者可以看出托洛斯基主義之全部的真實的內容起見，我們的回答將要完全依靠托洛斯基所提出的問題的系統，並在每一段之前，將托洛斯基所寫的原文都一字不改與一字不刪的寫出來。我們在托洛斯基之每一段話的後面，寫出對托洛斯基主義的駁斥。托洛斯基的原文共計十四條，現在我們應當分段的研究：

## 二 不斷革命論與列寧及托洛斯基

第一：『不斷革命論現已需要每一個馬克斯主義者來加以莫大的注意了。因爲理

論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過，已把這問題從我國馬克斯主義者之過去的紛歧意見中分別了出來，又使這問題成爲性質的，內在關係的和世界革命方法的問題了。

這幾句話本來只是一個序言，沒有什麼內容，我們並不說「不斷革命論」不需要注意，若能研究與注意，自然對於一切問題都是好的。但這裡我們必要簡單的指明幾點：

一、馬克斯指出無產階級應當使革命不斷的前進，直到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這自然是一個絕對正確的原則。列寧應用馬克斯之不斷革命論的原則，指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任務，是要使這個革命走到澈底勝利，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主義是馬克斯主義的繼續發展，革命轉變論也就是馬克斯的不斷革命論的繼續發展。現在我們認爲「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澈底完成中轉變入於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名詞比較簡單的不斷革命論要更能指出革命發展之正確的階段與方向，更能表現無產階級在各個具體環境中之戰略的中心。俄國革命的經驗，是執行的馬克斯的不斷革命論的原則，但同時列寧告訴我們一切策略中是用的革命轉變的名詞，這一「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的了解，是列寧在二十世紀對於馬克斯主義之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爲此，我們現在只用「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名詞，這其中不但已經包含了馬克斯之

不斷革命的原則，並且還包含列寧對馬克斯主義的繼續發展。托洛斯基現在想以馬克斯之不斷革命論與列寧的革命轉變論相對立起來，或是想以「不斷革命論」的名詞來掩飾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或是想以「不斷革命論」來代替革命轉變論。這些都會必然的走到可恥的破產。

二、由馬克斯的不斷革命論到列寧的革命轉變論，這是馬克斯主義在半世紀之「理論鬥爭和階級鬥爭之經過」中發展出來的。托洛斯基說不斷革命論是「從我國（自然說的俄國——友）馬克斯主義者之過去的紛歧(?)意見中分別了出來」，這句話我們完全不懂，因為這完全是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修正」，對歷史事實的隱蔽，與對羣衆的欺騙。托洛斯基抹殺了自己在俄國歷史上之不可饒恕的錯誤，抹殺了列寧親自反對托洛斯基主義「不斷革命論」的二十年的歷史。抹殺了自己（托洛斯基）在俄國革命中曲解馬克斯之不斷革命論之原則以與列寧對抗的事實，抹殺了自己在一九〇五年，辱罵布爾塞維克是「自限」，是「反革命」的事實，抹殺了自己過去之一切爲列寧所攻擊得體無完膚的破產的理論。將這些在俄國革命與列寧主義之發展中有非常重大意義的事實都完全不提，而以「過去之紛歧」這幾個字，將他不負責任的不作斷語的輕描淡寫過去。每一個馬克斯列寧主義者都應該公開的承認，在整個俄國馬克斯主義的歷史中，絕不是什麼「紛歧」，而是托洛斯基主義在列寧親身二十年的打擊之下，所得到的可恥

的破產。

三、說不斷革命論「成爲性質的，內在關係的」，我們不懂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哲學，只好『敬謝不敏』，『不知所云』，這或許只是翻譯上的問題罷！

### 三 托洛斯基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

第二，『對於落後的資產階級發展的國家，尤其是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不斷革命論已顯示了這些國家之欲完成其民主的及民族自由的任務，只有經過被壓迫的民族的尤其是農民羣衆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纔有可能。』

我們在這一段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下面，同樣應當給以下列幾點的駁斥：

一、落後國家之民主及民族自由的任務，他的解決並不是『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纔有可能』，而是到無產階級專政，纔得着最後勝利的保證。這個話的意義就是說，在他還沒有得到最後勝利以前，還沒有到無產階級專政以前，革命運動還要經過其他的必要的階段。如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經過這一階段然後革命勝利『纔有可能』，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則民主革命已經得了最後的完成，那時候並不是『纔有可能』的問題了。

二、托洛斯基這段話，完全忽視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前的階段，在落後國家中便可以經過民主革命而直接從無產階級專政起，這與列寧主義是絕對矛盾的。列寧在

一九〇五年以前告訴我們：

『只有糊塗，他能明瞭現在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他能提出組織革命公社（即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友）的口號。只有糊塗與反動，他才輕視無產階級之參加與領導民主革命，他才懷疑無產階級之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只有糊塗，他才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與條件混淆起來，因為在性質及參加的社會力量上都是不同的。』（『社會主義與農民』。見俄文列寧全集，第一卷 第四四八面）

三、托洛斯基這些話，完全將『落後國家』無產階級之特殊條件與任務一概抹殺。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俄國也是一個落後國家，我們看列寧是怎樣說的：

『俄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程度（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之覺悟與組織程度（與客觀條件緊相關連的主觀條件），使工人階級徹底解放一時成爲不可能的事。只有那般最唱高調的人，能把現時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置諸度外；只有那般最無聊最作樂夢的人能不顧到目前工人羣衆是如何還不瞭解社會主義的目的，及其實現的方法。但是我們相信，工人解放只有工人自身的事情纔有可能，若羣衆無覺悟與組織，無準備與訓練，無反對資產階級之公開的階級鬥爭的鍛鍊自己，則社會主義革命簡直無從說起。』（兩個策略》，中文本，第一五面）

四、托洛斯基之「欲完成其民主的及民族自由的任務」，是「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這將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完全混淆起來，這完全不是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列甯當一九一八年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次基」的時候，他寫着：

「祇有布爾塞維克才嚴格的研究了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使前者幹到徹底之後，他們即打開了轉到後者的門戶。這是唯一革命的與唯一馬克斯主義的政策」。——（「革命與考次基」，中文本，第一四一面）

五、以上這些話，證明現在一九三〇年的托洛斯基主義與在十月革命前之反對列寧的托洛斯基主義，在基本理論上完全沒有改變，我們看，列寧對於托洛斯基的批評是：

「托洛斯基的基本錯誤，忽視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沒有對於由這一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友）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過渡問題的明確觀念」。——（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之鬥爭任務，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六面）。

#### 四 托洛斯基將反資產階級看成民主革命的唯一任務，不談反對封建勢力

第三，「不僅土地問題及民族問題亦同樣決定了農民之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沒有工農的聯合，民主革命的任務即無解決的可能，且亦無需於嚴重的提出。但欲

實現這兩個階級的聯合，除了和民族自由資產階級作不妥協的鬥爭以外，其道末由了」。

對於這一段托洛斯基的理論，我們應當說明的是：

一、工農聯合既然是解決土地問題與民族問題，則首先（注意）應當「不妥協鬥爭」的還不是對民族自由資產階級，而是對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爲什麼托洛斯基在整個大綱中不提反對封建地主及反帝國主義呢？爲什麼當托洛斯基說到「落後國家」及「殖民地國家」的時候，當着說到解決「民主」「民族」任務的時候，偏只說反對資產階級而將封建地主及帝國主義不提呢？這正是托洛斯基之混淆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具體的表現。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一定要說，現在是帝國主義時代，只有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沒有反對封建勢力的鬥爭。這些表面的「左傾」，早已被列寧打得粉碎呵！請看列寧怎樣寫的：

「托洛斯基的基本理論……：「我們生長在帝國主義時期，帝國主義並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和舊統治對立，而是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這簡直是笑話：假使俄國帝國主義已經使俄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着，那麼，在俄國前面便直接擺着社會主義革命！！那麼，便應該反對「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那時候我們便不能說「革命的工人」，而應該說「在社會主義政府中的工人」

。托洛斯基的糊塗簡直不知邊境……」。〔論革命中的兩個路線〕，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三—二二二面。

二、托洛斯基說工農聯合應該『與民族自由資產階級作不妥協的鬥爭』，這句話若是離開歷史上的時間與空間，單純的作爲一個定理，這依然是不正確的，這與馬克斯及列寧主義的原則都不一樣。馬克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上說：

「在德國，對於資產階級有革命的行動時，共產黨人和其他聯合起來同專制的王政，封建的地主戰爭的。但他們一刻也不忘記使勞動階級明白認識有產者和無產者仇敵的對抗，以期勞動者得準備利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時所必然造成的社會及政治狀況來做反抗資產階級的武器，也使勞動者得準備在德國保守階級顛覆之後，或須立刻和資產階級本身開戰」。〔馬克斯主義之基礎〕，潘文鴻編，第二二七—二二八面。

這是馬克斯對於德國民主革命所指出的策略，在開始時候有聯合資產階級的可能，但即在這個時候同時要準備反對資產階級。同樣，列寧對於殖民地革命的指示：

『共產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地妥協或協作，但是絕不能與他們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之獨立性，雖然這種無產階級運動或尚在萌芽的形式」。〔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決議案〕。



所以，在民主革命中，應當堅決的不妥協的和資產階級鬥爭，這是指在資產階級開始表現妥協以及叛變革命的時候，並不是沒有時間和空間之限制的。托洛斯基將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看成民主革命之一開始便必然有的任務，甚至於唯一的任務，將這個任務還超乎反對封建勢力之上，這便將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混合起來，這是非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路線。

## 五 托洛斯基混淆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不問兩（或者是每字之誤——友）個國家之在第一階段的革命是怎樣的革命，工農聯盟之實現，只有在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政治領導之下才有可能。這就是說，民主革命的勝利，只有經過以聯合農民為基礎而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

這一條前半段也有錯誤，因為譬如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蘇維埃，雖然還是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之下，但列寧仍然將他看成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不過這一錯誤，還不成嚴重的問題，因為正確的路線，在民主革命中是要爭取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的。但後半段的錯誤，他以為『以聯合農民為基礎』而『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他以為『工農革命聯盟之實現』，『只有經過無產階級

專政纔有可能」，這無論在理論上及實際上都是不通的，這個不通與整個托洛斯基的基本錯誤「忽視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沒有對於由這一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過渡問題的明確觀念」（列寧），是有密切聯繫的。因為沒有看到革命的資產階級性，沒有看到由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革命中間的過渡時期，所以將「工農革命聯盟」，「以聯合農民為基礎」的政權，「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的政權，都沒有條件的看成無產階級專政，這簡直離開了馬克斯主義的初步原理。我們看列寧說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時候，他將這個專政的性質說得非常顯明，列寧說：

「要打破這個（指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專制政府——友）反抗，壓倒反革命的企圖，沒有專政是不可能的。但這自然將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個民主主義的專政（沒有革命發展的許多過渡階段）是不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的。他至多不過能把土地私有權根本上重新分配一次，以滿足農民的利益，施行徹底的完滿的民主主義，直至共和政體為止。……這樣一個勝利，還不能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做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來的，民主革命是不能直接逃出资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範圍的。……」（『兩個策略』，中文本，第六三——六四面）。

所以由工農民主專政到社會主義專政中間還有「革命發展的許多過渡階段」，這個東西是托洛斯基永遠所不能瞭解的。

## 六 托洛斯基自己不懂列寧所指的工農相互關係，反罵列

### 寧沒有指明工農相互關係

第五，『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舊口號——「工農民主專政」正確的顯示了上述性質的工農及自由資產階級的相互關係。這一點已由十月革命的經驗來證明了。但列寧的公式並沒有期先解決革命聯盟中工農應發生若何相互關係的問題。換句話說，這公式只有一個代數學上的未知數，而歷史經驗過程中之數學的已知數却都是由這代數學上的未知數來決定的。這歷史經驗過程中之數學上的已知數若不加其他的解說，那只證明農民之在革命中的作用不論其若何偉大，無論如何是不能發生獨立的或領導作用的。農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資產階級走，這就是說「工農民主專政」只有當作領導農民羣衆的無產階級專政看待，才有意義」。

在這一段話中，除了什麼『代數』，『數學』，『已知數』，『未知數』這些故意使人不懂的托洛斯基主義的『哲學』以外，我們可以看出托洛斯基的三點謬誤：

一、由『十月革命的經驗』證明的是托洛斯基之『上述』的理論都完全錯誤，十月革命不是馬上便成功的，乃是由二月革命以後，經過許多『革命發展的過渡階段』，最後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無產階級革命。十月革命並不是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因爲第一階段乃是二月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並不是馬上建立的，而是經過一定的階段，經過工農民主專政政權的實現，這種民主專政並不是立刻便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發表的論策略書中，列寧說：

『在俄國革命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某種形式下，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公式所能預見的，祇是階級的相互關係，而不是實現這種相互關係和相互合作的具體的政治機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但這個政權——二月革命以後的蘇維埃政權，任何人都知道他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工農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了一些革命發展的過程，到十月革命以後才實現。而上面（第四條）托洛斯基的理論偏是說『工農革命聯盟，……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這種理論已經被十月革命的經驗打得粉碎。現在托洛斯基反說十月革命證實了托洛斯基主義，這真是絕無恥的修改歷史的事實。托洛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的口號是『推翻沙皇，建立工人政府』，這正是托洛斯基主義將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混合一齊的實際運用。但這個口號歷次的被列寧打得粉碎。到二月革命以後，就在我上面所引證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所發表的論策略書上，列寧還寫着：

『我們會不會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會不會有『跳越』尚未完成的（農民運動

尙未過去）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而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那種危險呢？倘然我這樣說：『推翻沙皇，建立工人政府』，那麼，就有上述的危險。我所說的不是這樣，而是別個樣子。』

列寧的策略是經過各種過渡的階段以走到無產階級專政，托洛斯基主義是由現在馬上跳到無產階級專政。及到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到十月革命之後，於是托洛斯基先生跑出來說：『我的對了，我說的是要無產階級專政』。這真是笑話！我們由這個中間，除了看見托洛斯基之最無恥而外，用十萬倍的顯微鏡也照不出別的東西。

二、托洛斯基說『列寧的公式並沒有期（大概是預字之誤——友）先解決革命聯盟中工農應發生若何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這簡直是托洛斯基的胡說與『自作聰敏』。列寧的公式——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過工農民主專政轉變於無產階級革命，這裏面有什麼『工農相互關係』沒有指出呢？『工農民主專政』，這是否表示一種『工農相互關係』呢？無產階級聯合貧農，使中農中立，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是否一種『工農相互關係』呢？列寧是最明瞭『工農相互關係』的了，也只有列寧，他給了『工農相互關係』之最完全的最正確的各方面的指導，托洛斯基自己對於『工農相互關係』絲毫不懂，對於列寧的指示完全不相信，現在反而出來罵列寧，說『列寧的公式並沒有預

先解決革命聯盟中之工農相互關係』，這真是無恥已極！

三、農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資產階級走。由這一個前提上，托洛斯基便做出一個結論：『工農民主專政，只有當着領導農民羣衆的無產階級專政看待，才有意義。這又是將『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混淆起來，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這個錯誤我已經在上一節中引證列寧的話將他駁斥了。

## 七 托洛斯基否認工農民主專政存在的基礎

第六，『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區別是由工農民主專政的階級內容來決定的，工農民主專政之實現，只有待於代表農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利益的獨立的革命政黨之有可能的形成——這政黨之有可能奪取其政權，仍有賴於無產階級各種幫助及其對於革命政權的決定。但現代的歷史，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來俄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成立農民政黨有滿途的不可超越的障礙，這障礙就在小資產階級之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依附性，及其深人的內在的變化，因這變化，小資產階級（農民）的上層份子，在嚴重事變中，尤其是在戰爭與革命中跟隨了大資產階級，其下層份子跟隨了無產階級，而中間分子則在兩大極端之間選擇他們的出路。在克倫斯基與布爾塞維克之間，在國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不能也不會有工農民主專政介於其間的。』

我們在這一段話中間應當指出的：

一、既然托洛斯基在這裡寫着『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之區別是由工農民主專政的階級內容來決定』，則工農民主專政便與無產階級專政便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東西。這與托洛斯基在上面幾段話中所寫的：『工農民主專政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絕對的矛盾。

二、托洛斯基在這裡說：『在國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不能也不會有工農民主專政介於其間的』，這是不通的，譬如現在中國有好多的地方蘇維埃政權，這不是國民黨的政權，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這就是『在國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也許托洛斯基已經投降了帝國主義，那麼，他能說這不是革命政權而是『土匪』與『新式流寇』，但我們從列寧主義的原則上看來，這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因為在這裏是依靠大多數農民羣衆的力量，徹底摧毀了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之政治與經濟的特權，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但還沒有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政綱，這就是工農民主專政。

三、托洛斯基說『在克倫斯基與布爾塞維克之間，不能也不會有工農民主專政』，這又是完全修改歷史事實與違背列寧的教訓。我在前一節中已經引證了列寧在『論策略書』上所寫的話：『在俄國革命中，工農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工人兵士代表蘇

維埃——這就是已經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民主專政。『這個民主專政，正是在二月到十月之間，正是在臨時政府及布爾塞維克之間，正是托洛斯基所永遠『不能也不會』瞭解的問題。』

四、在這裏，托洛斯基的中心問題是說工農民主專政『不能也不會』實現，他所持的『理由』便是小資產階級農民不能有『獨立的革命政權』，因為形成這種政黨『有滿途不可超越的障礙』。這種以為沒有小資產階級政黨便不會實現『工農民主專政』的理論，這乃是托洛斯基重複他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中之反布爾塞維克的腔調，這種腔調是被列寧所打得粉碎的。托洛斯基在俄國革命中，他起來反對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他說：

『那樣的聯合（指工農聯合的專政的政權——友）之實現的方法，或是由於有一個領導農民的資產階級的政黨，或是農民自己組成一個獨立的強有力的政黨。

無論是這或是那，我們都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總結與前途，第二四面）  
但列寧對於這一問題回答說：

『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聯合，若以為『或是由於一個領導農民的資產階級政黨，或是農民自己組成一個獨立的強有力的政黨』，這無論由一般理論上或是由俄國革命的經驗上說，都是顯明的不正確的。階級的聯合，完全不是必要這樣或那樣之『強有力的政黨』。若以為要這樣，便是將階級問題與黨的問題混淆了。……只



要有「共同行動」的時候，這種聯合便可以實現，譬如工人代表蘇維埃與兵士代表蘇維埃，鐵路罷工委員會與農民委員會等，只要有這些羣衆組織，便在這些組織的共同行動中，實現了階級的聯合」。（「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之鬥爭任務」，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七面）

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階級聯合，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是兩個階級的共同行動，這裡並不需要任何「這樣或那樣」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但是，托洛斯基反對列寧主義的這一理論，總是處處在找這樣或那樣的政黨，自然因此便不能找出工農民主專政存在的基礎。

## 八 托洛斯基現在罵共產國際『反動』，與一九〇五年他罵列寧反革命是一樣

第七，「共產國際之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應用之於東方各國的企圖，久爲歷史所推翻了，這個口號只能成爲一個反動的意義而已。這口號既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相對立，那他只幫助了無產階級之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的混合，爲民族資產階級領導權和民主革命的失敗造成了優越的條件。把這口號引入之於共產國際綱領中，就等於對馬克斯主義和布爾塞維克十月革命之直接的背叛」。

我們對於托洛斯基這種空口的謾罵，應當指出兩點：

一、共產國際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文件中，無論對什麼國家，絕不是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與無產階級專政相對立，絕不是說我們只要工農民主專政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共產國際只是指出，在落後的農業國家中，在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的國家中，這裡首先需要完成民主革命，經過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而進一步的轉變到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國際在全世界一切國家的任務，都是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之政權的建立。但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還有其本國的特殊經濟條件，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特殊歷史任務。這種任務在落後國家中，便是首先領導本國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只有糊塗與反動，他才輕視無產階級之參加與領導民主革命，他才懷疑無產階級農民之革命的民主專政的口號』（列寧），托洛斯基始終是：『忽視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沒有對於由這一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過渡問題的明確觀念』（列寧），從一九〇五年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有一點變更。

二、托洛斯基在此地罵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動』，罵共產國際是『背叛』，這些與托洛斯基在俄國革命中罵列寧爲『反革命』是一樣的來源。我們看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寫的，他將孟雪維克與布爾塞維克看成一樣的東西，他說：

『孟雪維克由一個抽象觀念出發，說『革命是資產階級的』，結果使無產階級

的策略，迎合資產階級的行為，以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布爾塞維克由同樣的抽象觀念出發，『革命是民主的，不是社會主義的』，結果是要使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仍然使他自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範圍以內。……當着孟雪維克的反革命性在現在已經表現出來的時候，而布爾塞維克的反革命性（注意——友）却要在革命勝利以後，將有非常大的危險』。（托洛斯基，『一九〇五』，第二八三，二八五面）

托洛斯基當時罵列寧布爾塞維克之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自限』，是不做無產階級革命，說布爾塞維克到民主革命勝利的時候，一定會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會『反革命』，『將有非常大的危險』。我們將他這些話與現在罵共產國際的話來比較一下，對照一下，很顯然的可以看出，無論在原則上或是在口氣上，都絕對的沒有兩樣。相差的僅只是：以前直接罵列寧，罵布爾塞維克，現在則不得不戴着『列寧』，『布爾塞維克』的帽子，作為容易欺騙人的工具，以罵列寧所創造的共產國際而已。

## 九 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否認了革命發展的一切過渡階段

第八：『民主革命中的領導者在其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有不可避免的而

且又迅速的侵犯資產階級財產權的任務放在他的前面。民主革命之迅速的轉而為社會主義的革命，那這革命也就成爲不斷的革命了」。

在這一段話中間，托洛斯基並沒什麼新的發明，只不過重述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錯誤而已。

民主革命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在他開始領導農民奪取政權的時候，還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其政權也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爲開始即使是取得政權的勝利，「還是不能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做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來的，民主革命是不能直接逃出资產階級社會經濟範圍的」（列寧）。「這個民主主義的專政，沒有革命發展的許多過渡階段，是不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列寧）。所以在民主革命中，當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開始取得的政權，這只是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只是工農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由工農民主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在革命發展中，雖然無產階級的政策是要使他盡量迅速的轉變，但他究竟存在着——即使是很短的——一個轉變的過渡階段，只有托洛斯基不明瞭由這一革命到那一革命的過渡時期」。革命當然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但托洛斯基若將「不斷」的意思，看成沒有過程，看成民主革命可以與社會主義革命混合爲一個，這便是「跳越」革命，而不是馬克斯主義不斷革命論的真正內容了。

## 十 資本主義發展的形勢和一個國家能否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

第九：『無產階級之對於政權之奪取，並不是革命的結束而是革命的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在國家的和國際的規模上才有可能。這種鬥爭在國際資本主義關係之極端優越的條件之下，便能不可避免的引起大的爆發，爆發於內部的是內戰，爆發於外部的是革命戰爭。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就在這裡，不問他是昨天剛在進行民主革命的落後國家的問題，抑是經歷了長期民主主義和議會主義時代的舊式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

很慚愧！對於這一段話我已經反覆讀過好幾次，但始終還不能瞭解其真正的意思。我自然不敢說托洛斯基這一『大文學家』寫得不通，只怪這些托洛斯基主義者的翻譯，並沒有將他的意思傳出來。我又仔細看了幾次，不揣冒昧，我想大概托洛斯基的話是這樣：

『無產階級之對於政權之奪取，並不是革命的結束而是革命的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在（許多）國家和國際規模上（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才有可能。這種鬥爭在國際資本主義關係（對於革命）之極端優越

的條件之下，便能不可避免的引起大的爆發，爆發於（各國）內部的便是（國）內戰（爭），爆發於外部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戰爭。

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就在這裏，不問他是昨天剛在進行民主革命的落後國家的問題，抑是經歷了長期民主主義和議會主義時代的舊式資本主義的國家問題。

括弧裏面的字是我加的，我覺得原文應該加上這些字纔能講得通。假使我這個義務校對並不失去托洛斯基的原意，那麼，我便將這一條與下一條的問題一併回答，因為這兩條是同樣的問題——一個國家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

下一條是：

第十：『欲在一國之內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之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生產力之超過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因此，一方面就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另一方面引起了歐洲聯邦的空想。在一國範圍內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而後發展到各國，復由各國發展到全世界。這社會主義革命在這一個字的新的廣泛的意義上成了一個不斷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我們地球上新社會得到最後的勝利以後才有完成的可能』。

在這兩段話中，表示了托洛斯基反對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托洛斯基以為無論在什麼國家中，既然開始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則必然便要『不斷的』引

起其他國家之同樣的革命。於是他將『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工作，看成必要候世界革命『在國際規模上』爆發以後才有可能。因此，在目前世界革命還沒有完全勝利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還僅在蘇聯一國實現的時候，便不能說社會主義的勝利，便反對在蘇聯一個國家中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托洛斯基的理論，一則曰『現在生產力超過了民族的國家的界限』，因此便將世界經濟上目前還存在的還有重大影響的經濟以及政治上的民族劃分都完全拋棄；再則曰『在一國範圍內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而後發展到各國，後由各國發展到全世界』，以爲這就是『不斷革命』，而不知道在這個中間尚有一個一定的過程。革命發展的趨勢是不斷的，但『不斷』的意義是要馬克斯主義的科學的在發展前途的意義上去瞭解，而不能機械的以爲不斷的意思便是：『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後天又在那裏』，將歷史的發展看成非常單純的，平坦的，一直的道路，這是完全離開馬克斯主義之辯證法的無論如何的『不斷』，其中終有一定的過程，托洛斯基始終是不明瞭歷史發展上之各種過程的。列寧是唯一正確的馬克斯主義者，但列寧觀察世界經濟的發展便完全不是這樣。列寧說：

「無論那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無論那一個學過近代普通科學的人，我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從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能够按照同等的步驟或和諧的比例麼？」答覆這個問題將無疑義的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沒

有同等的步驟，從沒有和諧的比例，而且也不能夠有。每個國家發展，特別偏向於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或特別顯著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某一種特性或某幾種特性。發展的過程是不劃一的。……全世界的歷史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去的。但所走的絕不是平坦的，單純的，一直的道路。（『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八三—一八四面）

正因為列寧認識了『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的規律』，所以列寧便與托洛斯基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列寧認為『因此得到結論，就是首先在幾個國家或者甚至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可能的』。托洛斯基以為社會主義必需在全世界範圍內同時得着勝利，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首先在一國或者幾國得着勝利。這一托洛斯基主義與列寧主義的爭論，並不是現在纔發生的，還當列寧生存的時候，還在十月革命以前，當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中，托洛斯基當時擁護『世界聯邦共和國』的口號，列寧便是極端反對的。列寧說：

『將世界聯邦共和國看成一個獨立的口號是不正確的。第一，這個口號離開了社會主義，第二，由這個口號可以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以為在一個國家——對於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勝利是不可能的』（『論歐洲聯邦共和國的口號』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三三—三三三）



接着列甯更顯明的說：

「經濟的和政治的不平衡的發展，是資本主義之必然的規律，因此便可以知道社會主義勝利首先在幾個甚至於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可能的。已經勝利的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沒收資本家的財產，組織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開始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吸引其他國家的被壓迫的羣衆接近自己，在他們那裏鼓起暴動反對資本家。」（同上）

當時托洛斯基在他的機關報『我們的話』（真巧！那時候俄國之反列甯的托洛斯基的機關報叫這個名字，在現在中國也是一樣的）上，對於列甯這種意見是絕對反對的，他說：

「以為社會主義革命有民族範圍內的前途——這不是做了狹小民族觀念的犧牲者，這就組成了社會愛國主義的實質」。

這是托洛斯基於一九一五——一六年罵列甯的話，我們在以後可以看見現在托洛斯基對於共產國際，對於『史達林』的辱罵，與這完全沒有兩樣。

十一 托洛斯基否認世界各個民族中之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特點，因此否認一個國家首先勝利的可能

第十一：『根據上述世界革命之發展的計劃，由現在共產國際綱領之以迂腐的無生氣的精神，來劃分社會主義『成熟』與『不成熟』的問題，已被推翻了。資本主義既經形成了世界市場，國際分工和生產力，那他就為社會主義之重新建設預備下了世界的經濟。各國之在這過程中的推進，有各種不同的程度。落後國家在某種條件之下能夠迅速的達到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們之向社會主義的推進，則較為遞後。一個落後的殖民地成半殖民地國家，因其無產階級沒有聯合農民和奪取政權的充分準備，就不能徹底的完成其民主的革命。反之，在無產階級因民主革命的結果而奪取政權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未來的命運，不僅有賴於一國生產力之最後的分析，且有賴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

我們看托洛斯基這一段話，包含了許多無常識的錯誤與矛盾。

一、托洛斯基說共產國際綱領有『迂腐的無生氣的精神』是『劃分了各國社會主義之『成熟』與『不成熟』的條件，他這幾句話是對着共產國際之以下這幾句話說的：

『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形加重。此種不平衡，引起資本主義形式之不同，引起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不同，更引起革命過程中各種不同條件或特殊條件。這些情形使無產階級之獲取政權，在歷史上必然要採取各種不同的路線與速度，使有些國家在向無產階級專政走去時，必須經過某種過渡階段，並且使各國建

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也不相同。（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通過的綱領，第四章『無產階級專政』第八節）

我們看共產國際這種分析，完全是與列寧之論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絕無兩樣，完全是根據於列寧之『經濟的政治的不平衡發展，是資本主義之必然的規律』，因為：『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沒有同等的步驟，從沒有和諧的比例，而且也不能夠有』（列寧）。因為：『全世界歷史是定歸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但所走的絕不是平坦的，單純的，一直的道路』（列寧）。這種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托洛斯基無論如何是不能瞭解的，他只機械認識了『國際分工』，『世界市場』，他不知道因其不平衡的發展便必然引起各種不同的條件，便使社會主義勝利之成熟的條件在世界各地便一定有區別。

其實托洛斯基自己也寫着『各國之在這種過程中的推進，有各種不同的速度』，然則『各種不同的速度』是由那裏來的呢？他若不是從天上掉下來，便必然是從經濟發展中產生出來。既然各國的經濟發展，可以使各國到社會主義有各種不同的速度，當然這便有經濟條件之『成熟』與『未成熟』，但托洛斯基偏要說這是『迂腐的無生氣的精神』，其矛盾簡直無從解釋！

二、托洛斯基以為在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中，『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未來的命運，不僅有賴於一國生產力之最後的分析，且有賴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

」。假使是說，只有普遍的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使某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勝利，得着最後的鞏固，這自然沒有錯誤。但托洛斯基不是這樣，他是說若沒有國際的社會革命，則某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簡直沒有『未來的命運』，這就是說，沒有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之普遍的爆發與勝利，則談不上某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落後的國家——的勝利。這在理論上的不通，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尤其當蘇聯存在十三年以後，當蘇聯經濟建設正突飛猛進的時候，這是絕對不正確的。自然，關於這一問題是與在蘇聯在一個國家中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有密切聯系的，我們且看托洛斯基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

## 十二 列甯說在俄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托洛斯基說不可以

第十二：「由不滿於十月革命的反動的酵素之上，形成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之理論，是與不斷革命論完全相反的一種理論。在我們批評的打擊之下，想把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應用之於俄國一國，說俄國具有特殊的條件（即地大物博的條件），這種無恥的企圖，並沒有把事情改進，反而把事情弄糟了。把社會主義從國際的地位下分離開來，往往會形成一個民族自救主義，就是說，承認他自己的國家有例外的優越

權和特殊條件，將允許他發生一種爲別的國家所不能得到的作用。世界的分工，蘇聯之有賴於外國技術，歐美先進國之有賴於亞洲的原料，……這是使任何一個單獨國家都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

這一段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是他目前反對共產國際及反對蘇聯的中心思想。他罵共產國際是「民族自救主義」，這與一九一六年罵列寧爲「狹小民族觀念的犧牲者」是一樣。托洛斯基之這些「反動的酵素」，「無恥」，「民族主義」等等名詞，是用以罵誰的呢？表面上看來是罵現在的共產國際及所謂「斯達林」，事實上自然完全是向列寧主義的進攻。因爲我們在上面已經引證了，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有社會主義首先勝利的可能，這是列寧的理論而不是其他別人的。列寧不僅說了一般的理論上的可能，並且特別指出俄國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並且指出俄國必要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在開始提出電氣化之口號的時候，他說：

「沒有電氣化的計劃，我們轉入於真正的建設是不可能的。共產主義——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的電氣化」。〔列寧一九二〇年在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

在另外一個地方，在「論糧食稅」這一小冊子中，列寧說：

「我們是否想由現在俄國這一種普遍的狀態直接轉入於社會主義呢？是的，我們是想的，但僅只在一個條件之下，我們經過了許多的科學的工作，到現在便知道了。」

這個條件便是——電氣化』。（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冊，第二〇四面）

這裏，列寧說俄國到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是電氣化，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便是共產主義。我們再看，在列寧將死之前的最後的著作上，列寧說：

『事實上，一切生產工具歸國家，國家政權握在無產階級之手。整千百萬的農民小生產者與無產階級聯合，無產階級對農民保障着自己的領導地位，等等，……難道所有這些不是建設完全社會主義之必要的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完全建立，但所有這些都是建設社會主義之必要的並且已經足夠的條件』。（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冊，第一四〇面）

我們只由這些引證上便可以看出來，托洛斯基之一個國家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以及『民族觀念』、『反動』、『無恥』等等毫無理由的謾罵，都是對着整個列寧主義的進攻，絕不僅是對於現在共產國際的問題。

托洛斯基爲什麼不相信在俄國——在這個無產階級已經取有政權十三年的國家——來建設社會主義呢？除了因爲托洛斯基之不明瞭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的規律以外，還有一個很主要的來源，這就是托洛斯基不相信無產階級可以與農民合作，不相信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作用。譬如當一九一九年的時候，當俄國革命已經成功兩年以後，當列寧正在說無產階級聯合中農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托洛斯基在他『一九〇五』這一

本書中，他寫着：

「無產階級正因為要保證自己的勝利，所以在他自己取得政權的第一天，他不僅與封建勢力並且要與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進行嚴重的鬥爭。在這時候，無產階級不僅與這些在革命開始的時候曾經幫助他進行革命的各派資產階級發生仇視的衝突，並且同樣要與隨着他共同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嚴重的仇視的鬥爭。

在落後的國家中，工人政府與佔大多數人民的農民羣衆的衝突，僅只有在世界範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才能得着解決」。——（『一九〇五』，序言）

就在這同一個時間與同一個空間中，當托洛斯基將農民的私有制度與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擺在一塊的時候，當托洛斯基高喊「無產階級應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嚴重仇視鬥爭的時候，列寧在布爾塞維克黨的第八次大會上說：

「我們對於資產階級及對於中農（即農民中的大多數——友）之基本的區別就是——完全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而與不剝削別人的中農聯合。這一個基本理論是所有人都應該承認的」。——（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四六面）

從第八次大會以後，在俄國便開始了列寧之無產階級聯合中農的路線，以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托洛斯基既然覺得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馬上便應該與農民發生「仇視鬥爭」，則自然托洛斯基不能看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前途了。

## 十三 對共產國際之一些毫無根據的謾罵

第十三：『斯達林與布哈林的理論，不但把民主革命機械的對抗着社會主義革命，違反了俄國革命的經驗，又把民族革命從國際的路線上分離開來。此種理論只使落後國的革命來從事建設一個不能實現的民主專政的制度的任務，這種制度不但反對了無產階級的路線，在政策上引入了許多的幻想，且麻醉了東方無產階級的力量，並阻礙了殖民地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之對於政權的奪取，站在那種可恥的理論的觀點上看去，即表示了革命的完成（照斯達林的公式已完成了『十分之九』）及國家改良時期的開始。富農生長之於社會主義和世界資產階級『中立』的理論，是與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分不開的。他們站在一起，沒落也是在一起的』。

托洛斯基的這一段話中，完全是絕無根據的謾罵，沒有任何證據與理由的。我在這裏必須說明三點：

一、共產國際在任何時候，對任何殖民地革命運動中都沒有『把民主革命機械的對抗着社會革命』。共產國際認定目前殖民地革命是民主革命，但這是指目前這一階段之特殊的歷史任務，其將來的前途當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祇有布爾塞維克黨人才嚴格的研究了民主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使前者幹到徹底之後，他們即



打開了轉到後者的門戶。這是一唯一革命的及唯一馬克斯主義的政策」（列寧）。

托洛斯基以爲無產階級參加了民主革命便是「麻醉了東方無產階級的力量，並阻礙了殖民地革命的勝利」，這不獨對列寧主義沒有一絲一毫的常識，並且是列寧所認爲「只有糊塗與反動」的理論。

二、無產階級對於政權之奪取，當然表示革命完成之最大的一部分。這爲什麼是「可恥的理論」，爲什麼用「施達林的公式」來掩飾問題之真正的內容！我們看在二月革命後，列寧是怎樣寫的。在「論兩個政權」這篇文章的第一句，列寧說：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總是國家政權的問題。倘然沒有認清這，那就講不到什麼自覺的參加革命，更說不上什麼領導革命了。」（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冊，第二四面）

在「論策略書」上，列寧講二月革命的總結說：

「自這次革命以後，政權轉到別個新階級——即資產階級之手。照革命的嚴格科學意義以及實際政治意義上講來，國家政權從這一個階級轉到別一個階級，是革命的第一個根本的主要標誌。因此，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已經完結了。」（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冊，第二八面）

列寧不僅說了奪得政權是革命完成的「十分之九」，並且說是「已經完結了」，這

有什麼『可恥』?! 只有托洛斯基主義者，不明瞭政權在革命中以及在一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才做出了極端機會主義的結論：『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而不建設社會主義』。這纔是『自限』呵！這纔是『反革命』呵！托洛斯基時常用絕無根據的以謾罵別人的名詞，拿來自己罵罵自己，是再適當沒有的了。

三、『富農生長之於社會主義』和『世界資產階級守中立』的理論，與共產國際完全風馬牛不相及。與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更是全不相干。果然有了這樣的理論，共產國際一樣將要以肅清托洛斯基主義的手段來對付他。將這種理論絕無根據的冒加於共產國際身上，這是官僚式的最無恥的誣賴與造謠。

## 十四 托洛斯基要一手掩蓋二十年之列甯親身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

最後，第十四：『布哈林一手創造的共產國際的綱領，完全是含有折衷主義性質的。想把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馬克斯主義的國際主義相調和，而不知道這和世界革命之不斷性是分不開的。左翼共產主義者反對派的鬥爭，爲的是爭正確的政策和健全的共產國際，他與爭取馬克斯綱領鬥爭有密切的聯系，關於綱領問題絕不能與兩個相對的問題——不斷革命論與一國社會主義論——有所分離。不斷革命論的問題也

不復存於列寧與托洛斯基之一時間的分歧意見中，因為這種分歧的意見已為歷史所完盡了。這裏只有馬克斯與列寧之基本思想對於中央派之折衷主義的鬥爭。」

在最後這一段的「結論」中，托洛斯基寫了世界最無原則最無恥最欺騙人的話頭。他們反列寧關於民主革命基本理論，反對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反對由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反對資本主義之不平衡發展的理論，反對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他將列寧主義中的主要問題都反對完了，但他還依然要戴着「列寧」的旗幟，還說他是「擁護馬克斯與列寧的基本思想」。尤其是最無恥的，他將列寧親身二十年反托洛斯基的鬥爭，完全輕描淡寫的模糊過去，說這是「一時間」（這個「一時間」不很長），前後計二十餘年）的「分歧意見，說這『已為歷史所完盡了』。這真是笑話！當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大會的時候，開始第一次表現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分裂，托洛斯基便與孟塞維克站在一齊，共同的反對列寧。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托洛斯基公開宣傳自己的不斷革命論，主張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罵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革命」。反動時期俄國黨發生了取消派，托洛斯基開始是所謂「中間」的調和派，反對列寧向取消派進攻，以後托洛斯基又將一切取消派聯合起來，組織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八月聯合」，托洛斯基是其中的領袖。一九一二年以後新革命高潮開始以後，托洛斯基主張「俄國工人鬥爭歐洲化」，學習第二國際的議會主義，反對列寧之革命進攻的策略。世

界大戰開始以後，列甯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要使本國資產階級失敗。托洛斯基認這種口號是『幫助敵國帝國主義』。第二國際破產以後，列甯主張創造革的第三國際，托洛斯基與考次基聯合一齊組成爲『中派』以反對左派的列寧。二月新命以後，托洛斯基看見了革命高潮與布爾塞維克勢力的擴大，才開始加入布爾塞維克，並企圖保持自己的小組織而沒有成功。在十月革命後之布列特特和約的時候，列寧主張和平不戰爭，托洛斯基主張『不和平不戰爭』。一九二〇年開始轉變於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托洛斯基提出了他的『職工會行政化』的計劃，使工會與經濟機關併合起來，列甯罵他爲變工會爲官僚主義的企圖。這是列甯在世以前所親身領導的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重要鬥爭，這顯然的充滿了整個列甯主義發展的歷史。列甯死了，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當然不會終止，一直到現在，將托洛斯基主義整個的驅逐於共產國際及聯邦共產黨之外。這一系列寧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之前後卅十年的鬥爭，托洛斯基偏說這是『列寧與托洛斯基之一時間的分歧』，這豈不是世界上最無恥的表示嗎？托洛斯基並說『這種分歧的意見已爲歷史所完盡了』，這簡直完全沒有馬克斯主義常識的話，列寧反托洛斯基之數十年的鬥爭，在整個列寧主義發展的歷史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托洛斯基企圖以一手掩盡歷史的事實，但這無論如何是不會被其掩飾的。『歷史所完盡的』是什麼？我看『歷史所完盡的』只有托洛斯基主義之無條件的全部的破產。

什麼是托洛斯基之『不斷革命論』的歷史呢？他就是不斷向列寧主義進攻的歷史，也就是他自己（托洛斯基主義）不斷破產的歷史。

最後，托洛斯基主義這一『不斷革命論』的理論到中國有什麼作用呢？這便是反對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反對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十大政綱，反對推翻國民黨與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反對正在發展的普遍全國農村的土地革命，這是什麼？除了說他是取消派以外，實在不會有再適當的名詞。

列寧有一段批評托洛斯基主義最適當的話，這一段話我已經幾次的引證過，因為這句話是對托洛斯基主義之最正確最深刻的批評，尤其特別適合於指出托洛斯基主義在目前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因此我可以再將這一段話作爲我這全篇的結論：

『托洛斯基以及一般托洛斯基主義者，妥協主義者，他們比一切取消主義者都更要有害些。因爲在工人階級前面揭露取消派的錯誤是比較容易的，只有托洛斯基先生們，慣弄些爲工人羣衆所難於瞭解的東西。一切幫助托洛斯基派的人，他的政策都是欺騙工人的，掩飾取消派的。讓普特列紹夫（當時俄國取消派的領袖——友）在俄國完全自由的活動，在他們外表上更增加一些『革命的』語句——這就是托洛斯基主義的實質』。（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二冊，第三五九面）。



# 一九三〇年全中國五一運動的總結

澤鴻

## 一 全國五一運動的客觀形勢

今年全世界的五一運動，在國際的客觀形勢之下，表現着他偉大的歷史意義。正如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所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特徵是：根本的內部與外部的矛盾之加劇；這種矛盾，目前表現於資本主義加速的崩潰，表現於國際無產階級鬥爭之革命潮流的深入與擴大，同時表現於殖民地民族運動的發展。最顯明的例證是：世界大戰危機的緊迫，帝國主義者所召集的海軍會議，充分表現帝國主義間正在加緊準備世界大戰，表現軍備競爭的緊張，特別是進攻蘇聯的危機。在帝國主義間一致的採取各種方式（從中東路事件到反宗教問題等）向蘇聯挑釁，積極的武裝圍繞蘇聯的各小國，企圖消滅世界革命，消滅蘇聯。這一企圖，正從世界的全部政治經濟危機中反映出來，同時加深了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更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內新的革命浪潮之興起。許多地方，工人羣衆向資本主義猛烈的反攻（如：魯爾，洛茲，法國的紡織工人，美國南部及孟買的罷工）。以及不斷的示威與騷動（如：法國的示威，柏林及波蘭等的示威），特別是全世界工人逐日加增的失業恐慌，三月六日國際失業工人的偉大示威運動，與在業工人鬥爭聯系着的發展，更促進世界革命浪潮之加速發展。東方

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在印度，安南，朝鮮，緬甸，菲列賓……都有空前的發展，印度已經進到革命高潮，蘇維埃的印度，正在滋長。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加速的成功，更成爲世界革命鞏固的中心基礎。帝國主義，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以至托洛斯基派的騙子們，正恐慌萬狀，企圖挽救他們垂死的命運。所以特別加緊組織世界白色恐怖，加緊改良主義的欺騙，尤其是加緊從各方面向蘇聯進攻，（如：釋放白黨，製造假鈔票，與波蘭訂約以進攻蘇聯，組織蘇聯國內技師，陰謀破壞鐵道礦山等等）。

全世界偉大的五一運動，動員了全世界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勞苦羣衆，向着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以及社會民黨工賊們，熱烈的反抗。特別是柏林十餘萬人的示威與武裝衝突，巴黎，倫敦，紐約，各幾萬人以至十餘萬人，在東京亦破天荒的動員了一萬六千人，這些世界中心城市的示威，與赤都莫斯科八十五萬人的示威相呼應，表示出世界革命浪潮的發展，全世界的革命高潮，迫切在我們眼前。各大中心城市工人階級積極的鬥爭罷工，示威，騷動，將成爲世界革命高潮到來的主要標誌。

中國是帝國主義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同時是帝國主義統治世界最薄弱的一環。世界革命第二個高潮有首先在中國爆發，掀起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炸裂全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可能。

全中國的五一運動，不但是與全世界的政治經濟危機相適應，與全世界的五一運動



相配合，成爲世界革命浪潮的一支巨流。同時，中國的五一，正當着全國經濟危機日益尖銳，工業農業驚人的繼續破產，廣大的災荒與失業的蔓延，造成全國經濟生活中非常嚴重的現象。在政治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不可調協，軍閥制度衝突的尖銳，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各派的對抗，造成不斷的軍閥混戰，整個中國都捲入了戰爭的漩渦。

一方面在軍閥混戰的過程中，削弱了反動統治的力量，另一方面特別加深了廣大羣衆的痛苦，驅使廣大的羣衆，葬身於砲灰之下，或是活活的凍死，餓死，累死，飽受着戰爭災禍的壓迫剝削而死。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之下，逼使着廣大羣衆從鬥爭中去找尋出路，城市工人的罷工，示威，以至武裝衝突，到處爆發，特別是上海『三八』幾千人的莊嚴示威。祥昌，電燈泡廠的慘案，北寧路南廠工人打死黃色委員；武漢一紗，福源，裕華，紗廠工人驅逐黃色領袖，與軍警肉搏；青島工人反對關廠，反對工整會的鬥爭；滿洲中東路失業工人的鬥爭；這些中心城市的工人鬥爭，猛烈的向前發展，一起來便是嚴重的政治鬥爭，以至武裝衝突，衝破了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更縮小了改良主義黃色工會在羣衆中的影響。農村土地革命，更有驚人的發展，農民羣衆的暴動以及游擊戰爭，從南方漸漸向北方發展，不但江西六十縣，湖北五十縣，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各有幾縣以至一二十縣發生農民暴動，在江，浙，豫，直，滿亦逐漸有游擊戰爭或者農民的騷動。蘇維埃的政權，幾乎普遍了南中國各省的鄉村，豪紳地主的統治，在

這些省份縮小到幾個城市，實際在中國的半部，形成了兩個絕不相容的政權對抗着。

反革命軍隊中的士兵羣衆，被軍閥的殘酷壓迫，沒有出路，土地革命的吸引，將他們從反動的軍事系統中叛變出來，投到紅軍中去，兵變隨着軍閥戰爭的延長與擴大而繼續的發展，普遍全國，在戰爭的前方與後防，造成了中國革命浪潮的支流；這樣的兵變發展着，更促成了軍閥制度的崩潰，同時生長成爲工農革命一支有力的隊伍。中國特殊的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所產生出來的紅軍，得着猛烈的發展，朱毛之後繼續生長了千數的「朱毛」，樹立起工農革命的武裝基礎，敵人每天高喊着「剿滅」，然而却愈剿愈多。這四大動力，推動着全中國的革命向前發展，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勢。全國五一運動中黨的任務，正如中央七十一號通告中所指出的：

「黨的任務，便是要堅決的去組織偉大的政治鬥爭，以匯合各種革命勢力，特別是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形成全國的偉大的革命鬥爭，推進直接革命形勢更快的到來，并極力爭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首先勝利」。

就在這一客觀條件之下，所以組織全國五一政治示威有非常偉大可能，並且是目前全黨促進革命高潮到來之總的任務中一個最具體的工作。

## 二 全國五一運動中各黨派的策略

在全國五一運動中，更表現着中國兩個極端尖銳的營壘之陣容。一個是反革命的營壘，從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改組派一直到取消派的工賊們。他們一致壓迫和破壞全國五一運動。南京國民黨政府採取高壓屠殺與欺騙的手段。前方軍事吃緊，後方禁止罷工罷課以及一切羣衆的集會，他們造謠說：『共產黨在五一要暴動』。藉這一理由，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資本家，一致的舉行高壓。南京『四三慘案』，上海『四八慘案』，哈爾濱及北京的大批拘捕，江西，雲南，武漢，四川，奉天，天津，香港，廈門，南京，一直到上海『四二七』羣衆代表大會，均發生廣大的逮捕革命戰士的事實，各地的軍事戒嚴與白色恐怖，籠罩了全中國。同時南京政府，老早通過五一停工，叫工人到家裡開會或休息，不准出外示威。更經過黃色工會的破壞與欺騙，和緩羣衆鬥爭，消滅五一運動。

改組派更兇險的到羣衆中去活動。他們利用半在野黨的地位，蒙上一層欺騙的面具，專門企圖拉攏羣衆作反蔣的陰謀，企圖取蔣而代之。他們特別喊出容易欺騙羣衆的口號，取得羣衆的力量，以爲他們進行軍閥戰爭的工具。但他們實際上是非常恐怕羣衆力量真正壯大起來，他們已經高唱着：『徹底反俄反共』的口號，他們已經與帝國主義資本家以及閻馮各派軍閥勾結着，到處屠殺羣衆。因此，改組派在五一運動中，雖然企圖召集羣衆會議，企圖利用羣衆要求武裝暴動的心理，組織軍事陰謀，在後方打

擊蔣系軍閥以幫助其他的反蔣軍閥；然而在羣衆鬥爭前面，使他們完全失敗。

取消派陳獨秀劉仁靜區芳各派，在全國五一運動中，政治上組織上都劇烈的宣佈破產，他們眼巴巴的望着革命浪潮，既跟不上，又拉不住。他們唯一的方法是咀咒黨的「盲動」，他們便坐在屋裏，指揮馬玉夫等幾個小嘍囉到羣衆中去耍羣衆作合法運動，不要鬥爭。區芳等托洛斯基派發出通告，他們在通告中寫着：「各地反對派應當號召工人羣衆在工廠門前舉行非常集會，使「富農派」，（他們無恥的罵黨的特別名稱）的示威完全沒有工人羣衆」，「在我們指導下之工人組織（那裏有半個工人！）并力爭五一停工一天的實現」。托洛斯基派不敢提出示威的口號，不敢說五一工人罷工。他們的目的是幫助國民黨使工人羣衆離開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破壞工人參加五一運動。他們與國民黨異口同聲的喊出「停工一天」，以分散羣衆的力量。取消派本來沒有羣衆，他們在五一那天，不但沒有舉行任何一個非常集會，在上海他們到南京路去拉示威羣衆到茶樓上「吃茶」，他們向示威羣衆說：「你們在這裏送死，走！去吃茶去！」！羣衆一陣「帝國主義的走狗」！呼聲，將他們驅逐去了。阜陽示威中，取消派份子掛出孫中山遺像，企圖污蔑示威羣衆，耍羣衆和他們一樣無恥的投降國民黨。這是何等明顯的卑鄙的行動！但同樣被羣衆將他們驅逐出去。

另一個營壘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兵士，貧民，以及僑居中國的少數被

壓迫民族的羣衆。黨依據五一運動當前的客觀形勢，提出全國罷工，罷課，紀念五一的口號，指出組織政治罷工爲五一示威最主要的骨幹，動員全國黨員和團員，經過赤色工會農會學生會的組織，建立各地以及各廠各校的五一籌備會。發展赤色工會，建立工人糾察隊，獨立的運用公開活動路線號召全國五一示威，在農村中與組織地方暴動的策略聯系，在兵士中與組織兵變的策略聯系，在紅軍中與猛烈擴大紅軍的策略聯系，黨的目的是在組織全國五一運動以促進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

### 三 全國五一運動的經過

全黨都在這一路線之下動員，動員的結果，的確有偉大成績的收穫。據我們已經得到書面報告的統計，其內容如下：

一、從準備到五一，已經有報告者：

中心城市：上海，香港，武漢，哈爾濱，天津，唐山，北京，廈門，廣州，海口，  
啓東，江陰，蕪湖，安慶，龍井村，年陽。

鄉 村：溫州，王田，滋縣，延吉，南通，六安，德安，文昌，瓊山，湖口，定安，會樂，東江，海陸豐各縣。

二、五一的罷工：上海英界電汽車，江陰整個紗廠，啓州整個紗廠，海口印刷工人

，延吉洋襪，印刷，挑水，鐵工，土木等工人，北京印刷工人，唐莊子礦工人等。

三、五一罷課：上海幾校，延吉廿餘校，阜陽十三校，廣州美中，北京清華，天津中日，等校。

四、五一示威的羣衆：

地名	基本羣衆	參加示威的羣衆
上海	二千多人	二萬多人
香港	二百多人	未統計
武漢	一百多人	同上
哈爾濱	一百多人	一千多人
廈門	二百多人	五百多人
江陰	四百多人	未統計
啟東	六百多人	一千多人
阜陽	二千多人	三四千人
廣州	幾十人	未統計
天津	一百多人	五百多人

唐山(限於外礦)二千多人 未統計

玉田 幾百人 同上

磁縣 幾百人 同上

六安 十六萬人 同上

廬山 幾萬

南通 六萬

加上各紅色區域，當在一千萬以上，影響的羣衆，未列入統計。

五、五一攻下的城市：

五華，湖口，宣安，黃老門車站……

六、五一的宣傳品，其有報告者：

上海 三百萬

香港 二十餘萬

武漢 十二萬

七、五一運動黨與赤色工會的發展：

黨的發展：上海四百餘人

唐山外礦五十人

北寧路南廠與天津各數人

北京十餘人

香港十四人

工會的發展：上海幾百人

香港四百餘人

糾察隊的發展：上海二百十人

香港百人左右

唐山七十人

武漢幾隊

天津十五人

（此外青年團，童子團的發展，五一籌備委員會，未統計。）

從這一簡單統計上看出，今年全國的五一運動，普遍了全國中心城市與鄉村，這種廣大的動員，超出『五卅』與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大革命，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新紀元。

#### 四 全國五一運動的估計

人們對於今年全國五一運動，發生兩種極不正確的觀點：



第一個觀點，是從組織上出發，他們單舉出數目字來反證說，今年全國五一罷工，示威、以及組織上的發展，仍不廣泛，甚至有少數地方、被捕和開除的黨員比新入黨的黨員更多；因此，他們的結論是五一運動很少成績，或者甚至說失敗了。

第二個觀點，是單就五一示威來立論，不從整個五一運動過程着眼，他們說示威人數並沒有比以前增加得多，有些地方連示威都流產，這有什麼成績？他們和第一個觀點一樣的結論，五一是一失敗了！

這兩種庸俗的觀點，與取消派毫無二致，他們所得的結論，完全不合事實，這樣的結論，只有使他們動搖，懷疑，使廣大羣衆對他們失望。

我們從整個革命形勢與五一運動的全部過程中觀察，雖然今年全國五一運動未能完全令人滿意，未能達到客觀形勢的要求與容許的限度的完滿目的；但是全國五一運動是成功的，只能說這些成功，有許多『美中不足』。

我們單從主要的幾個問題上來估計，便知道我們獲得了偉大的成功。

一、全中國的五一運動與全世界的五一運動打成一片，這是開闢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配合聯繫的先例。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沒有得到世界革命的配合。帝國主義封鎖武漢，消滅上海暴動的勝利，包圍葉賀軍，以至摧殘廣州蘇維埃，當着這樣緊急的關頭，英法日美等帝國主義國內與所屬殖民地革命，未能起來，以

致中國革命只在蘇聯的幫助之下孤軍作戰，卒至失敗在帝國主義及其所羽翼下的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手裡。現在，完全不同於一九二七年，國際的革命浪潮，在資本主義的國內與國外，正在發展，與中國新的革命浪潮密切的聯系着，將平衡的配合着，表現在今年全世界的五一運動中，非常明顯。這是中國革命將要在全世界階級最後決戰當中取得完全勝利的特徵。

二，全國五一運動，匯合了各種革命勢力——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兵士暴動，紅軍發展。貧民鬥爭——推進着中國革命的更向前發展。我們看見，五一後，全國的農村比以前有更大的變化，南方各省土地革命更加深入，蘇維埃很迅速的擴大。平江，瀏陽，修水，大冶，黃石港，沔陽，六安，……的縣城，發生了暴動，成立了蘇維埃政府，紅軍的發展，至少在一倍以上，順直的直南與京東，從新出現三軍紅軍，遊擊戰爭正在發展與擴大，遼寧的延吉鄉村，亦爆發了農民的暴動。兩個政權的對抗，日益尖銳，國民黨政權日趨削弱與破產，蘇維埃的政權，逐日深長着。士兵的叛變與暴動，在軍閥戰爭的前方與後方，無限制的擴大。貧民反捐稅，鬧米荒的鬥爭，普遍到各省。特別是工人階級的鬥爭，劇烈的與日增長：上海自英界電汽車同盟罷工勝利後，油漆罷工，美亞同盟罷工，法界水電罷工，榮昌火柴廠罷工，江南造船廠罷工，永裕紗廠罷工，裕民機廠罷工，端鎔鐵廠罷工，黃包車夫罷工，電話的罷工，……罷工的浪潮，在

上海每天發展着。廣東，粵漢路工人怠工，漸汕荏船夫同盟罷工，武漢紗廠，碼頭，兵工廠工人鬥爭，唐山，天津工人反黃色工會的鬥爭，青島工人反對關廠，要求增加工資，反對國民黨工整會的罷工以至示威，同樣猛烈的發展。這些工人的鬥爭，一起來，便是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首先便要衝破武裝進廠，拘捕與屠殺，經過嚴重的政治鬥爭，才能爭得經濟條件的勝利，武裝衝突與流血，到處發生，成爲工人鬥爭在目前形勢下的特點。這是革命高潮到來的信號，將發展成爲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標誌。

三、全國五一運動，不但在城市中有各種羣衆集會，講演，示威，游行，以及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在鄉村中一樣的爆發各種羣衆的革命運動。紅色區域的武裝示威游行動輒是幾萬到幾十萬羣衆的動員，全國幾十萬的紅軍，赤衛隊，少年先鋒隊，都一致在無產階級與共產黨領導下參加這一運動。這又是第一次大革命所沒有的條件。第一次大革命當中，機會主義陳獨秀們，抑制農民運動，深怕農民『過火』行動，所以沒有引起廣大農民羣衆與工人有配合的積極參加第一次大革命，使工人階級失去他的同盟軍。

現在，完全不同於一九二七年的形勢，廣大的農民羣衆，非常熱烈的鬥爭着，在全國五一運動中，實行第一次全國城市與鄉村的總動員，這將是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組織全國武裝暴動的演習，這一演習是完全成功。

四、全國五一運動當中，帝國主義一直到取消派都異常恐慌，他們高叫着：共產黨

「暴動」，「盲動」，他們動員了海陸軍，巡捕，警察，以至工賊，他們佈置了鐵絲網，機關槍，坦克車，他們檢查行人，拘捕示威羣衆，抄查共產黨與赤色工會等機關，他們到處散播謠言，說「共產黨要羣衆到街上去送死」。在上海五一前夜有外國海軍的示威，各地入夜斷絕交通，……這些事實，證明敵人的動搖無恥。廣大羣衆絕沒有被他們所懾服，反而激起了羣衆對他們的憤恨，拚死的反抗情緒。我們看見，今年全國五一的示威，不但調動千萬以上的革命羣衆，而且調動了敵人一切的武裝力量，演習了一次全國武裝暴動的對壘。

五、全國五一運動中，只看見到處是共產黨的活動，到處是共產黨所領導的羣衆運動與示威，很少看到國民黨黃色工會召集羣衆會議或示威，只有徐丹，上海，天津，青島，有幾十到百人的工賊和國民黨員在五一關在屋裡開會，簡直沒有半個羣衆參加。

這是很明顯的，比去年五一國民黨黃色工會到處召集羣衆大會相差懸遠。不但五一示威是如此，目前各地工人罷工，有幾個是黃色工會領導的？除山東，順直黃色工會在羣衆中還有相當的力量，全國改良主義黃色工會在羣衆中的影響，隨着國民黨的破產，隨着黃色工會的法西斯蒂化，工賊化而日益縮小。這不是偶然的，這證明羣衆的日益的左傾，證明中國民主民族改良主義很快要送葬在革命的發展當中，了結他欺騙的過程。

六、全國五一運動，不但證明黨的路線完全正確，特別提高了黨在羣衆中的威信，

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便沒有五一運動。更明顯的是許多地方（如廣州）共產黨未能堅決的執行他的任務，五一運動便很少成績。共產黨在上海抓住了羣衆正確的情緒，克服了羣衆落後的情緒，然後才爆發了電車罷工，渡過了危急的關頭，取得勝利。上海工人自動的找老上海總工會，工聯會，找共產黨，香港工人怪赤色工會不通知他們去參加「四一三」示威，煙台看傳單的羣衆被捕後，自己承認是共產黨，各地工人罷工，多半是在共產黨領導或影響之下。這是表現共產黨成爲羣衆唯一的領導者，充分證明黨在政治上的成功。

七、全國五一運動當中，黨、團、赤色工會都有相當的發展，建立了許多新的共產黨的產業支部；上海，天津，北京，武漢，香港的黨都開始打進市政工人，交通工人中去建立起支部，特別是支部生活的建立，反右傾鬥爭的深入，有更多的成績。糾察隊，在幾個中心城市樹立起基礎，開始上海第一次成功的總檢閱，這些都是五一運動的收穫，將來革命勝利的基點，絕不能因其微弱而加以忽視。

以上是說明全國五一運動偉大的成功，這些成功是取消派和右傾份子所絕對不能了解的。我們讓他們去懷疑，動搖，咀咒吧！

#### 四 全國五一運動中暴露出黨內嚴重的右傾危險

全國五一運動雖然獲得了偉大的成功，然而的確包含了許多弱點和缺點。很明顯的事實，全國五一運動的成績，與客觀形勢的要求和容許的限度相比較，相差甚遠。

爲着五一的政治罷工，尙不多見；五一的示威，在中心城市調動的羣衆，尙不寬廣；五一籌備委員會在各廠各校的建立已經很少，又多屬於形式的；公開路線的運用，未能深入羣衆；糾察隊，赤色工會，黨，團的發展，很少成績；婦女與青年的工作，一般的注意得非常之少；特別是黃色工會有基礎的工廠，未能捲入罷工浪潮，根本消滅黃色工會；一般的政治宣傳鼓動，仍不充分；擁護全國第一次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宣傳與行動，更是缺乏。這些缺點的主要來源，是爲黨內嚴重的右傾所障礙。

一、許多黨部或黨員對客觀的形勢估量不夠，他們對全國五一組織罷工示威的路線，發生懷疑。滿洲，廣州，順直，武漢黨內都有一部份人發生『除外主義』的口號。我們以滿洲爲例，看滿洲黨內一些黨員如何懷疑五一運動呢？他們說：

『滿洲羣衆政治水平線低，鬥爭經驗缺乏，黨和團的組織薄弱，因此中央七一號通告在滿洲不能實現』。

『滿洲可以組織五一政治罷工，但比關內更多困難』。

實際他們落在羣衆後面，哈爾濱『四一』到『四五』以後的鬥爭，立刻回答了這種不正確的估量。哈爾濱五一有一千餘人的示威，被右傾的份子幾乎斷送了，第一次沒

有發動，第二次用了很大的力量戰勝右傾份子之後才堅決的發動起來，搗毀日本領事館，到蘇聯領事館門前熱烈的喊出『保護蘇聯』的口號。

各地黨部，多半是發動工人經濟鬥爭聯系到五一示威，將五一示威與政治罷工分開，更是一般的現象。他們不了解，目前政治罷工的口號，已經變成了羣衆迫切的要求，沒有嚴重的政治鬥爭，便很難取得經濟的勝利。因為他們沒有以政治口號作中心去組織五一的罷工和示威，所以許多可能爆發罷工的工人，未能參加五一運動。

二、在農村中被富農意識所籠罩，在五一運動中，未能堅決的組織地方暴動，奪取城市。在東江，不加緊城市的工作，單純靠紅軍攻打城市，結果使羣衆受挫折感覺倦憊。在浙江，發生攻打杭州的觀念，而不加緊杭州城市的工作以及和上海的配合。農村黨的右傾（有的表面似左，實際仍是右傾），障礙農民暴動發展到最高形式——地方暴動。

三、紅軍中過去遊擊戰術的觀念，障礙着猛烈擴大的路線。他們有些部隊還是將所奪得的武裝分散給農民，還是在偏僻的鄉村，帶東擊西的作戰，還未能與當地的羣衆配合，奪取交通要道，向着中心城市發展，特別是朱毛紅軍第四軍，表現得明顯。

四、在士兵運動中，還多停留在士兵的日常鬥爭與組織兵變，還未能堅決的提出『組織兵士暴動』，領導兵士與當地工農配合奪取地方政權。在軍閥戰爭的陣綫上，發

動的兵士鬥爭。仍然很少，特別是對軍閥戰爭失敗主義的工作，執行得非常不充分。

五、組織上的右傾觀念，尤其嚴重；特別是將組織工作認為技術工作的機會主義的觀念，在黨內障礙着組織的健強。發展組織的保守與狹隘的觀念，更形成右傾的基礎。

所以，全國五一運動中組織的發展，異常薄弱。

以上的現象，證明目前黨內最危險的仍然是右傾。現在當紅色五月終結之後，革命形勢已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只有堅決的作反右傾的鬥爭，深入反右傾鬥爭到支部中去，才能執行黨的路線，才能領導羣衆的政治鬥爭，推進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爭取蘇維埃中國的勝利。

一九三〇，六，二二。



# 蘇聯集體農業運動近况

楊新松

## 改造農村

使農業機器化，使農民集體化，使農村與城市的區別漸漸的消滅，使農業經濟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中之一個。

農村機器化的問題在蘇聯五年計劃內差不多已經完全解決了的，無數的製造耕種機及各種農業機器的工廠已在建築，其中有好幾個到現在已建築成就了，許許更多的耕種機及各種農業機器已在向鄉村運送。在最初計劃五年計劃時的計算到一九三三年在蘇聯每年能生產五萬三千個耕種機和總共能有二十二萬個耕種機，可是據最近的計劃到那時在蘇聯每年能生產二十萬以上的耕種機和總共能有由八十萬到一百萬個耕種機。無疑義的在最近的將來耕種機定能佈滿蘇聯遼遠的和僻靜的農村，無疑義的在最近四五年以後，蘇聯能成爲一個在世界上第一個出產農業機器的國家。

改造農村，使農業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祇靠機器化是不能夠的。除此以外還必須使散漫的農民團結起來去使用必需共同勞動的機器，在他們共同勞動之下漸漸的以消滅農民的很深厚的私有觀念，催促他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很明顯的，使用偉大的機器去耕種田地必需要有許許多多農民共同的勞動，散漫的，零星的，個獨的農業如果不

把他們集合起來是絕對沒有方法去使用偉大的機器和最新的技術。同時，如果沒有農民集體的共同的勞動是絕對沒有可能去消滅他們的私有觀念。我們知道，取消私有觀念，消滅私有制度，共同勞動，共同分配是建設社會主義必需的條件。那麼，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除農業大工業化以外當然還要使農民團結起來共同的勞動，使農業集體化，發展集體農業運動。

### 什麼是「集體農業」？

集體農業就是在鄉村裏農民共同勞動的合夥的各種組織，這種的組織在現在的蘇聯總共有三種——同勞社，勞動社，和公社。這三種的組織有一個總的共同點，就是加入該社以後，每個農戶從前向國家所領取到的耕種田地的界限完全取消，每個社員過去所耕種的田地都歸該社公共的使用，其次耕種田地都是站在共同勞動的原則上的，沒有什麼某一塊田應該你去耕種，某一塊田應該我去耕種。他們互相間分別的地方就是：同勞社和勞動社同前一二年在中國醴陵農民暴動勝利後農民所組織的「共耕分吃」和類似的，就是勞動的時候是各社會共同的合作，勞動的結果按照每個社員工作的能力，按照每戶工作人員之多少而分配之。生活每戶各個獨立的，總之，就是共同勞動分立生活。這就是同勞社和勞動社的總的現象，他們的中間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同勞社田地雖大家共同耕種而生產工具（牛，馬，及耕田地的一切家伙）還是每個社員各自的私

有，如果該社要使用某家某種生產工具，或牛，馬的時候應有相當的報酬，因此在同勞社內還免不了間接的互相剝削勞動的現象。在勞動社內互相間接剝削的現象就沒有了，在那裡主要的生產工具都為該社所公有，在那裡沒有什麼那一隻耕牛是你的，那一匹馬是我的，但是居住的房屋，自吃的菜園，奶牛，家禽，家畜等還準許各自私有。無論如何勞動社是要比同勞社進一步的；公社是集體農業中最高形式的組織，在那裡不但共同勞動，而同時共同的分配。這個組織是與過去中國醴陵農民的「共耕分吃」相彷彿的，在那裏一切財產，無論是雞，豬，牛，馬，房屋，園田及一切器具是都歸公社所公有的，在那裡吃飯共同的，一切的消耗，如穿衣服及各種日用品是不按照勞動能力而按照每人所需要而平均的分配之。總之，公社是已取消私有制度的、共同勞動共同分配的組織，是將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小小的雛形。

### 集體農業運動

在蘇聯突飛猛進的發展是過去誰也沒有料想到的，在五年計劃內預定在五年內將全國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戶組成爲集體農莊，可是在今年二月間已有百分之五十集體化的農戶了。這樣偉大的勝利是對於整個的工人階級，對於他們的領導者——蘇聯共產黨，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有絕大的意義。這樣偉大的勝利完全證明蘇聯共產黨對於農民的政策之正確，是完全證明工人階級能領導農民去改造他們的社會經濟的基礎。

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目前蘇聯共產黨的責任就是：「鞏固已得的勝利和有計劃的應用牠，以備將來向前進行」（斯大林）。

集體農業運動在這種風驟雲湧的勝利中間，使得各地黨的蘇維埃的，及一切集體農業運動中許多領導工作的同志弄得頭暈顛倒，集體農業這樣迅速的發展，他們以為自己的力量不知有多少大，他們認為「我們什麼都能幹」，「一切都是小事」，「在世界上沒有難事的」，他們輕看了集體農業運動工作之複雜和困難，他們認為組織集體農莊用不着什麼預先準備，用不着去顧到各處地方情形之不同，祇要下一個「命令」就夠了，用不着經過什麼集體農莊的過渡到公社的形式——同勞社和勞動社，一開始就組織公社多麼簡單呢，因他們犯了這些錯誤使得黨在農民中間失掉不少的威信，集體農業運動受了不少的損失。

### 各地作領導工作的人員主要的錯誤

一，違犯列寧主義的組織集體農莊自由的原則。根據列寧的遺言，祇有站在自由的原則上才能組織集體農莊。組織散漫的農民到共同耕種的道路是不應有任何的強迫手段，無論任何強迫的手段是沒有可能把他們組織起來的，祇有在實際上將集體農業對於農民的利益表顯給他們看，在散漫的，零星的農村經濟的面前，樹立模範的集體農莊，使得周圍的農民感覺必須組織自己，使他們自願的來組織集體農莊，到那時集體農業

運動的勝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不然，集體農業運動就要失敗。

可是有許多各地參加實際工作的同志，將這樣最淺近的組織集體運動的列寧主義的自由原則完全忘記了。有許多地方他們曾經預先什麼也不準備，很倉忙的用強壓的手段硬拉農民組織集體農莊，有些地方因農民不服從他們的『命令』，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時候，他們就紙面上空口的宣佈當地全區集體農業化，把那些不服從他們的農民（尤其是中農）當作富農看待，將他們的財產一切沒收，把他們驅逐出境。這樣一來使得一部分農民開始仇視集體農業運動，開始懷疑黨對於他們的政策，幾乎使集體農業已得的勝利動搖起來。

二、他們忘記了集體農業運動在各種不同情形的區域內應採取各種不同的步驟和方法。他們忘記了在蘇聯有各種經濟條件和農民文化程度高低的區域之存在。他們忘記了在蘇聯有幾乎完全自然經濟的，已商品化的，已工業化的各種不同的農業區域之存在，而把牠們都當作同類的看待，而都大聲疾呼的：『全區集體農業化！』！『全區集體農業化！』……。

在今年一月聯共中央關於集體農業化的議決案上說得很明顯的，在那裡將全蘇聯劃分為三大區：第一是蘇聯主要的穀麥區域，北高加索，中鵝兒克江區，和下鵝兒克江區，集體農業運動在一九三一年春季告結束；第二，其他的穀麥區域（烏克蘭，中央黑地

州，亞伯利亞，烏拉領等等）集體農業運動到一九三二年春季告結束；第三，其他的區域集體農業化可以延長到一九三三年。

可是在實際怎樣呢？例如莫斯科特別區完結集體農業化雖然還有三年的期限（到一九三三年），可是當地的同志開始就想在今年的春季把他結束，中央黑地州結束集體農業化雖然還有兩年的期限，可是他不要『落伍於別處』亦準備在今春完結。而其他更落後的區域也公然的想『追上和超過』前進的區域。這樣一來，很明顯的，對於集體農業化還沒有相當準備的，還沒有相當條件的區域想『追上和超過』比較有準備的，有條件的區域，當然必須要採取強壓的手段，硬拉農民加入集體農莊。這種強壓的結果，很明顯的不但不能使集體農業運動向進一步，而反要使他向前後退步。

三，破壞集體農業運動現時的主要形式，違犯了列寧主義的領導羣衆運動的原則。斯達林同志在他的『因勝利而頭暈』的文章上說過：『人爲的領導是很嚴重的事情，不可落伍於運動，因為落伍就是脫離羣衆。但亦不可跳到前面，因為這是失掉羣衆的聯繫。誰要領導運動和保存與千百萬羣衆的聯繫，他就應該在兩條戰線上奮鬥——反對落伍者和反對前跳者』。這裡的意思就是說凡是領導羣衆運動者，尤其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共產黨員在領導各種運動的實際工作上首先應嚴格的估計運動的現狀及其變移，根據實際情形，顧及羣衆的需要和情緒，下一定的原則，採取相當的策略

，不要脫離羣衆，推動羣衆運動向前進展。

蘇聯根本的改造農業開始才不久，農業機器化雖然已在迅速的發展，但論其整個的情形其實還很幼稚，廣大的集體農業運動開始不到一年的光景，牠還在中途，還沒有鞏固，大多數農民（尤其是中農）對於集體農業還沒有十分的認識清楚，一般農民私有財產的心理還非常濃厚，因此，聯共中央在今年一月關於集體農業運動的決議案上認為農村的勞動社最適合於現時的集體農業運動。這是很明顯的，同勞社不能適合於已在中途的現時的集體農業運動，因為牠是私有制度很濃厚的共同勞動的組織，是集體農業運動最初期的組織，是已經過去的組織。同時農村公社亦不適合於現時的集體農業運動，因為牠是幾乎完全取消私有制度的組織，是最高形式的組織，是結束整個的集體農業運動的最後組織形式。如果我們認為同勞社是現時集體農業運動的主要形式，那麼，我們就落伍了運動，脫離了羣衆，如果我們認為公社是主要的形式，那麼，我們就跳在集體農業運動的前面了，失掉了與羣衆的聯繫，因此，『……要領導運動和保存與千百萬羣衆的聯繫』勞動社是最適合現時集體農業運動的組織，因為牠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公有的，私有制度比較淺薄的，共同勞動社的組織是集體農業運動中途的組織，是由初期組織過渡到最高形式組織的組織。

可是各地領導集體農業運動的同志，被初步勝利所醉迷了將領導羣衆運動的列寧主

義的原則，將聯共中央的決議案完全忘記了，他們在實際工作上拋棄了集體農業現時的  
主要形式——勞動社，而『命令』將初初加入集體農莊的，私有財產的心理很濃厚的農  
民，都硬迫他們組織最高形式的公社，用強迫的手段將他們家禽，自吃的奶牛，居住的  
房屋，自吃的菜園等，都歸社有。這樣一來，將小胆的農民（尤其是中農）嚇壞了。  
結果，當然阻礙了集體農業順遂的發展。

這些是集體農業運動上主要錯誤。但這些錯誤對於工人階級有什麼危險呢？很  
明顯，如果讓這些錯誤自然的繼續下去，結果必然破壞集體農業運動，使工人階級失掉  
鄉村裏的主要的同盟軍——中農，使貧農在農村失掉作用，減弱社會主義建設全部的力  
量，傾向恢復富農。總之，這些錯誤能將工人階級由與主要農民羣衆鞏固聯盟的，領  
導農民改造自己社會經濟地位，由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推到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  
失掉農民羣衆的道路。

### 向破壞黨的路線奮鬥

當然，在斯達林同志領導下的列寧的聯共中央所管轄下的蘇聯境內這種無原則的，  
無聊的，不負責任的事情不能讓牠自然的繼續下去。在上述這種現象發現不久，聯共  
中央就見到了，當時就委托斯達林同志作一篇警告違犯黨的路線的人們的文章——『因  
勝利而頹暈』登載全國各報，同時聯共中央在三月十五日的決議案上宣佈堅決的向破壞



黨的路線者奮鬥。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決議案上大概就是說：絕對禁止在集體農業運動中用強制的方法，同時在自由的原則上極力的吸收農民羣衆加入集體農莊，鞏固現有的集體農莊，鞏固集體農業運動已得的勝利，在集體農業運動還未成熟的地方和沒有上級機關的許可，絕對禁止直接的組織農村公社和即刻停止強迫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將他們的居住房屋，家禽，家畜，非商品的奶牛歸社公有，嚴格審查已被取消的富農的名單和即刻改過對於中農已犯的錯誤……等。這個決議案不是空洞的，而是很切實的，在該決議案最後一條說：『沒有能力的或不願意破壞黨的路線作堅決的鬥爭的工作人員撤退職務，以別人代替之』。

在斯達林的文章和聯共中央的決議發表以後，各地黨的組織都重新審查自己在集體農業運動上執行黨的總路線是否正確，大多數地方黨的組織都承認自己的錯誤，即刻改正自己的錯誤，極力的在農民羣衆宣傳真正的黨的路線。祇有少數同志如過去在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者的陳獨秀，譚平山等式的人們自己犯了錯誤而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對於這樣的人們布爾塞維克的黨當然不客氣的要堅決的向他們奮鬥，撤退他們的職務，處罰他們，甚至於開除他們出黨。

犯了錯誤，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不願意改過自己的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本來，錯誤在鬥爭中是不能免的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非是羞辱的事在布爾塞維克的觀

點下而是很英勇的事。犯了錯誤，承認這個錯誤，即糾改過錯誤，在錯誤中學習，免去將來的錯誤，在錯誤中找到正確的道路，更踴躍的前進奮鬥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戰鬥員。

現在的情形。在斯達林「因勝利而頭暈」的文章和聯共中央向違犯黨的路線奮鬥的決議發表以後，已被取消的富農分子和在富農影響下的反動勢力的殘餘，用「自由」的口號去宣傳中農，使他們來反對集體農業運動，反對在農村中無產階級的領導，結果有許多已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尤其是從前被硬拉進來的中農）大批的退出集體農莊，恢復他們的個獨的農場。可是大多數的貧農，一部分覺悟的中農都沒有動搖，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都很踴躍的，在集體農場內極力的擴充耕種田畝，提高和鞏固集體農莊的經濟，對外堅決的向富農的殘餘及農村間一切反動勢力（天主教堂，教士等）作堅決奮鬥，同時猛烈的同無組織的農民，已退出集體農莊的農民宣傳真正的黨的路線，宣傳集體農莊對於他們的利益和在春耕時期在事實上證明給他們看。在最近一二月間各地黨的組織在鄉村裏極力向農羣衆宣傳真正的黨對於集體農業運動的政策，同樣的在城市向工人羣衆宣傳，另一方面聯共中央在四月二日命令蘇聯的政府定出優待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的決議案，在兩年期內完全免去在集體農莊內，牛，馬及一切牲畜的捐稅，無條件的取消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在未加入前他們所欠國家的農業捐，各種的處罰……等等

。所以這樣的結果，大部分的農民關於黨對於他的政策，集體農莊對於他們的利益漸漸的都了解起來了，不久退出集體農莊的農民都懊悔自己過去的錯誤了，大批的都請求重新新的加入集體農莊。不但這樣，在這些農民中間有許多並且請求加入共產黨。這種現象就是證明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政策之正確，證明蘇聯共產黨在集體農業運動中所採取的政策之正確，證明聯共中央能夠領導黨的羣衆，整個的工人階級去引導農民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 結論

蘇聯的農村已走上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農村機器化是這個改造的技術的基礎，集體農業化已成了這個改造的槓杆了。在集體農業運動中各地雖然犯了許多的錯誤，幾乎動搖了集體農業運動，但因聯共中央善於領導，很快消滅了這些錯誤，鞏固了已得的勝利，重新的又開始了領導集體農業運動向前進行。

莫斯科 一九三〇年四月廿日



# 蘇聯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代

之華

## 一 偉大的轉變

中國工友們！你們的祖國——蘇聯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中有了很大的成績。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十月這一年是社會主義建設各方面偉大轉變的一年，這個轉變，就是社會主義向城市及農村資本主義成分舉行極堅決的進攻。在這一進攻的階段中的成績可分為三方面：

(一)就是在勞動生產率方面：在這方面達到了可以決定一切的轉變。這一轉變的表現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數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創造的自動性和強烈的勞動與奮性的發展。所以能發展創造的自動性和強烈的勞動與奮性的緣因在於這樣的方法：

A 是用自我批評的方法來和壓制羣衆勞動自動性與勞動積極性的官僚主義作鬥爭。

B 用社會主義競賽方法來和偷懶者及無產階級勞動紀律的破壞者作鬥爭。

C 用進行不斷生產制的方法來和舊習慣和生產中的守舊派作鬥爭。

有了以上的三種方法在勞動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成績，這種成績的意義很大，因為只有成千成萬的羣衆的勞動的熱情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向前發展。

(二)就是工業建設方面，在這一年內蘇聯在基本上已經把大規模建設重工業的基

金積累問題解決了。在生產工具的生產中已採取了很快的速度，並造成了一種先決的條件，把蘇聯的國家變成了五金業的國家。工友們，你們看看蘇聯雖然在世界帝國主義包圍之中，但是在經濟上一天一天地進步，這些進步他們完全靠自己——工農兵的力量，勝利地解決了重工業的基金問題，關於這些事實就是工人階級的敵人也不能否認了。實際上：一九二八年投入大工業內的基金，共有十六萬萬多盧布，其中有十三萬萬盧布是投入在重工業內面的，而一九二九年投入大工業內的基金，則有三十四萬萬多盧布，其中有二十五萬萬盧布是投在重工業內面的；一九二八年大工業生產品總量，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業的生產品是增加百分之三十，而一九二九年的大工業生產品總量則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業的生產品總數又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六，這種工業發展的速度是使全世界資產階級都害怕起來了。蘇聯和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奇怪起來了，布哈林所害怕的五年經濟計劃的最高標準，實際上已變成五年經濟計劃的最低標準了。

(三) 農村經濟建設方面的成績，就是蘇聯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由小的落後的個人的經濟，轉變為大的先進的集體的經濟，轉變為共同耕種，轉變為機器的耕種機站，轉變為建築在新技术基礎上的合作社和集體農莊，轉變為巨大的為百數的耕種和收穫機所武裝起來的蘇維埃農莊。農村經濟建設的發展有了偉大的意義，就是在許多區域

內，已經把農民的基本羣衆，從舊的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個道路只對於少數的富裕資產階級有益，而使極大多數的農民陷於貧困）轉到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只有這個道路才能達到消滅農村資本主義的成份，而將中農和貧農重新武裝起來，就是用耕種機和其他的農村機器，將中農和貧農武裝起來，使他們脫離貧困和富農的剝削，而走上廣大的協作的集體耕種的道路。工友們！你們看了以下的幾個數目字就能够明白蘇聯在農村經濟方面的成功。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莊的耕種面積，共有一百四十二萬五千畝，其五穀商品量，共六百多萬担（約三千六百五十萬普特），集體農莊的耕種面積，共有一百三十九萬畝，其五穀商品量約有三百五十萬担，（約二千萬普特）。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莊的耕種面積，共一百八十一萬六千畝，其五穀商品量約有八百萬担，（約四千七百萬普特）；集體農莊的耕種面積，共有四百二十六萬二千畝，其五穀商品量，約有一千三百萬担（約七千八百萬普特）。至於在一九三〇年，則照他們的標準計劃，蘇維埃農莊的耕種面積就應達到三百二十八萬畝，其五穀商品量，却要達到一千八百萬担（約一萬一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的耕種面積，則要達到一千五百萬畝，其五穀商品量，應達到四千九百萬担，（約三萬萬普特）。換言之，就是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的五穀商品量，應達到四萬萬普特以上，就是說，要達到整個農村經濟五穀商品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指在農村以外的五穀流通數量而言）。

集體農莊建設方面這種空前的進步是有許多原因的，其主要的。

第一是因為蘇聯共產黨實行了列寧主義的教育羣衆的政策，和能夠有系統的用合作化意義的方法，來引導農民羣衆走到集體的經濟。就是說黨對一切傾向進行了一種勝利的鬥爭：一方面和那種超過運動與企圖破壞集體農莊之發展的傾向（「左派」的詞句）的半托洛斯基派鬥爭，別方面和那種企圖把黨拉往後去甘作運動的尾巴的傾向（布哈林一派）作鬥爭並且戰勝了這種左的右的鬥爭。

第二因為蘇維埃政權能夠正確地計量到農民羣衆的需要，計量到農民對於新農具的需要而加以實際上的幫助，如設立農具租借處，耕種機隊，農業機器站，如進行共同耕種，設立集體農莊以及用蘇維埃農莊的力量來從各方面幫助農民經濟等等。從此農民就脫離舊的耕種而走上了集體經濟的運動的道路。

第三因為蘇聯國內的先進工人能把這種事業，抓到自己的手裡，能實行領導基本的農民羣衆使他們相信並努力集體經濟的運動。

蘇聯在經濟方面的發展已如上述，根據這種實際狀況，就已經把資產階級國家的「科學」家的預言——反對五萬畝和十萬畝的巨大的五穀工廠，以爲這是不可能而且不適宜的等等——完全破產了，尤其把黨內的右派機會主義者的斷言打得粉碎——他們認爲（一）農民是不會到集體農莊內來的，（二）加緊集體農莊發展的速度，只足以引起羣



乘的不滿意，引起農民和工人階級的聯盟的破裂，（三）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大道，不是集體農莊，而是合作社；（四）發展集體農莊和進攻農村中資本主義成分就會把蘇聯國家變成沒有麵包的國家。事實上恰恰相反，農民羣衆帶着整個的鄉村，鎮，區，跑進集體農莊來了，在新的生產上的基礎中加強了工農羣衆的聯盟，所謂鄉村社會主義的「大道」自然是初步的合作形式，即供給和消費的合作社；可是當高度的合作形式就是集體農莊形式，所以集體農莊形式就成了鄉村發展的大道了。右派份子忘記了時候性，看不見社會主義的改造在那裡進步的。蘇聯正因為有了集體農莊運動的發展向鄉村資本主義成分進攻才能在目前穀類收穫事業上有這種巨大的成績在國家手裏聚積了幾千萬普特的穀類儲蓄，使國家跑出了麵包的危機。

工友們！蘇聯的經濟建設的進步就是可以保障工人的利益，尤其對於與蘇聯最接近的中國工人直接地能夠得到革命運動幫助，直到完成革命以後的經濟建設。所以我們聽了這些消息以後應該高舉我們的紅旗來慶祝蘇聯的勝利！

## 二 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策略問題

（一）

列寧在自己寫的一篇文章上（在無產階級獨裁時代的政治經濟）這樣說「無產階級獨裁時代，俄國的經濟是共產主義所結合的統一的偉大國家，與小商品生產，保存着的

資本主義，以及在他的基礎之上復活起來的資本主義初步的鬥爭」。

列寧常常反對機會主義者的說法，什麼小資產階級的小商品生產好像與社會主義生產的形式是一樣的，又如布哈林，認為小生產可以生長到社會主義而且因此就說富農可以生長到社會主義。列寧主義恰恰相反，他認為小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它不能夠生長到社會主義而且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轉變中改造經濟的時候要與小商品經濟作鬥爭的。

無產階級是否能夠用強力去強迫小農走到大的社會經濟的原則上呢？無產階級對中農的政策是否也能用強力的呢？關於這個問題在列寧的一篇「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文章上這樣地寫着：

「社會主義是消滅階級的，為要消滅階級首先要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這個任務我們已經執行了，但是這不過是一部分的任務，並且不是最難的，為的要消滅階級，應該有第二步，就是要消滅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分別，使他們都變為工人，但是這不能立刻做到的，這個任務比較的更要難些更要長久些。這個任務不能以推翻任何階級來解決的。只有組織和改造一切社會的經濟，就是從單個的特別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大的社會經濟，才能夠來解決的」。

因此在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對於中農的關係是建築在集體經濟的道路之上的，使農民

自己明白不能夠再過舊的生活，只有過渡到集體經濟的形式才是他們的出路。

(二)黨的經濟政策的轉變及其轉變的前提

爲什麼在現在時候可以提出消滅富農階級了呢？應該在些什麼條件之下消滅富農階級呢？

第一消滅富農階級與鄉村小商品生產制度的存在有密切關係，在鄉村中還是小商品生產制度的時候就不能夠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任務：列甯曾經說過「小商品生產在羣衆範圍之內不斷地每日每時的自然的生產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第二消滅富農階級與整個區域集體農場化不可以分離的。廣大的中農羣衆甚至貧農羣衆還沒有在自己的經驗中信任大的集體農場的優點的時候，富農在經濟問題上還有很大的威信的時候，農民羣衆還沒有能夠很明白認識未來的大的集體農場的利益的時，廣大的農民羣衆還沒有團結到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時候，那就不能直接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任務。

我們應該要明白現在蘇聯社會主義的改造已經進到了一個新的時期，斯大林同志說「現在我們已經有可能去堅決的進攻富農，消滅富農的反抗以致消滅富農階級，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生產來代替富農生產。現在貧農和中農羣衆自己起來沒收富農的財產實行團結到集體農場中來，現在在鄉村中整個集體農場的沒收富農財產已經不是一

個簡單的行政辦法。現在沒收富農財產是發展集體農場的組織部分了」。

從限制和排擠資本主義成份轉變到整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這是黨在解決問題上的主要策略之一。

右派機會主義者不瞭解一切問題的時候性和實際環境的變動，他們常常喜歡把過時的策略應用到現在來，對於富農問題他們認為我們已經戰勝了富農不成問題了，現在只要來完成這個勝利好了，反對進攻和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他們的目的完全要避免階級鬥爭，避免堅決地打擊富農這是亡黨的政策，這是蘇聯黨內主要的危險。同時黨還反對另一種左的過分的傾向，就是趕過羣衆運動，而且把中農也當作富農一樣來「消滅」，用強迫的手段對付中農，這種傾向可以破壞集體農場運動的進行的。

### 三 消滅富農階級和國家經濟的突變

黨對於富農的政策是根據於整個國家經濟變動而決定的。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漸漸地把市場式的關係去掉，而代之以有計劃的有組織的分配方法。

蘇聯的經濟組織完全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蘇聯國家的政權在無產階級手裡，一切生產機關就在無產階級管理之下，他們有生產合作，消費合作社等等的組織，在鄉村的經濟組織是這樣的，就是每個鄉村中都有勞動社的組織在幾個鄉村之上就有總的聯合會。各勞動社在生產和消費兩方面要與總聯合會締訂條約，在這條約上就規定着，勞動

社的任務是把有組織的有計劃的鄉村經濟生產品和多餘下來的生產品供給國家和總聯合會，同樣，國家和總的聯合會的任務要供給勞動社所須要的生產工具和消費品等等，這裡我們就可以看見在蘇聯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生產的成份。

現在蘇聯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就是應該要來造成功社會主義的社會的經濟基礎。列寧教訓我們在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是容許有資本主義存在的，我們要限制它一定的發展，同時到了一定的時候必須要跳到它的前面就是說從資本主義成分與社會主義經濟的競爭的階級轉變利用社會主義的力量來消滅資本主義的成份。現在蘇聯的客觀環境已經證實了新經濟政策到了第二個時期，就是要堅決地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的時期了。列寧說『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新經濟政策完全可以保證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的』。

只有盲目的人才會重復了托洛斯基和齊諾維夫等反對派的觀點認為新經濟政策是有系統的退守政策，認為史太林的發展生產力的方針是引導到降低社會主義成份的比重，實際上他們表露了自己的叛徒行為不信任在蘇聯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

右派機會主義者也與這些人一樣在這些問題上是失敗了，他們忘記了在社會主義生產力強大和階級力量相互變換的時候新經濟政策的形式和內容應該變更，他們竟停住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時期，不懂得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工業的速度和集體化的成績，在生產

關係上建立了工農聯合的基礎，鞏固了城市工人領導中農貧農羣衆的力量來改造鄉村經濟的生產制度造成消滅階級的條件。他們恰恰相反認爲進攻富農和消滅富農階級是破壞工農聯盟的政策，可是事實已經證明他們錯了，進攻和消滅富農的政策是列寧主義的路線黨執行了列寧主義路線所以在改造社會主義的實際上得了偉大的勝利。

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是工農聯合的消費形式，第二個時期是工農聯合的生產形式，就是因爲農民不但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不但城市工業化，而且鄉村也要工業化消滅工農之間的分別，大家共同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誰來反對工農聯合的生產形式，誰認爲全部新經濟政策的意義是給小生產者的商業自由，誰就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路線。

斯大林對於新經濟政策問題這樣說的，『新經濟政策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特別政策，是爲有經濟命脈的無產階級國家領導之下的資本主義存在而準備的，爲資本主義成份和社會主義成份的鬥爭而準備的，爲社會主義成份作用的生長，資本主義成份損失下去而準備的，爲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而準備的，爲要建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消滅階級而準備的。誰不懂這新經濟政策的雙重性，誰就離開了列寧主義的路線。』

他又說『應該要揭穿這樣的錯誤，有些人認爲新經濟政策只爲了城市和鄉村間的聯系，不錯，我們是需要城市和鄉村間的聯系的，但是我們不是需要隨便什麼的城市和鄉

村的聯系，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夠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工農聯繫。我們要保存新經濟政策就因為新經濟政策為社會主義而服務，如果當它不能為社會主義而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放棄它，列甯說，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嚴重的，長久的，但是他從沒有說過實行新經濟政策是永遠的。」

從此，我們知道了蘇聯黨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在目前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上所必須的政策，蘇聯的共產黨雖在絕困難的環境中，但是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之中得了極偉大的成績，現在不但在都市有很大很好的機器，就是在鄉村中也有了許多機器，耕田是用機器了，所以農民都集中到有機器耕田的集體農場去了。他們也與城市工人差不多了，他們的生活都比任何國家的工人和農民要好，他們每天只做七小時工作，有的只有五小時，他們做四天工可以休息一天，他們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工人的生活。





# 四川革命形勢的開展及其發展的前途

寬陽

## 一 一切危機矛盾的到來

四川天字第一號的軍閥劉湘曾在年底說『三月內勿論如何統一四川』，事實把他這一誇大的囑語投到馬桶內去了。

劉湘軍閥不能統一四川，也如蔣介石或任何一個軍閥不能統一中國一樣。

自然劉湘軍閥相當的代表着重慶的商業資產階級和自井的鹽業資本家，幻想着用自已優越的經濟基礎和南京蔣介石政府的政治背景，把四川形式地——至少是使各派軍閥就他的範圍——統一起來，使他所代表的重慶大商人和自井井灶主能得着相當的發展，因此他一面極力完成成渝馬路的計劃，一面與廿四軍劉文輝公布了『整理鹽業的條例』。

可是，在帝國主義加緊進攻中國所爆發的南北軍閥混戰，反映到四川的各派軍閥也極力準備着猛烈的廝殺。同時，各派軍閥爲要把握勝利的前途，必須等待全國軍閥混戰有了一個決定勝負的象徵，然後才作總的爆發。事實上全國軍閥的混戰，在帝國主義竭力幫助和推動之下，絕不是一個短的時期所能解決，而形成起伏的長時期的紛亂。四川受着這樣外感症的傳染，也同樣在一個大的醞釀過程中，隨時要爆發一些局部的戰爭。所謂『遂寧會議』，『成都會議』，『瀘州會議』，『營山會議』，『順慶會議』……等等，都

是這一矛盾之具體的說明。

最近特別是川東的戰爭走到了爆發之焦點：一個動力是劉湘爲完成其統一四川迷夢之第一步統一下東的計劃，解決橫互渝萬之間的陳蘭亭部隊。一個動力是劉湘要拉攏楊子惠停止其覬覦重慶而投入二層將領的聯盟中。爲要實現這一政策，只有助楊子惠進攻劉存厚，取得綏屬數縣的防地以安插其二萬餘無飯喫的部隊。

劉湘真能統一四川麼？只要不是客觀上幫助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取消派，他絕不能作一個肯定的答覆。主要的原因，是四川比其他各省所帶的半自然經濟更濃厚，更沒有一個統一全省的地方市場，也就更容易反映全國以帝國主義爲背景的軍閥混戰，這一反映更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在這一形勢之下，無疑的要加重人民的負擔，除了負擔幾個大的軍閥之統籌的軍費政費而外，又必須擔負各小軍閥——二層將領——在自己防區內之苛捐雜稅之剝削。劉湘雖然他企圖很快的完成成渝馬路，雖然很願意自井的鹽業恢復起來，可是，爲了戰爭的需要，不能不拉用并勒征馬路款以購置飛機。不僅自動的取消了「鹽業整理條例」，（裡面有「不征附加」之規定）而且宣布了「每担鹽勛，於正稅項下，加繳五角」之明令。這是充分的證明了民族資本在帝國主義加緊進攻中國之下，是不能突破這一危機走上統一市場的道路。我們可以結論到「四川只有長期的軍閥混戰，沒有統一於任何一

個軍閥的可能」。

軍閥混戰之準備和趨勢，是這樣顯明而險惡：劉湘從德國購回了十餘架飛機（已到重慶戰鬥機六架）千餘架機關槍，二千餘手槍及最新式的步槍。同時在重慶趕造拍擊炮，快中快，擲彈槍，以及各種步槍子彈。劉文輝與田頌堯在成都拚命的搶奪兵工廠，爆發了一月十四成部南門外的巷戰。鄧錫侯也加緊的製造槍彈，各小軍閥如羅澤洲也在順慶兵工廠趕造新式械彈，特別是每個大軍閥都祕密的趕造毒瓦斯以及炸彈。劉湘在重慶，梁山兩處建築了飛機場，成都鄧，田，劉的部隊隨時互相警戒，楊子惠在渠縣一帶佈防，劉存厚準備向梁山方面禦戰……這許多的事實擺在全川人民的面前，爆發後的戰爭，必然遷動全川人民的生活。

現在四川的人民的痛苦已經是到了嚴重的時期，譬如劉湘在下東各縣籌公債二百萬元（重慶市民擔負八十萬，各縣擔負一百二十萬）他下面的小領袖又加籌月捐（如忠州每月二十一萬元）以及各種苛雜附加。鄧錫侯在自己防區內共籌公債四百萬元，以二百萬擔負在成都市民身上，田頌堯在潼川各縣的剝削也不下於其他軍閥。因此，促成了四川各種的危機到來。

第一我們看見的是鹽業經濟的衰落，行商受苛捐雜稅的影響，不願購運鹽勛，政府曾強迫要行商購買五百載，而行商則消極的逃跑，又因為封建地域的束縛之下，包商包

銷，分引分岸種種限制，使鹽業銷場，一天天更加縮小，形成「產浮於銷」的現象，井灶主不得不採取縮減生產，可憐的實行生產合理化。以致如大坡堡從去年三十六口井，現在減至十六口井，並且經常起推的只有八口井。又因為鹽業的衰落，影響到附近各縣工業和農業的破產，譬如榮威的煤礦工業和富順各種與鹽業有關之手工業以及運輸工業都跟着蕭條或破產，鹽業為四川主要經濟之一，牠當然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一般人民生活的惡化。

第二是商業危機的加緊。如重慶一月至四月，倒閉的較大商號，竟達廿家左右。列表如下：

倒閉商號		倒閉銀數（以兩為單位）	
鴻信		三〇〇〇〇	
李白先		一〇〇〇〇〇	
嘉祥		二二〇〇〇〇	
安記		一七〇〇〇〇	
裕成通		四二〇〇〇〇	
謙和		一六〇〇〇〇	
寶林		五〇〇〇〇〇	

協通	四〇〇〇〇
華璋	四〇〇〇〇
致和	一七〇〇〇〇
蜀興	二〇〇〇〇〇
西記	一三〇〇〇〇
宏裕	一七〇〇〇〇
川江	三〇〇〇〇〇
陳禹門	一二〇〇〇〇
永聚元	四〇〇〇〇〇

共計倒閉二三六〇〇〇兩（四月廿六號大中華報）

這表只列入了三萬兩以上的，至於三萬兩以下的不知有多少。一二萬兩和七八千兩的倒閉，至少也有百家左右。劉湘劉文輝，看見川南的鹽業和川東的商業，有這樣逐漸破產和倒閉的現象，申匯暴漲，物價一般的貴到幾乎一倍。不僅影響到社會的金融，城市貧民將因此而引起極大的騷動，特別組織了一個『川東南商業整理委員會』。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至多只能使幾個大商人和鹽灶主借此以控制各個小商人，毫無實際的意義。譬如，夏布業之倒閉，苛捐雜稅實促牠實現的主要動力。從榮昌到

重慶，爲程僅三百里，而所納之捐稅，除正稅外，苛捐雜稅竟達十五次之多，其他各貨運輸也同樣平均在廿里路內有一個關卡。茲將由榮昌到重慶每件本值卅七元之夏布除正稅不計外應納之苛捐列下：

捐稅名稱	應納數目
邛亭鋪護商印花稅	○·九角
津永瀘護商捐	二·七五角
津永瀘團費	○·七五角
大安場印花稅	一·角
馬坊橋山防捐	一·角
小馬坊橋山防捐	二·四角
來鳳驛護商印花捐	○·八角
渝北護商印花捐	一·二五角
渝北江防捐	一·二五角
渝北分收捐	○·八一二五角
渝北印花捐	一·角
重慶統捐	三·角

重慶統捐附加

一·二角

重慶護商捐

○·七二五角

重慶商團捐

○·二四角

共一·九元強

除了這些苛捐雜稅而外，還有什麼卡員驗丁的手續費，茶酒費……合併正稅，其稅率達百分之八九。在這種層層捐稅之下，任使用什麼整理委員會也『整理』不好的。川西，川北無論任何一個城市的商業，都沒有方法可以使牠活躍起來！

第三是一般工業的破產特別是手工業的破產。譬如重慶的絲廠除了日本資本的而外，其餘中國資本的五六家今年幾乎都不能開門，直到最近才勉強的開工。潼川，嘉定，順慶，各地的絲廠，都不斷的減少。資內的糖業生產，榮威的煤礦工業，都帶着每况愈下的趨勢。至於手工業如重慶的鐵木機織布工業，由三千餘架機頭減少到一千餘架。成都的機織工人由一萬餘人減少到四五千。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看得見手工業的破產非常迅速。

第四交通工業也同樣的衰落，譬如來往宜渝的輪船由三十餘艘減少到十餘艘。並且這些四分之三是日清，怡和，太古的輪船。行走上游的小火輪，也由卅餘隻減少到十七隻。這一面證明交通工業之衰落，一面更證明民族商業的衰落。自然，在相反

一方面，帝國主義商品的進攻，更加厲害。軍火的輸入也以這時期為最多。美帝國主義更籌劃辦一宏大的桐油公司，壟斷全川桐油市場。

第五是農業的恐慌。去年的秋收天旱和小春的沒有收成，各地軍閥勒種鴉片煙，各種錢糧預征，團費，馬路捐，過道捐……使農民大批的離開農村。荒廢土地，成千累萬的農民流為土匪或神兵，大批的農民形成『吃大戶』的騷擾。

總而言之，四川絕不能如一般和平主義的夢幻者或國民黨政客所歌誦的——天下太平了！

## 二 羣衆鬥爭之開展

四川決不是獨立的王國，不是中國整個政治經濟的劃外，在全中國鬥爭的形勢已經走到直接革命的前途，巨大的浪潮不會湧進夔門以內去。更不能說帝國主義特別恩惠四川不加緊對四川的商品進攻和製造軍閥的混戰。如果我們沒有理由否認上述的事實，我們決不能用『四川經濟落後』『民衆文化水平低落』這一類辭句來抹煞羣衆鬥爭之復興的形勢。

自然，我們也不能過分的非馬克斯主義地說，四川馬上就有一個全省蘇維埃的成功。但是工農兵士貧民，在生活日益惡化之條件下面，消蝕了許多畏縮的情緒。的確，他們從一切危機之到來這一真實的革命基礎上，開闢了偉大的鬥爭的坦途。



我們且舉幾個主要鬥爭的事實來說一般的狀況：

### 一、自井鹽業工人的大罷工

自井鹽業工人，從去年兩次總罷工失敗後，他們更加認識了資本家殘惡的面孔，積極準備着第三次總罷工的行動。年關時候，在赤色工會領導之下，發動四五千人的經濟鬥爭，得到了相當的勝利。今年井灶廠主，盡量的改變生產合理化的組織，減少工人，壓低生產，加重工作時間，使一般工人感受失業的恐慌和生活的痛苦，失業鬥爭和經濟鬥爭匯合而成了這次大罷工的偉大行動。

三月十六日，郭家坳全體車水工人宣佈了同盟罷工。同時，大坎堡的失業工人也舉行了壯嚴的示威遊行表示援助。遊行的路線經過來龍壩到工人區域解散，沿途高呼：援助郭家坳工人罷工，要工做，要飯吃……等口號。十九日資本家勾結駐軍武裝鎮壓，廣大的羣衆用堅實的團結，竟能衝破了這一武裝的鎮壓繼續罷工的前途。資本家更殘酷的一面斷絕工人伙食，一面拘捕工人，宣佈如不復工者，處以槍斃。於每廠門前按置軍隊和團隊不許工人出外，工人仍積極的組織大坎堡在業工人的同情罷工。二十一日大坎堡全體罷工實現了，長土工人也非常表同情，漸漸的推動這一罷工瀾漫到整個井區。資本家非常恐慌，僱用黑老表（即附郊失業的農民或苦力，沒有做過鹽業工人的）來車水，威嚇工人，工人竟衝擊了駐軍和團練的防守到觀音灘驅走黑老表，拖回

水車表現了非常勇敢的行動。廿三日資本家派請副官到竹子三講演，勸工人復工，叫工人不要受共產黨的利用。然而工人竟不稍稍爲他動搖，於是工人很強硬的提出了四個條件：（一）軍隊和團隊先撤退然後復工；（二）復工後廿四小時內實行增加工資每天一升米錢；（三）原人復原工；（四）復工後不得開除或逮捕工人。這些條件資本家終於在羣衆勢力之下完全接受了，二十六軍團撤退，廿七日總工會下令復工，工人認爲這次鬥爭，步調還不整齊，雖然支持到十天之久，長士機車工人沒有一致行動。目前正開始糾察隊的組織，總工會將此次鬥爭的經過和沒有得到更多勝利的經驗教訓，普遍的在工會支部內討論，準備下次更有力的反抗。

自井罷工的影響，又爆發了郭井關一萬餘抬鹽工人（提裝工人）反提裝行的自發罷工，這一罷工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 二、重慶鐵木機械工人的失業鬥爭

在手工業逐漸破業之下，工廠主只有更殘酷的剝削工人，特別是利用大批失業工人的弱點，控制在業工人，使在業工人在勿論何種苛虐的條件之下也不敢起來反抗。

重慶鐵木機械布工人，原來有三千左右，現在減少到一千二百上下，失業者佔一倍以上，主幫即乘此向工人進攻。第一改計時爲計件，每天限定工口，工口不夠，則扣刻工資。因此，工人每天至少須做十四小時工作，萬一某件布重量不足，老板即強迫

以市價賣給工人，以爲懲罰。第二是低合銀價，從前每元換七千幾，現在換十三四千，但是現在老板給七千幾百文，便與工人合成一元。第三是不準工人出街，從早晨六點鐘到晚間八點鐘，工人須在潮濕黑暗的機房不斷的工作。第四盡量的招收學徒，利用學徒與成年工人鬥爭，利用學徒代替成年工也工作，使他們更快的失業。第五是強迫工人加入『老板工會』，一面免得工人出外開會，一面大抽會費每月半元。此外有種苛例，如不准與女工談話，違則罰錢或開除，伙食不加改良，每月沒有休息日……等等。至於工資每月至多不過四元。

工人在這樣剝削之下，去年在黃色工會領導之下，作了一次鬥爭，由社會局仲裁會議調解，勞資雙方簽定從今年起增加工資十分之三。去年放工時，老板亦叫工人早去上工。

但是，今天工友到廠時，老板一致拒絕工人說：『我們折了本，不能開工了』，實際是老板不願加薪十分之三，反要工人『矮工低價』，一部份工人沒有飯吃，他只好忍痛的去上了工。這很明顯的，主帮由欺騙的方式，變而爲公開進攻的形勢了。

最後剩下百餘工友，流落在外，到了乞丐境地，無可奈何。只好去找鐵機工會（黃色工會）工會說：『去找社會局好了，我們不管』。工友於是到社會局，要他們給工做，給飯吃。社會局說『總是你們太懶，老板不要你們我有什麼辦法呢？』工人非

常氣憤，自己組織了一個失業團，一面在工人，士兵，警察中募捐，維持生活，一面宣言與主幫及黃色工會社會局作長期的奮鬥。

失業團領導着全體失業工人到社會局示威黃色工會社會局初則以話威嚇！「把你們通通捉去關起」！工人大呼：「我們橫豈沒有飯吃，好的，我們願意這樣」！於是社會局又用欺騙的話向工人說：「你們暫時各人回去，下月無論如何強迫主幫履行條約」。工人認識得非常清楚，知道這不過是緩和工人的情緒，想另一種方法來襲擊工人，國民黨社會局和黃色工會整個的假面具揭破無餘了。羣衆高呼：「打倒社會局」！「打倒黃色工會」！到街上示威遊行一二小時。

第二天工人以自己羣衆及各赤色工會，兵聯，警聯代表的羣衆力量，一廠一廠的掙進工廠，自動開工，老板在羣衆勢力之下完全屈服了。

三月十五日，全體織布工人，開了一度失業鬥爭勝利慶祝大會，通過了赤色工會鬥爭綱領，正式宣布舊的黃色鐵機工會的死亡，并通過了新的鐵機工人聯合會的組織案和增加工資總同盟罷工案。

三月二十日新的工會成立，國民黨公安局也不敢解散會場。可是主幫則異常恐慌，收買工賊，搗亂，造謠，結果，工人的團結仍是非常堅固，在大會中并高呼「擁護蘇聯」！「擁護中國共產黨」！

三月三十日又召集全體工友，討論罷工問題，主幫一面唆使工賊造謠，阻止羣衆開會，一面報告公安局逮捕工人，解散會場。雖然捕去工人三人，會場被解散，然而工人情緒更加熱烈，臨時改變開會地址，具體的討論總罷工的佈置和糾察隊的組織。

三月三十一號，又召集羣衆大會，一面紀念「三三一」慘案，一面決定罷工時間。

此時，重慶黃色市總工會，向公安局告密，捕去工會執行委員長和羣衆領袖二人。羣衆更加憤激，決定以罷工來援救被捕工友，加緊反國民黨政府機關和法西斯化的黃色市總工會。

這一鬥爭，雖然還沒有結束，但工人一步一步都是採取進攻的策略，他們衝破了國民黨的法律範圍，從鬥爭中爭得了赤色會工之公開的存在，從鬥爭中恢復了工作，推倒了黃色工會。

### 三、重慶兵工廠白藥工人的罷工和全廠工人的失業鬥爭

重慶兵工廠三千餘產業工人在劉湘趕造殺人武器加緊工作之下，年關不放假休息，白藥工人四百餘人，自動的宣布罷工，其餘造機工人子彈工人，造幣工人也同時怠工。廠方恐怕這一風潮擴大對白藥工人提出的條件：休息五天，預支薪餉一月完全接受。五天休息已滿，工人又強迫多休息一天，廠方也莫可如何。復工前，工人大開慶祝會。

這一罷工，影響到全廠工人，都要起來與廠方鬥爭。當時工人提出三條要求：一，年關休假；二，年關給獎；三，年關雙薪，工人準備大年（正月十五）一致罷工。但廠方得此消息，以先發制人的手段，將白藥廠門封閉，放出謠言，說是要全體開除白藥工人使白藥工人與其他下江工人（子彈，造機均是下江工人）分化，但廠方後來看見下江工人採取一致的行動又散布流言，說要將全體下江工人開除，使川江工人脫離下江工人的影響。但是工人雖然有許多地域觀念的弱點，廠方對他們一步緊逼一步的進攻，還是認識很清楚。工人方面積極組織全廠的同盟罷工，抗議軍閥資本家的進攻，并提出反對軍閥戰爭的口號。

廠方的陰謀，以爲首先關閉一部份廠門，借此威駭全體工人。如果工人表示軟弱，廠方即一面淘汰活動份子，一面改行包工制，工人知道這個消息，羣情憤慨，將包工頭高某（工程師）毆打一頓，廠方於是增加護廠兵，宣布戒嚴，準備以武裝鎮壓工人。十二日軍閥資本家關閉全廠威駭工人，三千餘失業工人，非常恐慌向廠方提出要工做，要飯吃，停工期間照發工資，廠方已發每人一月薪資，但工人仍繼續要求開廠。

在這鬥爭尖銳化的時候，資本家寧肯把工廠關閉起來，使工人失業，使工人無可如何完全被屈服在他們苛虐的條件之下，重慶兵工廠的關閉，就是非要工人承認包工制不開廠，資本家的面孔真像鐵一般的冷酷呵！

#### 四、重慶油漆工人包圍法院的鬥爭。

油漆工人領袖蕭樹云被主幫勾結清共大同盟密告於公安局，說他是共產黨被捕入獄，全體工友，認為蕭樹云完全是為工人謀利益，無故被捕，集合到公安局要求釋放，公安局即秘密將蕭解到法院，工人第二天會同各赤色工會，兵聯，警聯代表二百餘人前去包圍法院示威，要求無條件的釋放他們的領袖，工人衝破了衛兵的阻止，到法院內高呼口號，并開羣衆大會，各團體代表都有熱烈的講演，兵士聯合會代表更鮮明的向工友們演說『你們鬥爭時，我們幫助你，我們暴動時，要你們來領導』法官初則威駭鎮壓，而羣衆仍咆哮呼喊，法官只好承認羣衆立即傳密告人對審，密告人（清共大同盟常務委員）聽說工人聲勢很大馬上逃避起來，羣衆認為不能馬上得到結果，後到街上遊行示威高呼『打倒法院』，『打倒清共大同盟』……等口號。

第二次審訊時，工友們又全體到法院，要求馬上釋放蕭樹云，法院要工人具保狀，工人說『既沒有人對審，又沒有任何證據，當然無條件的釋放。』堅不具保，法官只好推委要得軍部的命令才放人。

工友雖然沒有得到好的結果，他們充分的認清了國民黨的法律是什麼東西，更了解了『司法獨立』又是什麼一回事！

#### 五、成都黃包車夫的總罷工：

三月份成都三萬餘黃包車夫，宣布了總同盟罷工，這一罷工的浪潮，揭破了改組派之無恥和第三黨的欺騙。

照常地車夫工人的生活來說，可說在市政工人中最痛苦的了，每班車租由三千五到四千文，（即每天由七千到八千文）但車夫每天至多不能拖到十二千文（銀元每塊十五千）在此物價騰貴，食米飛漲之時，車夫維持個人最低限度之生活也沒有，但是，車行反在此時一致的佔加車租每班爲五千文，工人於是自動的全體罷工了。

最無恥的改組派，提出『少加車租』的口號在工人中宣傳，主張『車夫與車行互相讓步』除了最少一部份落後的工人受他影響而外，大部份工人非常唾棄他的。其次是第三黨借政治的力勢，來欺騙羣衆，他主張『不加車資』，事實上在當時羣衆最近切的要求是『減少車租』應該領導羣衆這一更迫切的要求，『不加車租』客觀上還是替資本家消滅鬥爭，出賣工人利益的。共產黨不僅主張不加車租，更積極的提出『減少車租』『每月歡迎兩天』（不給車租的意思）最後，因罷工過久，羣衆的生活無法維持，第三黨借市政府（第三黨在成都的背景）的力量，完成了他『不加車租』的舞斷的欺騙。這次罷工，實際上是失敗了，工人也得進一步的來認識了國民黨系統下的改組派，第三黨都是一樣的無恥與欺騙。現正準備着在共產黨獨立領導下的第二次罷工。

六，川西獨輪車工人的武裝鬥爭：



川西獨輪車工人，在一萬以上，自從去年卸件改用駱馬運輸以後，生活即感覺非常痛苦，隨後，汽車公司又用汽車裝運貨物，獨輪車工人更是痛苦非常。他們曾經作消極的反抗，約集數十人橫臥馬路上讓汽車開來把他們輾死，但公司方面仍不讓貨物給他們運輸，工人只好盡量加重運輸，減少運費與公司爭生意，大家都改用鐵輪（鐵輪每次可運六七百斤，且少費力）公司認為這容易把馬壓壞，不准工人走中間，只准梭邊邊，不聽從的，即由公司所招的護路隊，將車子坎濫，提去鐵輪，兩三月來南門外被壞之車竟達五六十架，工人憤極忍無可忍，約集受害之車夫，將馬路上橋梁完全撤去，並將壞車堆集路上汽車開到時，工人各持犁頭鋤頭，忽出而襲擊，護路隊即下車與工人對抗，但車夫人多勢大，護路隊不敢動作，開車轉去。工人馬上號召約七八百人，各持小旗到城廿內四軍部請願，要求賠償損失，軍部支唔不給工人答覆，工人於是到車站衝進鐵門，毆打公司內的管理人，護路隊多同情工人，不敢鎮壓，駐軍趕到，向天鳴槍，羣衆鎮靜非常，官長婉言勸慰，承認勒令公司賠償，工人始慢慢散去。

兩天以後，仍無動靜。此時工人在川西獨輪車總工會領導之下更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起來，西外，北外，東外各路均一齊動員，不得勝利不止，社會局出來調解工人不接受，要直接與公司交涉，曾經作了一次二千多人的示威游行，一般市民，特別是學生羣衆十分同情，現準備在五一作更大規模的示威，如果政府要以武力壓迫，他們擬作巷戰

的答覆。

此外這三四月來還有很多的大小鬥爭，在成都來說有：南外兵工廠二千餘人的索薪鬥爭，東外機械廠反對開除工人要求加薪包圍經理會計的鬥爭；春熙路六百餘店員工人反虐待的鬥爭，三倒拐鞋業工人的年關加薪鬥爭，銅業工人反黃色工會的鬥爭，建築工人反行會抽收會金的鬥爭……等等。在重慶有印刷工人的加薪包圍經理室的鬥爭。鞋業工人加薪的鬥爭，白毛工人加薪的鬥爭，提莊工人加薪并反黃色工會的鬥爭，渡船工人反苛捐的鬥爭，洋服工人反黃色工會的鬥爭。棉紗帮店員工人反虐待的鬥爭。南岸運輸工人反日帝國主義的鬥爭……其餘各地都有蓬勃不斷的工人鬥爭。這一形勢，從一九二七年「三三一」慘案後所沒有的。自然在這一些工人鬥爭中，還帶着大部分的經濟主義的傾向。但誰也不能否認這是革命復興的具體表現。不僅城市的工人起來了，而士兵和警察也同樣的爆發許多偉大的鬥爭，如重慶警士總共只六百餘名，在士兵聯合會領導之下的達到四百餘名，并發動了全體一致的援助韋植聲無故被捕及其他無故竟革職的羣衆鬥爭，兵士方面在砲兵營也發動過鬧草鞋的騷動在涪陵組織了郭汝棟的兵變，兵變後到花村中發動羣衆，建立了鄉村蘇維埃政權，江津的士兵會自動的號召了兩連人的兵變，將團長拘禁起來，準備處以死刑。其餘有羅澤洲某營全營的譁變。劉存厚王光宗旅全旅的兵變。兵變後有自動到萬源找紅軍的。在農民的鬥爭來說，

一般的超過了減租反捐稅的鬥爭。萬源游擊戰爭已經由鄉村發展到進攻城市，兩月前即將城口縣城攻下，宣佈了沒收土地，槍斃了縣長，解除了駐軍王耀清全團的軍械。現正集中紅軍力量向梁萬發展與培豐忠游擊戰爭或農民鬥爭匯合，在榮威一帶農協組織逐漸恢復，準備發動游擊戰爭，在宜賓南六縣的遊擊隊也同樣有壯大的可能，在梁山農民曾徵發了地主的穀米四五百石，創辦了農民學校，組織了二千餘農民赤衛隊，達縣南嶽垭農民會有一千餘人的示威打團練局反紅燈捐的鬪爭，在綿竹有三四千人圍攻縣城的農民暴動……這一些事實，充分表明了，各種鬥爭已求得了自然的配合。在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鬥爭，有成都支持二十多天的全體罷市反印花稅警察捐，潼川有十多天的罷市反田頌堯的公債，在重慶南岸有五渡十三碼頭的罷市反對席酌捐和全市大罷市的醞釀。成都有過二十餘次不斷的學潮……這又證明了，不僅工農兵運動有平衡的發展。而市民小資產階級也更加對統治階級不斷的打擊。

### 三 羣衆鬥爭發展的前途

四川一般羣衆的鬥爭，無疑的在全國革命浪潮之偉大的推動下，走上了鮮明的政治的直接革命形勢。工人階級的鬥爭，領導着農民的土地革命如飛似箭的向前猛烈的發展着，使得豪紳軍閥政府，在革命浪潮之前發抖。

共產黨在廣大羣衆中的政治影響的增大，更是促進新的高潮之主要的動力，重慶自

從一月五號，反軍閥戰爭示威的公開號召後，不僅發動了大小十五次的工人鬥爭，而且在每一次鬥爭中都表現了羣衆自己的力量和反國民黨軍閥政府的決心，成都在『二一六』慘案紀念會被國民政府摧殘逮捕後，公然在『三三一』慘案紀念在公開號召之下，徵調了二千餘羣衆的示威大會，這一示威，并衝破了敵人的白色恐怖，游行路線經過四五里路，到最後羣衆情緒更加高漲，將成都國民黨官僚職工會搗毀，政府雖然逮捕了大批的羣衆，但在羣衆要求釋放被捕同志的聲威之下也得全部的勝利，重慶的劉湘軍閥，雖然他這次用了極野蠻極殘酷的白色恐怖，逮捕了二百餘革命的工農兵士學生羣衆，屠殺了共產黨的重要工作同志，然而他能撲滅整個的革命浪潮嗎？重慶的工人更加興奮起來，鐵木機工人積極的準備同盟罷工，江北兵工廠工人也積極準備反工頭鬧火食的鬥爭，渡船工人和提裝工人決定五一的總罷工行動，涪陵的遊擊區域一天天更加開展，劉湘自己的部隊也較前更爲動搖。市民醞釀着的罷市反抗公債，如果劉湘沒有法子能夠消滅那一切政治經濟的危機，他不能戰勝各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所引起的一切矛盾。他必然在最近的將來在廣大的工農兵士羣衆前面受着最後的裁判！

或許有人以爲四川的經濟落後，羣衆的鬥爭也必然落後。這完全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取消派心理。自然，四川的經濟比較落後，但這只能說明鬥爭的方式落後，羣衆的組織落後，鬥爭一樣的在轉變他的新形勢。黨只要能夠艱苦的去戰勝目前一些實

際的困難。在正確的黨的策略之下去發動羣衆堅決的去組織幾個中心城市工人的政治罷工，擴大萬源，城口，涪陵等縣的赤色區域和榮威一帶的游擊戰爭的領導，組織幾個中心部隊的士兵暴動，使這些鬥爭能夠有計劃的求得配合，雖不能說在全國範圍內有四川一省單獨的首先勝利，至少在全國某幾省特別是武漢鄰近幾省勝利中，四川一樣的可以趕上客觀的蘇維埃政權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的要求。第一四川共產黨和羣衆吸收了湘、鄂、贛，粵許多農民鬥爭，尤其是上海工人鬥爭的經驗教訓，這些血的珍貴的寶物，只要能活潑的運用到四川，教育黨，教育羣衆，必然要少受着很多嚴重的失敗，迅速的達到任務的實現，第二四川軍閥的戰爭，雖然仍帶着過去一貫的形式，——同樣的反革命戰爭，但牠有牠這次爆發的意義，前年的下東戰爭，去年的東道戰爭，一般人民對他的態度，只存着希望和平，幻想軍閥的覺悟，甚至黨在那時陷於非常之機會主義的路線，沒有堅決的採取失敗主義的策略，現在呢？，不僅黨能夠在軍閥戰爭中號召廣大的兵變和羣衆的武裝鬥爭起來變軍閥戰爭爲革命戰爭，爲革命的蘇維埃的戰爭，一般羣衆也將脫離那種『希望』『幻想』的夢鄉而走上動的鬥爭道路。第三全國革命浪潮，直接幫助了四川鬥爭的發展，譬如重慶反軍閥戰爭的示威，成都『二一六』『三三一』兩次的示威，各種工農兵士鬥爭之很快的走上政治鬥爭的前途，決不能說毫無全國的影響。特別是全國紅軍的壯大，蘇維埃區域的擴張，這是給四川沉靜的民衆一個很大的震動。

第四，這最根本的一個條件，是一切危機的到來（如前面所說）工，農，兵士城市貧民生活之極端惡化，農民無限的破產而流為原始行動（如涪陵一縣有三四萬土匪，沒有一個農民不是土匪，各縣都有神兵的組織）工人普遍的失業形成社會的騷亂（如重慶今年失業的工人在三萬左右，成都也經常有兩三萬人的失業，自井失業成了全區工人的恐慌）士兵的欠餉一般在六月左右，兵變成了普遍的現象。再加上許多地方的天災水患，飢民普地皆是，（川北許多縣份）過去雖然說四川怎樣的怎樣的危機到來，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厲害。

我們估計四川羣衆鬥爭的形勢和其發展的進途，決不要機械的去從牠本身的組織和目前鬥爭方式上去罷，一定要把上面所述那四個條件合併起來去估計，否則，定然會以『羣衆組織薄弱』『階級意識模糊』『經濟主義濃厚』……等一類的觀念無意中在原則上取消了政治罷工，游擊戰爭，士兵暴動的領導，這是客觀上幫助了國民黨政權的延長！

因此，我們要堅決的領導羣衆走上四川全省或全省範圍內某幾個區域內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最後我舉幾件實際的例子，來作為我這篇文章的結論：

第一、榮威的農民鬥爭，去年六七月內已走上了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的前途。他

們自動的集中武裝，解除地主階級的武裝，更進一步準備向駐軍攻擊，但是，黨和農民協會下令停止了農民的這種直接行動，主張『分散武裝』，『整頓後再幹』。結果，駐軍下鄉包圍，按戶搜索，將農民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得的武裝一支一支提去，農民領袖也一個一個捕去槍殺，於是農民說：『早知這樣，該不聽農民協會的話』。

第二，宜賓去年的減租鬥爭，在行動上，農民已踏進『抗租』的範圍，他們認識得很清楚『只有拿槍去打地主，才能得到勝利』，農民圍瓦屋，圍大塔都首先舉起槍來要向地主開槍，黨和農民協會却命令羣衆『靜候交涉解決』，農民有氣得暴跳的，甚至有武裝農民竟因此脫離農協拖到山上去了，後來地主階級一面在交涉上允許農民減租，一面暗暗派兵襲擊農民，結果，農民失敗，捕去農民領袖三十六人鎗斃。黨在這次鬥爭失敗的經驗教訓的決議案上還說，游擊戰爭槍斃地主不過是威嚇他使他屈服，然後從『交涉』中實現我們的要求，『這次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由於農民不聽命令自由焚燒房屋的盲動』，『搶地主的谷子是野蠻行動』！現在農民都有這種心理：『倒是大幹起來，恐怕不會拿與軍隊殺頭吧』！

第三，江津的兵變，羣衆自動的將團長拘禁起來，要槍斃他，說他反革命。私辦兵士，黑暗專制，軍支認爲『兵變條件沒有成熟』命令他們將隊伍拖了回來，於是上級長耳一面用改良主義欺騙羣衆，一面用白色恐怖鎮壓，以致許多活動的士兵不能立脚，通

通被趕了出去，羣衆也覺得有些灰心，找不着出路似的。

從上面的三件事實中，我們如何的看出羣衆的鬥爭的形勢，牠教訓我們革命的黨，也指示了一般鬥爭的出路，只有進攻才能衝破白色恐怖，只有進攻才有徵調更廣大的羣衆，只有進攻才能爭取更多的勝利，只有進攻才能建立工農兵士蘇維埃政權！

一九三〇，五，一五日於上海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第三卷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